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干枯风流情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第一章 重逢

在锡城市货运总公司，哪一个工作场所，最脏、最破、味道最难闻、人们最少停留脚步？是修理厂清洗汽车零部件的碱水缸。可是，就这样的破地方，脏地方，鬼地方，最近一段时间，却突然熙熙攘攘的，一下变得热闹红火起来。这时候，虽然姚文元已经在上海《文汇报》上，吹响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化大革命进军号，全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老百姓，却还懵懵懂懂的，抱着充耳不闻的态度；头脑中多少有些印象的政治新句子，只是“毛泽东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之类的至理名言。但按照目前这碱水缸前发生的情况看，另一句出在古人嘴里的名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似乎证明也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属性。之所以出现上述的反常，全因为近来烧碱水缸的清洗工，换了一个据说有沉鱼落雁、倾城倾国之貌的女人。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却使一向冷冷清清的荒芜之地，一下变得车水马龙，人丁空前地兴旺起来。

这所谓的碱水缸，其实是一个宽约两米、长约三米的水泥清洗池，池内是一个距形的大铁锅，铁锅中注入一米多深的碱水，下面用炉火加热至沸点，汽车保养修理过程中拆卸下来的大大小小的部件，小的装在圆筒形的铁丝箩筐里，大的如变速器、曲轴箱之类，就用钢缆套在滑动葫芦的勾子上，拉动铁链吊起来，再利用按装在碱水缸上方的滑轨，牵引到缸中，放入具有强劲去污作用的浓烈碱水中去浸泡；必要时，辅之以钢丝板刷的人工摩擦。在烈日炎炎的夏天，一走近那两壁被油烟熏黑的过道，就能闻到一股股扑鼻而来的强烈烧碱气味，和黑油机油汽油味。从炉火和煮沸的水池中散发出来的阵阵热浪，烫辣辣地，烤着操作者皮肤上不停出汗喘气的汗毛孔。在滴水成冰的冬天，刀割一样的凛冽北风，在长长过道里象受了什么委屈似地，满地肆虐打着滚，呜呜地鸣叫着，直扑这间朝北而座的简易棚。这简易棚，不过是利用汽车大修理车间和公司围墙之间的一条狭走廊，在走廊尽头用石棉板，由南而北地延伸四五米，草草地盖了一个斜斜的顶。也许是因为考虑到了夏天那股呛鼻的味，顶上做了一个大大的烟囱形的出气孔。然而一到冬天，那朝北的一面既没有门，这出气孔就同那个长过道上下串通起来，组成了一条似乎专供空气对流的巨型通风管。在数九寒天，最吸引人的地方，必然是那些背风朝阳的处所，没有西北风的侵扰，却有太阳的光辉和温暖，无论是蹲着干活，还是围坐着聊天吹牛，其乐也融融。因此，即使是没有那呛鼻的气味，在寒冬腊月也没有哪个人，会在那个巨型通风口前招惹西北风。由于这些原因，碱水缸前虽然有一张供人歇息停留的乌不溜秋的长条椅，那椅子上通常都是空荡荡的，连翅膀扑楞得酸麻的麻雀飞过，也决不会把它当作歇脚的地方。如今却时来运转，发配来了一个使人赏心悦目的“淑女”，众“君子”们便趋之若鹜，对种种毫无变更的恶劣环境条件，全然变得置若罔闻。如果有旁观者懂得一点联想和逻辑推理的话，思想上是会出大问题的！因为承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颠扑不破真理的小前提，又笃信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大前提，两个前提一连接，就可能会荒谬绝伦地引伸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于毛泽东思想的结论来。而在那个年代，昏头昏脑作这样的推论，是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的。我们亦由此可看清：在人

类逻辑思维的路程上，陷阱丛生；稍不留心，在不提倡宽容的时代，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在宽容兴盛的时代，则可能真理谬误一锅煮，明明是混淆视听、误人子弟，却可能借着逻辑推理的招牌，大言不惭，振振有词地招摇过市。

别看干这烧碱水缸的行当，又脏、又累、又被人瞧不起，来干这一行当的人，通常却都不是等闲之辈。虽然这一职位归修理厂管，它的安排分配权，却直属公司保卫科傅科长亲自掌管。原先负责这一工作的，是一位曾经当过国民党市政参议员的老反革命分子。看他那副尖嘴猴腮、在呼呼寒风中清涕淋漓缩成一团的可怜相，实在很难使人想象出他当年耀武扬威的风光与体面。看着这个年老体衰的干瘪黑枣老头，在没遮没拦的西北风中瑟瑟发抖，慈悲为怀的傅科长不是出于怜悯历史反革命，而是考虑到：如果这个改造对象挺不住考验而被严冬送往西天极乐世界的话，物色接班人的问题，并不象外界人士所想象得那么容易。因此就向有关方面建议，能否考虑把过道出口用墙封住堵死，在大修理车间一侧墙壁上打个门。这样改道进出，又能挡掉西北风，修理车间的工人送件清洗时，又可以省脚步。但是公司基建科的技术权威却认为：在那个车间墙壁部位打个门，会直接影响整个建筑的结构强度。傅科长虽然知难而退，却执着于革命人道主义的考虑，叫人在简易棚门前挂了两条兰色棉帘子。

岂不知，这棉帘子有很大副作用。出入碱水缸送件清洗的那些工人，大都同时带着一双沾满油泥的乌黑的手。沾满油泥的乌黑汽车零件，可以扔到碱水缸里洗一洗；沾满油泥的乌黑的双手，却不能交给历史反革命分子作同样办理。如果手边没有擦手用的回丝，而正好想掏烟点火，或被寒风刮出来的鼻孔清涕，要想用手背擦一擦，那棉帘子，就成了最理想的擦手回丝。因此不出半个月，兰色的棉帘子，就变成了一片乌黑色，亮光光的，好象淌着油。这对那些并不总是带着油泥双手去碱水缸的爱洁人士，面对这应该也浸泡到碱水缸里洗一洗而不应该挂着挡道的棉帘子，无论用手去掀，还是用肩去顶，都觉得心里腻腻的，十分地不方便。而对某些阶级立场坚定而又喜欢简捷方便的人，即使棉帘子很干净，推着载满一堆部件的铁轱辘车，或抗着一大件东西，走进走出时，突然需要多一个掀棉帘子的额外动作，自然也是非常地不习惯和不耐烦。那位昔日堂堂市政参议员，虽然成天跟油污打交道，或许骨子里仍然非常爱干净，或许是敏感地意识到了一部分人心中的不满和诅咒，也可能是已经预感到自己烧碱水缸的日子屈指可数，竟临寒不惧，自动自觉地把棉帘子卸下来，放在刚换清水的碱缸里煮了一遍，晾在火炉壁上烘干后，千恩万谢地送回到了总务处。当人们欢天喜地度过了1966年的春节，懒懒散散地返回公司上班时，就再也看不到那位似乎被西北风吹得越来越小的干瘪老头。据说他是得了肺癌，躺在家里等候阎王爷的召唤。有人认为，这跟他常年累月受碱水缸的毒气熏蒸有关系。也有人认为，这是他自己走了一条精神上压抑成疾的路；年轻时作威作福惯了的人，怎么受得了老来天天受苦受难受蔑视呢？

碱水缸总得有人烧，新来的接班人，却大大出人意料。各种流言蜚闻，不仅传遍了把公司总部、运输五场和运输修理厂连在一起的这个大本营，连其它运输场的那些好事者，也会借着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修理厂，探头探脑地走到那个长过道前，寻思着能够靠近碱水缸一探虚实的理由或借口。碱水缸前那条黑糊糊的长板凳，是为那些修理排期紧、要求部件现洗现取的人士准

备的，因为冬寒夏热的恶劣环境，本来少有人光顾。可是自从来了神态端庄如淑女，骨子里据说却是极其淫荡风骚的女人，那冷落寂寞的长板凳上，却常常坐满了立等取货的人士。连那些一向习惯用汽油清洗保养小零件的驾驶员，也会突然心血来潮，凑忙轧热闹地改用碱水缸。

一个天暖回春的星期五下午，运输五场党员按惯例过组织生活，人们就七嘴八舌议论到了这一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反常现象。平时话不多、说起话来却一字一卯有人听的奚大雄，在蜚蜚扬扬的人声落定后，语气沉稳有板有眼地说：“依我看，如果这个女人犯的问题真够了格，应该送劳改就送劳改去。如果还不够格，这烧碱水缸的差使，确实不是女人干的活。可以改造人思想的行当多得很，在修理厂学门油漆工、汽车电工之类的技术活，对她个人，对企业，都有好处。现在闹得这么多人常去碱水缸处逛荡，影响不好。”奚大雄的话一落音，就得到了很多声音的附和。

个子矮小却肚有文墨且十分关心时政的场党支部书记丁荣兴，对这个话题一直没开口，这时他却绷紧了黄瘦的小长脸，阴阳怪气地说：“我看，咱们还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件事。”他主张运输五场跟修理厂联合起来开个批判会，把这个女人的黑底子原原本本兜出来，让广大职工群众认清美女蛇的丑恶真面目，不再受迷惑，以利加强对她的监督和改造。不知为什么，对这位基层党支书的意见，表示支持的声音并不多。大多数人，不是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就是静修气功般地保持沉默。

最后，下场了解党员意见建议和思想情况的公司党委书记邱铭详告大家：这个名叫凌漪的女人，原是市交通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借工作之便，有意接近一位主要局领导，利用色相，把这位“三八式”的老干部拉下了水。问题严重之处在于：她这样做是带有政治动机的，目的是要想借助这位局领导的力量，为她还在服刑劳改的右派丈夫翻案。考虑到她以前的工作表现尚可，事发后认罪态度较好，组织上就决定从宽处理，放到基层监督劳动。烧碱水缸是暂时的，如果表现好的话，以后可以考虑改换比较适合女性做的工作。开群众性批判会的事可以先放一放，看她一段时期的表现再作计较。如果不老实，不服从改造，再发动群众斗批也不晚。这位脸相和善、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转业干部最后说：“我们党的政策不是要惩罚人，把人往死里整。而是要给出路，使犯错误甚至犯法犯罪的，都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邱书记的话听上去不偏不倚，耳朵明白的人一听，就知道在骨子里是向着奚大雄的。这本来也是大部分在座的人所预料的。奚大雄也在朝鲜战场上当过兵，有相似经历的人，似乎总是更容易在思想或感情上取得共通点。而且他们知道，奚大雄在部队时，曾在司令部开小车，来公司以前又在市委小车队干过一阵子。大家觉得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讲起话来也不象一般的党员群众，只会跟着领导的调子做跟屁虫，而总是能说出一点子丑寅卯来。而且他技术上又过得硬，是安全行车四十万公里无事故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在基层企业单位，技术上有真本事的人，总是比较吃香的。然而奚大雄的吃香，还另有原因。

“老奚这个‘圆圆头’不含糊，不仅有水平，还有骨气。”这是在那些年轻驾驶员的嘴里，常能听到的评论和赞扬；他们习惯把有党员身分的人称作“圆圆头”。年轻人的这种评价是有根据的。

在市货运公司，最最使人眼红嫉羡的工作，是汽车运输调度，众所公

认的第一大肥差。

如果说当个六十年代的汽车驾驶员，是个吃得开的职业，那么汽车运输调度就是驾驶员的爹。不，是爷爷。因为在公司运输五场那些驾驶员中，确有不少在其他人的面前威风神气的角儿，一走到调度的面前，就觉得自己象小孙子；要打哈哈，陪笑脸。凑着周围没有人存心侦听刺探机密的当儿，还会鬼鬼崇崇压低嗓门偷偷地问：“上次从福建带给你的荔枝不错吧？又大又甜又便宜。怎么样，这次去山东，要捎什么？小红枣？莱阳梨？老母鸡？……。”处在爷爷位置上的叶调度呢，往往会漫不经心地哼一声：“你看着办吧。”一个正眼也不瞧他，把指挥发问者出征路线的运输路单一撂，随即转身向别的驾驶员，交代起出车任务来。

一心想讨好调度的驾驶员，习惯了这种“看似随意实机巧”的回应，对这种回应所意味的损失风险，心里沉甸甸地盘算着：路途迢迢，或抛锚，或撞车，或误路，或骄阳酷暑严相逼，莱阳梨会烂掉，老母鸡会经不起考验，擅自向阎王老爷去报到；小红枣呢，如果别的驾驶员撞上了价更廉、物更美的巧货，平时没有吨公里费收入的叶调度，碰上诸如此类的情况时，当然是择忧录取，灵活处理，没有理由对你照价认帐的。因为有言在先，“你看着办吧”——这不仅不是认购合同书，连是否有正式口头委托的味道也辨不准。然而开车的兄弟们，对此都已习惯了，好象是一条约定俗成的不成文法，比好多形之笔墨的成文法，更有权威和约束力。城市里的职工，各行各业都靠基本工资或再加上一点奖金。在运输公司开车的凭什么抖威风？未婚的靠什么吸引心高气傲的女孩做对象？已婚的靠什么向老婆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摆架子？关键就仗这吨公里补贴费。而这吨公里费得多得少，命运全掌握在调度的手里。

一个月内派你出几趟来回载货的远差，上北京，下广州，哗哗到手的吨公里费，可以高出死工资的一两倍。如果得罪了调度爷，尽给你跑不出吨公里的单趟货，或时间都耽搁在装卸过程上的短途货，一个月下来的吨公里费，可能还抵不上那些机修工的几个小奖金。因此，在调度手下讨饭吃的大司机们，就必须懂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硬道理。再说，叶子栋当调度前，也是开车出身。一坐上调度台的位子，权力虽然大了不少，却损失了转汽车方向盘时“三六九、现到手”的公里费，按科室人员标准拿几个平均奖，实在不能算是一种使人心平气和的补偿。驾驶员众兄弟们对此又理解，又同情，持之以恒地孝敬上一些出车外地捎带的便宜货，纯粹是小意思。可是那些不能尽情享受这类小意立场。

奚大雄家在锡山县的农村，离城八十多公里。不算远，但是一大半路靠搭乘农村公共汽车，另一小半路却要靠步行。回家看一趟父母妻儿，要化上半天的时间。因此他差不多要每隔头两个月，才回去一次；积一些星期天调休日，也好凑着农忙时节，帮助家里干掉一些农活。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有家在农村的汽车修理工冯有强，一名家在上海的助理工程师诸申，以及虽然家在本市却因家中太挤而不得不常来单位寄宿的青年司机李辉康。在这个位于第三层楼楼梯口的四人集体房间中，因为三天两头出车去外地，他和李辉康的床铺经常是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个集体周围发生的情况消息不灵通。只要他一回到这幢新造的四层公司宿舍楼，另外三位室友，就会又象汇报又象传达似地，向他输送各种各样的最新消息。这三人中，冯有强显然是最为热心的汇报传达者。比如，过春节后他所报的一条重要消息，

就是靠四楼楼层顶端的那个房间，变成了这幢大楼里绝无仅有的单人女宿舍。宿舍主人，便是“那朵被人扔到黑煤灰堆里的白牡丹”——操持碱水缸的俏女人。类似这样的头号新闻，他是一定要跟奚大雄分享的。

奚大雄觉得冯有强的比喻挺传神。那次组织生活后，听说丁荣兴还是让人在碱水缸的门口，刷了一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奚大雄有些不相信，因为这显然不符合邱书记那天立足于改造人的讲话精神。另外他只听说，这个女人长得如何如何天姿国色、容貌绝伦，却因为经常出车在外，从未有机会一睹风采。因此也借着清洗机油粗滤器的借口，去那碱水缸光顾了一趟。那标语，是明明白白地贴在简易棚门口的墙壁上了，黑字黄底，字体不算大，整个标语面积，大约跟驾驶室的两扇挡风玻璃一样大小。但是一个惊叹号，却标得又粗又黑，触目惊心地向心地善良、思想麻痹的人们作警告。整个碱水缸的周围，确实是一片黑污污的世界。被油污烧碱成年累月蒸熏的墙壁和棚顶，是乌黑的；碱水缸的水泥槽沿，是乌黑的；槽沿旁边两只专门存放油渣的废油桶，是乌黑的；架设在碱水缸上方的起重葫芦和滑轨，也是乌黑的；木质中吃透了油污的那张长条凳是乌黑的，那挨着火炉进口处的煤堆，当然更是一片乌黑色。

那位叫凌漪的女人，似乎头脑中具有讲究主体与环境色调和谐的艺术细胞，也追随周围环境中的一片乌黑色，上下套一身黑色衣裤。那黑色衣裤，也许还是她做大闺女时穿过的旧衣裳，裹在那欣长的躯体和腿上，圆滚滚地似乎显得紧了一点。奚大雄走进那简易棚的时候，她正用铁勺，把飘浮在碱水缸水面上发亮的油污，一勺一勺地掏进污黑的油桶里。与周围一片沉沉污黑相对照，她那两颊丰满的鹅蛋脸庞，却是白皙的，那粘贴着汗湿发络的后颈，是白皙的，还有她那从污黑手套与黑色袖管间露出一截圆润的手腕，也是白皙的。确有一点“黑煤灰堆里一朵白牡丹”的味道。按推理，她的年龄，起码也应该在三十多岁以上吧，但是在她脸上，却几乎看不出明显的皱纹来；只有当她转身时不自觉地扭腰摆臀之际，才暴露出，那体态和身段，是为少妇所特有。她的脸神漠然而冷板，两道秀长眉毛下黯淡无光的大眼睛，好象压根儿就不看在这块天地中进进出出的各种人。然而，她还是已经注意到了奚大雄手中拎着的机油滤清器，就抿着两片小嘴唇，对他朝身旁的一只铁丝箩筐努了一下嘴。奚大雄按她的示意，把滤清器放进了筐里，轻声问道：“你马上洗，还是我过一回再来取？”她抿了抿嘴，弯下显得十分柔软的腰肢，把一条纲缆套进了一只还在滴着黑油的齿轮箱壳，爱理不理地回道：“随便。”那声音，又压抑，又低沉，又冷淡，好象是从公司围墙之外什么地方远远地飘过来的。奚大雄注意到，当她抿动嘴唇的时候，她那刻板冷峻的嘴角边上，会显出一对引人注目的酒窝来。这种不是在媚笑之际显露出来的酒窝，却比那些随意抛掷的笑窝，显得更耐看，更动人。使奚大雄感到疑惑的是，这位据说用色相勾引老干部下水的改造对象，表面上，却看不出一点那类放荡女人常常盈溢于表的狐腥骚气，倒象是一名应该为之竖上贞节牌坊的烈女子。听了她那冷冰冰的口气，奚大雄转身欲走；却发现那只齿轮箱壳放得太远，她手里偏短的钢缆套绳，正好够不上葫芦吊钩。他想，她应该能挪动那只不算太沉重的齿轮箱壳吧。虽然他心里是这么想，一双粗大有力的手，却已经不由自主地抓住了那铁家伙和钢缆绳，毫不费力地轻轻一提，几步直接搬放到碱水缸的缸沿上。这时候，碱水缸恰好处在一个短暂的冷清时刻，因此对奚大雄这种见缝插针地讨好“劳改”对象的卑鄙行为，并没有旁观者。

那女人，也并没有因此对他道一声谢，然而总算是正眼朝他盯了一下，仍然只是把嘴角抿了抿，显出两个圆圆的酒涡来。

那一夜，躺在宿舍床上入睡前，奚大雄脑海里，老是冒出凌漪的脸容身影来。他并不是被这个女人名不虚传的绝色姿容所惊骇迷乱。他在部队机关和市委大院开小车，沾靠首长之光，观摩出入过无数美女如云的高档文艺表演和舞会；而是越回想那对嘴角紧抿时显现的酒涡，他越觉得自己一定在什么地方遇见过这个女人。可是，他跟市交通局毫无想到玉芳对那个女人的不贞，会作那种体谅和辩护，也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一段情况，跟她作交流。他觉得心口堵了一个木塞似的，憋得慌，好象需要找个合适的人，用铁棒通一通，才会松快一点。

可是这个对象，应该找谁呢？

玉芳看着自己丈夫好象丢了魂似的，突然想起什么兴奋的事由来，用劲来回摇晃着他的肩膀说：“看，只管说人家的事，忘记了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我要你猜，”玉芳卖起关子来。

奚大雄摇了摇头，觉得此刻委实没有那个心思和她捉迷藏。

“我告诉你，凌姐为了成全咱俩，她今明两夜到他男人父母那里去住。”

玉芳得意洋洋地收住口，两眼盯着丈夫的脸膛等反应。

奚大雄好象一下从梦里醒过来，“哦，什么？烧香人赶走老和尚。怪不得你开口一个‘凌姐’，闭口一个‘凌姐’叫得甜。你给我注意了，这称呼在公司里，可不能当作其他人的面乱叫。”

“看你这个老鼠胆，算是人家背后对你看错了眼。”

“我是老鼠胆吗？”在回公司宿舍的公共汽车上，奚大雄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他此刻对凌漪的认识，似乎深了一大层，而对自己的认识，却需要好好地琢磨琢磨，静心想一想。

玉芳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带着凌漪送给她的一本“孕妇须知”和一袋奶粉。对后一件礼物，玉芳的拒收之心是坚定的，但是缺乏持久力。因为在“孕妇须知”上，也明确告示怀孕时期，要增加营养，而要凭票供应的奶粉，则是农村中绝对罕见的营养品。玉芳以前从未品尝过，就难免生出一种好奇心。当她在轮船码头，把这种近似“受贿”的行为向丈夫坦白交代时，心里怯生生的，觉得自己有愧共产党员妻子的光荣和纯洁；但是她确认，这跟政治立场没关系。她觉得，那位穿军装大官的政治立场才真正有问题。大雄却并没有指责她，这跟她的预期相一致，尽管她心里总是惴惴的，有些不踏实。在那次公园谈话后的几天里，每逢玉芳谈到她的“凌姐”时，他已经不再象第一次那样，向她严肃地交代政治背景和对敌政策，而总是不吭声。以她对自己丈夫神情态度的琢磨和一贯了解，她隐隐约约地可以感觉到：大雄对自己所抱的政治认识，是抱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同情和支持的。

奚大雄觉得应该和许洪元，好好讨论一下有关凌漪的情况。他终于认识到，能够帮助他拔掉那个堵在心口木塞的人，就是这位如今在市委开小车的老战友。他俩是一起复员转业到地方的。由于某些个人原因和想法，奚大雄后来从市委小车队转到了运输公司。但是他对市委大院里的一些老人马，还是熟悉的。在这以前，虽然有心好好谢谢凌漪对玉芳表示的好意和成全，

他却有意识地回避她。每次半途相逢，他总是把眼神压到自己的脚板上，匆匆地擦肩而过，好象两个人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在许洪元那里得来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不，应该说是令人惋惜的。战功卓著的贾师长，终于因为过不了女人关，摔了下来，据说如今在本市一家大工厂里当个人武部干部。那是两年前，军区市歌舞团下他们师搞慰问演出，他又喝多了酒。半夜里他带着满身酒气，摸进一位女高音歌手的单人房间里，撒野、发性、胡来。不巧这一次，他没有预先把情况侦察好，那位如花如玉的女歌星，竟是北京解放军“三总部”一位老将军的千金小姐。这一次军长不仅爱莫能助，还把他找去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但是最终没有上军事法庭，而只作转业退伍处理，据说军长还是出了力。

“以前你的难处我能理解和原谅，如今这些难处都已经不再存在。况且现在对十年前的事情讲真话，也不会加害已经跌到楼梯底下的贾师长，可是却能挽救两条政治生命。”奚大雄严肃认真地向老战友，提出了已经在心头翻腾了好多天的要求和想法。

许洪元垂着头，沉思了半晌，终于开口说：“这回我听你的，可是有一个条件。光咱俩作证翻不了这个案，她那方面也一定要找到以前的同事，一起在证明材料上签字作证。”

在此以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凌漪听到敲门声。打开宿舍门一看，两条弯弯秀长的秀眉，几乎要跳到额顶头。“我还以为是小李，”她极力掩饰自己的吃惊和慌乱：“除了他，还没有其他人，有这个胆量来敲这扇门。”

奚大雄把一袋荔枝，放到一张靠墙的桌子上，不待邀请，就管自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昨天刚从福建带回来，尝个鲜。”

“谢谢你，”凌漪小声地说，还是站立在门口，低垂着头，也垂着双臂，十个纤细的手指头，不安地绞在一起，好象一副随时准备送客的模样。

“应该我谢谢你对我老婆的关心，一直没有机会。”奚大雄打量着她身上蓝底白点的连衣裙和玄色毛背心，心想如果这一身打扮换在玉芳的身上，可能就不会显得这么美。玉芳肤色深，必须穿颜色比较晓亮的衣服来衬托。

“玉芳是个好妻子。”凌漪在他打量下，显得有些局促。

“来敲你这扇门的人，为什么需要有胆量呢？”奚大雄开始单刀直入。

“你没有看到过那条标语吗？”凌漪一甩显然刚刚洗过的象瀑布般奔泄在肩头的一头乌发，突然扬起黑亮的双眼对视着他，一扫原先的局促与不安。

奚大雄心里很慨叹！她那颗敏感的心，还没有忘记被丁支书那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标语所绞刚的刺痛。“可是，我并不觉得那条标语是针对你的。”奚大雄寻找最能抚慰之意的话来说。

“共产党员也兴哄骗人吗？”她那逼视的眼睛一下变得尖刻起来。

奚大雄一愣神，忽然冒出一句临时跳出来的应对话：“我是说，毛主席讲这句话，不是针对你的。”

“你有什么根据？”凌漪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

“因为我了解你，因为我早就认识你。”奚大雄摆出他令人吃惊的理由来。

凌漪几乎是被奚大雄的话吓了一跳，眼睛睁得圆圆的，好象要仔细认清自己面对的，到底是一个梦影还是一个真实的人。

奚大雄为了打消她的惊疑，就用平静的语调，一五一十地叙述开往事来……

晶莹的泪珠，顺着凌漪优美的脸颊曲线，悄然滚落下来。当奚大雄讲

到贾师长已经开除了军籍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双手捂住脸，两个滚圆的肩头剧烈颤抖着，一个转身，扑倒在蓝色的床被上，颤动着全身，低声呜咽抽噎起来。

奚大雄当然可以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可是觉得他今天拜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观赏女人的眼泪和哭泣。他踌躇着，竭力想找到恰当的语言，把这层意思说出来。他也不会走到床头边，或者把脸盆架上的毛巾递给她，或者匍匐在她的身边，轻轻抚摸拍打她的头发或肩膀。

这倒并不是因为他顾忌中国的老传统，不同意有妇之夫与有夫之妇之间，有这种形式上使人混淆不清的相互抚慰和精神鼓励，而是他从来就不习惯这一套。玉芳了解这一点，所以绝少动用眼泪和哭泣这类常规武器，来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争端。

“凌漪，你需要用行动代替眼泪。”奚大雄终于找到了一句敲到点子上的话。公司里的同事佩服他，就是因为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常能够说出一些言简意赅的话。

三周后的又一个星期天，奚大雄和凌漪已经坐在一个驾驶室里面了。车身在并不十分平整的浇浆路面急驶前进，微微地颠簸摇晃。随着这颠簸摇晃，奚大雄阔阔的肩膀和凌漪柔圆的肩头，不时地相擦相碰。虽然解放牌汽车的驾驶室并不十分宽敞，但是在这种只穿单薄衣衫的晚春季节里，如果凌漪坚决要避免这种接触的话，她只要靠紧自己车窗一面固定身体，就能在两个人中间，留出一条狭长的、类似朝鲜半岛上“三八线”那样的“非军事区”来。

当然，这反而会在同事之间，显出一种不自然来。何况，他俩现在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同事关系，尽管他俩尚未意识到：任何一种关系，迟早会涉及到一个定性的问题。他们不定，人家也会来代劳。

现在他俩的车子，是往回赶。西下的夕阳，当窗映照到凌漪白里透红的脸上，使这张脸显出一种神采奕奕的光泽和娇美。她那已显褪色的深蓝连衣裙，和紧身的雪白羊毛背心想映衬，更凸现出一种娴静的妩媚和风度。这件天蓝色的连衣裙，是否就是十年前，她在“八一节”登台表演时所穿的哪一身？奚大雄心里这样作寻思，但是并不开口询问这种婆婆妈妈的问题。

“我没有想到，今天会这样顺利，”凌漪撂了一撂披散到脸前来的一络乌发。她今天没有盘辫子，而只是用一块洁白的手绢，把头发拢在脑后打了一个松松的结，脸色显得很兴奋。

“是啊，正好没几天就有这趟赶顺路的任务。想不到你那位同事收到你的信后，每个星期天都待在家里恭候你。说明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奚大雄应答着，瞥一眼前方路边田径上，几头悠悠哉哉似乎是无人看管的水牛。

“那个时候，我丈夫看到他也在那份胡说八道的纸上签了名，气得眼珠里几乎要喷出血来。你知道，那天就是这个同事突然开亮了全部的灯光！他后来去了苏州后，还专门来信解释他的难处。”凌漪一面说，一面欣赏着被水牛衬托着的田园风光。看着那晚霞的光，在水牛背上涂上了一层桔红色的反光，觉得美极了。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做一些违心的事。”奚大雄说话的时候，眼睛老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空荡荡的路。六十年代的沪宁公路上，星期天来往车辆很稀少；因此这种专注严格地讲，不过是反映了他有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不自然。以奚大雄的驾驶技术和灵敏反应程度，如果旁边坐的是玉芳，他说

话时尽可扭头转首，用眼睛和嘴巴同时作交流。可是此刻他的脖子是僵直的，显出一种虚假的做作和伪装。因为尽管他的眼睛直视前方，他也完全意识到，他今天开车的注意力，并不比平时更集中。如果要作老实的坦白交待，实际上竟然是异乎寻常地分散。他希望那个不时跟他摩擦碰撞的富有弹心的肩头，是玉芳的，他换挡时右手肘不经意触碰到的身体部位，也是玉芳的。他想起偶尔和玉芳一起开车外出时，他有时会把右手腾出来，让玉芳双手捂住，搁在她结实圆壮的双腿上。可是此刻身边的这个躯体，却属于另一个人。他就不得不动员起很多的心思与精力，用来抵御和谴责自己肩膀部位太过敏感的皮肤触觉，和对玉芳不合时宜的胡思乱想。这种分散使他内心很烦乱，很困扰，也觉得有些危险。本来是很堂堂正正的事业，济难扶弱，仗义执言，如果任凭心猿意马的干扰参杂，就一下会使自己变得很渺小，很卑劣。他眼不斜视，但是分明能感觉到，凌漪每次对他开口的时候，和听他开口的时候，都优雅地斜扭着头，波光流动的双眼盯住他的脸，眼神里充溢着钦敬、感激、和热诚，同第一次跟她照面时的那种冷若冰霜，判若两人。这就使他越加觉得心中不安定。有一辆跃进牌卡车，按着嘹亮的喇叭向他迎头扑过来，然后紧挨着他的车身，惊险地交会而过。双方似乎都没有想到，应该在会车时适当减一下速，在还算宽敞的公路上，把车子朝各自的右侧靠一靠。是两位驾驶员都有精确的距离感，还是双方都在想心事？

“凌漪，你对那位局长夫人是否真有把握？”刚才一场虚惊，似乎提醒了奚大雄，需要澄清一个早就应该加以澄清的问题。凌漪说，她能使那位当时也在现场、如今在家养病的市歌舞团前副团长出面签字，奚大雄总觉得有些玄。虽然她摆出理由，说明当初这位局长夫人，曾经抵制把她开除出团的上级命令，然后是靠她着的帮忙，才进了市交通局，但你毕竟是后来跟她丈夫发生了关系，才下放到运输公司来的呀。奚大雄觉得这里面，有个令人困惑难以理解的谜。虽然他明白，这也许涉及凌漪不愿公布于众的个人隐私或伤痛，他却抵挡不住要想搞清这一谜底的欲望和冲动，但是他问得很技巧。

凌漪没有吱声，从放着那份见证材料的精致小皮包里，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奚大雄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会感到热，需要掏手绢擦汗。也不知道她此刻转成了什么脸色，却下意识地感觉到，凌漪有些不乐意。果然，顿了几分钟，她突然开口说：“记得你已经不止一次问过我这个问题了。”

奚大雄看了看车窗外的照后镜，松开油门，把方向盘朝右边拉了拉：“她会对你不记恨吗？”他声音惶惶的，但最终还是把在心头憋了好久的疑问，英勇无畏地甩了过去。

“一两句话说不清，”这次凌漪回答得很干脆。奚大雄把口张了张，突然显出一脸惊恐之色。“骑牛的小孩！”凌漪大声尖叫起来。可是奚大雄不煞车，猛踩油门，往左急拉方向盘，绕过突然从右侧田径拐上公路的骑在牛背上的放牛娃，再把方向盘急右回，方才“嘎——”地长长一声地猛煞车。凌漪的身子被惯性所支配，先朝右边甩去，又朝左边扑向奚大雄，最后两手死命地挺住车窗前边的抓手，才总算没有从挡风玻璃里撞出去。

可是奚大雄瞧都没有朝她瞧一眼，“砰”地拉开车门，“咚”地跳下车，急步朝车后走去。

凌漪惊魂未定地朝右侧窗后看了看，放牛娃显然安然无恙；却听到从车下传来一声严厉的喝叫声：“把证件拿出来！”凌漪急忙把头探出左窗外，扬眼一望，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她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倾侧在卡车左后

方向的秧田里，车内还有人影在晃动。奚大雄的身体两侧，站着两个和他同样腰阔膀粗的身穿制服的人，四个裤管都沾着湿淋淋的泥浆。

只听得奚大雄蹙着声音在发问：“要我用钢缆把它拖上来吗？”

“少废话！”又是一声喝：“叫那个女人也下车！”那个比较年轻的人虎眼圆睁。

奚大雄和凌漪显然一时都没有闹明白对方的意图。“与她有什么关系？”奚大雄疑惑地问。

“下不下来？”年轻的汉子发怒了，从口袋里“哗”地掏出一支乌光闪亮的手枪来。凌漪吓坏了，一下缩进了驾驶室。这时从持枪汉子身后，又走上上来一个文绉绉的戴眼镜的中年人，显然也刚从小轿车里面爬出来。他拍拍汉子的肩膀：“首长说了，用不着这样。”然后转过身，对着奚大雄：“你知道我们在后面跟了多长时间吗？硬堵着不让超车。好不容易让了一让，又把车头猛地横冲过来。存心要我们首长的命吗？”

“我起先没有注意，后来又要避让这放牛的小孩。”奚大雄指了指此刻正牵着牛头在一旁看热闹的放牛娃。他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在吓人的枪口面前，还能沉住气作解释。

“好吧，别多罗嗦了。叫那个女人快下来，让他们乘你车到前面镇上去打个电话。”戴眼镜的中年人挥了挥手。

这时候，凌漪才算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走下了车，耸着颤成一团的双肩，两手紧紧地互握在一起。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马上会回过头来接你。”奚大雄用安慰的眼神，朝她扫了一眼，登上了车。

凌漪目送着卡车奔腾而去，留下一溜滚滚的尘烟，耳边响起了中年人的询问声：“你是哪个单位的？”声音比刚才柔和得多。显然，女人的美貌，总容易使人的恼火平定下来。

“我们是同一个汽车运输公司的。”凌漪觉得没有必要作隐瞒。

中年人眯起了眼：“做什么工作？”他好象有些不相信。

凌漪不想回答这问题，抿着嘴，正在寻思怎样打开僵局，消除对方的怀疑，又不暴露自己的底细，对方却并不勉强她，管自转身往回走了。顺着他的背影望过去，看到朝上倾侧一方的轿车车门打开了，车门里探出半个全国人民所熟悉的一位中央首长的身影来。三年前，凌漪在太湖宾馆的小舞厅里陪他跳过舞。他的舞姿很优雅，与她从头到尾都很有礼貌地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他询问了她的年龄和学历，却并不询问她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名称。他，当然不会再记着她。她觉得这一连串突然其来的发生一切，就好象是在梦中……

第二章 初试锋芒（1）

就在凌漪前赴后继接老反革命分子的班，走马上阵操持起锡城市货运公司碱水缸来的新春季节，苏南工学院的马进和其他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在

邻近锡城市的锡山县县城集训了三天，在该县西塘公社开了半天会，就顶着仍然寒气逼人的西北风，同机械系的近十名师生和十几名市、县机关及工矿企业的人员，分乘三辆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装载着被头铺盖，“突突突”地拖着一溜黑烟，来到西塘下大队。跟大队干部会了一下面，就在大队部小会议室里关起门来，由季家驹队长作了简短的工作布置和分工。马进和王小燕、曲湘川、何为民、宋培元、林和昌、朱坤兴一行七人，编成个工作组进驻戴巷、钱巷、南石街和北石街四个生产队。也许，季队长觉得马进作为苏南工学院马列教研室的青年讲师，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干劲和机敏，再加上这一组有四名工学院的人，就让他担任组长，却让市国棉三厂工人党员林和昌担任副组长。

马进和其他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在锡山县县城集训了三天，在西塘公社开了半天会，下午就同机械系的近十名师生和十几名市县机关及工矿企业的人员，分乘三辆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装载着被头铺盖，“突突突”地拖着一溜黑烟，来到西塘下大队。跟大队干部会了一下面，就在大队部小会议室里关起门来，由季家驹队长作了简短的工作布置和分工。马进和王小燕、曲湘川、何为民、宋培元、林和昌、朱坤兴一行七人，编成个工作组进驻戴巷、钱巷、南石街和北石街四个生产队。也许，季队长觉得马进作为苏南工学院马列教研室的青年讲师，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干劲和机敏，再加上这一组有四名工学院的人，就让他担任组长，却让市国棉三厂工人党员林和昌担任副组长。

这南石街和北石街合在一起号称石街镇，其实不过就是南北走向一条石板路，路的中端东侧有个土地庙，西侧有条平行的小河浜。以土地庙为分界中心，沿着石板路的东侧，街南街北各自排列着三十多户人家。顺着这条路朝南再走三里路，就是西塘下村，驻扎着西塘下生产大队的办公室，在大队办公室两侧，有一家杂货店，一个小饮食店，一户肉铺，附近还有一座小学，构成这条街南面的一个闹市区，俨然是方圆十几里地的政治经济商业中心。自从西塘下村驻了大队部，开了那几家小店，这石街镇就衰落了，实际上只成了一个普通的村落。马进不避利用职权之嫌，率领译名“小喇叭”的王小燕和锡城建新机械厂的朱坤兴，就把离那政治经济商业中心最近的南北石街，占据为自己的工作区域，却派出另外四人，分头进军戴巷和钱巷。当石街“咯咯咯”的鸡鸣声、“汪汪汪”的狗吠声、“哇哇哇”的小孩哭叫声、和“嘣嘣嘣”妇女在河边洗衣服的捶打声，在石街上空此起彼伏闹成一片的时候，已经有人扛着木条长凳，拖着板椅，端着饭碗，牵扯着小孩，三三俩俩地从南北两个方向，朝土地庙汇拢。没多久，石街上一长串青黑色的屋顶，就渐渐融入了深褐色的夜幕中。这时候，平时阴沉黑暗的土地庙的大堂里，却被耀眼的汽灯照得亮堂堂，显出热热闹闹的气氛来。

身穿灰色中式旧棉袄、额头刻满皱纹的南石街生产队队长高长兴，从嘈杂的人声中走到有一张方桌组成的讲台前，压了压手，嘶哑着喉咙说：“乡亲们，我们是第二次合并在一起开社员大会。眼看就要开始春忙，按大队的要求，今晚一定要把南北两队合并的事情定下来……”

未等他的话落音，下面“轰”的一声好象炸开了马蜂窝。高长兴拉开了喉咙：“静一静，并队的事放在下一步讨论，马上大队戴书记会来解答各位的顾虑和疑问。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社教工作组，马上有工作组马组长给大伙作报告。这个会，是两会并一堂，到会者一律记

工分！马上就要开始点名。家里人还没有到场的，请赶快回去催一催。”

马进和朱坤兴、王小燕坐在靠近讲台左侧的一张长条凳上，白晰额头下，掩在金丝眼镜后一双沉思的眼睛，不时扫视着眼前这些即将被引导投入“第二次土地革命”洪流中却暂时还浑然无觉的农民。作为一个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对这次下乡搞社教，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向院有关当局提议，遵照M青年人应该在实际阶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要求，让学生们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接触基层，接触工农群众。但总是被某些领导和教学权威们看作是“不务正业”，用“空头政治”冲击教育。但是，由于机械系所办的半工半读试验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风波，今年一过寒假，校当局却突然宣布，这个试验班的所有学生，全部下乡搞社教，从让学生进一步拓宽社会生活接触面，增长实际经验，倒有一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他对新来的院党委书记华得钧竟然和孙趋、刘海南之流站在一起，以这样一种态度和手法对待教改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却觉得又失望，又忿懑。但是，他并不象机械系那几位曾经热衷于这一教改试验的教师那样，觉得很压抑。因为，他以自己特殊的敏感感觉到，中国的政治形势，似乎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相信：苏南工学院那种“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以及打着“又红又专”的幌子、实质上是只专不红的倾向，可能会遭到会遭到某种冲击和匡正。

马进是从中央在社教问题上的口径变化，进而推测对高教系统的连锁影响的。这也是他在跟复旦留校老同学的通讯中，在探讨局势方面所得出的一个共识。1965年元旦过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传达下来，据称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文件的口径调子和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明显不同。显然，在党内高层出现了政治分歧。这种分歧，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会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所出现的那场分歧一样，使中国长时间地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呢？还是云聚云散，一阵风吹过就会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此时此刻，马老师的大多数中国同胞，对此并不在意或根本就浑然无知。然而，他是在高等学府搞政治理论的，加上年少气盛，思想活跃，嗅觉敏感；风起于青萍之末，他不可能一点不感受到正在酝酿中的一场政治风暴。尽管他对某些蛛丝马迹的长远发展前景无法把握，但是近来总的风向在往哪里吹，他是心明如镜的。他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执教的老同学特别提醒他，刘主席虽然也提倡和支持“半工半读”，但是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过“专家治国”和“专家治厂”的问题；“又红又专”的口号，其实就是配合这样一种要求提出来的。绝大多数高等教育界的领导，也必然会根据同样的要求，理所当然地把高等学府，看作是培养专家、工程师的摇篮，而不是有“半工半读”基础的优秀技术员。因此，刘主席所提倡支持的“半工半读”，同苏南工学院所试点搞的“半工半读”，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他夫人的“桃园经验”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否定，他所支持的办学路线，是否能够在高教部门保持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呢？从不久前毛主席同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内容看，马进持怀疑态度。

坐在马进身边的朱坤兴，方方墩墩的脸孔显得冷漠淡然，无动于衷。他与马老师年龄相仿，个头相仿；其外表世界看似泰然又平静，似乎是因为他没有马老师那样复杂的政治头脑所造成的；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是他

的内心世界，正处于一个萎顿时期。跟他谈了三年的女朋友，去年国庆节前找上了一个干部子弟，背信弃义地离他而去。这对他，也许并不能算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在旁人眼里，已过而立之年却仍然孑然一身，难免发生种种疑问和猜想。从市交通局调过来的老资历的夏书记，工作细致深入，来工厂不过半年多，借每周五下车间劳动之机，不仅摸清了他的情况，而且跟他交上了朋友。车间汪主任通知他参加社教工作队集训时，透给他口风：设备科科长将要退休，厂部看不上科里那几个洋墨水喝过了头的读书人，决定还是在根正苗红的工人中，培养科长接班人。想到自己粗坯直肠，却要跟那些肚里弯弯绕绕不知有多少圈子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他就头皮发麻，心里打小鼓。汪主任用使惯的烟斗一磕他的头顶：“傻小子，看来这劳模，现在已经在女孩子眼里跌价。你少了当干部的爹妈，自己争取当个干部，不是更硬气！可别辜负了夏书记的一番好意。”朱坤兴一听老主任扯上了这层意思，更觉得带上了庸俗化的味道。所以前几天，勉强参加了社教集训班，虽然一直坐长板凳听报告，却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存不到心里去。脑子里孜孜念念的，仍然还是那些榔头扳手。他本是农民出身，1958年市区工厂征用郊区部分农田时，升级改行当了工人。为了帮助做农民的父母供养四个弟妹，他坚持晚恋晚婚，自以为年纪轻轻，能因为这种牺牲精神而变得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却没有料到，这德高望重，需要承担风险，付出成为“老大难”的代价。

朱坤兴对农民是熟悉的。因此下午跟高长兴、马进和王小燕来这土地庙勘察会场情况时，对庙中仍然保持着一丈多高的土地神老爷塑像，并不大惊小怪。而王小燕对解放近十六年，当地农民既然还保持着这一神权的象征，不仅感到惊讶和失望，甚至有一种忿忿的感觉。尤其是在神像两侧张，不伦不类地贴上两条“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的大红标语，更觉得简直是对革命的一种亵渎和讽刺。而在朱坤兴的眼里，土地神老爷保佑一方平安的神力虽然大可怀疑，但是农民们借以寄托的愿望和心思，跟这装点会场以增加气氛的革命口号，并没有根本性的对立冲突。况且这位土地神老爷的面目并不狰狞可怕；那介乎于关云长和托塔李天王之间的一脸文雅相，与四川刘文彩收租院中那些地主狗腿子凶神恶煞般的脸型作比较，和蔼可亲的感觉，就很自然地冒出来。可是此刻他没有料到，由于照明气灯悬挂的高度低于土地爷的脸，在光线从下向上的投射反衬下，那白天看着还挺和气的土地爷，此刻的神态却一下变得恶魔般地又凶狠又可怕。马上社教工作组的人上台发言，背后衬托着这样一个朝容夕改、张牙舞爪的“两面派人物”，确实既不协调，又不雅观。小王也许是对的，应该把它敲掉，然而贴上一张带着慈祥脸容的毛主席的大幅画像。

坐在马进身边的王小燕，与朱坤兴正好一个相反，红朴朴的圆脸显得兴奋而又激动，但是她竭力把自己装扮的平静而又庄重，使内心升腾翻滚的崇高历史使命感，和外表庄严肃穆的神态相统一。她想象着当年父亲去农村组织农会斗争土豪劣绅的历史情景，庆幸自己能够搭上又一班时代的革命列车，亲身体会文艺作品中，那些使她心潮澎湃、如痴如醉的火红革命场面。她听说，农村中不仅出现了借三年自然灾害大发“国难财”的新富农分子，而且出现了一些为非作歹、作威作福欺压农民的“土皇帝”，自然觉得很气愤。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却只落得共产党“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结果，连毛主席都作这样的估计，王小燕感到了一种危机感。想到要跟钻进

党内的“南霸天”、“黄世仁”之流作斗争，她几乎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和冲动，恨不得要用工学院师生所熟悉的那个广播喇叭中的女高音，向面前的乡亲们大声疾呼地发出战斗动员令。但是，她懊丧地意识到：在今天这个动员会上，而且在整个运动中，如果不发生什么奇迹的话，自己都只可能站在从属的地位，扮演一个配合的角色，就有些郁郁不得志的感觉。

王小燕对马老师，是服气又不服气。她佩服他在哲学课上滔滔不绝的演讲口才，旁征博引的渊博学问，扔开备课本能作天马行空式的阐述和发挥。他在学院众多南方籍的教师中，惟一能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对从小就在普通话环境中长大、常常为拥有一个口才横溢的烈士父亲而自豪的王小燕来说，无论是听那些教授讲师用大言不惭的“洋泾浜”口音讲课，还是面对那些靠厚厚备课笔记生存与炫耀的学术权威，她都觉得是对自己耐性的一种考验和折磨。如果不是把她带养长大的姑妈反复告诫她要尊重他人，她会毫不客气地表达自己对这两类对象的公开蔑视。更使王小燕佩服的是，马老师能够通读原版的英文书籍，并且在讲课时，经常用发音标准的英文插科打诨，使他表现出一种超国界的幽默感。然而，马老师远未使她达到倾倒的地步。她想，如果自己早生十年，自信起码也可以处于跟马老师平起平坐的地位上。马老师跟她讲过，他在大学时，曾当过系团总支的宣传委员，而她现在已经是学生会的宣传部副部长。现在马老师把她拉在手边作帮手，曾明确暗示过，是对她的一种看重和承认。想到这一层意思，觉得在今后的三个月里，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她基本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感。当短小精悍、显得精力充沛的北石街生产队长高胜泉，手拿本子走到方桌前要开始点名的时候，她递给马进几张纸：“这是两个生产队主要劳力的名单，我在吃晚饭前向两位队长誊写来的。”

马进赞赏地朝她回看了一眼，心想还是女孩子细心，这个帮手看来没有选错。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两位生产队长点名时，按名对脸，加深形象记忆。

高胜泉年纪轻，中气足，每个名字都报得清晰而又响亮。也许是“工分挂帅”起了作用，每报一个名，都有一个“来了”的回应。北队的名单已报得差不多，每次都是有报必答的。但是当报到“高阿根”的时候，却没有人应。高胜泉又重复了一声，却响起一个带有苏州口音的软绵绵的女人声：“我家的让我来作代表。”

马进闻声望去，却看到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身穿一件粉绿色缎子面对襟紧身薄棉袄，懒洋洋地扭着水蛇腰，双臂交叉抱着，斜倚在离讲台不远处的一根厅柱上。只见她长得唇红齿白，面容姣丽，眼睛虽然不挺大，却带着一股子野野的花俏气。

“他自己怎么不来？”高胜泉似乎有些疑惑。

“他不在家”，妇人回答说。那一脸白嫩之色，显见得象是一个经常下农田劳作的人。

“不是下午还蹲在南墙下晒太阳吗？”这位队长今晚表现得特别顶真。

马进不晓得这高阿根是个何等样的人物，为何开会不到场？而此刻周围的眼光，却都齐刷刷地朝那女人射过去，表现出一种不合常规的好奇心。那女人却只是挑了挑眉，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来。高胜泉皱了皱眉，就继续报名。马进觉得其中似有蹊跷，就用钢笔在高阿根的名字旁边，斜斜地打了一个问号。

“高虹时，”高胜泉最后报的名字，色彩跟这个土地庙中多数聚会者的起名情趣相偏离。

“有。”只见一个脸色苍白，身材苗条的少女，从后排一个角落里起了起身，回答的声音远远飘过来，低得象深秋节的蚊子，侥幸活过了大冬天，在冬寒未消的空气中抖抖地震颤着，使人可以联想起，那些被残冬吸走最后一丝体温的可怜小生命，在枯黄的草丛中，奄奄一息地喘着气。马进虽然没有在这个不同一般的名字旁留下任何记号，她那双大得出奇的美丽大眼睛，和眼睛中透露出来的忧伤神气，却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下面轮到南石街生产队。南街北街同属一个高姓，不知从哪个朝代起，同一个氏族的两个分支却结下了怨。五八年吃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时候，两个生产队曾经合并过，当时就有高长兴当合并后的队长。然而好景不长，两块同样颜色的泥团就是捏不到一块去。不到一年时间，又重新闹分家。打那以后，与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大两公”精神相违抗，这两个各自仅有三四十户人家的生产小队，一直保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建割据状态。这种状况不仅妨碍农田基本建设的统一规划，分散推动农业机械化所必需的规模经营与资金集中，而且对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领导能力和权威来说，也是秃子头上一个疤，决不是光彩的标记。因此以工作大胆泼辣闻名乡里的大队党支书戴洪发，去冬曾向公社党委书记钱壮立下军令状，一定要在大年初一使南北高家吃上“团圆饭”。现在已经过了正月十八，却仍然由于两个队都存在强大反对派，使合并原地踏步，难成好梦。因此即使跟社教运动的计划步骤有冲突，经过公社党委向社教工作团作请示，上面批准并队和社教运动可以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南北石街的两支高家后裔，虽然宗派情绪很激烈，彼此视对方一举一动为不屑，其实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事习惯，都极其地类似和相象。就拿这开会和点名的情况来说吧，如果不宣布到会者记工分，哪怕是天要蹋下来，地要陷进去，挨家挨户地用轿子去请，用牛鞭去赶，南北两队都凑合不起三分之一的人。但是一明确有工分作经济补偿，两个队绝少会拉下一个人。还有那“队外有队、队内有派”的总格局，也是一个模子里铸成的。统共就不满一百号的到会者，却以土地老爷不偏不倚的直视目光为中线，除了两队成员各据一方形成阵线分明的南北壁垒外，这壁垒内部，东一簇，西一堆，男人归男人，妇女归妇女，其中又以年龄、兴趣、个性、或各种各样的说不清扯不明的恩恩怨怨，进一步分化组合为若干块。其间还有“单打一”的独立支队；例如，那位身上透着一股邪荡气的高阿根老婆，那位瘪瘪缩缩躲在人众最后的高虹时。他们有的显得心事重重，有的却热烈地交头接耳。王小燕用这些说话人的眼光是否朝她那边溜瞟，来确定他们的话题是围绕并队或其它家长里短、闲事逸闻，还是在评头论足，目标对准三个从天而降的城里人。这一堆南北石街生产队的农民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分男女老少，被点到名的时候，都预先统一口径似地一律回答说：“来了。”三位工作组同志洗耳恭听到如今，就听到那个高虹时，按节约原则省词又省气地低低说了声“有”，那位冒名顶替的风骚娘们作了一个简短的解释，其他都千篇一律，万腔一调。因此当喊到高金福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宏亮的“到”字，不由使全神贯注搜索名字脸孔的工作组同志，蓦然间起一个惊跳；放眼望去，原来是位头戴棉军帽、身穿军棉袄的精壮汉子。马进以貌取人，断定这是一位复员军人，就肃然起敬地在他的名字下划了两条杠。如果彭德怀提倡的军衔制还存在，

这“两条杠”，就起码象征少校级的军衔。然而还没有完，高金福并不是最后一个按军人标准回答点名的人，尽管开头炮的光荣属于他。但是很奇怪，当马进看到这第二个报“到”字的人时，他的心里却一下慌了起来。从那时起直到终了，他把钢笔套着笔套的一头，就老是抵在下巴上；这动作，没有逃过胆大心细的王小燕的眼睛。

“他突然一下为什么事情伤脑筋？为紧接着的动员报告吗？”王小燕心里摇了摇头，这样的即兴发言对马老师来说，无需调动一个脑细胞。她立即追忆，这一反常变化，是在什么关头开始的。对了，是在高长兴点名点到“高远”的时候，那扶着眼镜架的瘦长男子站起来，也回了一声“到”字。那藏在两片玻璃之后的眼睛，好象还跟马老师的眼镜飞快地对视了一下。如果她没有看错这一煞那的眼神交流的话，那么，这个左脸颊带着一条伤疤、有着一副落魄知识分子模样的高远，是什么人？“四清”下台干部？下乡劳改的右派分子？他跟马老师是什么关系？……王小燕似乎觉得，考验自己上级对下级是否忠诚坦白的机会，不，应该说，考验上级对自己下级是否绝对信任的时刻，从下乡蹲点的第一个晚上，就开始了。

马老师的动员报告，也在土地老爷恶狠狠的俯视之下开始了。王小燕以满怀信赖和期待的眼光，注视着那张在课堂上点燃过好多同学熊熊思想火焰的那张脸。

马老师的发言，就是同前几天集训时她所听到的那些干巴巴的报告不一样。主要区别在哪里？那些人都用讲稿，马老师不用。当然还有新的提示和启发：他不用自我介绍作起头，也不以讲解开展社教运动意义作开场，而是对症下药，直接冲着听讲人可能关心的疑虑之处来下手：

“乡亲们，今天石街上突然出现了一批外乡人。有人也许要问，这些人从什么地方来？来做什么事？你们一定还记得，十多年前，你们也接待过一批外乡人，那是毛主席派来帮助你们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工作队。今天，我们也是毛主席派来的，搞什么呢？按中央的有关精神，就搞第二次“土改”运动。可是，上次运动有地主富农可以斗，有土地浮财可以分。这次斗谁分啥呢？晓得别地方搞过“四清”运动情况的人也许会说，我知道：就是要斗党外党内那些屁股上有屎、头上长辫子、手脚不干不净、借三年困难时期大发国难财的人；分么，就是要分清“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重新划分阶级阵线。照这么说，那些有过投机倒把、贪污腐化或小偷小摸行为的人，那些接受改造但是还没有摘去四类分子帽子的人，是不是今晚一开完会，回去就要睡不上觉了呢？我在这里要明确告诉大家：以上这种说法过时了！什么“先整群众、后整干部”，或“先整干部、后整群众”，就更加不对头！是造谣。

按照中央新发的《二十三条》文件精神，这次运动绝对不整一个普通的社员，地富反坏右表现不好的，要整也让运动后新选的领导来处理。我们现在面对的，并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要防止农村重新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让少数人作威作福，多数人重新受灾受难，吃两遍苦，受两遍难！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

因为掌握实权的人，要搞歪门邪道，危害会特别地大！对生产小队来讲，主要查队长和会计，大队干部的权力更大，更要重点查。总之我们这次下来，基本目标是瞄准共产党的内部，而不是党外群众。因为钻进铁扇公主

肚皮里的敌人，最危险！对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走资派，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资格多老，都要把他们揪出来，扫地出门！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分清阶级阵线。一些省、地、市、县、以及公社以下的农村基层单位，已经揪出了这样一批钻进党内的坏人。根据中央的估计，农村基层中，有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已经烂掉。当然不是党员的掌权干部也要查。各位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要围绕四清这个中心，对大队小队的当权派，做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我觉得今晚这个会，就是不记工分，也应该来听。因为如果权力不掌握在好人手里，你们的劳动果实就会被别人剥夺侵犯；你们辛辛苦苦付出的血汗，就会养肥新生的剥削阶级分子。这个亏就吃得大了，比你们开会少拿几分工所吃的亏，不知要大多少倍！在座的生产队干部，不管并队后是否继续当领导，都要老老实实地接受运动审查。希望你们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主动检查自身的问题，也要背对背互相检举揭发，特别是要大胆检举揭发大队干部的问题；同时要积极抓好生产，如果躺倒不干，就是对抗运动，就要罪加一等……”

马进上述这些话，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动员报告。然后才是作自我介绍，以及介绍两位工作组同伴。接着询问有没有疑问需要解答。问题多多少少，总是会有一点，但是在场的人，因初次跟马同志见面，似乎既不习惯，又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就向他追根究底。他们共同的感觉，是觉得这位马同志讲的话挺新鲜，而且有一点蛔虫钩虫样的本领，能钻到自己肚子里，戳碰到的那些疙疙瘩瘩。王小燕限于年龄和资历，在第一次具有亮相意义的见面会上，虽然只有听的份儿，没有说的机会，却不得不承认：要是由有自己取而代之，恐怕不会比马老师，表现出更高的发言水平来。那完全象是跟老乡们聊家常，没有条条杠杠，不分第一第二第三，却把要点说透了。就好象一篇看似漫无边际的散文，笔墨铺阵，枝节横生，却万变不离其宗，始终紧紧扣住一个文眼，就是突出这次运动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县里学习的时候，虽然也时常听到那些作报告的领导提到这一点，但是象马老师那样地浓墨重彩，反复渲染，却还是首次耳闻目睹。主题之鲜明，重点之突出，热情之洋溢，反映出他对毛主席最新思想动向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体味和理解，血液中有了解化的成分，开起口来就流起了自然欢畅的小河。虽然有些教训人的口气，逃不掉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的老习惯，但总的来说，是瑕不掩瑜，流光溢彩。

马进的报告一结束，乡亲们的思路就重新被引导到并队事宜上。这次是高长兴高胜泉并排站在土地老爷的神像前，继续主持会议。马进则返回原座位，和工作组的伙伴同坐一张长板凳。他对社员们用沉默以对的态度回答自己的报告，抱着理解和谅解的宁静。然后以兴致勃勃的态度，扫视和倾听社员们对两队合并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什么要重新折腾？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事，为何还要一意孤行？”一个戴着罗宋帽的发言人，听用词似乎有些私塾的功底。

“南队北队虽然同姓一个高，却早已分了家。强扭的瓜甜不了！”另一个分裂主义者，利用人类舌头喜甜不喜苦的缺陷作煽动。

“天时、地利、人和，这人和两字最紧要。缺了这一条，其它念头都是空想、白想、瞎想！”这个发言人显然熟读“三国演义”，而且能够活学活用其中的精义。

“人多力量大，两个队合在一起，可以办原来办不了的事情。但是人多

心也多，本来能办的事情也可能办不成。”这个老乡肯定没有学过辩证法，却能利用辩证法来掩护自己的抵触态度。

“……”……

就这么“哒哒哒”地，南北石街生产队的农民们，象美国国会大厅里的议员们，一样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进行“大鸣大放”，把言论自由的高潮，掀得一浪更比一浪高。但是很显然，这名义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质上是反对派声音的一统天下，南北两队的冤家对头们，在并队问题上，却沆靡一气，狼狈为奸，遥相呼应地向生产大队贯彻“一大两公”的方针和决心，进行猖狂地挑战和反扑。然后黑暗不会长久，太阳终将升起；这种声嚣尘上的局面和空气，能比兔子的尾巴长吗？长不了。随着一阵脚步声，民主自由的呼声，突然被凝固，或者说，突然被那脚步声踩入地下去了。一个身披棉军大衣的大高个，带着进门时挟带进来的一股冷风，碎步走到土地老爷跟前，粗大的手和马进拉了拉，朝朱坤兴与王小燕则用点头相代替，然后用双手，分开被先前一派反对声浪闹得手足无措的两位生产队长，昂然挺立到两人中间，高挺鼻梁上方的一双锐利大眼睛，目光炯炯地朝大厅中扫视了一圈，威严而又不失礼貌地开口道：

“对不起各位，被要紧事情所耽搁，来晚了。有什么意见要求，敞开喉咙提。我戴洪发今晚能够答复的，决不拖到明天。但是这并队的事，也不能再拖！有民主也得有集中，不能老是廿九（研究），没有三十。在农村实行“一大两公”，走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道路，是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不会因为少数人的反对就不办！两个队长都同意并队。他们不是大队任命的，是你们自己选的，既然选了，就应该有代表权和拍板权。当然大队还是要走群众路线，尊重大家的民主意见。我今天到会，就是给大家一个民主的机会。请大家说吧，我在这里拉长耳朵听。”

全场一片寂静，似乎对明确声明已经拉长的耳朵，有些惧怕，心存胆怯。马进中午首遇这位身高马大、相貌堂堂的大队党支书时，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子威慑力——用当地人的说法，叫做压人势。现在他站在横眉竖眼的土地老爷前，双手插腰，把军棉大衣象披风一样地朝身后叉起，更有一股威风凛凛的气概。

“怎么啦？进门前还听到庙里挺热闹，就好象在闹腾水泊梁山的戏台班子，怎么一下消声没气地，都变成了羞羞答答上轿的新娘子了？”戴书记好象显得很惊奇，对大家突然一窝蜂地等待集中不讲民主，公开表示不理解。

这时听众中，却有人“吃吃吃”地低声笑起来。马进循声望过去，发现原来是高阿根的老婆，手托着被气灯光耀白的圆尖下巴，隆起的胸脯被笑声带动得一耸一耸的，那种抖动的幅度，与笑声的强度相比，显得有些夸张。

“有话不说，有屁不放，我就只好点名了。高进宝，听说你的反对声音最大，摆摆理由么。”

那个名叫高进宝的农民，象在作案时被当场抓住了的小偷，脸孔红红地站起来，低垂着头，憋了好一回，嚅嚅着嘴说：“书记，这并队是好事。但你知道的，我们南队的工分值，比北队高一角多钱，这一并，不是就把我队的收入拉低了吗？”

“是啊。”南边营垒中响起一片含混的应和声，在高进宝逼上梁山的顽抗声音鼓动下，民主的精神开始悄悄地复活。北边营垒中，有些头颅却开始摇晃起来，嘴里发出吡吡声，对南队的自以为是的民主声音，很有些嗤之以鼻

的意思。

“这笔帐，两个队的队长和记工员早就合计过。把合并后的各种有利条件都算上，到今年底，新队的工分如果不比你南队高，你们就来找我戴某人算帐。”

南队纠结在高长兴身后的反对派愣了神，觉得找大队书记算帐的事，似乎只可言传，不可意会。况且算帐一词在苏南农民的语言词典里，带有报仇雪恨的意思；例如当年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就叫做同地主“算帐”。谁吃了豹子胆，敢同共产党的大队支书算帐呢？人们觉得这明显是在说诳话，急焦焦地，在沉默中等待着有哪个大智大勇的弟兄，挺身而出，敲落戴大书记的这一杀手锏。

“请问这帐怎么算？”期待之中出英雄。终于有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马进一看，就是那位被他在名字下，打了两条杠的高金福。也许因为他也穿着军棉袄，因此对披着棉军大衣的大队书记，就彼此彼此，畏惧得不是很厉害。

戴支书似乎料到：迟早会有“狠脚色”跳将出来；而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位也当过兵、也扛着一顶党员帽子的高金福。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小子转业回家后，虽然已给他安排了一个大队民兵营长的职位，但因为这是空衔，还是要凭手上的一把老茧在生产队里挣饭吃，他就不甘心。戴洪发猜穿，他是想当南队的生产队长，一直闹着要退职的高长兴，也已经顺着他的意思，把这个接班人的名字提过好几次。如果他确实只是眼热这生产队长的位子，倒也好办；当个经济实力有限的一队之长，屁颠颠地为大家的事成年忙得团团转，多拿一百多个补贴工，实在并不是令人羡慕的行当。因此那位连任十几年的老队长，对并队比什么人都积极，满心想把一副担子撂给北队的高胜泉，然后可以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操持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他的那把经验和精明，收益当然不会低于那可怜巴巴的一百多个工。高金福当然也不傻，他想接高长兴的班，不过是要以此作跳板，真正目标，却是盯在大队党支书这把交椅上。人是能人，可惜他复员晚了两年，错过了时机。并且，他有老战友在公社做党委书记吗？他不称量一下自己，凭着年少气盛，一直或明或暗地跟他戴洪发较劲。这次并队，把他想得到的跳板也抽空了，让他得个教训。然后什么时候再扶他一把，让他知恩，感德，共产党在西塘后大队的一元化领导才能得以维护和巩固。戴洪发早已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点起一根香烟，眼睛并不瞧高金福，却对着众人缓缓地说：

“这件事我早就考虑过了。这样，南队去年底分红是九角一分。大队包你们新队今年每工得一块钱，低了大队出钱补，高了归你们自己分。怎么样？”

南北营垒中，大部分的眼睛顷刻之间发出亮光来。

“还有，两队合并后，田地都连在一块，大队将为到你队担保向信用社贷款，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并免费培训一名驾驶员。这样一来，你们不仅自己可以实现机耕化，还可以借给其它队用，让他们交钱，你们赚外捞。”

“要是戴巷万巷也买机呢？”土地庙中不乏深谋远虑者。他们想如果是好事，他姓戴的为何自己村里也来这一手呢？他们总是用自私自利的农民心理，去度量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特殊材料性能。

“没有大队的贷款担保，谁能买得起？大队也不会看着每个生产队都买机，耕完自己的一块土后，就让那些铁家伙睡大觉！我这是给你们专营权，

懂不懂？专营权！”

好多人显然不懂这个新名字，于是响起一片带着兴奋的乱轰轰的讨论声，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勇敢地要求戴洪发作名字解释。然而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并不暴露苏南农民的胆怯性，只反映他们的爱面子。自我暴露自身寡识陋闻的行为，就是在准备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兵营里，或者为维护真理宁可献身的高等学府中，都是屡见屡鲜的事。

“还有呢，”戴洪发显然采用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用以瓦解收买反对派的手段花样层出不穷：“人们都知道南北石街上的女人心灵手巧。只要你们能合起来，大队决定把派给戴巷的县外贸的刺绣订单，分一半给你们做。”这一下，人群中既然有了零零落落的掌声，但是这次并不是高阿根的老婆带的头，仅不过是，她那看来也只适宜刺绣的双手，拍打得最热烈。

“还有别的意见吗？……既然大家没有意见，我就在这里宣布，原来的南街生产队和北街生产队从今晚起，就已经不存在了！南塘下生产大队石街生产队正式成立。明天就开始着手进行具体的并队工作。日常领导暂时由高胜泉负责，高长兴协助。正式的队长什么时候选，视四清工作的进展情况，有工作组的马组长定。”说完他扭过头，客气而恭敬地对马进说：“马组长，再给我们作几句指示吧！”

马进摇了摇手。

“那么这就散会！”戴洪发以完成了一项重大历史使命的庄重，作出宣布。

这，就是扎根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头一个夜晚。在这个夜晚，马进的脑海里就留下了几个形象特别鲜明的印象。第一名，当然是高远那左颊带着一条伤疤的脸。他那条伤疤，是怎么来的呢？1956年他在复旦见到将要毕业分派的他时，他的脸上并没有这条疤。马进与他虽然不在同一个系，因为是同乡，彼此就有了一点不算深广的交往。在马进印象中，高远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思想虽丰富，却轻易不肯与人分享。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选择新闻专业，从职业要求看，实在是一种阴差阳错；从政治安全保险系数看，无疑是天造地设。五八年秋，马进在去苏南工学院报到的路上，与早两年派入《锡城日报》任职的高远邂逅相遇。听他带着一脸晦暗之气解释了政治触礁的简要经过后，仍然不理解，稳健持重之如高远，怎么会轻信那位省委蹲点干部的怂恿鼓动，帮着那位老婆在舞会上受了委屈的作家到处乱说八道？道别时，嘴说保持联系，而后却再也没有闻其音讯；只知道《锡城日报》报社的人员，在反右之后“全锅端”。但是那一次，也没有见到他脸上有这条疤。今晚突然在这种场合与老同学重新相遇，立时把自己逼入了尴尬的境地。当然只要不去主动兜搭他，马进相信以高远的知趣个性和目前处境，他是不会主动跟他来重叙旧情的。但是，这对自己的心灵却是一种折磨和负担；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对落难朋友拉得破脸的人。然而从自己目前所处的地位讲，他却不能不有所忌讳，觉得应该避免招惹上不必要的鱼腥气；这就使他的良心受责备。因为他知道，虽然在名义上，高远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列的右派分子，实际上，要是他那种人也配得上这顶帽子的话，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大概都可以做右派，包括自己在内。设身处地为高远着想，他此刻该多么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情、理解和尊重！特别是碰上了熟悉了解他的过去和冤屈的老同学。可是，他马进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他惟一能够做的，已经做了，那就是在自己的直接管辖下，宣布这次运动不会使老同学受冲击。这

就是他在刚才那套喋喋不休中，对老同学所作的明确暗示。他个人不敢打保票，但是根据对最近几年来政治方向的观察和理解，他觉得自有更加强有力的因素在打保票。

马进对毛主席发动反右斗争前那段时期所作的讲话和文章，曾经作过相当仔细的分析研究。他以为，毛主席对党内那些胡作非为当权者的憎恶和忧虑，并不亚于对那些党外人士头脑发热下所作的攻击。马进的心里，暗藏着一个从不与人交流的个人观点：即中国革命走的并不是标准的马列主义道路，而更接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历史上农民造反所具有的一切痕迹和局限性。右派分子的恶毒攻击是令人难堪的，但是令人难堪的总根源，却根植于这类痕迹和局限性。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显然清楚地意识到：党所面临的双重威胁：一是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趋势使人民不满，二是那些浸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旧知识分子，会利用这种不满对共产党提出挑战。他想通过对党内病毒的主动出击，消除人民的不满，抵挡化解从旧知识分子阵营投掷过来的批评攻击——因为共产党搞建设没有经验，因此还必须跟这批不得不加以利用的人，尽量搞好关系。当攻击来得太激烈时，当毛主席觉得这种攻击已经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时，他就不得不抡起了大棒。遗憾的是，那些毛主席原来想通过开门整风加以清除的“病毒”，却也借机抡起大棒，把一切发出批评声音的人，统统打入了政治另册。因此直到今天，在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马进对排行老五的“右派分子”，总是偷偷地抱着某种同情心。因为据他所了解，真正借“大鸣大放”要推翻共产党的毕竟是少数；自己所熟悉的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跟自己思想接近的人；包括一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领导，和一名他所钦佩的青年讲师。事实上正是他俩的大兜大揽，才使得哲学系包括他在内的好几个同学，幸免于难。可是在家乡，高远这位时运不济的报纸编辑也摊上了。而根据对毛主席近年来的一些讲话作分析推测，马进发觉他老人家，对五七年发动“大鸣大放”的初衷似乎并没有忘怀。不仅没有忘怀，也许那些在鸣放过程中揭露起来的党内问题，使他原有的憎恨和担忧越加上升。否则就不能理解，他为何要否定关于“四清四不清矛盾”和“党内党外矛盾交叉”的说法，强调要把矛头对准党内。这，就是马进对最新政治形势发展的理解。他虽然不公之于众，却自信这种理解不仅符合逻辑推理，而且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这种历史根基，不仅连结着中共建党以来数十年的情况，而且连结着中国几千年兴衰成败的漫长历史轨迹。

马进和高远没有思想上的深交。他想，如果高远也具有这种历史感的话，也许他会对目前的处境觉得好受一点。历史巨人在朝前迈进的时候，总是会需要无数的垫脚石。中华民族延续生存到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愿或不自愿的，为此承受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而做一个自觉自愿的牺牲者是幸运的，做一个不自觉不自愿的牺牲者则是可悲的。他觉得从七年前路遇时的交谈情况看，高远更象是一个可悲者。

马进相信自己将成为一个幸运者，并且觉得，身边的王小燕也可能成为幸运者。尽管她还还不成熟，傲气十足，充满一个烈士子女所特有的妄自尊大的优越感。但是也正因为是烈士子弟，她才具有出身其它优裕家庭同学所缺乏的那种社会意义上的热情、关切、虔诚和使命感。马进以为这是一个民族的中气，丢失了它，就丢失了这个民族可以奋发向上的精神推动力，就丧失了灵魂和希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对这几年大学校园里风气感到忧虑，

对院领导的办学路线和系党总支过分强调专业和分数、忽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倾向，深感不满。校园里那种陈腐厚重、刻板僵硬的书斋学究气息，使他有窒息之感。而学生们那种埋头专业、死啃书堆的狂热，以及驱动这种狂热的成名成家动机，与共产主义革命所设计的长远目标，显然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偏离。这些从小出身于优越家庭的“天之骄子”，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些人甚至因经受不住白热化竞争而走向精神崩溃，因不能在分数上出人头地而发疯发狂……，这样培养起来的一代人，今后由他们来执掌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同今晚聚在这土地庙里的农民类似的五亿多人口，在思想和感情上，还会有理解沟通吗？如果他们从懂事起就被个人竞争、优胜劣汰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毒化，艰苦奋斗，历尽艰险，终于成为社会的上流阶层之后，他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眼光，看待那些不幸被出身和命运，扫落在粪土尘埃之中的大多数同胞呢？恐怕，他们与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上一辈知识分子，不会有多大的差别。这一点，从学院里那几位留校“业务尖子”对待农村出身学生的蔑视态度，已经得到了验证。不会的，他们决不会理解中国的几亿农民，更不会代表他们的利益讲话。当年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专家精才的国民党，就是这样对待农民的。他们自以为有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历史使命和能耐，却把国家和百姓抛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自称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但是人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白骨成山，血流成河，最终得来的，如果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老结果，国家精英阶层仍然置个人利益于民众利益之上，那么，革命的意义价值何在？这些，就是马进和几位仍然留在复旦哲学系的老同学，经常在信中交流的想法和观点。

这次工学院抽调这批人员参加社教，要不是因为在“工读班”的问题上起了极大争议，对这种“不务正业”的社会活动，院党委华得钧书记决不会有这种积极性。马进本人是农家子弟，他觉得带领这一批大学生下乡接触农民的本身，就具有内蕴极其丰富的历史意义。他由衷敬佩毛主席的胆识，但是曲高和寡，他觉得无论是在领导同事中，还是在好多学生干部中，能够与自己思想接近的人并不多。他在课余时间和王小燕有过几次交谈，发觉这个女孩子的可爱之处，就是不是皮肉饭囊。她虽然学习成绩不错，却并不为学习成绩所困，而表现出一种更为深广的精神关注和思想见地。这也是他这次分组时，把她留在手边的主要原因。

然而，自己和高远所处的微妙关系，应该向她通讯交底，还是瞒天过海？他却有些犹豫不决。

第二个使马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队党支书。这个戴支书驾驭局势的能力，那种恩威相济、刚柔并举的应对策略，使他感到中国农村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所以才每过几百年，就会推出一个汉高祖朱元璋之类的角色来。

第三位是那位高金福。他觉得应该尽快地找个机会，跟这位显然同样非属等闲之辈的“复兄”好好聊一聊。锡城人习惯称呼复员军人为复兄。

第四名是那个混身透着一股子骚情狐气的高阿根的老婆，经打听，知道她的名字叫胡翠丽。马进注意到，她那副火辣辣的花狸眼，老是针锥般地在戴洪发的身上扎，很有一副敢作敢为毫无顾忌的巾帼英雄气。她的丈夫，却是这次大会惟一缺席的正式男劳力，马进心里想，有便时应该跟她男人会一会面，摸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使他难以忘怀的一张脸，是属于那个一直躲在人后、具有惊人姿

容和忧郁神态的高虹时的。要不是亲眼目睹，他很难相信，在这个文化层次显然不高的偏僻乡村里，竟然会造就出这样一个不仅形态美、而且更具一种富有神韵气质美的形象来。这位带有浓重东方古典美女特征的农村姑娘，同样没有逃过王小燕的眼睛。确切地讲，她的注意力，是被身边朱坤兴的注意力所唤醒的。因为在会议开始时，她对这位工人阶级代表的情绪不振就有察觉，但是自从高胜泉点了高虹时的名字后，她却发现，他的眼视神经却一下显得活跃起来，眼神老是翻过一排排的人头，射向刚才对“高虹时”名字作出回应的地方，进行若隐若现的远距离探视。王小燕承认，难以完全责怪这位工人老大哥自控能力差。实际上，她发现马老师的目光，也朝同一方向作过多次窥视。在审美问题上，与班上那些或多或少受到小市民气感染的男女同学相比，她自认为具有鹤立鸡群般的眼光和见地。比如，她觉得课堂里那些男生私下评定的“校花”，充其量不过是反映了现代男大学生审美知识的贫乏和视神经的退化。因此她对非公开性程序下所产生的那些走马灯一般变换的“校花”人选，一概不予承认。于是就有心怀叵测的女同学，尖嘴薄舌地把她的高超审视力，曲解成一种挑剔、嫉妒和苛求。她过早地体尝到了曲高和寡的孤独和悲凉。而遥视点名时亭亭起立的这位高虹时，她几乎立即毫无保留地给予她极高的评判和结论，觉得她具有一种能使异性摄魂动魄的古典美。当然由同属女性的她来作这种结论，难免使评判的质地带有臆测的成分。然而从两位工作组男性同仁的频频顾视来看，这种缺陷应该能得以抵消。理念的美和直觉的美，已经从一位大学讲师和一名车间工人的微妙反应中，得到了一览无遗地充分揭示和证实。把高虹时与厅柱前那位扭腰凸臀、卖弄风姿的妖婆娘作比较，你可以清楚看到美的高雅与粗俗之分；跟校园里那些轮流享有“校花”之誉的女同学比，你能看到，美有自然和雕琢之别。然而，具有高度政治警觉性的王小燕，却开始为身边战友的爱美之心，莫名其妙地担忧起来；她似乎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觉得这位神情郁郁、落落寡合的女子，恐怕不是出身于贫下中农之家。即使她出身于一个政治可靠的家庭，社教工作队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之一，就是决不能和当地社员发生恋爱关系。由于客观存在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工作队工人或干部类的未婚男子，经常遭受自以为有吸引力的农村未婚女子的引逗和进攻。王小燕觉得在自己刚刚踩边的革命生涯中，似乎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历史内容。

第二天王小燕借跟女劳力上麦田施肥机会，侧面打听到：高虹时果然是一名地主子女。

她生于解放前两年，却从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父亲的面。那位在美国留学的地主儿子与她母亲只同过两个多月房，就远走高飞回美国继续深造。高虹时原名高鸿思，显然是那位可怜的女人表达苦苦思夫之情的象征。解放后第二年，不知是因为已经为遥在海外的独养儿子了结了心愿，还是经不起改朝换代所引起的惊恐惧怕，那位已经丧偶的老地主，被亡妻的灵魂所追逐，一命呜呼地逃避了土改运动，却把一个颇有文才、美貌贤惠、整天以泪洗面的儿媳做了顶替者。所幸身边有个逐日出落得花貌月容的女儿作陪伴，这儿媳就把肚中所有的诗礼经文，都灌输给了曾经被老地主视作掌上明珠的小孙女。然而待到高思鸿初小毕业时，因为心灵上受足了素不相识的父亲所带给她的侮辱、欺凌和伤害，她就自作主张地把鸿思改为虹时。王小燕也在地头看到了那个名叫刘洁雯的地主婆，虽然一脸愁苦相，被过多皱纹填充的眉头眼角一移动，却仍然能透出她昔日大家闺女的姿容风韵和神态来。想到高虹

时的美妙之处，原来是受了一个地主婆的遗传、感染和熏陶，王小燕就对高虹时的美貌姣好，产生了某种蔑视和嫌恶。

可是不久王小燕就发觉，大部分妇女社员对她的蔑视嫌恶对象，却似乎都抱着一种同情和怜惜；“她爷爷在世时没有作过什么恶，她爹跟这石街没关系。她娘虽然曾经是闻名乡里的大才女，嫁到高家后却从来就是饮声吞气，低头埋首地当个活寡妇。以时宏的灵性和勤快，如果她生在一个好人家，会象你一样进城里的大学当女秀才。”几个情况介绍者，包括妇女队长的女儿高惠娟，都放出一通类似性质的辩护词和感叹号。王小燕现在就在高惠娟家落户，两人同寝一室，几天下来已经亲密得象一对姐妹。小姐妹的态度难免使王小燕受影响，使她动了一丝侧隐之心，想到这“第二次土改”不会把这母女俩当作活靶子打，心中就没有升起一种原来也许会有失落感。

高长兴照顾马进是读书人，安排他也参加娘子军的队伍。但是他宣告自己身体里流着农民的血，坚持要跟男社员一起挑河泥，动机之一，是要跟农村左右大局的群体沟通思想和感情。当然他还想借机和高金福建立对话渠道，与昨晚恨无相见之缘的高阿根取得碰头照面的机会。高金福似乎也存着向他有意靠拢之意，午晌时间对上了口，晚上就端着饭碗转悠到马进的住地来。马进知道他有要话相告，为提高速度，就学着高金福的样子，把碗里的稀粥拨动得哗啦啦地响。他的“三同对象”高得兴是队里的“五保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可惜不善言谈，恪守问一句、答半句的交流方式，使得马进对村子里情况的了解，难以深入发展。看到高金福主动来做弥补，高得兴就从吃饭的客堂间知趣地退出去，弯弯的腰背已经隐入过道口，又返身探出一个头对马进说：“吃完自己添。不吃好，要吃饱。”

“这农闲季节，乡下都不吃干的。你们下来可是受累了。”高金福用生活话题做先导。

“这乡下的粥，还硬是比城里的好吃。我已经吃了两大碗。”马进消灭掉最后一口，抹抹嘴，摆出一副言归正传的功架来。

高金福朝过道口走过去，瞧了瞧，确信高得兴已经走入屋子后头去了，就转身坐到马进的对面，开口说：“你不是打听那个高阿根吗，别说他本来就干不了挑河泥的活，就是想来干，他今天也来不了。”高金福停了一口气，见马进象听书一样的被他的开场白引住了神，就接着抖出整段的情节来：

“昨晚那娘们不愿报出他的去向，是因为他被戴洪发关了起来，就在开会前半点钟光景下的手。我也是刚刚摸到了底，说他偷了大队仓库的钥匙，戴洪发在这里回去后，又审了他一阵，下半夜才放出来。”

“你们这里的大队干部经常关押人吗？”听说在工作组眼皮底下发生了这种事，马进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次还真是靠了你们工作组的牌头，这个高阿根才免了皮肉受苦。他可已经不是第一次落在戴洪发的手里了！”

“高阿根这个人怎么样？”

“是个可怜命。人倒是苦出身，却一直没有翻过身来。土改后讨了那个从良的婊子，吃着打扮是本行，却从来不肯下田。近四十岁的人了，成日价倒象个刚下轿的新娘子。高阿根又要奉承这女人，又要负担老爹娘，一人担着四张吃食的嘴，要不是合作化，早就到了典房卖地的地步。那老爹娘没能挺过1960年。他呢，先得浮肿病，后得肝炎病，再也做不动强劳力活，虽然少了两张嘴，日子却过得越发艰难，全亏生产队经常给他一些补助照顾。

人是穷一点，但是从来就没有偷鸡摸狗的名声在外。可是怪了，前两年大队仓库里少了五六十斤豆饼，说是他借在仓库做帮工之机，做了顺手牵羊的勾当。抓到大队里吊起来一顿毒打，死不认帐。去家中一搜，嗨，几十斤豆饼还正藏在床底下。”

“几十斤豆饼，犯得着这么狠么？”马进表示不理解。

“奥妙就出在这中间，名义上说是为了杀一儆百；有人却怀疑这是栽赃。就拿这戴洪发丢钥匙的事来说，高阿根前两天又去大队干过活，可姓戴的凭什么，就断定是他拿的呢？嘿，还真奇。据说他招了，最终还让他老婆把一串钥匙送去了。好象他每次去大队干活，都派定会出事情。”

马进回想起昨晚社员会上高金福和戴洪发对嘴的情况，以及那个胡翠丽，自己老公被戴洪发绑了却还老用眼睛勾他的情景，突然明白，高金福是针对戴洪发来散布怀疑的种子的，但是从他的前言后语中，马进却觉得自己缺乏大侦探的联想力和逻辑推理力。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你觉得，戴支书在这方面有问题吗？”

“风言风语倒不少，要看工作队有没有决心查。你知道吗，人们都叫阿根那个婆娘潘金莲。”

“这次运动主题是清经济和清政治，生活作风不是重点。但是如果牵涉到欺压吊打贫下中农的话，这就变成政治问题了。”

“奸污地富反坏分子家属也算政治问题吧？”

“这要分主动和被动，”马进想起毛主席说的“几包香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不必说了”的话，觉得这种类情况挺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但是高金福的问话，却勾起了他的警觉：“戴洪发还有这方面的事吗？”

“多了，在西塘下大队，这是公开的秘密。你说，现在提抓阶级斗争，那些屁股上有屎的人，战战兢兢过日子，躲都躲不及，有几个胆敢主动勾引拉拢共产党的干部？我们戴支书工作有魄力，这没有话讲，就是好色。而且他有经验，专挑那些挺不起腰杆的户头。他不怕那些人去告发，上边相信共产党干部，还是相信你地富反坏分子的话？我琢磨着你昨天说的那些新提法，叫什么来着？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是不是可以治一治这号人？如果治不了，今天就算我没来，白说。我还要在这块地方混下去。要是能治，我好歹也是个党员，不能没有原则性。”

到底是党员，当过兵，有一点政治敏感和觉悟，马进不由把高金福重新打量了一眼，回答说：“关键要看有没有证据。”

“昨天开会，你注意到那个脸颊上带条伤疤的人吗？高远，今天挑泥没有来，本来也是你们城里人，反右后从报社贬回老家来。因为是高长兴的亲侄子，也不受大苦。可是后来呢，和北队的一个地主婆好上了，于是就惹祸了。那伤疤是怎么留下来的？伤疤里面证据多着呢！”

“这件事我要查一下再说。你觉得石街两个生产队队长的情况怎么样？”情况不摸底，马进觉得不好轻易表态，就把话题扯开了。

高金福摇摇头：“我看没有啥，西塘下的问题主要在大队一级。生产队一级，当队长要靠大家选。经济上，大家眼睛都盯得紧着呢！不比是工厂里；你多拿了，就是拿了大家的。”他对马进转换的话题显然不感兴趣，又聊了一通无关紧要的话，快快告辞了。

高金福走了以后，马进把全组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碰头会，交

流一下情况，布置下一步的步骤。散会时，已经将近十一点半。仰天躺在高得兴为他打的地铺上，因为稻草垫得厚，马进觉得背后软软的；想到高金福反映的那些情况，脑子里却是乱糟糟的，背下的稻草，都爬到他的脑子里去似的。高远那里即使有证据，用右派分子的话，可以扳倒共产党的支书吗？因此在碰头会上，他没有通报这方面的情况，只是笼统地要求大家在清查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时，同时要注意收集对大队干部的意见和反映。

第二天中午收工时，高金福指给马进看靠在土地庙门口晒太阳的高阿根。只见他面黄肌瘦，佝偻的腰背象大虾般地弓曲着，双手插拢在乌黑油亮的棉袄袖管里，眯缝着被挤压在皱纹中的眼睛愣愣地看太阳。那模样，看上去倒可以做他婆娘的爹了。晚上碰到朱坤兴和王小燕，马进告诉了高阿根被大队支书关押的事，关照他俩要注意收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近两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马进这一工作组所领导的三个生产队（原先四个并掉一个）的四清工作，据说由于在指导思想存在着右倾情绪，进展缓慢。至少，这是在工作队全体会议上，季队长所作的评判。按照毛主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指示精神，这三个队中，应该起码有一个队属于“三类队”，即问题严重的队。可是现在都变成了“一类队”或“两类队”，即好的和比较好的队，这就违反了毛主席所作的基本估计。和农民搞“三同”、天天吃三顿稀饭的朱坤兴，本来心中就有情绪，“没有蚤子也要硬抓一个吗？”他同样用毛主席的话，不客气地加以回击。王小燕立即运用斯大林的话，加入支持行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她觉得季队长的评判不仅官僚武断，缺乏工作领导水平，而且是对工学院师生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和革命干劲的公然蔑视和否定。这些日子里，这一组的同志除朱坤兴有些牢骚外，都任劳任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劳累后，每晚访家问户，谈心讨论，不到十一二点钟上不了床。王小燕本来就是下定了和新生南霸天、黄世仁作殊死搏斗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斗争的。其本心，又何尝不想在自己手上，亲自抓几条大鱼出来呢？可是这三个队，除了有一些小帐目上的来去，和有人揭发前几年高胜泉曾利用城里一家运输公司的汽车，搞过蔬菜长途贩运外，确实没有发现其它情况。群众没有大的意见，客观上是因为，大伙儿守着一个锅里面本来就货色不多；如果谁还想昧着良心在锅里捞一把，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大窟窿，很难逃得过众人的眼。加上三个队的民主选举制度一直运行得比较正常，选出的队长当然也就比较公道和得人心。马进内心赞同手下人对季家驹所作的反驳，但是觉得当面顶撞这位从市委组织部来的科长，会使人觉得，是自己在背后鼓励和怂恿，于是就诚恳地提出：对队领导的批评，应该虚怀若谷，摆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姿态来欢迎。同时认为要摘掉右倾主义的帽子，看来要寻找新的突破口，把矛头转向生产大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位曾经颇得他好感的戴洪发。毛主席所担心的另外“三分之一”，可能就反映在这位大队支书的身上。因为马进听曲湘川与何为民的汇报，在其它两个队，也有戴洪发到处搞女人的反映。他决定找高阿根好好谈一谈，把他受戴洪发吊打关押的真实原因，彻底查清楚。

马进在生产队的养猪圈里，找到了面黄肌瘦的高阿根。见到工作组的人找他，高阿根起初有些惊慌。在听马进谈明来意后，他就蹲到在猪圈旁边的稻草堆前，耷拉着脑袋，半晌不吭声。马进反复开导，他好象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散神的目光定定地，望着猪栏里靠在墙角打盹的一只瘦黑猪，就

是不作声；那眼圈，却变得渐渐红起来。就这样愣了两三分钟光景，终于抹了抹眼角，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唉，就怪自己这号命！要不是靠了共产党，我这把骨头，恐怕也早就被野狗叼走了。其它不顺心的事，也就不去多想了。人只要咽得下气，万事也就不扰心。好死不如恶活，鸡子不能跟石块去撞。唉，你叫我跟你说什么好呢？”

马进见他已经张了口，就愈加不肯放松。除了各种各样的开导和激励话，再三强调：对他说出的实情，会百分之一百地加以保密，决不使他为难。就这样苦口婆心，反反复复地做工作，终于铁树开花、枯枝发芽，使高阿根把吞在肚里的苦水，吐一句咽半句地倒了出来。

原来，戴洪发当上党支书不久，就和高阿根的老婆有了勾搭。朱坤兴之所以受毒打，是因为他在察觉奸情后，平生第一次打了他老婆。戴洪发为了给姘妇出气，就商定时间，把几十斤豆饼弄到了高阿根家的床底下。然后以此为藉口，对他大打出手。随后又施之以小恩小惠，包括把大队的各种轻松零活包给他做。就这样软硬兼施，终于摧毁了他那狭隘的大男子主义和夫权思想。这次高阿根交出的钥匙圈，其实是戴洪发脱下裤子撂在朱坤兴家的床头时，滑落在床底下没察觉。被朱坤兴捡到后，戴洪发担心会成为他手中的把柄，在“四清”开始后成为一条祸根。于是就连夜突袭，连吓带哄，迫使高阿根交出了钥匙圈。马进掌握到了第一手资料，虽然满心喜欢，一走出猪场的门，就立即泄了气。只要高阿根不敢站出来公开作证，一切就几乎等于零；而他既然还担保为高阿根绝对保密。只要他信守这一诺言，就意味着：在戴洪发的拒不承认面前，他将无计可施。

于是，他就想到，必须同高远也好好谈一次。多点进攻，全面开花，也许能够冲出一个缺口来。这样在跟高远的关系上，就不能再和王小燕打埋伏，因为他需要她一起参加这次谈话。他想，高远也许不仅能提供重要情况，还可能帮助出主意，促使高阿根挺起腰杆来。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了，我打听到他是复旦的毕业生。”王小燕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好象对马进突然找她谈高远早有思想准备。

“你知道他脸上伤疤的来历吗？”马进接着问。

“我知道，那是他跟高虹时的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时，被戴洪发带人去从被窝里掏出来之后，从小阁楼上推下楼梯时撞破了脸。”王小燕显然并不觉得，这件事属于“四清”范围。

“咱俩一起找他谈一谈好吗？听说戴洪发跟那个地主婆也有关系。”

“是吗？”王小燕似乎闻到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看她那样子倒挺老实，既然用美人计腐蚀拉拢干部！”

“调查研究后再作结论吧。”马进淡淡地说。

在高远栖身的那个低矮阴暗的阁楼上，高远坐在被褥凌乱的床沿上，猛抽着香烟，好长时间不说一句话。

“高远，小王是我的学生。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当是咱老同学叙旧一样，随便说好了。”马进知道，王小燕对这个摘帽右派分子并没有特别的恶感，就给高远吃定心丸。

“我晓得，”高远终于开了口：“可是，你知道戴洪发的来头吗？只要钱壮还在公社书记位子上，没人能够动得了他。”

“公社书记算什么？”王小燕一撇嘴。

“他本人也许不算什么，但是书记背后还有书记，他并不仅仅代表他自

己。”高远冷冷地回答说。对于这一点，他自认为有切身体会。对面前这个乳臭未干的丫头，他佩服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但是，也为她将来也许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感到惋惜。他觉得，这种代价是可以预期的。

“跟你实说吧，小王是烈士子女，她父亲生前跟我们省里的领导熟得很。如果戴洪发确实有问题，一个公社书记保不了他。”马进对老同学内心的想法洞若观火，提醒他不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高远抬起头，眼睛从洋瓶底厚的眼镜片后，朝王小燕重新探视打量了一番，又静了一阵子，开口说：“让我考虑一下，过两天再给你们答复。”说完就站起身，明显是下逐客令。

马进了解高远的脾气，只好和王小燕退出，耐性去等待。但是四五天时间过去了，却毫无动静。每当马进或王小燕有机会和他照面时，他都躲躲闪闪，竭力回避。王小燕对此心中不免忿忿，觉得往好处说，这是辜负了工作组对他的信任；从坏处讲，则是对工作组的蔑视对抗，对运动设置阻力。马进劝她沉住气，提倡理解万岁：“一年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他是把社教当作反右，把咱当作那位后来当了省委派的蹲点干部了。”

到了第六天，王小燕恰好和高虹时派在一起种山芋苗。清明已过，万象更新。绿油油的麦子，欣喜地迎着温柔的春风，波涌起伏。双翼闪着蓝光、胸脯泛着银白的春燕，在黄灿灿的阳光下，欢快地翻上飞下，还不时以清脆的叫声，欢欣鼓舞地划破早晨凉湿的空气。

高虹时已经卸去了臃肿的冬衣，贴身裹在窈窕身肢上的胭脂红毛线衣，虽然已经褪色，在蓝天白云和绿色麦浪的衬托下，却仍显得的娇艳鲜亮。她的脸色是苍白的，好象是由于营养不良，又好象是缺少睡眠之故。但是那种苍白，不仅没有削减她的美丽，反而使她更加显得楚楚动人，娓娓娜娜，似乎是专门引发人们不可遏制的惜玉怜香之意的。

王小燕是个性情豪爽、胸襟宽广的新型女性，她在别的女孩子面前，体验最频繁的感情，不是悲天悯人，就是轻蔑藐视，忌妒两字，是排除在她的情感辞典之外。但是此刻，她却不能不承认，面对身边的这位“落难公主”，自己的心里起了一种隐约的嫉羨。然而她安慰自己，这种嫉羨发生在一颗高贵心灵里的时候，并不带有卑劣的成分，而是真正的美，必然会触发的一种健康而正常的心理反应。而且她能感觉的，高虹时的眼神也不时停留在自己的身上。那是一种谦卑的、敬慕的、类似古代女佣侍奉女王所常用的那种眼光。而且她甚至不敢直视自己，每当感觉到她注视的眼光时，王小燕坦然相迎，对方的眼光却象老鼠一样，惊慌地躲避奔走。这使王小燕感到一种满足，觉得自己回报以一点有限的嫉羨，不过是一种礼尚往来、平等待人的表现。然而，当这种由窥视和捕捉所构成的眼光交流游戏，随着太阳的冉冉升高，从游击战变成持久战的时候，王小燕的好奇心，就逐步转换为一种猜测，一种期待。她以女孩子特有的敏感，意识到高虹时也许有心里话要对她倾诉，只是还在经历心灵的搏斗挣扎。她就借着递给高虹时一捧山芋秧苗之机，亲昵地用一只胳膊挽住她的腰肢，柔声说道：“歇工时我俩一起走，好吗？你今天看上去真漂亮！真的，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漂亮。”

高虹时这时苍白的瓜子脸上，蓦然腾起了一片红晕。她能以自己的心灵体味感受到，这一赞扬是真诚的。而她本来期待的，是一种嫉妒，一种讥讽。不要说是在一个高贵的女大学生面前，就是偶尔上锡城市，站在那些商店柜台女营业员的面前，她也总是能够感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气概，和鄙夷

不屑的目光。她知道这种作派是硬装出来的，因为她们中间极少有人，能够真正与自己所媲美。她们就用对乡下佬的蔑视，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失衡。可是眼前这个城里姑娘，不仅长得端庄大方，给队里好多人留下了热情爽直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她可能会是自己命运中的惟一救星。自从上星期高远叔借夜幕掩护溜进她的家，跟她娘躲在房里悄悄商量了大半夜之后，自从她娘向她转告了高远叔的想法和建议，她就几乎整夜整夜地失眠。她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念头中，筋疲力尽地搏斗和挣扎。恐惧，羞辱，愤恨，哀怨，一面是对新生活抱有一丝不灭的希望，另一面是对可能惹起的报复惩罚和毁灭性打击，极度地恐慌。今天，恰好和王小燕分在一起干活，天赐良机，时不再来；她几次都觉得，自己的嘴巴已经嗫嚅移动，却没有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来。想到在分分秒秒的流失中，自己就要失去一个难得的机会，她对自己的怯懦和犹豫，感到恐慌和绝望。蓦然听到王小燕首次用那么亲昵的眼神和口气，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就一下觉得自己变得坚定起来，尽管前途茫茫，吉凶难测，她还是点了点头。

在歇工回村的路途中，她俩有意走得很慢，远远地落在其他人的后头。当经过一个芦苇丛生的池塘边，她俩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彼此会心地对望了一眼，就折入小荃，面对漂满浮萍的池塘，背靠长满油绿新叶桑树林的掩隐，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那芦苇被暖暖的春风一吹，就吵着，闹着，哗啦哗啦地响成一片。夕阳在那弯弯垂向池塘一边的叶尖顶上，撒下一片亮闪闪的金光。当芦苇随风响起一阵一阵喧哗吵闹的时候，那金光就在芦苇丛的顶端，抖动着，跳跃着，得意洋洋地起伏翻动。池塘水是清彻的，在池塘边上蓝幽幽的水草丛中，可以看到黑黝黝的小蝌蚪，摇着一曲一曲摆动的尾巴，成群结队地，仿佛在举行盛大的庆典，热热闹闹地一边集会，一边游行。

高虹时默不作声地坐着，两眼定定地注视着水里的小蝌蚪，仿佛困惑这些小生命，何以会有这么多自己所缺少的喜悦和欢乐！王小燕把左手勾在她的肩头上，用右手握住她的双手，全神贯注地看着她黯然神伤的双眼。那眼睛哀怨，忧伤，逐渐湿润的眼眶，使长长的睫毛变得分外黑亮；黑亮中，渐渐地，泛出一种闪光来。那闪光，在扩散，亮晶晶的，水汪汪的，如果那是一种欣喜，一种激动，一定会是分外地娇媚。然而不是的，这是晶莹的泪水，默默地在涌动。慢慢地，王小燕觉得高虹时的肩头，开始微微地颤动起来，终于，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无声无息地在滚落。高虹时用牙齿咬紧嘴唇，仿佛认为这样做，就能制止泪水不听指挥的流淌，但是她失败了。一滴，两滴，王小燕感到自己的手背上，有高虹时脸上滴落下来的泪水，凉凉地在滚动。王小燕把左手移到自己口袋里去掏手绢，可是没有。她开始慌乱，因为在她的生活中，还从未有过这种经历。慌乱中，她就开始笨拙地行动，把自己的右手权当手绢，在高虹时的脸蛋上，无济于事地移来抹去，一边用低微而又很是焦急的声音，重重复复地念叨着：“别哭，别哭，哦，别哭了，有什么难过尽管对我说……”。高虹时执住她的手，用抽噎的声调续不成声地说：“我……我不想哭，可是……忍……忍不住。”说完，一头扎到王小燕的怀里，反而失声痛哭起来……

第二章 初试锋芒（2）

马进脸色铁青地听完了王小燕的汇报，沉吟了一会，说道：“看来高远所以回避我们，是因为担心光凭戴洪发不让他和刘洁雯办结婚登记，扳不倒姓戴的，就想索性把戴洪发强奸霸占母女俩的事，都抖出来，但是又担心坏了高虹时的名声，所以就让她自己作决定。”

“是这样，高虹时惟一的心愿，就是远走高飞，远远躲离开她的家乡。我已经想过这件事，也许应该跟朱坤兴商量一下。”

马进长长地盯了她一眼，明白她的用意来：“你有把握吗？”

“试试吧，我看他对高虹时挺有好感。再说不为她安排好退路，她随时都可能缩回去。”

“看来，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大学生。”马进赞许地说。

朱坤兴听了马进和王小燕的情况介绍，显得很暴怒：“妈的，这共产党的天下，还有没有王法！非把这条畜生揪出来！”

“怎么揪呢？姑娘家破了身，总是有顾虑的。如果高虹时不愿站出来作证，他照样逍遥法外。”马进冷冷地说。

“高虹时说，只要她能远远地嫁到外乡去，她宁愿撕碎面子，也不愿再活受罪。唉！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可怜姑娘，可惜我不是个男人，否则我一定要讨她做老婆。”王小燕说完用眼睛瞟着朱坤兴。

朱坤兴憋红了脸，顿了好一阵子，终于说：“只要她也看得上我，我可以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

“你是培养对象，讨个地主女儿对你合适吗？”马进提醒他表态时，把事情想周全。

“我本来就不想当什么官！没问题，回我原来的郊区生产队好了，我阿叔是队长，没有人再敢碰她一个手指头。”

“你今晚睡在床上再好好想一想，如果不反悔，明天就让王小燕作红娘。但是你俩今后要注意，必须等你回城以后才能有接触，以免被人抓住把柄。”

“不用再考虑，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朱坤兴觉得在外表和个性上，高虹时比他原来的女朋友，要高出一百倍。虽然破了身，不是她的错。何况自己和原来那位，也已经出过轨，没有理由苛求人。但是对这一条理由，他是无须加以公开说明的，就用了一句豪言壮语做替代。

第二天下午，马进听说，高虹时对有关朱坤兴的各方面情况均满意，就决定和王小燕一起，找季家驹队长作汇报。

谁想季队长的态度很冷淡：“你们这是听到的一面之辞嘛。光凭四类分子子女的揭发控诉，就要整共产党，工作队的立场往什么地方放？”

“群众中间反映也多得很，就看我们是否发动群众认真查。”王小燕对季队长的态度，心里有些火。

“生活问题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不要走偏题。毛主席在前两年就四清运动曾经说过：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儿女勾搭，不洗澡就不能对敌。因此，戴洪发即使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是下水洗澡的问题，我们不能小题大作。”

“可这不是勾搭，而是利用职权，强奸妇女，党纪国法不容！”王小燕的声音变得高起来。

季家驹瞥了她一眼，把脸转向马进。马进意识到他的意思，就用沉稳

的口气说：“季队长要我们注意立场问题是对的。我们打算回去召集积极分子开个会，认真听取一下贫下中农的意见。我们最初也是听了党员高金福的反映，才注意戴洪发的问题的。”

“不必了，跟你们直话直说吧，戴洪发已经把他的问题，都向工作队交待过，公社社教工作团已经作决定，马上就要把他解放出来。这个大队书记人才难得，是有一点小名气的。

就说你们南北石街并队的事吧，就是在他手里才办得成。最近县委还特地通报表扬过他。”

“你这是谎报军情！”王小燕听他搬出上一级社教工作团和县委来压人，就尖锐地点出大队工作队一级的责任来。

“我不来跟你争。小同志，共产党是有组织、有纪律、有领导的。不注意这一点，就会摔跤子，跌跟斗。你们回去吧，我马上还要到公社开会去。”季家驹用教训的口气结束了谈话，转身去拿他的公文包。

“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去找我爸的老战友？”回村的路上王小燕问马进。

“暂时别忙，这是最后一步棋。先回去开碰头会，把全组的意见统一起来。”

晚上七点钟光景，七名工作组人员，全围坐在高得兴家那张台面上布满裂缝的八仙桌前，由高得兴在门口守着，防止有人直闯进来，影响开会。

马进把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后，第一个坚决认为不能半途而废的，自然就是朱坤兴。工学院的何为民，也站在赞成老师的立场上，认为应该加强做受害人的思想工作，鼓励她们站出来大胆检举揭发。但是另一位工人阶级代表、工作组副组长林和昌，却有些不以为然，他已经参加过两期工作组，就以老经验的资格，摆出自己的忧虑来：

“农村中干部的男女问题，因为一般不涉及群众经济利益，大家不很关心。有些老百姓反而把这类事情当作谈话中的调剂品，少了觉得日子不完整，只要不碰到自己头上，不会有民愤，因此上面不重视。我以前在别的乡听得见得多了，有几个大队干部合占一个女人的，有大队治保主任带着手枪闯进新房强奸四类分子儿子讨的新娘的，只要其它方面没有大问题，都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过去了。至于捆绑吊打社员的事，更是家常便饭。农村里的好多土政策，全靠这一套手段来维持。而这些土政策，好多是公社一级或县一级搞出来的，上面就靠这些基层干部来贯彻。只要上面的头不倒，总是会护着自己的手下话是说给他听的，其实这是多此一举。既然县委也已经有人给他打了招呼，那就不看僧面看佛面，能放过时且就放过。这社教工作是临时任务，犯不上为此得罪当方土地，把关系搞得很紧张。至于这眼前的王小燕，他已经听说过一点有关她的情况，知道这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就朝前欠了欠身，插上话头说：“噢，这位钱书记，你们过去在公社欢迎会上应该见到过，是我们工作团不挂名的顾问参谋。你们向上级反映情况的积极性是好的，但是要养成依靠组织的观念，没有特殊情况，还是一级一级的来比较好。大队党支书烂掉了吗？但是你们季队长没有烂掉，他没有去搞女人；所以就应该努力争取他的支持。我跟你们季队长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同志关系。因此在工作意见上，要相互尊重。”说到这里，他有意停了一停，瞟了钱壮一眼，然后继续说道：“你们直接来向我反映，组织上是容许的，无可指责；但这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因为我倒过来还要找你们季队长了解

情况，听取意见。做一个合格的领导，不是光靠一条命令压下去。而能不能让季队长接受你们的看法，主要得看你们有没有本事，平时跟他是否做好沟通工作。总之，我很赞赏你们年轻人嫉恶如仇的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还有那特别难能可贵的理论头脑。所以毛主席把希望寄托在你们一代身上。王小燕，我看得出来，你们这代人有帮助，很有希望。怎么样？还是回去和季队长好好商量商量，都是工作团的同志，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应该会很容易地找到共同语言。”

王小燕本来是憋着一股子气来公社的。一听钱壮那般口气，无疑是火上加油，雪上添霜。脑子里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堆势不可挡的革命理论要点，就如弹上膛，箭上弦，只待秦团长奏起同样的陈词滥调，立即予以迎头痛击。而且要用最尖锐的语言，刺得这两个敌我不辨、良莠不分的昏官暴跳如雷。然后在头脑发热中叫来两个民兵，把她凶神恶煞般地关押起来。然后她就宣布要见家属，同时宣布绝食，高唱国际歌……在来公社的路上，她亢奋的脑袋里，尽是这种喜剧性的悲壮场面，以致一点都没有体察意识到，陪伴她的朱坤兴，一路上有好多私房话，要和她这个红娘分享讨论。他的心态，其实也是亢奋的，只不过那是另一种类型激动，没有很强的政治性。搞倒戴洪发，不过是要想心头出一口恶气，为心上人报仇雪恨。搞不倒他，他还是要娶她。这几天夜里，只要一合上眼，高虹时的音貌愁容，就楚楚动人地显现在他的眼前，不由使他心神摇动，下身躁热。而且他俩通过身边这位媒娘的介绍，已经以身相许，违背马组长的关照偷偷作过几次私下幽会。他不能想像，如果没有这个美人在身边，他今后的生活怎么过。可惜他的媒娘太年轻，太富有狂热的革命精神，而少有体察他心曲的圆熟和经验。其实只要谈上几句任何有关高虹时的话，就会使他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活，使他觉得不虚此行。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觉得还能忍受得住她那种难耐的沉默。因为他比她年长，可以体察她此刻的心理。她好象面临大决战的一位将帅，有好多难以预计的复杂情况，需要尽量提前估算，以免猝不及防，落盔丢甲。然而，尽管这位将帅周密盘算，把类似钱壮那样的诡辩论调，早就估算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却挂万漏一，没有想到秦团长却完全使出另外一种套路来。王小燕体育虽好，但只是田径和乒乓球等方面的行家，对于太极拳法那套不扁不顶、不丢不抗、棉内藏针、以柔克刚的精义奥旨，根本一窍不通。秦团长讲的每句话，都好象设身处地在为基层工作组的同志打算，而不是站在维护季家驹和包庇戴洪发的立场上。他没有批评指责，而是循循善诱，谆谆启导。起承转合之中，圆润光滑，绝不让王小燕找到一个突兀生硬的支点，使她能有机可乘地插进一条杠杆，天翻地覆地撬动一个地球。王小燕因此感到茫然，觉得实际情况与她想像的惊险或壮烈场面，有天差地别之分。军号战马，地下斗争，一个历史时代既然已经结束，就不会再简单的重复重生。她的想像力太丰富，在光天白日底下，也做轰轰烈烈的革命梦。她已经被太多的革命激情，淆乱了自己的视线，以致把一个革命队伍里的领导者，当作了自己假想中的敌人。这就很危险，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随着地球隆隆地滚向那使整个世界震撼惊骇的一个时代，我们就不能不为她手攥一把冷汗。其实，惊雷已经在远方的地平线处慢慢滚动，只是她还没有觉察到，感受到，意识到罢了。不过此刻现实和想像闹别扭造成的心理反差，却需要她努力地加以消化调整。可是她却一时还认识不到这种调整需要，仍然坚持错误立场。她愣了好半晌，突然回过神来似地抱怨：“我们是想和季队长沟通，可是却没有沟通

的时间和条件。底下正要发动群众揭露戴洪发的问题，可是明天上面就要下来宣布他没有问题，群众一旦被堵住了口，我们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取得季队长的支持！”王小燕到底不愧为革命烈士之女，她没有被秦团长所施放的烟雾迷障，完全挡住路向，丢失自己的强词夺理的本领。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够不够？我关键要听一起挑担送马老师小王他们，都记工，没二话说。”然后又回过脸对马进说：“胜泉要我对你说，要不是挡着大队里那几只眼，他今天还真想亲自送你们上轮车站。唉，好人难做人，恶人磨世界！”高长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间，马进百感交集，竟不知道对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队长，嘴里说什么好。眼睛里热辣辣的，被喉咙头一股滚动的热浪冲得一阵一阵的，几乎要闹出笑话来。一只握着那满是老茧手掌的手，原本是想拉一拉就松开的，这时候却好象变得抽不回了，反而连另一只手也被牵引住，落到了那可以感觉到硬硬骨头的肩膀上，轻轻地摇晃着，俩人都不说话，只是用眼睛相互对视着。下乡这么多天，马进觉得跟老队长的心，从来没有象这当口，贴得这么近……

这时，前屋响起了推门声；高得兴在迎进高长兴后，没有再把门关死。然后是一片杂乱的脚步声，“啪哒啪哒”地响进来。这会儿是王小燕打头，身后跟着曲湘川，何为民，还有送行的高惠娟，朱坤兴，林和昌，宋培元。王小燕的神情，好象刚和人吵过架似的，眼眶脸盘，都是红红的，双手捧着一小个黑布包袱，气急败坏一连声地叫进来：“马老师，你看怎么好？你看怎么好……”

马进朝那包袱张口处一瞥，原来是鸡蛋，黄黄的，估摸有十几个。“怎么回事？慢慢讲。”他眼睛盯着上气不接下气的王小燕问。

王小燕总算定住神，一五一十，开始解释起事情的始末经过来：“我和惠娟刚才走过土地庙前时，看到庙门的石阶上，黑糊糊的蹲着一个影子，看到我俩，就一下横到我跟前，差点没把我吓一跳。你猜是谁？是高阿根！硬把这鸡蛋往我手里塞，说是给我们路上抵饥。怎么也解释不通，怎么也推不掉。两手一松，扭头就走掉了。你说这急不急死人！”

“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你们就领了吧。”老队长缓缓地说。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村里日子最难过的人，我们工作组的人，回城时怎么好拿他的东西呢！”王小燕的声音里，几乎带上了哭的声腔。

“这个高阿根，也真是！我早就准备好了。”得兴拿出一个小篮子，黄澄澄的，里面也是煮熟的鸡蛋。“

”带上吧，吃上这些鸡蛋，心里会变得实。“马进一脸肃穆地说。这一刻，工学院的三个学生，都跟他们的老师一样，脸色变得非常地肃穆和庄重。他们虽然都不言语，但是在这—时刻，似乎都能彼此理解得特别深，相互能够一眼看到对方沉甸甸的一颗心。这颗心，是什么时候、怎么变得沉重起来的呢？也许是因为，通过这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了解到了许多在书本上了解不到的东西，懂得了好多大学课堂里根本接触不到的知识道理。装的东西多了，于是一颗心的份量，也就跟原来不同了。特别是王小燕，此刻似乎在竭力回想下乡时，乘在手扶拖拉机挂斗里的心境。两者前后是如此之不同，感慨之际，不由为从前的浅薄浮夸而自惭。

鞋帮上沾着被露水打湿的草屑，眉毛发尖被乡村浓重的晨雾染得湿漉漉的，一行人挎着背包担着行李，迎着胭脂红的晨曦和掠过稻田秧苗的清风，

匆匆行进在江南水乡的田埂上。

马进和朱坤兴落在最后。

“听说，你跟高虹时暗中会过了几次面？”马进把声音控制在前头人听不清的程度。朱坤兴脸赭地点了点头。

“一定要克制，回城以前不要再碰头。否则要出纰漏，今后想在一起，也办不成。”马进的语气极严肃。朱坤兴又是点了点头，稍过一会，加强性地回答说：“我知道了。”

“把这十斤粮票带给高阿根吧，谢谢他；也告诉他，坏人不会永远当道的。”

马进低微的声音一出口，飘飘忽忽地，一部分恰够传进朱坤兴的耳朵孔，其它的，就被一阵晨风吹散了，消失在空旷的田野里……

当热烘烘的太阳已经爬上半空的时候，当马进等一行和其他工学院的师生们汇合住，一起呆在“嘟嘟”地朝城里进发的船舱里时，一封工学院人事处的回函，送到了季队长的手里。”马进……1956年至1959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那右派分子也是在复旦毕业的，年份也差不多。”戴洪发凑在季家驹身边瞧着公函，低沉地插上几句话。

第三章 见面礼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高潮，马进带着王小燕等一班投入四清运动“经风雨、见世面”的苏南工学院学生，仓促地从农村退回锡城市校园。而此时此刻，王小燕烈士父亲的那个老部下，原省委宣传部部长武遥，也在进行一个人生道路上的战略大转移。

列车铿锵，背靠套着猩红绒套的软座椅，随着车身的轻轻晃动是惬意的。江南地区从梅雨季节刚钻出来，就撞上第一个热浪，气温骤升到35度左右。幸好夏天第一个回合的进攻，也许准备得不够充分，气势汹汹嚣张了几天，就无声无息地消退了。列车地板上的地毯，也是猩红色的，与猩红色的椅套相映辉，就使整个软席车厢里，充溢着一种暖乎乎的气氛色调。如果是在寒冬腊月，这种暖洋洋的色调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如今将要进入使人汗流浹背的盛夏；前几天，在享有“三大火炉”盛誉之一的南京，晚上已经有人在汗水中辗转翻侧，不能安睡，这种暖色调的装饰布置，就显得不合时宜。武遥想：对政治气候的变化，人们所作的反应和调节，往往是敏感而及时的；但是对自然气候的变换，有时候却显得反应迟钝，有些麻木不仁。但是他随即又想：这样下结论似乎也不对，车厢里的空调不是开着吗？丝丝的冷气舔着端着报纸的手臂，汗毛孔上可以感受到阵阵寒意。显然，列车长已经充分估计到，有了这种寒意，就足以抵消红色氛围造成的暖意。但是武遥心里又反驳：热浪已过，这空调这样开着，未免有些浪费；因为据他所知，这沪宁线一带工业地区的能源供应，并不宽松。应该厉行节约，随时随地精打细算才对。你上海铁路局不归地方管，但是节约了煤炭，可以通过铁道部，

调拨支援那些能源燃料紧缺的地方，关键是他们对那些缺柴少火地区人民的困境，缺乏体验。武遥前两年，去苏北农村检查“四清”工作进展情况时，知道好多地方，烧饭煮水的燃料都保证不了。县里的领导借机乞求呼吁，“请上边支援一点工业用煤吧！”武遥却当场就在心里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这几乎不可能。他与省委工业口子的领导很熟悉，知道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中国面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封锁，为了使正在摇篮中的现代工业逐步成长发展，必须委屈一下五亿农民兄弟。因此每当在农村贫困地区，看到那些几乎惨不忍睹的情景时，他的心境基本上是平定的，咬紧牙关再熬上十几年，暂时的局部的牺牲，是必不可免的。然而此时此刻，就因为他感到汗毛孔被冷气冲得有些凉，就觉得心中老大不安宁似的。在宣传口子干了十多年，他似乎得了多愁善感的毛病。对于看到听到的任何事情，只要跟群众利益群众情绪联在一起，他就会变得过于敏感，耿耿于怀。其实这空调的事，跟他一点都没有关系。他今天如果不搭这班车，这空调也照样开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乘上了这班车，也轮不上他来摆布干预这件事。在软席车厢里，比他级别还要高的首长相信有的是，也不一定都能管得了这件事。物理界有惯性，惰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着惯性惰性走。老的习惯固然不容易打破，而新习惯一旦建立，也就马上产生跟老习惯同样具有的顽固性。夏天来了，把红色换成绿色要跟惯性惰性作斗争。

热浪退了，要把前几天开顺手了的空调重新关上，也要与惯性惰性作斗争。武遥想：一个社会如果总是被惯性与惰性所摆布，恐怕就会产生一种危险性。中国从辛亥革命起，就一直在变。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当然也时有挫折和失败，使那些不愿意看到变化的人心怀不满，抱怨不迭。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带来了众目共睹的历史进步。中国在走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哪能处处一帆风顺呢？武遥重新把思路集中到手头的报纸上。

一段时间来，中央看来发生了一系列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人注目地把前几年农村刮起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与历史剧《海瑞罢官》联在一起；并断言：“《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前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报界耐人寻味地沉默了十几天之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都相继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洋洋长达万言的文章。开始时，《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首当其冲。武遥听说：毛主席早就要北京市市长彭真，组织力量批判吴晗这个剧本的政治问题，可是彭真认为，把《海瑞罢官》跟“翻案风”挂在一起，纯属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有人从北京回来告诉武遥，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已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武遥对彭真宁可冒犯毛主席而不愿触动吴晗的做法，并不很理解。因为即使按彭真的说法，“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吴晗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副市长，当然清楚知道那位原国防部长，在59年庐山会议上对毛主席犯颜直谏的情况，和八届十中全会定彭德怀62年写的八万字书为翻案的背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大张旗鼓地宣传海瑞刚直不阿“骂皇帝”的“硬骨头精神”，坚持这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显然与毛主席在

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精神相违背。毛主席还特地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段话，如果把小说两字换成剧本，再结合姚文元文章的一些提法，彭真难道就一点都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吗？

武遥的政治敏感和分析能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966年4月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载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5月1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一向占据北京政治舞台活动中心的彭真，没有露面。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戚本禹又在《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时隔不久，武遥又读到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主持制定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北京还传来了毛主席直接批评彭真的严厉声音：“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宣告：“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

社论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于欺骗、愚弄、麻痹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晌，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制造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武遥把这些文字用红笔划了起来，认为它阐明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文章中所充满了的一股前所未有的火药味，不可能不引起武遥的政治警觉。就在同一个6月1日的晚八点，武遥正

在忙碌地打点行李，为第二天个人生活中的历史性转移作准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电台联播节目女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广播的内容之异乎寻常，如果不是亲耳聆听，几乎使人难以相信和想象——这是一份北京大学哲学系部分师生，把矛头对准大学党委的大字报。九年前，文教系统那些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所遭遇的下场，至今仍然停留在好多人的记忆中。1957年的历史，会在1966年重演吗？

第二天早晨，省委宣传部的小车送他上火车时，带给了他当天的《人民日报》。横在报纸中间的一条头版通栏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触目惊心地映入眼帘。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全文。这份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一开头就责问：“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对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然后大字报罗列了上述三个人有关在北大开展文革的种种言行，诸如：“……‘现在急切需要领导，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向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指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大字报刊载版面的旁边，还配上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文章号召：“只要谁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坚决地与之作斗争，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

在这两篇文章的上方，则是《人民日报》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社论说：“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是违反辩证法的。那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仍然丈夫，以便从此可以随时拜倒在妻子的石榴裙下。虽然武遥比她大了十多岁，杨玲觉得跟他的结合，是幸福的。也许从第一眼见到这个省委蹲点干部起，她就被他那种谦逊坦诚、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吸引。在一次偶尔交谈时，她了解到他原来解放前在江南大学读过书；再一深入，竟是父亲教过的学生，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就一下缩短一大截。她想，丈夫不愿承认对自己政治安全所发挥的保护作用，不过是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词，都会无微不至地体味照顾到她的心理和感受，这使她感到满足、幸福和陶醉。而这种体味照顾，并不是光为讨好自己的夫人而承担的一种额外负担。如果仅仅是为了讨她的欢心而专门做出来的话，这固然能使她感到高兴，却并不会使她感到自豪。她对丈夫这方面之所以特别满足和自豪，就因为这几乎是他个人品格中的一种内在特性。它具体反映在他对高远去向问题上所抱的关怀歉疚之心，他在罢工问题上对闹事者所表示的理解和同情，他在下雨天对小车驾驶员开过低洼处不要溅着路边行人的关照……，诸如此类。他觉得丈夫的所作所为，在干部中不算绝无仅有，也可算得上是凤毛麟角。因此她在拥有许多妻子都能够拥有的满足之外，还拥有其他妻子无法拥有的骄傲。在她少女的心灵刚刚绽开青春蓓蕾的时候，他父亲就告诫过她：你要找一个不仅是全心全意对自己好的人，而且要找一个对

他人也同样好的人。杨玲仔细咀嚼品尝父亲这句忠告，直到和武遥结合后，才完全体味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深邃哲理。然而，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妻子，几乎都认为自己对丈夫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妻子，能够完全避免在这种评价中，夹杂个人情感的因素，杨玲也不例外。她丈夫虽然帮了高远，但是在他的动员鼓励下，报社积极投入帮党整风的响应者中，一共有十一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其他十名倒霉蛋，当然并没有个个仿效高远向他写信求助，即使写了，武遥恐怕也只能采取装聋作哑爱莫能助的态度。而在涉及维护她政治生命洁白无瑕的事务上，杨玲对丈夫的猜测，更是违反实际情况的。为了证实自己所作抵赖的真诚可靠，武遥骇人耸听地告诉她，是毛主席，而不是他这位几乎都一度自身难保的蹲点干部，最终保护了她，”不相信吗？你一定看过这篇《人民日报》社论吧——《论职工闹事》，最近我才知道，这是毛主席亲手写的。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省委对我写的报告，也有激烈争论，有人甚至质疑我的政治立场。

是这篇社论救了我，也救了你，”武遥说着，把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旧报纸，递给了杨玲。

杨玲一下记起很耳熟的这个社论题目来，记得那天早晨看到这篇文章时，心情沉重的她，顿时好象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但是她既不知道，最终是这篇文章决定了她的命运，更不知道，这篇文章原来竟出自伟大领袖之手。

毛主席在这篇1957年5月13日发表的社论中说：“在我们国家里，职工是国家的主人翁，企业的领导人员则是代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企业来管理企业的，因而领导者同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接着问：既然如此，在他们中间存在的种种矛盾，本来完全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却为什么会有罢工情愿之类的事情发生呢？他的回答是：“分析这类闹事的起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职工群众不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的。”

毛主席接着说，职工闹事，大都是为了解决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就说清楚，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是，由于有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习气，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合理的、办得到的要求，由于官僚主义，对群众的疾苦没有如同身受的感觉，不去办；不合理的、办不到的要求，也由于官僚主义，不同群众推心置腹地说清楚，甚至对群众打官腔，说假话；在与群众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领导者言行不一，处理不公；所有这类情形，都会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都是直接同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但是群众不满意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闹起来；通常也还是先提意见，出墙报，写信上告，总之还是希望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来解决的。这时候，领导者要是头脑清醒一点，真正把群众的意见听进去了，对自己的工作认真检查一番，错了就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错就对群众恳切地解释，那么问题还是可以烟消云散的。但是遇到了官僚主义者，事情就只好办了，就有‘一种条件反射’，总觉得提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思想落后’，甚至‘存心不良’而从不愿意反躬自省。他们对于提意见的人不但不尊重，不感谢，而且采取种种方式加以打击。这样，就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大门堵死了，群众就只好起来闹事了。”

毛主席又问：群众闹了事，是不是要加以禁止呢？他回答说：“很明显，

禁止的办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禁止闹事并不能解决所以闹事的矛盾，反而会加剧这种矛盾。”他认为：“闹事可以解决矛盾，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可以教育领导者和群众。”但是，他又明确表示应当尽量避免闹事。避免的办法，“首先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扩大企业中的民主管理，加强群众的监督。”对此，他在文章中说打算专门另行专题讨论。同时，毛主席提出以下三点意见：

第一，要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共甘苦。

第二，要把工人群众看作自己人。他说：“明明有困难，偏偏说一切都很好。结果事情反而搞坏了，群众会说你骗了他们。事实上也是你骗了他们。为什么不敢把困难告诉群众呢？……职工群众都是自己人，你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来看待，有什么事都一五一十地端出来，群众是讲理的，是可以想通的。不是有许多职工申请要房子，后来听说国家有困难，就撤消了自己的申请吗？”

第三，要谦虚谨慎，乐于听取反面意见。他说：“旧社会有句话，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现在有些同志在群众面前，似乎是‘天下无不是的领导’。但是事实是相反的：天下无不犯错误的任何领导者。聪明的领导者可以少犯错误或是不犯大错误，这就常常需要听取反面的意见，发现自己做出决定中的错误。……”

这些话语，对当时运输联社工人罢工闹事的情况，颇有一点针对性。闹事的起因，就是涉及了同职工利益切身相关的住房问题。联社动用一部分集体积累资金盖了一些房子，本来说是要解决那些居住条件特别困难的职工住房问题。可是房子造成了，有一部分却被运输联社上级部门的少数干部占用了，于是工人们就闹起来，说是当官的占据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而按照上级领导的理解和解释：联社职工的劳动收入，也是同上级机关领导所付出的脑力劳动分不开的。而且他们恰恰是按毛主席在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刚一听到反对声音的时候，就起了“一种条件反射”，觉得提反对意见的人“存心不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种种方式加以打击。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大门死死地堵住了。谁知那些拉板车、扛包子出身的装卸运输工人性子犟得很，面对压力不仅不买帐，反而越压越闹腾得凶，终于走上了罢工闹事的路！而在象俞迁那样的市级领导眼里，他们对开始时的起因并不很注意和在意；心中更关心的，却是罢工闹事的后果和影响。不管领导部门有什么错，如果下面闹一闹，上面就作检讨退让，那就不是“天下有没有无不是的领导”的问题，而是按锡城市民的“蜡烛不点不亮”的俗话，领导会不会在群众眼里成为“蜡烛”的问题。在没有见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和省委的书面指示之前，他们很担心，如果给老百姓尝到了罢工闹事的甜头，造成“领导是蜡烛”那样一种错觉，今后他们就很可能动辄放火点“蜡烛”，那市委领导成天当消防队员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心思来抓生产建设！这就是他们原想严厉打击、杀一儆百的主要考虑。这场风波，最后终于由同社论精神具有不谋而合想法的武遥出面平息了。

当时，他也许从未想到，十年以后他会重返锡城。这一次，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在等待着他呢？

驱车去火车站接客人或首长，是许洪元在市委车队上班时的例行公务之一。然而，象今天这样，由市委办公室主任恭鹏志亲临押阵，却并不是十分经常的情形。恭鹏志三十多岁，爱修饰，注重仪表，戴一副金丝眼镜。雪

白的夫绸衬衫，两只袖官的纽子扣得严严实正的，与贵宾候客厅里那些把袖管挽在胳膊肘的候客人士，形成鲜明对照。在小车队司机的眼里，恭主任是一位官架子最小、并且愿意和他们闲聊、为他们解难分忧的领导。他在手下人面前，那笑容常开的脸神，给人以一种油然而生的亲近感。在市委大院那些接近权力核心的人士中，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把甚至不属于干部编制的小车司机，放在眼里的。“一介车夫而已，”许洪元常常以这种自嘲的语气，向人作这种自我身分介绍。而那些属于大院之外的闻言者，不管许洪元对自己的职业如何自我作践，仍然会显示和保持肃然起敬的神态。毕竟，这些车夫是属于最有机会接近核心人物的人士之类，首长的威仪，和对这种威仪表示的敬畏之心，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有失分寸地摆渡到他们的身上去。许洪元似乎颇觉得有些当之有愧，在真价实货的当之无愧者面前，就很知趣地夹紧尾巴做人。尤其是在今天，他有一份告状信要请恭主任笑纳，就分外做出一副殷勤巴结的模样。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的恭主任却变得有些难说话。许洪元苦苦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好几天，可是当他把那份上告材料草草扫视一遍后，却冷冷淡淡地塞回许洪元的手里：“我最近太忙，顾不了这类事。还是按正常渠道走，送信访办公室吧。”

“我在信访办已经留了一份，但是他们那里最近积压得很厉害。你对奚大雄也熟悉，他希望我能把它直接交给你。”许洪元看到自己有辜负战友之托的危险，心里不由着急起来。

恭主任眯缝着眼睛想了一想，开口说：“这样吧，我建议你直接交给今天所接的这位首长吧。他是省委派下来的接班人。”

常给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开车的司机，多多少少都知道，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由来以久的矛盾，越闹越厉害，两人都已年过六十岁。接班人？哪一位的接班人？许洪元知道，恭主任刚才向他透露这一点，已经对如果从政治含义上去理解，无论是跟人们经常在电影和照片上看到的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相比，还是与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实的美国国会山或英国海德公园对照，则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但是有一点，是与那些闻名于世的政治中心不能相提并论的：人们聚集在这块地方，并不象中国的人大代表或美国的国会议员，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也不是象海德公园里那些名不见经传却激情洋溢的演说家们，抱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或使命感。运输五场的驾驶员们所以汇集到这里，抽象笼统地讲，用落后一点的说法，是为了吃饭，挣工资；用革命大道理来统率，则是为了全世界四分之三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解放全人类，当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先行官。但是如果具体确切地讲，首先是因为这地方有他们的壁橱，壁橱里放着那些要伴随他们出征四方的各类用品。其次，他们来这里贯彻就近原则，等待着有一门相通的调度室里，能很快传来叶子栋的呼唤，就可闻风而动，随即起身去接运输路单。接到运输路单，就意味着公里费已经朝着自己的口袋，行进了一半路程；或者说已经是煮熟了一半的鸭子，就差没有进入嘴巴；因为有了运输路单，只要不发生三长两短，一笔相应的公里费就可以指日而待地进入自己的口袋。再次，就是人们除了有挣钱吃饭、养家活口方面的物质需求，还有精神交流方面的需求。当时，西方什么“人类需求五层次”的时髦理论还没有传入中国，或者说虽然已经传入，但是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还不能见之于大庭广众。但是这一理论似乎具有普遍的适应性，不信？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如下情形：

隔壁调度室里的电话铃声特别稀疏，好象电话机也要休息打盹儿；叶

调度叶司令呢，当你凑上调度桌的柜台前，自告奋勇地询问今天的革命任务时，他回应你的声调是无精打采的，脸是死样怪气的。这就意味着这一天的革命任务短缺，供不应求；意味着司令手里没有路单可以分发，也就没有公里费绽开笑容向你亲切招手致意。这时候，仍然在休息室里流连忘返的驾驶员们，物质的考虑显然就退居第二线；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其中确实会存有这样的少数派，其嘴巴，在加入有关公司外部世界海阔天空的闲聊，或涉及公司内部机密的信息交流；其耳朵，却仍然在注意倾听隔壁的电话铃声；可谓身处斗室，心系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革命任务。而占据优势的多数派，明了粥少僧多的基本形势，认定在这种革命任务特别缺少的情况下，自己与叶调度的个人交情之深度，也不足以获得关键时刻所需要的革命信任和委托。平时大家各奔东西，难得有此相聚一堂的良机，如果不是为了和开车的弟兄们畅舒胸臆，互通信息，尽可以在公司大墙的范围之内各奔东西，处理形形色色的个人或工作杂务。之所以在这斗室里面留下来，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与同事从事思想沟通和精神交流的需求。开车时虽然路途寂寞，但是行万里路，见许多事，种种触动与感慨，极想与人分享。同时，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公司是自己的老窝；自己在外“树高千尺”的时候，老窝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最新动态，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鼓舞或使人惶然地牵连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他们应该时刻加以关切注意的。这类思想动机和精神状态，一部分显然还达不到人类需要与他人精神交流的层次，因为这似乎仍然停留在对个人利益和安全方面的关注；一部分，也许已经超越了单纯与人交流的欲望，而是要掌握自己受命在外时，企业内部的动向和职工的情绪，明目张胆地或隐晦曲折地，表露自己个人意欲充当企业主人翁的雄心或野心。而按照严格的定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主人翁，是一个集体名字而非个体称谓。这一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如果真想成为一个企业的主人翁，弄不好，会使人联想起过去骑在工人阶级头上作威作福的老板来。于是在这些聚会者中间，就并不家喻户晓地存在着极少数特殊的加入者。这些加入者通常都是“组织同志”，即所谓的“圆圆头”——党员，也有个别正在积极争取成为“圆圆头”的建党对象。他们积极参加聚谈，一是作为公司领导的触角，弥补在这个“议事中心”欠缺窃听器的不足，倾听了解人们有些什么牢骚怪话，在牢骚怪话中是否有值得警惕注意的动向，或者有可以吸取正面的营养。二是侦察是否有自觉以“企业主人翁”思想和姿态自居的对象，如后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清这个对象是真心实意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弘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还是潜藏要想做企业老板的痴心梦想。因此，这些忠实履行党员职责的聚谈者，实质上，既是在发挥企业基层民主运作的功能作用，又在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新形势下，担当站岗放哨的神圣使命。

第四章 告求有门

奚大雄，无容争议，经常是这个“议事中心”的中心人物。这恐怕主

要得归结于他的见多识广，他先后在军队司令部和地方市委开过小车的经历，仿佛是在一块不起眼的铁铤上附上了经久不消的磁性，起到一种吸引听众和追随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许受他重情讲义性格脾气的影响，奚大雄从不按组织的期待要求，忠实履行上述一个党员应该履行的职敬佩之心。心想他之所以能在公司数千人中令行禁止，称霸一方，恐怕就是因为既有霸主之威，又有王者风范的缘故。现在才算真正有所领教。在座各位钧都观他之神色而行事，也许早就都有所领教，收获良多。会后数天，又有新情况前来补充邱铭心中的这一想法。碱水缸上，一向就是单人单班制度，现在却让奚大雄和凌漪一男一女同时值班，工人中对这种窝工浪费现象，颇有微词。这次已有领教的他，不再多言。他明白，这是崔经理有意把一个颇得职工敬重的形象，跟一个已有臭名在外的女人形象，存心捏在一起，天天让他们俩在众人面前丢脸现眼，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去作种种联想猜测，从而使一个桀傲不驯的人声名狼籍，以使广大公司职工受到生动形象的政治思想教育。崔经理虽然不是艺术家或心理学家，却懂得视觉形象的重要和有效。

对奚大雄这件事，市委办公室主任恭鹏志，是把它当作一个机会来看待的。他对奚大雄，是有良好印象记忆的，因此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愿意帮他的忙。捡了鸡毛当令箭，因为某个中央首长带有松紧带性质的指示，加上爱管一点闲事，就把一个具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曾经专给部队首长和市委领导开车的转复军人，给予“劳改”对象的对待，似乎有些太过分。他让许洪元把信交给武遥，纯粹出于一种灵机一动的想法。对那位省委前宣传部长的某些传奇性的处事方式和作为，他早有耳闻；其中包括五七年在锡城市日报报社蹲点时，站在闹事工人一边，跟俞市长和陆书记唱对台戏，曾经在本市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一时传为美谈。陆书记同俞市长一段时间来闹矛盾，然后有撂担子甩手不管的表现，省委因此派来了替补队员武遥。作为市委办公室一名年轻有为的办公室主任，如何跟新来的市委书记接班人搞好关系，建立感情，就成了他心中的一大研究课题。亲自去火车站迎接，不过是雕虫小技，人学人会。恰好许洪元手中有封“人民来信”，被反应特别灵敏的他所抓住，作为跟将要“以副顶正”的武副书记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此乃“天助我也”的良机。因为以他的揣测，以武遥那样的领导风格，见到群众的告状申诉书时，绝对不会推诿拒收，官说官话。

但是也不可能亲自查访，或者揣在怀里，等对手下人熟悉了一段时间后，再物色对象委托办理。十有八九，会顺手交给他办理。这样一来，新领导刚一下车，他就与之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工作关系。然后从中表现出一点自己的积极干练，和明断秋毫的识见水平，树立起一个良好的起始印象，以后就可能被倚为左右臂膀，为锡城市人民多作贡献。恭鹏志不敢自夸料事如神，但七九不离十是做得到的，武遥果然把信交给他去处理。于是，他就百忙中抽出一空，兴冲冲地下基层作亲自调查。

接待他的是运输公司党委书记邱铭。在奚大雄的告状书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他出的是非责任事故，按常规处理，根本就不应该吊销驾驶执照，更不应该罚他去做监督劳动对象做的工作；这是因为公司领导层中，有人对他挟嫌报复。但是在信中，又没有提出为何要对他挟嫌报复的充分根据来。二是他让同公司职工凌漪搭车并不违法，写那份落到组织手里的见证材料，也不认为是在政治立场上犯了错误。因为那见证材料本身，就说明以前对凌漪所作的处理是不公正的，违背了事实真相，因此他在那份见证材料上签名，

是无可指责的；按照党“有错必纠”的一贯原则，是对党负责和党性强的表现。他强烈要求归还那材料，因为他还要征集更多当事人的签名，使沉冤昭雪，党的威信被维护；他自己所谓“阶级立场不稳”之类的罪名，也能得到洗刷。恭鹏志在来公司的车子里重新读过那封信，因此就把问题焦点集中在有关见证材料和“挟嫌报复”两大要点上。几句话一接触，善于察颜观色、辨声听音的恭鹏志就发觉：面前这位邱书记也没有把奚大雄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对目前的处置方式，也并不觉得尽善尽美。深入一交谈，了解到奚大雄以前对公司经理，确实有不够恭敬尊重的表现，但那也是跟其他职工的态度相比较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构成领导对群众打击报复的动因。于是，嗅觉敏感的恭鹏志就截住话头问：“这个崔经理是否一向就报复性特别重？在目前对奚大雄所作处置决定中，崔经理起了什么作用？”邱铭对第一个问题，很机巧地不作正面回答，那当然就容易被理解作为一种事实上的肯定之意，同时又不承担背后非议同级领导的坏名声。对第二个问题，他就实话实说，尊重事实，以作为对第一个问题不置可否的一种绝妙补充。从这一番对答中，恭鹏志意识到，在奚大雄这件事上，公司领导层中有分歧。同时，他对那位素昧平生的崔经理，心中已经生出了一点不良的看法。过去只听说农村中，有些领导就象称霸一方的土皇帝。想不到，在城市的企业中，也有类似不可冒犯的太上皇，只是手腕更巧妙，运用时机更恰当。而名义上应该是第一把手的公司党委书记，竟然也对之无可奈何！即使是在市委大院内，陆书记也不能象这位崔经理那样独断专行，把党委一班人操纵在股掌之中呀！因为陆书记与俞市长之间闹矛盾，他过去常为自己搞得无所适从而苦恼；此刻却觉得，比起运输公司崔经理的一统天下来，领导层中，还是象市委大院里那样，存在一种势均力敌的权力平衡和对抗比较好。后一种“一声令下”的局面，手下人的日子，可能更不好过。

正作这些触类旁通联想的时候，党委机要秘书按邱书记吩咐，把那份见证材料送到了恭鹏志的面前。恭鹏志眼睛看材料，耳朵听邱铭复述从奚大雄那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不仅觉得那凌漪的名字好耳熟，心里竟对那位女人的遭遇，暗暗生出了几分同情心；而对那位部队首长最终的下场，觉得还真有一点苍天有眼的味道。可是，光凭这份有三个旁观者签名的见证材料，能否改变那位可怜女人及其丈夫的处境？特别是考虑到，后来她又跟那位夏思云发生了两性关系，恭鹏志就觉得有些吃不准。对前市交通局局长夏思云，恭鹏志其实还是挺熟悉的。对他的工作能力、领导水平和为人，也一向有好感。听说他出了事，心中为他还挺惋惜。后来知道主要是女方的责任，他只是职位稍会降了一点，去也有数千名职工的建新机械厂当了党委书记，倒也觉得松了一口气。

读完见证书，听完邱铭的情况介绍，恭鹏志两片眼镜玻璃后的双眼直视着邱铭，单刀直入地问：“邱书记，你觉得，这件事情如何处理更为妥当？”

邱书记说，他跟奚大雄私下交过心，要他主动从凌漪的历史纠葛中跳出来，写个简单的认识书，表示以前没有认识到生活问题后面，还包含着政治问题，退出见证不见证的行列。

事情的性质就变得单纯了，是交通事故嘛，就还是按交通事故的规矩办。不要把别人身上的屎，硬涂到自己身上。可是他搞不明白，奚大雄却不领份，说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话还要当话，更不要说是白纸黑字，落下名字的事。见证的事是他起得头，现在不明不白地带头退出，他

奚大雄今后就会被人笑话。再说要写什么认识书，还不是变着法子要他认错吗？他自认为就是没有错，怎么好随随便便写个东西让人塞到他的档案袋里去呢？邱铭告诉恭鹏志，他不明白：好端端的一个党员骨干，先进生产者，在职工群众中又有那么高的威望，为何硬要把自己跟一个右派分子的老婆搅在一起，落一个为右派分子翻案的恶名，跳进黄河都洗不净？

恭鹏志听了邱铭这席话，沉思着，首先权把隔桌相坐的邱书记当作武遥，估摸他如果听到这番情况汇报，会作什么反应。这样一作模拟实验，心中就有了准星，稳稳地开口说：“咱们不忙作结论，还是先直接找奚大雄谈一谈再说”。邱铭书记觉得有些莫测高深，就起身说：“那好，我马上就派人去找他来这里？”

“不要了，”恭主任的回答使他很惊讶：“我们下去直接找他去。难得来你们公司，交通先行官，地位重要。一路上走马看花，也可增加一点感性知识。”说完，不管对方如何反应，已经站起了身；这就是市级机关领导的作派，以行动代替命令，无声而又无容挑战。

“呵，欢迎，欢迎市领导下去参观指导。”邱铭对这位外表斯文、却有奇特办事方式和深入基层热心的市领导，不仅有些肃然起敬。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位市领导，其实是凭想像在着意模仿一位更高一级市领导的办事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他俩此刻是共通的：恭鹏志在模仿过程中，也觉得自己仿照的模式，是有悖常规的，属于极少数高明棋手才偶尔运用的奇兵异术。适应领导的风格，善于向先进看齐和学习，这是恭鹏志成功的要诀。短短几年中，从一个小小机要秘书，迅速进步成长为十名市委常委之下，谁都不敢小觑的市委办公室第一把手，全仗具备这样的素质。他戴着黑色玛瑙框架的眼镜，梳着黑亮的流线型的分头，脚穿黑亮的小方头皮鞋，黑色的府绸衬衫短袖管下，挟着一个黑色的公文皮包。当他与邱铭一起并肩走下楼梯的时候，那种气宇轩昂的风度，引起了办公大楼里所有目光所及者的注意和猜度。其实，早在他走出那辆在公司办公楼前停下的黑亮伏尔加轿车，与急着要去火车站接人的许洪元挥手告别的时候，他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许洪元告别时的脸神欢欣而又感激。这正是恭鹏志希望看到的效果，也是他和其他几位市委中层要员的不同之处，他注重群众关系。象今天这趟公差，因为骑自行车上下班时都要经过运输公司的门口，他尽可不必让许洪元用小车顺路送他来此，而可以用上班晚一点去办公室或下班早一点离开办公室的办法解决。但是不，恭鹏志并不是贪图乘小车的享受。说实在话，他乘小车都乘得腻了。他特地安排这次顺路搭乘许洪元小车的机会，是要让许洪元觉得恭主任对他所呈信件的重视、抓紧，雷厉风行。许洪元知道他是大忙人，他知道许洪元会被感动。这就是感情投资，不仅对上，而且对下，四面八方，左右开弓。许洪元是明白人，市委大院内所有的小车司机，几乎都是明白人。只要他们平时为首长开车时听到一点什么，只要他们觉得对恭主任有用，不属于泄露国家机密，都会向他及时提供。这也是他比其他秘书同伴升迁得快的一些诀窍，对此，他从不向人作心得讲用；连妻子面前都不留口风，已免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此而把他其它方面的积极努力看得无关紧要。

恭鹏志和邱铭款款而行。体胖腹隆的党委书记一边引路开道，一边指手划脚，作着各类说明介绍。在经过人多严密监视，加上自身本有较好的纪律观念，并没有养成好多驾驶员都具有的自由散漫的坏习惯，上班时间脚是从不踏上宿舍楼梯的。冯有强上班时不得不套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不到

下班时间在更衣室里改变行装后，一般是不回宿舍的。于是，这个集体场所，此刻就变成了一个私下交谈的好地方。三人因陋就简地在床铺上或椅子上坐定，恭主任开门见山地说：“受到你让许洪元转的信，市里领导很重视，特地让我来了解情况。”

刚才已经跟你们邱书记深入地交换过意见，对情况也大致清楚了。说一说吧，如果你一定要把那份见证书要回去，下一步打算再找谁签名？”

无论是奚大雄，还是邱铭，对恭鹏志这样一段开场白，都没有预料到。奚大雄想了想，就搬出了那位前市交通局夏局长的太太，作为第四个候选签字者。觉察到两位领导脸上露出明显的怀疑神色，余大雄就摆出凌漪以前解释过的理由，说明当初这位市歌舞团前副团长了解内情，曾经抵制过把凌漪开除出团的上级指令。后来，还是靠她了的帮忙才进了市交通局。恭主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既然凌漪后来跟夏思云发生了关系，那位爱才的局长夫人，不管怎么富有同情心，怎么会帮了一次结局令人失望的忙，再愿意为这个背信负义的老部下帮第二次忙呢？但是话得说回来，如果那位前歌舞团领导真愿意为凌漪作证，要对他们夫妻俩的情况重新审理和定性，就不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就决定，让奚大雄下去，把凌漪马上换上来，亲自了解一下情况。

此刻的碱水缸清洗间，当那些抱着刺探军情目的的大班人马开到时，他们已经看不到那位气势不凡来历不明的拜访者和奚大雄，只看到凌漪还留守在岗位上。他们对于形踪飘忽的原追踪对象，显然找不到任何借口向宿舍楼上作继续跟踪追击，更不能破门而入进行现场实况采访。于是就围住那个女人，百般盘问打听，当然都是很友好的口气，绝没有逼、供、信的气势汹汹。他们跟这个女人已经熟了，不仅发觉这只“破鞋”并不如他们所想像中的那样破，沉默平和之中，反倒透出一种使人不敢在其面前放肆戏言狎笑的威慑力量。而且也发现连奚大雄，对她都似乎抱有一种尊重友好之心，这是他们从事变以来所得到的总印象。而对奚大雄，虽然以前所抱的敬重之心，已经笼罩上了一阵烟雾灰尘，但是事情尚未定论，他们对崔经理的治政方略，又一向抱着畏惧而并不心悦诚服的态度；所以每上碱水缸的时候，似乎就老忘了那里是一块惩处坏人的地方，不接受奚大雄是一个坏人的新概念，而宁可抱着拭目以待的想法。奚大雄既然暂时还没有在他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坏男人，原先那个坏女人的概念，也相应地被冲淡。这类态度在修理场，至少占了百分之五十。如果做个民意测验，也许在全公司都是如此。因此至少对这部分人来说，崔经理的战略方针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急急赶到碱水缸前的人，大都抱有这类态度。

凌漪今天显得和颜悦色，态度特别良好，特别愿意以合作的态度提供信息。她突然觉得：奚大雄当初所以有那份仗义执言的气概要为自己昭雪沉冤，不仅凭一颗侠义心肠，而且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背后确有相当的实力靠山。难怪这一段日子里，看着她愁眉苦脸，悲观沮丧，老对她极力宽慰开导，鼓励她要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前途，看到光明。他一个劲儿地动员她再次写信给苏州的那位老同事，把最新事情发展真相告诉对方，请求对方再签一次名。可是，奚大雄托诸申重写的见证书虽然已经备妥，凌漪却迟迟不发信。她吃不准，要是老同事知道了新的实际情况，是否会在这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再次愿意落笔签名。说不定，公司保卫科派人去对方单位外调过了，已经把人家吓坏了，她怎么还好意思写信去再开这个口。奚大雄见她老是犹豫不决，心中焦急地对她说：“现在我们已经骑虎难下，连我自己能不能翻

身，都取决于你们俩口子能不能翻身了。”这个道理是明显的。如果最终证明组织上对她夫妇俩处理错了，那么奚大雄就不再会有政治上的小辫子可以被别人抓。他就可以重拿方向盘，每月重新多拿几十元钱的公里费；他乡下的妻子就要临产，手边需要钱。而更重要的，他可以完全恢复他在公司职工中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名誉；虽然现在有好多同事仍然对他不见外，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的眼色脸神使人觉得不好受。但是一想到：就是因为这见证的事情才牵累了他，而且邱书记有一次单独找她谈话时，明确向她奉劝过，只要说服奚大雄不要再管她的历史旧帐，他的问题很容易解决。这就使她心里更内疚，更不愿意按奚大雄的意思去办理；而是按着邱书记的吩咐，反过来天天做奚大雄的思想工作。有时做得奚大雄不耐烦起来，就铁青着脸，几天之内就好象把她当作仇敌似的，整天一声不吭地，不跟她搭理一句话。

凌漪那颗软弱的女人之心，觉得好痛苦，好难受。夜里躺在床上时，脑子里极少想到那位远在边陲的丈夫，那张曾经是那么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小白脸，而老是晃动着一张方方宽宽的黑脸膛；那脸膛上的双眼虽然不很大，却常常闪现着那么刺亮的光，那样气虎虎地瞪视着她，好象对她抱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似的。还有那脸膛的底下，那显得特别坚挺突出的喉结，以及喉结下，老是敞开的阔阔胸脯，也会莫名其妙地加入到她的脑海中来。而且那胸脯，在初夏炎热和碱水缸炉火的炙烘下，总是汗涔涔的，亮晶晶地滋润着一些黑黑的、卷曲的毛。那胸毛虽然并不浓密，在汗水的浸润下，却黑亮亮的，显示出自己丈夫所缺乏的一种阳刚之气。这胸膛，有时会比他的眼睛和脸膛，在她难以闭盍的眼睛前，时间停留的更长久，不仅显得更清晰，而且仿佛竟可以感受到它滚烫的热量，嗅到那股微带酸味的、使她身子骨发软的气息。她听着楼下汽车停车场上，晚归的司机“嘀嘀”地鸣着汽车喇叭在泊车，同时听到他们的说笑声。那些说笑声的内容，是听不真切的；但是，凭她对那些外出开车人的了解，知道他们并不能与老婆天天同寝共卧的苦衷，再凭着那说笑的声调，她就能猜想到那种说笑的成分。在这时候，那个粗壮坚挺的喉结，和那长有黑毛的宽厚胸膛，就会越加真切地逼现在她的眼前。于是她就会记起：在白天，由于地方的偏狭而又缺少默契与提防，在工作高峰期两人忙作一团的时候，移动身子或转变动作方向之际，有时两人会不期然地碰撞到一起。那一刻的光景，自己的脸部与这喉结与胸膛，一刹那会靠得那么相近，几乎就紧贴着地挨上了，那些专门散发那种使她眩晕气息的粗黑汗毛孔，似乎可以粒粒可辨；但是，双方马上就会起条件反射，闪电般地立即分开来，速度比不期然地碰在一起都要神速，都使人猝不及防。这时，奚大雄会给她一个憨厚而谦意的笑，似乎要请她原谅，他那尺寸过大的身肢在运动时的鲁莽和笨拙。凌漪内心，其实非常喜欢这种鲁莽和笨拙，它们所带给她内心的感觉和骚动，竟是那样地持久，那样地难以平息，使她自己都惊异。晚上躺在床上时，那感觉，那骚动，就会象在那寂寞空旷的海滩边上，那潮起潮落的海浪，“哗啦啦”地涌上那裸露的黄褐色礁石，那一波又一波翻卷的浪花，欢快地奔腾着，跳动着，奋然跃上雄浑的礁石顶端，然而恋恋不舍地退下来；一边退，一边用那雪白色的舌尖，柔情万般地舔尝着那坚硬的、带着腥咸气味的石壁；那神态，那情景，似乎恨不得搂抱着那巍然的巨石，一起滚回到深深的海里去，然后可以在泡沫翻腾的浪花里，尽情地缠绕扭打，嬉戏折腾，直到筋疲力尽，终于融化在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于是就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生世世，永不分离……这种的内心骚动，

狂潮般席卷而来，又狂潮般席卷而去，而最终留下的，在这段她对奚大雄苦苦相劝的日子里，往往会是那一声不吭的铁青的脸，那气虎虎地瞪视着她的刺亮双眼。于是，她就会觉得蓦然刺醒，竟好象一下跌落了万丈深崖，跌进深谷。那幽幽深谷，比海滩还要空旷，还要荒凉，还要孤寂，把她铺天盖地地罩在一片幽暗阴寒的绝望中。这绝望，就是那孑然一身的孤单，形影相吊的空寂，无边无际，无休无止。她在这幽暗阴寒、几乎要使人窒息的孤独中，已整整生存了八九个年头。仍然充满青春活力和气息的躯体，常常只能和乱成一团的棉被，发狂地紧紧裹卷在一起。她不敢想像，这些年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漫漫长夜，听着出早车的驾驶员在楼下隆隆地发动汽车引擎，她发觉脸腮冰凉，就因为她把脸腮贴着被梦中泪水打湿了的枕巾。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日何时方能休。她也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过离婚，再嫁，她那在法院当官的表姐，也一再劝她这样做。但是她那天仙般美丽的外表，并不能代表她必然有一颗天使般的心灵。她不是共产党员，连共青团也未曾加入过。她丈夫父母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方代表，拿定息，在靠近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地方，有一幢小洋房。她丈夫这种家庭出身，对她夫妻俩的厄运，也许亦是一份因素。每次去探望那个心地善良、靠克勤克俭发家的公公，以及那位世俗气很浓的公婆，公婆就会或明或暗地向她炫耀今后可能继承到的财产。可怜的老人，把重见自己独生儿子的一丝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位保有家乡城市户口的媳妇身上。如果她离自己儿子而去，儿子今生今世，就几乎不可能再重返这座美丽的江南水城。而他们也也许认为，他们所据有的殷实家产，乃是留住媳妇的有效法宝。凌漪懊悔自己没有在一开始就作出决断。如果她不顾良心的谴责，在离开歌舞团之前就提出离婚的话，她甚至还可能被留在团里。如今，她已经作出了那么多年的牺牲，她觉得那份家产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份子。因此一切已为时太晚，她不愿失去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奚大雄的出现，他决计仗义执言的豪侠和勇气，使她心头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如果丈夫的沉冤昭雪，她就可以重新躺在丈夫温暖的怀抱里，一边享受他纤细手指的温存抚摸，一边听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甜言蜜语，而且还有大笔的遗产可以指望。她甚至开始回想以前俩人在一起的情景，但是常常惊异：那些曾经使她陶醉的情节，如今却变得那么模糊，如隔重重云雾，无法触摸，无法辨认。而奚大雄的形象，却会生动活泼地闯入记忆回想，顽固不化地占据自己的脑海。她好象已经变得不怎么特别关心翻案的结果，而更沉溺于翻案的过程。因为正是这一过程本身，才把她和奚大雄，息息相通地联在了一起。她告诫自己，奚大雄所以她在她思绪中鹊巢鸠占，并非是自己对他已经具有比对丈夫更深的感情，而不过一是因为抱有感激之心，二是因为天天相见，大脑半球皮质上的记忆沟痕，日日得到更新和深化，如此而已。不要自作多情，对有妇之夫心存妄念，想入非非。

在出了那次交通事故之后，她见奚大雄久久不愿回家，原因是公司有个同事的家就在邻村，偏巧这位同事素有“长舌妇”之雅号。他就担心村里已经沸沸扬扬，希望拖上一段时间再回家，等明朗化的事实，来代替向妻子作解释。凌漪不以为然，觉得这种拖延态度，只会在玉芬心目中，加强自己丈夫作贼心虚的念头。并且一再提醒他那个正当待机而发的小生命，以及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在六月份领工钱的那天，凌漪几乎把拿到的工资，全部用来购买了产妇和婴儿需要的物品和食品，乘奚大雄一个人在宿舍时，大包小包地搬到他的房间里，几乎是用发布命令的口气对他说：“你必须回去

一趟！”奚大雄不作声，只是猛抽烟。他在苦恼中，为自己抽烟开了禁。“你倒是回去不回去？你们做男人的，就都是这样没有心肝的吗？”凌漪恨不得一步冲上前，拔掉他叼在嘴唇上的香烟。但是她忍住了，认识到自己没有这个资格。奚大雄长长地吐了一口烟，反问道：“你那封信写了没有？”凌漪无话可说，一转身奔回了楼上自己的房间。虽然，奚大雄并没有接受她的劝告催逼，但是那几天夜里，她却觉得自己的心情比平时宽慰不少。他没有拒绝自己的关心，自己的心意。第二天早晨在碱水缸前碰头时，他仍然一声不吭，也没有对她昨天送去的东西称恩道谢。但是凌漪可以感觉得到：他这天的目光，分外柔和。而且在以为她没有注意他的时候，老是射向她。

这种情况是过去所没有的。每当她意识那两道柔和的、好象要把她看穿的目光时，她就觉得自己的心口“咚咚咚”地跳得厉害。到晚上下班前，他在没有旁人时对她说道：“你早一天写信，我们早一天把案子翻过来，我可以早一天回家去看玉芬。”又过了三四天，他主动告诉她，有位老乡进城来看他，已经把东西都带回家去了。“真谢谢你。”他终于道了谢。凌漪并不期待他的道谢话，因为觉得自己所欠他的，不知要比自己所给予的要高出几百倍！但是那天夜里，只要一闭上眼，耳边就会响起那句话：“真谢谢你。”连同他说话时的眼色，神情，都跑出来，痒痒地撩拨着她的心。她终于发现，她对自己以前所作的解释不合理。

想当初她跟夏局长在交通局大楼里天天相见的那段时间，尽管因为老夏对自己遭遇深表同情，并且也表示会帮她寻找复查的机会，使她对他抱有感激之心，晚上回到机关宿舍后，她却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现在这种心情。即使两人那天晚上在值班室终于发生关系后，夏局长那满头银丝、庄重而又儒雅的形象，也不曾老是占据她的脑海。现在回想起来，她之所以接受了他，不仅是他因为那十个手指的动作，能使她回忆起自己丈夫那双温存的手；也不仅是因为老夏不仅对自己关怀备至，而且在整个局机关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更不是因为出于感恩之心。全都不是的。这恐怕一小半是出于使自己发狂般的孤独，出于已有过两性经验的少妇对爱抚的一颗渴望之心，出于一种许多人羞于说明却是每个正常人不可或缺的情欲；而另一大半，是出于对他的同情、敬佩和怜悯。而这种同情和怜悯，是由那位极其贤惠的局长夫人所作的多次暗示和明示所播下的种子。“唉，我家老夏，什么都好。就是被我害苦了！”这位前歌舞团领导每次请凌漪作客时，总要这样深长地叹息。凌漪对这位帮助她转到市交通局工作的老领导，心中一向是很尊敬的。因为她在团里待人好，遇事关心体贴起别人来，就象个老大姐，大家都很尊重她的话。后来凌漪才明白，白副团长患得慢性肾炎病，竟使她早在十多年前就失去了性机能。“你看我家老夏身体这么壮，头发却白得这么早，我一想到自己的无能，心里就难过。我早就劝他另外找人，可是他硬不肯。我总觉得……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他……”那天在她家吃过晚饭后，俩人单独在一起聊天时，近五十岁的老大姐，说着，说着，竟然泣不成声了。凌漪凭直觉，知道她的感情流露是真诚的。而且在交通局机关里，夏局长的作风严谨，也是有口皆碑的，从来就没有拈花惹草的丑名声。也许这一点是更为关键的。因为这使凌漪在对他产生同病相怜心情的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钦佩心；因为她自己，就是因为遭受到那类不讲道德操守的领导干部的污辱，才有倒楣的今天。她就在局长室隔壁的秘书科上班，几乎天天都和夏局长碰面。因此除了上他家跟他夫人聊天，在局里时，他俩也经常有接触的机会。这就使她对这位局领

导的知识渊博和一丝不苟的工作要求，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交谈中，夏局长也时常流露出对一个青年妇女孤单生活的理解和同情。这种猩猩惜猩猩的情绪持续发展了六、七年，终于在那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夜晚，进入了正人君子们极容易失去自控能力的特殊环境。那一个晚上，与凌漪一起值班的女同事因气候恶劣之故没有到班，而常有挑灯夜战工作习惯的夏局长，受风雨之阻不能回家。除非他让值班干部出面，跟局里的小车驾驶员取得联系，他就必须等雨停，或者在值班室过夜。但是这晚值班的是女同志，这后一种选择也就不存在。但是在近十二点钟的时候，他还是朝值班室走去了。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晚是凌漪一个人单独在值班。他也不会在这种时刻，找值班干部叫小车司机顶风冒雨骑自行车到局里来，开车把他送回家，再顶风冒雨骑回家去。他只是顺便转一转，觉得既然人在局里，夜间巡视一下也是他的份内事。然后，他看到了凌漪。他打量着她，头发是湿的，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显得分外乌光油亮。那薄薄的白色短袖元领衫也湿了一片，一部分是雨淋的，一部分是被那披散在肩头上的湿发沾湿的，结果就使她上身优美的轮廓线条清晰地凸现了起来。

“怎么会把身上淋得这么湿？”夏局长开口问，双眼想避开那紧贴在湿白衣衫上肤色微显的两个突出乳峰，可是他做不到。

“哦，我刚才跑去宿舍拿了本书，值班解闷。”凌漪见突然来了人，而且是局长，马上意思到自己上身的透明度，就急促地把手中的书掩到胸口。

“什么书？我翻一翻好吗？”夏局长问。

“是《简爱》。”凌漪有些局促不安地把书递过去，知道这样一来，自己的上身就重新暴露了，但是她对上级领导没有抗拒的习惯。幸好夏局长此刻的眼光，已经转到了书本上。

然后，他俩就开始讨论起《简爱》来。在彼时彼刻讨论那本书，也许对谈话者，无意中起了某种危险的提示作用。而衣衫上的水分，也散发得太缓慢。夏局长虽然是一位意志坚强的老同志，但是忍耐了近十年半寡生活的血肉之躯，在一位那么美艳绝伦的少妇面前，又是一向熟悉亲近的，又有雨湿使那充满奇妙曲线的胴体，增加了令人心情纷乱的诱惑力，又是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时刻，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即使有最强的自制能力和革命坚定性，也无济于事。他已经自我压抑得太辛苦，也太长久，一旦进入危险的临界线，就再也刹不住车。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与什么情况下，终于十分冲动地伸出火热的双臂，紧紧地箍住了凌漪柳枝一样富有弹性的腰。她开始感到，他的双手也终于伸向她的下身，就象当年那位师长一样，揉搓着她丰软的臀部，可是她并没有抗拒；是因为那温柔搓揉着的十个手指，与那位高级军官粗野的抓摸完全不同的缘故吗？她不清楚。然后她又感觉到，那温文尔雅的手指重新返回到了她的腰部间，并且小心翼翼地、仿佛担忧一不小心会触碰碎一对极其脆薄滑润的精美陶瓷圆球似的，慢慢爬动到她的乳房上。这时候，那乳峰上已经好多年没有与男性接触过的微细神经，闪电似地向她的全身，发射出一种兴奋的痉挛和快感。她意识到那双手，又滑落到她的腰际下，她终于惊醒了，开始用力去瓣动在裙子内已经抓住她三角内裤的手指，然而在那坚如钢爪的手指前，她觉得自己的手指是那样地绵软无力；自己的整个身子都是绵软无力的。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在挣扎，在搏斗，但是弱者没有发出叫喊声；因此就不可能出现闻讯而动的援救者，僵持也就不能持久。这，也许是凌漪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最终就发展成了一条腐蚀

革命老干部的罪状。然而，这条罪状也并不是完全由组织上强加于人的。当两段曾经自我闭锁的血肉躯体一经交流，就不可能不产生惯性，直到有一天终于被人双双堵住在被窝里。

事发后，老是觉得负罪深重的局长夫人，眼泪流得更欢畅了。她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她害了老夏。她不仅找组织谈，说明原委根源，恳求从轻发落，而且在凌漪面前苦苦地求，要她看在老大姐的份上，多为老夏挑担子。凌漪见白副团长眼泪流不停，自己也就跟着掉眼泪。两个人的眼泪流到了一起去，两个人的想法，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去。这就是凌漪为何坚信，老大姐一定会肯再帮她一次忙。但是，这一切，叫她怎么开口向奚大雄解释清呢？她并不纯净，但是她心地善良；就象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一样，无论是受过正规教育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无论是长得美丽出众还是丑陋不堪的，只要她们以为应该，值得，她们就会勇敢无私地挑起甘愿牺牲的重担，默默无闻地，长期忍受着其实完全不应由她们忍受的委屈、难堪、歧视和痛苦。

那些一窝蜂似地赶到碱水缸清洗间的人，大都是对奚大雄抱有同情之心的青年人。听凌漪说，来者出自市委，是专门来搞走访调查的，个个觉得自己拭目以待的立场是正确的，富有远见，可以引以为自豪。同时，他们更相信，宋代的“包青天”确有其人，其子孙后代虽然姓氏可能不同，却落绎不绝，使人欣慰不已。但是对崔经理是否属于“包青天”查办的贪官污吏，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就是觉得他独裁专制，而且往往是笑里藏刀。使人经常感到一种压抑感，使他们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在企业当家作主的民主地位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兑现。而另外一部分不赶到碱水缸清洗间凑热闹的人，以老工人童年财为代表人物，对此可能诚接受。一个船上只能有一个老大，老大多了就要翻船。

世界上哪里来真正的民主？民国初年中国不是没有试过搞民主，结果一塌糊涂，暗无天日。

这部分人，大都属于年长之辈，历史经验丰富，对生活的独到看法和见解，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基本固定。他们对奚大雄没有特别的恶感，对崔经理却有相当的好感。但是觉得前一种人多了多麻烦，后一种人却须臾不能缺少。否则，国将不国，公司将不公司。他们回到家里面对老婆孩子，恐怕也会套用崔经理的管理模式，否则家也将不家。他们对刚才走过一名有邱书记陪同的客人，冷漠置之；对于数十分钟以后到处通风报讯的义务通讯员们，嗤之以鼻。

恭鹏志跟凌漪的谈话没有超过五分钟。显然，要使始终持躲闪回避态度的凌漪，说出她能使夏思云老伴不念旧恶为她作证的理由，不仅不可能，也并不具有必要性。他已经感觉到里面必有缘故，然而弄清这种缘故，并不是他不可逃避的职责和任务。既然她那么斩钉截铁，断然声称只要组织上把把作证书还给她，她一两天之内，就一定能把签名拿到手，就没有理由不按这条路子去走一下。就因为跟这个关键性的女人在半个多小时内接触了这两次，恭鹏志的心思好象起了大变化。此时武副书记会怎么想，似乎已不再成为他的考虑重点，希望能把凌漪从不公正的对待中解脱出来，却成了他的着眼点。但是，他仍然谨慎从事，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百分之百的胜利上。万一历史上的老帐翻不转，按邱书记的主张，把两件事分隔开来处理，也不失为第二套预备方案。可见他对奚大雄，是尽心尽力的。即使对凌漪的帮忙受

挫折，也要把当年的老部下救出来，在讲究原则提倡大义灭亲的共产党干部中，对手下人如此重情讲义者，打着灯笼也不见得就容易找。当然，持这种看法是旁观者迷。恭鹏志作为一个当局者，并不觉得这跟共产党的大义灭亲原则有冲突，因为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奚大雄都不属于他大义灭亲的对象。于是在跟凌漪谈完话之后，在党委书记办公室里，凭邱铭的推荐，恭鹏志又找几位职工了解核实了奚大雄在公司里的一贯表现。因为邱铭本身心里就带有倾向性，找来谈话的对象，自然也带有倾向性，众口一词地为奚大雄评功摆好。问到崔经理是否有挟嫌报复的可能和习惯时，多数谈话者的回应，似乎是与邱书记的回应不约而同，都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让市领导从这种回应方式本身去揣度。只有那位跟奚大雄同住一个宿舍的冯有强，也许是受奚大雄的影响太严重，不计算后果地一口断言：报复是崔经理最大的缺点！而且以个人切身经历作例证：60年困难时期，崔经理要调度安排他去上海运货时，拐到他乡下表弟家去把那里农民自留田里的蔬菜贩运到上海卖高价。有一次因为路上有耽搁，冯有强怕误了运货正事，没有如约去装菜。结果回来时被调度大大抱怨了一通，说是人家农民把菜都起好了，眼巴巴地一直等到他天黑，结果把几十担青菜都黄掉了。冯有强就跟调度摆理由，调度对他一口撞道：你跟崔经理摆理由去！冯有强当然没有这个胆找经理去作自我辩解。可是有一次在公司食堂餐厅里当面撞上了，冯有强呐呐的，还不待找出解释的词儿来，崔经理就表示出充分的理解和谅解。可是两年后，冯有强几乎已经把这件事情忘了，崔经理却用类似对待奚大雄的方法，使他的记忆得到更新和加强：他也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最多停掉几个星期的开车资格，可是他却被终生吊销了汽车驾驶执照，转到了修理场当机修工，从此再也不允许握方向盘。

对这些谈话对象所作的是反映，恭鹏志都一一作了笔录，最后还说服邱铭在笔录上签了一个简短的意见。大意是说，除了跟本公司职工凌漪之间有关情况（详情参见奚大雄的陈述笔录）尚待澄清外，奚大雄的政治和生产表现一贯得到公司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并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希望上级领导机构抓紧查实有关凌漪及其丈夫的实际情况，以便基层对奚大雄正确评定，实事求是地做好相关交通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邱铭不仅签了名，还叫党委文档秘书拿出党委图章来，盖了一个鲜红的印。他这么做，回想起崔志中在这件事所作的种种干涉阻难，独断专行地把自己当作傀儡玩耍，心中觉得有些扬眉吐气，巴不得市里直接来个指令，明确以前对奚大雄的对待处理有违党的政策，从而使不可一世的崔某人颜面扫地。

然后自己也可以借这股东风，确立党委对公司行政工作的领导地位，名副其实地发挥自己在党委“一班人”中间的“班长”作用。

恭主任深入运输公司了解实际情况的直接后果，一是改变了奚大雄的一半处境；说是一半，是因为奚大雄重握方向盘的目标，一时之间还达不到，在碱水缸的“劳改”生涯却总算结束了。邱书记拉大旗，作虎皮，以市领导恭主任的建议为依据，指示傅科长把他调入了机修车间发挥技术专长。二是把那份留有奚大雄不可抵赖痕迹的见证书，放虎归山地发还给了凌漪。在傅科长的眼里，这见证书具有向党反攻倒算罪证材料的性质，因为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对失落这样的真凭实据很痛惜。凌漪则是欢天喜地，对恭主任感恩戴德，认为这见证书的失而复得，全靠这位市领导的恩赐。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份材料属于她的私人财产，别人是无权随意把持占

有的。她把这几张具有救命稻草功用的纸揣在怀里，下班用过餐，就去拜访她的老领导。

如今是建新机械厂党委书记夫人的白慧芬，虽然丈夫正好不在家，对丈夫昔日情人突如其来的造访，显得很意外。夏天季节，公房大楼里的房门大都是打开的。条件好的，只留对付蚊子的绿纱窗门还关着，这绿纱窗门当然是只挡蚊子不挡眼睛的。所有具有这一装置和没有这一装置的人家，可以凭着走廊里响起的脚步声，使好奇的眼光，一览无遗地观察端详到在家门口晃过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访问者。其实，老大姐有点杞人忧天。大楼里多数人，对她老伴以前的风流韵事并不知情，即使略有所闻者，也并不见得认识凌漪其人。而她表现出来的脸神是惊喜的，高兴的。但是看着凌漪额头汗涔涔，却忙不迭手地把在夏天有助于通风透气的房门，令人难以理解地死死关上，然后又是递热水毛巾，又是送凉茶，以弥补关上房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温室效应。接着就是一迭声地询问凌漪的工作处境，声音急切而又关心。听说凌漪眼下是跟充满油污毒气的碱水缸打交道，脸色恹恹的，长叹一声，说道：“老夏把你害苦了。”然而沉思着，仿佛在考虑，是否应该接着重复是自己把老夏害苦的老调子。凌漪揣摩到她的心思，为了防止她又一次陷入内疚和自责的痛苦中，就急忙打开包，取出纸，一心要用那份见证材料来转移她的注意力，同时还讲解这份材料产生的前因后果。老大姐并不急于看材料，而是先安安静静地听凌漪谈情况，一边听，一边还似乎在竭力回忆那天晚上，呆在舞池一角的那些部队首长的随从人员，以便辨记出凌漪所提到的两位现场目击者来。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无情的岁月，早就把当时并不特别引起她注目的记忆形象，冲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她就站起身，转进卧室去拿她的老花眼镜。磨蹭了好一会，走出房门对凌漪很谦疚地说，不知道老夏整理东西时，把她的眼镜搁到哪里去了，要凌漪把材料先留下，让她找到眼镜后，帮着仔细研究一下，也许可以把字面改得更有说服力，明天或后天再来取。凌漪千恩万谢地退出夏局长的家。从气闷燥热的大楼里走到空气流通的街道上，额头被夏夜的微风一吹拂，心中突然变得忧心忡忡起来。回想起跟恭主任谈话的情景，既然恭主任会疑心重重、刨根究底地追问她：“为何她断言前交通局长夫人能为她作证”，局长夫人怎么会不担忧顾虑，她一旦承应这种有悖常理的作证，会使别人对她的丈夫起疑心？如果她因为这一担心，而找出推托理由不签字，虽然这与她“老大姐”的一贯形象不符合，然而对一个时时处处都想着如何维护自己丈夫声誉的妻子来说，这样子翻脸无情，也并否就一点都不可理解呀！

第五章 鸿沟

世上大多数女人在情绪方面的感受神经和库存积累，也许比大多数男人都要发达和丰富得多。然而每个女人的情绪感受内容，却会因为经历和处境的不同，有天差地别的区分。比如，当凌漪千恩万谢地退出前夏局长寓所的时候，心中是一派忧心忡忡，而作为市委新任副书记夫人的杨玲，近来却

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杨玲照理应该感到很满足。近九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终于宣告结束，无疑是应该庆幸的。

虽然她和老武之间不是隔着一条浩瀚如海的天河，他俩也无须象好多两地分居者那样，等待每年一度的鹊桥相会时机，但是经常在沪宁线上来来回回地奔走，挤车赶时的感受，并不很美妙。有时遇上他恰好外出开会或下基层检查工作，如果来不及通告，还会白跑一趟。杨翼已经七岁，也需要作父亲的经常出现在孩子的身边，否则她会把爸爸永远当作自己生活中的匆匆过客。还在杨翼埋伏在妈妈肚子里的时期，他俩就已经订好了协议，名“翼”是雷打不动的，因为这是外公的创作成果，意喻翱翔万里，应该予以尊重；姓是随机应变的，如果与父亲同性就姓武，如果与母亲同性就姓杨。结果是母亲得胜利，父亲好欢欣；因为按老武的原始动议，无论男女，都跟母姓，以满足外公含而不露要使杨氏家族存亡继绝的心愿。杨玲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一是不公平，二是照顾迁就了封建落后意识。而这种意识，无论从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坚持的革命原则来讲，还是按一个身为市政协委员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觉悟境界去要求衡量，都是要不得的，对它的讨好迎合是和时代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难获一个现代妻子和母亲的欣赏感激。最后还是上帝作了安排；上帝是男性，因此就不无偏袒地站到了两位男子的一边，派定杨玲生女孩，从而免了好多口舌，使两个大男子欲让武家后代姓杨的意愿得到满足。而最使杨玲许多同事朋友羡慕不止的，是她离开了一房一厅的单套，搬进了著名的东巷。

东巷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聚居地，在顶端呈波形起伏、砌有精致漏窗的高墙后，那些掩映在绿树青藤中的花园式红顶小洋楼，又称“常委楼”，非要达到市委常委一级才有居住资格。因为有太多的空房间，连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小杨翼，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当然，待她稍大后只要有她的个人心愿和需要，她也可拥有她自己单独的书房，单独的会客厅等。而杨玲的父亲，还是坚持他的清高作派，当年不去石头城，今日当然也不肯屈就“常委楼”，使自己在至朋亲友中克勤克俭树立起来的名节气概，须臾毁于一旦。杨玲理解父亲的清节操守，任劳任怨地接受在东巷和父亲居所之间徒劳往返的不便和麻烦。然而真正使杨玲感到宽慰高兴的，倒并不完全是那现代化和思想汇报时，有了可以使人括目相视的新话题。可是监管人员对他的汇报并不特别感兴趣，无动于衷地在笔记本上记了几排字；到底记了一些什么，他也没有权利查阅。直到半年之后，有关方面突然宣布，鉴于他表现优秀给他提前摘帽时，才知道那次的巧遇，对他并非一点没有帮助。他以为从此可以象个无事人一样了，但是不然，街道干部们虽然不再把他当敌人看，一般群众对他总是另眼相待的。由居委会介绍安排的就业机会，也总是轮不上他。发狠把原先靠城中心的房子连一些家当一起卖了，还了治老婆肺病欠下的一屁股债，带着儿子搬迁到以前熟人绝少可能涉足的草鞋浜，依样画葫芦地按着苏北安徽新移民的方式，搭了一个茅草屋，以为从此可以忘掉或抹杀以前的那段历史，神不知鬼不觉地生活下来。却不知，新地方虽然起初没有居委会之类的组织，却很快就在大跃进年代成立健全了起来。而新的居委会，对他的失业问题似乎并不放在心上。然后他就走上了老婆的相似道路，得了慢性溃疡，虽然没有解放初期得肺病那样致命，原有的经济困难就更为加剧。富有革命同情心和友爱心的居委会干部，对此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却视而不

见，始终不伸出援助之手。今天有了儿子的责问，才如梦初醒，认识到“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共产党的天下，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组织得细致严密，滴水不漏。他那不光彩的历史，就象他身后的影子，随便他跑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也是甩不掉的！

但不管怎么说，在学校的联系帮助下，袁世清家总算第一次拿到了地区上发的经济补助。袁世清本能地感觉到，杨老师不仅态度对他仍然很友好，很赏识，而且会对他父亲不光彩的那段历史，亦为他守口如瓶地保守机密。真是又遗憾又可恨，那位地下党不发展父亲参加地下党，而是甜言蜜语地把他拉入了敌对的党派。由此造成的历史后遗症，连无辜的后代也跟着受牵累。尽管他因成绩优异，经常受课堂表扬和期终奖励，处处能得到老师的青睐和偏爱，也受到好多同学的敬重与佩服，每当这位黄军同学恶作剧地把他父子俩不怀好意扯在一起，就使他感到有些心惊肉跳。虽然这种恶意的牵扯，暂时还没有自觉地带上政治色彩，但是近两年来，学校中讲出身讲成分的政治空气，已经越来越浓，使他经常产生一种提心吊胆的恐惧感。黄军是那么热衷于拿他父亲卖棒冰、捡垃圾之类的情况，作为取笑打击他的资料，如果有朝一日被他得知父亲的历史问题，袁世清简直不敢想像，会有何种更加使他脸面扫地的场面，会被这位以侮辱作践他人乐的专家设计创造出来。因此面对目前这类形式的恶作剧，他觉得还是小难堪，他但愿能够在这类小难堪的伴随下，平平安安地度过自己的中学生时代，然后可以和他的隔桌邻居挥手，友好地道一声“再见”，从此永远不再相见。

然而，他的同桌好友张本度并不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心思。他虽然长得没有黄军那么高大，却矮矮墩墩结实得象个铁秤砣。而且他从初一起，就拜师傅，练武术，又是打砂袋，又是练什么形意拳。那双手握拳时，两个拳面一崭平，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是长期击打砂袋的痕迹和证据。他有个姐姐也卖棒冰，因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讥笑卖棒冰，刺伤的就不仅是袁世清，也刺伤了他，和跟他属于同类阶层的所有人。他脸色一沉，气势汹汹地朝黄军走过去。

全班同学早就知道他俩之间缺乏友好之情，都紧张起来。独有杨玲此刻看到的，是他没有表情显示的后背脊，因此并没有预感到有什么严重之事将要发生。张本度却不管老师和同学们的心里怎么想，管自一直走到黄军身跟前，凑近他的上身，猛然扬起右拳朝前挥击。黄军的身体急忙躲闪后仰，左臂本能地挡到额头前，由于躲闪得太急太猛，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他所处的最后一排课椅和墙壁间又空了两尺多距离，因此背后没有依靠，急忙靠着左手去撑住地面，方才使失去平衡的身体没有完全翻倒在地上。那张本度却只是用那握紧的拳头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然后回到自己的头顶上，装模作样地搔了搔痒。旁观者恍然大悟，看到黄军那副惊慌失措的狼狈相，哄堂大笑。那笑声，很扬眉吐气，分明比黄军刚才所制造的那阵笑声更为响亮。而刚才跟着起哄笑的那部分同学，此刻也照笑不误，使黄军心里觉得很恼怒。

如果不是因为班主任老师在场，他可能忍不住跟张本度干一架，毕竟，他还从未跟这位只闻其名未见其实的形意拳手正式较量过。他认为，学拳术的人，大都是花拳绣腿那一套。真家实伙干起来，不一定抵得过他跟爸爸警卫员学的擒拿手和“搏克兴”（西洋拳击的谐名）。

可是张本度的手并没有碰触到他，众目睽睽之下，先动手的总是缺理。因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只好把张本度这一次可恶的挑衅，恨恨地记

在心上。

杨玲看到当时那情景，似乎是受了班上学生笑声的感染，嘴角边也荡起了一丝笑意。这丝笑意分明让黄军瞧见了，由此就对这位班主任老师，产生出一种好长时期都无法消除掉的敌视心理。或许，杨老师是存心这样做的，以借这种特殊方式，表达对黄军做法的反对与批评。恶意嘲弄人，自恃出身高贵，就看不起家境差的同学，这是身为革命军人后代的黄军，应该抱的态度吗？她反感。她也知道，黄军代表了学校里的一批人，他们均来自驻军某部的家属大院里。但是她想不通，按推测：这类同学的家长在参加革命前，大都家庭处境一定也好不了，为何刚刚换了一代人，神气姿态，就跟那些凌辱他们父辈的地主老财一个样了呢？

以上这些回想，大都是跟草鞋浜有联系的。杨玲对在历史上、工作上、以及因上下班而避不开的交通问题上，自己跟草鞋浜发生的种种联系，心情是复杂的。但是，肯定不是一种使人留恋和陶醉的感觉。现在好，下班时推着自行车款款出校门，不再需要朝西行，而是面朝东方径直骑行；如果天气晴朗，不下雨，也不下雪，她欣然地脚踩“凤凰牌”自行车的踏脚，虽然因走向问题不能面对灿烂东升的太阳，却能背衬一片绚丽的晚霞，而把种种愧疚、尴尬和令人扫兴的场面，远远地抛在自己的身后。

从事业上的成就看，杨玲也没有理由不满足。五八年前走进惠湖中学的校门时，她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低年级教师，惠湖中学在全市中学中，原来教育质量名列最末第几位。而如今，她是教导处高中教改组的组长，惠湖中学的大学入学率，一跃进入全市前三名，成为新排上号的重点中学。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并没有专门搞约会，却老是碰上知遇，见到好人，改行前是老武，改行后是董校长。董校长也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一只空空洞洞的袖管老是晃荡着，常使人觉得他的身体重心有些失衡偏移。“没有知识的军队愚蠢啊，”他对新进的教师，用仅剩的右手指着那只空袖管作现身说法。他的左手臂是给炮弹炸掉的。而那炮弹，却并非来自帝国主义的轰炸，却来自自己人的炮口。那一天的战况分外激烈，原来高射炮连的连长和指导员一死一伤，临时接任的党员排长一看阵地上的炮弹已近打光，就下令把一批原先封存在坑道里的炮弹搬出来派急用，“通通通”地朝天空中猖獗俯冲扫射的敌机轰上去，击中了就是一道火光一团浓烟，击不中的，火光和浓烟却回到了自己部队和兄弟部队的阵地上。原来，高射炮里轰出去的，竟是一批不碰不炸的穿甲弹。后勤部发错了货，连长牺牲前一刻没有来得及留遗嘱，指导员抬下阵地时，可能知道弹箱上有文字说明，却估计不到后来挺身而出的接替者，恰好会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而在战斗激烈的当口，除了指挥员，装弹的炮手即使认得字，也不会忽发奇想地来检视一下弹箱上的文字说明。有这样一位因为血的教训而对文化知识特别看重的“丘八”当校长，杨玲要想施展一番的抱负，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成功条件。

杨玲先做了两年初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因为表现突出，第三年就开始担任高中班的班主任。她向董校长提要求，希望能把一个班从高一到高三连续带三年，以利于系统性地总结一些教育经验和做学生思想工作的经验。董校长对她的建议深为赞赏，不仅答应她的请求，而且同时把她负责的那个班，明确列为教育改革试点班。也许从档案材料中，董校长知道这位报社“转业干部”来历不凡；尽管杨玲每逢填表时，从来就只在“丈夫”一栏中，填写“省委宣传部干部”一行字。或许是她离开报社前不同凡响的表现，已经

在那些黑字白纸间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而校领导对这“省委宣传部干部”七个字的含义，恐怕也是心领神会，因此个人档案中的有关印记，即令达不到闪闪发光的程度，也必然是正面的，给人留下可以信托可以重用的印象。杨玲果然不负重望，她连任三年班主任的教改试点班，在高考中取得80%的录取率，不仅在校内一鸣惊人，而且由于一下使惠湖中学的高考入学率进入先锋行列，杨玲的名字在市中教系统，也变得小有名气了。她成了市劳动模范，和市“人大”代表，靠得是硬当当的考生分数，而不是那位遥在金陵城内的武部长。她不仅为学校增光，也为部长脸上镀金。要问杨玲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她笑而不语。因为这是不可公开的秘密，公开需要有胆略，实行更加需要非凡的勇气。而这种胆略和勇气，也许并不和她的政治命运有很大干系，而直接与董校长相关，需要他的雄才大略和敢作敢为。而杨玲充其量，不过是当了一个军师参谋，或者在某些场合下，竟可以说是担当了一种并不十分光彩的讹诈要挟角色。这在惠湖中学的教师层中，几乎是不公开的秘密。该校著名的“四大才子”，统统是她在担任那个高中试点班班主任时，不知从哪些七弯八绕的社会角落里搜罗出来，向董校长作推荐保举的。其中那位学富五车的数学老师傅青，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本来以摘帽右派的身分，在郊区一个民办初中当民办教师。而可以把枯燥单调的化学反应程式变成栩栩如生形象思维的钟博文，是位好高骛远、屡考屡败的邻市待业青年；他的名落孙山并不是因为其得分不高，他连考两届，总分都在全市前茅，化学更是名列前三名。就因为他一心要进清华、哈军工这类并不向资本家子女开放的名牌重点，却欠缺一个好出身，就只好在家望洋兴叹。她所引荐的物理教师苏顿，能把物理原理讲解得使学生如痴如迷，可是却缺乏洁身自好的做人品德，在邻近一所中学和一名高年级女学生搞得沸沸扬扬，触怒了学生家长，几乎到了革职回家的严重地步，杨玲借董校长的独臂之力，授以援救之手。苏顿心中自然感恩戴德，几乎是以校为家，日日夜夜为临考的应届生加班加点，巩固印象，加强记忆，使全市物理高考第一名的状元，石破天惊地诞生在惠湖中学。陈驰华是“四大才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执教英语之鞭，早年乃留学美国史丹佛大学，据说抗战后期曾充任过驻华美军的翻译。以上四位老兄高超的才智、扎实的治学功底和忘我的工作干劲，自然是有目共睹。他们为使惠湖中学扬眉吐气而立下的丰功伟绩，亦使同事们心悦诚服。然而他们的来历背景，除了那位仿效牛顿之名的物理教育天才已有风流名声在外，属于仅有杨玲、董校长和个别人事干部之间严守的一级机密。而杨玲所教的语文一课，如果行功论赏，应该是“五分天下而有其一”。可恨有深厚历史功底的大男子主义，即使在素有开明之称的教育界，也仍然有称王称霸的幽灵在游荡，因此言只提“才子”，而不及“才女”。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忿忿不平的指控，就强烈地带有污陷不实之味道。由于性别上被分水岭所阻隔，如把杨玲归入同一辉煌群体，无论以“五大才子”之名，或是以“五大才女”名号统一以冠之，都有名不副实的难处。如果尊重事实，改称“四大才子一大才女”，或“一才女四俊才”，均显拗口；可见非之不欲，实为不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即使不论举荐之功，杨玲也在“四大才子”之上。因为高中毕业班共有四个班，其余三个班同样有“四大才子”执教，高考录取率虽然明显上升，却远远不及杨玲当班主任的那个班。可见她是发挥了类似恒星的作用，而“四大才子”则更象围绕其旋转的四大行星。因此就在初战告捷之年，杨玲就被提升为教学处高中教改组组长，并仍然兼

任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杨玲对自己所得到的声誉既有得意之处，也有愧疚之意。她觉得自己是享尽了胜利换来的花团锦簇，而董校长却一开始，就为此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只要“四大才子”还在惠湖中学存在一天，他就要继续为此承担一天风险。对于这一点，她开始时知之甚少，体会肤浅；尽管老武在和她交换单位里的工作情况时，用隐隐约约的语言提醒过她。但是语言的力量总是苍白的，她更相信事实。事实是令人鼓舞的，与老武的智者之虑存在着很大差距。比如，俞市长曾来校参加过高三年级的毕业庆典，为学校作过“百尺竿头、更进一丈”的题词。为了使思想保守、胆小怕事的原校党支部书记心血管负担不要过于沉重，上级领导就把他调离原岗位，在风景秀丽的太湖职工疗养院担任院长，以使他早期的心脏病症得到及时休养生息；而董校长则成为全市教育系统唯一存在的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但是如果带着黑暗的有色眼镜看问题，这样的职务安排，却似乎是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到时候不要主次不分一起报销”的消极防御战略。

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老武官拜十三级，杨玲屈居行政二十三级。如果一级算一层楼，不用毛估，而采取先减后乘的精确计算，老武的眼光可以比夫人远出一万里。这一距离，相当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五分之二，地球自转行程的八分之一。它所包含的政治含义，是直到老武来锡城市市委走马上任之后，武夫人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切烦恼、不满、困惑、忿懣，也都由此而来。

老武向夫人透露过，省委书记找他谈话时曾暗示过：调他去锡城市，省委有让他接班的考虑和意图，要他熟悉情况，搞好团结。先带个市委副书记的帽子头去，具体分工接受市委常委讨论决定，待条件成熟时正式宣布接班。武遥兴冲冲地参加第一个常委会时，因为都是熟人，一点没有拘束的感觉。陆书记在57年一起参加处理罢工事件时就是市委书记，俞市长是那时是市委常委兼工交办主任。尤其是跟俞市长，当时虽然意见分歧得利害，不打不相识，后来却几乎成了莫逆之交。南京与锡城市之间，你来我往，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他俩总是要相聚一下的。当会议转入讨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武遥亮出了那份不伦不类的大字报，其他的市委常委不约而同地起立，围成一圈，或扫视，或诵读，大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阵势。然后是从北戴河疗养院匆匆赶回主持“一班人”会议的陆书记，参照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锡城市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和特点，一是建议不失时机地向本市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早派早主动；二是成立一个专门协调指挥各工作组工作的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就由武遥同志总负责。所有工作组中，去苏南工学院的最关紧要，按各地的情况看，大学的文革是龙头。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龙头，使之走向正确轨道，发挥其对全局示范指导性作用。虽然苏工是国家轻工业部部属单位，和本市是平级，但是中央有指示，各地高等院校的文革归地方领导。所以工作组要有武遥同志亲自带队，把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尽快地处理好。然后是作表决。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毛主席强调书记在党委“一班人”中的“班长”地位和作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大的原则出入与分歧，班内的“战士”是不会和“班长”在会上公然唱反调的。即使有不满，关系融洽的，会后交换意见。不怎么融洽的，或在背后嘀咕，或在行动上消极抵抗。武遥下车伊始，和陆书记的关系融不融洽，还有待时日检验，因此这一条就对不上号。至于原则上有无出入分歧，就更谈不上。陆书记讲的话，头头是道，都是经过一路深思熟虑之后，简明扼要地开的金

口。武遥至少暂时尚未接班的思想意图，更不愿意让可能会被接班的候选对象，感到咄咄逼人之意。因此慨然应允，心里明白揽此重任，完全是承担新形势、新情况之下所出现的新工作、新任务，不和在座各位的管辖范围交叉重叠，没有越庖代疍之嫌，对立足未稳的自己，最适合不过。而当时在座的各位，无论是动议人还是附议人，也都是这么真诚地认为的。因此均无异议，但是也没有采取鼓掌通过的形式，因为这是核心会议，光靠心领神会的眼神、微笑，或颌首点头，便可以相互沟通确认；而不是几百人、上千人的大呼隆会议，必须依靠响亮的掌声，和明显的手掌挥动幅度加以认可。

老武走马上任，市委派惠湖中学的工作组也接踵而至。杨玲似乎有了第二次在武首长手下“混饭吃”的感觉。工作组进校第一天，就毫不含糊地显露出替代董校长领导职权的架势，明确宣布：从此校内各项重要决定，均要通过工作组讨论研究。然后就四下寻找学生和教职员工谈话，谈话内容不仅对教导处封锁，也对董校长董支书封锁。于是杨玲在夜晚上床睡觉前，就当真用“在他手下混饭吃”之类的话跟老武开玩笑。但明眼的旁观者一轧苗头，就知道她有笑里藏刀的味道。当然这“刀”不是对着自己丈夫的，而显然是对着市里派下来的工作组的。对孩子她爹，充其量只是表现一点牢骚，一点不满，一点抱怨，一点缺乏理解力所产生的困惑。当时她尚未意识到，十三级干部和廿三级干部在形势判断上，存在着一万里的差距；然而对学校里新来的工作组，也就是自己丈夫的部属，她却是近乎本能地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攻击。武遥以笑对笑，也只是淡淡地回之一笑。然而，这后一种笑和前一种笑比，在本质上却有天差地别；后者不过是一种心不在焉的应付，是在对工学院错综复杂情况苦思冥想之际，碰到外界干扰时所作出的一种懈怠性的反应。武遥开始重蹈许多丈夫的覆辙——一经和自己妻子的距离拉近，朝夕相处，他们就以爱理不理的懈怠之心，折磨妻子敏感脆弱的感受神经。幸好杨玲不是女流中的脆弱之辈，自从老武那次请王小燕上门闲谈，自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进驻苏南工学院，她已看出丈夫心中似乎有着更深的困惑和烦恼，她不应该再用自己无关宏旨的感受，去搔扰他的思路。她给他沏了一杯茶，退出书房时脚步轻蹑，这是大家闺秀的风范，从小受母亲对父亲做法的耳濡目染。父亲中年丧妻，终生不再重娶，而只是在自以为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对着母亲的遗像喃喃有词。杨玲从母亲的如水温柔中，感受到了比钢还要坚韧的力量，即使母亲的灵魂和肉体都已经烟消云散，这股力量还是牢牢地捆绑着曾经被她征服过的男人。对照母亲，杨玲开始对自己的某些言行感到后悔和羞惭，奇怪自己何以缺乏自制，竟然象女儿在父母面前一样，对丈夫表现出一种与自己身分和年龄所不相称的任性和撒娇？她努力寻找理由，对自己所作的这种自我谴责进行反驳。但是又觉得这种反驳，强词夺理的成分居多。

从那一个夜晚起始，杨玲就尽量克制自己，不用一个小小教导处高中组组长的小烦恼，去冲击干扰一个市委付书记、锡城市文化大革命总指挥的大烦恼。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在他这个总指挥所属部下的领导下，杨玲觉得自己的神经和心态，已经逐渐濒临自我爆炸的边缘。她倒真希望自己是颗穿甲弹，只有在遭受猛烈撞击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可是每天走进那个校门，见到那些曾经使人那么心旷神怡的花花草草，都被充满着变质墨汁恶臭的大字报，掩盖得严严实实，心里就气闷。那些军队干部的女儿，除少数人之外，学习方面不怎么样，干起革命来，却好象具有无师自通的天赋。学校的教室

走廊之间，分布最广的是玻璃窗，造成贴大字报的可用面积相当有限。然而这些革命小将发挥革命想像力和创造力，沿着冬青树丛在花圃上空，拉起了好多绳索，然而就象晾晒衣服一样，把大字报上端糊贴（也许应该说是挂贴）在绳索上。那些平素在夏日阳光下显得生气勃勃的绿叶红花，如今被这些围廊式的大字报遮盖得密不透风。而多数大字报的内容，紧扣一个主题：谁专了惠湖中学这块教育阵地的政？校党支部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阶级路线？开始时还是指指戳戳，躲躲闪闪。然后就是矛头一挥，直指杨玲早已惴惴不安、呼吸日益紧迫窒闷的心口。

“分数挂帅的要害是打击红五类子女！”这分明是罗织罪名，向杨玲近十年来呕心沥血的努力进行公开的讨伐。

“看！四大才子！丑恶真相！砸烂惠湖中学的‘四家店’！”四大才子的档案，只有工作组才能调阅。与前面的讨伐遥相呼应，后面开始对具体的对象大打出手。杨玲终于清楚意识到，一个多月来气势汹汹、尘嚣甚上的攻势，原来有工作组躲在幕后发动，杨玲的心口不由自主地紧缩。

“揪出‘四家店’的黑后台！”学生们借用了北京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帽子，毫不犹豫地套在“四大才子”头上。而锋芒所向，已经凶险地直逼大包大揽的董校长。

此时此刻，杨玲才总算领悟和信服丈夫的先见之明。然而，她同时也更加信服起自己来。她一下回想起工作组刚来时，她在家里跟老武所开的那句话中有刺的玩笑，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撒娇，并不是任性，而是一种第六感官的直觉和悟性，使她在下意识中感觉到：威胁和危险正在向惠湖中学迫近，而她，她那些与之同甘共苦齐心协力的同事，她所尊敬和深深感激的学校领导，即将被一股什么力量打入暗无天日的深渊。她惶恐，困惑，同时也感到震怒，感到激忿。当她走进教导处高中组的办公室时，她在门口停止了脚步。她看到了新贴在门框上的一幅对联：

“庙小阴风盛，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个黑窝”。

面对这种公然的人身污辱，杨玲脸色气得煞白。教导处高中组的办公室特大，是有原来一个会议室改用的。这也是杨玲的发明首创，她让以“四大才子”为首的骨干教师，加上几个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全部集中在一个房间里。这样有情况就随时能沟通，大家之间的合作、配合和工作感情，也愈加融洽。现在这副对联，分明已经把手指点着了她的鼻子尖。她看到办公桌位于靠门口的傅青和苏顿两位，双双正襟危坐，一听到她的脚步声，脸孔都已经扭向她，认真地注意观察她的神态和反应。室内另外几位老师，或站或坐，本来似乎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这时候也都收住了口，一齐屏息敛气地，加入了观察者的行列。杨玲仿佛早就预期到，终有一天会有这样一种场合和场面；在门口停住脚步，略一思索，毅然决然地伸出手，竟然“哗啦哗啦”地几下，就把那对联撕个粉碎。目睹她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她的同事显得很吃惊，但是又觉得这种冲动性的行为，也符合她的个性，符合她的地位，符合在场各位逐步变得忍无可忍的心情。但是他们感到震惊，惶恐。从共产党建国，迄今为止一切政治运动的经验，都无法帮助他们把握局势，明辨方向，预测未来，减轻惶惑。他们大脑半球皮质上刻下的深深沟痕，毫不含糊地提示警告他们：单位一级的领导是代表共产党的，进驻单位的工作组，也是代表共产党的，两者从来就穿联挡裤。事实上，从其它学校传来的消息表明，这些记忆沟痕中的储存，仍然基本适用于对当今形势的观察分析

——许多中学的工作组，是和校党支部协同作战的。但是在惠湖中学，情况却显然有些例外，董校长显然已经被架空，这么多“资产阶级专了惠湖中学政”的指控，分明是把矛头对准了他。而“四大才子”的丑恶背景终于昭示天下，也是工作组向学生提供的炮弹。学生们已经很明显地把董校长放在“四家店”黑后台的金交椅上。然而，光有“黑后台”而没有总管家，这个店铺的门面是支撑不起来的。可爱的、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觉悟的革命小将，是不可能不考虑到、也不可能不明白这样一个极浅显的道理。那么，谁是这个总管家呢？答案就更为浅显明直，这就是新任市委副书记、工作组总指挥武遥的夫人杨玲！在大学和小学教师之间，中学教师的智商、识见，对事物的理解、分析和判断能力，虽然不居顶峰，但是也不在山脚根底下。与一般的工农老粗相比，他们的敏锐和才识，更是显得洋洋可观。因此，在这个社会上，允许有大部分公民暂时地感到迷乱或不知所措，他们却理应和大学教师们，组成一个令人骄傲的少数派，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头脑。可是不，惠湖中学的这一群人之师表，此时此刻，却显得比任何人都迷乱、惊恐和无所适从。无论从原则还是从社会常识出发，接受上级领导的校党支部书记和工作组既然可以代表党，代表上级实施这一领导的武副书记当然更可以代表党。而他的爱人，除非与他在思想和感情上势不两立、婚姻关系处于土崩瓦解之势，按推理，当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样一种党的领导。我们在此运用了“反映”两字，而舍弃“代表”之说，是极有分寸感和经得起推敲质疑的。可是，尽管杨玲与她丈夫的亲密无间，使许多对夫妻羡慕不已、黯自神伤；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这一切，却并不能防止她堂而皇之地成了一个“王八”成群的黑窝之头。是谁，在背后用一只强有力的无形之手，将她一把推上这一很难使人羡慕的宝座？是她自己丈夫吗？这样揣测不仅有悖常理，而且迹近荒谬。面对杨玲这一瞬间似乎失去理智控制的冲动之举，黑窝的成员们，茫然无措地注视着他们的“黑头”，举着一只手，徒劳无益地朝上方空抓两下，却是功亏一篑，够不上那条“一个黑窝”的横批，就气急败坏地叫喊：“给我拿张椅子来，给我拿张椅子来！”他们好象都显得迷茫而木然，好象是在袖手旁观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但是眼神却都凝重而严峻，绝对没有看好意思。从他们又迷茫又严肃的表情来分析，他们也许是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沉思估摸中：杨玲在这一瞬间采取的行动，不仅对杨玲，而且对自己，对这一整个黑窝乃至整个惠湖中学，是祸是福？是吉是凶？

杨玲的呼喊未能引起同事们的响应，却招惹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学生。他们嘁嘁喳喳，表情各异，莫衷一是。然而在他们的脸上，显然看不到惊恐或麻木的神色，而是有同情，有激忿。同情者中，有人积极响应杨老师的号召，挤开挡在门口的其他老师，从办公室里拖出一张靠背椅，以弥补杨玲身不够高、手不够长的缺陷。于是围观的学生中，就有恶狠狠的眼睛钉着这位助人为乐的同学。这位助人为乐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位一向腼腆的袁世清。他此刻可能是记起了杨老师对他所施舍过的恩惠，和其它种种使他敬佩感激之处，因此他不管一部分同学的竖眉瞪眼，大无畏地伸出援助之手。然而此刻的杨玲，并不注意是谁终于响应了她的呼吁，接过椅子就站上去，干脆利索地完成了自己的未竟事业。她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在瞬间中所作出的举动，纯属感情冲动。这一个多月来，她对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工作组架空校方领导，并且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黑帮之名，在背后煽动学生把火烧向她的同事和董校长，早就强烈不满。但是，尽管她是一个极具个人主

见的女人，在身为共产党大官的丈夫面前，她恪守传统意义上的妇道，遵守她父亲所灌输的、为世上当政者的贤妻们所确立的那套规范，绝不想以个人好恶，影响左右丈夫的主观判断和决断。她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个人见解，但是在丈夫面前，无论是在背后为他的部属褒扬邀功，还是加以贬谪指责，都是令人厌恶的为妇之道。如果她跟老武在性别和夫妻名分上的关系能够颠倒一下，但是职位仍然保持原状，也许她就不必如此压抑自己。直言直语，本来就是男人家应有的特征。如果一个党委书记正好是女性，这位女性的丈夫经常在背后为她出谋划策，所有中国史书作者即使起死回魂，恐怕也决不会有哪一位会对此评头论足，横加指谪责备。然而这种人为的颠倒是不可可能的，杨玲必须尊重现实。虽然老武百忙之中多次询问过她学校里的运动情况，她在简短扼要的回答中，总是只摆事实，避免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好恶和是否判断。而老武总是“唔唔”地点着头，嘴上虽然不置可否，脸上却显示出以为为异的表情。

“把有那么多污点的人集中在一起加以重用，还冠之以‘四大才子’的帽子，看来是有一点问题。提高大学升学率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为此不择手段，不讲政治。”这其实是老武的一贯立场，前两天夫妻在枕头边再次谈到惠湖中学的文革情况时，他终于作了这样一个表态。老武的这种见解和态度，不仅隐隐显露了他们夫妻之间在政治问题上所出现的第一个重大裂痕，而且令人惊讶地反映出不该有的一种政治迟钝和麻木；至少，杨玲是这样认为的。

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政治见解是正常的，她并不因此而对老武无可置疑的思想领导地位，产生怀疑和动摇。使她产生怀疑和动摇的，恰恰是后一种政治迟钝和麻木。学校工作组的人为什么要拿“四大才子”开刀呢？学生们异乎寻常地把矛头指向校领导，而工作组既然不闻不问，这无论是与“反右”时的情况对照，还是与其它学校的情形相比，都是耐人寻味的。学生们下面抓“黑干将”，上面要揪“黑后台”，就差没有明确点名要整她这个承上启下的“黑管家”了。而今天，公然把这样一副对联贴到了自己办公室的门框上，没有学校工作组的纵容支持，谁敢想像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如果上头没有人支持工作组，工作组又怎么敢把由她这位市文革办主任夫人一手创建的、曾经受到过俞市长亲自嘉许表扬的先进教育集体，打成“一个黑窝”呢？杨玲觉得，太多迷蒙不清的烟雾，不仅笼罩在她的四周，而且连老武，似乎也被罩在这种迷雾的阴影中了。她意欲通过这一果敢之举，逼迫学校工作组作出回应，以便迅速找到一种确定性，一种明确性。她不想重复九年前的途径——那次是用调查报告的形式向老武告状；也不想用在枕头旁边的叽叽咕咕的舌头，动员老武对惠湖中学的运动作出干预。那样做既不明智，也不见得会有效。作为一个处在政治权力圈子之外的妻子，要提醒象武遥这样的丈夫，对发生在这一圈子之内的可能情况提高警戒，作出估量和预防，不仅绝对地不适宜，而且是危险的。这种危险的程度，甚至可以危及他俩的婚姻关系。不管怎么说，她知道自己是和一个原则性特强、党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职业革命家生活在一起。这个革命家不会容忍夫妻间的温情来干扰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损害他所信奉的革命原则。而猜疑党委一班人中有人想从自己妻子的身上打破缺口，达到最终陷害他的目的，无疑是对这种神圣的革命事业和革命原则的讽刺嘲弄；如果做人妻的要作这样的挑唆者，她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杨玲心明如镜，不愧为一个有主见、有胆识的女人，她就如战国时代那位身带浩然之气的石击秦王的壮士，突然跃身而起，把巨石砰然掷向

对方。对方不可能不作出反应。如果这种反应是负面的，那时，最终她的丈夫也就不得不对此作出反应。如果这种反应是正面的，那就证实自己不过是捕风捉影，经历一场虚惊。这样她就可以象在五七年一样有惊无险，完璧无损。而只要能够保全自己的完璧无损，杨玲觉得自己竖起的教育红旗就不会倒落，她就仍然有机会可以帮助拯救保护她的同伴，以及她所尊敬的那位“独臂将军”。高中部教务组在这段日子里，就象被一阵飓风卷入波峰浪谷中里嘀嘀打转的一叶孤舟，掀天的暴风巨浪，可以使小舟随时倾覆，舟上人的生死存亡，系于千钧一发之机。而此时作为掌舵者的杨玲，却毅然决然地扯起了满篷风帆，或者借着一阵狂飙猛然冲出漩涡，或者被巨风一举掀入海底；这就是她在撕对联前一刹那所抱定的念头。这时候，当她撕完那副可恶的对联，她突然间注意到了那几双恶狠狠瞪视着袁世清的眼睛；于是，她也把自己咄咄逼人的眼光，挑战性地射向了它们……

第六章 火山口

武遥知道，杨玲在学校里也许会面临一些小小的麻烦，他对妻子没有以这些事情来麻烦自己，心中由衷地感激。自从一脚踏入苏南工学院的大门，他就觉得自己陷入了一团乱麻堆里。作为市里分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市文革办公室主任，他根本就抽不出那份时间和精力，来关心派到各个中学里去的那些工作队的情况。他不得不把这些面上的事情，交给兼任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恭鹏志来代理。对妻子学校里的情况，他也向妻子询问过几次。但是那不过是一种象征，是对自己妻子表示关怀的一种必要形式，同时也能顺手牵羊地了解到一点中学里的运动情况，使自己在听取恭鹏志的工作汇报时，不会显得一无所知。

工学院一开初就出现两派观点尖锐对立的文革形势，使他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

根据王小燕到他家做客时所反映的情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待工学院两年前举办的半工半读试验班上。

1960年，武汉大学创办起了半工半读试验班。这一尝试，起源于毛主席1958年9月12日去武大视察时，对学生要求实行半工半读的支持和鼓励。在一次全国性的高校教改经验交流会议上，武汉大学有关人士介绍了举办这一试验班的六大优点：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等，培养了学生的哲学头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下厂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热爱工人热爱劳动；达到了一级到二级技工操作水平。理论联系实际，增学理论物理，电工学，无线电学等。活学活用，反对死读书，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建立了新型革命师生关系。

政治方向明确，组织形式短小精悍，教学方法机动灵活，有强大生命力。

工学院的前任党委领导积极引进了这一新生事物，在机械系也创办了

一个类似性质的试验班。但是1965年新调来的校党委书记华得钧，按照王小燕的说法，却对试验班抱着敌视的态度，千方百计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借“试验班学生能不能学到东西，学校不放心”为名，要试验班同学和在校同年级学生会考“复变函数论”。试验班师生一是反对，因为试验班不主张、不继承那套资产阶级的考试方法。二是不怕，自认为学用结合，学得深，学得活，能够在考试中取深。校方装出“公正”的样子，事先“约法三章”：一，请第三者（既不是试验班教师又不是非试验班教师）出考题和监考。二，密封考卷。三，考题内容照顾到双方。但是在校方审题时，却偷偷去掉了三题应用性强的考题，换上了理论性强、认为对普通班学生有利的考题。考试结果，试验班的成绩大大优于普通班。

第二次会考“数学物理方程”，校方背信弃义地完全按照同年级普通班的讲课内容出题，结果试验班又优胜于普通班。院领导慌了手脚，欲以偷改考生试卷分数的卑鄙手段，来达到扼杀试验班的目的，但是被试验班教师所发现而未能得逞。第三次进行理论物理考试，试验班大多数学生成绩优良，无一不及格。这三次考试，考出了试验班的影响，考出了试验班的威风，考出了试验班的优越性。主考老师的评价是：学生虽然以自学为主，但是概念清楚，思路明晰；一般的基本内容都掌握了；学生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把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表述。学得不错，学懂学通了。许多过去不明真相的师生觉得试验班办得比某些人的评价好得多，一些原来在普通班只搞单纯课堂学习的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试验班。在一封封申请书被扣压的情况下，有人就管自直接去试验班报名。把持学院教学大权的某些所谓“学术权威”们，对此十分害怕。他们采取封锁、阻挠、颠倒黑白、篡改事实等卑劣手法，极力诋毁、抹杀和消除试验班的影响。同校学生们纷纷要求介绍试验班的情况时，以华得钧为首的院当局却横加阻挠，蛮横宣布：“不准谈试验班，否则就是违背组织原则。”外校的人员前来取经时，他们回说：“试验班就是‘四不’，即不讲课，不答疑，不改练习，不考试。”大肆歪曲试验班的实际情况。他们还对马进等几名坚持试验班教学的骨干教师，扣上不听党委的话、试图摆脱学校党领导和鼓励学生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道路的大帽子。从马列教研室临时调任试验班班主任老师的马进，借去南京出席一次哲学理论讨论会之机，向省委领导告了状，才使院党委被迫取消批判斗争试验班师生的安排打算，一反过去反对学生“不务正业”的常态，把试验班的师生，统统赶到乡下搞社教运动，迫使试验班的教学活动中途停顿了下来。而深入工厂农村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试验班一贯主张的口号，对于院党委所作的这种安排，自然没有理由加以抗拒。

五月初试验班师生接到上级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后，根据对全国文革形势和走向的判断，就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名，把院党委敌视反对试验班的所言所行，搬上了大字报。这种公然批评指责院党委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院党委有组织有步骤的系统性压制和反击。而武遥在六月初所看到的那份危言耸听的“辟谣”，就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所出现的产物。武遥本来还以为，这一“辟谣”纯粹出于年轻人的想像和捕风捉影。但是进了工学院校园，他才知道：在校党委保卫处的保险柜里，确实实地躺着一份绝密文件，文件的名称叫：“苏南工学院‘试验班’反党小集团情况分析”。

按这个文件的说法，从五月初以来，校园内如火如荼的大字报批判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一些应该使一切具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们应该加

以注意的杂音。有那么一些大字报，每在大批了一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后，总要居心叵测提出诸如此类的疑问：“为何半工半读试验班受压制，而封、资、修的东西却能在苏南工学院大行其道？”“是谁在纵容、支持和包庇资产阶级黑帮分子在工学院为所欲为？”“为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在工学院受到抵制？为何工农子弟在学院中不成比例并受到歧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苏南工学院的领导权又掌握在谁的手里？……”据统计，这类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为数极少，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每当这类大字报一出现在学院大礼堂的墙壁上，立刻能够喧宾夺主，把许多大字报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们的跟前。文件断言：这个小集团的核心分子，就是那几个热衷于搞所谓“试验班”的骨干人员。因此，文件把它称之为‘试验班’反党小集团。

一段时期来，只要在学院内大字报集中的区域看到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堆人，无需挤入人群查证，必定是这类极具蛊惑力和能够煽动起人们强烈好奇性的大字报在兴妖作怪。高等学府里年轻的或年老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超凡脱俗，他们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代表了党的领导。建国以来各种各样的运动使人目不暇接，没有哪一个人，在哪一场运动中，能够公然和党委领导作对之后，逍遥法外地逃脱党的严厉惩罚！而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却如此胆大妄为，几乎把向院党委挑战作为其洋洋大作一个须臾不离的主题，这种向社会公义和民族常识公然挑战所包含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好象使人读了惊险侦探小说的起头之后，读者心痒难熬地急于了解情节的发展，急于知道下回分解。

而好多党性和革命性不是十分坚强的读者，其思想与情绪也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感染，竟然忘乎所以地希冀：小说中弱小而又狂妄地向党挑战的主人公，可以侥幸取胜。人们往往无视公理和自身的利益所在，盲目愚蠢地偏护倾向弱小者，这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弱点。这种使人扼腕叹息的人类通病，不仅很容易使读者们在耳渲目染中陷入偏激思想情绪，而且身受毒害而浑然不知。这绝非危言耸听，把怀疑的、挑剔的、心存敌意和不知好歹的眼光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正在稳步增长，声势日见其浩大。

而从“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个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那篇“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这个反党俱乐部所吹奏的调子，已经丧心病狂地把工学院党委书记华得钧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或明或暗地相提并论，工学院的部分师生既然将信将疑地加以姑息纵容，认识不到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遭受到1957年的沉重打击之后，向党发动的猖狂反扑。

在九年之前，阶级敌人是以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为名；而这一次，他们是以响应毛主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召为名，再次向党发动进攻。然而这类进攻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错误缺点和毛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兴风作浪，无限夸大。苏南工学院广大革命师生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性，面临严峻考验。苏南工学院党委的英明正确领导，正遭受史无前例的挑战！而根据保卫处同志的严密观察和周详调查，那些最初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以及至今仍构成这类大字报的主体部分，均出于这一个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之手。这个反党小集团或暗中呼风唤雨、串联策划于密室，或推波助澜点火于基层。他们行踪诡秘，经常不在学校却在马进家中进行秘密聚会，背着学院领导四下出动，进行非组织性的活动。这些人数量虽少，能量极大。而作为试验班发起者之一王小燕，是这一集团“三

驾马车”核心领导中的头面人物。王小燕依仗自己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喜欢出头露面的虚荣心，处处冲在头里，公开站在大字报前从事鼓动宣传，与明辨是非的大字报读者辨认争吵，强词夺理。另一位试验班成员、机械系的调干生曲湘川，和作为试验班主要组织者之一的马列教研组讲师马进，则躲在幕后出谋划策，不仅泡制混淆视听的反动文章，而且窥测方向形势，制定跟系党总支和院党委领导作对的策略和拉拢师生的手段。他们无视校党委的耐性劝导和多次警告，一意孤行地在学院党团组织系统之外从事“非组织活动”，并且欲盖弥彰地在市区贴出好多作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辟谣”通告；甚至不惜采用阻塞交通的方式，向地方党委施加压力影响。充任这个集团军师身分的马进，其反党行为一直可以追溯到在六十年代早期。他经常以教育讲台为阵地，超越教育大纲的范围，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和社会上的某些现象妄加评论，肆意歪曲攻击。而抱有政治野心的曲湘川，入学以来对机械系的领导长期心存不满，并利用其中共党员和团总支书记的身分，拉帮结派，与组织分庭抗礼。王小燕则一贯“唯我独革”，对专业学习不感兴趣，在政治上却好出风头，经常借班级民主讨论会、团生活和学生会活动的场合，对老师、同学甚至学院领导的政治和生活表现，评头论足，以极左的姿态和过激的言论哗众取宠。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于1966年初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时期。对这伙人在社教运动中中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伥魔一气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以及马进个人1957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期的表现，这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

读了上述机密材料，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武遥感到有些吃惊。这并不是仅仅因为看到了他所亲自经历的情况，竟然也成了档案材料之一部分。他把那份“辟谣”带进市委大院，本意是为消弭化解矛盾，七传八转，却好象事与愿违，反而起了加剧矛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自己先入为主从王小燕那里建立起来的初步印象，同站在王小燕对立面的领导者的看法，差距是如此之大，几乎有天壤之别！他应该立足于弥合这一虚假的敌我差距呢，还是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活生生的反映，从而在两种对立观点中选择其一，作为自己的立场？这是他首先需要确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懂得这一选择的重要性，因为这不仅有关苏南工学院文革运动的发展方向，也有关自己能否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站稳脚跟，作出建树，从而最终能够令人信服地完成省委领导所期待的顺利交接班。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最初选择，后来会导致他走向一条始所未料的道路。在一场他自以为理解而其实并不确切理解的大革命风暴中，这条道路后来竟然使他在锡城市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使数十万人十分崇敬而另外数十万人极其憎恨的人物。武遥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相信命运。于是命运就决计给他上课，手段之惨烈残忍，超出他所能作出的最坏打算。当然这些都是后事，武遥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耐。当时他所能做的，首先是在校园里四出溜鞅，视察那些反对院党委和支持院党委的各种大字报；同时还采取“温故知新”的方法，阅读了院党委办公室所在前一时期秘密摘录的大字报抄件。得到的感觉，好象是双方的观点立场都有偏颇之处。一部分师生把院党委教育路线上的一些偏向，说成是蓄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这显然是夸大其词。而反对这类偏激观点的大字报作者，却又采取了另一种夸大其词的偏激立场——把前一种偏激观点持有者说成是反革命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小爬虫，资产阶级新右派。武遥对于这类过激反应并

不陌生，然而以文革开展以来的党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论精神来衡量，这类反应似乎并不受到鼓励和支持。

党中央试图输送的信息，与大多数人所作的接收与回应，两者间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作为体现代表党中央领导的大多数基层党委，毫不令人惊奇地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或者勿宁说，他们带领广大基层骨干群众和依靠对象，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如既往的传统立场，从而使党的高层与基层之间，出现了并非人人都意识到的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现象，和这些领导者与部分被领导者之间的对立情况相互纠缠在一起，对一个局部乃至整个全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意味着什么？武遥仅仅隐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他当时所具备的思想水平和客观认识条件，却不可能对此作出深思熟虑的回答。甚至，他都没有能够对它加以足够的重视，把找出正确解答，作为指导自己下一步自觉行动的基本前提。

武遥对马进毫无直感印象，与曲湘川却是有过一面之交。那天他走下车，看到由“辟谣”通告所组成的那个人群聚集圈之外，在一辆载有浆糊桶、纸张等的三轮脚踏板车旁，另有一个规模较小的聚集圈。圈子的中心，便是这位外貌黑瘦、眼珠黑亮的曲湘川。只见他在人群中侃侃而谈，所谈问题的范围，却并不完全围绕那份“辟谣”内容的本身，却更侧重于解释产生“辟谣”文章所代表的社会含义。他显然不仅是个能干的讲演者，而且是个耐性的倾听者；武遥在他上下周围所碰到的各色人等中，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交谈者，为了倾听对方的意见，那么愿意随时准备打断自己的话头。武遥不能记忆曲湘川那天讲述的所有话题，然而有一段话却至今还留在他的脑子里，他甚至还能记得曲湘川讲那段话时的认真表情。那段话的大意是说：在我们好多单位里，单位领导总希望把他们看作党的化身。只要哪个群众或下级不合他们的意见想法，就“啪嗒”给你一顶帽子；这是不对头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总是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就如站在这里看那张“辟谣”，因为远了一点，加上太阳反光，我们看到的象是一张白纸；此时此刻，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看过去的人，得到的一定都会是白纸的结论。这是因为我们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如果不走到近处或不反光的角度的去看，大家都不会觉得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会是错的。我举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个人的意见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每个单位的领导也不例外，他们会犯各种错误，主观上的，客观上的，立场性的或方法论的，都可能犯。查一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领导人犯错误的情形屡屡发生，而且都是很高级的领导人，更何况如今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他们所处的地位，所积累的经验 and 了解掌握的情况，都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我们就应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任何事情都要问过为什么，绝对不能盲从，绝对不能提倡奴隶主义。武遥记得那一群听众听了曲湘川这番话，眼睛里都流出钦佩之意。显然，这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并懂得讲究策略的人。他并不加入同伴跟警察的争论，而是另外开辟一个战场，在外围做群众工作，争取舆论同情。而且他不就事论事，而是用深入浅出的方法高谈阔论，运用常识加上可以使老百姓觉得言谈不凡的哲学党史知识，俘虏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如果那边与警察闹僵了，他就可能把身边听众对他的钦佩转化成一种群众声援和舆论压力。实际上，武遥已经听到群众中有支持学生贴大字报的喊叫，这喊叫者也许就是前一刻刚刚从这个小圈子转入那个大圈子的听众。另一个留下来的记忆，就是在武遥加入交谈并自我介绍了身分之后，

他马上就开列出了交换条件：可以揭下墙上的那张大字报，但必须劳驾武遥带一份进入市委大院。非常地精明！竟好象是在同他讨价还价地做生意。这就是这位“反党集团”头目在武遥记忆中留下的基本印象。坦率地说，武遥对他甚至比对王小燕还要好感，觉得他政治上更成熟，更有哲学分析头脑，更会做群众工作，也更善于妥协。从跟小燕子交谈的情况看，她对这位比她年长四五岁的“调干生”，显然也很有几分钦佩之心；武遥知道，要能够赢得王小燕的钦佩并不是容易之事。回想自己当年在江南大学从事学运的时候，论年龄相仿，论水平还达不到曲湘川这种程度。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第一印象是真实的、可靠的、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本质，而不是象材料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印象是虚假的，欺骗性的，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武遥的第二步是遵循共产党的老传统，决定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兼听则明”的原则，他以所谓“反党集团”的几名骨干分子作为了解重点，对有关成员进行大量访谈。武遥先找了机械系具有一定学术名望的老教授孙趋，被视为“又红又专”业务尖子的中青年讲师刘海南，以及院学生会主席邵敏。这三个人，不仅在年龄上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个不同层次，在政治上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孙趋是解放初期受共产党感召从海外欣然归国服务的专家学者，按党的内部方针，属于利用改造的对象，然而历任院领导对他却十分器重，委以种种名誉性的头衔和实质性的教学科研大权。刘海南代表了党在建国以后所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自己的知识分子，一身兼有业务皎皎者和时代幸运儿的双重特征。邵敏则代表了党按照长远的设想，正在精心加以培养的第二代红专结合的革命接班人。这三个人又同时代表了那个“反党小集团”的对立面。孙趋是这伙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主攻对象，刘海南是“副攻对象”，邵敏则是他们的强烈批评者。

孙趋对曲湘川的评价，是既有赞扬又有惋惜，总的感觉是有关部门把这个“调干生”送错了门。如果把他送进以应用、维修和保养技术为主的什么专科学校深造几年，以他的基础水平和实践经验，很可能成为一个技术革新能手之类的有用之才。可是来这所注重基础研究和和技术设备开发的部属重点大学，他虽然在应用科目方面成绩不错，人也既聪明又肯刻苦用功，基础知识和理论方面的薄弱，却拖了他的后腿。用一句外国人喜欢讲的话作形容，叫作“圆身子的鸭子被塞进了正方形的孔洞里”。对环境无法适应，就导致了对环境的抵触情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双鬓已经带有银丝的老教授在悲天悯人的摇头叹息中，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把这位工人大学生当作“反党分子”来看待。但是他认为，高等学府就是培养国家高等工程科技人材的摇篮，而不是培养工人技术员的地方。培养一百个、半吊子，顶不上一个完整的。现代生产力的提高，光凭大批输送技术员和、半吊子'工程师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主要靠科学技术上的突破，靠国家全力以赴地培养出大批具有这种突破能力的专家与学者。现在虽然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读书第一，但是他还要讲：为了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就要强调发奋读书；是学生，一万年也要发奋读书！对马进，他表示自己教材料力学，对方却教哲学，隔行如隔山，业务上没有关系，个人之间缺少交往，因此就无可置评。提到王小燕，他说他所得到的最深印象，是从校园里的高音广播喇叭里来的。从那总是气势澎湃、充满激情的播音声调中，他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存有过多的旺盛精力，需要寻求出口发泄。“青春反叛期，青春反叛期嘛！”孙趋最后用复述性的排比句式，结束了他对自己“浅识陋见”的表达。

刘海南身任机械系党总支委员之职。他对曲湘川的看法，没有被无产阶级所利用的老一辈专家学者那么宽容：“纯粹就是变态心理！”刘讲师以后起俊彦所特有的锐气和直率，一开口就先定性质，然后阐发：“你想吧，他在工厂时，又是党员，又是工段长，又是先进生产者，又是一群文盲半文盲中的最高知识分子。到了工学院，除了党员，以及领导考虑他的组织能力让他当个团支书之外，他什么都轮不上！在这里要看成绩，看分数，这是硬标准。

其它都是次要的，只能象征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他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他感到心理失衡，使他背上包袱，使他觉得老受歧视和亏待。总之，使他思想上到心理上，都出现巨大的落差。于是，他就需要寻找机会加以弥补，弥补方式就是对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一贯方针，横加挑剔评论；利用前院党委领导赶时髦的心理，加入一批思想激进分子搞什么‘试验班’的闹剧。人家武汉大学带头创办的‘试验班’，就因为出现了不少问题而不得不加以重新审视评价，他却利用他的党员身分，不断向组织施加压力，硬要重复人家已经走过的弯路。试验班几次考试成绩还过得去，不是得益于那种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办学形式，而是当初开班时，除了少量装点门面的调干生，就精选了一批学习底子很扎实的学生。这些学生如果按照正规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接受严格地训练，能够掌握到的知识水平，不知要比成年累月泡在厂里高出多少倍。而为了照顾工农调干生所搞的这种试验班，客观上拉低了大家的水平，实际上对国家很不利。”

对于院马列教研室的马进，因为不在同一个系工作，刘海南表示对其人其事不是很了解。只是耳闻他讲课能力很强，能够谈笑风生地把马列主义理论发挥得津津有味，使本院最容易使学生打盹和逃课的课堂里坐无虚席，个个精神抖擞。但是为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赶超国际科技先进水平，学院里的领导和师生都更重视专业学科。哲学虽然也是一门专业，却是“软专业”，万金油，不管哪个专业的新生第一学年都要来上几十个课时，当然就不可能象理工科专业那么吃香。但是他不甘心，借口要突出政治，让学生多接触实际，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学习马列哲学理论等等之类，老是去院党委提要求，出建议，成为试验班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你只要想一想，一个机械系专业的教学班，却有一名马列教研室的哲学讲师做班主任老师，这样一种红专结合，未免太离谱了吧！然而，刘海南对跟自己属于同一代人的马进所抱的心态和动机，表示理解：“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说不定也会这样做。

这不是要反党，而是要向党特出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对马进的评论，刘海南采取了这种阐述在前、结论在后的表达方法。“至于王小燕嘛，烈士子女，根正苗红。特别优越的政治条件变成了拖累她的包袱，导致了她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致命弱点！希望工作组能够尽力加以帮助挽救，不要使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刘海南当然不知道武遥和王小燕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关系，因此就带有信口开河的成分；而信口开河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种最恰到好处的表达程式。

学生会主席邵敏也是一个女孩，但是与王小燕相对照，就好比一个是文静温柔的月亮，一个是火辣辣的太阳。她长得细眉玉脸，稳重端庄，只有那两瓣薄薄的嘴唇，才会在经验丰富的观相者眼里，暴露出她在文静仪表遮盖掩护之下的能说会道。“我对马老师的认识有待深化，反正一年级上他所

教的哲学课时，我是很受他的迷惑的。从现象到本质，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这就增加了我们认识人和事物的难度。但是至少有一点，我是一开始就抱有疑惑态度的。一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再高，首先必须向党靠拢。按照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坚强的、具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形式，才能成功地得以实现。这条基本的道理我在上中学时就懂得，因此从那时起就积极向党靠拢。”说到这里邵敏顿了一下，似乎在犹豫，是否有必要向武组长汇报，她曾经是一名当时极为罕见的中学生党员。然后觉得这是画蛇添足，就跳跃过已经涌上舌尖的话语，急速地转向下一句疑问：“但是为何马老师就至今仍然不是一个党员呢？如果他真正地信奉马列主义，难道会允许自己一个象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分子那样，一面游离于共产党的大门之外，一面夸夸其谈地大谈马列主义吗？……”

当话题转向曲湘川的时候，邵敏对这位曾经当过自己学生会竞选对手的大年岁同学，抱有更为严重的关注和忧虑：“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变态心理。他考虑问题的层次范围，他的目光视野，他分析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都好象同他的身分不相称。我一直就奇怪，无论他过去作为一个工厂里的工段长，还是现在作为一个系的团总支书记，怎么会对那些有关全局性的大事、那些应该由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并决策的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比如他对院党委重视教育质量和专业水平的做法，对试验班所抱的审慎态度和批评意见，动不动就提高到整个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高度来上纲。他还认为，为了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对全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全面改革。这些重大问题，是对全局情况缺乏确切了解的一个基层党员所应考虑的吗？如果每个中共党员都象他那样，都自搞发明创造，都自以为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我们还要不要党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我们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还是人人都来争当发动机？我觉得：他的关键问题，是有个人野心。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设想、考虑、建议方案，我总觉得不属于我们这些学生干部的职责范围，不是党所安排他要发挥的作用。除非他是专作空想，否则他就必须掌握相应的权力，比如说，至少是我们院党委的权力，他才有可能在我们学院范围推行他那套东西。”

对身为学生会宣传委员的王小燕，因为是她的直属部下，邵敏充分显示出了与她外表相一致的温情：“她是受了蒙蔽，被人挡枪使而已。”

武遥觉得他跟上述三位人士的谈话，大有收获。从谈话中，他不仅对“反党俱乐部”的“三驾马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对谈话对象也取得了第一手的印象和感觉。而这是他请手下人代劳、然后听汇报所无法达到的效果。随后武遥又访谈了其他一些调查研究对象，发觉与上述三位人士的观点相左，在苏南工学院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人，同情和支持内定的“反党集团”，而对孙趋、刘海南和邵敏等抱有很深的成见。

一位出身农村名叫于根宝的学生认为，孙趋对穿着寒酸、一眼就能看出是工农子弟的学生，心底里是蔑视的。对于他们在课堂上的提问，总是抱着爱理不理的态度。在课余时间，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不搭理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考虑到喝过洋墨水的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及其回国服务的爱国心，如果对孙趋的趾高气扬尚能谅解的话，可气的是，刘海南作为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业务尖子，其对待劳动人民子女的恶劣态度，比起他的前辈来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吧，当工农子弟学生在课堂上向孙趋提问时，孙趋习惯的应对方法，就是竖起食指说：“等一等，我讲完这个问题再回答

你”。而结果呢，也许他的记性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把你的提问放在心上，等他把问题讲完，你从来就别想指望他会记起你所提过的问题，和他不久前所作的承诺。而对那些衣着入时、善于社交的上流家庭出身学生的提问，他经常会赞许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或“问得有意思”。然而毫不耽搁地立即给予循循善诱的解释和讲解。如果工农子女提问的对象是刘海南呢，他会老实不客气地对你说：“对不起，先生。这里不是工农速成补习班！”或者反问说：“你提得问题，跟我们此刻所讲的课题有关吗？”于是课堂里就会响起一阵哄堂大笑，可是他却独自板着脸，似乎对讲课被这种不应该有的哄笑所打断，非常地不满意。而作为学生会主席的邵敏，照理应该不论出身高低贫富，代表所有学生的声音和兴趣爱好，为所有同学的利益讲话和提供服务。可是不，学生会组织工农子弟参加不起的旅游、联谊会之类特起劲，而对穷学生对食堂伙食价贵物次的抱怨，从来就置之不理。如果召开座谈会，选派同学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等，工农子女也绝少轮得上份。在苏南工学院，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虽然只占较小的比例，约占30%不到，武遥从这些少数派学生交谈中所得到的意见反映，却是基本一致的。而个别政治上特激进、理想主义色彩特严重的革命后代，以王小燕为杰出代表，加上部分出身城市中下层、家境与工农子女所去不远的的学生，以及少数受到孙趋、刘海南等压制排斥的青年教师，对上述意见反映，也抱有程度不等的同感和支持；对上述三位处于优势地位的典型人物，存在着普遍的反感或不满。

有位名叫刑冠智的青年教师忿忿地说，那位孙趋简直是一名学阀。在他手里安排的科研题目和经费，一概被他的得意门生（例如刘海南就是其中一位）所霸占。只要是他手下人申请的项目，哪怕毫无实际价值，总是能够得到他所安排的经费支持和扶助；如果出了成果，他就能以祖师爷的身分，自然而然地分享一份荣誉；甚至在双方达成幕后交易条件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在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上签他的名字。而对那些不属于自己“近亲繁殖”系统出身的学院同仁，在申请科研项目 and 经费上，则加以百般刁难阻挠，甚至依仗系领导和院领导的支持，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加以压制排斥。刑冠智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牺牲品。他和刘海南同是教授材料力学的。但是因为他是从外校调入工学院的，而刘海南是孙趋一手培带出来的博士生和留校生，就因为两人学术观点不合，并且在业务上形成互相竞争的势态，结果他就被迫改行转教理论力学，系党总支书记为此还搬用了一大套“革命螺丝钉”的理论。而孙趋既然还到他的面前，对他的被迫改行表示假惺惺的同情和惋惜。他惯会杀人不见血，而不象他的弟子那样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尽管，刑冠智不否认孙趋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条件报效祖国的爱国心，他对曲湘川王小燕等对孙趋所作的批判却拍手叫好，因为“孙趋是按照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和由此形成的世界观，来实行他的‘爱国’理念的。如果社会主义的大学听任他那一套泛滥成灾，就跟解放前的大学不会有什么大区别。而这些年来，孙趋成了院党委眼里的大红人，看不惯他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排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支持工学院被资产阶级专了政的观点”。

听了刑冠智对孙趋的这些评论，特别是“杀人不见血”的说法，武遥不由回想起孙趋对曲湘川所作的评价。初听上去，他既不象刘海南那样毫不客气地把曲湘川斥之为“心理变态”，也不同意邵敏那样把曲湘川说成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危险分子，而是为他惋惜，慷慨地给予某些赞扬甚至辩护。然

而就那么轻轻的一句话：“有关部门把这个”调干生“送错了门，”就对曲湘川的大学生资格，从根本上判处了难以驳回的死刑。而正因为这种判处间杂有种种称赞和同情惋惜，就比那种难免给人以夸大色彩和情绪倾向的“心理变态”、“有野心”之类，显得客观、中肯和公允，因而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这是否就是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双重特性：爱国，却不爱那些在他们眼里低贱一等的人？如果确实如此，对于由此所引起的心理仇视和报复行动，他们是否应该表现得毫无思想准备和满腹委屈呢？从另一方面看，在批判“读书第一”已成主流声音的情况下，孙趋那种仍然坚持和表达自己观点的直率大胆，却又使武遥看到了旧知识分子圆滑之外另一面所具有的耿直和固执。武遥同时也清楚，孙趋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在党内中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那些具有较为广阔视野的知识型中高层领导中，有着广泛的市场。从中央，到省委，到院党委主要领导华得钧，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除了说法和用词不同外，其主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也许，孙趋看到他那种学者型的外表，把他也归入了同一类的干部阵营，因此在一对一交谈的时候，仍然大放厥词，似乎是要借机发泄他近来所受批判指责的牢骚怨气。武遥不难理解这类立场想法的合理内核，觉得孙趋所作的主观归类并不错到哪里去。但是，武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层含意。他与党内那一类主抓基层实际工作、知识层次不怎么高、思想视野不怎么宽、更关注短期实效的中低层干部，同样颇多接触和了解。对如今分配到基层工矿企业去的大学毕业生，从这一类干部口中听到最多的抱怨是：不实用，动手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差，而且还常常因为自己书读得多而瞧不起基层的工人群众和领导。“你书读得再多，在实际生产中派不上用场，又有什么用？”这是武遥在一家大机械工厂作情况调查时，厂长对面对老出故障的东欧进口机床一筹莫展的大学毕业生，所作的典型抱怨。他知道，这种抱怨对于那个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在大学里所学习的东西，是按培养具有尖端科技突破能力人才的要求所设置的，怎么可以期待他能手到病除地解决那类在大部分情况下，主要靠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呢？也许正因为这类抱怨多了，并且层层上达，必然也会影响到党内一部分更高层次领导的思想看法，例如俞市长，还有那位支持试验班的原院党委书记等，最终就归结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他就有了系列批评现存教育制度的讲话。他老人家所支持的武汉大学的那个“半工半读试验班”，也就应运而生了。从这种班里出来的学生，在解决实际生产难题和动手能力方面，以及在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方面，无疑会对解除上述那类基层企业领导的不满极具功效。如果我国的整个高教系统都以此为指针，全面转向，基层的生产效率暂时间肯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问题是，谁来搞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突破？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修正主义国家，如果为了照顾基层的普遍需要而放弃提高方面的全力投入，后者所造成的损失，与弥补前者所得到的收益相比，不知要大过多少倍！而培养科技尖子，是必需通过一定量的教育培养面来加以保证的，没有大批的“矮子”作选择面，上哪里百里挑一地“拔长子”呢？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能够从全面扎实基础理论训练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进不了科学院而必须进基层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当初培养重点和指导思想上与基层生产需要相脱节，就往往会受到学难致用的责难和抱怨。这样一种两难选择的局面，这样一种由于党内工作分工和知识涵养差别所造成的不同侧重点，竟然会变成文革中划分无产阶级革命

教育路线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评判标准，并且在他掌管的苏工文革运动中，成为一个使他倍感困扰的矛盾焦点，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搬用革命方式来解决这一分歧和矛盾，是否就是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法呢？这是武遥内心向谁也不敢透露的疑问。他想：如果能以某种形式，使那些有可能成为尖子的佼佼者在不影响其专业深造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其接触了解社会基层生活和实际需要，避免走与苏联完全类同的成名成家路线；如果那些主张“专家治厂”、“专家治国”路线的领导同志，对担心可能产生新精神贵族的另一部分党内意见比较重视；而这一部分党内意见的持有者，也能够明了培养科技尖子的紧迫意义和必须要付的代价，是否可以在两条教育路线的尖锐分歧方面，取得某种兼顾双方观点的中间立场呢？从武遥这种深藏在心头的想法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在党内两派意见分歧中，并不简单地归属于哪一派。也许，骑墙派、折衷派这类的帽子，更适合于他。当然，他是断然不会同意接受这类帽子的。作为主抓一个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工作的市委付书记，他会毫不犹豫地宣称，他从来就是毫不动摇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在很多情况下，至少在他的主观愿望上，他也许可以当之无愧地这样说。仅仅在教育路线这一问题上，似乎是一个小小的例外。谁叫他既是一个知识型的领导干部，又是一个与非知识型干部有着广泛接触联系的领导呢？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苦恼，又是一种骄傲。就类似一只蝙蝠，有时为自己既不属于老鼠又不属于麻雀所懊丧；有时，也许为自己能得天独厚地同时体验到老鼠和麻雀的感受而沾沾自喜。其实，他是否除了在教育路线问题之外，从来就毫不动摇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点也是可以存疑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发展，才能给他下定论。

从总体上说，这段时间在苏南工学院所作的调查研究，使武遥不仅感受到了教育路线方面的争论，而且清晰地感受到比表面教育路线之争更隐蔽、比预想更深刻的社会鸿沟。这使他心情有些沉重；但是也有使他感到宽慰的地方。因为这一切，都并没有能够改变武遥从听王小燕情况反映中和从读大字报所得来的基本印象；他无法认可那个“反党集团”的确凿性和客观可靠性。做科技研究的人没有找到新发现，会感到扫兴。可是对此时此刻的武遥来讲，没有新发现却使他松了一口气。在这一点上，这位年龄不大的老布尔什维克，显然也受了中国传统人情世故的影响。看到自己已故老战友的后代只是陷入一个虚有其名的“反党小集团”，心里就感到宽舒，而没有想到这等于是损失了一大战果，丧失了教育人民生活阶级斗争的最佳事例，浪费了动员革命群众布下天罗地网的时间、精力和心血，破坏了“引蛇出洞”的精巧构思。更重要的是，兵临城下，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说这是竹牛木马，是一个早就使人听得耳朵生茧长膜的“狼来了”的故事，从而导致磨掌擦拳的革命勇士颓然丧志，懊恼之间产生一种被愚弄和嬉玩的情绪；如此以往，兵无斗志，日后真有豺狼成群，攻城略池，就会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后果就不堪设想！而最关键之处，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直指院党委的声声叫嚣，与豺狼虎豹之声在本质上分明没有区别。如果肯定这是“虚有其名”的反党活动，那就等于是鼓励大家都来向党进攻，中国共产党苏南工学院委员会在锡城市市文革办公室武主任所率工作组的英明领导下，就只能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绅士态度。照此办理，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历史使命，尚未全面展开，就已匆匆结束；革命半途而废，同志们无须努力。所有这一切含义和后果，姓武名遥的新任市委副书记竟然熟视

无睹，置若罔闻，异想天开地要在势不两立的东风和西风中间，搞修正主义嫌疑很重的折衷调和。他似乎对发现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大学里存在一条社会鸿沟，比发现苏南工学院存在一个反党小集团的可能更为惊恐。毛主席讲愚公移山，他却好象要搞武遥填沟，同曲湘川相似，也热衷于个人的发明创造。

武遥首先把调和点放在向党猖狂进攻的王小燕一方，三番五次找王小燕，要他们把大字报中充分暴露其与党为敌的火药味去掉，把“嚯嚯”磨刀的声音放低一点，然后倒过来动员说服革命的同志：这些年轻的反党分子不过是在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的时候，对党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热诚可嘉，其革命积极性应该充分加以保护。对于他们的政治幼稚和错误，我们应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云云。你说，那些同样具有长期革命经历、并具备同等革命资格和级别的革命领导，会按着他所拨动的如意算盘转吗？

这，就是对武遥目前处境的确切描绘和真实写照。桀傲不驯的王小燕固然使他头痛，来自强大革命阵营一方的抵制对抗，更使武遥感到束手无策。他手下工作组的副组长任旭东，是驻军某部的一名师政委。论级别与他同级，论关系，任旭东跟市委书记陆波更相熟，同他以前却素无交往。因此武遥发觉在好多问题上，任旭东并不听从他的意见和领导，相反却跟院党委书记华得钧靠在一起，对他形成夹攻之势。对华得钧，他也不能怎么样。因为对方跟自己也是平级，组织人事上又隶属于轻工业部管。他和任旭东毕竟都是正职，而自己在市委却暂时还是一个副书记。所有这些，都使他觉得工作组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吃力。任旭东和华得钧不止一次在内部交换意见时，婉转地向他暗示，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同时，他发觉在这段时期中，院党委和任旭东等跟邵敏刘海南为首的一批师生接触十分频繁。苏南工学院的上空，雾积云堆，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第七章 “反干扰”

这几天，他回市委开常委会。会议上，陆书记在谈到对文革的领导问题时，也不指名地提到了领导思想“右倾”的危险。散会后，俞市长有意延迟他的动作，使他与最后离开市委小会议厅的武遥有了搭口的机会：“老武，来锡城市后，还没有机会相聚过。怎么样？一起上我家吃晚饭吧，饭后咱俩可以好好聊一聊。”武遥略一犹豫，觉得应允又不好，不应允也不好。革命同志之间，串串门，聚聚会，本来是很正常的，更何况是市常委“一个班”里同班战友呢？可是，他顾忌到俞市长与陆波之间的矛盾。而这两位第一第二把手按照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又正好门对门相邻地独占隔壁的那个院子，而自己则和另外三个常委同住一个院子，其余四个常委则合住另一个院子。搬进东巷后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串门。既然听说市常委里有矛盾，最明智的态度，是不要搅和进去。而与其他常委一串门，就说不清，不沾边也会被看成是沾边的。即使采取“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去每个常委家都串一下门，精确计算和控制好在每家停留的时间和对每一位同班战友拜访的频率，一碗

水端平，也仍然惹嫌疑：这么地热衷于串门访友，联络感情，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接班上马？因此，不要说去隔壁那家双人院，就是在自己所住的四人院里，他也是绝对地做到足不涉他人户，相互碰见了，宁可学那些在赶路时刻不期相遇的市井百姓一样，彼此面对面地站定，各自背靠自己家的大门，然后就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上一阵子，以示相互认识并遵守待人的规范礼貌，如此而已。更不要说红杏出墙，跨越院门的限制蹿到俞市长府上作国事访问。由于俞市长和陆书记是一衣带“树”、唇齿相依的紧密邻邦，这种访问被陆书记或陆书记家属察觉的机率可以用天文数字作估算，由此所造成的动机和效果，不用别人来怀疑，武遥自己都会首先发生疑问。据武遥自己近期的革命知识和经历，这种现象也并非锡城市东巷所独有；在别地方好多类似性质和级别的院子里，也都呈现出这样一派“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光。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在十七年以前还是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同志关系，为何一下子会变成目前这样的格局呢？武遥有时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有时又会觉得这种现象很反常，于是就在脑子里，向自己提出这种带有某些神经质味道的疑问来。而今天，俞市长似乎也突然觉得这种风气不对头，勇敢无畏地向他发邀请，很有一点要与这种不正之风斗一斗的架势。武遥思想开始动摇了：是有点不正常。本来不在一起工作，还经常聚会交谈，如今做了同事，反而避之尤恐不及，把同志与病毒和瘟神之类相等同，今后无论在什么场合下，再彼此相称同志都应该感到脸红。

俞市长虽然不是政工干部，是抓经济建设的，其政治敏感度一点不比在政工系统工作多年的武遥同志差。对于武遥同志在一瞬间犹豫中所经历的长距离思想搏斗，洞若观火。于是就用暗示来表白，他并不想当反潮流的英雄：“陆书记今天一家都走亲访友去了。早晨出门前，我还听到他爱人在门口喊，下班后要他直接去妻舅家参加生日晚会。客人都要等齐了他才开宴。”武遥被俞市长不露声色地点破心机，心中难免感到几分惭愧。但是为这类惭愧是不需要把脸红起来的，脸红也没有用，愉快地接受风险率一下从天文数字几乎降低到零的邀请，是打败惭愧的最佳武器。

进了那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双人院，果然发现对门的一幢别墅楼里黑洞洞的，显出一副杳无人迹的空旷和寂静。进了俞市长那个灯火通明的家，才发觉这幢外表和其它两个院的小楼相类似的居所，其内在质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底层地面不再是光滑的磨矾石上加地毯，而是很精致的柚木拼缝地板。然后是皮肤感觉上的差异，空调装置所放出的丝丝清凉之气，使武遥从酷热暑夏，一下重新回到了舒适的春天。由于这人工制造的春天，这客厅柚木地板上覆盖的厚重地毯，就不需要象自己家上上下下居所的地毯，按喜欢有凉快感觉的杨玲的动议，在一个星期天，用汗流浹背的代价把它们卷起来，统统塞入地下室。除此之外，其它方面的装饰、摆设、格调，都是和其它常委楼的规格模式大同小异的。可见与“一班人”成员的居住条件相比较，班长副班长所搞得特殊化，不，应该说，有关部门强加给他们的特殊化，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考虑到年龄和体质上的因素，谁叫他俩是“一班人”中年龄最大的长辈呢？特别是老陆，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症，一身豪气，持续不断地被疾病所磨损消耗。他抱着“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革命精神和毅力，带病坚持工作。在上级领导关心他身体情况而派出武遥作为革命后来人之后，他与疾病作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干劲冲天地高涨。人人都说江南好春光，可惜江南的春光好而不长，一年四季中，盛夏寒冬几乎要占据了3

60多天中的大一半，年老体弱的人，就常常经受严寒酷暑的折磨和严峻考验。

当然也有个别人可以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机动灵活战术，来对付大自然的作对挑衅。按这两年形成的习惯，也就是自六四年初始，省委在他与俞市长的意见分歧方面，老对他陆波作更多的批评，使他对恶劣气候条件的抗衡能力大打折扣。因此当梅雨季节降临时，心脏部位对阴雨连绵造成的低气压特别不适应的陆书记，就不得不逃往不受梅雨天气影响的地方去躲避。紧接着追踪而来的是盛夏，老陆更不能用已经老弱病残的革命本钱跟酷暑硬打硬拼，秦皇岛、大连港等处，就成为他与天奋斗的临时革命根据地。从十二月份到春节前，陆波同志就呆在温暖如春的昆明或广州，一边遥控指挥锡城市的革命生产，一边轻蔑地嘲笑老天用阴冷湿冬对付锡城市父老乡亲的手段，对他却不管用。然而，遥控指挥总是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双人院别墅楼中装置空调的起因，可能就是想改变老陆在同老天打仗中老是东躲西藏的被动局面。可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可以轻快地随身携带随时调节周边气温的空调设备还没有问世，陆波同志作为市委书记的活动半径又是如此之大，一年中躲躲藏藏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这一年夏天，也许被文化大革命的热潮所鼓动和感染，也许要为省委派下来的接班人树立光辉榜样，陆书记决心与老天爷真刀实枪地打一场阵地战。他不再去秦皇岛，也不再去大连港，总之，不再打着“敌进我退”的旗号实行流寇主义路线。他从省委书记派遣武遥同志来锡城市协助他工作的谈话中，明确了自己应该采取的积极态度。他一方面对新来的武遥同志委以重任，另一方面担心他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不了解情况，所以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应该从事的头等大事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为武遥选派最强最可信得过的恭鹏志作其助手，一面不断地在幕后听取汇报和进行指点。下次再见吧，秦皇岛！下次一定来看你，大连港。锡城市的工作脱不开身，锡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离不开他。他留得及时，留得正确，因为他已经发现武遥同志在指挥锡城地区文革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在这一天的常委会上，他用很有分寸的语言，向武遥同志作出了警告。然后他信守向自己老婆子作出的承诺，去妻舅家参加生日晚宴。

俞市长虽然跟陆书记在工作配合上有矛盾，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他还是愿意尽其所能作好这种配合工作的。今晚就是一个明证。他担心武遥对陆书记的警告没有领会，或者掉以轻心，就既不等待第一把手的明确吩咐，更不作宣扬声张，就趁陆书记不在同一个院子的当口，主动积极地把武遥同志请到家里，帮助他提高思想认识。但是，他首先谈一些又算是题内、又算是题外的话。因为这跟当前文革有关但是又跟陆书记在常委会的发言无关。他劝武遥作为市文革办公室的正主任，要关注全市的运动情况，特别是对惠湖中学的情况，更应该多加关心。把事情都交给文革办副主任恭鹏志办，是没有尽到领导责任的表现。

因为他的儿子俞彦也在那所中学读书，俞市长对那所中学的情况就相当了解，也比较关注。

听说有人把学校的教育成果都否定了，还要揪“四家店”的黑后台，俞市长就感到由衷不安，不得不向武遥请教，问他知道不知道这“四家店”的含义和来历。武遥疑惑惑地回答说，好象听杨玲讲起过。俞市长闻言点点头，不提“坚决揪出‘四家店’的黑后台”的大幅标语正好盖在刻有他亲笔题词“百尺竿头、更上一丈”石碑上的细节，却发人深省地提问道：“这把火到底要

烧到什么地方去？”他还提醒武遥，据他所知，他夫人眼下在学校里的处境有些不大妙，劝武遥既要管大学里的和远处的事情，也要管中学里的和身边的事情。对惠湖中学的董校长，他是了解的。这么富有革命责任性的同志也要作文革对象，恐怕今后就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校长了！见武遥虽然不吭声，但是皱着眉头显然在认真思索他的忠告，他就并不打破砂锅，而是点到为止，话题一转，回到今天常委会所涉及的正题上。他提醒武遥在苏南工学院要认清自己所处的复杂形势和环境，审时度势，稳扎稳打。还告诉他，幸好有陆书记在背后把关掌舵，工学院党委和工作组也经常有人主动向老陆作汇报反映，相信出不了大的岔子；但是要注意协调，防止牙齿和舌头打架。然后，他询问武遥目前对那所大学里的运动情况是怎么估价的。作为市委主抓工业生产的领导，他特别不希望看到，因为稳不住全市这所唯一高等学府的几千名大学生，而连锁性地冲击工厂企业。因为他听说，在外地已经有大学生去工厂煽风点火搞串连的情况。

武遥对工学院的情况，心里正憋着一大堆话。但是要不是俞市长此刻的提醒，他压根就不知道陆书记也在插手那里的事务。早知如此，他就应该跟陆书记好好通一下气，以免真的使牙齿同舌头打起架来。这段时间来，他看到校园里两股对立的力量，都一个劲儿地朝着激烈对抗的方向运动，双方都以为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都采用同样的单一武断的肯定和否定态度对待自身和对方。眼看着那条被文革轰轰烈烈的表面现象所遮掩的社会鸿沟，在人为因素下进一步加深扩大，武遥深以为忧。如果上升到理论来认识，这种鸿沟也许是集中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间的矛盾。消除这些矛盾无疑必须假以时日。但是，以什么方式加以消除？是以暂时扩大矛盾的做法来最终消除这一矛盾，还是从现在就做起，想方设法缩小有关差别、尽力缓解这些矛盾？武遥知道对这两种立场，党内是有明显不同观点的。面对世界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形势，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和某些中国领导人，竭力主张“专家治国”、“专家治厂”和“专家治校”的路线，而毛主席则显然对体现群众路线的《鞍钢宪法》、干部及学校师生定期参加劳动和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人民公社化等，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和执着。武遥过去总以为，这不过是中央高层领导在看法和做法上的一般性分歧，因此并不认为这种分歧有什么重大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含义。但是自从毛主席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然后是城乡四清多革命形势相比，都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我们就应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任何事情都要问过为什么，绝对不能盲从，绝对不能提倡奴隶主义。

第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她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的以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这里，我们的英明领袖毛主席十分清楚地告诫我们：中国革命当前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是那些已经混进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组织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已经窃取了一部分党委的领导权力。试问，如果反对党委就是反党，那么，不就意味着：这些窃据了党委权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了吗？革命的人们就一点都不应该去戳动他们了吗？如果

这伙人也能代表党的领导，我们的党，不就是变成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党和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了吗？

第三，毛主席党中央和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尖锐斗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一旦党的某一级组织领导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所把持，这一级党委就会变成“一针也插不进，一水也滴不进”的独立王国。如果反对这样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就是反党，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类反党分子认错，让他们重新上台来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呢？把持这类独立王国的大小阎王们，总是宣称自己是党的当然代表。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借用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对革命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动专制。对于这些批着党组织领导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胡作非为，我们了解得太清楚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利益，什么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都是不存在的，都必须首先以他们个人的喜怒好恶决定取舍。只要有人敢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给你加上种种帽子，直到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我们在此要明确地宣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不吃这一套！我们坚决响应《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中所提出的战斗号召，明确指出：只要谁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坚决地与之作斗争，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革命人民既然已经把旧北京市委和旧北大党委那些所谓的“党的当然代表”拉下了马，彭真、陆平之流在全国各地的同伙们，也就同样逃脱不了他们最终覆灭的下场！

苏南工学院华得钧及其追随者们，你们对于上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和人民所采取的革命行动，是怎么看、怎么想的呢？你们以为凭借手中所把持的权力，就想一手遮天、把工学院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吗？老实告诉你们，在已经觉悟的工学院广大革命师生面前，这只是痴心妄想！这些年来，你们贯彻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遗余力，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立场的反动学术权威，关怀备至，言听计从；而对工农出身的学生和富有革命精神的青年教师，则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排斥和打击。明明是广大人民群众用血汗供养负担我们的学校，而学校所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新精神贵族，却极端地蔑视广大人民群众，以历史支配者和统治者自居。你们极端仇视、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百般挑剔，千方百计扼杀半工半读试验班。你们对自己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不仅不向全院革命师生作出认真的自我检讨和反省，反而在市委工作组个别别人的支持、包庇和纵容下，变本加厉地向革命人民反扑，大造反对院党委就是反党的黑舆论，大整革命师生的黑材料。我们在此要严正警告你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光靠市委工作组个别领导人的撑腰打气保不了你们，工作组人员在工学院的所言所动，是推动还是阻碍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和发展，同样要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检验和孙悟空金睛火眼的监视。

最后，我们要衷心奉劝工作组的任旭东同志，好好学习一下《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的下列一段话：

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鄙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氓，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

人心中醉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恨，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

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不信邪，不信鬼，不怕压，勇敢无畏地造了披着校长老虎皮的黑帮分子匡亚明的反。《人民日报》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中，为此拍手叫好。我们也敬请任旭东同志对照自己的言行，读一下社论中的这一段话："这些家伙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

如果你们听从党中央的声音，坚决地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就应该立即转变立场，站到革命师生一边来。我们曾经怀着十分热烈和兴奋的心情，欢迎你们来我院推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并对你们抱有无限的希望和期待！如果你们反其道而行之，以"救世主"和"保姆"自居，把革命师生当作群氓阿斗，指手划脚，设置革命障碍，或者甚至与华得钧同流合污，敌视革命群众运动，你们自己就会走向革命的反面。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敬请悬崖勒马！

机械系、粮工系、纺织系部分革命师生

1966年6月24日

.....下面再播送一边，....."

金黄色的夕阳，终于在西天坠落。在曾经给它照耀过一天的校园中，直到依依别离前的最后一刻时间，发生了那么多的情况。意料或意外的，发人深省的或令人费解的，夕阳似乎也感到困惑，而且好象带有一种莫名的骚扰、激动、紧张、不安，难以释怀和放心，甚至有点惊讶和震恐，于是就在离别前，在身后留下一片外表不动声色的暗红色晚霞，陪伴人们冥冥苦思、期待和分析总结，以便明晨在东天恭候她返回的时候，作出一个至少可以应付门面的汇报。而此时此刻，王小燕激昂的声音，还在校园的上空回荡。那些被喇叭声音打断骑自行车回家进程的人，重新上车启动脚柄。而呆在大饭厅、大操场或学生宿舍里的那些年轻人，已经开始了热烈的争辩讨论。不管是回家的，还是以校为家的，所有人的心情，和夕阳晚霞并无多大区别。人们感到思想和心灵被骚动、紧张、不安、困惑所纷扰，这些纷扰所归结的中心点，却是莫名的惊讶和隐约的震恐！他们对"小喇叭"等一批"无畏闯将"从六月初起就把批判矛头指向院领导的举动，屏息静气拭目以待的心情尚未得到舒缓，忽然间，又响起了公然向市委工作组隆隆开炮的声音，本来手心里就攥着一把汗的，那凉凉的汗水，好象已经窜上了背心。原先就有些忿忿不平者，此刻竟有些"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感觉。

什么胡说八道，这分明是在放毒！打着红旗反红旗！

人开始大声抗议。

学生会广播站那些人是怎么搞的？竟然让坏人利用党的宣传工具进行反党宣传！

一个更为粗壮的喉咙起而响应。

那悬在头顶的高音喇叭，还真有一点心灵神会的灵性，"小喇叭"的猖狂叫嚣，突然被打断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阵子刺耳的机子锐叫声，显然是

有人在重新调整音量。然后，响起了一个比较柔和但显得更为响亮的声音：“同学们，老师们，我是邵敏。刚才在我们学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已经被学生会撤消播音员职位的王小燕带几个人擅自闯进播音室，占据了话筒，宣读了一篇打着文化大革命招牌向党公开宣战的反革命宣言书！他们不仅反对院党委，而且公然把矛头指向了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我们从这篇反党宣言中，闻到了布拉格之春的火药气味！听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猖狂叫嚣声！我们必须从现在起，紧急动员起来，坚决保卫校党委！坚决保卫工作组！决不允许一小撮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水搞混，扰乱革命的阵线，把工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歧路！请各系团总支的干部，听到广播后，立即带领同学们来广播室。他们那伙人还在这里闹，还想抢夺我手里的话筒！我们这里现在只有十几个同学，他们用血肉之躯组成了人墙，但是这人墙随时会被冲破，情况十分紧急！请你们赶快到广播室来！请你们赶快到广播室来……”

人们骇然，震惊。学生会主席邵敏的声音，是显得那么气急败坏，她在向同学们发出紧急呼救！刚才还一本正经做出冥冥苦思状的晚霞，在这一突然事件的惊吓之下，一下逃遁得无影无踪。苏南工学院内刚才还染着微熏霞光的林荫道，以及被霞光映照的林荫道西侧的大操场，一下都堕入了一片使人惶恐不安的沉沉黑暗之中。林荫道上响起了“咚咚咚”或“啪啦啪啦”的脚步奔走声，“咚咚咚”的是球鞋，“啪啦啪啦”的是拖鞋，其间还夹带着嘈杂的急促交谈声，先行者对滞后者大呼小喊的叫唤声。在靠近大饭厅的那幢宿舍楼，甚至有人吹响起了哨子声。尖利的哨音划破夜空，和林荫道上的混乱纷杂的人声脚步相汇合，使在黑暗降临之前刚刚在树丛中找到栖息之所的麻雀，惊恐万状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扑楞楞”地扇动起翅膀，漫无目标地向黑暗的夜空中四处逃遁，更使苏南工学院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增添了一种紧张、慌乱和惊恐的气氛。

那幢设有广播站的三层圆顶小洋楼，已经被黑压压的人头团团围住。楼前阳台顶上雪亮的照明灯，和周围一圈高支光的路灯交相辉映，给人一种灯火通明、照耀尤如白昼的感觉。

头发和衣襟都显得有些凌乱的王小燕，被人簇拥着，推搡着，终于在二楼半圆形的阳台边缘站定了身子，阳台边上涂着墨绿油漆的铁栏杆，给她提供了两手可以抓住的依托。她穿着白底红点的衬衫，衬衫衣领下的第二个纽扣，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使她的胸襟敞开了过多的面积，在强烈灯光的照射之下泛着肌肤的白亮。然而，处于高度亢奋、激动和愤慨中的“小喇叭”，却并没有自我意识到她这种狼狈不堪的模样。

在获悉下午所贴的那张大字报被人覆盖之后，王小燕打听到晚上在播音室值班的，正好是同情自己思想观点的同学蔚然。蔚然对因为她持有不同观点就不让上广播台的做法，曾公开表示过不满。吃晚饭前，王小燕找曲湘川和邢冠智谈了她的独特想法。曲湘川觉得最好跟马老师商量一下。按照他的分析，今天上午任旭东所作的是政治表态，并不一定完全能代表武遥的看法。他这样想，一是依据武遥平时对他以及与他观点相同的人所抱的态度，觉得他并不象院党委和工作组的某些人明显敌视。二是任旭东表态的时机，正好选择武遥去市里开会的当口。如果突然闯入广播站宣读那篇文章，估计事情会闹大。而在没有与武遥接触沟通的情况下，事态一旦闹大，作为工作组主要领导的武遥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就很难讲。“但是我们不能把命运都

押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哟！”王小燕焦灼地说：“既然任旭东表了这个态，他一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如果我们不积极抗争，在同学老师中争取广泛的支持同情，下一步就会动手开刀。”王小燕见曲湘川还是沉吟不语，真的急了：“你看你是怎么啦，这其实还不是按你在乡下时建议的那种策略，从新做一次嘛！只是这一次的所针对的和指靠的对象不同，我们也许要靠省委，华东局，甚至党中央，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是这必须先把事情闹大了，上面才会说话么！”听了这席话，邢冠智也点头以为有理。“那篇文章贴出去以前，你给马老师看过吗？”曲湘川又提出一个问题。“我吃中饭时找他，没找见。

反正其中好多观点，是上午和他一起商量过的，他不会不同意。而且我也没有签马列教研室的名。马上一广播，他立即就会知道嘛。”王小燕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邢冠智摆出成年人的智慧和成熟：“这件事闹起来有一定风险，我看不让马老师掺杂也许反而更有利！不要一下子全出场，都困在一条船上。”“对，”王小燕好象受了启示，立即接口说：“晚上广播站的事曲湘川你也不要出面，保存实力。等武遥回来，如果他站在工作组立场上唱白面，你也可以代表我们唱白面。”曲湘川同意了邢冠智的意见，对王小燕的建议却不置可否。然而嘱咐晚上去广播站时多带几个同学，以防不测。王小燕不以为然：“我们又不去跟人打架，人多为王。”曲湘川这时摆出大哥哥的姿态，摇了摇头，开导说：“你想，喇叭声一响，那邵敏会坐视不管吗？”

到底姜是老的辣，曲湘川没有比她白多活五年。当王小燕把那篇文章播读第三遍的时候，广播站的门“砰”地一声被撞开了，邵敏脸色青白，带着十多名同学闯进来，把小小的广播室占得挤挤满满。还没有待王小燕和她的三名同学回过神来，她的身子就被几只有力的胳膊扯离广播扩音器，三名同学也被推挤到门口。当听到邵敏对着刚才一刻还在她掌握之中的话筒，对她和同伴所进行的一连串的诽谤污蔑，她就象一只发狂的小鹰，扑开翅膀向话筒前重新撞过去。但是她被十多名男同学所组成的人墙无情地挡回了原地。她似乎忘了：她在刚才的广播里，也使用了诸多刺激性的语言，对对方同样进行了一连串的诽谤污蔑。她只想着这个平时装的彬彬有礼的学生会主席，此刻竟会变得那么强暴，那么无耻！他们明明已经在人数上占了绝对的多数，却还造谣煽动更多的人来广播站横施强暴。直到这时候，她才突然感觉到，自己和身边的几位同学是显得多么势单力薄，孤立无助。她多么希望，曲湘川此刻会带着一帮同学赶到自己身边，他那不高不矮、显得十分壮实的身体，加上他那双粗壮的双臂，即使就那么遥遥地瞥上一眼，就会使她心里感到踏实，安全，充满力量和信心。王小燕不相信心灵感应之类的胡诌；即使真有心灵感应，她觉得也并不会发生在她和曲湘川之间，因为他俩之间迄今为止，并不存在发生所谓心灵感应所凭借的某种亲密关系，因此曲湘川就无法收听到她此时心中的声声呼唤。这时候，楼梯上响起了许多“蹬蹬蹬”的脚步声，这说明邵主席的紧急求救呼吁，已经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当她带领首批随从冲上楼来的时候，她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对手驱逐到墙壁角落。当她来了大批援兵，就简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王小燕掷出窗口了！邵敏转过头来，顿住了对话筒所作的战斗动员；显然，她也已经听到了自己队伍向楼上挺进的脚步声，刚才还显得气急败坏的鹅脸蛋上，竟然浮起了一丝笑容。那笑容，可以被认作是对王小燕的轻蔑嘲笑，也可以被看作是在败将面前，胜利者所显示的一种矜持的微笑。然而，这笑容涤忽即逝，白胖脸蛋上圆柔的弧线随

即变得僵直。

首先奔上楼来的，竟是对手的援军，以曲湘川打头，浩浩荡荡地跟着十几号人。王小燕此刻心里，兴奋得象一面被鼓槌急促敲打的腰鼓，脸上闪闪发光的红晕，一定会使所有注意打量她的眼睛，觉得她这一刹那变得出奇地美丽。然而，楼梯上奔突的脚步声连续不断，她未免高兴得太早了。紧追着曲湘川的脚跟冲上楼来的，全是院党委所信托依靠的骨干分子，而且人数大大超过曲湘川带来的援军。邵敏脸上僵直的线条，重新恢复灵巧的跳动：“把他们隔离包围起来，分头处理。”她对大批涌到的支援部队发出命令。于是，王小燕，曲湘川，以及他们所有的同伴，立即被继续不断蜂涌而至的大队人马团团围住，成了被小楼走廊上滚滚人流所隔绝的一个个孤岛。王小燕被这股洪流推着，卷着，一片人头攒动之中，也看不到曲湘川在哪里，蔚然在哪里，还有其他的十几个同学在哪里。然后，她被人推搡到二楼的那个大阳台上，终于倚着阳台的栏杆站定。面对阳台顶端丝丝扑面而来的清凉微风，刚才围困在人堆里那种把她挤逼得几乎窒息的体酸汗臭味道，已悄然隐退。她的头脑被夜风一吹，也变得稍外镇定起来。她放眼四望，阳台下面的坪地上，一自延伸到东西两条林荫大道的转弯口，都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在这些人的中间，有好多熟悉的脸孔，有好多同情的眼神，还有象蜂鸣状一般“嗡嗡”无法确切辨别的交谈和意见争论。终于有更高亢更洪亮的嗓门奇峰突起：

叫她低头，低头！昂着脖子，倒还象做了英雄似的！

义愤。

凭什么叫人家低头？她又不是黑帮分子！

者，而且取得了一片应和的声音。

冲击广播站，宣读反动文章，比黑帮还要黑！不要说低头，砍头的资格也差不多了！”还是先前那个义愤填膺的嗓门。

这广播站是学生会的，不是邵敏的私人财产！每个同学的都应该有一份使用的权利。”

反动文章？扣大帽子容易，要使人信服，得靠摆事实、讲道理。

是啊，为什么把人家贴得大字报覆盖掉？香花毒草，让大家辨别么！

……………

也许是支持院党委和学生会领导的骨干群众，挤挤塞塞地主要占据在小楼里面，站在阳台下四周的人七嘴八舌，同情和倾向反叛者的声音似乎占了上风。

同学们，同志们，的手提喇叭，就站在那个已经变得有点名不符实的“小喇叭”的身边。她的手里拿着两张纸。那纸，就是王小燕方才播送的稿子；在混乱中，王小燕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或是怎么落到邵敏的手里的。只见她举手扬了扬那两张纸，对着小喇叭喊道：“不是有人主张要摆事实、讲道理吗？那就让我们来摆一摆事实、讲一讲道理。看一看这份广播稿，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她把纸端到眼前，大声念道：“在苏南工学院的校园里，游荡着一个幽灵。在苏南工学院的校园里，游荡着一个幽灵。”念了两遍，她突然顿住，转动着身子对着身边的那些同伴她而不是阳台下面的听众，大声问道：“这句话我们是不是感到很熟悉啊？”

是啊，话！”

你说对了。

好想想，这伙人开口马克思主义，闭口马克思主义，到底是站在什么

样的政治立场上！资产阶级把共产主义学说当着一个人幽灵，极其害怕，又极其仇视。而王小燕之流，也在他们文章的一开头，就攻击一个人幽灵，而且发誓要把它扫除，他们的爱憎立场，是何等地分明！何等地清楚！试问，我们共产党的宣传阵地，能够让他们来分享一份权利吗？"

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精巧金属篷顶、盘旋而上的开敞式楼梯道上，都响起了齐声的呐喊。阳台下面围观的人群中，也有人呐喊，却没有小楼里那样齐心协力，同仇敌忾。

你这是一种荒谬的类比！

在人们的一片吼叫声中，她的声音，还抵不上小楼墙根边青草丛里一只"嗡嗡"哼叫的蚊子。

再让我们看下去。

论的观点，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总是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受这种限制的影响，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他们会犯各种错误，主观上的，客观上的，立场性的或方法论的，都可能犯。查一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领导人犯错误的情形屡屡发生，而且都是很高级的领导人，更何况如今一个基层单位的某一级党委领导。"读到这里，她又打住话头。这一次，她不转向别人，却突然转向她下属的挟持者："王小燕，你说，这里'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是不是也包括毛主席在内？"

说！快说！拿出你刚才的热情、干劲和勇气来啊！

王小燕双唇紧闭，她没有想到对手会这样子抓她的把柄。尽管，如果一定要如实作答，她会毫不犹豫地："是的。"因为她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一定会赞成她这样回答，然而此时此刻，她知道绝对不能这么回答。她沉住气，只是以鄙夷的目光，对视着自己身边不择手段的对手。

好吧，沉默也就是默认！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手段，逃不过革命群众的雪亮眼睛！文章还特地提到了'很高级的领导人'，请问：毛主席是不是'很高级的领导人'？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反革命伎俩。这笔帐是要算的！"邵敏见王小燕死不吭声，就为自己找了转题的台阶。然后把身子仍然转向阳台下的听众，继续她对"反党宣言"的揭露批判："我们继续往下看：'.....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借用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对革命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动专制。对于那些批着党组织领导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胡作非为，我们了解得太清楚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什么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利益，什么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该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利，都是不存在的，都必须首先以他们个人的喜怒好恶决定取舍。只要有人敢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给你加上种种帽子，直到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在场各位经历过五七年反右斗争的同志，你们听听这段论调，和九年前那些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何其相似！也请你们告诫提醒你们身边的年轻同学们，让他们懂得和知道：中国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总是攻击共产党对他们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专制。总是叫嚷我们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利益，剥夺他们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现在，他们又摇身一变，打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给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先扣上一顶'大大小小独立王国'的帽子，然后老戏新唱，什么'必须首先以他们个人的喜怒好恶决定取舍'啦，什

么'只要有人敢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给你加上种种帽子'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此，我要提请同志们特别注意：他们所点明的这些所谓种种帽子，就是'直到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你们听，他们不是公开在为那些被人民戴上帽子的右派，反党分子和反革命鸣冤叫屈吗？这么猖狂地、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坐视不管、听之任之吗？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我们必须把这个反党小集团的首恶分子，坚决押上革命的审判台！"

邵敏的话音未落，曲湘川就被几个身大力壮的男同学，反架着双臂，按着头顶，也推到了阳台前端，与王小燕并排站在一起。一时间，阳台上和小楼里口号声大作。阳台下面也有一些人跟着振臂高呼。

打倒曲、王反党小集团！

把曲湘川、王小燕押上革命的审判台！

砸烂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狗头！

曲湘川、王小燕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揪出曲、王反党小集团的黑后台！

.....

王小燕愤怒了，脸孔涨得通红，眼珠里几乎要崩出火星。但是未等她反抗挣扎，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上的两名体育女健将，就把她的双臂死死地按住了。其中的一位还尝试着腾出一只手，企图往下按她的头颈。

这时候，邵敏手中的半导体话筒转到了一位中年人的手里，阳台上下的好多人人都知道，这是院党委保卫处的郭处长。他的身边，站着表情严肃的市委工作组副组长任旭东。

同学们，各位革命同志们，我们保卫处对曲、王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早就加以密切注意，并做了大量的内调外查工作。今天，他们终于主动跳出来了，要借着文化大革命运动表演一番。我们在场的所有革命师生，都应该衷心地感谢他们所作的精彩表演。这再次雄辩地证实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作的英明结断：这些反革命分子，人还在，心不死。不管革命人民怎样把自己的总方针告诉他们，他们还是要向我们进攻的。在新的革命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时刻擦亮眼睛，特别注意那些叫喊着响亮革命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敌人。他们也许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但是用心一查，就会发现：他们跟那些已经被人民搞臭的阶级敌人，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决不要给他们的表面假象所迷惑！现在，我代表院党委和市委工作组，正式宣布：对曲、王反党小集团的首要分子曲湘川、王小燕，从今晚起实行隔离审查！同时希望和这两名反党分子有牵连的人，积极主动地向组织上交代情况，划清界线，轻装上阵，大胆检举揭发；以实际行动，争取重新取得党和人民的信任！最后，我们还要警告那些在这个小集团中陷得很深的人，躲在背后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必须赶快悬崖勒马，缴械投降！否则，曲湘川王小燕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在又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处长口气威严地对手边的人说："把他俩押下去！"

当王小燕被身后的押送者扭身转向阳台过道的时候，她正好看到也被扭过身子来的曲湘川。曲湘川朝她扬起那张扁平的长圆脸，脸神显得意想不到的平静。她还分明察觉到朝自己笑了一笑，还说了一句什么。在持续轰

鸣的口号声中，那声音虽然听不真切，凭他那棱角分明的口型所作的变动，王小燕猜想他是在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王小燕突然觉得眼睛有些湿热，好象是由于羞愧所引起；看着自己的战友是这么镇定自若，觉得自己不该那么激动和愤慨。特别是当那四只不象是女性所有的臂膀，如狼似虎地把她的上身拼命朝下揪压的时候，她那颗比公主女王还要骄傲的心，一下子感到是那么地羞辱！她想到了武叔叔，想到了被国民党军警押向刑场的父亲，无法压抑住心头怒涛狂澜般掀动的巨浪。她终于不得不承认，正是这股滔天巨浪，在死命地向她的眼眶边上压挤着那种热辣辣的感觉。这股巨浪掀动的，既不是她在瞥见曲湘川镇定脸色瞬间所感到的羞愧，也不是她所常常想像的，象父亲那样英勇就义前的昂首挺胸、壮怀激烈！不是的，看着那些挥舞的手臂拳头，听着那些真心实意声嘶力竭叫喊的喉咙，还有阳台下那好些低垂着的头，及其有气无力举过头顶，象麦穗般随风飘扬似的手臂，和手臂下那些只见其蠕动却听不到发出声响的嘴巴，她一点都感觉不到因投身革命而身陷敌手的那种悲壮慷慨，而只是觉得眼眶发热，鼻根发酸，那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委屈，重如山深如海的羞辱，她蓦然间想起了高虹时那一滴、一滴，悄无声息盈出眼眶的泪珠，亮晶晶的，曾经使她惊异：一个女孩子的眼泪，怎么会那么容易地抛洒？而且这眼泪并不是抛洒在自己亲人的怀里，而只是在一个跟她并无深交的年龄相仿者的面前。而此时此刻，她面对着的，可并不是单单一个跟自己并无深交的年龄相仿者呀！那眼眶里的泪珠，不是照样拼命地打转！想到路边有许多双眼睛正在打量自己，那被押解着走在她前几步远的曲湘川，蓦然回首时，就能看到她关键时刻所显露的这种软弱，王小燕就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忍住，忍住。这时候，她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个可怜农村姑娘续不成声的抽噎声调：“我……我不想哭，可是……忍……忍不住啊。”她后悔自己不应该在这种时候，作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回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已经感到，脸腮上有热乎乎、湿漉漉的小虫子样的东西在爬动。可是，她觉得自己此刻比那位地主女儿还要可怜，因为她的双手还被人揪着管着。所幸，那管制着她手臂的手臂，已不再象方才在阳台上时那样狠劲；一转过拐弯路口，没有了小楼前耀眼灯光的照射，就变得松松垮垮的，有如在和她作一种友好的挽手同行。她要挣脱一只手，擦一下脸上的“虫子”，也绝对不会有麻烦，但是，她却觉得自己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她以为：与她挽手同行的陪伴者，尚未觉察到她脸上有异常的情况；她的自尊心已经深遭挫伤，干吗再自我暴露那些丢人现眼的“虫子”，使自己的自尊心更加下不了台！况且，这三人行，已经随着前面十几步远押着曲湘川那伙人，雄赳赳地步入了浓密的林荫道，昏暗的无精打采的路灯灯光，对隐藏在繁茂枝叶下的脸蛋，要想予以暴露，也已经无可奈何了。

为什么就是忍不住呢？所熟悉的一个对革命忠心耿耿的烈士子女，被人打成反党分子吗？尽管这段时期，他常常警告她：要跟学院党组织站在一起，要学会全面看问题，要检查收敛前一段时间的“偏激态度”，要注意不给别人牵着鼻子走……但是这一切，只能看作是两代革命者，站立位置角度不一样而产生的意见分歧，而决不是一种敌对关系。难道，武叔叔已经把她跟工作组所代表的党组织，看作是一种敌对关系了吗？难道，他是有意避开这个预先策划好的场面，使她好好地领受一下教训吗？难道，自己真是受人利用欺骗了吗？……王小燕脑子里，假设一个接着又一个，可是没有一个，她觉得能够站得住脚。特别是那最后一条，我王小燕是给别人牵着鼻子走的那

号糊涂虫吗？真要说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每一次“两报一刊”上传来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曲湘川马老师等，总是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吃透其实质，领会其精神，全心全意跟党走革命！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的政治分析理解能力，会比院党委的那些人差；而马老师和曲湘川在这方面的能力，也是众所公认的。还有其他一些老师同学的类似理解和看法，难道都错了吗？不，绝对错不了。这不过是印证了认识论方面的一个超前现象--事物在急剧地发展改变，而在这种发展改变的起初阶段，只有极少数思想和眼光特别敏锐的人，才能感受、认知和把握这种趋向。但是他们常常在多数人面前受误解，遭压制，甚至为自己的先知先觉付出代价和牺牲。想到自己也正在成为这种先知先觉者，她突然觉得：她对曲湘川刚才一刻那种沉静的微笑，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沟通。她把目光朝前面放出去，在黑沈沈的夜色和树荫中，追寻曲湘川的背影。但是，男同学脚步迈得大，迈得快，她只能借助偶尔在枝叶缝隙下泄露的几滴路灯灯光，在那黑暗浓密的树荫下，依稀看到几个摇晃着的人头……

第八章 崭露峥嵘

在1967年初夏，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热潮，在大学校园和中学校园的表现形式和特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许多不可忽略的区别。这种区别，在苏南工学院和锡城市惠湖中学反映得特别明显。也许，这是因为在惠湖中学，有一大帮子以黄军为代表的革命军人子弟的缘故。

一段时间来，每当黄军骑着铮亮的自行车，象一阵旋风似地，“嘀铃铃”地冲进校门时，除了有时被传达室那个豁嘴唇的多事老头硬拦住，扫兴地逼着他推车步行之外，自我感觉总是很良好。在六十年代中期，学生能够骑自行车上学的，绝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更何况，这是崭新的“永久13型”，全锰钢的，校园的停车棚里，能够找到第二辆吗？虽然高考入学率的提高，使在惠湖中学上学的为干部子女多了起来，但是，干部也要当到了相当的级别，再加手长一点的，才能拿到“永久13型”的购买卷。而地方干部中那些能拿到购买卷的，好象也不喜欢让他们的孩子骑着这种“稀有商品”招摇过市地来学校，不自量力地同革军子弟比高下。他们大都缺乏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勋，因此在享受打下江山的胜利果实时，也就难免有些畏畏缩缩，仿佛心中有愧似的，短少坐天下的风光、气度和豪情。特别使黄军感到趾高气扬的，不仅是那“永久13型”，而是与自己“永久13型”同在的那种阵势。这阵势是这样组成的：以他的“永久13型”为龙头，几十辆自行车排成一行，浩浩荡荡地开出部队家属大院，一路铃声一路风，一路威风一路欢闹叫喊。没有哪个行人，无论恭敬还是不恭敬，不向这支带着明显光荣痕迹的自行车队伍，行上他们的注目礼。这光荣痕迹，就是一顶顶头戴的黄军帽，一只只肩头斜背的黄挎包，以及一双双飞快踩动自行车脚踏的黄球鞋。这样的显赫气势，是绝大多数买得到和买得起“永久13型”的地方干部子弟，只能望洋兴叹而无法望其项背的，可以羡慕忌妒而不敢痴心妄想的。当

这支车队一阵风地冲上运河大桥时，大桥仿佛在抖动；当它横冲直撞穿过马路街道时，公共汽车得为它停步让道。当它穿过那原始肮脏的草鞋浜，风驰电掣扑向惠湖中学的校门时，那威风，那架势，他们自诩就象长篇小说《平原枪声》中的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然而，心怀忌妒的同学，却把他们比作同一本小说里的“夜袭队”。而由日本皇军走狗组成的“夜袭队”；恰好是敌后武工队的死对头，这就完全颠倒了黑白。这些同学只抓现象，不看本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虽然按小说情节，敌后武工队因为条件有限，把装备整队自行车的权利，拱手交给了臭名昭著的“夜袭队”。因此单就外表论，“夜袭队”才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才不三不四地戴着黑色太阳眼镜，耀武扬威地吓唬老百姓。人们这样胡说八道时，有意抹杀了一个根本的事实：正是这支当代“夜袭队”成员的英勇父辈，消灭了“夜袭队”，赶走了日本兵。有一次，虽然自行车队在挟风卷雷般的急速行进中，不小心撞翻了草鞋浜弄堂口的小摊贩，然而这并不是故意的；没有耽搁时间停车道歉，是为了遵守学校校规纪律，做到上课不迟到。可是第二天，阴险的报复者却把“车队”所属自行车的所有轮胎都放了气。黄军及其部下对此恨得牙痒痒，可气学校保卫人员并不将此当作案件来侦查。哼，如果黄军率领之下的真是一支“夜袭队”，即使人赃未获，也是可以冲进草鞋浜，以报复对付报复，一把大火烧它一个半天通红的！正因为是八路军子弟兵的子弟车队，才忍声吞气地不怎么干。是延安还是西安，界线亮得象太阳！怎么可以把黄军打头的自行车队，信口雌黄地比作由汉奸走狗所组成的“夜袭队”呢？

其实，这也一点不奇怪。在惠湖中学，黄军和他的同伴们经常觉得革命军人子弟受到歧视、排斥和欺压；上述不受惩罚的报复行为和恶意诽谤，不过是冰山一角。其它例子还多着呢！例如：在学校共青团、学生会领导层中，竟然没有一个“夜袭队”（看在这个名称听上去很威风的分上，就将错就错地这样称呼吧。）的英雄好汉。在自己班上，黄军仗着自己体育好，又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中锋，又有一群同是部队家属大院来的“夜袭队”骨干分子和外围分子当选民，勉强保持了一个体育班委的职务，同那个当学习委员的卖棒冰老头后裔平起平坐，简直是耻辱。他袁世清娘里娘腔的，能够在同学中指挥调动得了一兵一卒吗？而他黄军，在惠湖中学几百号革命军人子弟中，只要登高一呼，就可以风起云涌地得到一片响应和支持！这是什么，这是威望，这是组织能力和号召力！中国革命的胜利，父亲领章上扛的一颗银亮白星，全凭着这个来。记得当年刚转到一家有几个部队合办的“八·一”子弟小学读书时，好多同学一碰到一起时，就热火朝天地争论，争比谁的爸爸领章上有更多的“杠”和更多的星。他沉默不语，朝那些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同学一一打量过来，待把他们父亲领章上的星星杠杠都搞清了，就冷冷地说：“我爸一条杠都没有。星呢，只有一颗。”有人作嗤笑状，但是很快就被更聪明懂事的同学所嗤笑：“傻瓜蛋一个！连这个都不懂，还来比高低。”

进了惠湖中学的部队子女，当然已经成人长大，更懂事理，无需争论不休才能搞清谁的父亲比谁的大。更不会有人不明白：单独一颗星，什么杠都没有，乃比那些领章上杠杠星星繁多的强。凭着他父亲高人一头的少将衔，附带他那种敢说敢为的强悍性格，黄军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同一类出身同学的头。然而，黄军自己对此是不承认的。他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与其说他是凭着父亲领章上的那颗星，不如说，是凭着他从父亲那里所继承

到的果决、勇敢、坚毅、慷慨、豪侠仗义，凭着父亲所传给他的将军血液和气质，才使他在同伴中建立威望、取得领导地位的。然而，去年上边一个电波传下来，他领导威望和地位，却好象一下烟消云散了。虽然残剩着一点点，那却几乎成了一种讽刺和嘲笑，专门勾起他对昔日荣耀声势伤心入骨的回顾和追忆。他的“夜袭队”分崩离析了，他的“龙头”地位，被一个名叫史苏星的黄毛丫头取而代之了。一个篱笆三个桩，英雄全靠好汉帮。当黄军单枪匹马推着那辆“永久13型”，孤孤单单地走进惠湖中学校门时，昔日浩浩荡荡的车队，一下变成了尾随着他身影的一个陈旧的梦，他感到了一种空荡荡的失落感。

那个使人怨恨交加的女排健将，眼窝凹陷眼睛却很明亮，脸蛋圆而宽，说话声音脆脆的，一个鼻子长得特别挺拔。加上一个胸、腰、臀、腿都显得圆滚结实的高大身材，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要不是脑后扎着的两条显得威风凛凛的牛角小辫子，很有一点俄罗斯姑娘的气度风采。如果她的身上，不是存在着太多的、似乎是男子才应该具有的英雄气的话，就总体而言她可以算长得相当出色漂亮，爱美之心并不少于别人的黄军，是会从心眼里喜欢上她的。特别是在她奋然跳起挥臂扣球的时候，她那高高耸起的胸脯，猛力扭动时显得弹力强劲的腰肢，和那被绷着深蓝色田径裤的臀部带动起来的滚圆长腿，对营养充足、发育良好、已经步入青春骚动期的黄军，是极具诱惑力的。他想蔑视她，怨恨她，一会儿觉得他这样做的理由比山高，比海深；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点道理都不讲。因为正是她，如今正住在他以前所住过的湖边别墅里。他怀恋那圆形阳台上的青藤竹圈椅，和那竹圈椅上方红白两色的遮阳篷顶。夏日半躺在这竹藤椅里，手里可以心不在焉地捧一份画报杂志，眼睛却可对着波光鳞鳞的万顷碧波作各种遐想，或什么都不想……那别墅旁边绿油油的香樟树，满枝树叶被湖面上滑过来的凉风一扫，“哗啦啦”传出一片带着凉意的喧闹声，常常会使黄军兴头大发，奔到屋里取出闪亮的弹力拉簧器，对着令人爽快的湖风，裸露着布满肌肉疙瘩的上身，“哼哼”作声地猛力提高肌肉的外观形象和内在质量。而如今，那阳台，那别墅，那迷人太湖的鳞鳞波光，连同从那鳞鳞波光上面吹过来的湖风，以及被那风吹得“哗哗”作响的香樟树，都已经被她一家所占据。怨恨之心，在所难免。

可是，这种怨恨的情感和态度，在黄军的心里却不能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保持下去。

非但不能保持下去，没有多长时间，反而滋生出一种与之格格不入的对立情绪。他竟对史苏星，暗暗起了一种敬佩之心。一个堂堂六尺男子汉，既然敬佩起一个毛丫头来，这对黄军来说，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不能言诉、也不愿承认的情绪；然而，它是确切的，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地活动在他的心底里。他发觉，他从父亲那里所继承到的果决、勇敢、坚毅、慷慨、豪侠仗义，他所具备的威望，组织号召力，她几乎一样都不缺；不仅不缺，有些比他还要强。何以见得？答案很简单，连自己都对她敬佩起来了，连他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她的安排指挥，那就只能说明：她的威望和组织能力，已经青胜于蓝。当然，这种安排指挥是巧妙的，不露痕迹的，没有使被指挥者感到自己是在受指挥；否则，无论是以大名鼎鼎的“夜袭队”队长的身分，还是以他那太过坚强的男子汉、大丈夫心理，黄军都是承受不了的。比如说，他不是受指挥，而是在这位“红星”女排队队长强烈荣誉感和集体精神的感召下，为了维护革命军人子弟的光荣和团结，竟然不惜退出学校篮球队，毅

然决然地加入了那支并不受到校方正式承认的“军旗”篮球队，也成了“红星”女排队与本校女排队和其它学校女排队比赛时，嗓门最宏亮大、精力最冲沛的“啦啦队”队员。他也常常批评自己那种怨恨的蛮横偏狭和不通情理。史苏星占领那座别墅和享受那个阳台的风光，不是她的错；她对自己革军子弟领导地位的取而代之，也不是她的错。真正要查这笔帐，因为涉及到军事机密，肇事者的确切姓名，几乎是无法加以查实的。这个人也许在军委，也许在总参，也许就在军区作战部；是他出了这个调防的馊点子，然后借用哪位高层首长的名义，一个电令把自己父亲统率的军队，背乡离井地调到了风天沙地的大西北。以同样的手段，又一个电令把史苏星父亲所属的部队，欢天喜地从风天沙地的大西北，调到了素有“鱼米之乡”的太湖之滨。军令如山倒，原来属于黄军统率的子弟兵的子弟们，除了一小部分奉父母之命的高年级同学，继续坚守在惠湖中学等待大学招考外，其余都风尘仆仆地跟随大军寻找新的安家落户和读书上学之所去了。而那些坚守者们，大都是已经升了高二高三年级的，而又自以为成绩上乘极有希望一脚踩进高等学府门槛的对象。黄军设法让自己父母产生同样的期待，又不让这种期待同时蒙蔽自己的心。他知道自己成绩平平，很难挤进只重分数不重人的高等学府中去。但是他那颗留恋江南温柔富贵之乡的心，软弱得跟浩然刚强的将军之气，难以相符相称。将军和将军夫人其实并不是那样容易欺骗的，他们知道儿子那颗软弱的心，并不以戎马边陲的豪情壮志，因为己之所欲就强施于人。结果把大班人马连老带小地一起拉走了，却把儿子孤零零地扔在惠湖中学当“光杆司令”。这笔帐，怎么可以算到史苏星的头上去呢？

史苏星走进惠湖中学时，不仅也带来她老爹的少将衔，带来了数百名素不相识的革军子弟同学，而且带来了两支实力强劲的球队。这就是如今已在市中学系统赫赫有名的“红星”女子排球队，和“军旗”男子篮球队。这两个队的队员，一进惠湖中学，就跟学校原有的校队矛盾上了。校队的教练和队长态度傲慢而又明确：照单全收是不可能的，少量充实录用可以考虑。这两支球队的兄弟姐妹们，从小就是在一个部队家属营里长大的，彼此之间动作配合之默契，性情脾气之了解，战斗友谊之深厚，怎么能够容忍蛮不讲理的第三者，活生生地把两个有机整体拆散砸碎！于是她们和他们，就以革命军人特有的豪壮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不仅冒天下之不韪，跨班级跨年级地把两支军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公然与受到校方支持的校代表队，分庭抗礼，两军对垒。起初校队对其不屑一顾，他们就采用激将法，诱使校队把他们作为竞赛对手。在第一次女排比赛中，轻敌的校队竟被憋着一口气的“红星”队打得落花流水。而原先占有优势的男篮校队，因为黄军的“判国投敌”，与“军旗”队变得高低难分，使外界人士搞不清，惠湖中学到底是哪一支球队，算是名副其实的学校代表队？而领导与校队谈判的，指挥跟校队分庭抗礼的，策划游说黄军重返革军子弟营垒的，都是这位史苏星。“我们革军子弟的脚板跺一跺，就要叫惠湖中学的地皮跳三跳！”这样的豪言壮语，黄军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了，很难相信竟会是出于这个黄毛丫头的口！惊骇之余，就不能不深感羞愧：自己当了那么多年的革军子弟的头，却从来就提不出这样一句气壮山河的战斗口号来，不由一下子被折服。面对史苏星“你身上是否仍然流着军人父辈的血”这样的大问题，他幡然醒悟，义无反顾地投入“军旗”之下当战将。然而更加使黄军没有想到的是，史苏星竟有那样强的说服力和动员力，使人几乎难以置信地说服“军旗”队队长把职位让给

了他。他要推辞，觉得这样子抢班夺权，会使惠湖中学其他的新进革军子弟不服气。

“你不要杞人忧天，我说的话，没有人会不服气。这不光事关你自己，而是惠湖中学新老革军子弟大团结的一种象征！”史苏星的话，总是那样别开生面，激情昂扬又富有启迪性。然而使黄军倾倒的，不仅是史苏星具有这种强烈的革军子弟集体荣誉感、归属感，具有一种其他同学所不具有的高度自觉的群体意识，而且兼有大多数革军子弟所短缺的知识性。在高三 班，开天辟地第一回，在学习成绩上，既然有了和非革军子弟能够势均力敌相对抗的革军子弟优秀生。自从来了史苏星，袁世清和孙晨菲统霸五门主课成绩第一名的一统天下就被打破了。虽然数学第一名还是袁世清，化学和物理第一名的座椅，还是属于孙晨菲，语文和外语第一名的桂冠，却从此光荣地归属到革军子弟的手里。那位孙晨菲，是苏南工学院名教授孙趋的女儿。特别使黄军感到扬眉吐气的是，在数学和物理上，史苏星跟两位第一名的成绩，都只相差一点点，而在语文和外语上，史苏星却把她的竞争对手甩出了一大截。史苏星所带给革军子弟的光荣，不仅是给袁世清这样的草鞋浜子弟以一个下马威，而且对在学习成绩上一向蔑视革军子弟的那些工学院知识分子子女和市委干部子弟以当头一棒：“请猛醒！革军子弟并不似你们所想像的那样，个个都是草包蛋！”

确实如斯言，丘八里面有秀才。史苏星的老爹和黄军大字不识一筐的老爹不一样，他是早期投奔革命的一名大学生，现任新来驻军的军政委。因此在遗传基因上，同样是将军的后代，在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上面，她就比黄军明显高出一头来。以她知识上的雄厚实力和出身上的出类拔萃，惠湖中学的同学和老师们再也不能对革军子弟继续轻视和排斥，史苏星不仅进入了校学生会，而且担任了学校团委组织委员的重任。而真正使黄军对她进入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境界，则是从1966年5月底开始的。那时候，锡城市的绝大多数中学生，还傻里傻气、浑浑噩噩地埋在书堆里温书迎考，惠湖中学在史苏星的带动下，已经红红火火地掀起了批判封、资、修和黑帮分子的大热潮。史苏星带着一班革军子弟贴出的大字报，图文并茂，文笔犀利，不仅使好多低年级的同学视为写作范文，连杨玲老师，也在语文课上加以夸奖称道。由市委宣传部季家驹科长率领的工作组一进入惠湖中学，革军子弟仰仗史苏星如椽巨笔出尽风头的大字报，和老是围着这些大字报挤挤攒攒的人头，就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工作组的注意和重视。史苏星成了季组长在惠湖中学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依靠对象。没有多久，一批把批判火力从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转向惠湖中学“四家店”的大字报，就石破天惊地把整个校园都震动了！然而，这还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史苏星勇敢无畏的笔锋，很快就使人目瞪口呆地指向了董校长。真如一年前史苏星策反黄军退出校男篮队时所说的那样，在革军子弟脚板的躁动下，惠湖中学的大地开始不停地摇晃震动。也许，史苏星的说服动员能力和争取政治支持的才干，是无与伦比的。从兄弟学校传来的消息，凡是借文化大革命之名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的，都被市委进驻的工作组慷慨地赐予了小反党分子和新右派的帽子，和那些黑帮分子一起遭到了批斗。可是，在惠湖中学，史苏星所领导的大胆进攻，不仅没有遭受同样的可悲下场，而且受到了季组长的默许和支持。史苏星审时度势，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由全校革军子弟领头，召开一个大规模的批判研讨会，把已经被批得声名狼籍的“四大才子”，

连同他们仍然具有一定迷惑力的黑后台董耿，一起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就在这时候，就在惠湖中学革军子弟磨掌擦拳、枕戈待旦的当口，就在革军子弟胸中的革命激情，被夏日的太阳烤烘得熊熊燃烧的时候，又一件使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使惠湖中学已经象在大海波涛中摇晃不停的地皮，变得更加动荡颠簸起来。而这一次，引起人们大吃一惊的肇事者，却不再是史苏星所带领的革军子弟，而是曾经赞扬和赏识过史苏星的杨老师！

许多革军子弟，以黄军为带头者，对这位不识好歹的教研组长公然撕毁对联的狂妄举动，心肺要炸裂，怒火高万丈！迄今为止，在季组长的暗示规劝下，尽管他们明知她是“四家店”的拼凑者和黑管家，还是对她执行了网开一面、区别对待的政策。这里面，当然也有史苏星的个人好恶和政治影响力在起作用。而黄军对这位把自己已经压制了两三年的班主任老师，早就耿耿于怀。他虽然外表看起来，显得粗旷而豪放，但是对于某些关键性的细枝末节，他却有过目不忘的能耐。这也许是从粗中有细的将军父亲身上遗传过来的，在指挥千军万马的战斗中，只有豪壮而没有细心是要吃亏的。去年杨老师加入同学嘲笑行列的表现，黄军至今记忆犹新；她那嘴角边挂起的那丝深深刺痛他心灵的微笑，生龙活虎地老是蹦跳到他的眼门前。他觉得，以前惠湖中学革军子弟因为学习不硬气而受到种种压制排斥，董校长虽然难逃其咎，这位外表文静的杨教研组长，更是一名心狠手辣的黑主将。因此，他就不管工作组怎样三番五次地打招呼，还是纠合一些革军子弟老部下，毫不留情地贴出了“揪出‘四家店’黑管家”的大标语。后来还是听了史苏星不停地劝，反复强调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光辉战略思想，他才窝着一肚子恼火，把自己刷的标语自己去盖上了。现在好，你不去触动她，她竟放肆地爬到革军子弟的头顶上拉屎拉尿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会”筹备会议上，黄军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必须把姓杨的一起拉到会场上去陪斗！否则就无法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搞文革，杨老师的丈夫是市委工作组的总领导。把杨老师也当作文革的斗争对象，工作组的领导肯定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样做，是否是摆脱工作组的领导？黄军对这种疑虑嗤之以鼻，道理很简单：“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是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动立场，不管她是什么人，她的后台有多大，她的魔爪有多狠，我们都要把她揪出来，砸个稀巴烂！”

筹备会议是在下午一点开始的。因为早晨黄军来校时带来了三份从北京寄过来的重要政治传单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会议又增加了史苏星提出的一项临时议程：商讨把惠湖中学所有的革军子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红旗战斗兵团”。理由很简单，随着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有一个更为紧密的组织形式，把革命大批判的火力更好地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同时，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严肃的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就必须要有个领导核心，对内对外，对敌对友，产生一个统一的声音，形成统一的行动计划和步骤，确保革命目标的实现。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受了北京来信的提示和启发。北京好多中学的革军子弟和革干子弟既然已经建立了“红卫兵”、“红旗兵”这样的革命组织，惠湖中学的同一辈革命后代，没有理由无动于衷，按兵不动。一上午在革军子弟骨干分子中飞快传阅、传阅后使他们眼界大开热血沸腾的，是清华大学附中一个名叫“红卫兵”的革军革干子弟组

织，所写的在北京学生中广为传抄的三份大字报，内容如下：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两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就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造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什么太狂妄了，什么太粗暴了，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者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喏喏，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里，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朵，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把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是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 6月24日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光荣得很！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

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怎么能不万岁呢？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 7月4日

《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浑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

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

对待革命的造反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鉴别忠实于最高指示还是反对最高指示的分水岭，是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你是革命者么，你就必要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参加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

你是反革命么，那就出于阶级的本能，就必然咒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

一听革命的造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先生们，不是反革命，就是糊涂虫！这些混蛋们，只准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准无产阶级造他们的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

一万年一亿年需要！

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激荡的大风暴。红卫兵的战士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向勇敢的海燕一样在这场大风暴中翱翔吧！

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 7月27日

与会者们受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传单的影响和鼓动，对史苏星的提议，一致表示热烈的响应和坚决的支持；并根据她的建议，酝酿产生了五名以她和黄军为首的“勤务组”成员候选人名单。这个组织领导核心所以叫做“勤务组”，是根据史苏星随身所带《毛主席语录》148页上“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最高指示所作的建议。大家一致同意将把这一名单，提交出席明天批判大会的所有革军子弟表决，如果获得50%以上的支持票，即告通过。如果某一候选人支持票不满50%，其候选人资格就自动作废，并在会场上提名产生新的替补候选人，进行当场表决。

会议开了四个多小时，开会者就议程中的其它一切问题，都达成了共识。就是在对杨玲撕对联的行为如何作出反应上，争论不休，无法达成统一。眼看着天色已经暗下来，大家最后把眼睛，都转向了始终不作明确表态的史苏星，从大家期待的表情看，显然是希望由她最后作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史苏星的想法很矛盾，内心的思想斗争，其实比桌面上唇枪舌剑的争论还要激烈，还更使她的感情和理智受到苦苦折磨。她对持有斗批杨老师主张的同学，心情想法都很了解，于是就能明显感受到某种差距来。对于黄军认为杨老师对革军子弟抱有偏见的说法，她凭着自己的切身体验，很难苟同。她知道杨老师对她就很看重，很赞赏。只要成绩好，不管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她都看重，都赞赏。史苏星来惠湖中学短短一年多，她在同学中的威望，包括在一部分非革军子弟同学中，威信升得怎么快和怎么高，那么毫无争议地成为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核心干部，都是和杨老师在各种场合所作的夸奖称赞分不开的。

就凭这一点，说她在学校有意压抑革军子弟的政治地位，是说不通的。从心底里讲，史苏星对杨老师抱有尊敬而感激的心情。

然而，从总体实际情况看，革军子弟在惠湖中学，确实受到政治上的排斥和压制。史苏星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革军子弟校级学生干部这一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使她感到荣耀和庆幸，反而使她感到心情压抑和担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看来很公正，其实，它是站在维护那些有条件取得好分数的幸运者一边的。那些住在草鞋浜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子弟，以及那一小部分从郊区农村来的农民子弟，除了班上象袁世清那样的个别情况，他们中的极大多数，即使天资才分与工学院那些知识分子和市委干部的子女不相上下，在诸多客观条件方面，却绝对处于无法公平竞争的劣势地位上。首先从可供学习支配的时间上，前一类同学往往要抽出一大部分时间，帮助家里干家务，想方设法帮助家里挣生活费用；而班上那几个市郊来的农村同学，放学后顺着铁路走回家时，要费时费力地一路上寻割青草，装满背上的箩筐，以保证家中饲养的兔羊之类，不会因为他们专心致志的学习而挨饿。更不要

说，那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学，手头有那么多的参考书，好多课堂上的高难度题目，老师还未开始讲解，他们早就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步的解法。他们的家里都好象开着图书馆，而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等价交流和互通有无，更是使那些既买不起、又借不到这类参考书籍的同学，在课堂上碰到老师提问时，显得那么冥顽不灵，呆头呆脑，因而时常得忍受某些嘴巴刻薄的先生所放出的冷嘲热讽。而那些搬用参考书上的现成解答，轻而易举换取老师一片赞扬声的同学，又常常是显得那么沾沾自喜，趾高气扬。

而对大多数革军子弟来说，也许是其父辈，并没有遗传给他们读书人的基因细胞，也许是其家庭，并没有象那些知识分子和市委干部家庭那样，对他们在读书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和很高的期望，光凭学习成绩来论短长，就很难体现出他们真正的长处和优势。他们和新中国一同诞生，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他们的父辈为革命出生入死，终于为无产阶级打下了江山。对于这个江山在下一辈会落得什么人手里，他们中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带头人，例如就象她史苏星这一类精神领袖们，有着本能的敏感，本能的关注，本能地抱有一种革命成果捍卫者的立场。而在他们眼里，现存的教育制度，实际上会使这无产阶级的江山，不是通过血与火的拼战，而是通过考场上的竞争，重新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党在各种场合下，宣传鼓励又红又专的道路。而在很多情况下，“红”只是一种掩饰，一面招牌，一块遮羞布，而“专”才是实质，才是根本，“专家治国”，“专家治厂”的说法，经常可以听到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当作口头禅一样地挂在嘴上。那些思想很“红”、特别热衷于学雷锋、做好事的同学，如果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强人意，有几个人能成为“三好学生”，欢天喜地把印着烫金字体的奖状揣回家去？而那些认为学习雷锋做好事会挤占他们宝贵学习时间的所谓高材生，只要他们和老师同学保持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能一俊遮百丑，取“三好学生”的奖状，易如囊中探物。如果说，这类荣誉性的奖赏还仅仅起到鼓励某种不良社会风气的作用，而依据分数高低，决定一个人能否跨进大学门槛的做法，就更加后患无穷。因为这就是意味着：那些只关心自己个人成名成家、出人头地而不关心公益和他人利益的人，那些家庭可以为其提供优越学习环境和读书条件的人，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子女，那些拿大笔定息的大小“吸血鬼”的后代，那些在政治上已失去了一切，而在知识上仍具有一定优势的形形色色家庭中的后继者，会比革命军人和工农的子弟，有更大的机会进入高等学府，被党和人民培养成各种治国治政治企业的专家，逐步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而那一小部分有幸挤入这一专家行列的干部子弟，也将因为兴趣和利益上的一致，被他们的大多数伙伴所同化。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以这样一种软刀子割头不觉痛的方式，得而复失！

特别使史苏星感到震惊、荒谬和反感的是，惠湖中学为了提高高考录取率，竟然以学雷锋、做好事为号召，在迎考期间把应考生都集中在学校，然后组织低年级的同学为他们送饭打菜、洗衣扫地，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而市教育局的领导，甚至堂堂市长，都公然赞扬提倡这种做法。一段时间来，史苏星从她在外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那里，先后得到了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和与王海容的谈话抄件。毛主席说：“你不是说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学的？只听讲课能否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践中去学习。”还指出：“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公开号召青年去争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在学校是全优，在工作上就

不一定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连举人也没有考取的人才真才实学。唐朝两个最伟大的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师后面跑。……注入式连资产阶级也反对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对？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的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自己多看。……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学校应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毛主席的这些话，使史苏星的耳朵孔倍感亲切，觉得必须对学校现行的教育路线来一个彻底的批判。而现在，杨老师显然成了把这一批判引向深入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拦路虎和绊脚石不扫除，革军子弟在惠湖中学通过革命大批判建立起来的声势和影响就无法保持，一部分情绪激烈的伙伴，也会对她的领导作用提出疑问。因此，为大局计，为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了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天然接班人的政治地位，从学校时期起就得到根本改善，看来她只能牺牲对杨老师的个人好感和尊敬。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正如有些同学所提出的，把杨老师也拉上“斗鬼台”，工作组会赞成支持吗？显然不可能，季组长不会用自己的乌纱帽，来跟自己顶头上司的夫人开玩笑。想到这一点，史苏星心里就有些悲哀。这些身为革命领导者的成年人，尽管受党更长时间的教育培养和信用，占据着重要的领导岗位，然而真正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一事当前，先为革命利益考虑，而不是为自己打小算盘，似乎并不多；革命由此就大大增添了难度。外界师生们总以为，史苏星同季组长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彼此之间，一定有很多相互默契和沟通，否则她就不可能从工作组那里，得到有关“四大才子”的背景资料，更不敢胆大包天地把矛头指向董校长。然而在实际上，史苏星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所想像的要松散。季组长是经常找她谈话，但那是向她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各类政治情况，她说得多，季组长开口的时间少。这也许是地方机关干部的一种领导技巧，动机无非是两种：一是叫你猜不着，摸不透，使你具有莫测高深之感，你才会尊敬他。二是言多必失，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地说漏了嘴，一旦捅出纰漏来，他这个工作组组长是要承担责任的。第三个原因是史苏星所猜不到的。

季组长从第一次跟她交谈的时候，就想起了社教工作组队里的那位王小燕。两人都有响当当、硬梆梆的政治出身背景，都自以为对革命有着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现在，又同样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正确地界定和寻找一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史苏星的大字报文章尽管给他以深刻印象，但是一接触作者的实际谈吐和思想，他就觉得自己所找的依靠对象，并不很合适。他想找市委大院里那班领导干部子女，可是暗示的话题一触及董校长，他就发觉这些执掌团委和学生会大权的学生领导骨干，一点没有积极性，他们是董校长所提拔重用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对把火烧到自己庇护者的身上感兴趣。他也并不知道市文革办恭副主任为何指示他查董校长用人路线的复杂政治背景。更不晓得，市委干部子弟的抵制态度，同俞市长儿子俞彦在背后发挥的作用有关系。无可奈何，季家驹在不得已之际，最终还是选择史苏星，作为忠实贯彻执行上级意图的作战工具。然而他成竹在胸，对症下药，决心用人之所长，制人之所短。作为一个革命经历不是太长、却已经具有丰富革命（特别是工作组）经验的机关干部，他吸取了跟王小燕打交道的经验，

既不象太上皇那样地对革命小将的所作所为瞎批评，也不把自己和和谐地混同于他们中间的一个小年轻，而是威而不露，含而不发，保持一种距离感和朦胧感。在关键问题上不得不表态或亮相时，则尽可能采用不动声色的做法和风格。例如，奉恭副主任的提示，要查批一下惠湖中学“四大才子”的来历和董校长的用人路线时，他就领着史苏星他们几个同学学习了一遍有关的《人民日报》社论文章，然而就让手下人把四位老兄的档案材料抛给史苏星他们，然后是正式向他们传达了刘少奇主席有关中学文革怎么搞的一段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他自信这样做，是天衣无缝，无瑕可击。如果恰好碰上这个史苏星和王小燕一样好斗，又一样好钻牛角尖，他早就有备无患。你要跟我争论斗嘴吗？这可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市委文革办公室哪个领导瞎指挥。你这是跟《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过不去，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和英明部署唱对台戏。这，就是史苏星和学校工作组领导之间关系的真实图景。旁观者不清，双方当局者，也并不是都看得很清楚。这就对惠湖中学而后的时局发展，产生了始所难以预料的巨大变化。而人们不仅对以后的这种变化，毫无先见之明和预测能力，就是对眼门前发生的事情，也如堕云海迷雾之中，提出好多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问题来。

在一部分市委干部子女中，主要是那几位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学生领袖们，就经常当面责问史苏星，把矛头指向董校长，是不是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市委领导？人所皆知，董校长的工作，是受到市委领导多次表扬和肯定的。俞市长“百尺竿头、更上一丈”的题词，就是明证！俞市长的儿子学生会主席俞彦，公开宣称：批判董校长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史苏星面对内部外部的疑问和压力，沉着冷静地回应道：工作组是市委派来的，市委的领导是通过整体，而不是通过某个个人来体现的。既然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当然也意味着市委支持这样的革命行动。怎么能说我们是把矛头，指向了中共锡城市委呢？史苏星的逻辑推理是严密的，无瑕可击的。可是现在又把市委工作组主管领导的夫人扯上了，除非武副书记个人也表示支持这样做，季组长亲自到会支持这样做，原来雄辩的逻辑法则，一下就会变得漏洞百出。尽管在战略方向上，史苏星坚信自己的正确性，但是在战术运用上，冒跟工作组摊牌的风险，是否值得或明智？她被内心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所煎熬，圆圆的额头上，在皱起眉毛的压迫推挤下，显现出几道和她年龄不甚相称的皱纹来。大智大勇如史苏星，她照理是不应该让革命伙伴们感到失望的，可是，她最后却站起身来，厚颜无耻地对着大家说：“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吧。杨玲的事，让我今晚好好想一想，明天早上再决定。”黄军对这种首次碰到的议而不决的情况，感到失望和埋怨。如果是在战场上，总攻命令马上就要发布了，却还定不下哪个据点打，哪个据点不打，那不仅是闹笑话，而且是要付出人命代价的。脑子里想到这一层，他对长于出谋划策的军政委之女儿的佩服之心，就突然间被对用兵果决的父亲的无限思念所代替。幸好他此刻，对史苏星的内心活动并不全部知情，否则他会更加忿忿不平的。史苏星在终于决定用拖延之计来对付自己的革命同伴时，其实也是想到了她的爹。他去军区开五天会，屈指算来，今天应该回家了。自从投入学校文革运动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史苏星想到应该向爸爸讨教咨询一下。强将手下无弱兵。史苏星象赏识她的班主任老师杨玲一样，是个有主见、有

决断的女性。如果不是觉得事关重大，她是不会向任何人讨援兵求主意的！

惠湖中学的大饭厅兼大礼堂，是终日声音喧闹的，即使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过它的门前时，仍然能听到轰轰隆隆的不宁静。这声音，并不是它自己产生的，而是从隔壁墙头上，从紧靠学校的建新机械厂里传过来的。然而，今天这声音，震天吼地的，却分明不是那工厂机器的隆隆声。隔壁邻居的生产噪音仍然存在着，那墙根下长满青苔的围墙，也并不能抵挡那噪音的侵略进犯；而是那四、五百个吼叫战斗口号的嗓门，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机器噪音，铺天盖地地压住了。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调换上面，她一下就能那么清晰地感受到师生之间仍然残存的一丝情谊。这种隐藏着的脉脉温情，面对巨大革命风暴的狂吹猛打，虽然已经岌岌可危，并且不得不采取藏头露尾的鬼崇行径，也不知道还能存活多长时间，却使她的心头，蓦然间升起了一种无限的宽慰。这时她再举眼去找史苏星，却发现现在自己眼里突然间变得可亲可爱起来的学生，已经转身走向门口。于是，她就一声不响，拾起“四家店总管家”的显赫封号，乖乖地套上了自己的头颈，动作举止，就象一个非常听话的大孩子，显得极其温良驯顺。

一个小时之后，杨玲和自己的上司及下属，就被一大群学生簇拥着，以一种怪里怪气的队列形式，带进了大礼堂，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推上了大会的主席台。她并不知道，在她没有进入这个礼堂前，这里刚刚发生过一件史无前例的不寻常的政治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可以产生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见解：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党组织领导的公然抗拒和挑战；但是，也可以看作是一批新中国的第二代公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毫不客气地享用起新中国宪法所明确赋予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来。这些公民并不觉得工作组季组长的意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更权威。不管工作组的领导怎样阻拦和恐吓，天要下雨娘要嫁，在“红星”和“军旗”两支球队的名称各取一字的“红旗战斗兵团”，还是在一片战斗口号声中“呱呱”坠地了！不知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还是觉得跟原先已经挂上的批判大会的横幅标语有矛盾，会场上并没有同时挂出“红旗战斗兵团成立大会”大横幅，因此就使杨玲和她的同伴们，还以为自己是在跟一群散乱无章的乌合之众打交道。此时此刻的史苏星，神气活现地占据着主席台中央的那张讲台，一看就知道，她正扮演大会主席的角色。然而杨玲并没有认识到：她这个大会主席的角色，是具有硬梆梆的法理依据的。经过十几分钟前全体开会者的一个集体表决，她以“惠湖中学红旗战斗兵团”勤务组组长的身分，正式成为了这一大群革命红后代的领头人。杨玲也不知道，季家驹本来还打算来会场，说上几句带有引导性质的开场白，就因为听说与会者们仍是一意孤行地把非法组织成立了起来，他如果一出场，就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承认。于是就拒不到会作发言，这恐怕是引起主席台上几位学生领袖毛细血管很充血的主要原因。当然，杨玲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她的注意力，集中于观察分析这个批判大会的斗争目标和方向。一大通慷慨激昂的发言听下来，杨玲明显感觉到，大会的主要矛头对准了董校长。然而这种形势刚形成，一个面孔陌生的女同学，雄赳赳地走上讲台来，矛头一转，却愤怒揭发起苏顿攻击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黑言论：“……他竟然讥笑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保护公社羊群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是无知，是愚蠢，是得不偿失，是不尊重人的价值。苏顿，你这样大放厥词，矛头指向谁？说！是谁无知？是谁愚蠢？是谁不尊

重人的价值？”“说！快说！……”台上台下响成一片。

苏顿额头上面一片汗，心里对自己缺乏前思后想就那么莽里莽撞地鼓吹人道主义思想很懊悔，但是又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大场面，缺乏应付这类群众运动所必需的政治经验，唯恐自己认了罪，一套上纲上线的自我谴责言词，就会一字不漏地装进档案袋里，变成巨石把他永世不得翻身地压在十八层地狱里，就装聋作哑地，横下一条心，死活不开口。岂不知，革命小将对他的抗拒撒赖，早就有准备。连明确指令吩咐都不需要，黄军一个眼色做出来，就有几张长条板凳，“哗啦啦”地拖到主席台上。其中有一张，示范性地直接安置到苏顿的身跟前。“跪上去！跪上去！”控制他左右臂膀的两位学生连声喊。苏顿明白知道抗拒是徒劳的，只能把缺乏足够皮下脂肪保护的膝盖，乖乖地移动到涂着滑溜黑漆的板凳凳面上。那板凳条是狭长的，硬梆梆地比他的膝盖还要硬，加上挂在脖子上的大木牌受万有引力的吸引，使他再次痛苦地感受到了压强原理对他的无情嬉弄和折磨。允许他悠闲从容考虑回答的客观条件一经安排好，杨玲言词确凿地听到史苏星说：“慢慢地想，什么时候想出了使群众满意的回答，什么时候再下来。”说完，就似乎对他不再感兴趣，扭过头，对着董校长喝道：“苏顿是你的大伙计，你的敲门砖。对于他的这番话，我们很想知道你这个大老板的高见？”

董校长显然没有料到矛头一下又会转回到他的身上，是为之辩解？还是同声谴责？他脑子里犹豫不决地紧张思索着，权衡估量两种不同反应可能对自己和苏顿造成的后果。尽管他经历过朝鲜战场上，美军飞机狂轰滥炸和自己人发射的装甲炮弹哗哗地倾斜到自己头顶上的大世面，却也象苏顿一样，对这样子的批斗场面和咄咄逼人的责问，毫无应付的经验和办法。如果再来一次文革这样的大运动，无论是政治性很强的董校长，还是对政治知之甚少的苏顿，一定会同批判者们同仇敌忾地进行自我大批判，批判的格调可以更严厉，更尖锐，坏话说尽，毒词用光，使革命小将再也找不到更为革命的言词来发挥。当批判高潮进入这种无话可说的最高境界时，斗争的高潮，也就必不可免地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惜他们当时缺悟性，死头死脑地过于严肃和认真。面对那些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在玩什么历史游戏的年轻人，竟然正儿八经地把他们当做真正的历史审判者。想到自己是在跟历史审判者们打交道，一言一词如果要跟历史连在一起，“一言九鼎”，“驷马难追”，“覆水难收”……，各种各样的相关成语和词条，就象乱柴一般地堵住了他们的喉咙口。可是眼前这些胸怀革命大志的革军子弟，并不把这种沉默式的审慎态度理解为对他们的极度抬举和看重，反而当作一种极度的轻侮和蔑视，于是就暴怒，就发狂，就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狠狠回击对手的轻侮和蔑视。他们迫令董耿也跪到长条凳上去。可是，董校长曾经是军人，如今是党员，他有军人的高傲和党员的坚定性，他不跪！无论那是一条长板凳，还是一条红地毯！于是，遭受到轻侮和蔑视的年轻心灵就更震怒，更发狂。四五双手都同时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担任现场指挥的黄军，也怒不可遏地用脚去蹬他那不肯弯曲的腿弯。就在这种手忙脚乱的奋力搏斗中，突然间，那张长条凳子翻倒了，刚才一刹那间被勉强按上凳子的董校长，“咚”地一声沉重地仆倒在地板上，鲜血的血，从他那被凳脚磕破的额头，泊泊地流出来。两个仍然抓着他手臂的学生，神情显得慌张起来。第三个比较冷静的搏斗参与者低声问黄军：“送校医室去吧？”黄军显得也缺乏思想准备，就把脸空转向了史苏星。史苏星朝那流血的额头扫视了一眼，迟疑了一下，断然说道：“不，

叫校医带上药箱来会场！”她的声调很冷静。因为她知道，如果这出戏的主角一离开，整部戏就无法继续朝下演。作为这场搏斗的旁观者，尽管她对这突然其来发生的事故同样没有思想准备，她的表情，却比任何在场的同胞都要沉着冷静。她从裤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扔给黄军说：“先用这个堵一下他伤口的血。”然后把话筒举到嘴唇边，充满感情地对台下纷纷站立起来观察台上情形的同学们说：“同学们，董耿拒绝回答我们的提问，蹬倒了长板凳，自作自受地跌破了脸，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就应该把这大会马上停下来？”

“不！”台下齐声协力一起喊。

“是不是应该把他送进医务室？”

“不！”又是一声喊。

“是不是我们应该向他陪一个礼、道一声歉？”

“不！”

“他应该不应该继续回答我们的问题？”

“应该！”

……

杨玲此时再也无法忍受了！眼看着自己的同事和领导遭受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体罚，她突然感到：史苏星对她的那种特殊优待照顾，竟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和嘲笑！“我来回答！”她不顾一切地高声喊叫起来。

全场人的目光，一下都齐刷刷地转到了她身上。闹哄哄的大礼堂里，突然变得静寂起来，使人们可以重新听到隔壁机械厂传过来的隆隆马达声。史苏星用颇感突兀的眼神朝她盯了一眼，稍顿了顿，开口道：“你说吧。”

“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因此，苏老师的话虽然有毛病，却也存在着很大的合理性。”杨玲抱定引火烧身的决心，口吻极其平静地说完了这段话。

台下人听了这段话，身边带有小红书的，觉得杨老师引用的那段毛主席语录好耳熟，就“哗哗”地翻起《毛主席语录》来。而大部分与会者，因为当时《毛主席语录》尚未公开发行，就只能偏过头去，从已经拥有这种锐利武器的同伴手中分享伟大领袖的光辉思想。在已经找到这段语录的人丛中，响起了一片七张八嘴的讨论声。

史苏星看到一个严肃的斗批会，一下子被杨玲转变成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心得讨论会，第一次对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动起肝火来：“你这是断章取意，歪曲毛主席语录的精神！”史苏星高声叫起来，声调一点不比杨老师方才一刻叫得低。

杨玲用嘲讽的眼光瞧着自己学生首次显露的歇斯底里的样子，嘴唇动了动，真要反驳，却停住了口。她看到会场门口匆匆走进来一大群人。在这群人里面，有俞市长的儿子俞彦和其他一些学生干部，有她班里的学生袁世清、张本度和孙晨菲等。而匆匆走在头里的，是刚才派去叫校医的那位学生，身后跟着身背药箱的学校医生。在医生的后面，稍稍隔了一段距离，却是一张她在老武书房里见到过的脸。陪伴着这张脸的，是工作组的季组长，和另外两位工作组的同志。这一大群人一拥而入，其中一小部分直奔主席台，其余的，则散向会场的四方。主席台下原来的人和新来的人，都把目光好奇而急切地盯着主席台；他们都已意识到，一幕已经上演了一个多小时的闹剧，就要进入一个五分钟以前还根本意想不到的转折点。她扭头去看董校长的额

头，只看到史苏星的那块白手绢，血糊糊的，已经变成了一块红手绢。

“上头终于出面了！”杨玲心里暗叫起来；她以为：自己有意激化矛盾的做法已经见成效。却并不知道，惠湖中学学生成立非法组织的事，比起她因撕掉对联而被押上批判台的情况，也许更加唤起上级领导的关切和注意。

第九章 庇护与缝隙

就在凌漪登门拜访夏思云夫人的那个傍晚，夏思云正在朱坤兴的家里喝结婚喜酒。按六十年代中国的风俗习惯，不凑过年过节的日子办结婚喜酒，总是使人觉得有点不寻常。如果按照歪门邪道的思路去推测，十有八九会想到新娘的肚子，也许已经时不我待地贴出了公告，如果不追加必要手续和仪式的话，就会使人们风马牛不相及地误以为得了吸血虫病或肝腹水之类。那些与朱坤兴相好的师兄弟们，约略知道朱坤兴这位通过速战速决得来的新娘，同他下乡参加的四清运动有关，但是内情如何，朱坤兴并没有向他们交底，他们也就不便追根究底，更不便为他的堂堂人格品德作没有把握的解释辩护。那时虽然还没有时兴岗位责任制，大家却也清楚：厂里有负责追根究底的专职部门。而工人的本职工作，就是吃饭、干活、睡觉，有喜酒就喝。他们并不知道：此刻和关厂长同坐在正桌喜宴上感到不自在的夏书记，不仅确实对朱坤兴作过一番盘问查询，还专门派出过外调人员，到乡下去作过追根究底的调查。而引起夏书记兴师动众的根源，在于朱坤兴言不信，行不果，明明向马进保证过在乡下期间不再同高虹时幽会，却还是忍耐不住。

那是一个星光皎洁的晚春之夜，第二天就要结束社教工作使命返城的朱坤兴，无视马老师的临别告诫，违背自己信誓旦旦的保证，和高虹时不约而同地来到两人曾经幽会过多次的山芋田地头。那山芋田离高虹时当初向王小燕吐露苦水的那个池塘相去不远。浓重的青草气息与晚春暖洋洋的夜风掺和在一起，肆无忌惮地钻进鼻孔里，使心跳变得粗重，呼吸变得急促。自从大队党支书戴洪发那一次乘高虹时洗澡时间闯入房间强奸了她，而且从此频频拜访，一次又一次地竭尽强暴凌辱，她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王小燕的牵线搭桥和朱坤兴对她的一往情深，使她品尝到了一个被人尊重和爱呵的女子所能享有的甜甜滋味，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希望和憧憬。她没有想到，外表看上去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工作组同志，在私下和她呆在一起时，会变得那样细腻温柔，对她就象一个体贴备至的大哥哥。每次幽会时，在她坐到地上的前一刻，他都会脱下自己的上衣，不声不响地铺垫在她的臀部或腰背后。她从这个外表憨厚的工人老大哥身上，领受到了什么是异性的真正的爱抚和温存。就象沙漠中一棵因干渴就要枯萎的小草，突然饮啜到了清冽甜美的甘泉，贪恋不舍之情，大大超过了对风险的担忧恐惧。因此在苏南工学院的师生离开之后，忍耐了一段似乎是极其漫长的日子，这一夜他俩终于又聚集在一起。两个奔涌着滚烫血液的身子，并排斜躺在田埂与山芋田连接的斜坡上。

“我一回城，就立即办申请。”朱坤兴注视着高虹时在夜色仍然闪着亮光的双眼，作出自己坚定的承诺。高虹时闻言后默不作声，只是欠起身子，把

她的双手抱住朱坤兴的双肩；随后又移到他的脖颈上方，紧紧地抱住他的头颈，并把自己的脸庞，紧贴在朱坤兴的颧骨上。朱坤兴感到他的嘴里有些咸涩；那是高虹时的眼泪，在两个脸面的缝隙挤压下，最终渗入了他的嘴缝。他就托起她的脸，用食指和中指的背端，在她的脸上很轻柔地擦拭起来，那种慢慢的划动，使她的肌肤上起了一种痒痒的快感。这样一种微细微妙的爱抚和温存，与戴洪发那种粗野强暴的折磨，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记忆反差。高虹时陶醉了，觉得自己就要象前两次见面时一样，抵挡不住内心感情巨浪的冲击。她感到自己的身肢变得绵软，那股从他敞开衣领中散发出来男人的气息，使她觉得喉咙干燥，有了口渴的感觉。她感觉到朱坤兴呼吸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粗重，几乎变成了一种喘息。她开始用手去捌动那两只移向她腰间的大手，然后却觉得自己的手指是那么地软弱无力。如果在这时候，没有突然响起那阵脚步声，她必定会象前两次一样，抵挡不住朱坤兴的冲动行为的。然而这一次，当那感情的狂涛巨浪还来不及完全冲破理智的堤岸时，戴洪发和工作组季组长的手电筒所发出的刺目光柱，却突然照住了他俩……

结果可以预料，朱坤兴一回厂，就被夏书记找到党委办公室里谈话去了。朱坤兴的脸孔涨得红红的。可是，这红红的脸孔，并不表示他自觉理亏词穷。相反他坚持认为，他虽然违反了工作组成员不能同当地老百姓谈恋爱的纪律，然后却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和后悔。而共产党真正应该追究查处的对象，恰恰应该是那个用手电筒朝他乱晃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了说明自己的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气，使夏书记理解接受他的上述结论，他就把工作组同伴和工作队领导之间的矛盾，原原本本地向厂领导全盘摊出；当然，这里的原原本本，是打了折扣的，例如他在戴洪发强奸高虹时的问题上，就尽量说得含糊其事；对自己感情冲动之下同高虹时发生过的两次“关系”，则完全隐瞒。他承认，社教工作组有纪律，工作组成员不能和当地社员谈恋爱。但是他鼓起向组织说谎的勇气，强调他跟高虹时的恋爱关系，是在离别前的那个晚上最后确定的。因此从小处说，他并没有违反纪律；从大处论，国家法律并不阻止适龄公民谈恋爱。至于与地富子女谈恋爱，算不算是阶级立场不分，他认为党“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却可以选择”的一贯政策，对此是最权威的评判标准。他俩的倾心相爱，正是体现了他女朋友选择同工人阶级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和诚意，应该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和鼓励。据他所知，好多高级干部的老婆，也是地富家庭出来的。因此，他并不想改变主意。他的女朋友是全村人公认的好女孩，他之所以选中她作自己的老婆，是有重大的政治原因的。不信，厂领导可以去苏南工学院找他四清工作组的领导马进了解情况；也可以直接去乡下找有关四清积极分子作调查，但是绝对不能找原为四清对象的大队干部作了解。他不仅不愿意检查“过错”，与地主女儿划清界线，而且打算马上提出结婚申请。那么快马加鞭地搞跃进，并不是自己急不可待想结婚，而是因为自己的女朋友，正处在那个流氓成性的大队党支书的虎视眈眈之下。当然，以朱坤兴的笨嘴拙舌，如果不是硬着头皮根上工学院找王小燕“参谋”，是绝对讲不出这一通强词夺理的理由来的。

夏书记听了这一套诉说，觉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就让组织科和保卫科各抽一名同志，果真上苏南工学院找马进王小燕他们了解内情，并按着他俩提供的名单，下乡搞了两天实地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了，夏书记和一心要想提拔朱坤兴的关厂长一合计，不仅没有给处分，而且决定选朱坤兴当设备科长的原定计划，雷打不动。夏书记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正是他的精明之

处。在凌漪身上栽了一个跟头，新到一个地方，跟原来就在的领导搞好关系，是自己站稳脚跟、争取东山再起的上策。而关厂长这个人本来就很好相处，大炮筒子脾气，又性急，又直爽，就是见着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觉得难摆弄。特别是那位大学科班出身的老设备科长，布置给他的任务从来就不说一个“不”字，贯彻起来，却从来没有哪一次，完完整整地不走样。要是对那些工人出身的中层干部，因为以前是一张芦苇席上滚爬过来的，毫不留情，立即破口骂。骂个狗血喷头不碍事，白天在厂里狠狠训一顿，晚上就可能是一张桌子上碰杯子。可是对这设备科长，就不能这么干，说不得，碰不得，说重了有伤读书人的自尊心，说轻了当着耳边风。老关对此常诉苦，适逢老设备科长要退休，就又开朗、又明智、又大度地对夏书记说：“老夏，选干部归党委管。你选吧，选谁我都没有意见。就希望能到下面车间里挑一个。设备科那几位，都跟他们科长差不离，既自高自大，又弯弯绕绕的，催头胀。”

夏书记对关厂长的感受苦恼表示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就带着选择不弯不绕科长接班人的使命，以参加劳动为名，深入车间进行观察和了解。最后选中同样具有直筒子脾气的朱坤兴，人正直，又好学，又是机械设备维修能手，又曾经在关厂长手下当过学徒工；而且读过一年半脱产的机械原理进修班，在车间里面，也算是个半瓶子醋的土工程师。关厂长听说了，对他具有伯乐的眼光极敬佩，极满意。送朱坤兴下乡搞社教，原不过是过一下门，并不是要让他从此把政治当饭吃。因此工作队领导签的“政治立场不稳啦、划不清阶级阵线啦”之类的评语，在关厂长的眼里，就好象是评弹团的艺人在说大书，编谎话。吃喜酒的时候，看到新娘天仙般的美容时，他更是对自己徒弟的眼力大加赞赏：“这样一个活鲜鲜的大美人，踏破铁鞋也无处找。哪个见了，哪个也无法立场不动摇！”酒热耳酣之际，被酒精鼓捣得忘乎所以的关厂长，当着一班喝喜酒的弟兄，险些把领导内部掌握的机密，都拌着满嘴酒气一起泄露出去。

夏思云是第一次以领导身分出席部下职工的婚宴，这在机关里工作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这百年和合的大喜大乐背后，还有复杂的政治名堂作碍难，就出自本能地想回避这种酒肉场面。但是听说关厂长会出席庆贺，朱坤兴又是三番五次地邀请，又执着，又热诚，就觉得顺应大流是良策。朱坤兴在工厂里，如今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主流派，而且是一名中层干部。如果不接受人家满腔热诚的邀请，不仅是自绝于工人阶级的主流派，也是明目张胆地跟关厂长及其手下一大帮中层干部唱对台戏。事情的性质，本来是该不该同出席婚礼的地主女儿及其地主母亲划清界线，一放到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却成了要不要同工人阶级和关厂长划清界线的大问题，由此觉得斯大林“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论述，无比英明和无比正确。

夏思云昏头昏脑地回到家里，老伴觉得他大脑血管中的酒精含量浓度，并不妨碍要他在“十万火急”的事情上面立即拿主意，因此不接受他“有什么事情明天谈的”建议，不由分说，就把一份材料塞到他手上，还把送这材料者的名字，使他无比惊讶地告诉了他。夏思云这时才发觉，无论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老伴的通情达理，都是无可置疑的，这样一种特殊情况确实是不应该耽搁到明天去谈的。他苦着脸，把那份见证材料前前后后看了两遍，又要求老伴把当时看到的现场情况反复交代复述，逐字逐句同纸面上的墨迹作核对，最后又极其严肃地问老伴：“你确认这写的情况同事实没有出入

吗？”老伴肯定地点了点头，却对他没有领会她的谈话要点很着急，心里不由怀疑自己选择时机的合适性，是否受到了老夏头脑中酒精含量的破坏和捣乱？可是老夏的脸色却越加变得严肃起来，竟然把家庭当作单位来对待，一本正经地开口问：“你是中共党员吗？”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明知故问，夫妻相处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让她的耳朵开了眼界（连耳朵也能开眼界？）。

“是党员，就得实事求是站在党性立场上！”夏思云见老伴无法抵赖和否定，就采取紧逼战术，一下把她的退路封死。白慧芬这才明白过来，判定丈夫对昔日情人仍然有旧情，因此不惜承担不良政治影响，也要唆使她出面作见证；然而他唯恐暴露了那条深藏的感情上的狐狸尾巴，就冠冕堂皇地把党性原则搬出来作挡箭牌。“唉，老夏啊，老夏，这又是何苦呢？难道你到今天还不知道，当初是谁把凌漪引到你的身边的？又是谁在凌漪面前苦苦哀求为你减轻罪名的？如果你确实想帮她，只需一句话把意思说白了，别说是一个签名，就是一百个签名，我也不会手指发抖的呀。”夏思云的老伴从抽屉里取出钢笔就签名，心里一边对夏思云对自己缺乏深刻了解进行抱怨，一边又觉得在良心上，卸去了一大包袱负担，觉得好松快。其实她在借用缓兵之计对凌漪拒绝签字的第一刻，精神上就被两种责任感折磨得很痛苦。一方面，是自己受尽冤屈的老部下，在自己丈夫的事情上，她一直就觉得欠了这个老部下深重的孽债，一直想着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她。而另一方面，现成的报答机会送到了手头边，可是这种报答，却要以损害丈夫的名声作代价，她能这么做吗？她能让别人去猜测：白慧芬为何对丈夫以前的姘妇那么仗义执言？不，她不能。因为这份人情债，就是为了挽救丈夫的名声才欠下的，如果又以损坏丈夫的名声去偿还，那还不如当初就不欠这份人情为好……。这些令人烦恼的思想斗争，从凌漪告辞起，一直把她头昏脑胀地纠缠着。现在好，她终于被解脱了，全亏了老伴对以前那位年轻美貌的情妇仍然抱有一颗有恩有义的心！而在这颗恩义之心上，义正词严地包装上光明磊落的党性立场和原则，这种虚伪，这种矫揉造作，却并没有降低老伴在她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反而使她对他更加崇敬。因为正是在这种节骨眼上，能看出老伴为人不卑鄙，不下流，待人情深义长；而不象某些手中有权的人，利用权力地位玩弄起女性来，情真义切比谁都装象。而一旦玩到影响自己权力地位的境地时，又比任何人都要翻脸无情。

就这样，几乎是喜出望外的，仍然生活在夏思云一片暗藏情义之中的凌漪，在第二天就拿到了那个本以为可能逃之夭夭的见证人姓名。就这样，这份见证材料通过许洪元的手，很快地就转到了恭主任的手里。这份材料本是恭鹏志所期待的，却没有想到一拈到手上，却给他带来了始所未料的不愉快。当他带着有关汇报材料和自己的处理打算去见武遥时，武遥只是笼统地表示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给凌漪落实政策及对凌漪丈夫进行复查的建议，并没有表示具体的意见。但是恭鹏志看得出来，武副书记对他的工作和建议是满意的。恭鹏志并不知道，当武遥全面审阅有关材料时，他那超强性的记忆力，已经帮助他回忆联想起了九年前《锡城日报》社那个高远为同一个案子所受的牵连。他甚至想到，如果对那位作家丈夫可以甄别平反的话，也许可以为高远也作一个甄别。然而，恭鹏志因在武副书记面前一炮打响而产生的喜悦，却很快就被新的情况抵消了。他没有料到，遵循往年习惯去海滨城市疗养的陆书记，今年会在盛夏来临之前，匆匆赶回市委大院，而且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革命干劲和充沛精力。他开始全力以赴地主持起市

委常委会的工作来。而省委派来准备接他班的武副书记，却被他安排了一张市文革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又让他恭鹏志担任“文革办”的副主任，负责中学文革运动方面的日常指导工作。恭鹏志看到陆书记蓦然间挥发出冲天的工作热诚，开始重新审视起省委领导的真实意图来。上面派武副书记来锡城市，会不会仅是一种促进鞭策的手段，一种治疗陆书记无病呻吟、小病大养的方法？因为，如果一点不存在让陆书记继承留任的可能，如果省委领导嘴里没有漏出一点相关的口风，老谋深算的陆书记，是绝对不会这样拼着老命起劲瞎折腾的。而陆书记这么突然一起劲，他这个市委办公室主任就在工作关系处理上，就增添了很多为难和烦恼。奚大雄和凌漪夫妇的案子就是一例。“文革办”的工作，更使他无所适从，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应该向武副书记负责，还是对陆书记直接负责。上次武副书记回市里开常委会期间，因为白天抽不出空，特地晚上把恭鹏志找到家里去听工作汇报，并且在交谈的字里行间，对好多事情都把他蒙在鼓里的情形，作了含蓄的批评。而俞市长对他的当面指责批评，更是赤裸裸的，毫不客气地责问他：“你是‘文革办’的正主任还是副主任？”

因为党政两条线，俞市长手下另有一套行政班子，虽然对外合称市委办公室，实际上由另一位副主任管，彼此工作界线明确。但是，有界线就有矛盾，就有误会，就有隔阂；因此平心而论，在陆书记与俞市长的矛盾分歧中，尽管恭鹏志在感情上，更暗暗地倾向和同情俞市长，在具体工作上，却不得不执行陆书记的指示和意图，从而常常不可避免地同俞市长产生抵触拗劲的情况。俞市长无法体会到他的难处，对他日积月累地建筑起了根深蒂固的成见。因此在心底里，恭鹏志对省委让武遥接任陆书记的意图拍手叫好。他已经意识到武副书记和俞市长之间有较好的私交，难免生起欢欣鼓舞之心，觉得自己在两头打架的大象之间屡屡遭受践踏的悲惨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现在才知道自己过于乐观，两头老象未去，一头涵养不算不好的新象，却终将无可避免地加入践踏他的角逐中来。他对造成俞市长尖刻批评的原因，心中亮如白昼，但是却深感无可奈何。要求查批惠湖中学董校长重用坏人的指令，是陆书记亲自下达的，其真实用意，当然是冲着俞市长“百尺竿头、更进一丈”的题词来的。

他对陆书记那种特别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之类的想法做法，以及为了贯彻他的主观意图而不惜以邻为壑，常常心存疑问。而对董校长为了提高高考升学率，用人不讲政治的孟浪做法，以及俞市长还对此大加赞扬，亦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授人以柄，自找麻烦。他现在被派在那张专门抓人把柄的位置上，陆书记又明确指示他要抓这个把柄，君令如山，不能不抓，因此他就照旨下达，要求惠湖中学工作组季组长按旨办理。在受到武副书记和俞市长或暗或明的批评以后，恭鹏志突然有所醒悟，觉得俞市长的责问特别具有启迪意义。从那以后，每当接到陆书记的指令后，他就马上向武副书记作电话汇报。如果武副书记不提异议，他就遵照办理；如果武副书记有不同见解，他视情况性质，或者按新的指示办事，或者对新旧指示，一概按兵不动。陆书记责怪下来，他就推说已经向武副书记作过报告。所幸，碰到要追究他的按兵不动时，武副书记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实话实说地把责任揽到自己的头上，决不搞两面三刀，使手下人吃夹档气。惠湖中学季组长对部分学生斗批董校长所以不再积极支持，就是因为恭主任已经作了战略调整。他近来已经不再一面倒地听从陆书记的指示，而是在陆书记和武副书记之间，稳

稳当地走起钢丝绳来。他虽然对运用这一新的技能，不敢夸口得手应心，但是至少并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的调适能力特强，而是福星高照，走钢丝所涉及的一方对象，对他保护有加，并不把他作替罪羊和挡箭牌来处理。他因此就对武副书记产生了一种感恩戴德的心理。这也就解释，为何他在电话里一听说惠湖中学季家驹所汇报的情况后，就立即闪电般地赶到批斗大会现场，不仅坚决果断地阻止了头脑发昏学生的胡闹，而且按照武副书记在电话里的指示精神，明确宣布：这种无法无天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批斗大会，决不容许重演；不听工作组劝阻擅自成立起来的所谓“红旗兵团”，属于非法组织，必须解散；并责令有关肇事者进行检查反省，争取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理。

恭鹏志从惠湖中学回到市委大院的第三天，陆书记就派人找他。他心想，一定是跟惠湖中学发生的情况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惠湖中学的火，是在他陆书记背后操纵之下，一手点起来的。眼看着那把火越烧越旺，连学校工作组都觉得已经有些控制不住了，不得不向市里讨救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党对中学文革运动的领导，他按武副书记的要求，奋不顾身地扮演了消防队的角色。如果陆书记从维护工作组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威信出发，应该对此加以赞扬和支持。因为维护工作组的权威，也就是维护市委领导的权威。如果陆书记一心要搞臭董耿以打击俞市长领导威信的话，此行就会变得凶多吉少，恭鹏志的心里就蹦蹦跳跳，好象揣着一只兔子似的，磨磨蹭蹭地走上市委办公主楼的三层楼，拐进镶有拼缝打蜡地板的书记办公室。陆书记看见他进了门，却假装没有看见他似的，只是低垂着头，倒背着手，在被紫色窗幔掩遮的落地长窗前，来回地踱着步。恭鹏志凭经验，知道挨上了阴雨天，说不定还会有暴风雨。按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并不报到式地叫他一声“陆书记”，而只是耐性地观赏陆书记有模有样地踱方步，而且竭力装扮出一个观赏者悠然自得的神态来，用于掩饰头脑里对各种恰当词汇和字句的紧张搜索和寻找。

恭鹏志对付陆书记的这套功夫，也是经过仔细观察精心琢磨，才逐步发展成长起来的。

一般人总以为，包括市委办公室里好几位自以为聪明的聪明人，碰上首长处于极度不满或震怒的时候，卑属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摆出一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样子来。可是在陆书记面前这样做，就无异于自招灭顶之灾。因为这样一种表现，只会使他越加以为你做错了事，你越是表现出一副胆战心惊、作贼心虚的熊包样，他就会越加认为你出了大问题，你要使他倾听和考虑解释辩解的可能，就越微小。反过来，你越是沉住气，不慌不忙显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来，他就会对自己原来的想法，变得疑神疑鬼起来；你的辩解说明，也就可以找到趁虚而入的机会和缝隙。这就是陆书记的可爱之处，他刚愎不自用，专断不独裁；汹汹发作之时，只要不被他的汹汹之势所吓倒压服，就可能起死回生，枯木逢春。恭鹏志就是凭着这一套，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顶风斗浪，历尽艰难曲折和险阻，终于从一个小秘书，跨上了使陆书记感到基本上可以信用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之职。在陆书记的这个办公室里，为了支持保护陆书记今年不辞劳苦战高温的革命积极性，特地新装了空调器。

这时候，啾啾作响的冷气，朝身上围过来，使恭鹏志的额头感觉凉凉的，手心感觉凉凉的；即使有沉不住气的虚汗要跑出来，也此路不通，被封

闭抵御冷气的汗毛孔密密集集地堵死了。陆书记今天这踱步时间，显得特别长，是否也是受汗闭影响，把踱步当作热身运动来看待？恭鹏志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刚升起来，陆书记的踱步运动就停止了，也不跟他握握手，使他可以从那手上的温度，感觉判断自己刚才的那种疑问，是否具有合理性。更使恭鹏志失望的是，陆书记根本就不提惠湖中学的事，使他搜刮枯肠搅尽脑汁所作的劳动，有可能因为文不对题全浪费。

“我问你，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组织上交给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陆书记冷冷地开口问。问题的内容，同惠湖中学发生的事情，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倒跟俞市长的责问大同小异。

“协助武副书记抓文革。”恭鹏志觉得对陆书记问题的第一点，因为不言自明的程度太强烈，就省略了，跳过直接回答第二点。回答完，立即醒悟似地对刚作的第一判断作批驳：怎么能说这句问话同惠湖中学没关系？他下面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连上来，“抓文革？到底是抓文革，还是压文革？”恭鹏志的脑子象车轮一样飞快地转动着……然后我应该怎么回答？哦，很简单。就说我是在市委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面开展工作的。这样的话，又可以看作下级对上级的表扬称赞，又可以看着为一种沉着有效的自卫防身术——随你怎么说吧，反正我本人没有作发明创造。你说是抓文革，是在市委领导下面抓文革；你说是压文革，是在市委领导下面压文革。别看简简单单一句话，不仅刚柔相兼，守中有攻，连下一步的退路，也已经埋下了伏笔：如果他不同意，硬是认定自己是个大智大勇、敢作敢为的发明创造者，下面就可以确凿可查地摆出武副书记的名字，和一连串相关的具体指示精神来。然后，他还有什么话，可以叨叨不休呢？把问题挪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去吧！——这就是结论，所有具有起码政治常识的人，都不难求出这样的共识来。至于我恭某人么，很荣幸，每次都能作为会议记录者，旁听常委们的讨论和争论，然而仅此而已，除了承担类似一台录音机的功能责任外，是不会承担任何其它责任的。可是，恭鹏志的这番脑力劳动，好象又一次白费了。

“抓文革？抓文革去市货运公司干什么？那里也在搞运动吗？”截止七月底，锡城市市委的每一个高层领导，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学校里的事，和工矿企业绝对沾不上边。因此，一个分工主抓文革运动的“文革办”副主任，莫名其妙地蹿到一家企业里去指手划脚，而且引出一封署名“部分干部职工”的“意见反映书”来，扰乱陆书记的心境和思路，这才是他今天找恭鹏志的主要原因。这份“反映书”上说：“……亲不亲，阶级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是这段时期在我们公司里，出现了阶级立场不分、共产党员和右派分子的老婆勾结在一起，企图为右派分子翻案的怪现象。而更为奇怪的是，当公司领导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对这种反常现象加以及时分析、揭露和斗争的时候，市委却来了一个名叫“恭鹏志”的领导，据说是市委办公室的主任，公然站在右派分子老婆及其同伙的立场，对公司领导施加压力，迫使组织上交出企图为右派分子翻案的罪证材料。对丧失阶级立场、受右派分子老婆引诱的那个奚大雄（党员、前市委小车队司机）加以支持辩护，长资产阶级右派威风，灭公司革命职工志气。我们强烈要求陆书记对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另外派人重新查处……”，云云之类。最后，还跟了两句陆波觉得意思并不紧密相干的革命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因为“反映书”是通过市交通局的现任主要领导亲自转交到他手上的，行文口气也不

象是出于一般工人之手，就不能不引起陆书记的高度注意和重视。

恭鹏志这时才算真正摸着了边，一面在心里为自己的第一判断平反昭雪；一面觉得自己脑细胞所作的牺牲，并非百分之一百无意义。凡事跟武副书记联起来的总思路，还是同样具有指导价值的。他就把怎么劝许洪元把信交给“信访办”、怎么奉武副书记之命亲自处理这件事，简单扼要地向陆书记一五一十作汇报。

“照你这么说，你作的处理决定，都是经过武副书记的批准同意的？”陆书记要把这个关键问题问清楚。

“我向他报告时，他没有反对。”恭鹏志据实回报，只是这样的回答，并不如陆书记所希望地那样清楚而明确。

“你把有关材料送给我看一看，把这封信拿去好好读一下，然后交给信访办时红霞去处理。凡事不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了，革命群众就会不满意！”陆书记的声调虽然并不很严厉，也许是顾忌到在下属面前，要照顾到武副书记的领导面子。但是如果仔细作品味，事关阶级斗争大是大非，问题的性质却是可以无限上纲的。而且一件事情分交两个方面去处理，也打破了市委下基层办事的老常规。恭鹏志对陆书记没有让他有始有终地把整个事情处理好，觉得有些意外。从某个角度去理解，几乎可以把这种另起炉灶的安排，视为对他的一种不信任，嘴上与脸色表情都不能作抗议，心里却觉得老大地不快活。

陆书记知道以这种方式作安排，是有一点不寻常，但是他觉得必须这样做。从听说省委有那个意图，要让武遥来顶替自己那一天起，他就在心里盘算开；不是纯粹为自己。作为一个具有三十余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对自己的去留，并不看得很了不得，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一切听从党安排，是最基本的党性立场。省委一是照顾自己年大身体弱，二是鉴于俞市长老是跟他闹磨擦，使他生闲气，不利于革命事业，也不利于老同志的身心健康，所以有这个打算让他退下来，静心休养，安度晚年，这是党对自己的莫大关怀和照顾。这样作理解，心中就又感激，又激动。感激激动之余，就激发起了极大的革命积极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末年，壮志未已”。他向省委领导多次表示，决心发扬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产党员就要坚持“春蚕到死丝方尽、烛到泪干火方灭”的崇高情操，再豁出来，好好干几年。省委领导对他重新焕发的革命青春和崇高情操，表示赞赏和肯定。但是武遥同志既然已经派出来了，就先不急于匆匆忙忙地收回去，让他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先熟悉起来，锻炼起来。按照自然界的规律，人总是要老的，革命干部，也总是要退的。把一个年轻力壮的候补接班人放在他身边，就可以使具有强烈革命责任心的老同志，免除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后顾之忧。陆书记对组织上深谋远虑，表示完全理解和赞成。同时立即拿出实际行动来，不畏炎夏酷暑，毅然取消外地疗养；在武遥走马上任以来，他老陆波就好象变了一个人。连他自己都有点不明白，那股子劲头，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如果要他静下心来写一份自我总结的话，也许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不放心！”是的，他不放心。

他对武遥，虽然关系不是很密切，对他不是很了解，却是早在1957年就打过交道，一接触，就觉得这个同志身上有一股与众不同的味道。他承认，这个年富力强的政治新星，确是思路敏捷，才华横溢，但是总觉得他有些华而不实，激情有余，稳重不够；时代已经前进了一二十年，共产党已

从一个煽动人民冲冲杀杀的造反党，变成了稳定中华、压制反动的执政党，可他，好象还是停留在当年在江南大学搞地下学运的年分。他的感情，他考虑问题的思想、立场、和方法，温和地讲，仍带有他早年搞学生运动的那种稚气，那种冲动，那种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的痕迹；严重地讲，带有某种西欧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民粹分子的色彩和成分。陆书记的这种感觉，是从那次处理工潮事件的分歧中来的。尽管，在经过内部激烈争论后，省委最终支持了武遥的立场，他也完全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在思想观点上，他是持保留态度的。是否可以把维护工人的利益诉求、感情诉求，作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人的一种体现呢？陆波对此抱有很大的疑问。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工人中只会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思想，而不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外部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工人阶级从一个自发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而这种“灌输”，必须通过一个组织纪律严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也就是通过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是布尔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主要分歧之一。借口工人罢工中存在某些合理要求，对那些公然向党的领导进行示威挑战的罢工分子给予同情、支持和辩护，实质上也就是重复了“第二国际”夸大工人革命自发性、轻视、放弃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错误。另外一个使陆波感到不安的情况是，57年“鸣放时期”<锡城日报>社出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据说，与武遥在报社蹲点有好大关系。在那段时期里，他对报社人员所作的鼓励动员，煽动性是如此之强烈，成效是那么之显著，真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充分领会到了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战略意图吗？陆波对此表怀疑。因为在“事情的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之前，即使是陆波所接触到的那些省委主要领导，显然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动员“鸣放”是为了“引蛇出洞”。这样从逻辑上一推理，就不能不产生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来：如果武遥并不预先知道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那么，他如此积极热诚地鼓励报社人员向党“鸣放”，又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倾向呢？

老的看法和疑问尚未消除，新的看法和疑问，却已经在陆波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和涌现。据任旭东任政委的反映，武遥在苏南工学院对反对院党委的少数右派学生，竭尽纵容包庇之能事。因为事关大局，终于迫使他采取了特殊的做法，借召回武遥参加市委常委会议之机，他要院工作组和院党委一起，对少数害群之马采取果断行动。他料到武遥知道最新事态发展之后，一定会大为不满，一定会给他打电话。可是他胸有成竹：这次双方所面对的，已不是57年的那次罢工争议；他已经事先向省委作过汇报请示，手藏威力无比的尚方宝剑。但是，他却并不急于把那尚方宝剑亮出来。他要让武遥凭自己的觉悟水平和阶级斗争判断能力，充分自我表现，是对是错，是好是歹，让他自己得到摔打磨练，而自己只能在关键对待。意义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文件，既然不按共产党层层传达、层层布置学习、层层理解和贯彻的老规矩办，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一下子就捅给了所有喜爱看报纸和听广播的老百姓了。表面上看来，这仅仅是个时间差的问题；其实不然，这是对各级领导干部一次政治上的大降级。因为这样一来，不要说那些思想意识有问题、偏好曲解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后群众，就连那些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可以不分先后地与一个堂堂市委书记、一个局长、一个厂党委书记，同时接收和分享到那些原本应该由各级领导转达注释的重要精神。而且，因

为是不分贵贱高低，大家同时阅读或收听，无形中就会形成一个文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常局面。上级领导既没有授予他对文件的解释权和学习指导权，下面那些自以为理解能力特别强的干部群众，也就不会需要他的解释和指导。而一旦缺少了这种必不可少的解释和指导，每个文件读者，不管他是心地纯正还是心怀叵测，对文件精神都可有意无意地误解歪曲，断章取意，各取所需。如此而往，这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混乱局面？陆波此刻还无法确切预计，却已经本能地预感到一种深深地不安。

其次，当陆波把各地报刊都于8月9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拿到手上时，他越是研究，就越是觉得：别提他是多么担心别人对它是会抱严肃端正的态度，就是他本人，似乎也有有一种断章取意、为我所用的强烈欲望和冲动。因为他觉得，这个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十六条》，里边的许多条文，几乎就是点着他的鼻子，对他文革开展以来的所作所为，在一条一条地批评和训斥。如果不对它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吸收理解的话，自己的心里就会非常地不太平，不安宁。

首先在总则《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中，《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陆波一看这通开门见山的话，就觉得好象是对自己迎头一板子，就觉得好象是直接听苏南工学院那几个形“左”实右分子所叫嚣的那套政治调门；而他却根据前一时期上面下达的有关指示精神，亲自去苏工弹压了这种叫嚣。

在“主流和曲折”中，《十六条》又毫不吝啬地夸奖说：“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一段文字，分明是在为苏工那些闹事的学生们唱颂歌！陆波心中颇不以为然地接着往下看：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很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会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上面那段赞扬的话，已经使得陆波感到不舒服；这一段话锋一转进行指责批评的话，一捧一压，就使陆波更为不理解。

在“‘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这一部分，《十六条》说：“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一）能够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

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它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它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打击革命派。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儿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这一段话，陆波明白这是让自己对号入座作反省的。“在这四类领导干部中，我应该归入哪一类呢？”陆波问自己。他觉得，自己归哪一类都不贴切，都不恰如其分。

“‘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这第一类先进分子，他不仅自觉不敢当；而且据他所知，能够得上这一档次的，在全国恐怕都是凤毛麟角。

“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云云之类。对照这段描述，陆波觉得自己又象又不象。

“我‘怕’字当头吗？没有。惠湖中学的大批判烈火，不是在我的遥控指挥下一手点燃起来的吗？然而，”墨守旧章法，不愿打破常规，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这类指责，与他在得知惠湖中学学生采取了过火行动和成立非法组织之后所抱的态度，似乎也得上号。

至于“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抓他们的辫子”这一类，陆波觉得跟自己不沾边。

最使陆波感到紧张的，却是第四类。当然陆波明知自己不属于这一类，但是他却担心喜欢强加于人的小将们，会硬把“党内走资派”的帽子往他头上套。对照自己对苏南工学院文革运动所作的某些指示和安排，“极端害怕群众”，“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把运动引向邪路”，“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打击革命派”，这洋洋洒洒一大堆标签，如果只讲效果而不顾他老陆波对党一片耿耿忠心的动机，不由分说地往他身上插，自己恐怕很难躲得开。

在“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这一部分，《十六条》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陆波觉得这是很笼统的话。

什么是群众？群众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等组成的。你相信依靠了群众中

的这一批，就很难同时相信依靠群众中的另一批；如果让他们按着各自的想法和立场各行其事，这乱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对几十万市民的安居乐业负有责任的市委首席领导，怎么可能不怕出乱子呢？

在第五部分“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中，《十六条》强调“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一段话，使陆波的紧张情绪稍稍得以减轻。心想，自己跟党革命几十年，执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路线又一向很坚决，总不见得就属于那一小撮百分之五吧？可是下面又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段话再次明确斗争矛头应该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群众中的右派分子，这就使陆波的情绪再次紧张起来。

在第六部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按这段文字看，陆波觉得自己对惠湖中学部分学生过火行为所抱的态度，还是对的。很显然，在大幅画像看上去是那么一脸慈祥的毛主席，也不会喜欢下面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血淋淋的。

在第七部分，《十六条》强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的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之类的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把戏。在运动中，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这第七部分是在明白告诉自己，这“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两顶帽子，他陆波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在“干部问题”一部分，《十六条》说：“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兵团的这批人，却根本就不屑来市委表示一下他们对地方党委应有的尊敬和信赖，却跳过省市两级领导直接向中央发贺电；而且，在这批号称有千人之众的非法组织所发的贺电中，明白无误地显露了一派杀机，电文这样写道：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一个最伟大、最正确、最英明的决定，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最最热烈地欢呼这个决定，最最坚决地拥护这个决定，最最忠诚地执行这个决定，最最勇敢地捍卫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再次雄辩地证明，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灯塔。毛主席是革命的伟大舵手，把革命的航船从胜利引向胜利，走向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

敬爱的英明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将紧紧地跟着您，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刀山挡不住，火海难不倒！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们苏南工学院院长长征兵团的全体革命战士，此刻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们怎能不激动！在大浪滔天的日子里，在风云多变的阶级斗争中，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困难时刻间，当我们耳边充斥着从某些大人物那里传来的、怀疑否定工作组就是怀疑否定党的领导，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的威胁和诅咒时，当我们承受种种歧视、打击和政治迫害时，我们多么渴望见到中南海的红灯，我们多么渴望听到党告诉我们：你们没有错！你们做得对！

我们终于听到了，从国务院的来电中，从光芒四射的《十六条》中，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发出的无限亲切、无限关怀、无限支持的声音。怒浪滔天的海面上，只有海燕才敢翱翔。险峻陡峭的山崖顶，只有山鹰才敢盘旋。革命者比海燕山鹰更勇猛。我们长征兵团的一千余名文革战士，决心按照《十六条》所指引的革命方向，坚决揭露、斗倒、斗垮、斗臭苏南工学院和锡城市市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教育方针及方法，胜利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展望未来，我们深知任重而道远。我们向党和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放心吧，我们会接过革命前辈手中的火炬，为保证革命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另一份东西出自惠湖中学那些激进分子之手。惠湖中学的报喜队伍倒是来了，但是据反映，那批组织和参与那个批斗大会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参加。红旗革命造反团的大旗是公开亮出来了，以红旗团名义复盖在俞市长那块题词大石碑上的一张欢呼《十六条》发表的大字报，同样充满着火药味：

“亲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英明决定长了我们的志气！撑了我们的腰！证明我们造董耿及其资产阶级牛鬼蛇神同伙的反，造得对，造得有理！我们的血管里流着革命者的热血，革命父辈打下的江山，要靠我们来捍卫！未来的共产主义大厦，要由我们去建造！

有您的领导和支持，人类解放的重任，我们担定了！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武装，我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勇往直前！

如今，您作出的这个伟大的决定，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体现，是我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的方向盘、望远镜，是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得到的及时雨，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我们牢记毛主席你老人家的光辉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

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因此，我们对党内外卖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帮分子敢斗敢批，结果触痛了那些市委工作组‘老爷’们的神经。他们对我们放暗箭，造谣言，抓把柄，耍赖反扑，把我们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的批判行动，说成是野蛮、暴行。对我们积极组织起来搞运动说成是搞、非法组织’，图谋跟党对抗。我们不理这个碴！市委工作组的老爷们，你们有多少伎俩，就都拿出来吧。我们不怕，不怕，不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是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资格有多老，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我们要挥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反动的东西，创出一个共产主义新世界！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您的好学生、好战士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读一辈子你的书，听一辈子你的话，一辈子按你的指示办事，一定把无产阶级的江山保到底，一定把您的思想红旗插遍全人类！”

听说，就在由工作组组织、俞市长儿子俞彦带领惠湖中学师生来市委报喜的那天，红旗革命造反团在校园内外的围墙上，首次贴出了“市委工作组压制文革运动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炮打拦路虎，搬掉绊脚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的大标语。在张贴这些标语的过程中，引起了附近几家工厂企业上下班职工的大批围观。学生们并向围观职工进行游说，鼓动他们也起来造反。这几家单位的保卫部门发现，职工手里有好多从惠湖中学传发出来的内容令人震惊的传单；这些传单，在部分职工中已经引起了不稳定的状况。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在拥有数千名职工的建新机械厂，竟然出现了把矛头指向厂党委的大字报；这在全市工矿企业，事属首例。陆波作为锡城市统管全局的市委书记，现在最为担忧的有两点：一是不能让苏南工学院的造反学生和惠湖中学的造反学生串到一起去。二是不能让惠湖中学的造反学生和建新机械厂的造反职工串到一起去。他开始对两大问题产生了怀疑：第一，当初匆匆打断疗养计划赶回市里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是否明智？第二，他一向看不惯的武遥的那种民粹主义倾向，如今是否已经在全党成了一种主流？

陆波很清楚自己与武遥之间的不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武遥就是属于那些党内少数喜欢搞自我发明创造，喜欢追时髦、赶浪头，跟着报纸上的风向瞎折腾的人。在最近一次专门讨论文革问题的常委会上，武遥毫不足奇地引用了一大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论述群众运动的有关社论摘要，以此作为其庇护苏南工学院那几个所谓“群众”所作所为的理论依据。其中有7月3日《人民日报》所转载的《红旗》杂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日报》7月21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日报》7月29日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三篇社论，自始至终散发着强烈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民粹主义气味。

《红旗》杂志的社论说：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兴起。……

发动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

伟大的创举。

亿万人民群众起来批判旧世界，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特点。

毛主席告诉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革命的战争是这样，无产阶级的一切事业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这样。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同样，没有群众运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群众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有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出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才能使无产阶级深入地开展，……。”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用毛主席著作也用得最好。他们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他们是摧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盘踞的思想文化阵地的主力军。如果低估了这一点，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党的正确领导，就是要善于走群众路线，就是要自始至终把放手发动群众作为运动的根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针。

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岭，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一切修正主义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我们党所以有力量，就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只有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放手发动群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那就违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党的领导原则。”

“我们党必须依靠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要受级别、资历、年龄等错误框框的束缚，把坚定的左派组织起来，作为运动的骨干，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

只有依靠坚定的左派，放手发动群众，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才能辩明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运动健康地发展。”

《人民日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社论，则断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就是因为那里的负责人，他们能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站在运动的最前列，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地鼓励群众贴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领导群众投入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去。……但是，也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并不是这样。他们象叶公好龙一样，口头上也讲群众路线，等到群众起来了，他们却害怕了。他们怕这怕那，怕群众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来，怕群众抓住自己的一些小辫子。……另有少数人，对群众摆出做官当老爷的架式，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群众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群众贴了他们几张大字报，他们就受不了。他们甚至找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他们这样做，不可能领导文化大革命，日子就混不下去，结果就会被群众所抛弃。

……

共产党员绝不能够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进行革命。共产党员如果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对群众摆出一副官架子，这哪里有什么共产党的气味呢？这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绝不能保存国民党的作风，绝不能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

对于什么是共产党的作风，什么是国民党的作风，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分得清的。但是，有些人有时候分得清，有时候又分不清；或者在一些问题上分得清，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分不清。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竟然分不清共产党作风和国民党作风的界限，那是最危险的，那就站错了队，站到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的位置上去了。”

《人民日报》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则强调：

“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主观地定调子，划框框，那就会束缚群众的手脚，损害群众的积极性。

如果不先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发号施令，就会两眼模糊，分不清敌我，抓不住要害的问题。

这样，就不能正确地领导运动，就会阻碍运动。因此，每个共产党，都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赞成自己的意见，也要群众听反对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对于赞成自己的意见，总是容易入耳的。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就不大听得进去。其实，听听反对的意见，对于全面地判断情况，往往是必要的。”

“我们要认识，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标准。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

……”

说实话，这类报刊文章的政治份量，其观点论调一点都不对陆波的口味。在他的心目中，其权威性也无法跟那些从上级领导直接下达的指示精神相比较。而如今，这些为武遥所津津乐道的却充其量只能“仅供参考”的社论口径，却明显左右了《十六条》的基调。这一变化虽然没有使陆波产生天翻地覆的感觉，但是对什么是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为民请命”作特征的民粹主义，什么是社会民主党的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思潮，什么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本质，一下觉得非常地混淆不清。当然，这种内心深处的混淆不清，即使是对自己的老首长，也是不能随意吐露或提问的。他有时觉得：真应该躺在北戴河或滇池畔的干部疗养院里，好好研究攻读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自己就不会受这种前所未有的理论困惑所烦扰折磨。但是一想到在中共党史上，好多机会主义路线的大头目，不乏学富五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家，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理论如果与实际不对号，就比狗屎还不如。狗屎还可以沤田，搞清了什么是民粹主义的内涵，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谛，能象狗屎一样用来肥田吗？显然不能。不仅不能，而且可能使自己有坠入机会主义泥坑的危险。所以，关键的关键，是要搞清自己老首长的政治态度和指示精神。江苏省委在建国以来的历次大运动中，一向保持不偏不倚的稳健姿态；省委主要领导的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陆波相信可以代表全国绝大多数省委、直辖市和自治区第一书记的

政治态度。跟着这样一位上级的脚步走，就是跟着全党大多数人的脚步走。如果以苛刻的语言作挑剔，也许你可以把这说成是随大流。但是，在一个人数位居世界第一的政治大党中随着大流走，又有什么不好呢？陆波这么多年来，就是随着大流走过来的。就这样走呀走，这个主要有随大流成员组成的党，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它的随大流成员，也大都在职位上步步高升，水涨船高。而那些身败名裂的，大都是那些不随大流走的人。把握住了这一点，陆波就从《十六条》发表之后的第一轮思想冲击波中，回过一点神来了。陆波从南京得到的信息既含糊，又明确。含糊之处是，省委对于前一时期所作的与《十六条》精神相违背的种种文革指令，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和检讨；这当然是陆波和他的其他同行们所求之不得的。明确的地方是，要求各位到会者回到本地后，立即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左派队伍，牢牢掌握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对部分单位群众不满工作组的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工作组前一阶段“反干扰”的成果，不能搞“一风吹”。按照有关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工作组的情况分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很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因此对工作组不能一概否定。这些话，都很对陆波的胃口。他在脑子里所作的思想准备，和肚子里打好的检查腹稿，都一无用场，白白地浪费了。当然，对目巫醜伪鸪鲂牟玫匱刘潘*壁排成一个方圈，以便在关键时刻可以求得面面相觑的戏剧性效果；在教室正面的大黑板上，用硕大的黄色粉笔字体写上一段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样可以使人一走进教室就触目惊心，主题明确，印象强烈而又深刻。然而，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失，九月初四五十号人挤在一个教室里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使汗流浹背的会议等待者们越来越失去耐心，那两名已经被不厌其烦地通知过好几次的主角，却迟迟不露面。上午还在校园里看到过他俩的身影，此刻临时派出的紧急搜查部队，无论在校园里还是在他们家中，却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盘问那两个反动老子，那付疑惑好奇的样子，比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装备的革命小将，显得更加一无所知。此时此刻，在整个延安中学，不，也许应该说，在整个锡城市，只有两个人知道袁世清和孙晨菲的去向；其中一个人就在教室一角，用讥嘲的眼光，正端视欣赏着两位红旗团的学生领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教室内外进进出出地乱成一团。这个知情者，就是袁世清的同桌好友张本度。袁世清动员他一起走，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并无必要踏上那条凶险莫测的不归路。另一位知情者则是杨玲。作为她所赞赏的两个得意门徒，袁世清和孙晨菲临行之前，请张本度向她转交了一封告别信。就在她的另一得意学生史苏星感到手足无措的这一刻，她此刻正心绪不宁地坐在她那幢常委楼的书房里，心中被满腹忧虑和犹豫所折磨，左思右想，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拨响通向公安局的电话铃。

第十二章 示众

1966年的9月初，是惠湖中学的袁世清和孙晨菲突然从锡城市失踪的日子；也是锡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不同寻常新阶段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一大象征，就是文革运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越过了学校的界限，锡城市市委在全市工矿企业中，也开始有选择地派驻工作组。其中之一，就是市货运公司。工作组由市委信访办公室主任时红霞带队，读者一看这来头，就一定会以为：这工作组恐怕是奉陆波的指令，专门冲着中共党员奚大雄帮右派分子老婆搞申诉翻案的事来的。其实不然，奚大雄与凌漪勾搭之事虽然沾上了一点边，一上来时，却并不是市委出动工作组的主要考虑和目标。只是在工作组充分发动群众摸线索、查问题的情况下，加上去大西北劳改农场的外调有了对凌漪极不利的结果之后，奚大雄同凌漪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才成了工作组的关注目标。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社论，公布了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消息。8月9日，各地报纸以套红标题，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3日下午5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这一个接一个被人们当着特大喜讯的消息传到锡城市后，只见坐落在市中心的新华书店门前，张灯结彩，人头攒动。在新华书店的楼顶上，悬挂起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巨幅标语。标语下，人们排起一望无边的长队，井然有序地向前移动。能领取到免费发行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本，似乎是可以免费买到定量供应的猪肉鸡蛋白糖还要兴奋，还要激动。川流不息的贺喜队伍，肩扛着大红喜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群情激奋地涌向市委机关接待站，“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而当市货运公司工会在公司经理崔志中的授意下，敲锣打鼓地出动了三辆披红戴花的大卡车，为这欢乐的洪流也增添一束喜庆的浪花时，公司办公楼一向由诸申精心设计编排的墙报专栏上，却出现了一张与这激动欢乐气氛格格不入的大字报，标题是：“崔志中要把公司引向哪里去？”

这张公然把矛头直指崔志中的大字报一开头，就锋芒毕露出口伤人地叫嚣：“激荡奔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冲涤着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使各种各样善于伪装的牛鬼蛇神，逐步暴露出丑恶的反动嘴脸。现在，也到了揭开我公司不可一世的、太上皇‘、以、一贯正确’自居的崔志中真面目的时候了！”接着，大字报就信口雌黄如数家珍地给崔经理列举了如下五大罪状：

(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对职工颐指气使，官气十足，不关心其疾苦痛痒。大字报披露：修理厂和公司技术科旨在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机械化设备方案，至今压在崔志中手里不批办，理由是缺资金。但是买新的小车为什么就不缺资金了呢？公司的新职工宿舍楼一盖起来，自来水供应就经常中断，说是水压不够，水压不够为何不在楼顶加蓄水箱？说是经费紧张，为什么同样的水压不够，在办公大楼顶上加水箱经费就不紧张了呢？

(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货运公司当作自己的一统天下。对不听从他个人指挥和不满他那套领导作风的同志，处心积虑地打击报复，穿小鞋。

大字报以叶子栋出了责任事故提拔做调度，奚大雄出了非责任事故却贬烧碱水缸作例子。

(三)好大喜功，浪费国家资金搞汽车吊车，搞出一堆废铜烂铁却既不自我反省，也不承担经济责任。驾驶员和修理工出了交通事故或机械事故都要扣奖金，请问国家损失了几万块钱，崔经理少拿一分钱的奖金了吗？

(四)利用职权，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大收丧礼。前年崔志中的父亲去世后，崔志中不顾自己共产党员的身分，烧香拜佛，大做法场，大办丧礼和大摆丧宴，并为此出动公司大车小车五六辆。公司科室人员和各分场的头头，几乎都送了丧礼。文章气愤地责问道：请问，你崔志中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做，身上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吗？

(五)借公济私，在困难时期助长帮助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强迫驾驶员开公家汽车帮他在农村的亲戚搞长途蔬菜贩运。

大字报的结尾处，引用了一条毛主席的语录作镜子，用意恶毒地把极有共产党领导气派风度的崔经理，对照贬斥得丑陋不堪。大字报的作者，是要想在修理厂保修机具装备上露一手、但因资金告吹而未露成功的诸申。附签者有两位，一位是李辉康，前两天刚刚与专程前来公司登门拜访的昔日老同学、如今呱呱有名的首都三司驻锡联络站代表郭贤会过面，心中的文革激情被北京带来的火把点拨得如火如荼。另一位是至今无法重捏方向盘的冯有强，据他的一面之词，他之被剥夺开车的资格，全因为没有圆满完成崔志中要调度交办的长途蔬菜贩运任务。

这张石破天惊的大字报一出笼，立即在市货运公司掀起了轩然大波。谁说崔经理脱离群众？谁说他不关心公司职工的疾苦痛痒？修理厂以童年财为首的一批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就坚决不同意！他们个人有什么困难，只要找到崔经理，在许可条件下，总是能够得到解决和满足。他们也就越加拥护爱戴他。前任党委书记跟崔经理斗得热火朝天、难解难分之际，就是这些斗字不识半盒的老工人，由五场党支部丁荣兴自告奋勇执笔代劳，联名给局党委写了一封象模象样的“人民来信”，尽管所签的姓名龙飞凤舞，有几个甚至用鲜红的手印代替签名，却是绝对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意愿，经得起公安局的任何验证。联名信的结果，当然使阶级立场分明的局党委，不能不考虑老工人们的意见愿望。深孚众望的崔经理得以留任，失却老工人信赖拥护的书记，却不得不另谋高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张丧心病狂攻击崔经理的反动大字报，其矛头不仅是对准了崔经理个人，而且是对准了崔经理所代表的上上下下的一大帮革命干部群众。如果崔经理正象大字报说得这么坏，这些缺文少字的粗人也许分不清，可是上面的局党委难道就变成睁眼睛了吗？如果局党委变成了睁眼睛，那局党委上面的市委，市委上面更高的党组织，不也都变成睁眼睛了吗？这样一层层地推想开来，共产党的天下，不就变成瞎子眼里暗无天日的境况了吗？那不就是把共产党跟国民党的根本区别都一笔抹杀了吗？真是可恨可气，一群日常深受崔经理关心照顾的老工人们，心里忿忿的，恨不得立即把吃了人饭却乱放狗屁的大字报作者揪出来，学着红卫兵小将牵着成群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街上榜样，也给戴上高帽，挂上牌子，让他们上街去兜兜风，风光风光。

另外一些对崔经理既无特别好感、也无多大恶感、既有文化、又精通世道的公司职工，觉得大字报所罗列的罪名，虽然听上去好象言之有据，有的还早有所闻，但是平心而论，把崔经理与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那些干部相

比，既不见得坏到哪里去，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这么兴师动众、危言耸听地大做文章，所涉及的一些事例，又跟大字报签名者多多少少有些牵连，就未免有一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在内。加上这大字报的签名人，又都清一色的是奚大雄的宿舍同伙，那怕是真心实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总会使人把贴大字报的动机，跟奚大雄或紧或松地连着一点，使人怀疑这里面也掺杂着一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哥儿义气。这当然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本意格格不入！因此，他们除了对素抱好感的奚大雄，多少有一点同情的心理，但基本上还是抱着一种不偏不倚、拭目以待的中立态度。

崔志中对公司里这两类人的立场态度，心里大致有数。他对李辉康没有大印象，对其他两位，却早就知道他们对自己心存不满，说不准要借什么风吹草动之机，跳出来表演表演，较量较量。“那就奉陪吧，舍命陪君子！”他先后在科室会议和有关职工大会上胸有成竹地宣告，语调风趣幽默，还轻松地耸耸肩膀。“现在的右派进步了，他们虽然仍然用跟五七年相似的陈词烂调攻击党，但是不象五七年那时候嚷着要共产党下台，而是有了新发明，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甚至用毛主席的语录来打人。那大字报的最后一段话是怎么说来着？、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着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大概是这样说的吧，我背不好，毛主席语录没有那几位贴大字报的党外先进分子学得好。然后是怎么说来着？、请对照一下吧，崔志中这个领导干部，他的所作所为，还称得上一个合格的人民勤务员吗？不，我们觉得，他不仅不合格，而且连人民勤务员的一点气味都没有！’乖乖，好家伙，先是说我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后是断定我一点人民勤务员的气味都没有。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市委组织部提要求，告诉他们，我的档案材料已经不够资格再躺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了，让我带回去交给我公司的诸申冯有强等同志保管吧。他们最革命，最有权威，最有资格，可以凭毛主席的语录来给领导干部下鉴定。我还对市委陆书记说，建议他把市委组织部撤销，既然下面有水平那么高的革命同志管着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就不要再搞重复领导了。”崔志中这段有声有色的风趣话，说得下面的人哈哈直笑。但是，为不让这些笑声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冲淡了气味，他自己却铁板着脸，一点笑容都没有，紧接着说：“可是陆书记说：不对呀，如果我们党的市委组织部门不管你们这些党的宝贵财富，而交给那些背景不详动机不清的党外人士去管理，或者交给那些跟乌龟王八勾勾搭搭的个别党内人士管，那我们共产党的天，不是就被人给翻过来了吗？不行！我们不能拱手退让，而要借着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时机，把那些打着文革旗号跳出来跟党较量的英雄好汉们，好好清查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平时都跟那些人来往，背后搞了那些阴谋诡计，让他们彻底暴露在革命人民的眼皮底下，然后，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崔志中在讲这番话的时候，长一句短一句地把市委陆书记的招牌掬起来，使听众们觉得：他跟市委书记有说不尽的亲近，道不完的紧密。有这种坚强的组织后盾，就使他的论调与号召，显得格外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和煽动力。其实，借上次由交通局党委领导转交了那封有关奚大雄的“人民来信”为契机，他虽然和陆波有过一两次电话交谈，却并没有建立起密切的私交关系。上述那些在电话里交谈过的话，总的意思虽然七不离八，却并没有、也不可能允许他跟市委书记采取那类调侃性的文字语调，更没有含沙射影攻击

“个别党内人士”奚大雄的言词。不过，有水平的领导，在传达上级精神意图时，总会加以必要的艺术加工。

否则，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生产，轰轰烈烈的声势就难以形成。经过这样艺术性地一鼓劲，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叫打”的革命大批判场面，很快就在货运公司出现了。“揭露反党野心家、阴谋家”，“抓政治扒手”，“击退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大标语，声讨会，大组批，小组帮，思想交底，政策攻心，一下就使三个犯上作乱者陷入了灭顶之灾。然而，正当三名胆大智昏的“表演者”精神几近崩溃之际，早已被批判声讨文章重重复盖了好几层的公司墙报专栏上，却又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其中一张大字报的签名者，除了原来三名已经被公司革命群众批得狗血喷头的政治狂妄者，竟然又增添了几名以卵击石的不知好歹者。这批狂妄分子的挑头人，就是靠着恭鹏志的干涉，刚刚从碱水缸转到五场机修车间劳动的奚大雄。另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既非本公司职工，亦非本地市民。然而闻其威名之赫赫，观其文字语调之铿锵，虽然仅不过是几掬墨汁和一张白报纸所组成，却似有江河奔腾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使读者如惊雷贯耳，如醍醐灌浆。其大名，竟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奚大雄他们，把红太阳的大作公布于众，让公司同事开眼界。

奚大雄作为一个组织同志，竟然也这样沉不住气，这样跟崔经理对他事故处理上的从严要求和会议上几句旁敲侧击的话斤斤计较，实在是负邱铭书记在崔经理面前所作的一番斡旋之功。在半个多月前因心血管系统老毛病而请假在家将息的邱书记，听到奚大雄竟然赤膊上阵跳出来，直接向崔志中宣战的消息时，口中不表赞成、心中却暗暗叫好之际，却不免有些纳闷：这奚大雄又不知道姓崔的背后在继续做他手脚，怎么会正面主动出击，明刀明枪地跟崔志中接火对仗呢？邱铭当然不知道奚大雄有贴心朋友在市委开小车，更不知道奚大雄是否从贴心朋友处得到内部消息。反正邱铭一听局党委书记跟他提起公司有人向市委陆书记写“人民来信”的事，就知道奚大雄的案子复杂多变，于是就三十六策，避为上策，先请三个月的病假躲到一旁观起风声来。结果前脚刚离开单位，单位里后脚就沸沸扬扬地闹腾起来，不由得暗自庆幸自己出脚开溜得及时正确，不必为人救火，代人受过。这次由奚大雄带头签名的再次向崔志中挑战的大字报，很有策略地避开了签名者们与崔经理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集中火力，批判攻击他卖力推行“物质刺激”、大搞“奖金挂帅”的罪状，并给堂堂崔经理扣上了“腐蚀毒害工人，破坏社会主义运输生产”的大帽子。这样的批判调子，跟《人民日报》上连篇累牍批判社科院经济学家孙冶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论调，丝丝入扣，遥相呼应。所举例子，也是证据确凿，惊心动魄。这个紧跟《人民日报》精神的例子，是由冯有强提供、并经过幕前幕后策划者的精心考虑。那件使人至今心有余悸的恶性事故发生时，无论是第二张大字报的实际启动者奚大雄，还是大字报的执笔者诸申，以及受了清华大学“井岗山”人士蛊惑头没脑地轰过来，使得一向处惊不变、坐怀不乱的崔经理，也有些沉不住气来。

崔志中找手下几个信得过的人作询问商量。一向关心时政、且熟读《人民日报》等报刊文章的五场党支部丁荣兴，不能不婉转地提醒崔经理：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看来是中央确定的重要斗争目标之一；对方打着这一旗号向公司领导发难，不可等闲视之。素来以结交广泛、消息灵通著称于世的叶子栋，吞吞吐吐地告诉崔经理，他好象也听到有关人士说起过，不

久前毛主席确实在中南海贴了一张什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崔志中听了这些刺激神经的话，心里真的开始有点慌乱起来。还是身材矮小、一脸精瘦的丁支书，显得比较稳得住。当年出那件惨祸时，他是保养工段的工段长，要论领导责任，他可能也逃不了，也可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因为他就是对用硬板纸垫刹车片的土办法，曾经提出过疑问的保留意见者。但是童年那帮子熟于此道却从未出过岔子的人，却直接找崔经理评理。因此出事后，如果上面要追究直接领导责任的话，他是掌握着有效的防身武器的。然而他不用，崔经理把他包了下来，他也就把众所周知的自卫武器不动声色地藏起来，以至当时局里派下来的事故调查组，并不了解他这个工段长，虽然其貌不扬却具有过人的先见之明；而且能顾全大局，临危不惧地为公司领导守口如瓶，把自己的嘴唇在关键时刻，修炼得比金子还沉默，还金贵。这就是崔经理为何提拔和信用他的缘故。崔经理识人，这就是他在货运公司的领导根基多年来坚如磐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重大历史关头，他找丁荣兴咨询商量，也算是找准了对象。只见他掏出一根“大前门”，分发了一圈，微踮脚尖，“啪嗒啪嗒”用打火机给一一点上火，然后把自己嘴唇上的香烟缓缓地吸上一长口，把烟雾缓缓地吐出一长口，然后不慌不忙地说：“拉着局领导，一起向市领导汇报去。这、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当初是他们上面下来的，现在当然得有他们出面挑肩膀嘛。”崔经理如梦初醒，对着丁荣兴的肩膀猛拍一掌：“说得好，不愧为货运公司的诸葛亮！”

这时候，一直没有发表什么象样意见的保卫科傅钟宝科长，也象受了启发似的，鞭辟入里地说：“对，上级领导是不会坐视不管，见难不救的。否则下面先乱起来，然而再顺藤摸瓜找上去，上上下下，一起连锅端。”

崔志中觉得手下的这几位心腹臂膀，一个比一个说得精采，道得深刻，就兴冲冲地来了劲，立即抓起电话，向局党委领导汇报情况和想法。电话里，还着重强调了手下亲信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性细节。他觉得：这个细节提供，也许会使上面对公司的政治骚动局面更重视，更关切。同时，他也必须在让部下表露了一番聪明才智之后，自己也能漂漂亮亮地露一手；否则，老是在关键时刻求他们出谋献策，自己倒显得束手无策，一点主张都没有，权威就会逐渐流失。

崔志中打的算盘确实很灵光。陆波在听到交通局党委书记和崔志中的当面汇报时，傅钟宝有关“一损俱损”的揣度固然是一个因素，北京清华大学有人去货运公司作过串联的细节，使陆波心里更为紧张。“越是怕鬼，这鬼就越是来得快。”他在心里对自己暗自嘀咕道。凭着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他觉得如果光是学生闹，或光是工人闹，都闹不出大事来。

怕就怕学生跟工人结合起来，党内党外相勾搭，乱轰轰地一起闹，这共产党的天下，弄不好就会被闹个天翻地覆。因此听完汇报之后，跟几个市委主要领导一碰头，就决定在交通局机关抽人，由市委信访办公室主任时红霞带队，立即向市货运公司派出一个文革工作组。而所以派时红霞做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因为奚大雄既然当了反公司领导的带头人，以前为右派分子翻案的情况就必须前后衔接深入追下去。一旦能把这方面的情况查实了，就会找到突破口，起到“擒贼先擒王”的效果，使货运公司日趋动荡的局面，迅速安定下来。这一次，又是武遥持反对意见，因为他早就从工学院造反师生那里得到了既未证实、又未否认的有关毛主席对工作组的严厉批评意见。而且《十六条》也已经出来了，任何压制性的意图和做法，似乎都有跟党中

央唱“对台戏”的嫌疑。一向同武遥站在一起的俞市长，这次却坚决地站在陆波一边。俞市长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怕文化大革命把他分管的工交战线搞乱了。现在既然乱象已现，当然必须当机立断采取组织措施，快刀斩乱麻，坚决地把动乱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在这段短暂而又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日子里，心里老象揣着一只小兔子，时时为奚大雄感到蹦跳不安的，是凌漪。她不理解，奚大雄为啥要卷入凶险莫测而又卑鄙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而且竟跟执掌自己政治经济命运的一级组织领导去对抗？可是奚大雄已经离开了碱水缸；两个人为了防人口舌，一下变得缺少相互深入交谈的机会。在食堂餐厅里，宿舍楼梯口，奚大雄送清洗件上碱水缸，只能在没有旁人时，彼此急促地谈上几句；见有人走近就随即打断，聊上几句闲话就分手。满腔的关怀，担忧，焦虑，凌漪都觉得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余地，使她能够言之达意地细细表达。她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个勇气，约他去公司外面好好聚谈一下。虽然在这个并不很大的城市里，随便上什么地方去聚谈，都可能会有撞到熟人的风险。她却深信：凭着与他匆匆相遇又匆匆分手时所看到的那种忧郁而又无奈的脸神，奚大雄也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意愿和勇气，欣然接受她的约会邀请的。晚上关了灯孤孤单单一人躺在床上时，她甚至会想到：这种秘密的约会，也许可能会超越以前的内容和范围，使她重温十几年前罗漫蒂克的甜梦和温馨。前两个月在碱水缸那样一种特殊环境中的朝夕相处，给她留下了太多眷念不舍、回味无穷的情景和细节，使她觉得心潮如涌，辗转难眠。他那从来不正对着她却让人觉得常常在暗暗端视她的眼神，以及从他那宽阔胸口散发出来的那股微酸的男人气味，似乎在那段日子里，不知不觉地早已深深地钻进了她的内心深处，专等夜深人静之机，趁着宿舍里的黑暗重新钻出来，赤裸裸地躺在她身旁边，一会儿热烘烘地磨蹭着她滚烫的脸庞，一会儿温顺地抚摸着她滚圆的肩头，一会儿好象悄悄地爬到了她如波浪般起伏不定的胸脯上，柔情万般地轻轻拨弄着她的心弦，使她觉得心火如灼，体软如绵。这样一种肆无忌惮地骚扰，挑逗，引诱，日复一日地在折磨着她，压迫着她，使她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常常感到全身懒慵慵的，心神里又是充满着渴求，又觉得这种渴求不仅很疲惫，很劳累，而且很不现实很危险。她很清楚：自己几同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首先就是一座挡路的大山；但是即使把这座大山搬走了，她和他之间，还横亘着玉芳。

她对玉芳是关切的；在奚大雄探视玉芳回城后，凌漪第一次跟他在宿舍楼梯口短促相遇时，开口就问玉芳分娩后的近况。凌漪虽然没有生儿育女过，但对女同胞生儿育女的痛苦辛劳，却好象有感同身受的理解、体会和同情；以后每次碰上后，也总是忘不了叨叨不休地作类似的询问，来显露表达这种理解与同情。然而，奚大雄却对这一枯燥单调的重复性话题，显然地感到不耐烦。不仅不耐烦，而且显得很压抑，很烦躁，这是为什么？心地十分敏感细腻的凌漪，脑子里立即就有问号跳出来。她夜里躺在床上所起的种种遐想和激动，也许亦是受了这种疑问的诱示和挑动。她很懊悔，觉得自己在她面前表现的矜持和稳重，又虚伪，又愚蠢。她那干枯龟裂的心田，是那样地渴望雨露甘泉的浇灌滋润，却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好似具有铁石心肠的老处女，道貌岸然尘欲全断的修道女。她认定他内心一定有隐痛，她希望能有机会，可以把这隐痛小心翼翼地挑开来，用一个女人的全部温柔、细心和慰贴，把它轻轻地抚平和消解，作为对他所给予和所遭受的一切作出的一种回

报和奖赏。于是有一天，她终于拿出历史上武则天或埃及女王所具有的那种决断和勇气来。

在这天傍晚公司食堂开饭的时光，她有意早早地去，迟迟地走，确保能遇见也要上食堂就餐的奚大雄。她如愿以偿地碰见了。可是，却只当没看见他似的，并不搭理他，使他对她连一句问候话都没有的冷淡，感到很诧异，很疑惑，只好用不动声色的漠然，掩盖内心的失望和扫兴。然后她又仿佛有意磨蹭时间似的，给又不给奚大雄以搭讪的机会，两眼目不斜视地只管定视在饭盆上，把盆里所剩无几的几颗饭粒反复拨弄着，身子却牢牢地黏在与奚大雄相隔三四米远的一张位子上，既不抬头望他，却也不急于离开，从而使一直在偷偷打量她动静的奚大雄，心中愈加觉得纳闷、烦躁和疑惑，闷着头，胡乱把自己饭盆里的饭菜扒拉完了，打定念头要走过去跟她聊上几句，一下却又发现：她的背影已经闪出了食堂的门。奚大雄似有所悟，饭盆也不洗了，急忙起身追出门，不紧不慢地远远跟在她身后，两眼遥视着那被薄薄夏衣裹衬着的腰肢和臀部的曲线，很优美地随着她迈动的脚步富有弹性地微微晃动着，心里不由涌起了使他感到惊恐的一种亢奋。自从上次回乡返城后，奚大雄每次看到凌漪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亢奋突如其来地袭击他；而在这夏日单衣薄裤的时候，这种亢奋使他走路的样子，都显得有些别扭。亦步亦趋地跟随在凌漪的背后，双腿迈动的姿式显得有欠自然。

前面已经到了拐进宿舍楼的转弯口，凌漪终于侧过头，朝后稍稍回望了一眼，窈窕摆动的背影，就一下消失在转弯口。奚大雄也走进了此时空无一人的宿舍楼梯口，却瞥见凌漪正静静地挨在墙脚根，亭亭玉立地在等候着他。这样的情形在两人的交往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新生事物，奚大雄的内心，一下变得更加兴奋激动起来。但是除了他把拿着饭盆的手遮放到身前之外，这种兴奋和激动，却并不是常人可以轻易发觉的。凌漪此刻内心的激动紧张，却很明显地反映到了她那闪着异常光亮的脸部上。那种流光溢彩的突然焕发，她也不一定自我意识得到，却使奚大雄全身的血液，一下急剧地奔涌起来；他的脸神，也首次在凌漪面前显露出黑里透红的颜色来。凌漪脉脉含情地盯着他，什么也没说，攥紧的手掌松开，露出一张已经被汗水印湿的电影票。

奚大雄看了看凌漪那副秋波荡漾的大眼睛，又看了看那电影票，对着从那两个大眼窝中放射出来的灼人光柱，好象是很迟疑的样子；但是这种迟疑，却并不能阻止他伸过手去，终于把那张电影票一声不响地拈到了手里。凌漪这时一句话都没有说，猛地转过身去，一阵风地奔上宿舍楼，急速地用钥匙拧开门锁，“砰”地推开宿舍门，脸影晃过床头前的镜子时，一下看到了自己那张艳如桃花的脸，不由为自己的忘情显露感到羞愧难挡，“咚”地坐倒在床铺上，两手捂住自己的头，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你今天干了什么蠢事？你今天干了什么蠢事？……然后，她就开始犹豫起来，对是不是应该去看那场晚上九点半的电影，突然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和怀疑。她自问：她把自己当作什么人了？而奚大雄在感情的狂澜消失之后，又会把她看作什么人？面对这种自我责问，她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为自己作辩解。她对自己说，她只不过就请同事看一场电影而已，顺便聊一聊上告信的进展状况，单位里的政治局势，以及玉芳和新生婴儿的情况。奚大雄是应该能够理解的，现在不在一起干活，平时确实很难找到深入交谈的机会。而他们之间，既然已经发生了牵扯不清却又正大光明的关系，就必须保持经常的沟通和交流；她凌漪决

不是那种被情欲牵着鼻子走的轻薄女人，更不会趁人之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跟奚大雄与玉芳陷入一种使人鄙视的三角关系中。她与奚大雄好，就是因为敬重他那种堂堂正正的为人。而奚大雄所以也敬重她，是因为他也很快地发觉：她凌漪并不是人们传说中和想象中的那种不要脸的骚女人。她要把自己这种使他尊敬的自我形象，永远不变地保持下去。她这样想的时候，觉得自己又重新变得正经高尚起来，而先前驱使她买电影票时的那种动机，就象碱水缸底里掏出来的油泥污物一般，不仅有说不尽的肮脏、龌龊和卑鄙，而且并不代表她的真实想法。有了这一番自我审视和自我辩护，她在九点钟时刻走下宿舍楼梯的脚步，就变得轻松自若起来。经过公司门口传达室的时候，她甚至朝那个老是用不怀好意的猜疑目光打量她的中班门卫，大方友好地笑了一笑。而在十几分钟前，她还在顾虑：如果门卫注意到她和奚大雄今晚一前一后或一后一前忽然离开公司外出，是否会作某种猜想和怀疑？

当凌漪由电影院的领场员在一片黑糊糊的环境中带入座位时，奚大雄已经心绪不宁地观看了十多分钟《地道战》的正片。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看《地道战》，因此银幕上的紧张故事情节，很难再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即使今晚是第一次看这部影片，其实他也是集中不起注意力来的。这段日子里，他思想深处所经历的急风暴雨和大起大落，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哪个人能确切想象和体会到，也没有哪个人能够与之倾诉和交流。也许，正是这种刻骨铭心无可排解的精神痛苦，使他在下意识的支配下，选择一种使别人与自己事后都绝难想象和理解的特殊方法，来跟内心的烦恼苦闷作斗争。他也曾经想过：如果正要把自己内心深藏的痛苦说出来的话，唯一可以选择的倾诉者，也许就是心地善良、对他抱有深深感激之心的凌漪。但是每当他动到这个念头时，他就觉得：这也许会使两人之间原先虽然遭人非议误解实际上却是理直气壮的关系，会完全变味走样，转为类似男盗女娼的性质，使自己逃不脱被歪心眼的人“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道准了）的命运；而他是如此要脸面重名声的人，就不能不对这种向凌漪交心诉苦的冲动欲望，竭力地加以克制。他有自知之明，晓得自己目前正处在一种特别危险、特别容易出纰漏的心境情绪中。打从他回乡探亲返城后，夜里躺在宿舍里时，绝少再去追想回味玉芳那活蹦鲜跳的身肢扭动和撒痴撒娇的举止行为，而在碱水缸干活时那不断在他眼前晃动的另一个脸蛋和身肢，就会取而代之，执拗地显现在他的面前。

与玉芳作比较，凌漪当然在各方面都显得更成熟，更深沉，更有一种明明无法掩饰却又尽量收藏的含蓄美。这就使一切喜欢单单以外表打扮或搔首弄姿吸引人的女性，相形见绌。

但是以成年人的理智和中共党员的自我品德要求，奚大雄时时提醒自己：凌漪再美再迷人，却是属于他人的，在两性问题上，跟自己毫无关系。然而在这段日子里，奚大雄每次碰见凌漪时，总发觉自己的心思和目光，会转向他以前跟她呆在一起时极少注意留神的方面和部位。这使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对他很崇敬的女人面前，外表虽然仍旧一付道貌岸然，内中却已开始变得下流卑鄙起来。同时愈相信：如果在这种经常冒露无法驱逐的心境欲望下，去向同情心极强的凌漪倒苦水，那一定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极有可能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淖中。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凌漪，都是极其危险的；特别是对改变她目前的处境，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他需要渲泄，他需要倾诉，他需要进发；他知道宿舍里的三位与他情谊深长的同伴，对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一直忿忿不平，也知道他们在讨论酝酿着什么事情。那封突然

其来的匿名信所造成的混乱心绪，和急于回家查清事实真相的迫切念头，却使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无法加以认真地关注。可是当他返城后，被诸申他们用大字报“炮打”的崔志中却硬是认定：他是大字报的主谋和幕后策划者，并通过其他党委成员，三番五次找谈话，直至崔志中在公司大会上，亲口使用“跟乌龟王八勾勾搭搭的个别党内人士”那样的混帐话，对他进行赤裸裸的诬蔑中伤。人要脸，树要皮；他奚大雄堂堂正正一个中共党员和先进工作者，不能不对此作出反应和回击。况且，对崔志中把货运公司当自己私家营地，对他那套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领导作风，奚大雄本来早就看不惯。看到他大发淫威，恨不得把写大字报的室友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凶狠，通过向李辉康的老同学郭贤反复询问商讨那张《炮打司令部》传单的真伪、背景和含义，又读了诸申推荐的《人民日报》有关文章，对照冯有强所提出的那三条人命的历史旧账，加上从许洪元那里听到崔志中仍在背后对他作的小动作，奚大雄考虑再三，决计豁出去跟崔志中面对面地干一场。反正人家早就横竖盯上了你，要躲也躲不掉，欲辩又辩不清，索性破釜沉舟，斗个鱼死网破，把崔志中斗垮台，让比较通情达理却不得不躲到家里养病的邱铭书记来当政，自己背上的黑锅才可彻底砸碎搬掉。而根据郭贤所作的形势分析和诸申表弟处传来的各类政治消息，崔志中的所作所为，绝对是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背道而驰的。于是，奚大雄终于选择了一条数周之前还根本无法想象的道路。不管郭贤所预言的最后胜利什么时候来临，至少这样一选择，就把他从乡下带出来的满心恼怒、痛苦和自悲，大大冲淡减轻了。这一切，当然是在平时与凌漪的短暂接触交谈中，无法解释说清的。反过来讲，即使有充分的交谈时间，即使两人仍然在碱水缸一起干活，他能把心中某些难以言诉的疙疙瘩瘩，都一并掏出来给她看吗？在凌漪到达电影院之前和之后，这些念头就在奚大雄心里，一个劲地翻腾捣鼓。而在他走出公司大门之前，有一个片刻，他甚至有点疑惑不决起来。和一个因生活作风问题正在下放改造的有夫之妇、一个右派分子的老婆，这样在公司外面偷偷约会见面，合适吗？如果给熟人撞见了，怎么向人解释？他一边犹豫地把脚步迈出公司的大门，一边在心里问自己。

凌漪所选的看电影的地方，是市人民大会堂；这是全市规模最大、设备最好、档次最高的一家影剧院。市委召开大型的干部会议或表彰先进大会，阿尔巴尼亚、北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来了艺术代表团，也总是会选这个地方。它离公司较远，乘车大约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大会堂朝东的一侧，还有一个挺雅致的小花园，有水池，小桥，花木，亭子，如果不是专门的会议活动安排和特殊级别的文艺演出，小花园不为首长或外宾们所临时占据，普通的影剧观众，是随时可以消遣享用的。凌漪选这样的地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时间，显然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奚大雄对此心领神会，头脑里就相互矛盾得利害。他在公司里本来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前几天贴了崔志中的大字报之后，更成了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前几天上面来了工作组，组长时红霞上午进公司门，下午就找他谈话。先是一通相信依靠组织、服从领导、顾全大局之类的大道理。接着为激发奚大雄的荣誉感责任感，就不厌其烦地询问他以前在部队的革命经历。然后为缩短距离感，又自我介绍表达：随丈夫部队调防来锡城市不久，对曾经在部队里呆过的同志，特别具有亲近感。在这之后，才转入正题。一转入正题，三言两语就扯到了“跟乌龟王八勾勾搭搭”的问题上。时红霞开导启发说：崔经理的说法可能是有不妥当的地方。

但是，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先进工作者，自己是否就一点没有值得自我检点的地方？奚大雄给上面写的信，她也看了。即使反右的时候对凌漪夫妇处理重了或处理错了，那女人在交通局犯的生活作风问题，总是事实吧？况且，到底是否处理错了，还需要作进一步调查研究之后才能作结论。奚大雄却不服，争辩说：对凌漪的问题，既然要在调查研究之后才作结论，凌漪在机关里所犯的错误，是否带有原来所认定的政治性质，还是一般的生活问题，也就有待重新审定。崔经理作为一个县团级的领导干部，说话应该要有政治分寸和事实根据。他认为本着党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他所了解的实情为凌漪作证，光明正大，问心无愧，崔经理凭什么说他是“跟乌龟王八勾勾搭搭”？时组长一时语塞，又不好把外调同志满载而归正在回家路上的机密泄漏给他，就话题一转，要求他以对党忠诚老实襟怀坦白的态度，告诉她所谓《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来源，汇报李辉康的老同学来公司串联活动的内情。奚大雄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地告诉她，《炮打司令部》是他从苏南工学院的“北上控告团”那里拿到的，跟李辉康的同学没关系。至于郭贤来公司谈的那些话，他觉得都同“十六条”的精神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观点一个样；他不明白，毛主席对红卫兵小将那么支持，下面的领导同志却为什么对他们那么不放心，对他们的行动要象“四类分子”那样进行监视和追查？这样的话，自然使时组长很下不了台，蓦然间觉得对这个“在部队呆过的同志”，一点都鼓不起“亲近感”，就沉下脸来冷冷地说：直话直讲吧，今天找你谈话，是看在你过去革命经历和工作表现的份上，还想帮助挽救你。但是叫声同志哥，你已经走得够远了！给你三天考虑时间，大后天把检查书交上来。如果不趁早回头，悬崖勒马，不要说开车的资格，恐怕连党员身分都难保！“好自为之吧。”时组长最后用陈老总八届十一中全会休会后赠给昔日新四军老部下、由老部下又转赠给锡城市老部下的嘱咐，同样慎重其事地赠送给奚大雄。当然，她这样搞“雷同化”，并非是有意。因为她压根儿就不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散会之际，在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曾经私底下流行过这样一句告别话。如果她在枕头旁边跟担任较高职位的丈夫，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多多交流和关心一下国家大事的话，想来她那位在政军界内交往极广的革命伴侣，对此必定会有所耳闻并且心领神会的。几个月以后，当她的丈夫也濒临需要“好自为之”的境地时，如果她能回想起此刻对奚大雄说的这句话，她一定会感到感慨万千，对命运无常、人生多变，得出极其深刻的感悟来。

奚大雄既然收了凌漪的票，本来是已经无可反悔的了。可是在从宿舍楼走到公司大门口这段短暂的路程中，他理智的天平，左右两端却在上下下剧烈地晃动，好象觉得他还存在着抽身回步的余地似的。在他的内心，一个声音在说：工作组现在正盯着你，一心要在你跟凌漪的关系上面抓把柄。你这样缺乏自制力，不是给他们主动提供砍人的斧头吗？另一个声音却驳斥：胆小鬼！怕什么？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把时组长驳得哑口无言了吗？前一个声音不认输：不要想得太乐观，最后结论还没下，她的话语里就埋了伏笔。凡事应从坏处想……。这两个声音听上去，似乎都振振有词，把奚大雄弄得很为难，觉得有的时候，人的理智就是这样一付抬鸭不上架的窝囊相，鸡肚狗肠的，专为自己的个人得失打小算盘，还硬要自欺欺人地说是为人家着想。可人家却什么都不怕，主动买电影票邀请你，赏那么大的脸，不怕撞上熟人，不怕闲嘴说闲话，你怎么跟人家比？算一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敢

作敢当，你怕什么来着？不过就是在公司没有机会说话，在外面碰个头，可以从从容容地说上一通在单位里不便说也没机会说的话。这几天从人家的眼神里就能看得出来，她是看你捅了马蜂窝，心里为你担忧得不得了。难为人家关心你，总得解释上几句吧？你要是怕，当时就别把电影票从人家手里拿过来。既然拿了，就不要再想着能够缩回去。就你有理智，理智得可以不顾怎样地去伤害人家的一番好意！你这算是什么东西？……就在走近公司大门还剩几米远的地方，奚大雄一下似乎觉得理智这个东西很丑恶，觉得自己的形态很猥亵，而重感情胜过重理智的凌漪，形象却很高大，使自己觉得脸红。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的“三大武器”中，有一件叫“批评与自我批评”。奚大雄此刻就一下拿起这个武器，在内心对自己作了一番狠狠的自我批评，那共产党员的脚步，终于变得坚定起来；那副昂首挺胸的样子，显然一点都不担心：门卫看到一个令人瞩目的他，同一个惹人注意的单身女人，今晚忽然接踵而至地走出公司大门口，会产生什么样的猜测和联想？相反，他还主动跟门卫打招呼，宣告自己要去看电影，就因为心中断定凌漪出门时反正不会做同样的宣告。

当一个人孤零零地和着近千名陌生人坐在影剧场里时，奚大雄的眼睛对着银幕，脑海里映出的，却是凌漪丰圆的鹅蛋脸，丰圆的胸，丰圆的臀，丰圆的长腿，还有那使身肢上下的丰圆显得分外婀娜多姿的袅娜的腰。而最最强烈的印记，却是在这天傍晚他首次见到的那种容颜焕发的神情，和以前从未见到过的那种勾魂摄魄的热切眼神。这时他才认识到：所谓的出外找个地方说说话，纯粹是自我欺骗的谎话。那神情，那眼光，显露的并不仅仅是关切，是担忧，是要想好好聊上一通话的愿望。很显然，她在热切地渴求着什么，焦焦地期待着什么。她一定已经看破了他苦苦压抑着的心思和渴求；而压抑对压抑，渴求对渴求，就如干柴对烈火，如果没有高压消防水龙头作弹压，奚大雄一直担心害怕会发生的事，看来今晚将要无可阻挡地发生了！想到这一种几乎无法回避的可能性，奚大雄觉得浑身的血管都开始扩张，胸口“突突”跳动的心声，比回荡在影剧大厅里的电影配乐，都要宏亮。突然间，他看到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象探照灯光般地在他近处游动，最后落到了他身边的座位上。

终于看到一个期盼已久的熟悉身影，猫着腰肢向他靠近，同时还伴着对让胳膊让腿的电影观众发出的一连串“对不起”的悄悄声音。他俩对视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好象什么也不需要说，两个热烘烘的身子，就第一次在黑暗中肩并肩地做了邻居。这对奚大雄来说，跟一个不叫玉芳的女人紧挨着坐在一起，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经历。他感到自己一侧的臂膀，在不经意中碰上了一个软软的、稍稍带着室外凉意的肉体，知道这是凌漪圆润的臂膀，立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感觉，传遍全身。他以为自己的臂膀与这只使人惬意的臂膀，一经触碰上，就会受双方心照不宣的指引，悄悄地靠拢紧贴在一起。而彼此曾被压抑的渴求，就会化成一种最强力的粘合剂，先把两只手臂一粘住，就会悄然扩展阵地，使两个的身子其它方便部位，在简便易行且不影响观瞻的前提下，也贴靠在一起。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那只手臂却象一只在黑暗中受惊的小白兔，一触碰上就立即惊慌失措地逃遁。奚大雄不由自主地扭头朝她瞥了一眼，发觉她的眼睛既没有回视自己，也不大看银幕，而只是望着她自己的双膝在出神似的。整个身子，都向着与他相反的方向作不自然的偏斜，使两人中间留出了不同寻常的多余距离。奚大雄理解她的这

种矜持，自觉刚才那一刻的期待，未免有些毛躁荒唐。幸好这种荒唐是内心世界的折腾，胡作非为却并不很露痕迹。他这么想着，不由把有意无意朝凌漪座位方向侵略扩张的身子，也稍稍收缩后撤了一点。他俩在心中都曾以需要交换看法和情况为赴约理由，然而赴约之后却似乎很注重保持电影院里的肃静环境，悄声没气地安安静静坐着，彼此都很相互戒备似地朝后躲闪着遥遥相隔的距离，都认真地以为自己真在正儿八经地看电影。一直看到日本鬼子第三次开进高家庄，村里的民兵和老百姓都统统钻进了已经修建改进得几乎尽善尽美的地道，人们都在地底下生龙活虎地活动着，地面上却一个人影也瞧不见，奚大雄就有些好笑起来，觉得他同凌漪此刻，似乎也在玩某种性质上的地道战。鼻孔里嗅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好闻的淡淡的香皂味，给电影票时她所射向自己的那种如火如荼的眼神，再次活脱脱地重现在他的面前。而她眼下时分的冷若冰霜，只不过是装饰在地道口的掩蔽物而已。这掩蔽物可以瞒得了日本鬼子，却瞒不过他奚大雄。他觉得自己的克制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共产党的光荣称号，此刻也显得松松垮垮地管不住他了；那只曾经触碰过那丰软圆柔臂膀的手，终于变成越过双方暗中划定界线的侵略者，死皮赖脸地一把紧紧抓住了那只滑润的手腕。这一次，也许是被侵略军的突然袭击打晕了，也许是被侵略者的胆大妄为所震慑，或者是对这一冒险性的进攻早就有备无患，那只手腕的主人竟然什么反应也没有，逆来顺受地让那只被擒获的手腕，安祥地静静躺在侵略者的手掌之中当俘虏兵。然而这种安祥分明是假装的，掳掠者从自己的感触神经上，分明可以感觉到那只被擒住的手臂，象一只在惊恐万状中卷缩着身子的小羊，在刚劲有力的五指把握之下，不停地瑟瑟发抖。然而奚大雄这种胜利者的欢乐是暂时的，小绵羊在执行了几分钟的不抵抗主义路线之后，终于开始用计谋智胜侵略者。

“这里面太闷热了，我们出去走吧。”凌漪柔声提议道，在奚大雄对此提议尚未表态之机，就已经站立起来，使得这提议向不可抗拒的既定方向去发展。这就逼着奚大雄不得不松开手，因为在六十年代的锡城市，就是夫妻在公共场所，也绝对不敢手拉着手“肉麻”。

两人噤手噤足趑出影剧场的东侧门，来到月光如洗的小花园，都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了一口夏夜有些凉快下来的空气，并不作讨论，脚步都不约而同地朝一头连着那个小亭子的小桥走去。那小亭子尖顶的上方，浓密的杨柳枝叶，黑沉沉地把银色的月光挡住了，只允许在枝叶随风飘逸时不慎露出的几个空隙中，落下几粒星星点点不断跳动着的光。那些婀娜飘拂的密密杨柳枝，不仅居心叵测地把皓洁的月光拦住，也把影剧院大门口辉煌的灯光照耀，也不怀好意地阻挡住，使得亭盖遮掩下的那块地方，黑咕笼咚地显得格外幽深和神秘。奚大雄步入这一新的氛围中，皮肤上的感觉，比在上千人士用体温烤烘的影剧场内，虽然凉快得多，内在的情绪，却并不随外界的气温接受“风凉却”。他似乎并不认为凌漪的提议是一种急中生智的降温措施，而更象是奏响了走向高潮的进行曲。看着凌漪在亭子的围栏边圈上姗姗亭亭地坐下来，心中迈前一步把她搂抱起来的冲动就变得极强烈，可是凌漪却不慌不忙地架起了一条腿，并把双手抱在膝盖上，这就使奚大雄不仅不能逼近她，反而不得不朝后退回一点。

可是这种姿势虽然在空间效应上，对奚大雄已经有些热昏的神志带有一种弹压性，在目乱色迷的情绪效果方面，却正好相反：那一只在黑暗中仍然现得白晰的小腿，一经横架在另一只腿的膝盖上，就使淡色连衣裙的裙摆，

不得不向横的方向去扩展，结果在竖的方向，就暴露出捉襟见肘的缺陷。奚大雄的眼梢借着这一缺陷，瞥见了压在小腿之下的一小截雪白大腿，额头边太阳穴的血管，就“突突突”地猛跳起来。猛跳归猛跳，共产党员的坚强革命意志，在关键时刻还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镇定作用，不由分说地把他安顿到凌漪身旁的围栏圈沿上。凌漪见他坐下了，就把身子的方向朝他调转过去，从而使拱曲的膝盖，仍然正面对着他。这就好象是在有意引伸变通少林拳架中“金鸡独立”的招式，尽管是坐着，却固执地显示用拱凸的膝盖作为防卫屏障和武器的用意。而实际上凌漪摆出这种姿式，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吃不准；但不管怎么说，使奚大雄可望而不可即的功效，总是达到了。

男人在感情变换上常常是粗心大意的，并且具有盲目判断自以为是的倾向。其实，从走进市人民大会堂的一刻起，凌漪的神志就变得清醒起来了。奚大雄目前正处在政治危险中，她必须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劝说他急流勇退，不要飞蛾扑火，自找毁灭。而不是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饥渴的感情要求得到满足。如果她在这一刻放纵自己的感情，那就不仅不是在帮他，而是在他身处险境的时候，把已经站在悬崖峭壁边缘的他，再朝万丈深渊推一把，铸成使自己良心永难安宁的终身大错。她暗暗在心中发誓：这样的约会，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不能以自身仍然不明不白的政治身分，和有违中国传统道德的婚外恋情，牵扯连累他。这种与一个并无生活伴侣关系的男子一起看电影的约会，对她也是平生第一次。在她的手腕被奚大雄一把逮住的时候，她的理智防线，几乎要全线崩溃。灵与肉惊恐地相抱在一起，那样又惊又喜又害怕地簌簌颤抖，这样的体验，是她跟丈夫在谈情说爱阶段，也未曾经历过的。她真希望，这周围被电影机光柱时时搅乱的黑暗，并不是一种人为的光线环境，而是大自然的一种特意安排。她希望自己此刻不是身置于大庭广众之中，而是呆在荒山蛮野中，周围是深谷古林，不仅黑暗无边无际，而且除了她和他，再也没有一个第三者。

这样她就无需担忧一切禁忌顾虑，可以尽情忘形地把整个身子倾倒在他那宽阔厚壮的怀里；将自己柔软发烫的双臂，象常青藤那样地紧紧缠绕在他的脖子上；用胀热得几乎要透不过气来的胸脯，紧紧地贴靠住那两块雄健的胸大肌；把许久没有接触过异性的臀部，安放在他结实的大腿上。然后用灼热的双唇，死劲地压住那宽厚的嘴唇，即使因喘不过气来而有窒息而亡的风险，也在所不息，咬住青山不放松。她在那几分钟时间里所作的这种想象，使她内心颤抖不已，如火如荼，却并没有使她失去理智的主导和控制。她终于用一种最委婉的方式，巧妙地使自己的手腕摆脱了奚大雄的抓握，也使自己的情欲重新受理智的收管。此刻在夏夜清风凉凉的吹拂下，她的心绪更镇定，对这次约会的目的，看得更明确。她扬起不受无袖连衣裙遮掩的一只光裸手臂，拂理了一下并不凌乱的头发，用沉静的语调开口说：

“老奚，我不明白你为啥要跟崔经理对着干，为啥要跟政治运动搅到一起。从五七年开始起，社会上的例子还看得少吗？我还从未看到过哪一个跟组织领导上作对的人，到头来有什么好下场。我那男人，如果当初听从他一些朋友的劝告，不跟组织上硬拗着，后来我俩也不会这样惨。我知道你这个人比一般人多见识，不仅心地好，而且有骨气。我素来就尊敬有骨气的人，但是又怕你为‘骨气’两字付的代价太惨重！你不要太相信报纸和传单上的那些话，上面的事情，我们底下的老百姓很难弄得清。这些道理，其实你应该比我懂得多。你是咽不下那口气，是不是？”

奚大雄这时才意识到：凌漪此时的心境和心思，显然已经完全从给他电影票时的那种情绪中解脱出来了。她看来真是要一本正经地跟他谈问题，一心要把他从已经投入的感情陷阱中拉出来。他也就很迅速地作自我调整，恢复了常态，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开口回道：“不尽是，我也是为诸申李辉康他们打不平。崔志中也太缺少领导的气度和品性，如果能借这次运动把他轰下去，对党对国家对公司，我看都是好事情。听李辉康的同学说，这次运动同以往的不一样。从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起，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尽下台；而那些本来不起眼的小百姓，不仅对单位里的事情，就是对国家大事，都能说长论短。而且据说这种情况，今后在中国会形成一种制度和习惯。随便哪一级的干部，都要受群众的管。群众如果不满意，觉得他们做得不地道，随时可以撤换罢免。”

“有这样的事吗？”凌漪不由有些听呆了：“真要能那样，这世道就会让人过得心平气顺了。如果碰上哪个掂着领导招牌的坏人，受了他的什么欺负冤屈，‘嚯嗒’一下撤换掉，全按老百姓的心思来决定，这该有多好啊！但是我不相信。这世道真会那么变吗？那上上下下并不靠老百姓当上领导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凌漪对这种前所未闻的政治发展趋势预测，很怀疑。那种怀疑的程度，就象十几分钟之前在影剧场里被奚大雄拉着手的时候一样，她明了可以在想象中把她和奚大雄相处的情景，憧憬得要多美妙，就有多美妙。然而现实是现实，她不会让自己跟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走。

奚大雄在黑暗中凭声调，知道凌漪不信服，就对她说：“过两天我从诸申那里借两本《红旗杂志》给你开开眼界。”

“真要是这样，敢情好。可是不知怎么，凭我的一种直觉，我总觉得你要倒楣，而且可能会倒大楣。你知道吗，我的直觉一向很靠得住。当年我丈夫要倒霉前，我的眼皮一直跳。

这段时间里，我的眼皮也老是跳；总觉得这是凶兆，而且这凶兆也许就会应合在你的身上。”

奚大雄听凌漪说出她为自己如此牵肠挂肚的心情，心里不由又腾起了一股热浪。真想再次靠近前去，不顾一切地把她紧紧地搂在胸口前。只是这一刻的这种强烈欲望，和几分钟以前的那种情欲冲动，在质地上完全不一样。心念里所想的，不再是自己的身子紧挨着那高耸的胸脯，两手抚摸搓揉着那滚圆柔软的腰肢和臀部，会是一种怎样美妙感受的低级生理欲望；而是想全身心地拥抱一个灵魂，拥抱一种类似伟大母性的同情、关切，把他人安危看得比自己的一切更重要的情操。这种情操和灵魂，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此刻却活生生地凸现在他眼前，使他又感激，又激动。让这样一颗看似平平庸庸、实质上却很崇高的心灵，为自己担惊受怕，使他觉得很不安，很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在黑暗中打出笑脸来，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作家夫人，怎么比我这个生在农村里的乡巴佬都迷信？”

“不是我迷信。不管个人的经验对不对，大多数人都很难摆脱它的暗示、引导和支配。”凌漪说完这句她并未自我意识到的具有深刻哲理的话，看了看公公去年作为生日礼物赠给她的“劳力士”夜光名表，接着说：“电影就快散场了，我们走吧。我今晚住我婆婆家去，太晚了不方便。”说完站起身，借着黑夜和柳荫的重重遮掩，深情地朝奚大雄长长瞥了一眼。

他俩默默地走完了小桥，又默默地向有人探头探脑朝这边张望的大门

口慢慢踱去；那种张望说明：不管他俩如何有意把相互间的距离重新拉开去，人们好奇的眼光，却已经把他俩看作一对情侣了。或者是，随着凌漪向灯光明亮处越走越近，她的风姿绰约，使人怎么也没法不去注视她。凌漪的脚步，却忽然变得更缓慢，几乎就要停下来。奚大雄意识到她还有话要对他说，只是很犹豫，思想上的搏斗太厉害，就使得分配给迈动脚步的身体能量打折扣；就干脆站定了，但并不开口问，只是用眼睛瞧着她。凌漪的嘴唇终于又动起来；奚大雄那般殷期待的眼神，显然使她受到了鼓励。

“玉芳和孩子的身体好吗？”

“还可以。”奚大雄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声，内心说不准自己是希望还是不希望她在此刻触及这样的话题。

“你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我觉得，就是为了玉芳和孩子，你也应该跟崔经理搞好关系。要是她知道你现在贴公司领导的大字报，一定会使她担惊受怕得夜里睡不好觉。”凌漪仿佛又回到了老话题上。其实不然，她这样说的时候，两眼极其专注地盯着奚大雄的脸神。她在窥视他心中隐藏的秘密。这秘密，她凭自己极为敏锐的细腻直觉，早就察觉到。今晚如果不借此机会把它搞清楚，就把这个约会极重要的一部分目的遗漏了。

奚大雄眼睛同凌漪对视着，心里一下明白了她问话的心思和用意，对她洞幽烛微的洞察能力很惊讶。他的嘴唇动了动，却又顿住了，脚步却开始重新移动起来，闷声不响地走了好几步，突然很沉闷地说：“不要提她和那孩子好不好，我听着就心烦。”

“为什么？”凌漪又收住了脚步，美丽的大眼睛，一刻不放松地追着奚大雄意欲躲避的眼神。

“如果不是看着我跟她已经有了前一个孩子，我就跟她离婚。”奚大雄终于很决断地，一下把在心里憋了好多天的郁闷，向凌漪倾吐了出来。

凌漪此刻一切都明白了，用十分同情的眼光看着他，脚下站住不动，尽力用劝慰的口气说：“不要太难过。夫妻老是不在一起，就容易发生这类事。我看她是很爱你的。”

奚大雄嘴上不反驳，心底里觉得凌漪的判断并不错。这也就是上次回家时，在玉芳哭哭啼啼把真相向他如实坦白交待后，他在所有人面前隐忍不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大的儿子已经很懂事了，他无法想象：如果风风雨雨地闹起来，会在孩子的心灵上，留下怎样的创伤和瘢痕！还有自己的老父母；他自己重面子的秉性，全是从老俩口子那里遗传而来的。他们能受得了这种精神上的刺激打击吗？最后是那刚刚呱呱坠地的小生命，他有罪吗？他难道不应该享受父亲的照拂护佑，和爷爷奶奶的喜欢疼爱吗？谁叫他在外面见过大世面、懂得顾全他人的感情和体味呢？如果他象小时村里的一些同伴一样，终生锁在那个闭塞的角落里，也不懂知书达理顾全大局是怎么回事，按着习俗传统看待处理这件事，全村都可以闹得天翻地覆的。他引着凌漪的脚步，一边重新缓缓朝市人民大会堂围墙的出口处走，一边把这些心思用极简短的词语和盘托给了凌漪。

凌漪听着这一切，第一个蹦跳到脑子里的念头就是：如果玉芳这件事情出在自己身上，她那位曾经可以称得上高等知识分子的丈夫，又会怎么处置呢？他那晚在那个舞会上暴跳如雷的模样，他回家后公开责怪她没有及早停步表示抗拒，他而后那样地固执放任自己的怨怒妒火，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她凌漪。可以说他不知书达理吗？她觉得奚大雄对同村伙伴的轻视是偏狭

的。一个人上品不上品，遇事是否不仅为自己考虑，也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有时跟一个人所受的知识教养，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她同时又觉得：自己对奚大雄回城后跟崔经理大动干戈的内在驱动原因，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的内心太痛苦，又向谁都不能倾诉叫苦，就用卷入政治来排解。这在作者看来：其实是一种心理障碍和病态；在西方的社会里，会有专门的心理医生来关照这类病人，使那些面对资本主义残酷竞争无法调适的弱者，不至于个个成为疯子，也极少去做铤而走险的革命造反者。可是凌漪从来没有出过国，对外界的情况几乎一概不了解，因此就不仅不以为奚大雄已经有了精神病态的嫌疑，反而把他当作一名又高尚又有豪壮之气的悲剧英雄，一付水汪汪的眼神，在大会堂出口处炽烈灯光的照耀下，反而不如刚才在小亭子里那样拘谨，那样有保留，而是飘飘忽忽地，从上望到下，从下望到上，仿佛又重新认识了一个人。正在她理智重新失守、开始陷入情意绵绵的当口，奚大雄却突然十分粗暴地推了她一把，厉声吆喝道：“快走，赶快离开我！”

凌漪很惊愕，正不知所以间，却发觉大门口外侧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印着锡城市货运公司的熟悉字样，一群脸孔陌生的年轻人，胳膊上戴着红袖套，正气势汹汹地朝他俩扑过来。她一下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却没有按奚大雄的喝令办，相反出于女人软弱本能似的，两手一下紧紧地抓住奚大雄的胳膊，被奚大雄使命地一甩，几乎一个趔趄。“快，快走，别管我！”奚大雄再一次猛喝。但是一切已为时太晚。他俩已经被一群虎视眈眈、嘴里不停大声吆喝着什么的红卫兵小将团团围住。

有几个腰圆膀粗的小伙子首先不畏艰险地冲上来，要想扭住奚大雄的胳膊，按住他的身子。被他猛一回旋，立即有两个人嘴啃地皮地摔倒在大会堂门口的水泥地面上，其中一位也许是撞破了鼻子或撞碎了嘴唇，顿时有殷红的鲜血从他的嘴鼻部位淌出来。这伙红卫兵小将想不到敌手这么厉害，一声怪叫，就有几根一头漆成红色、一头漆成白色的体操棒，雨点般地朝奚大雄没头没脑地挥舞抡打起来。奚大雄两个臂膀拼命地拦截架挡，却抵不住那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棍棒所构成的灭顶之灾。他朝前踉跄着脚步，要想夺住其中一个人手中的体操棒，却不防有另一根棍棒的坚硬顶端，硬梆梆地直奔他的腹部而去，只听得“哎呀”一声惨叫，他那高大的身子，就象一堵竖壁似的，轰然崩坍在地面上。发疯的棍棒，好象获得了无法刹住的惯性，仍然不停地围着地上猛打，直到有谁大声喊了一句：“别打了！押到车上去！”无情抡打的棍棒才嘎然停住，几个人一拥而上，把打得不能独自站立的奚大雄，象条死狗般地从地上架立起来，一阵风地推搡到车子上。早就有人准备好，把一块写着“蜕化变质分子奚大雄”的牌子，套上他的颈脖子，然后推到车厢顶端作展览。

奚大雄那两只伤痕累累的臂膀，被人朝后高高地反架而起；由粗壮的脖颈倔强支撑起的头颅，被几只凶狠的手掌死命地朝下揪按。而在几分钟之前，还在奚大雄跟无情的棍棒极力搏斗的时候，凌漪就被几个红卫兵女将反扭着双臂推上了车，在极其痛楚极其纷乱的心情中，领先享受着革命小将酷爱使用的这种“喷气式”待遇。她胸前挂着的招牌上，赫然写着“右派婆、大破鞋凌漪”。那乌黑散乱的云鬓，遮盖着她低垂的脸，一双乳黄色的半跟皮鞋，被从脚板上剥夺下来，用鞋带连结着，挂在她雪白的脖颈上。奚大雄的头颈是拼命地往上竖，压也压不下。而凌漪的头颈却是一个劲地往下低，使揪着她头发的手用劲往上提，提也提不起。在那些围观群众的眼里，她那

给左颊一道血痕映衬得分外苍白分外动人的脸容，她那一双因充满哀怨之神而惹人怜悯的美丽大眼睛，并不能遮掩她那寡廉鲜耻、道德败坏的丑恶真面目。而她好象是因为无地自容而把脸孔死命朝下埋的动作，使她那种女流氓放荡形骸而又遮遮盖盖的可憎形象，变得更为强烈和鲜明。那些对她极为鄙夷的女红卫兵们，也许是因为她的外貌实在长得太招人，使自己虽然正处在豆蔻年华，也不免自惭形秽，报复惩罚的心理就油然而生，向后揪拉她头发的手指就越显刚劲与狠辣，一心欲使她在刚刚散场的电影观众面前，出乖露丑地丢尽脸！这样一种恶作剧式的阴暗心理，竟然会潜藏在这些如花少女的内心深处，并借着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毫不知耻地尽情发泄，如果天上真有上帝的话，他一定会对人类天良泯灭的程度，深感惊骇和震栗！

喇叭长鸣，满载着红卫兵小将和押示着两名游街对象的卡车，向着正处在热火朝天“破四旧”高潮中的大街上，缓缓开动起来。焚烧“四旧”物资的火焰，在靠近市中心的几个大街十字路口熊熊燃烧着，向四周散发着滚烫的热量。震耳欲聋的宣传车高音喇叭，不知疲倦地喧闹着，叫喊着，使人觉得这座被文化大革命热浪挟卷的苏南古城，精神充分地亢奋和旺盛，永远不会倦怠和瞌睡。奚大雄和凌漪被人以一种令人刮目相视的机械化“游街”方式，在大街上展览示众，接受观望者的羞辱唾骂，领取猎奇者好奇的目光打量，一个象一头被铁链捆锁着的满身伤痕的盛怒雄狮，一个象一只无依无靠被尽情蹂躏而只能哀哀呜咽的小羊。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俩在影剧场里时的身影，会被恰好也在看电影的保卫科傅科长盯上了。就给正在公司值班的崔志中打电话，就紧急请示工作组时组长，就马上给锡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打电话，就立即让丁荣兴开一辆卡车去惠湖中学接应革命小将，就风驰电掣赶到活动现场把“蜕化变质分子”和反动腐化分子双双当场拿获。红卫兵的战旗，在车厢上空迎风招展，当车子一开动，就猎猎作响。

车厢前的驾驶室里，傅科长朝车窗外吐了一口痰，踌躇满志地点起一支烟，对丁荣兴说：“这两天眼皮一直跳，我老婆说我要有倒楣事。这算倒楣事吗？崔经理在电话里说，要吃庆功酒！”

丁荣兴回答说：“要看哪个眼皮跳，是左眼还是右眼？上眼皮还是下眼皮？”

坐在他俩中间担任今晚行动总指挥的俞彦，同两位好象已经变得很熟悉，此刻就一本正经地提抗议：“哎哎，你们再这样说，我就要把队伍调进你们的脑瓜子里面破四旧了！”

“别，千万别。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灵魂深处自己爆发革命。”傅科长急忙做出革命姿态。然后扭过头，对着丁荣兴问：“那位时组长前几天对奚大雄还是一付待如上宾的样子，今晚怎么会一下改变态度？”

“那叫先礼后兵。已经等他三天了，就是不肯作检查；敬酒不吃，就只能吃罚酒了。”

“我说，这样的待遇级别，对那个破鞋也许挺适合；可奚大雄毕竟还是党内的人啊。”傅古宝刚才目睹奚大雄在棍棒之下一顿毒打，似乎起了侧隐之心。如果不是他提醒俞彦发令阻止，今晚恐怕要打出人命来。他跟奚大雄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过不去。如果不是因为这革命的需要，运动的需要，或者预料到会对他这样大打出手，今晚他是不会多管这种闲事的。

“哎，你老兄，情况是在不停地起变化。就拿你我来说吧，今天是科长

支书，明天如果不跟党的组织走，不听党的话，性质也就起变化。你知道吗？更重要的是，去那女人丈夫处外调的人已经回来，那男人、恶毒攻击'的罪名，肯定翻不了！图谋为他翻案，算什么性质？奚大雄这回沾上了那个腥，可是八辈子倒楣，很难洗得清了！刚才还不识相，逞力气。

象那婆娘一样乖乖地跟着走就是了，硬要让皮肉吃苦头！”

“时组长这一招也真厉害。这奚大雄被红卫兵小将一游街，其他几个同伙也就折腾不起来了。”傅科长忽然觉得对女流之辈不能轻视小看。

“等着瞧吧，一个都跑不了。那李辉康的母亲，已经查出来了，本来是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解放后才改嫁给他爹。诸申的老子可以算、四清下台干部'；以前也是当科长的，四清后就削为科员。这冯有强嘛，你最清楚。前两年把厂里发的擦手回丝，拿回家去让老婆理了棉纱织背心穿。都是什么东西，一群乌龟王八蛋，既然想造共产党的反！”

“对，北京现在流行这样一句口号：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俞彦这时也插了上来。

“哎，对，这其他几个人的情况，时组长已经跟你们通报过没有？打算不打算对他们也采取革命行动？”丁荣兴突然被唤醒。意识到最终发挥作用的人物，正坐在身边。

“那还用说，我们的作用，就是为革命打冲锋。”俞彦说得很豪壮。

“好，搞文化大革命就离不开你们这些革命小将。我们崔经理说了，参加今晚行动的，报个名单给公司，每人发两角前夜餐费。”丁荣兴在新形势下，仍改不了思想老习惯，嘴唇稍一滑，就又冒出了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双管齐下的老一套。

俞彦觉得不对劲，立即老实不客气地回绝道：“谢谢了，我们是为革命。如果你要让同学们领这个钱，他们会觉得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污辱。”

“还是革命小将觉悟高，还是革命小将觉悟高！”丁荣兴连声称赞，自愧自己与崔经理的思想，都已经有些跟不上革命的趟。

第十三章 “九·一九”事件

按黄军近来的观察，史苏星脑细胞里所具有的政治智慧，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那种源源如江河、汩汩如涌泉的主意和念头，有时使他颇惊讶：这个毛丫头的脑瓜里，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政治方略和思想宝藏，以前并没有看到她有如此发挥，如果不是来了文化大革命，给她以施展机会，不知要冥冥沉睡到何年，终年终月不见天日，说不定就会白白霉烂掉，犯下毛主席所指出的“浪费是最大的犯罪”的罪孽。袁世清和孙晨菲在红旗兵团的革命声威震慑下，虽然夹着尾巴仓惶出逃，至今下落不明。但是以史苏星的见解来衡量，原定革命目标的暂时失踪，并不意味着革命可以休息或者终结，而是提醒和告诫红旗团的红卫兵战友们，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就要降临。锡城市跟北京之间的距离虽遥远，使得好多重要的革命消息传到太湖之滨时，总是产生一个时间差，然而革命时针总的转动方向，是不会因为这种时间差而改

变的。日新月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心脏胜利地向前推进；这不可能不对延安中学的革命小将和锡城市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产生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7月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在北大东操场参加万人辩论大会，拥有毛主席革命伴侣身分的江青同志，亲自主持会议。据说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权威理论家康生同志，干脆而又明确地宣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他还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7月26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下令撤销工作组。

7月27日，江青带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奔赴北京师范大学，亲自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并向到会革命师生发号召：“甩掉包袱，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7月29日，“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上公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史苏星多次研读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作者、近年来在全国中高层领导干部中威信日增月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亲临大会作检查：“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是莫名其妙”。在延安时期为陪伴江青骑马而摔伤一只胳膊的周恩来总理，带着对毛主席战略部署了如指掌的自若神情，向到会群众宣布：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对史苏星黄军等热诚传播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为赞赏的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经受过他老人家万丈光芒无数次近距离照射炙烤而并不融化的人民大会堂，接见欢腾雀跃的全体会议代表。

8月1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社论好象有意针对史苏星黄军他们前一时期组建红旗团和开斗批大会受压制的情况，忿忿不平地说：“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最初并不被人重视，甚至遭到压制和攻击。对待新生事物采取什么态度，也就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待革命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毛主席精辟地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些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程度。这种人我们难道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

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是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

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一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的，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背后猛击一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有一些同志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就是热心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他们比起那些无名小卒，那些敢闯的革命小将，在政治思想水平上落后了一大截。但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只习惯于

包办代替，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使群众运动冷冷清清。他们往往从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反对群众、压制群众。他们往往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不知所措，而当他们惊魂稍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把革命运动拉向后转。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迫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经验已经证明，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要靠那里的群众自己来进行，不能由上级机关来包办。在一般情况下，不要由上级机关派工作组。上级机关派出联系的人员，都不要有‘钦差大臣’的派头，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听到一面之辞，就先入为主。要诚诚恳恳地接触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多看，多问，多听，多想。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怎样才能实现党的领导？那就要党的各级组织以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认真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广大群众共命运，同呼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的同志把党的领导同放手发动群众对立起来，这是很错误的。”

以上这些强烈的革命讯号，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传送到黄军的头脑中时，对他的想象力，似乎并不能起到强烈的激活作用。黄军想不通：为何同样的信息一传送到史苏星的头脑里，就好像是她脑子里本来就已经有好多很活跃、很兴奋的革命细胞，两者一相撞，就象生物学课程上所讲的受孕现象那样，精力旺盛的精子和卵子一结合，新的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行动计划，就一下孕育而成呱呱坠地了！他不知道史苏星在去苏南工学院了解孙晨菲父亲的情况时，已经跟长征兵团接上了头；因此她提出来的好多计划设想，相当部分是长征勇士作的出谋划策。因而当她在勤务组会议上把战斗方案一摆上桌面，她的同伴就被方案设想之大胆、考虑之慎密、眼光之长远，完全所倾倒。他们全相信：这个计划一旦付之实施，就是在国共两党进行朝代兴替交接时机也显得平平静静、犬马不惊的锡城市，立时就会被搅得天翻地覆，晕头转向！惠湖中学红旗团，噢，如今应叫延安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团，就会象数月之前北大聂元梓在全国一鸣惊人地贴出那张大字报一样，在锡城地区也石破天惊，一鸣惊人！

到那时候，还担心延安中学的大部分同学，不争先恐后地倒向红旗团吗？而后情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们的这种期待和预想。而所以能够使他们如愿以偿，坚定贯彻执行省地市领导会议“坚持原则，坚守阵地，大胆领导，接受考验”方针的市委陆书记，也作出了功不可没的成绩和贡献。

史苏星的第一步行动，是强烈要求市委责令市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前一时期蹿到延安中学“消防灭火”、大放厥词的恭鹏志，去延安中学作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向红旗革造团的全体革命战士公开赔礼道歉，并且明确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立即从延安中学滚出去！革命小将限令市委二十四小时内对此作答复。面对这样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要求，见到那样一种富有刺激性的字眼腔调，当然是在枪林弹雨中跌打滚爬过的老陆波，决计无法接受的。他在听取恭鹏志的紧急汇报时，得知这个口气比黄牛还要大的什么“红旗革造团”，在选举学校文革会的七名领导成员时，只可怜巴巴地选上了一个名额，就轻蔑地撇了撇嘴唇，颇为不屑地说：“不过是一小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嘛，别理那个渣！什么时候我去驻军开会时，跟他们的那些老子打个招呼就行了。越是革命军人的子弟，就越是应该严格要求。”

陆波的这样一种回应态度，虽然不是史苏星所喜欢的，却是她与其他

最初策划者们一开始就期盼的。日出日落，二十四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1967年9月19日，这曾经是在锡城市市民头脑中，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一个重大日子。这一天上午十点，史苏星和黄军一声令下，早已整装待发的四百多名磨拳擦掌的革命小将，就打着延安中学红旗革命造反团的鲜红大旗，一路散发着明列“四点严正要求”的传单，斗志昂扬地高呼革命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市中心的闹市区，让大街上那些苟苟营营不见大世面的小市民们，开一开眼界，看一看多数人穿着泛白黄军装的红卫兵队伍，有多英豪，多威武！这队伍，六人一个横列，每人与前后左右的革命战友严格保持三个肩膀宽的距离，以确保整个队伍，把并不十分宽敞的街道，占得满满实实在地，显得浩浩荡荡蜿蜒不绝；这阵式，这架势，使得围观的群众，被老实实在地挤逼到人行道上之后，还对这队伍的雄姿勃勃，啧啧称道，赞不绝口。那些曾经耳闻目睹过由这批“自来红”革命者们到处张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人，着实领教到了什么是纯种“好汉”的堂堂气概和模样。而那些懒于点数又拙于估算的老百姓，看这队伍又宽又长地占了那么多路面，只觉得这红旗团的人马铺天盖地，声势浩大得就如千军万马从天而降。然而真正使人惊诧不已的，是那些吃了豹子胆才提得出来的“严正要求”和喊得出口的口号。什么“市委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必须批判”啦，什么“炮打拦路虎，搬掉绊脚石”啦，什么“市委工作组，滚出校园去”啦，什么“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呀，这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吗？共产党的反是可以造的么？很显然，这些红卫兵，跟他们以前所看到的那些热火朝天“破四旧”的红卫兵，唱的不是一出戏！但却并不能从理性的高度认识到：这正是徒有其名的大中红卫兵，与真家实货的革命造反红卫兵之间的根本分界线。这些市井百姓们，也许对《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呼声一向欠关心，因此对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就不可避免地觉得很兀然；本来很容易触类旁通的事情，却觉得不可思议得心发慌。于是其中就有一批闲空无事的好事者，或者抱着对大胆妄为者的钦佩心，或者抱着一种不怀好意走着瞧的敌视心，或者纯粹抱着不可抑制的强烈好奇心，组成一支不断扩大的陪伴队伍，尾随着革命小将的战斗行列，一起浩浩荡荡地来到市委大院前。

市委大院的门卫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一边挡住史苏星黄军等几个领队者，一边手忙脚乱地把大铁门关起来。史苏星不慌不忙转过身，朝后一挥手，四百多人马就“刷啦啦”地一齐在大铁门前的柏油路面上坐下来。外加数百名占据有利树荫位置的跟随旁观者，一下就把市委大院的出入通道严严实实地堵塞住了。这时的门卫才发觉，原先关门挡道的动作是多余的；眼前这些闹事的学生，其实就是带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悠然神态，抱着堵截大门的毒辣用心，来跟中共锡城市市委较量的。铁门重新打开了，正要去宾馆接客人的许洪元和其他两名小车司机，在大院门内一侧把汽车喇叭掀得“嘀嘀”响。而那些抗议静坐的革命小将，也许因为还没有进入短兵相接的严重关头，革命态度并不很严肃，而是嘻皮笑脸地，比划着手势，盛情邀请被堵截得很不耐烦的市委小车司机们，无所畏惧地驱动车轮从他们的血肉之躯上面滚过去。靠着市委门前大马路一端的静坐同伴，也竞相仿效，对着被他们阻挡住的公共汽车司机，发出同样使人无法欣然接受的邀请来。那些被拦断在马路东西两侧排成一字长队的公共汽车司机们，对学生们这样一种阻塞交通的恶作剧行为，有跟部分乘客一样感到义愤填膺的；也有跟另一部

分乘客一样，泰然处置地或一睹为快地作起观众来。而这样的场面，在当时流行的电影和戏剧里，是汽车司机们绝难见得到的。作这样一种千载难逢的观摩，不仅不需要掏钱买门票，而且在观摩时期还有公家按上班同等对待付给工资，就难免产生何乐而不为的糊涂思想。然而，尽管这两种人的思想趣味和精神境界有天壤之别，却都没有想到：他们本可以乘早及时调头，让对面车里的乘客各自上这边来换车，把学生们的闹事地点，变成临时的汽车中转站。等到个别有灵性的驾驶员想到这一灵机妙策之时，已为时太晚，公交车要想转首掉头，已被接踵而至的几辆运煤卡车和越聚越多的围观人群，死死堵住了退路。

此情此境，呆在市委办公楼三楼窗口的陆波，从掀开一条缝隙的窗帘后面，两眼穿过市委大门望出去，虽然不能把全部场面看得很真切，但是对形势发展的严重性质，以及原先的轻视思想和估计不足，却已经有所认识醒悟。十分钟前，他跟驻军军部的电话虽然接通了，但是对方回说驻军主要首长都上军区开会去了。因为调防的关系，陆波以地方党委领导身分担任新来驻军政委的任命，尚未正式批转下来，他跟驻军机关的一般人员又不熟，无可奈何放下电话筒，一面让秘书出外挡阵，一边探听虚实，一边做说服引导工作。同时急电武遥回市委，履行市文革办主任的光荣职责和使命。另外还要求市信访办公室主任时红霞，代为与驻军继续保持沟通联系。考虑到恭鹏志正处在造反学生的攻击炮火之下，陆波有意不让他出面见学生。使得这时惶惶不安地陪在他身旁的恭鹏志，对他在关键时刻对部下表示的关照爱护之心，感动得就差没有丢眼泪。当听说武遥因为跟工学院学生约定今天代表工作组上台作检查而无法脱身时，他就抱着“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一个劲地自告奋勇要出马。“马上召开紧急常委会。”陆波不为所动，沉思片刻后，下令恭鹏志立即发通知。

也许是因为个个皆有多年革命经历的常委同志们，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概念都极其明确，也许是应了“危难生友情”这句老话，这个临时紧急召集的常委会，意见出奇地集中和统一。众常委们众口一辞，面对闹事学生的冲击，必须守住第一条防线。所提要求可以研究探讨，但前提是必须把人先撤回学校去。堵截市委的大门，阻塞市委门口前的公共交通，都是跟十六条精神格格不入的胡闹行为，说不定背后还有坏人操纵；他们很难相信，这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娃娃，能够单独制订设计出这样一整套前后连贯、有准备、有步骤、有纲领、有目的的行动方案来。如果让这些闹事者得逞，树立一个坏榜样，今后谁要让市委接受各种无法接受的政治要求，都照此办理，堵大门，塞交通，乱发把斗争矛头指向市委的传单和乱呼性质可疑的政治口号，照此办理，不要多长时间，锡城市就恐怕不复再是共产党的天下。

因此一致主张先礼后兵，说服劝导在先；如果执迷不悟，就应该本着十六条的精神，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延安中学和其它学校的广大红卫兵小将，来现场一起做“说服劝导”工作，务必在下午四点大批早中班工人上下班交接高峰之前，恢复交通，恢复市委大院门前正常的公共秩序。武遥无法赴会，就在电话里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是所有市委常委中，唯一主张抱谨慎态度的人。他担心一旦把两种抱不同观点想法的学生搞到一起来，可能会发生难以控制的局面。而且他提醒陆波注意，据他初步掌握了解到的情况，延安中学的红旗革造团和苏南工学院的长征兵团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而长征兵团的几个主要头头，最近经常到市内各校去串连，甚至涉

足工矿企业，显然不再把精力心思完全用于工学院内部的文革运动上。而根据市文革办收集到的情况，北京和上海一些很有来头的红卫兵组织，也已经渗透到本市频繁活动，和工学院院长征兵团过从甚密。如果武遥的这些意见和情况通报，是在会议之前抵达，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最终的会议决定。但是，既然是在集体决议已经作出之后姗姗来迟，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已经无法改变大局。

到吃中饭之前，许多学校大中红卫兵总部的电话铃声大作，一道道指令传下去，一支支队伍正在集结。有人胆敢借文化大革命之名围困市委，阻塞交通，而且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打着红卫兵的旗号，公然向共产党在锡城市的心脏部位发动猖狂的进攻，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是延安中学大中红卫兵的领袖们，早就对校园里这批飞扬跋扈的对立者义愤填膺；接到市总部的通知，俞彦立即选拔一批身强力壮的男同学，组成精干队伍，按照市总部“先礼后兵”的指示精神，本着对这批素向蔑视礼义、不知好歹的老同学的日常了解，一上来就作好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思想准备……。

而这时候，在静坐的队伍中，已经有个别包裹在长衣长裤厚布旧军装之内的女学生，因经不起太阳的长时间高温炙烤而中暑昏厥。也有少部分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学生，在市委所出动的大批机关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当了使黄军恨不得拔出手枪一枪击毙的临阵脱逃者；可惜毛主席这个红司令尚未考虑给他的红卫兵们配备武器，使黄军英雄无用武之器，与当年年纪轻轻就老是把驳克枪拎在手里的父亲相比，痛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比在国民党专政条件下的革命，难度更高，受到的限制更严格。

史苏星此刻的心情，是又疑惑，又愤慨。她对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的内部情况，当然不可能了解。即使了解到了，恐怕也不能理解。其实，她对红旗革造团所采取这一行动的政治含义和内涵，也并不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形成了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的金字塔型垂直领导结构。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虽然有民主集中制作标榜，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的宣传，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上智下愚，上尊下卑，上行下效；服从上级，尊重权威，人身依附，做驯服工具；谁的权大就听谁的指挥，谁的位高就跟谁跑；这些诸如此类的观念，从上到下，在党内比比皆是，极其普遍。这一套常常用党内民主外衣羞羞答答遮掩起来的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当然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家发明。苏联的列宁党，仿照列宁党的模式改建的中国国民党，都大同小异。再说远一点，中国自有文字记载起，不论孔孟之道，儒家法家，秦皇汉武，盗贼草寇，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天亦不变，道亦不变，从来就是这一套。再往广处看，就是在那些酷好标榜民主自由、上帝面前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西方社会，其实也是金钱至上，谁最有钱有势，谁就掌握玩弄民主游戏的主导权和制空权。于是就出了一个头生反骨的马克思，断定现存世界不合理，勾勒描绘了一幅世界大同、真正人人平等的新图景。从小在家里就爱好跟专横跋扈的父亲闹别扭、去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又专门犯上作乱把长沙搞得鸡犬不宁的毛泽东，后来去了延安后，在一次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干脆就总结出一条时下被许多红卫兵小将们鼓喧得热火朝天的名言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

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可是人们似乎忘了斯大林曾说过：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当初毛主席在延安讲“造反有理”，是因为国民党在做统治者。不造这个统治者的反，共产党自己就成不了统治者。共产党一旦自己也成了统治者，还要提倡造反，就思所匪夷，使共产党绝大多数大大小小的首长们，如坠烟雨迷雾中。不要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就是不执政，即使还在羽毛未丰不得不栖息在延安窑洞里的时候，共产党能容得别人对它造反吗？不要说造反，话说得太刺耳，借着发扬民主之机谩骂几声共产党，也是要叫你脑袋搬家的。

那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什么王实味，不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脑袋搬了家的吗？然后是解放初，那个仗着与骨头最硬的革命先驱鲁迅先生有深交的胡风，竟敢斗胆与共产党的文化主管领导闹别扭，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编按语，大名鼎鼎的胡风先生，就不得不为自己头生反骨下黑牢。反而是五八年反右派，几乎就象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情！殷鉴不远，这些脱了帽子没有脑子的年轻人，怎么就不好好想一想：那些向中共锡城市市委所提的要求，与上述受到历史惩罚的老前辈相比，哪一条够不上严厉惩处的资格和性质？虽然，当今提倡鼓动造反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别忘记，当初提倡鼓励“大鸣大放”的，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党的各级首长，举世公认，一致肯定。然而，也有不公认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毛主席有时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太强烈，1957年以来，常常异想天开，心血来潮。比如，发明创造搞“开门整风”，制订害得好多党外人士想入非非的“双百方针”；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大搞根本无视经济规律的“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弄得劳民伤财，民不聊生。而对毛主席这些想入非非的做法及其危害，党内广大中高级的领导干部，通过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早有所闻。只是按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小百姓们至今蒙在鼓里而已。中国的历史挂历翻到了1966年，他所亲自主持制定的那个十六条，是否也带有异想天开、心血来潮的成分？市委常委会的各位成员们，当然不会同样异想天开地公开提出这种疑问来；然而口头上的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并不妨碍在心底里的疑虑重重；只要内部意见一致，加上有顶头上司的背后支持，甚至在行动上抵触否定，也未尚不可。除了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武遥之外，到会者似乎都本能地感觉到：这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乘搏击长江风浪之余兴而再次发作的浪漫主义豪情，不仅会象革命小将们所声称的那样，把整个旧世界搅得乱七八糟，而且会把全党革命同志早就驾轻就熟的整套规矩原则，框框条条，打得七零八落，使人无所适从，前程未卜，凶吉难测。人类按其本性，从孩提起就喜欢跟确定的、熟悉的东西打交道，而害怕跟不确定的、不熟悉的东西打交道。这就是为何小孩子一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时就会“哇哇”直哭的原因。因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和不熟悉，随时可能绊倒，随时可能撞壁。不怕绊倒、喜欢撞壁的人，通常是会被神智正常的人视为神智不正常的。请站在神智正常的市委常委会多数革命老干部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革命容易吗？不容易！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有熬出头的今天，可以问心无愧地享受品尝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安坐亲手打下来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当然，享用成果，安坐江山，并不意味着革命意志衰退，忘记天下仍在受苦受难的百姓。恰恰相反，人类

对物质享受的欲望和要求是无止境的。这就需要人们全力以赴地发展生产，建设经济，少说狂话，屏弃空想，按规律办事，切切实实地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是现在好，要搞把党内走资派作为斗争重点的什么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方式、程序、内容、对象、时间、地点、要求……，种种要点和方针原则，都不再靠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层层传达，层层执行，都不再按共产党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老规矩办理。荒唐吗？一群乳臭未干的中学娃娃，既然可以凭着道听途说的中央首长讲话或报刊杂志文章，来对一级地方党委发号施令！谁个革命，谁个不革命，怎样才算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怎样不算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既然不管级别职位高低，手中权力大小，革命资历深浅，人人都能不知天高地厚作评述，个个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八月份的《红旗杂志》发文章，号召“七亿人民都当批评家”，这样一哄而上的搞批评，能够保证批评的质量水平和正面效果吗？更有甚者，同一期《红旗杂志》还公然鼓吹要在中国仿效完善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如果按文章所介绍的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一系列原则来实行，“一切领导者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活动，……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罢免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剥夺”。当选者“同一切公务人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资产阶级国家议员和高级官员所享有的一切特权”，等等之类，如果都照这些原则来办理，中国的七亿老百姓全按着自己的喜怒爱憎，一不称心就随心所欲地把功勋卓越的革命老同志罢免掉，一高兴就把毫无革命资历经验或不受革命老同志信任的无名小辈选上去，中国今后会是一付什么情景呢？自己冒九死一生危险建立起来的革命功绩，还有什么价值和用处呢？即使中国的巴黎公社选民们对自己高抬贵手，不对自己行使“不可剥夺”的罢免权，按照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不就象五六年“对私改造”那样对自己同志也搞起经济剥夺来了吗？

所有以上这些可以模模糊糊感觉得到却不能清晰表达的想法，或者可以清清楚楚认识到却在任何公开政治场合都难以启齿的深重忧虑，与市委常委们经历相似地位相似的史苏星父亲，也许会非常地容易沟通理解和取得同感，但是对思想仍然相对单纯的史苏星来说，要揣度明白这些想法念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些想法念头所支配的政治态度，实在是太困难太复杂了一点。无论是同一位阴阳怪气的市委秘书，还是跟她在驻军家属大院见过两面的时红霞，纠缠磨菇了老半天时间，却一概没有进展。终于意识到：对红旗革造团提出的政治要求，市委根本就抱蔑视的态度。她与她的同伙们对此觉得百思不解：奇怪十六条的精神讲得这样明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章谈得那么透彻，为何这些市委老爷却会如此漠然处置，冥顽不灵？他们太天真，太稚嫩，思想方式太过直线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对市委的革命老前辈来说，是不是理睬和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不在于这些要求本身是否符合十六条和有关报刊文章的精神，而是事关由谁来掌握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和解释权，认可不认可七亿老百姓可以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引下，跳过重重叠叠的行政官僚层次，实行人人平等地议政参政这样一种极具浪漫主义和空想色彩的新尝试。这样一种新尝试，连同《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所披露的毛泽东的新想法，也许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创造设计出来的一种最大胆、最离奇、也是最不能使现存当权者所理解接受的乌托邦。如果这样一种乌托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旗号下，打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名义，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竟然取得成功的话，人类的历史就要改写；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发生大改变。因为这是出生在中国湖南韶山冲里一名富有诗人气质的农民儿子，为世界上落后贫穷的国家和人民，所设计创造的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不同于苏联东欧集团社会发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毛泽东的具体蓝图是：“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鱼），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都要这样做。”

《人民日报》在这篇于1966年8月1日所发表的社论中强调：“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不无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社论发表的日子，跟毛泽东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仅仅相隔四天。

8月11日《人民日报》在《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社论中特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史苏星显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红旗革造团今天所发起的这一行动，就象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到处发生的类似事件一样，乃是毛泽东整个大胆设计构思和具体实施部署中的一着棋。对于这一点，即使是深谋远虑、对自身切身政治经济利益有清醒认识的市委首长们，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否则的话，他们也许会举措更谨慎，对武遥的告诫和保留意见更重视。

不管怎么说，史苏星既然已经感到：市委不会按十六条精神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最新指示，来接受他们所提出的绝对符合文革发展方向的革命要求，她就不得不作最坏打算，准备打阵地战，打持久战。至于有些人中途退出革命行列，大浪淘沙，是不足为奇的。倒是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带草帽，也没有带水壶和干粮，即使革命意志坚定不移，也无法长期抗衡，坚持到底。因此她在跟勤务组成员火线会议上提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主动动员这部分同学赶回家去，把物品备齐了，重新投入战斗。第二件事，眼看着市委交替

派出来的那位秘书和“时阿姨”一边虚与委蛇，拖延时间，一边出动许多机关工作人员进入静坐同学中搞分化瓦解，就派人赶回学校，增印了大批中央文革领导人就工作组问题传达毛主席所作指示的传单，不仅在静坐现场向围观群众广泛散发，争取舆论同情和支持，而且以毒攻毒，塞到每个市委劝说人员的手中。这最后一招确实灵光。那些心眼多、头脑复杂的机关工作人员，平时也有阅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习惯，对党中央的最新精神和动态变化，也颇有所闻，一读这些传单，凭自身判断能力，觉得并不象子虚乌有的空穴来风，劝说的劲头，顿时下降。个别人甚至趁同事不备之机，窃窃私语地向红卫兵小将深入打听内情细则。

就在市委劝说干部面临自身军心动摇的不利前景时，大中红卫兵的各路人马，已经纷纷围集到市委大院的门口，把死皮赖脸占据着大院门口那一大片丁字形柏油路面的异端红卫兵，团团围住。红卫兵小将们跟红卫兵小将门打交道，当然不会套用机关干部那种婆婆妈妈的劝导方式，而是摆开阵势，里三层，外三层，组成了队形密集的包围圈；还把市委当初提供用来大造“破四旧”革命声势的两辆宣传车，也调集到包围圈的旁边，开足宣传马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攻心。“延安中学受少数别有用心者蒙蔽利用的同学们，当你们堵截市委大门，阻塞交通，给政府工作和市民生活造成很大不便和困难的时候，当不少工厂企业因为其工人不能准时上班接班而面临停产的威胁时，你们是否问过自己，你们在干什么？是在推动文化大革命呢，还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希望你们自觉遵循十六条‘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立即撤离现场，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有延安中学红旗革造团的一小撮头头，承担全部的责任！只要你们马上撤出现场，我们将既往不究，共同团结在一起，搞好锡城市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锡城市有革命责任心的市民们，各位在现场围观的同志们，希望你们积极配合我们一起做说服教育工作，动员参与静坐闹事的学生们，随同你们一起尽快离开现场。市委大院的门口已经非常拥挤，这门口的干道连接我市的两个工业区。如果静坐的学生不赶快撤出，不断增加的围观人群不立即散去，就会造成难以预计的严重局面！”“各位同学们，各位市民们……”

宣传车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地反复重播着同一个主题。然而，那种威胁警告性的语调，却不仅没有对静坐者的队伍产生它所希望的效果，反而起了某种刺激挑斗作用。被大中红卫兵团团围困起来的一张张脸孔，不复再有嘻皮笑脸的神情；而是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原来在逐步减小的人数，不再减少；加上那些回家拿物品的重新返队者，反而有所回升。以自尊心极强的革军子弟为骨干的静坐者们，绝对无法接受自己是“被人蒙蔽利用”的愚妄判断和恶意中伤。他们中的口才横溢者，此刻已放弃对围观群众作宣传演讲，因为他们已经有些嘶哑的喉咙，绝对无法跟高音喇叭作抗衡竞争。除了史苏星黄军等几个领头者聚在圆圈核心紧张低声地讨论形势对策外，所有的静坐者们都紧闭嘴唇，以一种殉道者的冷然和沉默表情，冷峻地环视着四周那些腰园膀粗、虎视眈眈的清一色的男性大中红卫兵，准备迎接一场恶斗。尽管他们暂时还无法确切预见想象这场恶斗的行式、规模和性质，但几乎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周围正在逐步增长加大的压力和紧张气氛。头头们紧张研究讨论的第一个结果，带有保密的性质，不保密无法执行；并且决定刻不容缓立即付诸实行。二是把身体结实强壮的男生，调移到静坐圈子的外围，面朝

不断向前挤迫的对手，手挽手地组成两道人墙。第三是立即草拟了一份抗议书，要求直接递交给市委书记陆波，对市委拒不接受红旗革造团的严正革命要求提出强烈抗议，并对市委调集大批人马围困静坐者和企图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严重局面，提出严正的警告，明确指出市委必须对此承担一切责任！最后，为鼓舞激励士气，决定由几个学生头头轮流，每隔十五分钟，率领大家高声背诵五遍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这样的语录背诵声浪首次在市委大院门口回响震荡起来的时候，不仅使静坐者们士气大振，使已经被包围者队伍排斥到几十米之外的围观群众，突然观赏到了一个小小的情节发展高潮，而且由于声波在高温空气中传导率特高的关系，也传到了被窗玻璃和遮阳窗帘双重阻隔的市委主办公楼里，使陆波的心情，变得分外烦躁不安。他看一眼那个具有装饰性质的古色古香的壁钟的指针，离工人上下班高峰时间只差两个钟点不到的时间，可是，如果闹事学生坚持不退，原计划在三点钟必须采取的行动，却不得不推迟；作为一个组织指挥者，他刚刚突然意识到一大疏忽，即使以最快速度加以补救，至少又要耽搁半到一个小时。另一方面，陆波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向省委作一请示为妥。与省委第一书记电话没有直接接通，只能转告扼要，等待回复。灯不点不亮，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此刻几乎已经可以断定，似乎被鬼迷了心窍的闹事学生，不会乖乖撤离现场。然而真要采取行动，他心中却未免犹豫踌躇。一旦让维护市委领导权威的大中红卫兵动起手来，对方会不抗拒吗？又会抗拒到什么程度？大中红卫兵在遭到武力攻击时，能够按要求那样做到尽力克制吗？冲突流血是在所难免的呢，还是可以避免的？这些问题不停地困扰烦搅着陆波的心绪，思想上感受到了十几年以来，极少经受体验到的精神压力。他突然回想起由陈老总发明、老上级转达的那句“好自为之”的文革赠言；只有在这一刻光景，他才好象一下明白了它的含意和分量。他觉得额头和背心，都有些微微冒汗，就检查空调所定的降温刻度；发觉与平时没有两样，从而意识到自己沉不住气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干扰身体分泌系统正常运作的程度，就怒不可遏，开始对自己的孬种模样作出毫不留情的批评训斥：“怎么回事？你身经百战，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大风大浪没有见识经历过？现在几乎就是在阴沟里行船。阴沟里行船还怕翻底吗？还犯得上额头冒汗吗？哼，真还好意思，不仅额头冒，竟然连后背心连带着一起冒，是算得上身经百战的一付英雄样了！”

陆波的头脑经过这样一通严厉的自我批评和热讽冷嘲，心里顿时觉得坚定果敢起来，看看时间已经三点出头，就打电话询问忙于策划和四下安排布置的恭鹏志，新召集的专门用于对付闹事女生的女红卫兵小将队伍，是否已经到位？如果万事已经具备，就不等省委的明确指示，马上准备动手。为了确保干净利落，避免动作纠缠和引起暴力冲突，还是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老套套，以三对一，力求双臂一架起，就使其脚跟离地，毫无挣扎抵抗之力。然后统统塞进那些被他们阻挡住的公共汽车里，送回延安中学严加看管教育。战斗命令尚未发完，办公桌上直通省委的红机子，就响起清脆的电话铃声。老首长回电，对锡城市市委的果断和集中优势人力速决速战避免暴力冲突的方案，颇以为然。对任何阻碍交通、影响生产、搞乱搞垮地方一级党组织领导的企图，都要针锋相对地予以有力还击。同时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注意做好分化瓦解和团结教育工作，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有了上级的全力支持和肯定，陆波斗志倍

增，对武遥在关键时刻显露出来的胆怯动摇，内心更为不屑。他放下红色电话筒，向恭鹏志发出最后指令，然后对身边的随从人员一晃首：“走，上顶楼去，可以眼观四方。”

陆波这边一声令下，市委大门外边顿时龙腾虎跃。宣传车高音喇叭中，响起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壮毛主席语录歌，“要文斗、不要武斗”革命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这种宣传攻势的配合下，大中红卫兵的精兵强将首先攻击静坐者的外围防线，一拥而上，拉的拉，抓的抓，抱的抱，三五成群地把红旗革造团的外圈防卫人员，连推带搯地架入歇息等待已久的公共汽车里。其余静坐者们立即起立，惊慌失措之际，又想解救被绑架同伴，又担心自己也身陷重围，犹犹豫豫之中，好多发觉自己的胳膊身体也已经被别人抓住架住，浑身虽然仍然可以奋力拼搏挣扎，却因寡不敌众，脚跟身不由主地离开了地面，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我控制权。史苏星一见情势危急，连声高呼：“同学们快聚到一起！快聚到一起围成圈！不要被他们冲散！不要被冲散！……”那些在乱作一团中尚未成为公共汽车强迫性乘客的静坐示威者们，听到呼喊就急忙收缩后退，百多个人臂肘挽着臂肘，紧紧纠聚在一起。也有性子大发不听呼唤者，以黄军为典型代表，面对扑上前来的人群，嘴里恶狠狠地操爷骂娘，发狂地舞动着不知在什么时候变得光秃秃的“红旗革造团”团旗的旗竿，左冲右突，顿时使好几名夏日衣衫单薄的大中红卫兵身上带伤，脸上挂彩。有一个人的鼻孔被黄军呼呼挥舞的旗杆尖挑破了，嗷嗷直叫，捂着血肉模糊的脸孔，瘁然回奔。

这边攻击者的队伍里，按照“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由熟人熟眼的张本度带头，率领几个彪形大汉，奋不顾身直扑黄军。张本度此刻的心里，早就憋着了一股劲。他那本来就微微鼓凸的眼睛，此刻瞟在黄军身上，血红红的，喷射着渴求报仇的灼热火光。他今天早晨才从神态哀伤的杨老师那里得到惊人的消息，从这一刻起，他就认定黄军是残害生死好友袁世清及其女友孙晨菲生命的罪魁祸首！听杨老师说，那两个遍体鳞伤、蓬头垢面、紧紧搂抱在一起的尸首，是在中越边境附近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面，被一名壮族猎人发见的。经过法医验尸解剖，发现两人的胃里没有一点食物的痕迹，似乎提示他俩是因深山迷路绝水断食而死的。但是从袁世清的臂部腿部骨折和孙晨菲大面积的腰背内出血看，以及从两人被坚硬物品抽打得皮开肉绽和斑斑血痕作判断，又不能排除横遭暴虐失血过度而死亡的可能。然而又是谁，在这人迹罕见的荒山野林中，对两朵刚刚绽开无限渴求和向往的青春蓓蕾，如此令人发指地肆虐暴行，横加摧残，把两个鲜如朝霞初升的年轻生命，残忍无比地扼杀掐灭在无边无际的沉沉黑暗荒芜中？与几乎被抽打烂的两个胳膊肩头的伤痕成反照，孙晨菲全身唯一保持肌肤完整的部位，是两个娇小圆润的乳峰。显然她在如雨鞭打的时候，用双臂死死护住了自己的胸脯。她的处女膜，也是完整的。这不仅证明一对青春少男少女的爱情，是那么至死不渝地纯洁和古朴，也证实，天良丧尽惨无人道的施暴恶魔，又并不是那种被兽欲所驱使的流氓土匪。而且据当地猎民反映，自从解放后大军进山剿匪后，附近一带山岭里，就再也见不到土匪的踪影。当地边防站和公安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袁世清因儿子的逃避而幸免一斗的父亲，孙晨菲那位因形势急转直下而威风扫地被关进“牛棚”的教授父亲，更无从知道女儿的噩耗。而与袁世清情同手足和把孙晨菲视为未来弟媳妇的张本度，完全不关心上述这套

牺牲者的遇难细节和推测分析。他只认定一条：是红旗革造团那几个密谋整治袁世清和孙晨菲的头目，迫使他俩不得不做出投笔从戎离乡去国的荒唐之举。张本度还始终认为：如果不是黄军为了图谋报复，红旗革造团也不见得会作出要拿袁世清和孙晨菲开刀的决定！他也知道：正因为史苏星与袁世清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黄军才把袁世清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从而终于迫使袁世清带着孙晨菲走上了死于非命的绝路。因此，冤有头，债有主，他不能不把全部的仇恨，集中在眼前这个正在张牙舞爪的恶魔的身上。只见他勇往直前，依仗着训练有素的拳脚功夫，对逼上来的旗杆尖端左闪右躲，突然间一个箭步，扑跃到黄军身前，偏斜着身子插出右腿，套到黄军的右腿后面，然后右肘贴近他的身腰，按形意拳谱精要，劲起于脚跟，形于腰脊，敛气蓄势，猛地拧胯转腰，大吼一声中，用肘尖朝左奋力横击，一下把黄军仰天掀翻在地。然后抬起右足，正待对他的腰腹处猛力踹去，以一解雪心头之恨，其余人早就一拥而上，遏制住他过度使用武力的企图和黄军的反抗图谋，扛头抬脚地把黄军全身擒住，就往公共汽车方向搬运。黄军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种情形场合下，败跌在早就想同其一比高下的同班同学手下，而且发觉对方的眼神里，竟然会对他表现出如此深仇大恨，恼怒万分，就在众人手中拼命地辗转反侧，挣扎怒骂不止。此时此刻，他既不知道袁世清孙晨菲死于非命的消息，也不检点自身脱离集体大逞个人英雄主义必然遭此下场的因果关系。类似黄军那样因为好勇斗狠或自恃身强力壮引发的冲突扭打，还有十几起，连同对史苏星临时集结起来的“集体堡垒”的轮番冲击，使得现场一片混乱。而在此之前，大中红卫兵作为主动进攻者，在“拆散”对方的人墙时，虽然难免毛手毛脚，对被擒者的踢打抓挠，还是按上头的指示精神，保持相当克制的姿态。在黄军大打出手负隅顽抗之后，也就把宣传喇叭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声声呼喊，听成了“要武斗、不要文斗”的战斗号召。在双方一片混战之中，俞彦把披头散发挤在红旗革造团人团核心中的史苏星，指给市总部的指挥者看，告诉他这个毛丫头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但是因为她此刻被她的同伙围护在“堡垒”中央，只有把这“堡垒”冲散，才可能马到擒拿，捉拿归案。可是，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公共汽车不是标准型的囚车，那些塞进去的闹事者有手有腿，因为受到了粗暴的绑架性质的待遇，个个变得狂暴不已，加上有一起被俘的黄军作指挥，就立即开辟出了一条第二战线。“囚车”的看守者可以守住前后车门，却守不住满车都是的窗户，因此不甘就此罢手认输的免费乘车者们，就纷纷跳窗而下，使大中红卫兵到手的革命果实得而复失，不得不从事重复性劳动，再次进行围堵追捕，这样就大大分散了真革命小将的优势兵力，使得本以为人力济济、挥洒有余的大中红卫兵队伍，立时感到兵力不足，捉襟见肘之感横加逼迫。加上气候闷热，肢体不动还泊泊冒汗，几番大汗淋漓的搏斗之后，攻击的体力亦明显下降，使得随后组织起来的对假革命小将反动堡垒的冲击，一次比一次显得力度不足，气势有限，久攻不克，反反复复不能奏效。

陆波此时此刻挺立在四层楼顶有围栏的阳台上，比数小时之前呆在三楼办公室内，更加踞高临下，对情形也就观察得更为清晰。遥遥望去，不仅可以看到成团成堆相互扭打的人群，使他原先所期待所指望的特殊“和平解决”方式，变成泡影，而且一心要求得的速决速战效果的解决进程，也分明陷入了胶着状态。正在陆波觉得无比烦躁之时，却见马路远处东西两侧红旗翻动，约有上千人马向市委门口席卷而来。陆波方才刚刚批评部下轻敌，

人数准备不足，蓦然见到有生力军涌入，大喜过望，对自己所作批评的主观武断不由心生悔意。

但见得那增援队伍飞快推进，神速穿插，转眼之间已经进入战斗现场。只听到人群中顿时欢声雷动，那些原先控制在公共汽车里的人，也纷纷蹿出车窗车门，好象是突然变得无人看管似的。这时陆波方才意识到自己判断失误，期待落空，正要派人查明真象，恭鹏志早已气喘吁吁赶到屋顶上，张惶失措地报告，新来队伍有苏南工学院院长长征兵团打头，并纠集了另外几个跟大中红卫兵作对的中学学生组织，前来为延安中学红旗革造团解围助阵！陆波闻言没有象恭鹏志那样惊慌失色，只是沉默着，脸色变得很铁板。恭鹏志见他不作声，就接着报告说：“武副书记正在来市委的路上。他那里检查一结束，就离开了苏南工学院。”见他仍然不吭声，又接着说：“刚才收到市货运公司崔经理打到你办公室去的电话，说市委门口的静坐学生把他们去港口运煤的直通线路堵死了，现在要远兜远转，使计划难以按时完成。问市委是不是需要派些工人来，把胡闹的学生轰走？”

“哦，”陆波心头一动，想不到这位只在电话里交谈过却从未见过面的基层领导，能够在关键时刻，主动提出这样一种很有全局观念的建议来。他抬腕看了看手表，神情十分严峻地沉思了一会，声音低沉地对恭鹏志说：“好吧，看来工人老大哥不出场，这局面还真收拾不了。看看其它单位是否也能派一点，不要再形成胶着状态。”

史苏星为了激励苦苦支撑的伙伴，早已把只要挺住就会有援军出现的说法，一遍一遍地重复。然而相当一部分听众，因不知内中底细，对此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待到援军果然从天而降，不由欢腾雀跃，欣喜欲狂；那些女同学们，不顾自己满身盐斑，汗臭扑鼻，和素不相识的救援者们，一个劲地拉住对方的手拼命摇晃，不是用苍白的语言而是用行动，倾泻心中无限的感激之情。而黄军则领着一班刚刚重获自由的男同学，狼腾虎突，把在慌乱中仍想负隅顽抗的一群大中红卫兵团团团围住。只听的他领头一声高喊，红旗团的勇士们齐声号令：“一二三！”“咚！”一个大中红卫兵在四肢徒劳的挣扎舞动中，被扔入了水波不兴的护城河河水中。“一二三！”又一个被扔进水中，激起飞溅的浪花，在阳光下闪烁发光，给死水一潭的护城河，增添无限的生气和活力。

苏南工学院的大学生们，自然不屑于这种野蛮行径。他们比中学生更有头脑，更有心计，也更有章法。他们抵达市委门口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曲湘川的指挥下，集中几百号人一阵猛攻，占领了停在市委大门外西侧的那辆大中红卫兵的宣传车。于是，那高音喇叭里的宣传调子，就立即翻了个身。首先是宣读近十个革命学生组织的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市委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倒行逆施，坚决支持声援延安中学红旗团的革命行动。

随后是反反覆覆地播送《北京快讯》、中央文革首长讲话、“两报一刊”文章等，为造反学生鼓劲打气，对退守到东侧那辆宣传车周围的大中红卫兵施加心理压力和思想影响，争取围观群众的舆论同情和支持。而大中红卫兵的宣传喇叭，连同喇叭前众多不知疲倦的嘴巴，也不甘示弱，开足马力揭露红旗团文革开始以来的各种胡作非为，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两方面声嚣尘上，那“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声浪大会战，持续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不仅对围观革命群众的耳膜，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判断辨别能力，都

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和高难度的摔打磨炼。人们的耳朵，好不容易对共产党天下这种各执一词、相互诋毁的喇叭大战有所适应，那西边的喇叭声却突然中断，仿佛想歇息一口气，仿佛在琢磨沉思着一个更险恶、更有杀伤力的宣传攻势。

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短暂的沉默，包含有何等重大政治涵义！它是一个新生婴儿呱呱坠地前的屏息敛气，是更凶更猛的暴风骤雨来临前的沉闷静寂，是锡城市市的文革运动将要翻开新一页历史篇章前的沉思默想。在这短程沉寂之后，随即响起了一阵急促而持续的呼唤，听起来不过是一个极简单扼要的会议通知：“请每个参与这次声援行动的学生组织，赶快选派一名代表来车上开会，有重大事情急需商量，有重大事情急需商量！……”这声音，这呼喊，它对所有现场人士的生活或命运将要产生的影响力量，不管他们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不管他们有所意识或一无所知，都将是势不可挡！而此刻绝大多数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下午四点钟以后的太阳，虽然已经朝西移低了一大截，热力光亮，却一点不减弱。被阻塞的交通高峰期人流，和新增的闻讯而来的“观光者”，把市委门口那个三角形地带及其四周围，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唯一流动着的，是跟大马路并行的那条护城河，河水对岸上的火热气氛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管自托着串流不息的农船、挂机船和一字长蛇形的轮队往前走。船上的人们，或者学着河水的样子显得很冷漠，或者引颈翘首，对自己不能加入岸上围观者的行列觉得很懊恼；他们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挤在人堆中，受汗臭屁臭的熏蒸就近观察，跟站在船头一边领略阵阵清爽河风一边远眺作比较，还是后者更惬意更合算。

这时候在发出呼喊声音的宣传车上，王小燕、曲湘川、史苏星，还有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年轻人，加上颇有实力影响的市一中“八·一八兵团”的代表雷竞天，已经围成了一个小圈。那个戴黑边眼镜者，就是李辉康中学时的同学郭贤，一身兼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南下战斗队骨干和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锡城市联络站代表的双重身份。他脸色白皙，身材单薄，过早显现皱纹的额头里，仿佛老是在沉思默想。那种老事成重沉默寡言的模样，会使人以为：他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答题时，会是一个喃喃不知所对的文弱内向书生。可是，如果你了解到这催动各位学生领袖向车子集中的呼唤，出自他的深思熟虑和提议，如果你能从他那紧抿的厚嘴唇边，看出那嘴角所隐含的坚毅，你就会猜到他在锡城市当前和今后的文革运动中所扮演的不同寻常的角色。他似乎比在场的任何学生领袖，都想得深，看得远。他知道：眼前造反学生所暂时取得的优势和胜利，虽然已经使部分学生头头有点自我陶醉，却瞬息易变；就总体力量对比而言，这种优势和胜利就象一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很可能在一根头发丝的一触之下，就顷刻破灭消散。因此，他要按北京总部的意图，借这各路英雄的临时聚合之机，促成一种联合，以便同受到市委背后支持的大中红卫兵分庭抗礼，最终取而代之。

郭贤的提议，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团结就是力量，一根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这个简单道理，早在他们念小学时就已经深深灌输到脑子里去了。接着就是起名，都同意“锡城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这个名称。所以用毛泽东主义这一前称，是因为考虑到毛泽东既然已经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仍然把他老人家的整套想法念头只称作“思想”而不称作“主义”，就使我们对红司令的无限虔敬和崇拜，打了折扣。大家

都对这种折扣反感，因此断然决定发扬革命首创精神，让毛泽东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在中国东南角的地平线上。会议一开头就很顺利，大家在起名称问题上没有斤斤计较，更没有人想把自己组织的名称，一字半音地塞到新的组织名称中去。可见革命小将刚刚兴起的时候，风头主义山头主义之类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即使有，也微乎其微，或者不敢轻易暴露。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虽然出自西方，却并不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在里面，我们不妨借来一用。但是一借用就发觉上当，还来不及为这好开头高兴上两分钟，就碰上大难题，即使大敌仍然当前，即使后面有更为重要紧迫的问题急需讨论决断，大家却在名额问题上喋喋不休地开始争论，使会议陷入僵局；新生婴儿刚刚在娘肚外露出一个头盖，就变得不进不退，生死未卜。按照郭贤的最初提议，一个组织出一人，不要一哄而上；一是考虑到还要扩充发展，二是有些够格的组织一时通知联系不上；如果一上来就把核心组搞得人头济济，人满为患，后起者就会望而生畏，拂袖而去。史苏星表示赞同，但认为同时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比如苏南工学院造反早，“北上控告”的行动震聩发聋，影响巨大，就应该多一个名额。与会者大都年轻稚嫩，天真单纯，觉得史苏星言之有理；加上苏南工学院一开始就有两个人与会，这建议其实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就一致通过同意。却没有想到，史苏星这是话中有话，预作圈套。她这是用几何学的方式，画了两个对等角；她为苏南工院长征兵团争取特殊化待遇所摆的理由，其实也是为红旗团设的。她当然不会明打明说，只是口口声声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对红卫兵战友们既然已经打破了一次绝对平均主义，却同时又留下一个死角，觉得万思不得其解，死钉着要苏南工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作开导。曲湘川王小燕已经欠下了史苏星的人情，当然不好意思独当老大，而不允许第二者也享受同等待遇。而其他小弟弟小妹妹一经发现史苏星饱藏祸心，对红旗团自以为是想充当中学红卫兵老大的狼子野心，觉得很难给以方便。具有催生婆和仲裁人地位的郭贤，久久沉吟不语。平心而论，就以红旗团今天率先向市委发难的不凡表现和气魄胆略，多一个代表名额似乎也不为过。但是其他中学的代表都起而反对，又使他不便与多数人不合。而红旗团那种强烈的“自来红”思想，前一阵在市里铺天盖地到处张贴的那付宣传“血统论”概念对联的做法，也使他无反感。尤其是刚才在市委谈判桌上，武遥副书记当面指责红旗团要对他们学校两个同学的死亡承担部分的责任，以及对方高音喇叭里对此所作的大肆渲染，更使一起参加谈判的市一中代表，对红旗团的革命先进性提出极大疑问。最后还是曲湘川出面提议：总不能老是争论不休，市委的老爷们还在等大家的最后答复。能不能由从中央文革身边来的“首都三司”代表，最后作个裁决。各人都以为然，觉得无论以郭贤所具的身份，还是凭他所留给大家的印象，都由资格当此重任。郭贤恭敬不如从命，舔了舔在苏南夏天并不怎么缺乏水分的嘴唇，开口说道：“刚才大家对红旗团的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我都赞成。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多次强调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是不对，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不利于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革大军，反而给走资派以可乘之机。尽管大中兵前一时期在鼓吹谭立夫路线时，比谁都起劲，市委老爷们已经抓住红旗团的失误做文章。因此，我建议红旗团一回去，就组织力量，在全市贴上一批‘老子英雄儿继承、老子反动儿造反’的对联，挽回影响。不如此做，‘红联指’就无法把最大多数的同学，团结到自己的周

围来。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红旗团应该多一个名额。红旗团确实对推进锡城市的文革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革命行动，大家还不会象今天这样紧紧地聚集到一起。我们对此必须认可。

不认可这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郭贤左右开弓，面面俱到，不仅搬出了中央领导的意思，也揭露批判了对立面的可恶行径，更指出了下一步“红联指”需要克服的障碍，不能不使大家心悦诚服，一致接受他的仲裁。

然后，就转入下一个议题：是不是在市委接受部分所提要求的情况下，立即撤离现场？还是坚持斗争到底，不达全部目标，决不罢休？武遥代表市委所接受的条件包括：承认红旗团和声援学生今天所采取的是革命行动；对他们拟议中将要成立的全市性学生组织，给予同大中红卫兵一视同仁的待遇；市文革办对各校工作组的情况分门别类加以排队，问题严重者责令其自我检讨。没有接受的要求有：责令恭鹏志到惠湖中学接受批斗；立即全部撤销工作组；大中红卫兵对今天采取的“野蛮挑衅行动”公开赔礼道歉。在这一重大表决案上，郭贤发觉自己成了绝对的孤立者。他在下午出门后的路上，听到一辆运煤卡车对着他“嘀嘀”地直按喇叭。抬头一望，原来是昔日老同学李辉康在招呼他。李辉康把车子靠到路旁边，问他是不是去市委门口。接着警告他：公司里正在集合队伍，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据说是去市委保卫党的领导。李辉康估计会对闹事学生动用武力，知道他也去市委，必然跟静坐学生有关系，劝他动员学生退一退，好汉不吃眼前亏。第二个通报同样使他很惊讶：奚大雄昨天被大中红卫兵打折了腿，已经送进医院里。

郭贤在思想上，对文革运动中的矛盾对抗虽然有准备，但并未想到会有如此激烈，使武力暴力也一起参加进来。要让学生去跟工人作抵挡，那是以卵击石，下场必定很惨。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集合到一起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个个斗志正旺。那些新官上任、刚扛上“红联指”核心组成员头衔的各校头头们，都极其渴望在一场新的恶斗中建功立业，树立声威；因此众口一词：市委的提案，即使我们接受，同学们也不会答应。如果人民需要以鲜血来唤醒，同学们会觉得自己的鲜血恰好可以派用场。这些学生头头的回答，也许并不是硬找借口。按当时的现场气氛看，如果把这一动议交给全体同学来表决，郭贤相信同学们会立即要求撤换“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头；马上就会有一批斗志更激昂的革命新秀，按巴黎公社选举原则，对右倾投降派取而代之。郭贤不处在受人撤换罢免的优越位置，因此可以独执己见，不受后顾之忧的牵制。在所有的其他与会者中，他从曲湘川的脸神和沉默态度去判断，知道只有他是唯一的知音。可是，他受手下人激进情绪的民主制约，同样不敢轻举妄动。郭贤感到一种深长的悲哀袭上心头。这种悲哀并不产生于他对同伴们的失望，而是对整个现代民主精神本身所包含的相互矛盾之处，感到一种困窘，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巴黎公社的社员为什么要选举出具有远见卓识的带路人？是为了能够带领他们识破迷障谬误，绕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之路。如果这些带路人只是跟随群众的思想情绪，让他们的喜怒爱憎左右自己的政治选择和决断，他们实际上是背叛了选民们的信任。但是反过来的推导同样成立：如果人民一旦选举了他们的领袖，而这些领袖们因此而自以为是，藐视民众，为所欲为，处处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视民心民意如垃圾粪土，一切要有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来决断，民主就不复存在。毛主席所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让最广大

民众享受和实践民主的伟大尝试，可是在一开始，他就那么强烈、那么鲜明地感受到了民主本身所包含的局限缺陷，人们是否可以最终找出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来呢？这种争辩过程中的短暂沉思，使他几乎忘却了他目前所处的角色处境。直到真有人大声提议把问题交全体同学表决，才把他骤然惊醒。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他同所有的与会者都明白，表决的结果，必然是他的意见被否决。他只能感谢提议者为照顾他的面子，才没有以与会者的绝对多数，当众使他下不了台。于是他不得不明智地撤回他的意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然后侧头朝东西两侧的远处眺望，只见横跨护城河的东西两座桥梁上，黑压压的工人队伍正在朝这边开过来。阳光照射在队伍的人头上，亮晃晃的，一闪一闪在跳动。他把眼神收回来，觉得周围很燥热，好象一点微风都没有，可是那高处的梧桐树叶，却分明在颤颤地作抖动。护城河的远处，响起一声长长的汽笛呜咽声；一点没有风，那汽笛声并不是靠风的传播，而是随着河水一股腥味飘过来的；他的心里不由一阵发紧。但是此刻心里发紧的，并不仅仅是他。

隔了一堵高墙，市委四楼会议厅里，大部分市委常委都聚集在圆弧形的窗口前。“他们拒绝了，他们拒绝了……。”陆波来回踱着步，嘴里不断重复着这一串字，突然站停在武遥面前，“这不奇怪，一点不奇怪。它可以使我们丢掉一厢情愿的愿望，去除幻想，明白我们的对手，是怎样地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的目的是在乱中夺取共产党的江山！我们不能让，一寸都不能让！否则不仅会给我们的对手以一个错误的信号，而且也会给我们的人民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不做败家子，坚决不！”

武遥知道陆波这些话实际上是在批评他，训斥他。他的心里象铅一样沉重。董校长所受到的野蛮等待，孙趋女儿和杨玲班上另一个学生的死讯，还有死者留给杨玲的那封信……，这一切都使他对惠湖中学的红旗团充满了厌恶之心。在刚才的谈判会上，他首先严厉地批驳了市委挑动武斗、大中红卫兵对红旗团大打出手的说法，指出大中红卫兵开始时只是劝说和架离同学出现场，没有动一拳，没有踹一脚。是红旗团的人，首先用旗杆挑破了一个大中红卫兵的脸，后来又把两个同学扔下河；使那个气焰嚣张的高大女将无言以对。然后让恭鹏志读两个死难同学写给他妻子的信。那信一读，不仅使其他学生谈判代表垂下了头，就连那个一口否认红旗团有责任的史苏星，也一度变得哑口无言。在谈判结束的时候，武遥好象觉得开始时的愤慨心情，不知怎么减少了不少。这也许是因为在学生的谈判代表者中，有使他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王小燕；他对死难老战友的感情，是无法从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完全湮灭的。而这些充满革命激情却尽做傻事的年轻人，从本质上讲，他以为跟二十年前的自己属于同一类。他没有理由对他们太苛求。在送谈判学生出会议厅的时候，他对走在最后的郭贤说：“你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我们搞革命，要对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负责任，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工具或牺牲品。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牺牲品。我们有责任尽量把这不必要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是不是？”他说完，分明看到这个外表腼腆实质却颇具影响力的“首都三司”代表点了点头。可是显而易见，郭贤对他的同伴所能发挥的实际影响力，却并不象他所期待的那样高；就象他自己一样，他也无法影响身边的大多数市委常委们。他不去看陆波的脸，也不去看窗外的情景，两只眼睛，只是扫视着一张张摆满了会议桌的“请战书”，“请愿书”，“决心书”。它们来自市里各个工矿企业，反映代表了锡城市三十万产业工人对

近千名闹事学生的愤怒、谴责和声讨。想到这个文明古城正无可阻挡地朝着野蛮和暴力的深渊滑下去，心中的无可奈何与悲凉，象爪子一样扼住了他的胸腔.....

第十五章 告别

袁世清和孙晨菲的死因终于查明了。他俩在南下云南边境的一列货车上，遇上了一群北京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不仅有着纯正的革命血统，而且沸腾着投笔从戎、去越南抗美前线建功立业的革命豪情。小将们萍水相逢，年龄相近，目标不约而同，自然倍感亲切，彼此无所不谈，共同憧憬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一起分享壮怀激烈的革命豪情。孙晨菲同其中一位文质彬彬的女红卫兵，尤其情投意合，谈花木兰，谈保尔·科察金，还谈《红肩章》，《青年近卫军》，《法国大革命》，和塔维尔金的《拿破仑传等》。谈着谈着，话题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各自的家庭背景和目前的处境。北京女红卫兵惊讶地发现：新交好朋友慷慨奔赴抗美战场的真正动机，原来是为了逃避“红五类”子女的革命铁扫帚！

内心苦苦挣扎搏斗了几个小时，终于向自己一伙红卫兵的头领告发。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们，蓦然发觉革命队伍里混进了妄图投机革命的黑狗崽子，不由怒不可遏，去越南抗美前线建功立业的权利和机会，是阿狗阿猫谁都可以摸一摸，舔一舔的么？两军对垒，如果让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来与敌人遥相呼应，那不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却不知道是怎么落的吗？想到这种严重后果，不由一身冷汗；立即解下腰间皮带，挽起袖管，双目怒睁，喝斥怒骂与飒飒飞舞的皮带抽打声交相混和。直把两个妄图混迹于革命的黑狗崽子打得奄奄一息，然后趁列车爬上高高山坡之机，推下列车，眼看着两个满体鳞伤的身体，咕辘辘地滚下一脸严峻的山坡，革命队伍得到纯洁，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自觉为革命干了好事，当他们在中国驻河内使馆所设的专门接待站受到询问时，就毫不犹豫地讲出了他们所作的革命壮举。两个横遭暴虐而又不甘心中途失去抗美援朝权利的“狗崽子”，在密密层层的热带原始森林里，拖着伤痕累累、精疲力竭的身子，凭着阳光和星斗的指引，餐风饮露，相互搀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向着中越边境的方向艰难迈进。那高高矮矮的树木，绿光盈盈地充满着生机，密密麻麻地举着肥大厚实的宽阔叶子，毫不礼貌地拦阻艰难跋涉者的进路。那参差披拂的藤萝，和兀伏遍地的巨大板状根勾结起来，磕磕碰碰地合伙羁绊变得越来越虚弱的腿脚。当他俩的身子一个拖着另一个一起被绊倒的时候，鼻孔里便嗅到了湿热熏人的腐土气息，而从厚厚的枯枝败叶中蹿冒出来的奇花异草，却会假装亲热地与他俩磨蹭接吻，以一片五颜六色的脉脉温情，来掩护它们那些身长尺余的蜈蚣和遍体花斑的腹蛇邻居，向陌生的远方来客发动可以致人死命的恶毒攻击。当一弯惨白的月钩阴森森地挂上黑咕隆咚的树梢时，远远近近，低一声、高一声地，响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嗥叫。猛禽扑翅惊飞，树叶在震颤摇晃中沙沙作响。草虫唧唧，在忽现忽闪、忽明忽暗的幽蓝磷光中，哼着悲哀

的歌谣。两个虽然年轻却热力不断消散的身子，在极度疲乏中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直到过多的内出血和极度的饥渴，耗尽了内中所积存的最后一点精力和生命。

当真相大白于众，噩耗传遍延安中学校园时，那些以往同死者相好的同学，那些家庭出身跟两位死者有着类似背景的同学，心中的悲哀、伤痛和愤怒，就象在黑夜中涌动的大海狂涛，地层下汹涌奔流的炽烈岩浆，左冲右突，痛苦地寻找着渲泄迸发的出口。在一个阴霾满天的上午，这些人在张本度的带领下，终于群情激忿地围聚到了工作组办公室的门口，要求正忙于作撤退准备的季家驹，为死者召开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季家驹并不知道，提出这一要求的背后策动者，就是他顶头上司之顶头上司之夫人杨玲。他向顶头上司恭鹏志打电话作请示。恭鹏志没有找到，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答应会尽快地转告。然而这“尽快”两字对此时此刻的季家驹来说，毫不管用。办公室门口的人越聚越多，诅咒、叫喊、怒骂不绝于耳。而另一方面，听说因头上挂彩而多日不在校园露面的黄军公开扬言，如果工作组答应召开这样的追悼会，就是用死人来压活人，红旗团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自从出了“九·一九事件”，红旗团在市内名声大振，更不把学校工作组放在眼里。恭鹏志的回电迟迟不到，季家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大热白秋的天气，紧闭上房门在室内团团乱转。当此手足无措之际，却有一名眼尖脑灵的工作组成员，十分慎重其事地把组长拉到窗前作观察眺望。季家驹不明所以，站到窗前顺着手下人的手指举目一望，瞧见市委武副书记的夫人杨玲和两个女同学一起，正各自手挎着一个小竹篮子，在向众人发放用白纸做的小花。他立时明白过来，立即破门而出，面对几乎有些忍无可忍的同学明确表示：工作组对两位优秀同学的惨遭不幸，与同学们一样深感悲伤。但是为了顾全大局，照顾各方面的想法和情绪，工作组不可能出面组织和主持召开这样的追悼会。如果同学们自发举行，工作组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

对季组长所作的这种表态，一部分同学虽然感到不满意，但是张本度等几个为首者与杨老师一商量，却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死揪住工作组并无意义。他们知道：工作组在心里是向着他们的，因此用这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实际上已经为召开追悼会开了绿灯。于是就分头忙碌准备；并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给学校里的大中红卫兵团和红旗团一起发了邀请。他们明知后者不会参加，却有意用这一方式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抗议示威。对黄军扬言要采取“行动”，张本度更是磨掌霍霍，瞒着杨老师暗地里把自己练武的一班师兄师弟，也悄悄地带进了学校，悄悄隐蔽在靠近会堂的一间教室里。

下午一点，天空中灰灰的云块变得更厚更深，沉甸甸地压在校园上空，也压在鱼贯而入走入会场、胸前都佩戴着小白花的追悼者的心头。那极低的气压象块极大的无形磨盘，把人们的胸口堵压得又慌又闷。高空深处，不时有沉闷的雷声隆隆地滚过，把阴暗光线笼罩下竖在会场前方的几个大花圈，震得颤颤颠颠地摇晃；在花圈的中间，竖着一个披着黑纱的大镜框，框内放着袁世清、孙晨菲昔日在全市考试竞赛优胜后，上台领奖时和俞市长、董校长及杨玲等站在一起的合影。两个人的神情都显得腴腆不安，似乎当时就意识到：两年以后他们会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下，面对同学们一种令人心碎的目光注视。暴雨来临前的疾风，一阵阵扑进会场来，使两头用绳子固定的追悼会会标，和那贴着“袁世清孙晨菲同学追悼会”白纸剪字的黑布，不断地在风中跃动挣扎，就象附上了死难者两颗苦痛的灵魂，在雨点般的皮带

抽打下，扭动着身子在哀哀地呼号求救。这种几乎要使人窒息的气氛，连同由它派生出来的不断尖利地刺疼着人们心灵的可怖意象，使一些神经脆弱且近来家中也有亲人横遭不幸的女同学，不等追悼会开始，就已经在会场一角嚤嚤地抽泣起来。杨老师脸色庄重地站在主席台上，对身边的张本度和闻讯赶来的俞彦感慨地说：“老天有眼，老天似乎也在为我们两位同学哀伤难过啊。”这时候，有几个晚来的女同学急促地跑了进来。她们的头顶上，虽然用举着的手帕作成一顶小雨伞的样子，身上却已经沾满了湿漉漉的雨点。这时不知有谁悄悄地说了一声：“下了，终于下了，老天也忍不住哭了。”这句悲切的话，引得那些女同学的原本嚤嚤的抽泣声，一下变成了一片哽噎呜咽声……“同学们，我们开会了。……同学们，我们正式开会了。”杨玲站到讲台前，想以这种机械性的重复提醒，劝那些感情脆弱的女同学们先克制一下自己。然而没用，流泪的女生们内心很想遵从杨老师的呼唤，管住自己太过冲动和伤感的情绪，可是流泪的眼眶和抽咽的喉咙口却仍然犯自由主义的毛病。杨玲见状不得不说得明白：“希望同学们克制一下感情，我们开会。”她这么婉转地批评不懂自我克制的与会者，自己的眼圈，却也开始红起来。并且觉得鼻梁间热辣辣的，有热流拼命地朝两边的眼眶处挤。她强忍住。她必须忍住，否则今天这会就甭想开起来。她不再等待脆弱的抽咽声完全自我休止，简单地说了几句开场白，然后就掏出一张纸，举在手中朝台下扬了扬：“什么是对袁世清和孙晨菲同学最好的悼念方式呢？我这里有他俩离开学校前，托张本度同学留给我的一封信。我给大家念念，大家就会更加理解：他俩是为为什么死的？他俩的死，为我们留下了那些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提示？敬爱的杨老师：请原谅我们的不辞而别。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有红旗团的好同学暗中通告：他们头头决计要拿我俩开刀，首先抄我们的家，然后把我们与有问题的父亲放在一起批斗，然后迫令我俩与黑帮分子一起关进‘牛棚’，接受监督劳动，以杀一儆百，使我俩今后在学校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乍听到这一密报，我俩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特别是在红旗团当头的史苏星同学，她品学兼优，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为什么突然会对自己的同学变的那样狠毒残忍？难道，只因为我俩出身在自己无法选择的家庭，就真的成了革命的敌人吗？他们因为有好爹好妈，就应该对没有好爹好妈的人，象秋风扫落叶般地残酷无情？难道我们不是同样在红旗下长大的吗？他们口口声声强调‘阶级烙印’，党的教导，党的关心培养，党在这么多年给我俩发的那么多奖励奖状，社会的各种正面影响，难道都是一文不值的吗？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第一首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会呼唤的第一句口号，就是‘毛主席万岁！’我们学焦裕禄，学雷锋。当我们候在大桥的斜坡前，用稚嫩的双臂帮助推动一辆辆上桥的板车时，当我们不论刮风下雨，一清早就去搀扶引导福利厂的盲人伯伯阿姨时，当我们得到行人赞赏的眼神和夸奖的鼓励时，我们觉得做新中国的小公民，是那么地甜蜜和骄傲！

可是突然间，这一切都消失了！我们成了阶级敌人的同谋者，反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没有参加革命大串连的权利，我们成了贱民，成了在别人面前处处低人一头的狗崽子，这是合理的吗？不！对于这种充满反动血统论的封建糟粕，我俩决不接受！

匹夫可杀不可辱！我们不会自怨自艾，消极逃避；更不会忍声吞气，

听任那些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同代人来凌辱欺负，任意摆布！我们走了，义无反顾，昂首挺胸，直奔抗美援朝的战场！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老师同学，无论是同我们心心相印的，还是对我们抱有敌视之心的，当在我们的骨灰盒上看到闪亮的军功章时，他们就会发觉：在我们身子里流淌的鲜血，同样地滚烫滚烫，革命的热力，一点都不比那些以流着爸妈血液而荣耀的天生革命者差！

永别了，杨老师！青山处处埋忠骨，我们并不打算在炮火连天的残酷环境中侥幸生还；而只想……只想证明自己的人身价值，给那些要想粗暴糟蹋作践它的人，以一记响亮的耳光！杨……杨老师，请……请为我们祝愿。等着我们……我们的军功章！”

杨玲念到这最后几句话时，已经断断续续不能连贯成句，竭力忍住的眼泪，亮闪闪的，终于盈满了眼眶。当台下的女同学看到要求她们克制感情的杨老师，自己也拿起手帕擦起眼泪来，再也无法控制得住自己，借着室外暴雨鞭炮般急骤敲打着屋顶的雨点声，应和着一道道电闪雷鸣的发作震怒，几乎个个都失声痛哭起来！她们不仅为信中慷慨悲壮的而又高傲的情怀所深深打动，更为写信者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结局，以及他俩对祖国对革命的无限挚爱和忠诚所换来的结果，感到撕心欲裂的伤痛！……雷声，还在隆隆作响，仿佛余怒未息。

雨，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老天爷似乎为自己哗哗奔泻过多的眼泪突然感到自惭羞愧，重新扳起了灰沉沉的脸孔。俞彦以大中红卫兵头头的身分，最后一个登台发言。他那严峻刻板的长方脸上，也挂着泪痕。但是，男子汉的眼泪在有些场合，并不意味软弱。尤其是象他这样的一校一派之学生领袖，更不会被女同学们孱弱的眼泪，蒙蔽自己清醒的革命理智。面对一个“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绝妙良机，他把眼光射向会场后排，声音沉稳地问道：“请问，今天的追悼会，有红旗团的同学前来参加吗？是红旗团的成员请举一下手。”他问完，顿了一会，似乎是给举手者以机会；虽然他明知没有人会举手。他在杨老师读信时，瞥见有好几张熟悉的脸孔溜进了会场的后排。“同学们，”俞彦见没人作答，就运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为什么要红旗团的人勇敢地亮一下相呢？因为他们的头头，总抵赖对我们两位死难同学的责任。刚才大家听杨老师念了那封信，可以很断定地说，这种抵赖是没有用的！我们有权利，要求红旗团对此作出交待！敢于在市委门口闹得天翻地覆的勇士们，为何此刻就失去了你们的勇气呢？”

会场中人的眼神，随着俞彦打住的话语，随着他灼灼逼人的目光，一齐朝后排扫去。杨玲这时才发觉：她高三（1）班三名尖子高材生中硕果仅剩的那位史苏星，也在会场之中。

她此刻正迎着无数怨恨憎恶的目光，无所畏惧地向台前走来，后面还跟着两个形同保镖的红旗团男同学。在她向主席台越走越近的时候，在她朝俞彦步步逼近的时候，会堂外边，两个出口处和一溜大窗户前，不知什么时候，也人头济济地冒出了好多红旗团的人。会堂里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杨玲此刻的心情，特别地紧张。袁世清和孙晨菲的死亡，9月19日市委前的大动干戈，使她觉得自己一向祥和的苏南古城家乡，充斥着暴戾血腥之气。而当她最初想到要给两位死难同学开追悼会时，老武第一个警告，就是要防止激化学生中的矛盾冲突。她因此而犹豫了好几天。可是，她觉得如果不促成这个追悼会，她的良心就无法安宁。她总感到自己对两位宠爱学生

的死，也有一分难以推卸的责任。他俩对她是如此信赖，在迈出人生最关键性的一步时，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透露，却告诉了她。这是何等感人至深的信任和师生情谊啊！她作为这一信任和情谊的承受者，作为更成熟更有社会经验的长辈和导师，照理应该随即作出反应和行动。可是她却一直拖延不决，似乎因担心他俩在学校的险恶处境，真心希望看到他们能在越南战场上建功立业，自己也能连带着脸上生辉。直到第三天，在老武知情后直怪她的糊涂时，才急忙向公安局报告。公安局的同志说，八月份以来，本市因类似情况出走的，已有好几党，都因为发觉报告得早，在半途就被拦截劝说回来了。

而最终发生这种恶性死亡后果的，在全国还是第一起！而这种死，杨玲老觉得跟自己没有及时报告有关系。她也不相信，两名同班同学的死讯，对毕竟还是孩子的史苏星，会一点触动都没有。因此在校园里每次遇见这位“学生领袖”的时候，特别留意观察她的表情。似乎感觉到了杨老师逼人的眼光，史苏星每次看到杨玲时，总是匆匆擦肩而去，绝不正眼回看她一眼。于是杨玲就以为，就断定，这位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已经感到内疚，从而判定开个追悼会，并不会象丈夫和季组长所担心地那样，在学生中引起一轮剧烈的冲突。如果他知道张本度在会堂附近的教室里埋下了伏兵，如果她知道头上还缠着纱布的黄军咬牙切齿地发誓：“决不允许狗崽子借机示威反扑！”她一定会改变初衷，劝说同学们取消这个惹事生非的追悼会。但是已经晚了！她一听到俞彦的开口第一句话，就情知大事不妙，第一感觉就是：经过数月革命大风大浪锻炼的小将们，在政治上已经显得身手不凡，成年人的一番良善用意，可以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接过去加以利用，心中已生老大不快；正在竭力思索挽回局面的对策时，史苏星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主席台，一声不响地直逼俞彦。台下屏息敛气观望的人群中，现出一片轻微的骚动，或提心吊胆，或兴奋激动，焦焦地等待着不知要发生什么情况。杨玲见形势一触即发，就断然抢上一步插入他俩中间，急促地问道：“史苏星，你想干什么？”

“杨老师，老同学不幸遇难，可以让我说几句话吗？”史苏星不慌不忙地回答。

“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张本度在旁边一声怒喝。

“俞彦不是刚才要红旗团作出交待吗？”史苏星一只手已经坚定地抓住了会场扩音器的话筒，一面朝张本度冷冷回了一句。这时门口也有人猛叫：“不许张本度撒野！”

杨玲一见这种情况，就示意俞彦松开也抓住会场扩音器话筒的手，且听史苏星说些什么。

“同学们，”史苏星昂首挺胸面对众人：“我听了杨老师读的信，心里也很难过。我们确实有过要对袁世清和孙晨菲采取行动的想法，但是到底怎么动，我们内部是有争论的。但有一点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我是一开始就想把所有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同学，都吸收进我们红旗团来的。如果有人不信这一点，可以上我们团部查阅有关会议记录。其实，我从来就不相信‘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因为我父亲，也是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中，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因此，我对袁世清孙晨菲想跑到越南去革命的想法，就特别受触动，特别容易理解！我愿借这个机会在此向大家宣布：红旗团从今天起，就跟反动的血统论彻底决裂！凡是愿意参加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会后可以立即去我们团部报名。大家一定都已听说过‘红联指’吧，我

们跟苏南工学院的长征兵团，是两家最主要的发起单位。我们9月19日在市委门前所进行的斗争，震动了全城，并且已经得到了中央有关方面的肯定！”

台下轰然。人们绝对没有想到，史苏星上台会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几分钟之前的悲怆气氛，被新的信息冲击波一扫而空。“你说你们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有关方面的肯定，能告诉我们具体是那一方面吗？”台下开始有人提问。

“林杰。听说过《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林杰吗？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明确指出：我们的静坐是革命行动！”

史苏星的话刚落音，有个脸上还明显带着泪痕的女同学，在会场后面怯生生地问：“你说红旗团不再搞反动血统论，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呢？听说你们以前打算吸收我们，只不过是让我们当什么红旗兵，仍然是两等公民。”

“这样跟你说吧：按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的思想认识是不断提高进步的。你们现在如果加入红旗团，就全部都是光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允许内部存在所谓的两等公民！还有，如果你们不相信红旗团跟反动血统论决裂的决心，就到校门口去看看。我已经吩咐同学，天一见晴，就把一副新的对联贴到大门口去。‘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你们等着瞧好了，这几天我们要把这副新的对联贴遍全城……”杨玲绝对没有想到：今天的追悼会最后会开成这样一个结局。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宣布散会后，对着史苏星说：“袁世清和孙晨菲如果能听到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他们会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史苏星这次仍然没有正视杨玲，但是却也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垂着头，踌躇着，顿了好一会，终于开口说：“杨老师，能给我一朵小白花吗？”

杨玲没有说话，默默地把自己胸口的白花先摘下来，递给史苏星。史苏星没说任何表示感谢的话，也没有把小白花别上自己的胸口，而是笼在手里，然后一扭身，跑下了主席台。

杨玲瞧了一眼脸色阴沉若有所思的俞彦，然后走下主席台，随着人流走出会堂。抬头望望天空，天空已经露出一条个圆形的大窟窿，从中热辣辣地泻下一长道白茫茫的光柱，使人立即感到：炎热的夏天尚未过去。离开会堂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象一群欢腾的小羊跟随在史苏星的后面。他们是去报名参加红旗团吗？杨玲诧异史苏星那番讲话，竟在几分钟内就发生如此神奇的功效。《红旗杂志》，中央文革，对天真无邪、充满革命渴求的中学生们，有着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啊！她看到有两个女同学经过她身边时把脚步放慢了，看到她在看她俩，终于站住。她俩是另一个班上的两名优秀生。“怎么，你俩也想参加红旗团？”杨玲又疑惑，又惊讶。

“杨老师，”其中一个朝四周看了一下，断定没人注意她，就低声说：“前几天俞彦他们去执行一个革命行动。想不到打起来人来也那么凶，那么野！把所抓人的大腿骨打成粉碎性骨折，还游街示众，直到昏倒在卡车上才送急救；现在正躺在我爸医院的骨科病房里，据我爸说，要躺一两个月，弄不好会变瘸腿。那个人听说还是个党员，却被硬套了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罪名；他单位有好多人都不服，都去探望他。有人还说我们学校的人手正辣，有朝一日要来找人算帐。所以我俩想，还是参加红旗团；他们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一定错不了。”

另一个女生这时也插上来，声音比前一个还要低：“杨老师，你念那封信时，我瞧见史苏星的脸神好象也不好受。她性子象男孩，会装犟，轻易看不出来。”

“听人说她跟袁世清本来就好。”前一个女生又低低补了一句，还想说什么；可是突然惊醒：杨老师并不是自己说这类悄悄话的合适对象，连忙打住；匆匆告别而去。

杨玲却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她俩最后说的话和欲言而止的神情。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她刚刚有些平息和宽慰的心，一下又剧烈地摇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俞彦带大中红卫兵把人毒打致伤的消息，在她心头所造成的震撼，一点不比听到袁世清孙晨菲的死讯差！如果说，前两者的少年早夭，只是这场伟大革命的灾难性效应刚刚露出冰山尖的话，那么，她一向寄予信任和厚望的俞彦，及大中红卫兵所表现的令人发指的暴虐行为，却好象整座冰山都在向她排山倒海压过来，使她觉得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切，都会被这种无视人类现代文明的暴虐所撕裂粉碎，陷入灭顶之灾！而俞彦这批人，他们大都出身优越，父母大多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的地方领导干部。他们从幼儿园起，就接受党的精心培养教育，先做少先队的干部，再成为共青团的领导骨干。在杨玲的心目中；黄军那伙军队子弟对董校长所施行的野蛮暴力行为，是不应该在他们身上重现的。因为无论是他们的长辈，还是他们自己，都更有知识，更有教养；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更有自觉性。1949年大军南下时，每进一个城市，就把军队中最有文化、最懂政策的干部留下，与当地的原地下党一起担负起管理建设城市的重任。而那些骁勇善战却缺文少字的干部，就大都仍然留在了部队。在军队的高级干部里，大字不识几个，甚至一字不识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人们如果把血统论反用到革命军人子弟的头上，也许可以说：老子粗野儿粗野，大体如此。然而事实却从另一个侧面，再一次证明那付对联的荒谬：按刚才所听到的情况来看，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所作所为的野蛮程度，想不到竟给人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感觉！

如果在一个民族中，人们有理由认为应该是最文明最讲道理的那部分人，也变得不文明不讲道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指靠吗？杨玲为自己突然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不由在心里打了一个寒战！自己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有一个脑波文字显示图，把她的内心想法展示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这不是公然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吗？她发觉这段时间里，或许是父亲也受到了批判冲击，他的退休市政协委员的头衔、女婿的显赫身份，都未能使他免遭同一类人都在遭受的厄运。或许是因为她自己品尝到了被斗批的滋味，杨玲觉得自己的整个头脑，好象正跟党所要求的那个头脑，变得越来越南辕北辙，格格不入。她跟老武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日俱减；本来还以为是因为他太忙碌所造成的。这时突然间，却好象有一道电光照示出了一个真正的原因。她对自己内心异端的想法越来越多感到害怕，并不是为自己；而是怕这些异端，一旦显露于高度忠于党性原则的老武面前，其后果：或者两人会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上，变得格格不入，愈分愈远；或者会使老武接受她的影响，不惜自毁前程，走上跟党的现行路线背道而驰的道路！这两种前景，当然都是她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她实质上是在向丈夫隐瞒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最新成果：“情投意合的夫妻之间，却要打起思想埋伏来！”杨玲的脑子里“咯噔”一下，又蹦出一句反动话。这次她没有打寒战，而只是苦笑了一下。如果此时有人注意到

她嘴角边因自说自话而独自挂上那样一丝突然其来的笑纹，也许会觉得怪怪的，疑心这位女士的神经是否哪个地方出了故障。

奚大雄觉得身背下面软软的，眼前白晃晃的，鼻孔里充斥着好象什么药水的味道。他想动一下右腿，却发现右腿骨沉甸甸的，立即有一种压迫性的轻微钝痛向他作警告：石膏尚未去除，不要当作好脚好腿乱移乱动！这里已经不是电影院，也不是那亭子小桥，而是自己早已“筑营下寨”了一段时日的骨科病房。身背下软软的，是弹簧钢皮条托底的病床；眼前白晃晃的，是被夕阳反射映照的很亮的天花板；而鼻孔里的味道么，就是病房里通常所具有的那种味。然后，他开始再次追忆往事。他记起了自己昏厥前那段时间的情形。他记起了自己硬撑着钻心疼痛的右腿骨，站立在卡车上接受游街示众的场面。卡车一阵快一阵慢地走着，在特别人多热闹的地段，还会有意停下来，仿佛体现公平原则，在别人观赏他的时候，也让他有机会观赏一下人们从车下射上来的各色目光。那些目光，或者显得疑惑，或者显得好奇，或者显得鄙视嫌恶，却极少有显出同情或不平的。他的头，被两只手使劲按着，不能朝旁边转动，就无法朝身边旁顾。但是不用转首旁顾，他就知道身边还站着谁。他还能想象她那一刻是副什么样的模样，揣测她心中悲愤欲绝的羞辱苦痛。他为此而觉得心里阵阵绞痛，深恨自己放纵深藏的感情欲求，明知这样的放纵会有危险，却还会自己寻找种种借口理由。

胸前那块标有“蜕化变质分子”的招牌，虽然使他感到奇耻大辱，他却更多地招致这种奇耻大辱的责任，归于自己的轻举妄动。劈头盖脑一顿乱棒使他感到：无论如何，他是不该跟凌漪一起出来看电影的。结果不仅自己遭灾，而且使她也跟着受难，虽然没有一丝一毫越轨之举，却使她再次承受不白之冤！尽管他不能不承认：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凌漪已经悄悄地超越取代了玉芳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她的遭难受辱，就使他心中分外地痛楚，分外地悔恨。两颗心，可以相互呼唤甚至碰撞；而两个身体，却必须遥遥相隔，形同陌人，这是现实。不尊重这个现实，就要为此付代价……。

而后奚大雄就想起床，但是觉得没有睡醒似的，就仍然躺在病床上不动，思绪迷迷糊糊的，有很大一部分，老是牵挂在凌漪的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他又闭上了眼，却看到了那个满头凌乱乌发下低垂着的鹅蛋脸，那道被雪白肤色映衬得分外鲜红的血痕，那沾着泥灰的光裸脚丫和挂到脖颈上去的乳黄色皮鞋，还有那“大破鞋”的触目黑字……。所有这一些，都是他在被推上车厢前端的一刹那所看到的，时过境迁，它们应该变得模糊淡薄，可是不，这一切却好象变成了电影中的一个定格，固定不变地存留在他的脑海中。他似乎老感觉：他仍然挨在她的身边。那身边周围的场景是黑黑的，暗暗的，仿佛还在市人民大会堂的影剧场里。他抚摸着她那肌肤滑润的脸蛋，在找那条血痕，却横竖找不到。凌漪扒开他的手轻声地说：“不要找了，我已经把它转移到心里去了。”“离心近了，那是不是会更觉得疼呢？”他急切地问。“不会的，只要有你在我身边，什么疼痛我都不会感觉到。”凌漪柔声地回答道。他一听这话，就觉得很冲动，就情不自禁地想把她的整个身段搂抱住，可是两条胳膊却好象被谁死死按住了似的，难以自由行动。而那道放电影的光柱，似乎窥破了他的企图，立即威慑性地转过来，直直地逼照着他俩，他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涌上头顶，整个身子都似僵住了一般。然而影剧场里的观众，却并不随着那耀亮的光柱看他们。人们只管盯着银幕看，还窃窃私语地发表着各种使他感到很惊异的评论……“那个女人不就是押在卡车上游

街的‘大破鞋’吗？”有个声音却突然高喊，好似觉得别人对银幕上主角的窃窃私议，比起他坦直的大声疾呼来，是一种更大的不礼貌。“她会跳舞，跳得美极了！她跟各种各样的人跳，就是不跟银幕上的那个男人一起跳。”有人补充说，而且也提高了嗓音。奚大雄这时才发觉：人们所以对他俩暴露在雪亮灯柱下的亲昵情景熟视无睹，是因为那灯柱同时担当发挥了两种功能，边摄影，边播放，把他和凌漪的一举一动，都分毫毕现地投射暴露在银幕上了。而那银幕上所出现的，同实际情况却又有非常大的出入。在灯柱下，他明明是想动而不敢动，想动而不能动，而在银幕上，他俩却已经滚在一起，扭成一团。行动根本就没有受到丝毫的束缚。那种龙腾虎跃挥洒自如的样子，竟极象他跟玉芳在床上度欢时的情形。这时他又听到了另一句评论：“她怎么会跟他一起跳呢？那个男人乡下有老婆。你看到没有，他跟她老婆在一起，干得多带劲，多欢快！还说是回乡做农忙呢。”奚大雄闻言后仔细一端详，方才发觉那女的原来是玉芳，一下子害臊得无地自容，全身汗如泉涌，他怎么跟玉芳当着这么多人的眼睛，也折腾上了？于是就惊醒。

这是奚大雄被送进医院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他这样子从午睡中完全醒过来，觉得身上还真有一点汗渗渗的，欲伸手抓挂在床头柜上方的毛巾擦汗，手却突然停住，这是怎么回事？奚大雄定一定神，让视神经适应了突然变化的瞳孔，眼睛睁得非常非常地大。然而，即使眼睛的括约肌已经扩展到了极限度，他仍然不能相信所看到的情景。他极少看小说。搞不清自己是否梦中套梦，仍然处在远离现实世界的虚幻境地之中？还是确实已经恍然梦醒，回到了人间？他没有用指甲尖压一压哪块皮肉，以检查自己有无痛觉，或采取小说家喜欢描绘的其它动作，来检测他的此岸性或彼岸性。而只是怔怔地望着窗外。他俩刚在梦中相会，此刻竟然在现实中不期然而然地重逢了！所不同的是，并不是在黑暗中，并不是手拉着手，脸挨着脸，而是隔着一排窗户。窗户是开着的，但是有挡蚊蝇的绿纱掩隔。绿纱外的阳台上，那熟悉的身背腰肢，那雪白滚圆的胳膊，使他心室砰然狂跳。那胳膊摆弄着的，是一些衣衫衣裤，胳膊的主人，正在把它们一件一件晾到阳台上方的晾衣绳子上去。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床底下脚盆里的换洗衣服，都已不见了。他分辨不清自己此时此刻的确切感觉是什么。极度地不安与震动？极度地感激与感动？他那些也从午睡中醒来的新病友，显然都不能看出他此刻心中卷起的万丈狂澜，而他却能清楚地看出，在他们注视他的眼神里，都包含着一种羡慕。羡慕什么呢？有一个美丽而勤快贤惠的老婆？误解，天大的误解！如果此刻真是老婆在场，如果老婆目睹这一情景，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寻死觅活，大吵大闹？不，不会的。当玉芳哭哭啼啼地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告诉他的时候，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跟她闹离婚，不要使她无脸见人。其它一切，她都会顺从他的旨意。临分手前，她还怯生生地问道：凌姐好吗？直到这时，奚大雄才发觉：老婆这一句问话，并非出自偶然或多余。她和凌漪一样，聪明而敏感；她仿佛已经预见和猜测到了一些什么。他自己，却为何对此显得好象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呢？

其实，奚大雄应该能够预想到今天这个场面。他住进医院的第二天，诸申、冯有强就到病房里来探望他，并告诉他：李惠康正在跟郭贤联系，商量对策。他想问他俩怎么找到他的，心中却猜度一定是凌漪作的通告。但是，他却不敢在他俩面前直言其名地提凌漪。倒是他俩主动跟他讲了，完美无缺地印证了他的猜想。这在他们似乎也是第一次，而过去他们也总在他面前回

避这个名字。他们说，凌漪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包括那份见证书的底稿，也给他们看了。在他们的广泛传播下，公司里好多人现在都知道了事情的全过程。

对于工作组歪曲实情、蒙骗利用不明真相的学生把他毒打致伤，都很愤慨。人们对凌漪，也开始重新审视，刮目相看，对她在历史上和目前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越来越多的人深感同情。也许，就是这种同情，给了她异乎寻常的力量和勇气，使她以一个有夫之妇之身，光天化日之下敢冒天下之不韪，来病房为一个有妇之夫洗衣服。也许她可以把这种行为冒充成学雷锋的举动，但是这种冒充实在是既拙劣又牵强，因为不仅学习者的年龄高了一大个层次，而且时下是以革命为重，没有哪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文章，继续在提倡号召学雷锋。如果奚大雄是一个卧病在床的残废战斗英雄，或者一个功勋卓著的老红军，也许舆论又会另当别论。可是他都不是。刚进医院的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身分不明、使医务人员神志混淆不清的人物。他们分明看着他象一头死猪似地被红卫兵小将扔进急救室里，而且在扬长而去时，还特意留下了把那块标有“蜕化变质分子”的牌子。那个同时留下来的脸色严峻的中年人，很严肃地出示工作证，亮出了他那市货运公司保卫科科长的身分。然后有好事者，打听这个昏迷者“蜕化变质”的具体情节。可是傅科长却又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从第二天起，就有公司同仁前来探望已经苏醒并被固定在石膏架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本以为只不过是少数香臭不分者或同流合污者。然而，探望者却与日俱增，以致引起了公司当局的重视，派那位傅科长前来医院抄录探望者的登记名单。不知骨科主任是讨厌政治把脚伸到他那白衣天使的领地，还是同被探望者建立了情谊，下令不予抄录。官司打到院部，主任在院部的后台硬得很。傅科长得到的回复是：除非拿出定性结论来，证明确有政治必要，本医院不能乱开先例。傅科长就奉令在医院规定的探望时间内，进病房亲自坐镇，对探望者的人头脸孔，连登记带检视兼监听。可是碰上的第一个被检视监听者，却是他的顶头上司、公司党委书记邱铭。那邱书记跟“蜕化变质分子”明显敌我不分，窃窃私语的模样，倒好象在跟奚大雄商量公司里的党政要事。书记还带来了一大迭报纸，傅科长伸长耳朵一听，才知比公司里的党政要事还高一个层次，他俩是在交流学习报刊文章和关心国家大事的心得体会。临走前邱书记还对他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口吻：“多学习学习报纸文章，不要尽跟在别人屁股后瞎转。”傅科长第一次碰上邱书记对他这么不客气地说话，就不象老受批评训斥者那样，耳朵里有一层麻木不仁的老茧作抗拒，心中不由悚然。邱书记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抢前一步，细细研读起书记所留下的那些报纸文章。读着，读着，背心里就出冷汗。就再也不摆坐镇者的威严模样，就跟奚大雄重叙昔日友情，就向他摆出虚心好学的请教态度。奚大雄一味谦逊，用手指着对面床铺前刚走进来的一个年轻人说：“你请教他吧，他才是够格的老师。我这段时间都跟他学。”

明天，就是奚大雄所介绍给傅科长的那位“够格老师”出院的日子。这位“老师”从凌漪一走进病房，就猜到了她的身份。他去盥洗室刷牙洗脸，见她在为奚大雄洗在床底下搜捡到的衣服，开门见山地对她开口说：“我了解你的情况，奚师傅跟我谈起过你。”

凌漪很惊讶地注视着奚大雄的年轻病友，疑惑之中，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叫曲湘川，是苏南工学院的工人调干生。你听你丈夫谈起过高远吗？我最早从他那里知道了你们的事。”

凌漪更惊讶。她可以分辨出来，对方的目光很友好，就朝他莞尔一笑，虽然不立即回应，却在心里认认真真地思索回忆起“高远”这个名字来。

“原来是《锡城日报》社的，搞文艺版。”曲湘川知道她在回想，就把有关高远的近况扼要谈了一下。

这样一谈，凌漪就回想起来了。然后她就觉得难受起来，进医院前的满腔喜悦，被曲湘川所告诉的有关高远的悲惨故事，扫掉了一大半。她同丈夫过去总以为自己是最低不幸的。现在才知道：他俩的不幸，还牵连了其他的无辜者遭受不幸。她再次意识到了丈夫处理整个问题上的固执和偏激，不由为自己最终所作的选择，轻轻松了口气。这一松气，就捅破了嘴边的关拦；面对着一个几分钟前还素不相识的大学生，一下说出了她个人生活中所作的最新决断和结果。而她本打算：她的第一个通告对象，必定是奚大雄。她要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然而，她自己都不明白何以突然来了一个冲动，会把首先得知这一消息的专利权，莫名其妙地在中途拱手交给了一个第三者。

这一回可是轮到曲湘川吃惊了。他久久地盯视着她，仿佛要透过那美丽而平静的脸容，看穿她的心底，摸透她的真实用意；并据此来重新评估这一新情况所包含的整个政治含义和影响。昨天郭贤和王小燕一起来看望他时，三人在楼下花园里足足商量了近两个小时，并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他们对这一意见信心十足，觉得可以受到有关各方的赞同支持。然而情况骤变，他的信心开始动摇。

奚大雄腿上的石膏，处在将去未去之际；身体在行动上，已几乎不受什么限制。不知是受了曲湘川眼神的默示鼓动，还是受自己满腔激情的驱使，他拄起了一个拐杖，移向了窗口，走进了阳台。凌漪虽然不转身，也不转首，却也已经分明地听到了向自己靠近的脚步，身背上感受到了一双炽烈的眼睛。她似乎期待着那双大手，会从背后抱住她的身子；或从她的腋下升举出来，托住她的脸庞；或把他的手，默默地插入她的头发中，轻轻地抚掌。她明知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愿意使自己沉浸在这种幻想型的期待中。然后，她终于听到了一声嗓音沙哑的呼唤。她突然一下扭转身子，把腰背靠在阳台的栏杆上，拢了一拢被阳台上的风吹乱的鬓发，由于身子略往后仰，就使胸脯变得很高耸，圆鼓鼓的，使人觉得在她的身上，青春的活力如头顶上的秋阳一般，仍然保持着热蓬蓬的力度。她看到了一付凝视着她的眼神，潮湿，滋润。在这凝视中，奚大雄又一次看到了那次在宿舍拐弯处所看到的脸容。那种光彩夺目的红润艳丽，那双水波荡漾的明眸，在秋阳的侧射下，显得千般妩媚，万般动人……。他俩就这样，脸对着脸，定定地对视着，四目交会碰撞，在悄然无声中闪烁着电光雷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从病员楼另一侧大街上，传来的阵阵毛主席语录歌声，使这种令人又陶醉又难堪的沉默，更加显得静寂。终于还是奚大雄开口：“今天不上班吗？”

“星期天。连日子都过得记不清了？”她嗔怪。

“在这病房里，呆长了会把外面的一切都忘记。”奚大雄自我解嘲了一句。怜爱的眼光，仍然不离开那张脸，并轻声说道：“没有留下疤痕。”

“留在心里了。”凌漪轻轻地回答说。

奚大雄很震惊！他记起了方才梦中的对话。他早就听人说过：心与心会有感应，梦跟现实会有照应，却从不相信；可是面对这种巧合，他还应固执己见吗？

凌漪看出他的神情有异，就用审询的目光盯着他。然而发觉是徒劳，奚大雄似乎并不打算作出解释。于是她就改变话题：“玉芳来服侍过你吗？”

奚大雄摇摇头：“她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我父母，还要出工干活，自己都忙不过来。

我都没有让她知道。”

凌漪自觉问得不得体，就换了一个话题，喜形于色地问道：“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奚大雄这会认真想了一想，然后答道：“公司里上午召开斗批会，是吧？怎么样，开得怎么样？”他也变得兴致勃勃起来。

“时红霞，崔志中，还有铁杆老保丁荣兴，叶子栋和童年财，都上了台；也尝到了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的滋味！大会结束后，也让他们去街上兜了兜风；真来劲！”凌漪的声调很兴奋。

“哎，前天他们到我这里来商量时，可没有提到要游街啊？”奚大雄和他的同伴在10月21日成立了“公路野战军兵团”，并通过曲湘川的牵头，加入了已经有几万名工人所组成的锡城市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奚大雄的病房，几乎成了兵团的临时指挥部。

“傅古宝在检举揭发中，一提到崔志中派他带人来抓你，大家就来了气。冯有强上台一脚把崔志中踢了一个狗趴地。有两个过去受过他整的小伙子，手里轮着铁棍冲上去，给诸申他们拦住了；小诸的手臂上为此还挨了一记重打。大家心里这么火，都说要游街，谁要拦都拦不住。我还记着你以前所说的那句话，凡事由老百姓说了算。这日子，想不到怎么快就来到了！”

“大家为什么光找姓崔的算帐，而不找那个时红霞呢？她可是最后拍板的人啊。”奚大雄对这位工作组领导，似乎也耿耿于怀。

“找了，怎么不找呢！”凌漪的声调，这时却突然降低了：“她从头到尾不认错，被激怒的群众打成了肾出血，送进了附近的陆军医院。”说完，凌漪顿了顿，有些犹豫似的，张了张嘴，忍住了，没有把欲言又止的话说出来。

“你想说什么？”男性与女性的不同之处，也许就是一有疑惑，大都就会毫不留情地逼问对方。

“我觉得有些人的手也下得太狠了点，人家毕竟是个女人；他们当初也没有对我动武啊。”凌漪在奚大雄的逼问下，说出了心里的看法。

“到底是女人，豆腐心。这号人，不让她亲身经历经历，她不会想到别人挨整挨打的滋味的。”奚大雄颇不以为然。

“大雄，你会在棍棒下面领受别人给你的教训吗？”凌漪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责问奚大雄，话一出口，就有些懊悔；心想，应该是再次改变话题的时候了。

奚大雄给凌漪一下问住了，不由朝面前的这个女人重新打量了一眼。他再次感觉到：她尽管在逆境中压了这么多年，却并未完全磨灭掉她那待人良善而又执拗的个人主见。

“不说这些了，你是中共党员，自然比我更懂政策。知道我今天还会带给你什么意想不到的消息吗？”凌漪的脸上重新泛出容光来。

奚大雄思索了一下，摇摇头：“我猜不出。”

“我已经办妥离婚了。”凌漪的声音说得非常轻。

“什么？”奚大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两眼吃惊得象铜铃。在经历了那样一种冤屈折磨之后，想不到她却会作出这样一种决定！她难道不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吗？这会使本来存有偏见的人，偏见更强烈；已经解除误解的人，重新起误解！还有，作阿公阿婆财产继承人的巨大物质引诱，她也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她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是为了什么呢？是否隐含着对他的某种巨大期待呢？是的，她已经知道了他同玉芳之间的巨大裂痕，她是否以此向他表明心迹，并且在提示和迫使他也朝同一方向走呢？

“邱书记和老大姐都跟我说了，我那位男人当时话说得太过头了，他的案怎么也翻不转。说实在，没有碰上你的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指望能翻他的案。可是……，”凌漪说到这里时，停住了，把目光从奚大雄的目光下逃避开，才压低了声音说：“这还要连累你。你吃这么大的苦，就是因为有为右派翻案这一条。我一离婚就把这一条划掉了。你起头做的那个见证，就算是光为我做的。邱书记说，这样一来，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开来了，上面也就好处理。也不会影响你现在的造反革命。”

奚大雄听了这一席话，被一通政治话题压制下去的胸中狂澜，又开始汹涌激荡起来。凌漪所暴露的那种处处为他设身置地作考虑的心曲，强烈地扣打着他的心！她没有一点暗示和逼迫他的意思，根本不求回报和偿还；这反倒使他受到一种莫名的逼迫和压力，那“我也离”这三个字，那么强劲有力地冲击着他的咽喉，从心中蹦跳起来，撞了顶，弹回去；又蹦跳起来，又撞顶，又弹回去；又跳起来……；一次比一次都强烈，一次比一次都坚决。他觉得：他的喉咙口就快抵挡不住了，他几乎要被胸中的万丈狂澜淹没了！他在绝望中一侧首，却发现曲湘川正隔着窗户绿纱，在很注意地盯着他。自从9月19日那个夜晚，这个大学生缠着满头满颈的纱布绑带，被护士从急救室推入这个病房起，他俩就成了莫逆之交。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得归功于郭贤的探望。他当时一踏进病房，就惊喜地发现自己一箭双雕，不期然而然地同时碰上了两个被探望对象。而这一天从奚大雄进入阳台那刻起，这个莫逆之交就一直在注视着奚大雄的一举一动。其他病友当然也时常朝阳台方向张望。但那不过出自一种纯粹的好奇心，并不象曲湘川，那样持续，那样抱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此刻，他似乎明白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就推开阳台门毅然闯进来，对着凌漪很有礼貌地邀请道：“咱俩可以一起到楼下去走走吗？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凌漪很疑惑，朝奚大雄望了一眼。奚大雄也疑惑，但是很肯定地示意她接受邀请。“你把提包留在奚师傅的床头柜上好了，”曲湘川先对凌漪说。又转对奚大雄说：“我俩很快就会回来。”

果然不出半个小时，他俩就回来了。回来时正好是病房订饭时刻。奚大雄要订双份，凌漪坚决表示不要，说她已经同人家约好一起吃晚饭。“那就不勉强了，但我们可以去楼下花园里走一走吗？”奚大雄提议。

“下次吧，今天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凌漪回答说。把一大堆水果点心掏在奚大雄的床头柜上，就匆匆告辞；连奚大雄要送出房门都不让。奚大雄在门口同凌漪的眼神最后一次相交时，终于看出她脸上，有异样的神情，心中变得很纳闷。

“去楼下花园吗？”奚大雄碰了钉子，心想一定跟曲湘川有关系；在床头闷坐了一会，对曲湘川作提议。

第十六章 以革命的名义

锡城市爱维医院原来是家教会医院，现改名为反帝医院。医院的小花园就在奚大雄所住的病员楼房的南侧，园里虽然栽着山茶、木棉、玫瑰、夹竹桃、棕榈树、芭蕉、桂花树等各种各样的花卉树木，可是时临深秋，此刻花园中引起人们注意的，却并不是这些已经过了它们全盛时期的花木，而是可能使诗人大发伤感的满地黄色落叶，而这种由萧刹秋风所造成的伤感氛围，对此刻奚大雄和曲湘川的心情思绪，却没有丝毫的影响和触动。奚大雄一心想搞清的，是曲湘川对突然告别的凌漪说了些什么话；曲湘川则想从奚大雄的第一句问话中，来判断他对凌漪匆匆告辞的情绪反应，然后决定自己的话怎么讲。奚大雄拄着拐杖，拐杖头抵着落叶，合着两人默默的脚步顺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往前移，眼看就要移到小径的尽头，曲湘川终于站住，面对奚大雄执拗的沉默，决定还是首先开口：“你知道我明天就要出院，本来就有好多话要想跟你好好聊一聊。你一定很想晓得我对凌漪说了些啥；但是，我想先告诉你近来外面所发生的一些重要情况。这样的谈话顺序也许不符合你目前的心情，但却包含很重要的逻辑关系。你跟红总的唐延言见过一面，是不是？”

奚大雄点了点头。上次来病房商谈红色公路野战军参加红总的事，这位大名赫赫的红总首脑，给他留下了风度翩翩、能言善辩的深刻印象。他当然不知道，唐延言在建新机械厂曾有过“唐伯虎”的雅号。我们所以在此称、曾有过，是因为革命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跃进，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面貌，“唐伯虎”的雅号早已淘汰，而被“花花太岁”、“阿飞司令”等所取而代之。所以出现这类失去了风雅味的新称号，一大半要归功于“革工联”宣传工具所发挥的神效，唐延言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或多或少为此作出不可抹煞的配合呼应。

革工联的全称为“锡城市革命工人联合委员会”。你想知道革工联都由哪些人士所组成吗？只要想想我们所熟悉的朱坤兴，他也是其中的一员骨干分子，你就能七不离八九地猜到它的性质和概况。如果用苏南工学院马进老师的哲学语言来表述，有阳就有阴，有白就有黑，有压迫就有反抗；同样的道理反过来也能讲：有反抗也就必定有压迫。据说，革工联就是为压迫红总的反抗而成立起来，屹然挺立在中国东南隅的地平线上的。但是，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够压迫得了另一个群众组织呢？这当然不能从狭义上去作咬文嚼字的理解，而要瞻前顾后地作分析。想一想：在这个地球上不闹文化大革命、没有出现五花八门的所谓革命群众组织之前，朱坤兴是干什么的？唐延言又是干什么的？一个是科长，一个是科员，是不是？在那些从灵魂深处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抱有敌意的眼睛中，必然会把这科长同科员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看作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于是后者就要反抗。前者只要不是马大哈，就不会对这种反抗听之任之，麻木不仁。就连笃实憨厚如朱坤兴，都知道参加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市性组织作自卫，锡城市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党

员骨干和基本群众，当然也都会揭竿而起，纷纷投入旨在保卫革命成果的革命阵营中。这就是瞻前的意思。那什么叫顾后呢？很简单：如果不揭竿而起，望风而归，革命成果就会得而复失。革命的工人干部通过瞻前顾后的考虑，就想到必须作自卫。而这“自卫”两个字，被某些“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舌头一搅和，却被弯曲成“压迫”的意思了！试问：有这样一种“压迫”法吗？明知红总的阶级队伍严重不纯，明知红总的头头唐延言是个思想腐朽、生活放荡的坏分子，作为压迫者，会这样客客气气地跟你“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晓得到处发传单，贴大字报，装设高音喇叭网，唠唠叨叨地对着锡城市老百姓的耳朵，好象是向上级领导作汇报似地喋喋不休光鼓捣：“那红总的第一把手唐延言是个、花花太岁，阿飞司令，手下用一个班的女秘书，一个星期七天轮流换……”不！不会这样做的。压迫就是压迫！压迫是专政，是武力，是冷冰冰的手铐，是“昂昂”鸣叫、令人心中发怵的警车笛音。因此，说革工联依仗着人多势众和市委的幕后支持压迫红总，是阶级敌人的造谣和诬蔑！革工联义正词严的揭露批判，使红总的乌龟王八蛋们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是有的。但这是革命舆论的压力，是正义呼声的神威和功效，而不是压迫！既然这种所指控的“压迫”是莫须有的，那红总想要反抗什么呢？当然是反抗市委，反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往前走，那倒真的可能会有压迫前来拜访。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是吃素的！

这些解释、警告和奉劝，红总和与红总狼狈为奸的红联指中的那伙核心分子，是听不进耳朵的。他们鬼迷心窍，得了听力抗拒症。眼下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唐延言的名声太臭了，象块烂皮膏药贴在红总的招牌上，使本来就怀疑红总纯属乌龟王八大杂俎的正经百姓们，更加觉得红总不正经。而他们却认为唐延言的不端行为，实际上是被对手大大夸张了的。他是用了女秘书，但仅不过是掉换的频率高了一点；每隔一两个星期换一个，交接班时因短暂重迭会有两个；但是全凑在一起，恐怕也不足一个班。既然革命的领导干部可以用女秘书，为什么造反派的革命领导用个把女秘书就要大惊小怪，就变得大逆不道了呢？这似乎很不公平，糟得很！

但以笔者之见，这种大惊小怪其实好得很！造反派凭什么起来造反呢？理由就是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行，占了江山忘了本，同国民党的大官一样，脱离了人民，骄奢淫逸，贪利好色，一心要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面奔。现在好，有一心要往社会主义道路上奔的革命新秀出来造他们的反，人们必然期待革命造反派的新秀可以一扫旧习，使人耳目一新；如果还是老趟戏，新瓶装旧酒，或者新的比老的还变本加厉，那你出来造什么反？想想看，国民党认为大清政府很腐败，才起来革命，才起来造反；共产党认为民国政府很腐败，也就起来革命，也就造反，把几万万同胞都搭进去，腥风血雨，白骨成山；依据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大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所以最终要垮台，就是因为刚刚出现几匹害群之马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大惊小怪；或者有一点批判攻击的声音，就围剿，笔杆子和枪杆子双管齐下一起上，缺乏真心实意的自我批判和更新精神。毛泽东认为：他的共产党跟历代前任统治者不一样。还没有把国民党的江山拿过来，就让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警告自己手下的农民造反者不要学清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有见多识广的国统区民主人士黄炎培去延安，忧心忡忡地问毛泽东：中国历史上一代一代先革命造反、后腐败变质的情况，见得实在太多了，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吗？“我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

出这个周期率来。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回答得很自信。建国不久，他就看到类似的历史趋向又开始冒头了，就慌慌急急地搞“三反五反，搬掉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的脑袋；开门整风，发动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再搞”四清社教“，责令千千万万的中共干部”下水洗澡“；可是都觉得不带劲，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才似乎突然回悟起在延安时对黄炎培先生所作的有关靠民主的话。于是他就把苏联式的高度专制集权模式扔到一边，让老百姓肆无忌惮地发扬起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来！其初步结果，就是在中国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催生出成千上万类似红总这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可是让以前无法享受到女秘书服务照顾的一个普通科员，也能象为革命立下功劳的老干部一样，受到同等的待遇和服务，而且走马灯般地人头翻新；难道，这就是”大民主“的本义和归宿吗？如果中国共产党跳不出的怪圈，到头来革命造反派也跳不出来，中国人民又应该朝何处去？全世界千千万万翘首以待的革命人民，如果看到这样一种结局，不是会变得伤心欲裂，茫茫世界一片黑暗，到处走投无路了吗？

以上这些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听上去好象见解卓越深邃，饱蘸忧国忧民忧人类之情，其实是大谬不然，牛头不对马嘴，尽抓住一鳞半爪的表面现象做文章。透过现象看本质，唐司令走马灯似地换秘书，乃是革命大浪初起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所必然造就的一种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些昙花一现的女秘书，经不起革命的长期考验而被淘汰，是符合人体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规律的。什么”长期考验“？根本就谈不上；一两个星期都经不起，就使唐司令觉得用起来不得得心应手，哪怕个个是长得花貌月容，哪怕唐司令风流倜傥、讲情重义，也不能不以革命为重，坚持原则，忍痛割爱。怎么能把一瓢污水就此泼到毛泽东的革命首创精神上去呢？这事不是坏在社会主义大民主上，而是坏在唐司令求美若渴的本性上。当然，夸唐延言人皆有之的爱美之心特别炽烈，乃是溢美之词；说白了，就是好色。如果他不好色，专招武二郎式的女秘书，或者只用武二郎式的男秘书，革工联也许就会狗咬刺猬没处下口。本书作者也就捞不到机会，大发带有招摇撞骗性质的历史空论和感慨！

但不管怎么说，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有关唐司令的风流传闻到处飞扬，却又无真凭实据在手上，确使红联指和红总的其他头头感到很头痛。当然，唐延言使他们感到头痛的地方有好几条，这不过是其中之第一条。

第二条，是散漫，无可救药的散漫。人们闹不明白：延河水加伏尔加河水，怎么会养育出这样一个流氓无产者习气极重的”革命领袖“来？

10月6日，北京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同时宣读了中共中央批示，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坚决贯彻执行”。大会还通过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大会

通电》。

10月9日至28日，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作检查。

11月1日，《红旗》发表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社论指出：“……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和当前形势大好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去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两条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此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11月3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林彪还讲：“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

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请看看，请听听，革命的脚步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北京的重要决策和消息情况接二连三的传过来。真正有志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的群众领袖，是应该根据北京来的这些源源不断的指令和精神，及时组织学习认真研究对策积极开展行动的。可是在红联指和红总联席开会研究相应计划行动时，这位所谓的唐司令却不见踪影。明明那开会通知还是经过他的秘书之手发出去的，他却可以公然缺席，连请假条都不留一个。他老是这样恣意妄为，或去逍遥西湖，或去黄山庐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到处游山玩水，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扔到九霄云外。这种情况屡屡发生，屡教屡犯；显得不仅对其他会议出席者是一种蔑视，而且竟好象是对发布新精神的北京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有蔑视之嫌。另外值得补充一提的是：尽管红总从来就没有正式任命过什么司令，大家起先不过是叫着玩玩，他就当真起来；开始时还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别人不称其唐司令而直呼其唐延言，他竟然变得老大不高兴，仿佛是别人有意对他进行侮辱和挑衅似的。

唐延言的第三条毛病，是小资产阶级狭隘复仇性太重。

他那次靠史苏星的搭救，跳下卡车夺路而走，他自喻为是虎口脱险。考虑到当时的情形，这种说法也许不算太夸张。可是，他却由此引申，从此把朱科长当作一只狰狞的老虎，平时不声不响，好象是戴着佛珠的阿弥陀佛，关键时刻却要露齿伤人！而把真正带人登台绑架他的贾部长，却只看成是老虎的爪牙。红总成立不满一个月，他就趁着一个星期天，风驰电掣乘着一辆卡车，闯进朱坤兴住的村子，一进门就把夫妻两个双双扭住，要想把他俩当作走资派和地主阶级相互勾结的活典型，押上卡车去城里大街游街示众。谁想这朱家村的农民，并不象政治教科书上所说的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而是笃信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来；凭着这村子里代代相传的宗氏血缘联系，一点不比无产阶级缺少革命的团结战斗精神。

全村的青壮年闻讯而至，把红总司令及其随从人员团团包围住。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几个毛手毛脚的青年工人，和几个毛手毛脚的青年农民碰到一起，就难免发生一点磕碰摩擦。结果工人阶级寡不敌众，唐司令几乎成了农民兄弟的“阶下囚”。报复未成反而吃了亏，使报复者心中的复仇火焰，燃烧更旺！那个把这位素不相识的仇人估计想象得很良善的高虹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天黑以前，她丈夫昔日的部属，就调来了实力强大的红总建筑兵团，近千名年轻力壮的建筑工人，头戴藤条防护帽，手持铁棍钢条，把整个村子水泄不通地包围了起来，勒令在半个小时内，必须把打人凶手和朱坤兴夫妇交出来，否则血洗朱家村！一刹间，村子里的狗吠声音，“嗡嗡”地也好像变得叫不响了；小孩吃奶时的哭闹声，也给喂奶的母亲用奶子死命按住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充满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怖气氛！朱坤兴的老母亲要儿子出面向同事低个头，认个错，求个饶；朱坤兴铁青着脸，死活不吭声。老爹老娘并不知道当初的前因后果，以及儿子在整个过程中所抱的矛盾心理和勉强态度，还真以为是儿子冒犯得罪了唐司令，想到要连累人，给全村乡亲造祸殃，不仅心里抖抖嗦嗦地乱成一团，连双手双腿也犯疟疾一般地颤抖起来。最后让村里一个在市委大院里当科长的朱兆平陪着，拉下老脸跪在唐司令的面前，乞求他高抬贵手，放过冒犯革命造反派的乡亲和他们不懂事的儿子儿媳。

“不懂事吗？不懂事还当科长？”唐司令讥嘲自己昔日顶头上司的令尊大人。

朱兆平是朱坤兴的远房堂兄，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又恰好跟红总建筑兵团的头头育文庆是熟人，对前因后果也从朱坤兴那里听了一点，就在旁边劝解说：“老唐，”他年龄看起来比唐延安大，称呼“老唐”带有很尊重的意思了：“这基层单位一个小科长，能算哪一个级别的走资派？他老婆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现在不是要批判反动血统论吗？而那天派车抓你的事，不要说朱坤兴作不了这个主，就是你们厂的夏书记，恐怕也拍不上板。据我所知，这是市里直接下的指示。都是相互认识的几个人，我看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好。”

唐延安给这个在市委机关里混事的朱科长冷言冷语地诉落了几句，却也一时噤住了口。

旁边朱坤兴的娘急忙见缝插针，连呼“唐大哥”，“你行行好，我那媳妇已经有六七个月的身孕了。就看在肚中孩子的份上，你饶了她吧。”

唐延安“嘿嘿”一声冷笑：“六七个月？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怎么这么快就会怀上孩子呢？”唐司令的冷笑，使两位可怜的老人听得毛骨悚

然；他们真以为：这算是碰上毫无人心的人面禽兽了！可是他们搞错了。唐延言毕竟是吃延河水长大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这样吧，看在朱兆平同志的脸上，我饶了你儿子儿媳。可是，上午给你们村里人打伤的三个人，每个人要你儿子承担一百块钱的停工补贴费和营养费。叫你儿子现交吧！交了我们就撤走。”

“你们看，造反派真是通情达理！”一旁的朱兆平立即又插上来，先奉承了一句，接着又说情：“这三百块钱要抵朱坤兴五六个月的工资。他老婆就要生产，等用钱；那几位同志受的伤又不是太重，又有公费医疗。所以是不是请老唐再考虑一下？”

唐延言在那一时期还没有被人“唐司令”、“唐司令”地叫顺耳，听着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开口一个“老唐”，闭口一声“唐大哥”，又是那样一副哀求讨饶、小心翼翼陪礼说情的模样，就动了造反派的恻隐之心：“这样吧，每个人减掉二十块，再少我们就不答应了！”

这件事情兴师动众出动了这么多人，再加上朱兆平的说法七拐八弯地被人一传扬，红总高层领导中有些抱负不凡之人，觉得这个唐延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架势比“走资派”还要“走资派”，对他并未正式授予的“司令”位置，就起了觊觎之心。这件事情七转八转地传到了红联指，其他头头一听也就过去了，那王小燕却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琢磨好象是跟下乡四清时的患难朋友联上了，就抽空赶到朱坤兴家中作调查。高虹时又象年初在石街村那个池塘边上一样，拉着她的手哭得泪汪汪的。而朱坤兴，因为已经听说过对立派的红联指里，有个大名鼎鼎的王小燕，就好象见都不愿看见她。跟她稍会敷衍了几句，就推说厂里还有事，把她撇给老婆管自扬长而去了。高虹时看出昔日的救命恩人对受到如此对待脸上不高兴，就拼命解释丈夫厂里真有事，说他是当上了厂里什么革工联头头的副手。她搞不清最近城里人所搞得那套政治名堂，也弄不懂各派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凭自己的一知半解，一个劲地宣传他丈夫是真忙，不是假忙；白天促生产，黑夜抓革命，没日没夜泡在厂里头。她说，她男人过去对文化革命并没有这股子热得邪乎的劲头；就因为交了四百四十块钱的学费，算把头脑交开窍了：知道要使自己不受气遭难，就要跟红总的那些龟孙子们斗！厂里被他们闹得乌烟瘴气，无法无天，关厂长被几个跟着唐延言跑的四清下台干部打得小便出血，就好象是国民党在专共产党的政！他只能豁出去，从来不喜欢搞政治，现在却必须把政治当饭吃；不仅是为了让她高虹时不再受人欺负，也是为了以后孩子钻出娘胎后不受人欺负……高虹时见到了恩人就好象见到了亲人，只管说呀说，直说得王小燕脸色发青，气不打一起出，猛然喝道：“你看我王小燕，还有马老师，曲湘川，都是龟孙子、国民党吗？我们都是站在红总一边的！”把个愣愣的高虹时，惊得心口“扑通扑通”地直打鼓，肚子里的娃娃也受了惊吓似的，伸拳踢腿地动弹起来……。

在文革初期，大学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的一大不同，是他们一般地对暴力行为还感到不习惯；对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诫令，颇有一点视若神旨的虔敬。再说，8月31日，林副主席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不也是再次强调了吗？“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王小燕想：唐延言作为红总的主要负责人，竟纵容本单位的红总人员大搞“触

及皮肉”的野蛮行动，他能带领引导全市的工人造反派在革命正路上前进吗？

这件事情及其相关情况，由王小燕传到马进和曲湘川那里，因为有以前的人情因素起作用，自然就不会象其他那些以前跟朱坤兴没有干葛的人，对唐延言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平心静气客观公正地作评介；而是对这位代表工人老大哥的文革战友，从思想上到感情上都变得很反感。然而，反感归反感，如果没有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他们还不至于同郭贤一起密谋策划，违反毛主席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战略意图，要以秀才和学生的身份干涉左右起领导阶级的事务来。他们终于决计要把唐延言撤换掉。

那是一个冷风飒飒的秋雨夜，……………（为防盗版，此处为大篇幅删节。）第二天，红极一时的唐司令，就被装在吉普车里，送进了坐落市区偏僻角落的精神病医院。已经发展到八九万之众的红总组织，一下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之中。

然而，红联指内苏南工学院院长长征兵团的秀才们却不这么看。一是他们信奉“坏事可以变好事”的辩证法，觉得可以借这件事，对红总领导班子成员作一次细致全面的政治复查。象唐延言这种情形，如果当初在政审一关查得认真仔细一点，他在锡城文革史上所留下的这段闹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如今直到闹出了大笑话，才把唐延言发疯的来龙去脉查清楚。原来在他的医院病历卡上，早就有精神臆想症的纪录。而这一记录所连结着的一段故事，如果不以“政治统帅一切”的目光去审视，还颇有一些催人泪下的成分在内。

唐延言虽然出自一个中共高层领导的家庭，却并不是仗着父母的权势，而是凭自己的留苏考试成绩，在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了莫斯科大学。早年的留学生涯不仅令人失望和扫兴，甚至带有几分苦涩的滋味。吃不惯老是占据着餐桌的乳制品和生鱼还是小事，他第一次发觉：他在国内门门得五分的优等生地位，在这个新的国度和学习环境中却一落千丈，门门功课几乎都和三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变得疲惫，厌倦，经常脱课旷课。脑子里老盘算：是转学改变专业？还是留级补习？还是想办法中途回国？他开始不好好进食用餐，也不好休息睡眠；而是沉溺于收听西欧的广播电台。对西方的电影、音乐、西方人写的小说和作的绘画等，因为接触起来比在国内容易得多，更是津津有味，如痴如迷。在他暗自打的小算盘中，如能以自我糟蹋坏身体的方式，取得提早回国的资格，乃是向国内亲人朋友的最佳交待。然而，一个突如其来击中他脸孔的雪球，却把他的心思和精神状态，扭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莫斯科的冬天是寒冷的，莫斯科的冬天却又是生气勃勃的。在冰天雪地里欢蹦乱跳地打雪仗，是大学生们的一大爱好和乐趣。唐延言抹去仍然攀附在他发红脸面和眉梢上的雪末水珠，一眼望到一个桔红色的身姿，很优美地弯曲着，杨柳枝般的柔腰，滚圆高耸的臀，金黄色的长发几乎要飘拂扫动在洁白耀眼的雪地上，而真正接触雪地的，却是一双通红的小手，很忙碌地攥起又一个大雪团，正准备向他发起第二轮进攻。这是他班上那位聪明美丽、活泼迷人的女同学叶莎娜！唐延言被这突然袭击激起的恼火立即融化了。他勇敢地朝着迎面掷来的第二个雪球冲上去，冰凉的雪在他开始发烫的脸上再次崩散开，银铃般的清脆笑声，把银灰色的白桦树梢的枝条，震颤得颤颤悠悠的，纷纷扬扬地飘落下许多银亮翻飞着的小蝴蝶。唐延言也弯下身，两手插进雪堆拼命地朝前拍击，似乎想扑打起更多更密的小蝴蝶，把那一团桔红色的火焰包围缠绕住。然而，雪是包围不住火的，他瞥见了高高鼻

梁下面，那个使他终生难忘的高圆梁和凹陷的大眼眶……在叶莎娜火热爱情的激励冲击下，唐延言在学业成绩上急起直追，厌学回国的念头烟消云散。两颗相依相偎的心灵，终于作出了要结婚的神圣决定。然而，一切似乎为时太晚了！他俩爱情发展的脚步，没有能够追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速度。唐延言在1960年初接到了父亲要他暂缓考虑婚姻问题的信件。暑期未到，就接到了回国的通知。他和心上人在醉人的初夏和风中依依告别，两张年轻发亮的脸庞上，都带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傻笑。一踏进北京的家门，唐延言才发觉父亲通过组织之手为他作出的安排，并不是短暂的回国度假。他从此再也不可能见到他心爱的叶莎娜了！他在家摔椅砸镜，大吵大闹；对着慈威并重原则如山的革命父母，又是以绝食自杀相要挟，又是苦苦哀求长哭泣。换来的结果，不仅是再回苏联哪怕呆一两个月的请求都不允，连同叶莎娜的继续通信都受到了限制！他反反覆覆地向立场坚定的革命父亲哀求：“你不让我出去，让她来中国吧！我了解她，她并没有特别的政治背景！我俩的事与政治根本就毫无关系！”可是久经革命考验的父亲无动于衷。

第二年春天，他收到了叶莎娜寄给他的一个特殊包裹。包裹里装着一盒做工精美的点心，每一块点心的表面，都雕刻着一个拼音字母，合起来就是他的姓名。而在那个特制点心盒的下层，他发现了心上人刻意隐藏的信纸。从那字字句句充满焦灼滚烫渴念的信纸上，他听到了姑娘为爱情宁可抛弃祖国、亲人、家乡和舒适富裕生活的山盟海誓。知道她已经给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写信，恳求他为她入境中国的要求得到批准，为成全一对有情人的幸福与中国领导人协商。她也要唐延言作同样的努力。可是，唐延言直接寄给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求告信，却出现在研究所领导的办公桌上。他想通过父母之手向上呈报，却遭到了父亲的痛斥：“不以国先，何以家为！为一外国女子丧魂落魄，把国家民族大义和事业专业求进尽抛脑后！丧志辱父，真是奇耻大羞！”唐延言忍无可忍，终于对着父亲同样咆哮：“什么国家民族大义，事业专业！你这是为保全自身的功名利禄，全然不顾儿女的真情和幸福！这套冠冕堂皇的说教，怎么也无法遮盖你们这一代大革命家的冷酷自私！你们习惯翻云覆雨，一忽儿甜言蜜语，一忽儿翻脸无情，凭什么硬要拖着下一代人跟你们一起去作谩骂争吵，结冤造仇！……”唐延言父亲闻言暴跳如雷，连喝“止口！止口！我从此不认你这个不肖儿子！你给我滚出这个家门！滚出去！”那位心地软弱的母亲，眼看着父子两代人根本缺乏沟通理解，双方恶言相加，只能躲在一边泣不成声。然而母亲软弱的眼泪，并不能打动父亲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意志力，和对置一己私情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上的深恶痛疾；也不能使误入迷途的儿子回心转意。唐延言的父亲直接向中央办公厅打了陈述报告和请求，坦荡无忌地指出：按我的日常观察和他本人的思想流露，我儿子不过是以个人问题作借口。他受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潜移默化，从根本上不满祖国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路线，向往修正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我恳请组织上对他进行全面严格审查，并采取必要措施。有关中央领导亲自批示：“此人在政治上已经滑向苏修一边。他对其父亲的抗拒反对，实质上也是对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因此不宜再在北京工作，请下放基层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对其个人问题和入党问题，暂时间一概不予考虑。并审查其以前是否有泄密情况。”当他的母亲在整理儿子人去楼空的居室时，在他与臭袜子抛掷在一起的日记本上，她看到了这样一些充满绝望怨恨的词句：“……我既然失去了她，所谓的祖国，民族，事业，

成就，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个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宁可去死，上绞刑台，或者赏我一粒冷酷无情的子弹！……他竟然这样对我，我还能相信他以前所灌输给我的那些理想、信念和责任吗？……我已成了一堆死灰。这样最称他的心意！从此我就最也不会给他添麻烦了。……我会算帐的，我渴望补偿。总有一天我要夺回我被剥夺掉的珍宝！……”叛逆儿子的母亲看着这些热昏的狂语，不由浑身象打虐子般地发抖，趁着老头子不防连忙把日记本塞进衣柜与墙壁的夹缝里。她有些多虑了——三天以后这对位居京城要职的夫妻就收到了外地单位领导拍来的急电：唐延言疯了！已送医院治疗。政治不会追究一个疯子。

这名因为陷入爱情泥淖而不能自拔的可怜虫，不知是因为爱情上的受挫对党起了刻骨的仇恨，还是底层的生活使他看到了更多的气忿不平，或者，他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实行他所信价值观念的天赐良机，他造反了；却因为再次陷入爱情泥淖而再次神经失常。“看不出来，这个花花公子，原来却是贾宝玉式的一个情种。”参加情况复查的郭贤对曲湘川慨叹。同时对自己当初审查红总领导人选时的马马虎虎粗枝大叶深感愧疚。尽管后来所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在唐延言的个人档案里一点都反映不出来，但是从他那段历史时期政治地位所发生的变迁看，很容易发现疑点和线索。一个出身优越、品学兼优、出国前就已经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的学生会主席，怎么留苏回国后，档案中什么不良纪录都看不到，却一下跌到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锡城工厂里当个小科员？当初他怎么会没有对此提出疑问呢？

唐延言精神病复发，也使得锡城市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可以借此东风，名正言顺地进行一次内部改组整顿，物色更好的领导人选，推动红总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的提高。

在确立新的人选标准时，最关键的考虑点：第一是要有代表性；第二是要有中共党员的金字招牌。目前红总组织中，人数最众、实力最强大的基层队伍有两支；一支是育文庆率领的建筑兵团，另一支就是奚大雄所组建的红色公路野战军。育文庆年轻有为，有朝气，有闯劲，在年轻的建筑工人中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可是在某些方面，还显得稚嫩和毛躁。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就是随唐延言带领建筑兵团包围朱家村，和参与夜袭歌舞团，陪唐延言等候赫鲁晓夫“开谈判”。红总和红联指那些中心组的头头，有事没事常拿这两件事同他寻开心：“小育，赫鲁晓夫一定是给你那个建筑兵团吓跑了，呼啦一下子，就把包围朱家村的队伍全调过来。交不交姚美珠？不交就让你在这歌舞团的楼里过一辈子，看一世《红色娘子军》，不给看《天鹅湖》！”听者都“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育文庆自然每次都被笑得满脸火烧云。他这人对敌斗争恨，对锡城市建筑系统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虽然还不能算满脑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却也算是该怀疑的都怀疑了，该火烧的都放火烧了，该打倒的呢，也正在想方设法地积聚力量将其打倒。可是对自己同志，造反派战友，他却很少怀疑之心；觉得如果在自己革命队伍内部都疑神疑鬼，就真的变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了！他是有政府的。既然唐延言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是司令，他这个副司令不听正司令的指挥，听谁的指挥？人人都可以做事后诸葛亮，充小聪明。其实只要“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机率会是非常地高。那天跟去了九个人，还是他第一个发现了问题，就是一个明证。可是，他不能逢上开玩笑者就作自我辩解。不管对方是有心的，还是随便说说玩玩的，越辩越黑，干脆随着“哈

哈”傻笑一阵子，就过去了。岂不知他老是这样被人开心，陪人傻笑，就把他的威望给笑掉了。因此他尽管是预备期党员，也是红总实际上的副司令，要接替唐延言却显然难孚众望。而余下的那些中心组成员，却没有一个同中共党员的光荣称号沾上边的。

于是，苏南工学院与首都三司驻锡联络处的秀才们，就想到了奚大雄；就把他跟育文庆作比较。他们几乎一致断定：如果奚大雄站在小育的位置上，绝不会在唐延言一声号令之下，就出动上千名人马，不问青红皂白地把贫下中农包围起来；也不会没头没脑地跟着唐延言，突然闯进歌舞团去闹国际级的笑话。而更重要的是：郭贤和曲湘川通过跟奚大雄较长时间的接触交往，觉得这个人确实有头脑，有觉悟，也有能够感服群众的个人素质和品德。考虑一下这个最基本的情况吧：就是在他被人浇上满脸污水臭水的时候，每天却都有好多同事去医院看望他，包括原来在市委一起开小车的伙伴，包括货运公司的党委书记，这就非常地不简单！就是在这医院和病房里，医生护士都敬重他，同室的病友也都钦佩他。还有更重要的：市货运公司的工人在镇压学生运动的“九·一九事件”中，起了打头阵的坏作用。可是他奚大雄人在医院，也不知怎么搞的，呼啦一下，就能把一支上千人的工人造反派队伍拉起来了！也许这全靠他背后的遥控指挥，也许他人在病房什么力都没有出；可是怪，队伍拉起来了，还硬是推他做总负责！每次中心组会议，都搬到病房里来开。这货运公司本来是保守派营垒中的一大据点，转眼间，却成了红总下属的一个大山头。而最最重要的是，奚大雄不仅是具有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而且年年当先进工作者，而且曾当个“祖国最可爱的人”！

不是说造反派都是乌龟王八所组成，是牛鬼蛇神的黑窝吗？红总如果把一个响当当、硬梆梆、光采采的造反司令摆出去，不仅会对还在犹豫的革命群众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好多对造反派存有偏见和保留态度的领导干部，也会刮目相待，认真考虑转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然而，曲湘川他们也知道：奚大雄并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物。既然工作组会抓住奚大雄同凌漪的关系做文章，革工联更会故伎重演，抓住这点，极尽造谣诬蔑夸大渲染之能事。

虽然，他们已经仔细研究过从李辉康那里弄来的见证书抄件，知道凌漪是反右运动中的牺牲品和受冤屈者，而且了解到公司党委书记也清楚他俩的关系，同情他俩的情况；可是两个都已婚配的人，凑到一起去看电影，总使人觉得其中有一种暧昧不清的味道在里面。当然，革命群众的眼睛雪亮亮。单把两个人在一起看一场电影，就作为搞腐化的靶子打，公众不服，人心难平，反而激起好多人对奚大雄的同情和支持。这也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奚大雄是清白无辜的。他跟凌漪之间，并没有超过仗义执言和感恩敬重的范围与边界线。问题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是绝对的。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他俩的关系会向什么方向起变化呢？

这，就是曲湘川第一眼看到凌漪出现在反帝医院病房里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

接着看到她毫不犹豫地做雷锋，又使其他病友不把她当作雷锋看，却把她误作来尽责任的奚大雄老婆，曲湘川马上敏感地觉得：这个女人对奚大雄，也许并不仅仅停留在感恩敬重的层次上。然后是听她向自己直言不讳地宣告已经办离婚。然后是看着他俩在阳台上眉来眼去，交谈的声音越来越低微，行迹越来越可疑。这一切，顿时使曲湘川的警觉，从迷迷糊糊的瞌睡状

态中猛醒过来。奚大雄对凌漪的帮助，正是纯粹出于仗义执言吗？假设凌漪是个令人生厌的丑女人，他也会显示出这么一种非凡的热心来吗？当然，这并不是说，奚大雄的帮助一上来就具有心怀叵测的含意，而仅仅揭示了他以前所忽视的一个要点：奚大雄虽然是中共党员，却并不是舆论所宣传的那样，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在公司职工中是有威望，但并不高尚得如圣人。相反，他有七情六欲，他好女色，他跟唐延言，或者说跟绝大部分男人一样，都有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弱点和弊病。他曲湘川所以能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不就是因为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在终于亲眼见到了凌漪之后，自己也为她那种美貌所震撼了吗？既然如此，它怎么会不对奚大雄产生极其强大的诱惑力呢？就是这种革命的警觉心，加上革命的责任心，加上通过以己度人的揣测推理所产生的无穷忧虑，使曲湘川当机立断，毅然中途插入阳台，棒打鸳鸯，挽救同志，挽救锡城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同凌漪下楼后，并没有走出医院，也就踩着满地落叶，步入花园，找了一张长条靠背椅子，消消停停地坐下来。

“可以冒昧地提个问题吗？”虽然按年龄算，曲湘川在凌漪面前不过是个小弟弟，他却竭力装出大哥哥的模样来。

凌漪脸神显得有些警觉地朝他望了一眼，似乎不情愿地微微点了点头。

“你很喜欢奚大雄吧？”曲湘川单刀直入地开口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凌漪的口气立刻变得很生硬。她没有想到：这个大学生会如此放肆地试图掀动遮掩她心头最隐私一角的帷幕。

曲湘川见对方勃然变色，立即说圆场话：“噢，你别误解。我看到你们公司来看他的人，都很喜欢他和敬重他。我想你大概也不会例外吧。”

“你邀请我下来，就是要让我听你讲这些无聊的话吗？”凌漪仍然不客气。

“不，当然不！”曲湘川看她几乎有拂袖而去的模样，连忙接着说：“我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内部消息；不，可以说是一个内部决定。经过充分地协商和酝酿，奚大雄将出任红总的第二任主要负责人。我相信，你和你的同事们，都会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也一定会预计到：革工联的人，会捏造各种可能的把柄，想方设法把他搞臭！为了工人阶级和文化大革命的总体利益，我们必须全力维护他的声誉和威望。”

凌漪听曲湘川说完最后那句话，用很尖利的目光瞥了他一眼，也开门见山地回敬道：“你是说，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跟他多交往，会有损他的声誉和威望吗？你是太多虑了！我有自己中意的对象；我就是为要重新组织家庭，才跟原来的男人脱离关系的。”

曲湘川见凌漪讲得这么干脆利落，心中一块石头顿时落地，自嘲自己确实太过虑；捕风捉影，望文生意，知识分子的职业病。就很恳切地说：“这样好，这样不仅对革命有利，对当事者各方都有利！我衷心祝贺你能重新得到家庭幸福！也祝愿你的个人冤屈，能尽快得到纠正。”

……以上这些情况，曲湘川根据自己的考虑重点和意图，简洁扼要地对奚大雄作了通报。按常理，奚大雄听了，是应该感到振奋和高兴的。当一个全市最大工人造反组织的头，意味着今后，他将同以前为之开小车的市委领导平起平坐地讨论商量问题；能把过去难以上达的群众疾苦和群众意见，以八九万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言人的身份，传达给的市委领导，引起他们的关切与重视；也意味着象崔志中那样的单位一级领导，今后不仅不再能够随意

给他穿小鞋，而且要战战兢兢地仰视他。他也相信：由他出面去跟原来就认识的恭主任、俞市长和陆书记等打交道，一定会更容易相互理解和沟通。他过去所认识的所有熟人，不管是一向对他尊重的或素来对他心存芥蒂的，都会对他刮目相待！这一切，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觉得不振奋，不高兴，可是在这一刻，他对这一切的体味感觉，却显得很迟钝。是因为听说凌漪已经有了将要重组家庭的对象吗？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尽管曲湘川描述的语气很肯定，他对此实在很难相信。他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相信起午睡时所做的梦，确实是由心灵感应引起的。可是他知道：自己应该享有的振奋情绪，确实是被凌漪的不期而至和不期而别所破坏掉的。如果他今天是在她没有来的情况下，从曲湘川那里听说这个内部决定，想必会有会有极大的喜悦和兴奋。如果她没有向他匆匆告别，而是留下来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再一起在这花园里散上一阵子步，交流一下站在人生道路转折点时的感想和体会，那又该会是一种何等使人陶醉的滋味啊。可是，她并不给他以陶醉的机会，而是冷冷地坚持说：她得走，有人在等她。对她的脸上临别前一刹那所显露的异样表情，他很难摸得透它的真实含义。他原本是可以跟面前的这个读书人作讨论的，可是凭这个读书人今天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谈，他明白：在与凌漪的关系问题上，他已不便与对方作任何交流。对方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干净利落地斩断他同凌漪之间的感情联系。凌漪不是妖怪。也不是恶魔；但是，出于一种冷酷的政治考虑，她却比妖魔鬼怪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与她多接近，就会葬送革命，葬送红总，葬送自己的辉煌前程！他什么时候想过：自己应该有一个辉煌前程呢？直到凌漪告辞时，他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回乡看老婆之前，他对贴大字报的事连想都没有想过，更没有想到要造反，要当大头头。可是，却好象有一股什么神秘的力量，在背后推着他身不由主地朝前走。就象现在这境况，因为要去红总当头头，对凌漪那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思，就必须扔到脑后去，再也不让它钻出来干扰革命的大目标和大方向。曲湘川今天所做的一切，所有的明示和暗示，都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一大群人的要求和期待，反映了锡城市革命造反派的整体利益，体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和原则！

奚大雄斜倚在靠背长椅上，一口一口地猛抽烟。一个多月的病房生活，使昔日早已被驱赶得很淡薄的烟瘾，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他吸进去的烟，他吐出来的烟，象征着两军对垒拼战过程中的战火硝烟。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说：大胆地提出来嘛，作为一个条件。反正现在是他们有求于自己，他们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如果不答应我就不去，我本来就没有想要那个位置，丢了也不可惜。对，让凌漪到红总当自己的秘书，她合格，他中意；决不需要象唐延言那样，大浪淘沙，一个星期换一个。刚才曲湘川谈到唐延言的手下人在厂里大打出手，这无意中正好应合了他跟凌漪的讨论话题之一。当时他还认为：她在时红霞挨打问题上所表示的温情主义是要不得的；可是按曲湘川的口气来推测，他如果知道了这一情况，一定会赞扬她而批评自己的。就凭这一条，他就觉得她够格，他的身边非常需要她。曲湘川常喜欢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末，在凌漪的问题上，为什么就不能也作一分为二呢？另一个声音却大声喝道：呸！无耻。你明明是对凌漪有了不可告人的想法，却用什么“两分法”来作借口！不承认吗，想抵赖吗？你难道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抓住她的手腕吗？在小亭子里你不是想把她抱起来吗？自己一边革命造反，一边暗藏着这些肮脏卑鄙的念头，对得起革命战友的信

托期待吗？对得起毛主席对革命造反派的殷切指望吗？配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吗？既然想开这个口，竟然想把它作为参加革命的一个筹码条件，脸红不脸红？害臊不害臊……！

奚大雄心里所打的仗，曲湘川可以猜到一些轮廓，细节却是无从揣测的。如果他完全看破其心思，知道奚大雄竟然有把凌漪调到身边当秘书的念头，他一定会非常地惊讶和失望，并且断然向其他战友提议撤销原决定！幸好，奚大雄的理智毕竟比感情更坚强，党员称号的光荣和红总司令的荣耀，加上凌漪所作的临别宣告，使他最终醒悟到自己未曾出口的上任条件，有说不出的荒唐与可笑。对曲湘川的通告，沉默的时间够长了，他终于打开口问：“你知道，红总现在的确切人数是多少吗？”

第十七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

落花无意水流去。武遥终于随着的工作组，被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出了苏南工学院。或许是鉴于他的表现确实与众不同，或许是他跟王小燕的特殊关系救了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在全市各工作组的组长中，他第一个荣获检查合格的资格，正式班师回朝了。

因为一到锡城市，席不暇暖就被派去苏南工学院，他那市常委的办公桌上和办公交椅上，如果没有办公室勤杂人员每天雷打不动地擦拭，一定会结满蛛网积满灰尘，使人以为这些形同虚设的桌椅，是那位故去老臣留下的遗物。“回去好，这下你该可以悠闲几天了。”杨玲为他的班师回朝唱颂歌。不料，这颂歌可以唱，歌词却需要作改变。能悠闲吗？革命干部能悠闲吗？当时虽然还不兴“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说法，而这精神，却是1921年党在南湖石船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就从娘肚子里一起带出来的。当然事在人为；武遥如果存心要偷懒躲闲，是完全能悠哉游哉上一段时间的。连陆波也合着武遥老婆的那种腔调对他说：“回来好，休整休整，准备下一个回合。”可是他不休整，马不停蹄，四下活动，成了市委常委楼里的大忙人；连身负重任的陆波书记，恐怕也要望尘莫及了！

武遥的积极性，也许使陆波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威胁和压力。可是，不要以为陆波对这种威胁压力很介意，你们对陆书记还是缺乏了解和理解。如果从左右两个极端的词眼色彩中去选择，充其量，我们只能用“冷眼旁观”或“乐观其成”这两个形容词去描述他的心情。

经过一段时间急风暴雨般的文革运动，陆波同志的世界观确实确实给改造了！你要坚持革命立场吗？你要维护党的原则吗？你忠心耿耿地忠实于党的事业吗？你就是脱离群众，就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就是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这种论调先是在报刊上面那样“哗哗”地吹，然后，连上级的讲话精神，不管是公开的还是内部的，也跟着这种调子吹，真不知道当初关起门私下宴请时，那“好自为之”四个字，现在该作何种理解？坐回到家里的沙发椅上时，老伴一边给他沏茶，一边劝慰他：“你也不要生老首长的闷气了，他也是没办法，中央文革的人都表态了：学生闹

得对，工人按宪法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他能硬顶吗？我看，你还是趁早退吧，乘那个接班人刚回机关，正好是机会。”老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陆波在这段时期里，确实萌发了退意。但由于这是消极抵触情绪支配下的退意，无形中就缺乏果断利索的性质，老是在怎么退、何时正式提出来上面转圈子。结果什么决定性的步子都没有跨出去，唯一所作的改变，是会上会下地对常委一班人吹风说：“运动发展证明：武遥同志的好多观点和建议是正确的。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今后我们要注意多多听取少数人的意见。”他这样说的时侯，自觉言不由衷的成分很高；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目前班子里不少人心里也是这样看的。你不这样言不由衷地说上几句，你这个“班长”也就显得太缺少气量风度了。如果我老陆波连这点都缺少的的话，那也不会在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上混到今天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箭双雕的含意在。这也是一种试探；试探“一班人”以及武遥本人，对此作何反应？不是老是在琢磨怎么退和何时退吗？他们的反应如何，在决定引退时间和方式上，至少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分量。其余百分之五十，则取决于省委的态度。

省委的态度暂时不是很明确，省委领导近来好象有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味道，对锡城市有点漠不关心的样子。但是武遥的活跃劲儿，却似乎明显地受了他这番言论的激励和促进。“蹦吧，蹦得越高，摔得越惨！”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也只能在心里这样自说自话。自我告诫嘛，随便怎样过分的字眼都能用；这点人身自由，党内还是允许的。如果把这些心里话放到台面上去说，就会被人以为是在诅咒武遥同志了；那他陆波成了什么人？对革命同志抱什么用心？这就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的言论或行为，从来就是排除在陆波同志的做人准则之外的。但是，他确实很想知道：武遥这段时间蹿来钻去的，到底是在忙乎一点啥？他首先想耐心等他主动来汇报；不，是交换看法。等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有点沉不住气，很想主动关心了解一下这个“班人”的行踪动态。正这么想着，武遥却好象抱着“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心态，跟他主动来作看法交换了。陆波一听他那套用文革时髦语言作包装的民粹主义大杂烩，心中气就不打一处来。可是，他有成套成套的报刊文章作依据，有常委内部那些没有政治主见的人作附和，陆波竟找不出象模象样的话来批驳他，只觉得他所提到的奚大雄这个名字很熟悉；仔细一回想，方才记起来：就是市货运公司的“人民来信”所涉及的那个司机，模模糊糊的印象中，好象以前还在市委给自己开过几趟车。于是他又回想起：曾让信访办的时红霞带着工作组，去弹压奚大雄一伙人的造反行动；也听说过不久前时红霞遭那伙人一顿毒打，被送进了医院。如果说，对这个个子高高、脸膛黑黑的小车司机，他以前是印象平平、记忆甚浅的话，如今听到这个名字时，却使他很反胃。而实际上，所有跟造反派有联系的东西，都会使他感到反胃。但是按目前中央的指示方针和精神，他知道这种反胃情绪，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条原则的。左思右想，实在一时找不到否定的理由出来，就只能回答说：“好吧，看来还是你对形势发展跟得紧，理解得快，什么时候放到会上好好议一议吧。”那种有气无力的语调，听上去就好象他已经退了休似的。

半个多月前，小车司机许洪元开车接武遥回市委时，兴冲冲地对他说：以前跟他一起在市委大院开车的老战友奚大雄，当了市里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红总的新任司令。武遥一时闹不清：“谁？奚大雄，奚大雄是什么人？”他询问。

“就是你来锡城市第一天，我交给你那封上诉信的作者。”许洪元一点不避忌。他的消息很灵通，知道武遥是市委内对造反派并不抱强烈反感的一位领导。

武遥的记忆力本来就不弱，只是前一时期给苏南工学院和市里的文革运动，搅和得实在有些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了。待他回过神来时，浓黑的卧蚕眉毛间，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星点旁人不易察觉的喜色来。中共党员，复员军人，先进工作者，在市委开过小车，同市委大院里的人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等等这一切，不能不使他向好的方面去想像，不能不使他产生出某种期待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已经明确指出中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反复复在强调各级领导要转屁股，及早站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问题是，许多领导和群众，都认为按中央要求应该加以支持的造反派，不过是一批社会渣滓，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不要说支持，就是同他们打交道，都觉得心里很别扭。武遥凭自己对苏南工学院那批造反派的了解，知道这种思想倾向里面夹杂着某些偏见和误解。但是就总体而言，造反派组织里，特别是工人造反派的队伍中，确实聚集了一大批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人员素质差、组织不纯的问题很突出。由于受这些情况的制约和影响，象红总这样的造反组织，一开始就对市委抱有敌视抵触的态度，也就毫不足奇。而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奚大雄，就使他觉得：这好象是在双方被阻隔的一条深沟上面，出现了可以沟通的一长条木板；虽然乍看上去象座不起眼的独木桥，经过努力，也许是能够扩展成为一座通衢大桥的。

武遥第一个通报对象，当然是陆波。但是陆波不感兴趣。于是他就找俞市长。俞市长对奚大雄记忆尚存，印象良好。可是他却一反以往爽朗健谈的常态，谈话时老是“哼哼哈哈”的，显得提不起兴致来。武遥觉得对老俞的情绪心境很理解，也很同情。他是抓工交的；现在全市工交企业中，百分之九十单位都有了革工联和红总两大冤家对头的下属组织，两派的冲突摩擦层出不穷；不少企业的组织领导已经陷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如此以往，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怎么能确保完成？然而，俞市长老是言不答语，缺乏深入探讨问题的热诚，一付心事重重的模样，终于使武遥意识到：他一定另有心事在烦他；否则，老俞决不至于因为担忧市里的生产情况，而不愿跟他作意见想法交换的。按常理，越是工作上的难题多，老俞同他的讨论兴致会越高。虽然近来由于意识到彼此在对造反派的看法上有分歧，这种分歧，可远未发展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程度呀。武遥默然，怅怅地告辞，怅怅地走向自己一边花园围墙的门，推门进屋，坐倒在书房办公桌前的圈椅上，却一点都没有看报或看书看文件的兴趣，只是一声不响歪着头，观看杨玲在辅导已经无学可上的女儿杨翼自学数学。

杨玲察觉他的情绪有些反常，开口问：“怎么，吃过晚饭出去兜了一圈，兜出什么不爽心的事来了？”

武遥顿了一顿，回答说：“我倒没有什么。刚去老俞那里转了一转，发觉他连跟我讲话的心绪都没有，心里挺纳闷。”

“哦，这个；他是为他的独养儿子犯愁么。”杨玲不以为意地回道。

“什么？你是说俞彦出了什么事？”武遥急问。

“前两天学校里来了一大批红总的人，协同红旗团把俞彦的‘大中兵’砸掉了，把俞彦也关押了起来。”

武遥显得很吃惊：“怎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他的口气里带着明显的责备性。

杨玲却很沉得住气似的，仍是不紧不慢地说：“犯得着吗？你以为我还会象以前那样向着大中兵吗？如今在我眼里，他们跟红旗团就好像是半斤八量，都没有指靠和希望。”

“他们怎么了？”武遥紧追问。

“报纸上一直在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前一两个月，他们打伤了一个人；这个人如今当上了造反派的什么头，就来作报复，这不是自食其果吗？”

武遥知道杨玲对暴力行为最憎恨，因此对自己一向喜欢器重的学生，也不会原谅，也就不再多言，闷头思索了一下，拨响了给恭鹏志的电话。

恭鹏志听说是市长的儿子出了事，又是武书记亲自打电话，要他通过跟奚大雄的关系，立即采取搭救措施，就一分钟都不敢怠慢。急忙通过值班人员找到许洪元，随即一起驾车直奔红总司令部。一路上，恭鹏志身子靠在车子的沙发椅背上，心里直庆幸：当初处理许洪元转交的上诉信时，自己似有先见之明地在奚大雄身上预做了人情。

恭鹏志进过革工联的无数次大门，连守门人都认识他，知道他是市委办公室的恭主任。

如果说，红总的催生婆是郭贤，那革工联的催生婆就是他恭鹏志。前者是奉谁之命他不知道；而自己则是奉陆波书记的指示，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才把十几万产业大军组织在革工联的大旗之下！这十几万人，是锡城市工人阶级中的精华。他们是党团员，是先进生产者，是车间、工段、班组的骨干，其中有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也有好多受到培养信用的年轻人。

他们就象是大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工人赤卫队；他们是面临一浪一浪冲击的市委可以信赖的护卫屏障和钢铁堡垒。可是此时此刻，他却迈着极不确信的步子，首次走进了跟这一革命营垒虎虎对峙的另一个阵营中。如果不是身边有个许洪元，如果所要拜访的对象不是老熟人，他会扭头而回、扬长而去的！因为他至今对红总、对造反派感到很大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他不明白：在共产党的天下要造什么反？这极简单的一个问号，就使他产生本能的反感和敌视；无论用什么样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来解释，他恭鹏志都觉得思所匪夷，即使嘴上不得不加以接受，心头实难理解。只有今天在走进这幢带有哥特式尖顶的小洋楼之前，当碰撞上那些在他和那辆铮亮的“伏尔加”小轿车之间来回瞥视的轻蔑仇视目光时，他才首次感受到“造反”的某种确切性质和含义。小洋楼的门前，游荡着一些臂戴红总“主力军”袖章的青年人。那些目光，就是从他们的眼睛中喷射出来的。他们是在甜水里和红旗下乡长大的，为什么会共产党的对小轿车和小轿车乘客，产生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呢？他进了楼，想到这伙仇视共产党的人，却是有他所熟悉的一个共产党员在领导着，心里更觉得淆乱起来。许洪元似乎注意到了他此刻的心境；在引导他走上一架豪华转梯的时候，朝他露齿一笑。那种笑的含义是暧昧不清的；是在向他表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象奚大雄这样公认的好人，出了市委大院的门也要遭人欺、也要被迫上诉告状，怎么会没有人造反呢？抑或是说：他的老战友有出息，他为奚大雄感到自豪和骄傲？或纯粹是因为看到他恭鹏志进了屋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而他在这个造反窝里却是熟门熟路，如鱼得水，因此用露齿一笑来表露他的一种得意之情？

在这种地方熟门熟路有什么可得意的呢？如果不是现在这个非常时

期，要是早知道你许洪元是这里的常客的话，我会给你好果子吃吗？恭鹏志在跟着许洪元拾级而上的时候，思路转得比绕着转梯扶摇直上的脚步快得多。因此乍一眼看到奚大雄也戴着“主力军”的红袖套，满面带笑地迎上来，倒觉得很突然似的；好象原以为上了这幢西洋式建筑结构的楼，应该七弯八转地先兜上几个圈，或者在哪一个跟转梯同样豪华的什么候客室里呆上几分钟，才能碰上这位“土别三日、另当刮目相看”的奚大雄。更使他惊异的是：奚大雄走到办公室门口来见他的样子，右边那条腿，竟是一跷一跷的，“大雄，你这腿，这腿是怎么啦？”恭鹏志惊讶而关切地问。

“哦，大中兵革命小将给留的纪念。恭主任，你这可是贵客临门，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牛鬼蛇神聚集的黑窝里来了？”奚大雄的口气是讥嘲性的，但是脸上的笑容却明显地很友好，因此使得恭鹏志并不感到特别地窘迫。“哪里，哪里话，你这里现在是响铛铛的革命造反大本营！连武遥书记都说，他哪一天也想前来拜访呢！”

“是吗？如果有市委领导干部的支持，我们跟毛主席革命造反的劲头就更足了！”奚大雄哈哈笑着，做出神情很欢快的样子，把恭鹏志和许洪元让进沙发里：“洪元常到我这里来。我本来就寻思着什么时候让他带个讯，请市里领导来谈谈。”说毕，那笑意仍然挂在黑黑的脸膛上，使人觉得他被欢畅伴随着。而实际上，他的内心此刻却很烦恼。傅古宝从公司里带来一封信，刚读了一个开头，就来了客人，只好打住，优先迎接客人。但是就看了那个开头，心里就发堵。而当着客人的面，却不得不强颜欢笑，给人以假象，而把真相隐蔽起来。

“武书记可是真的想来。可是，他刚听说你们红总下面的人，帮着延安中学红旗团把俞市长的儿子关了起来，他认为群众组织是无权抓人的，因此要我特地来一趟，跟你通通气。”恭鹏志接过一名“主力军”递上的茶，就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提出来。他已经注意到奚大雄的笑容是强装的，感到这拜访的时机也许选的不怎么理想。但是也无可奈何，他在时机上，其实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想不到的是：不等奚大雄和许洪元接上口，那位不起眼的递茶者却立即插起了嘴：“喔，你是为延安中学的‘大中兵’说情来了！可你知道奚大雄的腿是给谁打折的吗？……”恭鹏志没有料到：一个端茶人，在这种场合既然也有插话的权利！这大概也就是造反派里的风气；谁都可以充老大，谁都有七张八嘴发表意见的资格！他更没有料到：市长儿子的被押，原来跟奚大雄的那条瘸腿有关系。“这，这是怎么回事？”他急切地问，非常想搞清其中的来龙去脉。这样即使今晚事情没有办成，回去也好有个交待。

听了奚大雄手下人的诉说，许洪元这时插了上来，他还在恭主任手下吃饭，当然还是帮上司说话：“可是，这也不一定是俞市长儿子的个人责任，大雄你说是吗？”

奚大雄看了看恭鹏志，又望了望许洪元，却用驳斥的口气回答说：“我们公司带路的干部揭发了，那天是他领的头。”

恭鹏志和许洪元听他这么一说，一时间都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说；但是就这样无功而返，似乎又有些不甘心，就捧着茶杯，“嘘嘘”地拼命吹气，仿佛都很口渴的样子，但那刚倒的茶水又太烫，就努力用嘴巴所创造的空气流动，来削减茶杯的热量。

奚大雄跟他俩似乎已没有交谈的兴趣，自管自拨座位前办公桌上的电话。拨了好几次，终于拨通了，就说要找史苏星或黄军。等了一片刻，就听

他对着话筒说：“喂，是黄军吗？我是奚大雄。……我晚上也干革命？你不在干吗，否则我现在怎么能跟你对得上话？……哎，我说小黄，你就把俞彦给放了吧。什么？……他承认他是叫他手下人带了体操棒，可是他没有亲自下令打？……对，这些我都清楚，他说的是实话。放了；马上就放！……谢谢你。”奚大雄说完，“咔嗒”一声挂断了电话。

恭鹏志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如此顺利地得到解决，就不再对茶杯吹气了，把它撂在一边的茶几上，对奚大雄很诚恳地说：“俞市长看到他儿子安然无恙回家，一定会很高兴。你是知道的，俞市长为我市的工业建设和发展，可算是呕心沥血了！他对手下人也随和，是个好人。好人是应该受到好报的。”

“我了解他的过去；但是不知道他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抱什么态度，对造反派抱什么态度。更不知道他的今后会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你跟洪元都亲自上门来求情，这点面子我总是要给的！”

奚大雄话刚落音，就听到门外楼梯口有“蹬蹬蹬”的脚步登楼声。那声音很响，一听就有好几双脚在同时敲着楼梯板。然后声音到，人也到：“嗨，我们奚司令今晚有贵客登门哪！”发出这一轰轰响大嗓门的，是一个腰壮如牛、长着一张冬瓜脸的中年汉子；冬瓜脸的半边，象瀑布似的一直奔泻到脖颈上，有一片奇形怪状的疤痕，使他的形象在天花板顶灯的照视下，显得有些狰狞。跟他一起进门的，显然都认识许洪元，都同他打招呼。奚大雄站起身来，对着壮汉说：“你又乱叫，会上早就讲过了，不准称司令！红总没有司令，只有勤务员；再乱叫要处罚。”壮汉看着他一付一本正经的模样，转过头对身边的年轻人打趣地说：“这一来，你这副司令也不作数了。今后就永远只能叫你小育、育老弟了。你可不要为此对大哥产生不满喔。”那被称作小育的，顺手就对壮汉的腰肢上捅一拳，“去你妈的，别看你身胚扎墩；下次再胡说，我跟老奚一起摆平你！”“我愿意作帮手，”小育旁边穿黄色旧军装的中年人，也马上表示声援。“你说清了，你帮谁？”汉子立即把斗争目标转向声援者。

“当然是站在正义立场上了！”小育代回答。“哟，竟敢怎么大胆地得罪我，就不怕下次上我的游览艇，被我扔进太湖喂鱼去？”壮汉对声援者瞪起了金鱼般的鼓泡眼。

“好了，好了，”奚大雄见大家只管说笑取乐，并不把他的客人特别放在眼里似的，就打断话头，指着壮汉对恭鹏志说：“来，我作一下介绍：这位是葛富林，江南航运公司“石下草”兵团的头。”又指着被葛富林称为育老弟的年轻人说：“这位是红总勤务组的副组长育文庆，建筑兵团的头，中共预备党员。”随后指着那位复员军人模样的人说：“我们货运公司保卫科的傅科长，中共党员。现在临时借到总部来抓组织整顿工作。上次来我们公司时，你俩见过面吗？”

奚大雄见双方都摇头，就转向他的同伴介绍说：“这位是市委办公室的恭主任，恭鹏志；我以前的老上司。难得来我们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意见，可以向他反映反映。”

恭鹏志面对那个开起玩笑来也咄咄逼人的大炮筒子，一上来心里就有些发怵。接着看到他们用旁若无人的谈笑，有意冷落自己，随即明显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思想隔阂和敌视心理。待到作介绍时，虽然他依着奚大雄的介绍顺序对每个人都友好地点点头，三个人中，却只有傅科长也说了一声：

“我一看门口停着那辆车的车牌，就知道市里有客人来；”其余的两位，都只是爱理不理地朝他扫一眼。而那个“石下草”的葛富林，扫视他时动用的还不是正眼，而是斜睨的眼角。因此一听奚大雄最后的提议，心里就慌了神，唯恐这伙人真把内心的敌视情绪发泄起来，会使这种逢场作戏的意见听取，转化为一个小型斗批会。就一边说：“是，是，难得这个好机会。”一边把手表高高地举到眼睛前，好似很惊讶地喊道：“啊哟，已经过九点了！武书记还在等我的汇报。这样吧，我回去向武书记提一下，定个什么时间，双方正式开个会，好好交流沟通一下。”

奚大雄这时看到许洪元在朝他使眼色，知道此刻把恭鹏志勉强留住听意见反而不美，就顺水推舟地说：“这敢情好！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打倒市委领导，而是希望他们能尽快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

然后就送客，亲自陪下楼，送出门，目送着“伏尔加”车后的红灯，颠晃颠晃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中；然后返回身，觉得原先心头的懊丧之情，给恭鹏志的来访冲淡了不少。在奚大雄的生活中，这是他第一次品尝到了什么是权力的滋味。他以前只可能向恭鹏志这样的人求助，现在却倒过来了，恭鹏志向他求助。他不由不佩服起傅科长的神机妙算起来。去延安中学帮红旗团砸“大中兵”，拘俞彦，都是傅科长出的主意。开始时奚大雄还有些犹豫，既想为自己所落下的瘸腿和所受的耻辱报仇雪恨，又记着曲湘川批评唐延言报复心理重，忌讳自己也被人看成一个同类性质的狭隘报复者。

“如今在全市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中，你跟哪一方面关系最近？哪一方面关系最远？”傅科长循循善诱。

奚大雄一下就听明白，傅科长要他在同首都三司驻锡联络站和苏南工学院院长征兵团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发展跟几乎毫无交往的红旗团的关系。接着，老傅又不慌不忙地说出第二条理由来，以证明这是一着一箭双雕的妙棋。奚大雄听得很动心；如果把要想出口气的念头也包括进老傅的建议中去的话，那可就是一箭三雕了！实践证明：这些目的几乎全都达到了。

据说红旗团的黄军对谁都傲气得很。奚大雄凭自己的军人经历，知道在军人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崇拜实力和暴力。那次派去葛富林手下“石下草”兵团四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不仅把“大中兵”的那些娃娃镇住了，而且也使红旗团那些骄横的军人子弟服了眼！

他们很清楚：如果不开来这样一支“主力军”，大中兵是决不会兵不血刃地屈服就范的。因此这几天来，无论电话里还是当面碰见，黄军总是开口一声奚师傅，闭口一声奚师傅。红总在他心目中的身价，一下高了不少。这当然是奚大雄所十分需要的。因为他心里明了：红总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在红联指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文化”两个字带头，那些掌握文化的造反派，就不比不掌握文化的造反派，处在明显的优势地位上。他们所具有的呼风唤雨的造舆论本事，对政治风云变幻和权力结构的改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现在按傅科长的出谋划策，同有文化的造反派中三个主要方面都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由老傅所提醒的他在红总内部根基薄弱的弱点，就基本上通过外部关系上的优势被弥补了。而在砸大中兵时把俞市长的宝贝儿子顺手牵羊抓起来，同时逼他写检查，把组织指挥那天抓他打他的过程详详细细写出来，一是可以让他痛悔当初有眼不识泰山；二是在俞市长和社会舆论面前，也有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然后就可以静等市委方面作反应。情况的发展，果然不出傅古宝之所料！奚大雄觉得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自

已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些政治运筹机巧，经逐步运用锻练，也摸出了一些道道。今天恭鹏志的来访，更使他觉得自己在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想到红总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可能跟市委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对话渠道和协作关系，那比同造反派秀才们已经牢固确立的关系，意义一定会更重大。他开始感到老傅这人不简单；怪不得崔志中对他这么信用。

然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傅古宝也并不是事事神机妙算。在提议让凌漪来总部做内勤的问题上，他虽然就好像是钻到他奚大雄的肚子里做了蛔虫，摸透了他的心思，却显然没有摸透凌漪的心思。结果反而使他在出主意人的面前，显得是一厢情愿自讨没趣，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凌漪她为什么不愿来总部呢？好多人想来都来不了呢。

奚大雄送毕客人，匆匆走回楼上办公室，想把给客人打断的读信进程重新连接起来。可是事不如意，那三位老兄并没有离开他的办公室，很显然，他们有重要问题亟待同他商量。

“老奚，革反军那里，到底什么时候去谈？考虑了这么长时间，终得给人家一个答复吧！”葛富林首先开炮，声音里明显带着抱怨性的不耐烦。他的工作单位江南航运公司，与货运公司，一水一陆，同属市交通局领导，同是锡城市的大中型交通企业。通过老傅和江南公司保卫科某造反科员的牵线搭桥，葛富林带着他有三四千人的“石下草”兵团，加入了红总的队伍，加上奚大雄的公路野战军，使交通系统的“主力军”人数，首次超过了建筑兵团，成为了红总首屈一指的主力部队。根据老傅背后所作的政治摸底，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奚大雄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反对意见，把颇有争议的葛富林增选为红总勤务组成员。

葛富林出身于城市贫民。六岁死了母亲，就被吸毒成瘾的父亲送人换了几块钱。领养人起先家境尚可，还供养他读了几年私塾。可是到了他十四岁那年，养父亡故，家道难以为计，他养母就只好带他回城找生父。可是那生父一看儿子已经可以派用场了，就把苦苦拉扯他长大的养母一脚踢回乡下，而把葛富林送进一家米店当帮工。他在那家米店从搬运扫仓，到劈柴、烧饭、抱小孩，每天从鸡叫做到鬼叫。有一次实在恼得不得了，一打盹，把抱在手里的老板儿子摔落到了石板地上，摔破了头皮。那气急败坏的老板娘，就顺手把刚刚烧开的一锅水，恨恨地浇泼到他的脸孔上！于是就在他的脸孔和脖颈上，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疤痕；也在他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解放后“三反、五反”时，他挺身而出，揭发老板偷税漏税。老板因此要炒他鱿鱼，他趁“打虎队”下店查账之机，一把揪住老板向“打虎队”告状。老板吓得浑身抖簸，从此把他敬若上宾。葛富林成了运动积极分子。

在一次定案大会上，领导上把发定案书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每个老板上台来接定案书时，都要对高高坐在主席台上的他，恭恭敬敬地鞠个躬；有戴帽子的，还得在鞠躬时识识相相地摘下帽子，以脱帽礼表示尊敬。这时轮上他原来的粮店老板上台领定案书。因为这老板是痢痢头，在公众场合从来不脱帽子。哪怕在夏天，也必定戴上个凉帽作遮掩。他想自己的雇员应该了解和尊重他这一习惯，因此鞠躬之时，就把摘帽礼擅自免去。年龄尚不满二十岁的葛富林也不跟他计较，把手中的定案书往桌子旁边一撂，大声喊道：“下一个！”那粮店老板慌了神，急忙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无可奈何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展览他那个藏如珍藏的痢痢头。葛富林通过这一小小的恶作剧，

扬眉吐气，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痛快！后来他进工厂，仍然是积极分子，培养对象。可惜好景不长。他那个毒瘾成性的父亲，解放后积习不改，为了应付继续吸毒的花费，在公家工作职位上贪污了大笔公款，落得了一个啷当入狱的下场。

他受父亲判刑的牵累影响，随之在政治上也被打入了冷宫。于是就变得自暴自弃，吊儿郎当，经常跟领导磕磕碰碰。五八年精简下放工人时，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对象。六二年以后回城进江南航运当了一名合同工，吸取教训一改旧习，勤勤恳恳卖力工作，一心想转个正式工。不料失去容易求还难，始终未能如愿。悲观失望之际，昔日旧病正待复发，恰好来了文化大革命。他念过私塾，在那班合同工兄弟和船上水手之间，亦可算得上“人不可貌相”的一个秀才。且粗中有细，性格直爽，豪侠仗义，经过对《人民日报》几篇社论文章的一琢磨，就揭竿而起，带头造反，一呼百应，深得造反派群众的拥戴。

“象葛富林这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对翻身解放感受最深，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就因为他爹犯了法，就受压制，遭精简，你们说，这合理吗？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吸收，就象那些当权派一样把他关在革命的门外，那我们造反派同那些当权派，还有什么不同？社会上这样一类的所谓‘不纯分子’很多，其实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可社会就是对他们不公正。

我们就要把这类压制受得最多、革命造反精神最强的人，积极吸引到红总队伍中来，使他们觉得我们对他们很公正，引导他们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一起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现在市委搞的革工联势力这么大，人数几乎要比我们多一倍，我们难道应该为了计较一个勤务组成员的位子，把本来可以拉进来的一大帮子人马推出去？这样斤斤计较，坐失良机，就只好干等人家来把我们挤垮了！”奚大雄在勤务组会议上慷慨激昂。这边列席会议的傅科长，就不失时机地站起来，遥相呼应地念了好几段从江南公司保卫科偷抄来的早期档案鉴定，以证明贪污犯的儿子，在本质上具有很高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继而又从自身保卫科专业角度出发，论述葛富林可以作为革命依靠对象的种种理由。然后又由奚大雄特地搬来的援兵郭贤，滔滔雄辩地作了一个批判肃清反动血统论流毒的专题报告，终于使担心交通系统势力在红总坐大的反对派，在理屈词穷之下，不得不更弦易张，接受奚大雄的提议。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把“石下草”兵团拉入“主力军”，迫使恭鹏志到红总磕头求拜，可以算是奚大雄烧成功的两把火。可是，什么是第三把火呢？第三把火的成堆干柴就挨在手边，顺手扔个香烟屁股就能一点而着，烧个半天红。可是，奚大雄对是不是烧这把火，却前怕狼，后怕虎，心中犹豫得很。拖拖拉拉几乎要过去三个星期了，却还是没有能够作决断，终于使葛富林把不满情绪暴露到了面孔上。葛富林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恼火的。

革命工人造反军是一支完全由所谓的“三工人员”（即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所组成的文革组织；浩浩荡荡有四五万人马。因为“石下草”兵团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合同工，名气响，队伍硬，革工军总部就拼命拉葛富林，并许愿让他去当“副司令”。而葛富林却觉得革反军不上档次，两个头头也不三不四的，难以成气候；而红总好歹是全市第一个叫得响的工人造反组织，正副“司令”都是中共党员，背后又有首都三司驻锡联络站、长征兵团、红旗团等“名牌”革命小将作后援，就宁可不当“副司令”，毅然加入“主力

军”。因此红总如果连个勤务组成员都不给当，是实在说不过去的。幸好红总的主要头头奚大雄对此看得很清楚，在他面前把胸脯拍得“嘣嘣”响。葛富林欲报奚大雄的知遇之恩，就反客为主，倒过来找革反军的头头说项，力劝他们一并归入“主力军”。对方给他说动了心，有意归顺之心与日俱增。他们有自知之明，慷慨表示进红总当不当头头都无所谓，唯一不让的是：红总必须为五万名革反军弟兄争个公道！否则即使归顺了，弟兄们也会散光的。就为了这一条，把奚大雄搞得好为难。红总的下属组织起来干什么？干革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正式工，凡是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有一条，享受一条，雷打不动，坤乾难摇，绝对不需要他们斤斤计较费心考虑的！这是革命的果实，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翁地位的体象征！如果红总要把这些也作为问题来考虑，或是红色江山已经变白了；或是红总背离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红总“白总”已经分不清。然而革反军的工人兄弟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却大部分都享受不到，什么劳保福利退休金，如果他们也要照搬照抄，那共产主义也就不远了。可是这些革反军的兄弟们，却对此不理解；明明要经过几代人努力才能达到的事情，却想借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提前实现。否则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却不能同样享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就以为是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看待处理了，作为资产阶级来剥夺。而按他们的实际经济处境来衡量，他们自觉是整个无产阶级队伍中“最无产”的一部分，却按“最有产”的标准享受待遇，心里的不平与火气，自然就非常地大！革命造反的精神，也就特别地炽热旺盛！这就是为何他们一聚就能聚上四五万人，什么恭鹏志啦，郭贤啊，一个催生婆都不需要。

奚大雄的公路野战兵团里，也有少量的合同工和临时工。对他们在公司里处处低人一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奚大雄也早有耳闻，心里很同情。然而，如果把这类人的经济待遇问题，也作为红总的一个斗争目标，红总虽然因此可以把队伍扩大得跟革工联不相上下，却是否会使红总变得不成其为红总，而实际上成为一个扩大了革反军？但是如果不答应这一条件，归顺之事不仅会告吹，红总还可能失去自己内部一部分合同工临时工的支持；刚刚拉进来的“石下草”兵团受到的冲击会尤其大，并直接影响他们今后的政治态度和走向。这就是奚大雄左右为难，迟迟下不了决断的原因。

而今晚看这葛富林的语气态度，却好象要向他逼宫摊牌似的。他敢这样做，莫非已经争取到了育文庆的支持赞同？奚大雄审视了一下葛富林的脸，又望了望育文庆的脸，开口问：“小育，你的意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的。”一向单纯的育文庆，这一次却耍了一个金蝉脱壳计。是革命实践锻炼了他，还是他确实拿不准主意，而不得不仰仗勤务组组长的智慧和远见？

因为这个问题跟保卫科专业无关，奚大雄没有征询老傅的看法。老傅虽然是红总司令部里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中共党员，却因为他中途“起义”的性质、借用身份及其跟奚大雄出自同一个单位的缘故，并未增选为勤务组成员。因此，私下征询是可以的，当面征求意见却是不够资格的。奚大雄作为一个有多年党龄的组织同志，对这种分寸把握得很严格。于是，他坐下来，作沉思状。近处的援兵搬不动，就只好向远处讨救兵。他拨响了通苏南工学院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正好是锡城市造反派的幕后军师和理论权威马进。奚大雄把同伴的建议和自己两方面的顾虑都向马老师恭恭敬敬地请教了。在他电话请教的过程中，连葛富林的神态，也显得恭敬起来。凭他这种旁听式

的恭敬态度可以肯定：如果马老师在电话里不赞同，他也会心悦诚服地收回成命的。这种反应出现在他身上一点不奇怪。虽然毛主席老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国的卑贱者们受传统的毒害太深重，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已经刮了大半年，人们的思想却似乎还一时扭不过弯来。因此即使革命态度坚决如葛富林，选择归顺哪一个组织时，考虑重点之一，却是哪一边有高等学府的秀才作后援。

他可以对党员司令当面抱怨，对哲学讲师马进同志电话里的高见，却是随时准备接受的。

马老师在电话里说：他对革反军的组织性质和经济诉求早就注意到了，最近还为此专门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他劝红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太拘泥。因为马克思曾说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总是先从经济方面开始的。因此有些经济问题，看来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关键是要因势利导，先吸收进来，然后逐步引导，最终集中统一到更高更远的革命目标上去。

奚大雄听到革命造反派的理论家把共产党的祖师爷都请出来了，混淆不清的思路一经点拨，不由豁然开朗，好象在黑夜迷路时突然见到了晶莹闪亮的北斗星，心中长长舒了一口气。“去，明天就去谈。”他把马老师的意见跟三个伙伴简单复述一遍，终于下决断。

目送着葛富林随着其他两位同伴心满意足地离开他的办公室，奚大雄把身子靠足椅背闭上眼，竭力想把整个思路整理一下。因为他一天下来办完了好多事情，作出了不少重要决定，总觉得好象还忘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事。努力作回想，终于想起口袋里只读了一个开头的那封信来。于是就站起身，关上办公室的门，不走回桌子前，却舒舒服服地坐进沙发里，重新掏出那封使人扫兴的信，从头读起来：奚大雄：你让傅科长转告要我到总部当内勤，我经过反复考虑，觉得实在不能接受；但我深谢你的好意。我现在自觉日子过得很快活。经邱书记的安排，把我调进修理厂厂部当内勤，这跟烧碱水缸比，就好比是天堂地狱之分。我把碱水缸比作地狱，主要是指它带给我的精神屈辱，而不是那里的活有多苦。我已经很满足，诸申、李辉康他们也需要我帮忙。我这个内勤，其实是一身兼两职：上班时在厂部做，下班后就去野战兵团团部。我这人过去见政治特别害怕，现在却把它当作了自己业余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好象是犯了傻。老百姓在盼望着有更好一点的世道时，大概总会变得有点傻。公司里有不少职工也跟我一样。他们下班后好象把家给忘了，又是帮着刷标语，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印传单，劲头十足的样子，好象有人因此给他们长工资或发加班费似的。但你是知道的，只有‘促生产’才有加班费，‘抓革命’是一分钱的加班费都拿不到的；谁让你自愿来干呢？而这些普普通通的职工群众，不象诸申李辉康他们几个头，无论革命造反成功不成功，他们既不会升上几级，也不会降掉几级，这么兴高采烈地忙乎，他们图什么呢？无非就希望看到这世道变得更好一点。而最近一段时期，这世道还真好象在变，老百姓的声音还真有了一点作用。例子之一，我们宿舍楼上终于装了水箱，再也不担心断水了。听说这还是时红霞来了以后下得死命令。

大雄，我从来就称你为奚师傅，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你；因为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我琢磨：要使这个世道变得越来越好，大家都能过得更舒心一点，做人总是要有得有失的。你一下升得这么高，大家对你都有很高的期待。大多数人并不期待你把他们也拉扯上去，他们知道：你就是想这样

做，也做不到。而是希望你能在上面站稳脚跟，能代表下面的人说话。碰上不公道的东西，受了冤屈，上头有人叫得应。而不要象有些共产党的干部一样，一掌权就忘本，就翻脸无情，就烂掉垮掉；到头来普通老百姓还是朝中无人。我希望你理解和尊重大家的这些期待，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做一个叫得应、喊得响的造反派头头；而不要丢人现眼，身败名裂。

我最近去医院探望时红霞了。我是偷偷地去的，没有让咱们一派的任何人知道；连辉康我都没有对他讲。因为我担心他们要是知道了，也许会说我想讨好市里来的大干部。可是我总觉得：同样是个女人，她被打成那个样子，这不公平！而且她压根就不知道你会遭到那样的毒打。在被斗批的时候，她死活都不肯承认指使红卫兵殴打你的罪状。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不相信这一点。我却相信。市里派下来的干部政策性强，是不会允许下面的人这么胡来的。所以我还是去了。可是她见了我却不愿答理，虎着脸不跟我说一句话。临走时，还硬要我把带去的一些营养品带走。倒是她那个当大军官的丈夫很通情达理地把我送出病房，还一再要我原谅他妻子近来心情不好。我能理解和原谅她。就是象你那样应该是心胸宽广的男子汉，还对整过你的人耿耿于怀；作为一个女人，她更有权利怨恨毒打过她的一派人。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我去看过她之后，车间里童年财那些人，看到我时脸上和悦多了。我不敢把这些告诉咱们这一派的人，担心他们会指责我是两面讨好。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不知道你是否也会这样认为？但是即使你这样看我，我也不会改变自己。说实在话，我总觉得：这运动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厂子里的人，见了面却要象冤家对头似的彼此不讲一句话，真叫人觉得别扭。

还有，那次出了医院，我同李辉康一起上餐馆吃了晚饭。他已经邀请过我好多次，我终于决定不再扫他的兴。他对我很好，我也喜欢他。我俩现在经常一起外出，上街贴大字报和逛商店相互结合，还一起看市歌舞团上演的《红色娘子军》，已经看了五六遍；都是他的提议邀请，就为能使我重新回味过去的生涯；没有人再可以说三道四，也没有人再可以把我抓去游街示众。相信这一切，你都是能够理解的。

最后，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情况多跟玉芳讲，不要什么事都把她蒙在鼓里。你既然看在孩子和老人的份上已经谅解了她，就应该让她能享受到一个妻子应该享受到的东西。

永远对你感激不尽的凌漪 1966年12月25日”不知怎么，读完凌漪的信，第一次读信时的那种懊丧，已经不再那么强烈。如果说，凌漪在医院向他所作的匆匆告辞，只是给他留下了重重疑窦的话，现在却似乎一切都已经变得很明朗。而在恭鹏志来之前那一刻，刚读到信的开头一段时，他只领会到一个女人在另有新欢后对他所作的彬彬有礼的拒绝，使他心里无法不感到阵阵刺痛。他甚至有些怪怨老傅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自讨没趣地碰一鼻子灰。第二次细细读完全信后，他才品味出一些更深的意义。他并不能完全捕捉住字里行间那种无所不在而又无法确切把握的涵义，只觉得似隐似现的，又深邃，又厚重。心中所受到的触动和感动，一点不比她以前看到她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时来得浅。她是在责令自己也责令他，必须把某种已经深深根植在他俩心中的东西深深掩埋掉吗？他吃不准。但是至少有一点，他分明可以感觉到：她希望看到他不负众望，有所作为！

我会不负众望有所作为的，奚大雄面对信纸暗暗发誓。

第十八章 灭顶之灾

朱坤兴夫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迎来了他俩的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郊区农村老百姓仍然很看重的男孩，取名叫朱新。这名字是高虹时起的，她觉得这是自己获得新生的标志和成果。小新新仿佛知道外边的世界很热闹，急不可耐地要钻出来，观看热闹的世界有多有趣！但是，他连爸爸妈妈的话都暂时听不懂，对挂在房门外走廊里有线广播中咿哩哇啦的声音，更是一窍不通了！他只能看懂：每当爸爸的嘴巴动了几下，妈妈的嘴巴也就会跟着动几下。有时，两张嘴巴还会贴到一起。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他出生来的这段日子里，他比较清晰的记忆，就是爸爸会把他那毛毛糙糙的嘴巴挨到自己的脸颊上，痒痒地跟他磨一下。妈妈会把她那滑润的嘴巴移到他的嘴巴上，热乎乎地贴上一会，使他觉得心里很舒坦，很温暖。对这两种嘴巴的接触，他是宁可要妈妈的那一种。因为他空有两只小手，当爸爸的嘴巴使他产生痒痒的感觉时，他却还不懂得只要用自己的小手在痒的地方揉一揉，痒的感觉就会立时消失的。他按经验主义去推测，以为爸爸妈妈的嘴巴是专门用来跟他磕碰的，不明白有时何以另作它用，而把他的脸颊或嘴巴冷冷清清地撇在一边？更不知道，爸爸的嘴巴跟妈妈的嘴巴碰到一起的时候，是否也会使妈妈产生痒痒的感觉？只看到妈妈的手，从来就没有过举到嘴上脸上去作搔痒的举动；因此也就难怪新新不懂得搔痒的动作了。新新虽然还非常非常地不懂事，但是有一点区别他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在他小小的眼睛里，爸爸总是在房门口出出进进地很忙碌。新新有时觉得自己包在尿布里的下身，会突然变得热烘烘、湿乎乎的；就通常情况而言，妈妈仿佛在他的尿布里按了了望台，总是会把那带着腥臊味的尿布及时换下来。可是妈妈有时也会打瞌睡。一打瞌睡，那了望台就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那热烘烘的尿布，就会逐渐变得凉冰冰的，使新新觉得怪难受，就忍不住“哇啦哇啦”地叫起来。这时候，如果是爸爸正好在房间里，或者就在房门外不远的地方，就会象听到警报声一样地急忙赶到他身边，很老练地把手伸到他两条小腿的中间摸一下；然后就手脚利索地换尿布。那种动作利索的程度，一点不比妈妈差。妈妈这时也必然会被新新的警报声所闹醒，很羞愧似地揉擦一下惺松的眼睛，嘴巴动几下，弄不清是在表示歉意，还是在夸奖爸爸的机警麻练。然后就见爸爸把积满尿布的脚盆“蹬蹬蹬”地端出去。接着，新新那越来越变得灵敏的小耳朵，就会听到有“哗啦哗啦”的声音传进来。他当然不知道，那是爸爸使用自来水洗尿布的冲洗声。如果天气暖和的话，爸爸还会端进来一大浴盆的水，热气腾腾的；返身把房门紧闭。然后，爸爸就用绞湿的毛巾，轻手轻脚地给新新擦身体，使新新觉得周身的皮肤上面，好象一下打开了好多好多的小窗户，凉凉的空气在这些小窗户中作蹿动，使他感到很舒服。然而，爸爸所赐给的这种待遇享受，却并不是光让小新新一人独占的。小新新的身子擦完了，爸爸在盆子里面又“哗啦哗啦”地倒进一两瓶热水，使房间里的热气显得更蒸腾；随后就开始给妈妈擦身子。妈妈这时的眼神，就会好象把新新完全丢到脑后似的，睬都不睬他，却只管

盯着爸爸看。看着，看着，就变得亮晶晶地，湿漉漉的，跟新新平时所看惯的那双慈和的眼睛变得完全地不一样。然后，两个人的嘴巴有时又会凑到一起，没完没了作嗑碰磨蹭，把小新新完全扔在脑后不理睬。在这种场合下，当新新觉得太寂寞时，就会“哇”的一声用哭来作抗议！妈妈这时好象才得到提醒，意识到受到冷落的小新新，是很容易变得不耐烦的。就急忙悔过性地把她抱起来，把脸盘贴到他的小脸蛋上，嘴里还不时喃喃地说：“哦，新新乖，新新乖……。”

新新并不知道这“新新乖”是什么意思。然而，他自以为自己没有充足的理由，并不随随便便就哭闹。不仅住在屋前屋后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了解他好性子，就连左邻右舍也经常很惊讶地问：“怎么夜里从来就听不到你家新新的哭闹声？”奶奶这时就会很骄傲地回答说：“象他爹！阿坤小时候也是不哭不闹的。”当然对这些评介谈论，新新都是一无所知的。爸爸妈妈在他耳边的讨论，他都听不懂，要捕捉和搞清隔墙之言的含义就更不可能。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也许是一种讨好和表扬，就立即安静下来作为对妈妈的犒赏。一段时间来，爸爸妈妈端详着他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讨论得很热烈。每次讨论的结果，总是使爸爸很丧气。因为迄今为止，在新新的男子汉面貌和本色尚未充分显露之前，他摆到脸上来的所有特征，几乎都只代表妈妈。“我家新新，眉清目秀得就象一个女孩子！”连奶奶姑姑都这样认为，都觉得他除了性别和年龄不同，活脱就是妈妈的一个翻版。爸爸在身上唯一留下的鲜明记号，就是他不哭；或把夸张的成分去掉，实事求是地作评介：他极少哭。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爸爸一生下来就有的禀性；他不加思索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使得爸爸失衡的心理，多少得到一点补偿和平衡。而对这一切，新新其实是懵懵懂懂的，老是缺乏透彻的理解。他的视力和听力虽然突飞猛进，但是在语言接受和理解的能力方面，却显得很愚昧，很迟钝，连起步都谈不上。出生有三个多星期了，他仍然只知道爸爸妈妈的嘴唇在动，为什么动，动什么，他还是一窍不通。可是有那么一个晚上，他却看到爸爸妈妈的嘴唇，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动也不动。两人半躺在被窝里，上身靠着床背，把新新安放在两人中间，连身子都不挪动，屏息敛气地干坐着，把新新闹得很疑惑，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安分守己，好象就因为新新很乖，他们也必须表现出同样的乖来，否则就没有资格当他的爸妈似的。他不懂得，爸爸正伸长耳朵，在聆听走廊上“麦克风”里传来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妈妈看爸爸听得怎么仔细认真，自然不会拨动嘴唇作干扰，自然显得象个安分守己的旁听生。而在新新的耳朵里，那从房门外飘进来的广播声音，虽然没有妈妈哼的催眠曲那样好听，使他昏昏欲睡的效果，却一点也不逊色。他睡着了；一天下来虽然什么事情都没做，却也感到很疲惫。这人间，这世界，这周围的新生活，一清二白的东西极少见，不明不白的情况却睁眼就是，总是把他搞得昏头昏脑的；还是那些情节简单而有趣的梦境，对他更有吸引力。而使新新昏昏欲睡的电波，此刻却不仅是震响在房门外走廊里的有线广播中，也在神州大地上空到处激荡回响：“……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起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还散布谣言，把他们暗中所做的这些坏事，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给革命派带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们继续妄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

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

“正当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时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向群众作检讨，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革命群众平反，不肯当众销毁那些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扬、秋后算帐论’，扬言还要把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处理。这种论调，就是要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算帐的、秋后算帐论’是吓不倒革命群众的。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又对党，对革命群众欠下了一笔新帐。革命群众对于这笔帐，是一定要算的。”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他们闹得越凶，就越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到非起来揭露和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到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两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提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是：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要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极少数人，他们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他们表面上关心生产，其实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是保存资产阶级的旧东西，害怕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当着群众起来的时候，他们竟然挑动一些暂时受了他们蒙蔽的群众，停止生产，来对付革命群众。……”“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要打破清规戒律和那些束缚革命的条条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就在朱坤兴在老婆的陪同下，逐字逐句地，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时，东巷市委常委楼各家的收音机前，市人民大会堂隔壁的红总司令部里，苏南工学院学生教工的宿舍楼里，大门口有两头威武的石狮把门的总工会革工联总部内，锡城市驻

军司令部的家属大院里和靠在太湖边的小别墅里，市货运公司公路野战兵团的电话机旁，还有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耳朵边，都回响着同一个声音，激荡着同样一个主旋律：“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高虹时看着丈夫听得那么全神贯注，不忍打搅他，就移掉了披在身上的新棉袄，管自滑下身子，卷缩到被窝里。她的实际文化程度虽然不比丈夫低，中国大多数妇女对政治的本能性淡漠，使她以为这个《元旦社论》实在同自己毫无关系。她错了！就在这《元旦社论》响过后的几天里，也就是在她“坐月子”的最后一周内，朱坤兴突然又变得早出晚归，甚至夜不归宿；因为她的分娩而收敛降温的革命热诚，似乎又在他的身上熊熊燃烧了起来。要知道，她可还在月子里啊！什么叫“月子”？将来的年轻人可能会对这“月子”两字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他们不懂的，旧中国的妇女，一生一世有多辛苦，有多劳累。在一般情况下，唯一能够使她们得到一个喘息机会的，就是在这她们养孩子后的短暂三十天里，只要条件许可，就有权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也不知是从那个朝代传下来的规矩和经验，产妇在这一个月里，风是吹不得的，头是洗不得的，路是走不得的，话也尽量少说为妙。洗洗补补之类的家常活，更不能沾手；否则就会注下毛病，年轻时感觉不到，岁数一大，立即显原形！

只要家境不是特别地艰难，这一传统规矩通常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贯彻执行。朱家村的人们，和朱坤兴的一家，对此当然也是深信不疑的。幸好新新不是出生在大暑天，否则一个月里不许吹风不许洗头的禁令，会使高虹时在品尝到传统的优待时也品尝到传统的坑害。朱坤兴的父母本来就年老体衰，一直有儿子儿媳作照顾；当然不可能因为添了孙子，就返老还童，老当益壮，按老传统的标准倒过来服侍照料儿媳。而丈母娘有顶地主婆的帽子，要来婆家照顾女儿，待各道手续报批下来，女儿的三十天月子可能早就结束了。朱坤兴又是孝子，又是贤夫，就不能不把革命热情暂时收一收，在家调休请假几乎有半个月；随后仗着科里同事们的理解和原谅，总是在上班方面迟到早退，一心一意把弱不禁风的产妇服侍照顾好。前一阵子因未婚先孕和地主家底的暴露所造成的生活阴影，因为人们的见怪不怪和习以为常，已经越来越淡薄。丈夫体贴入微的照顾呵护，阿公阿婆的尊重喜欢，再次使高虹时感到无限地甜蜜和幸福。可是，就在《元旦社论》发表后的第五天，同母亲“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高远叔，却破天荒第一次突然出现在她的新家！他是阿坤把他请来的，说是受她娘的委托，要把她接回娘家将息一段时期；还说村里的惠娟等一班姑娘怪惦念她。高虹时也一直在心里惦着娘，梦里常相见，梦醒心惆怅。可是一想到娘在村里的处境，就犹豫。高远叔已经看出她的心事，就笑呵呵地宽慰她：没事！高金福带着一批农民造反军回乡造反，已经把戴洪发掀下了台。高金福过去对他就不错，最近更是发挥他摇笔杆的特长。造反军发的“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三号通令”……都是出自他的杰作，还说要给他搞“甄别”。

高虹时听到这些最新的家乡发展情况，自然很高兴；就同意月子一满，便回家见朝思暮想的娘亲。可是，高远叔却主张当天就动身。高虹时听不懂，转首看阿坤。阿坤不看她，却在翻箱倒柜地找衣服。问他找什么衣服，身上不是穿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想到还要找衣服？他不吭声，两眼很惭愧似的，老是躲避她追赶着的眼光。高远看着前地主婆兼右派老婆的女婿很窘迫的样

子，很同情，决定代他作解释说服工作。谁知，他的解释说服工作并不见成效。

“厂里有这么多革工联的人，少了你一个就不行了吗？”高虹时第一次感到不幸福了！

阿坤象做错了事的大孩子，喃喃地解释说：“上次体育场开誓师大会时，第一把手给他们打得趴瘫不动了。作为第二把手，我上次开会没有去，这次还不带头，其他人就更不会动了！”他在老婆面前，并没有把关厂长的考虑也亮出来。关厂长说：阿坤啊，你在底下是有影响力的。如果大家知道你老婆在月子里，你也照样上北京，就会有更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要把那些乌龟王八压下去，这是最后一着棋了！去吧，共产党的江山保得住还是保不住，成败在此一举了！国家变了色，你老婆，你孩子，我老婆，我孩子，都要遭难受苦！你是已经尝到过一点滋味了，我不说，你心里也亮堂。朱坤兴对关厂长这些在情在理的话，能够置若罔闻吗？

高虹时不响了。他知道丈夫不善言词，虽然是短短几句并不十分有力的解释词，相信他肚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只是没有能够充分表达出来。于是就让步，就改变态度，就打破月子禁令，亲自爬起身来，翻箱倒柜地为丈夫积极地准备起行装起来。在她心目中，北京非常非常地冷。她不能忍受阿坤在告状途中挨冻受苦，心中直懊悔没有借着“坐月子”的空闲，把以前给他编织了一半的粗毛线衣及时赶出来。随后，她又产后首次跨出房门，进厨房给阿坤炒他所喜欢吃的花生米，说是带在路上可以充饥。婆婆听到厨房间里突然有响动，走出房间一看是还在“月子”里的媳妇在炒花生米，不由大惊失色，连连惊呼道：“哎呀呀，你那只手臂肩膀不要了！你那只手臂肩膀不要了！”按照婆婆所相信的逻辑，她那炒花生米的手臂这样一用劲，那只用劲的胳膊连肩膀，年纪大了就一定会抬都抬不起来。

阿坤也闻声赶出来，夺下她手中的炒铲，心疼得不得了。

那老母亲问清原委，气得对着儿子破口大骂起来：“我看你这是吃昏了头！告状，告什么状？共产党那一点亏待你了？不领着大家在厂里干活，却要上北京兜风去！北京尽是西北风，没有你的好果子吃！老婆还未满月子，你倒真摺得开！大胖儿子给你养好了，你心定了，马上可以翻脸不认人了！就赶她回娘家！你这不是丢咱朱家的脸吗？……”朱坤兴面对老娘不伦不类的指责训斥，直觉得是秀才碰上了兵，有理说不清。关厂长那些有关老婆孩子都要遭殃的理论，在这种当口好象一点都用不上。一扭身，象大孩子耍脾气一般地，走向自己房间里。那老娘却跟踪追击，也跟进房间。一看床上摊着几件衣服，二话不说，裹起来就往自己房里走。

高虹时也学着公婆的模样跟踪追击，跟进了阿婆的房里，完全无视公婆维护自己的一片好心，反而帮着丈夫说起好话来。公婆气呼呼地就是不吭声，免得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气忿话冲出口，得罪了媳妇。

这时门口却有“嘟嘟”的汽车喇叭叫声传进来；随后，就有阿坤厂里的革工联同伴推门闯进来。见朱科长同一个陌生男人面面相觑地愣在房间里不作声，就惊呼：“哎？大家都在厂里干等你，你却干巴巴地愣在这里！总部接连打电话来猛催，五点到总工会门口集中，七点跟上海下来的工人赤卫队在锡沪路口汇合；人多势众，一起上北京告状去！走啦，快走。

关厂长让我们开车来接你。听说红总已经派人在封锁路口，如果小股分散走，会吃他们的亏！”

朱坤兴硬着头皮根，走进娘的房里，呐呐地说：“娘，你都听到了吧，不是我自己想去，而是关厂长的意思。”他娘一听是关厂长派人来请佛，情知是拦不住儿子的了。却不愿下脸改口，就骨嘟着嘴抱不理不睬的态度。朱坤兴看着娘不说话，知道她不会再顶牛，就上前从她手里把衣服拿下来，悄声说：“娘，你保重身子，照看好爹。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说完就走向自己房里，把那一身球衫球裤和一个棉背心穿到身上；把供替换的内衣内裤塞进一个挎包里。那挎包满满实实的，高虹时在里面放了毛巾、茶杯、牙刷、手套，还有那一大包余温未息的花生米。朱坤兴走到儿子面前，端详了一下那张清秀的小脸蛋；想把自己的脸凑上去，却担心弄醒他，就忍住了。然后回视在月子里养得白白嫩嫩显得分外娇美的老婆，很想凑上脸去跟她亲一亲嘴，却担心外面等待着的伙伴会透过房门看到他的这一举动，就很坚毅地忍住；只是用两个大手掌把老婆的脸庞抚摸了一下：“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我这也是为了你俩。”他把关厂长的意思，最终用自己的语言极简单地吐给老婆听；他相信，只有老婆能够理解他。

出门时，他只是跟高远简单地道了一声再见，没讲更多的话。因为按他所谈的有关情况，他觉得高远好象是属于农村中的造反派，这就一下无形中拉大了他跟继丈人之间的感情距离；而并没有来得及细想，在西塘下大队，只有造反派才可能去揪戴洪发。

汽车的马达响了。凌厉的寒风，把车厢上的人都吹得缩头缩脑的，恨不得把整个身子躲进黑色的棉工作大衣里去。然而，突然响起一声尖利的喊：“等等！”只见高虹时一阵风似地跑出来，把一条灰色的长围巾递给朱坤兴。然后退回到屋檐下，眼怔怔地看着车轮慢慢滚动起来，把他丈夫载往前途茫茫的革命征途上。

高远看了看远去的卡车和车轮扬起的灰尘，什么话都不说，弯腰从地上捡起用手帕折叠结打成的一个圈，递给高虹时；那是她按当地人习俗原来缠在额头上挡风的，刚才追出屋子时丢落到地上都没有意识到。阿坤的母亲赌气似地呆在房间里不出来。直到车子开走了，才赶出来。儿子没看到，却一眼看到了站立在寒风中的媳妇。不由气急败坏地叫起来：“你还要不要这身子了！偏头疼，酸腰腿，都会找上你！”说着，就打架似地扭住媳妇的身子直往家里推。高远看着这个走路都显得有些颤颤巍巍的老婆子，有些惊异：从什么地方她会陡然冒出那么一股劲来？

《元旦社论》一出来，革工联、大中兵天天被骂成“保皇派”，几个头头一合计：大势所趋，必须调整策略，改变形象，决定元月五号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陆书记听恭鹏志作汇报，大手朝桌子上一拍，连声叫好：“革工联的同志有水平！他们看准了形势，转被动为主动，市委要全力支持。我到时亲自带阵，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通知市常委的所有人，除有特殊情况，一律出席，接受批判教育。”

通知发出了，大会就要开始了。位居市委大院河对面的体育场内，红旗如海人如潮；战歌嘹亮声震天。十万余名革工联的战士，欢聚一场，同仇敌忾，决计向蒙蔽欺骗他们的旧市委也来开火！可是别以为他们是在跟造反派依样画葫芦。不是的，这是一种革命力量的显示，目的是要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市七十万革命人民，告诉主席台上接受批判的市委当权派，也告诉那一伙气焰嚣张、几乎得意忘形的造反派：在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九六七年，在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

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新一年，革工联不会销声匿迹，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相反，它将仍然叱咤风云，在锡城市的文革戏台上，扮演主角，推出一幕幕威武雄壮声势浩大的革命活剧来！

然而，全市七十万革命人民的组成成分很复杂；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已经深受红联指、红总（通称为“两红”）的毒害影响，认定革工联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的；是用来对方革命造反派的；是市委组织起来保自己的“御林军”。《元旦社论》为其敲响了丧钟，这十万人大会，不过是回光返照，死猫断气前的一跳。而红总那伙人，更是气急败坏：怎么，革工联也起来革命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赵七爷把辫子盘到头顶上，也算是起来维新革命了吗？他们这种气急败坏的心态，好象革命造反和批判资反路线，是他们的独家专利似的！这些本质上跟具有浓重流氓无产者习气的跟阿Q很相似的造反派们，很担心赵七爷和胸前挂着革命党“银桃子”的假洋鬼子，一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就会把他们这些道地的“革命造反者”送上断头台。而且夏天才刚刚过去，“秋后算帐”的论调就在全市各个角落到处流传。虽然在六六年的秋天，看来是已经来不及拍算盘了，但是六六年以后还有六七年；六七年以后还有六八年……。“有帐，总是要算的！”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人背脊发凉，记忆犹新，绝对需要把一切可能导致“秋后算帐”的趋向和迹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于是，大会尚未举行，红总要派人来冲击“赵七爷”和“假洋鬼子”会场的风声，就跟着“呜呜”作响的西北风，在锡城市内到处流传。同红总建筑工搬运工为主的组成成分形成鲜明对照，革工联的主力队伍基本来自名声响、待遇高的机械行业和重工业行业。因此大会一开始，由来自这些行业的青壮年所组成的近千名“工人纠察队”，便在会场外围穿梭巡逻，严阵以待。最使革工联失望的，是恭主任满口答应的、据说得到陆书记全力赞同的市委出席批斗人员，竟然一个都没有到场！唯一到场的，却是低了一个档次的恭鹏志。而且，他也不是到场接受批判的；以他的级别，想挨批也不够资格。他是前来通风报信的：陆书记来不了了！其他市委领导也来不了！

“为什么？”革工联的头头吃惊地问，语气里的愤怒很明显。恭鹏志脸色发白，却取下眼镜来，用手帕拼命地擦镜片上的灰尘。体育场内风沙大，他这一动作并不是装模作样的举动。却可借着这一动作，在回答上述愤怒责问时，双眼不去直接面对对方涨红的脸孔和冒火的眼神。他用非常非常低沉的声调说：“今天一清早开了紧急常委会，陆书记的主张被大多数常委否决了！”

又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为什么”，几乎是在场的几个革工联的头头，同心协力地喊出喉咙口的。恭鹏志觉得自己的耳膜在“嗡嗡”叫，脑子里也在“嗡嗡”叫。到底为什么？他本人也是又理解，又不理解。常委会作出的决定主要有三条：一是对照《元旦社论》的精神，革工联、大中兵前一时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市委只支持他们向革命造反派靠拢，而不是继续唱对台戏。二是市委谈判代表已经同红总红联指达成协议，今后市委一切重大举动，都要与其通报协商；而“两红”认为这个大会是意在接过革命的口号，达到继续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的目的。市委领导如果出席大会，就要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责任。三是这样的大会，能取消就取消；不能取消就以“缺席批判”的方式赶快结束掉。今后要开类似的会，一定要跟市里的两个主要造反派组织作商量，联合起来一起开。这三条东西，

恭鹏志无论是公开其中任何一条，都将是爆炸性的，都不啻是对责问者的一声晴天霹雳！都会是一把直插他们心脏的尖刀！面前的这几个头头，相信他们受党那么多年的信用培养，这声霹雳炸响在他们的耳边，眼泪会“哗哗”地流，但坚强的党性原则，会迫使这些眼泪只朝喉咙里头涌；这把使人意想不到的尖刀插进他们的胸口，殷红的鲜血会汨汨地流淌，对上级组织的无限信赖和忠诚，会迫使把流淌的鲜血咽入心中！可是，这广场上的十万大军，十万个同样受党信用培养的头脑，十万颗同样无限信赖和忠诚的心灵，他们就是听从了党的动员和指挥，才集合到一起，组成使他们觉得又光荣又自豪的革工联和大中兵的！可现在，这革工联大中兵却好象突然变成了一双肮脏的、受人鄙弃的破鞋，一下要被党扔到垃圾箱里去，他们也会跟他们的头头一样忍受吗？不！绝对不可能！他们决不会让眼泪和着鲜血，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咽进肚子里去！他们会觉得被欺骗，被出卖，被愚弄。老老实实听党话，跟党走的人，竟然不再有资格得到党的支持和信用。一开始就处心积虑跟党作对与党捣蛋的人，党却从此凡事都要同他们商量。既然如此，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逆来顺受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呢？他们也许会象一个受到引爆的火药库，一座在冥冥沉睡中蓦然苏醒的活火山，刹那间天崩地裂，山呼海啸！而这座在全省工业产值首屈一指的苏南重镇，也许会在这一迸发中，成为一堆废墟！恭鹏志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的心里，好象也有一把尖刀在搅动；那种痛楚，使他在说话时，声音虽然没有变得颤抖，脸部的肌肉，却显得有点走样了：“市委领导只安排我通知他们不到会的消息，没有责令我向你们通报常委会的内部讨论情况。”

这样一种回答，比任何一种回答，都使革工联的头头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恭主任，我们不难为你。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经得起考验的！”讲这话的，是“大中兵”的头头、原苏南工学院学生会主席邵敏。听得出来，这个姑娘凭自己的敏感直觉，已经想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因此那语调，明显带上了颤抖声。其他几位，也很恳切地说：“对，我们理解你的处境；也不怪是你当初把我们组织动员起来的。但是，至少你要让我们现在心里有个底。这样，我们也只好对下面的人做工作。”

恭鹏志的鼻子发酸了。多么通情达理的声音！他望望主席台，作为体育观礼用的主席台，又雄伟，又宽敞。主席台上，有个草绿色棉军大衣的年轻人，正指挥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他又看看广场上，广场上黑压压的人头，满天星星一般的红袖章，那一张张的脸孔，显得那么沉静和镇定。按原定开会时间，已经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但是这些等待的人们，没有喧哗，没有吵闹，没有责问，更没有起哄；而是规规矩矩地，安坐在垫着报纸的场地上，只是一个劲地跟着台上的指挥唱语录歌，唱了一首又一首。这就是革工联，有组织，有纪律，对上级对领导绝对地相信和服从。在酸酸鼻根的带动下，恭鹏志的眼眶开始潮湿起来。

他觉得：如果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还对面前的几位革命同志打埋伏，不要说是革命性和阶级感情，恐怕起码的人味都丢失了，终于把情况原原本本地讲出去。大家听完了，并没有显出恭鹏志所预想、所期待的震惊；他们好象早就预计到会有这一天似的。是的，恭鹏志当初所物色的这些革工联的领袖，都是锡城市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类拔萃的人。他们不乏预见力，洞察力和分析力。新的《元旦社论》一出来，他们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所以组织召开这样一个批斗自己所敬重的市委领导的大会，也就是建筑在这样一种预感

基础之上的。然而他们却发觉：使出这一招，似乎已经为时太晚了！市委领导已经走到他们前边去了，把他们远远地甩在屁股后；这是他们所没有预料到的。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了……”广场上的十万人大大合唱，震天动地，在他们的耳边轰响。隔着那条护城河，隔着那堵高大结实的围墙，隔着市委办公大楼紧闭的窗户，相信那里的市委当权派们如果有心倾听，也一定能听到这昂扬自信的歌声。主席台侧这几个人，此时都不开口，都好象很专注、很投入地在听这首毛主席的语录歌。在一曲终了，重起一曲的间隙中，一个出自总工会系统的革工联头头闷闷地说：“问题是，我们怎么向十几万名同志解释交待呢？”

“不要解释交待了！我接受大家的批判帮助来了。”突然间，一个宏亮的声音，从他们的身后响起来。大家猛转首，发觉陆书记由两个年轻人陪同着，奇迹般地从主席台侧的小门里走出来。那小门背后，是田径场的四百米跑道。顺着那跑道边朝东走上五六分钟，出体育场的后门，过大桥，再拐弯，再走两三分钟，就是市委的大门。“把牌子给我拿来啊，没有牌子我可不好登台表演啊！”陆书记咋咋虎虎地叫嚷着，兴高采烈的模样，仿佛是他重新登台演在解放区演过的花鼓戏。

站在这主席台侧小门前的一小圈人，心里都长长地松口气。是的，我们应当相信党，任何时候都不怀疑，不动摇。宣布正式开会的喇叭声音响起来，此起彼伏的革命口号喊起来，标着“锡城市资反路线总代表陆波”的黑牌挂起来……，恭鹏志也觉得心中松了一口气。陆波在就要迈上主席台台阶的一刹那，转身对恭鹏志嘱咐道：“你先回去，碰到老俞武遥他们，就说我代表我个人，不代表市委参加这个斗批会！这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良心。”

恭鹏志闻言很感动，动情地望着老陆波要求道：“就让我陪你一起上去凑个数吧。”

“不，你上去挨斗，不利于保存这支队伍。只有把我搭上才有用。回去告诉老武，既然他与红总已经建立了联系，就应该利用这种联系坚决阻止他们来冲会场！”

恭鹏志退出会场，退出田径场，退过桥，一直退进市委大门。一边退，心里对陆书记升腾起的那股子敬仰之情，一边在不断地消退。因为在退的路途上，他看到好多好多红总红联指的人马，已经从四面八方围集到体育场附近的马路上。更使他触目惊心的是，在冬季变得水波浑浊的护城河里，浩浩荡荡地，有首尾相接的船队奔驰而来。那船头船尾，不仅高高飘扬着江南航运公司红总“石下草”兵团的大旗，还飘扬着附近锡山县农民红色造反军的旗帜。这些陆上水上的队伍，陆波刚才进入会场前，难道没有见识到或眺望到吗？恭鹏志还听到了安装在船队上的高音喇叭，在反复宣读勒令革工联立即撤出体育场的“最后通牒”。两军冲突的阵势已经摆开了，陆书记要武遥阻止红总的行动，是否有给人出难题的味道？如果他想全力阻止这场迫在眉睫的大冲突的话，更有效的方法，也许不是让武副书记劝红总不要来，而应该凭他的个人威武和影响力，劝导革工联和“大中兵”迅速撤离会场。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借他恭鹏志的嘴，对内声明他是代表个人出席批判会；对外却造成他代表市委接受支持革工联的印象，从而使市委前两天跟造反派方面

达成的协议，成为一纸空文；使武遥跟奚大雄打交道时，处在一种尴尬的失信位置上。陆书记今天的这种自行其是，不仅使武遥在造反派面前变得很被动，也会使整个市委变得很被动。恭鹏志虽然在感情上绝对地倾向革工联，可是他并没有被感情蒙蔽搅乱理智，这是他的一大长处。他感到深深地忧虑起来。因为这是第一次，他看到市委把内部的意见分歧公开捅到了市民们的面前。恭鹏志回到市委大院后，对而后体育场里发生了什么，已经无法知道第一手的情况了。他只知道半个多小时之后，自己被红总建筑兵团的一批精兵强将簇拥着，受市委常委会的指令，再次返回到市人民体育场。这个常委会议，是武遥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听了恭鹏志的汇报后，临时建议紧急召开的。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常委们的支持。

对陆波不顾市委常委会决定擅自出席革工联的批斗大会，武遥很震惊。这样做，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后果，任何一个具有起码政治头脑的人都能一眼看明白：一，是使本市两大对立群众组织之间，矛盾冲突更激化；二，使市委同红总红联指之间已经得到改善的关系，重新恶化。而为了改善同这一派造反组织的紧张关系，武遥作出了艰巨的努力。首先，当然得感谢奚大雄在释放俞彦一事上，率先作出了善意的姿态，赢得了俞市长的好感。如果不是受到了常委会中俞市长一派人的暗中支持，武遥的努力，是既无法开始，也不会有任何成效的。而无论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还是为了稳定局势，继续发挥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与成员人数和同情支持者几乎占了本市一半人口的造反派组织建立沟通渠道和合作关系，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仍然按着老框框，老把这些人当作一小撮牛鬼蛇神来对待，一心想靠革工联的力量把他们压下去，由此引发的冲突，可能会使已经失控的形势变得更混乱。

武遥很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新来者，单枪匹马，能在市委一班人中起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力实在太有限。幸好市委常委会中至少有一半人已经意识到：短短两三个月，在群众中一下子会形成数量如此众多的造反派，单纯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兴风作浪和唆使煽动来理解，是怎么也解释不通的。那么多群众，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存有这么深的怨气和敌对情绪，借着革命造反的形式，一下如火山迸发地爆发出来，其涉及面之广、程度之激烈，确实出乎他们意料，使他们感到震动，也促使他们深思和反省。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共产党所作的一切，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并不谋求任何自己一党的私利。然而，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上上下下都做得很好，又怎么能理解，会有这么多的人一哄而起的出来造反呢？再说，如果毛主席觉得他的指示真是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落实，又何必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有理”呢？事实上，假如各级领导都按照共产党的宗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恭恭敬敬地做人民的勤务员，同人民群众保持鱼水相亲、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随便哪个人发造反号召，都不见得就会有人响应。革工联的情况，对此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相对而言，各级党组织领导同革工联所代表的那部分群众，是保持了比较紧密的联系，所以文革开始以来，不管风吹浪打，他们总是毫不动摇地站在党组织领导的一边。遗憾的是，他们毕竟只代表了另外一个百分之五十。就这百分之五十中，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他们也许并不觉得自己单位的领导就是合格的人民勤务员，而不过是按照十几年来来的政治经验和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认定“犯上作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他们参加革工联，或者站在革工联的一边，不过是想吃好果子罢了。同

时觉得那些不想吃好果子的人，或者认为可以通过“犯上作乱”吃到好果子的人，愚蠢得很！而他们作为聪明人，当然是不屑同愚蠢者为伍的，如此而已。“如果这样一分析，难道我们不应该出一身冷汗吗？”武遥对常委们说。“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把另一半市民的拥护支持丢掉的呢？如果没有文革这样的运动，使这一半群众的不满和怨愤得到如此充分地暴露，而我们的自我感觉还老是挺良好；就这样浑然无知我行我素地干下去，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另一个百分之五十，是不是会变成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九呢？到那时，会不会出现一场更厉害的大造反，把整个共产党的政权推倒呢？而按照毛主席老人家近年来所作的历次讲话，他几乎断定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就不得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真正把人民利益看得重于一切的共产党人，难道应该害怕这种揭露，并把这些敢于站出来揭露的人，视作毒蛇猛兽，必欲斩尽杀绝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同他们沟通对话，从他们那里找到改进我们工作的启示和教训吗？”这些话，是武遥在市委常委会上所作的发言；在与常委们所作的私下交谈中，他也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观点，并显然得到了共鸣。以这种共鸣作基础，通过恭鹏志的再次接洽，他和奚大雄很快就碰了头。

然而一碰头，武遥就发觉：沟通和合作这两个词儿，听起来很吸引人，真要实行，却非常地难。奚大雄说：红总欢迎市委转屁股，改变过去一边倒支持革工联的政策。根据《元旦社论》的精神，革工联和大中兵是资反路线的产物。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斗争目标，不是批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对抗红总红联指，妄图阻挡压制群众起来革命造反。

市委如果真心实意地要同资反路线划清界线，造反派所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市委必须撤销对保守派的支持，解散革工联和大中兵。

第二条，根据去年10月6日张春桥在北京十万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所宣读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凡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红总要求市委责令下属各级党组织，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精神。奚大雄还特别强调：《红旗杂志》在去年11月发表的第十四期社论中明确指出：“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而现在不少基层单位领导采取了转移黑材料、一心要想向造反派秋后算帐的立场。市委对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所有在文革初期整的黑材料被当众销毁，不留尾巴！

第三，对于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革命造反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不允许用解雇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已经解雇的必须重新招回原工作单位，并一分钱不少地补发工资。

对于在五八年为分担国家困难而下放、如今重返原单位的“三工人员”，应该转正。对于不属于原下放人员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应该本着同工同酬的原则，与正式工享受同等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

武遥把这三条要求细细一研究，觉得只有第二条要求经过努力可以得到。而对第一条和第三条，则诚难答应。市委不能在犯了拉革工联一派打红总一派的错误后，又反过来犯拉红总打革工联的错误。毛主席一贯强调紧

紧依靠群众和干部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任何排除、压制这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大部分人的做法，必然不利于革命的根本利益。几个月的文革经验和教训，对此已经作出了明示！最有利的做法，是市委出面做工作，使两派逐步消除对立情绪，缩短思想距离。在革工联方面，不要因为红总的组织成员有较多的缺点、错误或者历史问题，或者出身不硬，总把对方看作是“二等公民”，右派翻天；而要承认他们本质上是要革命的，在文革中代表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主动向他们靠拢。而在红总方面，不能因为对方曾经压制反对过自己，就不给他们改正错误和重新革命的权利。如果两方面都不揪对方的小辫子，而是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避免前一阶段的混乱局面，使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正规。至于第三条，因为涉及经济问题，不仅政策性很强，而且关系到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这方面涉及的情况面广量大，几次开会讨论协商，红总都专门组织人员现身说法，控诉“三工人员”所受到的各种政治经济歧视和不公待遇。某些极端的情况事例，使武遥也深感同情和震惊。因为他是抓宣传工作出身，一旦察觉到党所宣传的正面思想同基层实际情况存在很大距离，党要让人们所相信的，同人们实际上所感受到的，出现尖锐的矛盾冲突，就显得有些神经过敏。他觉得以前在自己领导下所作的是那些政治宣传：什么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使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真正享受平等的权利……，等等之类，在那些控诉面前，都好象变成了一种挖苦和讽刺。正是这种脱离实际的宣传，使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这一社会阶层愈加怒气冲天。如果我们讲明实情，说明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企业需要有一部分可以灵活安排的流动性就业成员，并且在政策上，对这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经济的总体发展作出了更多牺牲和贡献的社会成员，给予较多的重视和关心，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给他们以必要的利益补偿，并把尽量缩小他们同正式职工之间差距，作为缩小“三大差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种种问题和怨恨，也就不至于日积月累，象个炸药包似地捱到文革运动中来这么一个总爆发！

几轮“马拉松”式的谈判折腾下来，在这第一条和第三条方面，双方距离无法拉近。奚大雄通过许洪元，许洪元再通过恭鹏志，绕着圈子向武遥透底牌：在第一条上能否让步，主动权不在红总这一边。只要革工联仍把红总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来对待，心底里始终存着“秋后算帐”的念头，红总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势不两立、有你无我的态度。在第三条上，奚大雄也知道按国家目前的经济条件，要让大批的“三工人员”转正确实有困难。但是红总刚刚合并了几万名革命工人造反军的“三工人员”，如果不为这些归顺者争取得一点合法权益，不仅对红总的领导层会构成很大压力，如果革造军因此而重新分裂出去，对市委日后也许会造成更大的政治麻烦！因此必须使红总在这方面对他们能够有所交待。

武遥得到奚大雄的传讯，就同主管经济和生产的俞市长商量对策。正商量间，杨玲打来电话，说家中来客人有要事相商。武遥从来没有在妻子那里接到过这种含糊其词的电话，追问客人的名字，电话中却已经换了说话的声音。武遥一听，说了一声“我马上到”，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对俞市长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他们派人找上门来了，我会力争最好的结果。”说完就匆匆告辞了。

武遥在家中不仅见到了王小燕，还意想不到地见到了马进。杨玲告诉他：正在跟两位客人谈孙趋孙晨菲父女俩双双去世的事情。杨玲也许是有意

当着客人的面，向他通报这样的谈话主题。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要想把原来的话题继续下去的话，杨玲并没有这种通报谈话内容的习惯。马进、小燕登门拜访，明摆着不是来讨论这一对父女的死亡问题的。杨玲很清楚这一点，却还是死扣着那样的话题，唯一的解释，就是有意想给客人以某种难堪。因为她以前就在武遥面前说过：对她的学生的死，工学院的造反派也有一份难以逃避的责任。当她知道孙晨父亲在放出牛棚后，得知唯一的爱女已经先他而去离开人世时，就用剃胡子刀片割破了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自杀身亡，她曾经恨恨地对武遥说：“我再也不愿在这个家中见到王小燕！”可是，尽管她不愿再见到丈夫故去战友的女儿，人家还是不请自来了。以她的身份，按照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她能做什么呢？她当然不能象一个撕得破脸皮的乡下村姑那样，用笤帚把不受欢迎的客人扫地出门。因此她就用这种方式，来变相地表达她的抗议和谴责。她甚至都不愿在电话里提“王小燕”的名字，仿佛提一下这个听上去蛮清新可爱的名字，就会脏了她的嘴巴似的；因此当时就让王小燕自己接过电话，用“武叔叔”的称呼来自报身份。

武遥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小燕这样称呼他了，心中有些感慨：革命既能把人与人的关系拉近，又可以把人与人的关系隔远！是革命，促使他把王小燕的父亲看作自己恩深义重的兄长；也是革命，如今却使他的妻子把这位兄长的女儿视为冠仇。他一进门，看到一向礼貌周到的妻子，竟然连茶水都没有沏上，就知道这屋子里的气氛，是极不和谐的。疾恶如仇，这就是妻子的品格个性。她从来是这样，连对俞市长的儿子也不例外。如今，她又把这个性发挥到了小燕的身上。可是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小燕恰恰也是一个疾恶如仇的女性。同气不相求却反而相斥，谁应该真正接受这种讽刺，和承担孙教授及其女儿死亡的责任呢？武遥常暗以为自己可以算个“半瓶子醋”的思想家，可是在这个突然冒进头脑里来的问题，却茫然不知所答，终于觉得自己不应该被这样一类问题所纠缠，因此就立即甩开这念头，和颜悦色地对着两位不速之客，胸有成竹地问道：“你们一定知道这几天市委同红总所进行的接触和协商了吧？”

“我们就为这个来。”王小燕不仅是作认可，而且似乎是在向偏好死人话题的杨玲提抗议。马进接口说：“确实，从你们双方接触一开始，我们就始终跟红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对于市委领导的想法和苦衷，其实我们也理解。相信你们对奚大雄他们的想法和苦衷，一定也同样能够理解。如果彼此都能相互理解，那就应该离达成最终谅解不很遥远，你说是吗？”

武遥很高兴来客开门见山的态度，就爽快地说：“我刚同其他市委领导在商量。市委的底线是：我们可以承认红联指和红总对锡城市文革所作的贡献和主导地位，但是一定要保留革工联和大中兵的革命权利和组织。毛主席一贯主张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你们造反派应该有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管早迟的宽大胸襟。”

“我同意。”马进也很爽快地回答说：“十六条明确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只要他们不再同造反派作对，并真正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举双手欢迎。但这需要市委和革工联作出两个保证：一是今后市委一切有关文革的重大决定，都要跟造反派通报协商，取得共识或谅解；二是革工联、大中兵凡有重大的政治举动，也应该向红总红联指通报协商，以避免误解和冲突。如果市委接受这两条，我们将负责说服红总接受市

委的立场。”

武遥觉得马进提的这两条，都在他跟俞市长商量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既然红总红联指已经成为可以左右本市文革运动的政治主导力量，市委今后所作的任何政治决定要行得通，也必然需要取得这两个组织的支持。因此这第一条实质上不过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认可。而第二条如果真能实现，两派组织今后就能减少对立，凡事协商解决，无疑会大大降低混乱，促成稳定局面；而这一点，正是老俞最关心的。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新一年的生产任务和经济目标就无法完成。“只要可以确保生产和经济发展，其它都好商量。”这是老俞在他出门时送给他的最后关照。

在如何对待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的问题上，按照同俞市长商定的口径，同意凡是因参加文革而被解雇的“三工人员”，一律复职。并明文规定：今后如确实因生产超员而需要中止合同的，必须报经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和劳动部门联合审定；决不允许借机对参加造反派的“三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并建议红总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市政府这方面的工作实行群众监督。但是补发工资的要求无法办到；因为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被解雇者在解雇时期脱离了劳动，就不能领工资。

马进表示：市委的态度是诚恳认真的，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这一步迈得不够大，象个小脚女人；恐怕群众不会满意。“你说呢？”他收住口，把眼睛转向王小燕。王小燕不吭声，却从书包里掏出一份传单来，递给武遥看。

武遥一看，是中央文革有关领导接见上海市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群众组织的情况和指示。传单说：“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于1966年12月26日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同志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在听到‘三工人员’代表所作的血泪控诉后，当场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到接待现场，当面斥问他们：‘我们听到同志们反应的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我们尊敬的康老指出：‘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江青同志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武遥读完这份有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印发的传单，一是相信这个上海的“红总”没有那个胆敢公开造中央文革的谣言；二是过去已有从王小燕马进那里得过传单的经验，知道那怕是第一眼看上去象天方夜谭的故事，到头来却会证明是绝对地真实。于是他就不抱怀疑态度，马上走进书房，关上房门同俞市长通电话。老俞听了武遥在电话里对传单所作的简要复述，闷了半晌，无可奈何地说：“既然中央文革都完全向着他们，认为合同工制度是搞资本主义，看来这转正也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光靠我们下面顶是顶不住的！他们想要什么，先答应了再说。关键是要把局势赶快稳定下来，把市委的影响力恢复过来。”

武遥放下电话，呆想了一会，走出书房对马进和王小燕说：“市委可以答应补发工资，按江青同志所说的规定办。原为下放工人的‘三工人员’转正的事，视各单位的经济状况，由单位决定是否办理，市政府加以审批，前提是从长远目光看有利于发展生产，不造成冗员。凡是暂时不能办理转正的，参照正式工同类工种、工龄和技术级别，在政治和经济上享受同等待遇。”

马进和王小燕对视了一下，明白武遥所答应的转正要求，是放的空炮；后面享受同等待遇的许诺，不过是对转不了正的人所作的一种抚慰。但不管怎么说，两人都觉得这也许是武遥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考虑到他在市委并没有根基，能够在中央尚未正式下达文件之前就答应这么多条件，可见他对群众的疾苦呼声，是具有真挚的关切和同情心的。两人就站起身，同武遥握手告辞。马进的告别话是：“看来我们不虚此行。”王小燕的告别话是：“你仍然是我的好叔叔。请转告杨阿姨，我对孙教授和他女儿的死，也觉得很遗憾！你是了解的，我们长征兵团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血统论的。”

武遥笑了笑：“不要太计较你杨阿姨的态度；你俩其实是应该成为好朋友的。”

对武副书记所做的这些艰巨工作，恭鹏志是比较了解内情的。尽管从感情上说，他为革工联、大中兵的命运感到不平和屈辱；但是这种屈辱，乃是全国性的大形势所造成的。平心而论，武副书记能为他们争取到这样一种待遇，已经是殊为不易了！据他所知，上海市的赤卫队打从成立那天起，从来就没有受到过上海市委的正式承认；尽管它也是市委在幕后一手扶植培养起来的。当他在完成成为市常委会做完会议纪要的使命后，武遥当着俞市长和其他常委的面向他布置重返市体育场的任务和要求，他第一次看到武遥的脸色变得出奇地严峻。在他的记忆中，武副书记对下级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他懂得此刻这种严峻的背景和涵义。但是他吃不准：武副书记是否会认为陆书记的做法，是在他背后捅了一刀呢？抑或可以倒过来说，是陆书记觉得武副书记在他背后捅了一刀？或者说，是武副书记先动手，然后，陆书记“有来无往非礼也”，朝他背后还捅了一刀？……脑子里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大问号，恭鹏志急急赶回到了市体育场。在造反派的陪伴下，他穿过了那扇小门，只见那主席台上和主席台的周围，满目都是折断的旗杆，掀翻的桌椅，扯断的电线，碎砖破布间杂着破碎的传单报纸，满地狼藉。仔细辨认，还不时能看到斑斑血迹，展示出刚刚经过一番恶斗的迹象。而在主席台的上空，此刻高高飘扬着的，是红总、红联指和锡山县农民红色造反军的旗帜，表明主席台已经落到了造反派的手里。武斗却暂时休止。在主席台前三四十米的地方，显然是一条临时“三八线”。大批穿蓝色短棉大衣的“主力军”队员，和大批穿黑色长棉大衣的革工联纠察队员，组成两道厚厚实实、壁垒分明的人墙，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就在主席台侧小门旁的那个广播室里，他看到了革工联和“大中兵”的几个谈判代表，也看到了奚大雄，育文庆，以及最近才结识的曲湘川和史苏星。一看那架势，就知道双方在僵持。他不知道自己的光临，会否给这种僵持带来某种转机？武遥责令他带回体育场的常委会意见是：宣布市委不支持革工联“大中兵”无视“两红”意见单方面召开的所谓“批判大会”。并要求双方同时撤出会场，另外商定联合召开批判会的日程。恭鹏志一进门，就向双方传达这一立场。革工联一派对自己被市委明令剥夺独立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权利，非常愤怒。红总一边，对要跟老保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的主张，也嗤之以鼻；对双方立即退出体育场的要求，却举双

手赞成。因为这意味着，保守派和陆波联合上演的批判会闹剧，实际上被他们冲掉了。革工联和“大中兵”的谈判代表当然不肯就此收场。他们觉得自己是本着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采取竭力克制的高姿态，才把会场主席台失守给对方的。因此他们反复警告提醒对方，十万大军如果决计要把会议开下去，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颇有军事谋略的史苏星反过来作奉劝：“是的，就算你们在这场里正有十万之众；可是你们十万人可以排开一字长蛇阵来跟我们造反派干吗？真正可以接上手的，就这一百多米的东西两条线。造反大军现在也有十几万，我们一边抓革命、促生产，一边可以一个兵团一个兵团轮流前来跟你们作较量，你们愿意在体育场呆多长日子，我们就奉陪你们多长日子。”奚大雄接上来说：小史已经给你们说得很透彻了。撤不撤，再给你们半个小时。过了这时限，我们就会把你们围困起来。到那个时候，你们想溜都溜不走！

然而造反派的这种嚣张气焰，不仅没有把革工联“大中兵”压倒，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万丈怒火，不由地慷慨陈词：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愿意奉陪到底！

恭鹏志就在一旁作冷静地劝导：“撤离体育场，并不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丢掉了。也不是就不批资反路线。”接着讯问陆书记现在何方。革工联的人推说不知道。恭鹏志恳切地按着一位革工联主要头头的肩膀说：“我理解你们。但是还是要服从大局，服从党的领导。你们暂时想不通，我只好登台向大家当众宣布市委的决定。我也不相信陆书记面对目前这样一种严峻局面，还会赞成把这个会议继续开下去。你们如果确实真理在手，不在于一时一事之得失嘛！”

革工联方面的代表听了恭鹏志的一席话，觉得恭主任的内心还是向着他们的。就相互对视交换了一下眼色，答应先回“三八线”的另一边去，半个小时之内给答复。恭鹏志猜想他们是回去请示陆书记去了，不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确信：不管陆书记现跟市常委之间的分歧有多大，面对更大的流血冲突可能，他一定会说服革工联一方撤离的。

恭鹏志的估计没有错。不到十分钟时间，革工联就有人传讯过来答应撤离。不久，就看到革工联的大队人马向体育场西大门方向移动。他就要奚大雄亲自赶到西大门那一头去，撤走那些围堵在大门口的造反派队伍。一场可能引起全国震惊的大武斗，终于避免了！

大武斗是避免了，恭鹏志以为可以松口气。谁想到：革工联在体育场一炮打了一个哑火，随后的形势就急转直下。首先是革工联内部军心大乱，市委把屁股转向造反派的新闻，使革工联的骨干分子觉得非常地失望、伤心和悲愤；使动摇分子纷纷退出革工联，改换门庭投靠造反派。那些一两个月之前还凄凄惶惶、不知所终的造反派，却俨然成了耀武扬威的主宰者。那隶属于建筑兵团、“石下草”兵团和公路野战兵团之下的几支好象纳粹冲锋队式的队伍，专门闯到那些造反派势力仍然薄弱的企事业单位里，冲砸革工联、“大中兵”的基层组织。三几个月前押着各类“牛鬼蛇神”满街游斗的“革命左派”们。如今却被“翻天的右派”们，押着满街游斗。跪煤渣，剃阴阳头，油漆涂脸，戴高帽，喷气式，用铁丝把大木牌挂在脖颈上，甚至喂粪便，拳打脚踢连棍棒交加……“大中兵”破四旧时用过的种种革命手段，现在又倒过来被用于“大中兵”自身极其工人伙伴的身上。而红总那些“己所不欲、且施于人”的英雄好汉，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初饱尝这类革命手段的“反

攻倒算”者。他们或躲在幕后，或跳到幕前，对“红五类子女”和党团骨干分子大打出手，疯狂进行阶级报复。

革工联和部分“大中兵”的骨干分子，就是在这种群魔乱舞、牛鬼蛇神猖狂一时的背景下，毅然决然地聚集到一起的。因爱妻怜子而把体育场批判大会扔在脑后的朱坤兴，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才义无反顾地撇开儿女亲情，加入这支背水一战的北上告状队伍。这些在地方党组织精心关怀、培养和照看下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骨干队伍，在陆书记极其委婉的提示下终于认识到：问题不在市委领导，而在北京！中央受了坏人的蒙骗，硬拎着市委领导的耳朵转方向，换屁股，使地方上好人受气受难，坏人张牙舞爪。

向北方，上北京，找救星，伸怨怒！这是他们的共同心声。几个月来，面对那些造反派到处冲击破坏革命生产秩序的捣乱行为，我们革工联革命生产一肩挑，才是真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现在我们不得不撒手了！听说上海的工人赤卫队已经采取停电、停水、停工的“三停”政策，锡城市的革工联如果跟上海的赤卫队联合行动，使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在江苏名列第一的工业城市同时陷入瘫痪，由此可以造成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就是在这精神万分痛苦的四五天时间里，革工联的头头左思右想，反复琢磨，为挽救革命挽救党，最终定出的对策。他们向基层传达的方针是：除了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能动员到的赴京告状人员，越多越好。毛主席不是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吗？他老人家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吗？如果能把全国“赤卫队”、“革工联”之类的组织成员，都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让党中央毛主席听听真正的主力军心里是怎么想的，就一定能改变全国到处存在的“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可惜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全国总动员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本地区全力以赴，尽力而为。

听说革工联要制造“三停”，动员大批人马赴京告状，主抓全市生产的俞市长，当然要加以阻止，他把阻止的任务交给了恭鹏志。恭鹏志赶到市总工会门口时，只见得人山人海，把门口的那条街满满塞塞地挤满了。冬天的日头惨淡惨淡的，刚才还愁眉苦脸地躲在光秃秃的杨树梢后看热闹，一眨眼，却好象经不起凛冽西北风的吹打似的，一下就跑得不见踪影，把心情悲愤的人群，掷在一片阴沉沉的暮霭中。光线一暗，那些在寒风中“啪啦啪啦”翻卷挣扎着的旗帜，就立即失去了原有的鲜红颜色，黑不溜秋的，使人心里看着酸酸的。恭鹏志把自行车锁放在一家店堂内已经亮起昏黄灯光的副食品小店门口，尽量把下半部分脸掩藏在沿脖子绕成一个圈的黑色大围巾中。脸的上半部分呢，有放下耳摆的棉帽子和眼镜作掩护，使自己可以避免熟人的注意和拦截。他担心在这些悲怆而激愤的人群中，随时都可能碰见熟人。而这种碰面，必定是很尴尬很苦涩的。甚至不排除失去理智控制的人士，会迁怒于他，把他当作出卖他们的罪魁祸首！想到这种无法绝对排除的可能性，他的嘴巴，就借着高筑在嘴前方的黑围巾的掩护，作了一下牵动。这种牵动，算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苦笑。他心想：我算什么？一个小小的市委办公室主任，连到底算是陆波手下的棋、武遥手下的棋、还是俞市长手下的棋都搞不清，够得上罪魁祸首的资格吗？可是，如果你觉得冤枉，你不是罪魁祸首，这顶帽子又该戴在谁的头上，才算恰如其分呢？他自问。

是老陆波吗？也许是。毕竟，他是这个市的第一把手啊。在决定这个

市市民的政治和生活命运上，谁比他还有更高的权力和影响力呢？而眼前这些人，这些在小副食品商店穿进穿出购买充饥食品的出征战士们，这些仍然骄傲地戴着革工联轴章的基层骨干、党团员、先进生产者们，他们怎么会在这一片黑暗阴冷的暮色中，承受着呼啸寒风的肆虐抽打，撇下自己的妻儿父老，离开跟家一样亲近贴心的车间、工厂、车站和码头，聚集到总工会的门前来的呢？就一两个星期前，只要革工联的大旗一飘扬，人们的心头就变得亮堂堂！什么乌龟王八，魑魅魍魉，有革工联在，天不会塌！地不会陷！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就固若金汤！可是如今，在好多工厂企业，车间班组，甚至在大街小巷，革工联的袖章都不能公开戴。一戴就有人喊“抓老保！”就揪住辩论，就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昨天恭鹏志下班时经过市中心，看到那个原本由“大中兵”搭起来专门斗批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看台上，一位闻名全市的全国劳模被押在台上，正作一百八十度的低头弯腰请罪。

他的身上，披挂着一件象唐僧袈裟衣裳一般的奇怪红长袍。挤近台前一打量，那长袍，原来是用一只只革工联的红袖章拼制的。虽然是数九寒天，可是他的额头两边，却渗着细密的汗珠。恭鹏志从看台前急速地退出来，不仅觉得惨不忍睹，而且感到一种深重的负疚感！“老莫啊，是我害了你！”他在心里痛苦地叫喊。

两个月前联络组织革工联时，是他亲自找这位全市理发行业的服务标兵，反反复复地作解释动员：“……不会讲话不要紧，不会叫你去登台辩论；没有文化不要紧，不会让你去写大字报；不想丢开手中的理发剪子没问题，不会要你脱产闹革命。党就需要你在革工联挂上一个名，那就等于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莫师傅虽然没文化，但是受党的教育培养这么多年，对恭主任讲的革命道理，无法做到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他是一个本分人，一向只知道用手中的那把理发剪子，恭恭敬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管去他手下理发的是市委干部，慕名而来的社会名流，还是推粪车的清洁工人，上城卖菜的乡下农民，他总是待客如宾；如果恰逢接近关店时间，他从不拒人于门外，弄得他所在的那个理发店，老是到时间却关不了门。他最早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就是因为发觉他那个店的营业额，（因营业时间拖长之故）老是比同类店高出一大截。一了解，就了解出了一个全国劳动模范来！他那双看上去粗巴巴的手，在你头上折腾起来，却比绣花女还显的灵巧温柔。当它们在你头上精工细作的时候，会使你领略到一种意想不到的人生享受！恭鹏志开始时也是慕名作尝试，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只要手头工作不是特别繁忙，常常是挨不上两个星期，就去接受莫师傅的精加工。奉恭主任之命，老莫他终于参加了革工联，但是却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原有的生活轨道和目的。他把一切头衔职位都推掉，理由就从恭主任的谈话里面搬：他是借给革工联作块牌子用的，并不能指望他投身革命，忘掉本行。他在引用恭鹏志的语录时，自作主张地把“旗帜”改成了“牌子”。恭鹏志觉得这种篡改，不仅情有可原，所体现的谦虚谨慎，更使人肃然起敬。总之，他还是勤勤恳恳、待人如宾地理他的发。来的都是客，甭问是属于革工联还是属于“主力军”。然而，形势在发展，革命在前进。莫师傅领导的理发店，不可能成为两不搭界、超然于两条路线较量之外的世外桃源。造反与“保皇”，水火不相容。虽然在莫师傅的影响下，店堂里的职工都是清一色的革工联，登门理发的顾客，却已经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于是在等候理发的过程中，就时有

唇枪舌战爆发。莫师傅开始还能按照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要求，带着一班同事严守中立，守口如瓶。后来两派矛盾日益激化，莫师傅之辈的情绪，决不可能做到一尘不染，就难免言形于色，撇开中立伪装，一边操作发剪，一边加入唇枪舌战。这种不问政治的防线一旦突破，革命的原则、立场和感情，就汹涌澎湃，到了元旦后人民体育场发生两派武斗，可以给人以美妙享受的莫“记”理发店，终于发展到对几个脸孔特别熟悉、嘴巴特别好斗的“主力军”老顾客拒绝提供服务的地步。于是，就有了恭鹏志所看到的、有如万箭穿心似的一幕；就有了富有蛊惑力却并无实质性根据的指控：莫老保过去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理发理得十分起劲，如今却拒绝为革命造反派剃头，是可忍，孰不可忍！恭鹏志已经记不清：是否安排莫师傅为刘少奇理过发。但是即使真此事，此一时，彼一时。谁能预料当初堂堂的国家主席，今天会成为火烧、炮轰的革命对象呢？他就是不当国家领导人，经过锡城时有意要领略一下莫师傅的手艺，莫师傅能拒绝吗？至于他不肯给红总一派的人理发，那也情有可原。谁让你们跟他吵嘴吵得那么凶呢？人一伤了感情，动了气，剪子剃刀操在手里不听使唤，刮破剪碎了脸皮头皮哪个负责？

恭鹏志带着这样一连串的回想，畏毕缩缩地出现在革工联总部办公室的门口。革工联的头头这几天已经总结认识到：那天在体育场接受恭鹏志的劝告，乃是走向目前悲惨境地的开端。因此一看到这个背信弃义的昔日助产婆，就生出抗拒的心理。他们估摸他是前来劝阻革工联的北上控告行动的。眼看着他亲手扶植起来的组织气息奄奄，几近绝路尽头，他不尽历史责任和义务，反而想阻碍革工联求生存的最后努力与奋斗，悲愤之中，更增添了一份悲愤；失望已极，倍感被出卖、被欺骗、被抛弃的辛酸！他们同恭鹏志打过这么长时间的交道，知己知彼，不用开口，彼此一看脸色眼神，就能摸清对方的想法意图。恭鹏志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几句一般性的问候话之后，他就寻思着面对强烈的怨愤抗拒心理，怎么能使自己的劝阻发生效力，完成俞市长亲自交待的任务。这么多年来，由俞市长出面安排他任务，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只有在这种非常时期，才可能发生。奚大雄在释放俞彦一事上所放的人情，显然在俞市长的身上产生了作用。在前两次市委常委会上，他虽然都采取了弃权的姿态，但是同他关系亲近的那些常委们，以市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廖胜平打头，却都明显地站到了支持武遥的立场上。几名一向紧跟陆书记的市委常委，一是惮于《元旦社论》所定的政治调子，一是看到有一半人已经采取了同“班长”公然对抗的立场，情知大势不妙，也就大都投了赞成票或弃权票。而今天一听到革工联的大批人马停车关机，离开工作岗位打算上京告状，俞市长便把恭鹏志召入他的市长办公室，脸色铁青，眼睛朝他瞟了又瞟，半晌不说一句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说；恭鹏志知道这是俞市长每逢盛怒时的惯常做法：他在竭力克制自己，寻找在狂怒之际，能够尽可能减轻伤害部下感情的词句。“革工联是你扶起来的。你去告诉他们：如果想用对付国民党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那只是自找灭亡！”最后俞市长只掷给了他这两句话，简短得不能再简短；这就是俞市长！他即使是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候，也能注意上下之间的工作关系和说话分寸；不管怎么说，恭鹏志是直接对陆波负责的部下，他并不能把他当作自己的直属部下来训斥。同时，他能用最简短的话语，一语中的地砍到关键之处。这就是为何他在市委大院虽然职位低于陆波，实际威望却高于陆波。武遥不管怎么精明强干，风华正茂，他毕竟初来乍到，在市委没有根基。没有俞市长的暗中

支持和配合呼应，他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和影响。恭鹏志认为俞市长的话，一半是说给革工联听的，一半是在批评指摘陆波的不择手段。如果说：俞市长前几天在支持武遥的见解立场方面，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他怀疑陆波在背后煽动革工联搞“三停”向中央施加压力所引起的不满，终于使他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陆波、反对革工联的立场上。也许这种立场转换，同他跟陆波以前的矛盾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武遥。如果所采取的某种做法或步骤，会直接影响损害他主管一摊子的生产形势和计划完成情况，他一定会拔剑而起、六亲不认！他苦心经营十几年，使锡城市的工业生产在全省一枝独秀，总产值和一个广东省不相上下，这是他的骄傲，他的荣耀，他的资本。这就是为何省委主要领导对他如此器重，尽管他俩间毫无渊源关系，却在他跟陆波的纠葛纷争中，总是能“一碗水”端平，甚至常常批评自己的老部下而支持表扬他。“你们要知道锡城市工业发展的诀窍吗？”省委书记在省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去查查老俞换了多少条自行车的轮胎吧！锡城市大大小小上千家企业，哪一家没有留下他自行车的车辙？”而如今，有人却要制造“停电、停水、停工”，不管是出自什么理由，不管他过去与这些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有多少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有多同情，有多惋惜，这样做客观上就是要剥夺他的骄傲、荣耀和资本！而这些骄傲、荣耀和资本，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私利，而是同全市七十万人民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对整个江苏地区的经济建设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闻讯不能不勃然大怒，把蠢蠢欲动也想参加北上告状的儿子，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是，他对市委办公室的主任，是不能象对儿子那样破口大骂的；他只能点到为止，他知道恭鹏志是个聪明而干练的人物。响鼓不用重捶，他相信恭鹏志能够懂得那短短两句话的分量！

恭鹏志把俞市长的意思，用极其婉转的话语，转达给革工联的头头。他知道这些来自工交战线上的尖子人物，对俞市长的话就象对陆书记的话一样，一向也是毕恭毕敬、奉若神明的。接着他又以革工联助产婆的身份，用同一条船上人的口气，摆自己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在锡城市。你们把各单位的主要骨干都调离主战场，就等于把阵地拱手交给了对方；使留下来的同志处境更加困难，使你们的基层组织更加风雨飘摇，分崩离析。而最重要的，这样做会授人以柄；11月10日《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讲得非常明确：在工矿企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革，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如果因为动员大批人马上京告状而造成“三停”，革工联就难逃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责……”就在恭鹏志苦口婆心作劝导的时候，有人进来说：大伙在外面等着听出发前的临阵战斗动员。恭鹏志就只能追着革工联头头往外走的脚步，一边走一边继续他的劝说。但是对方有没有听进去，他的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全部希望或失望，就取决于作“动员令”的人第一句话脱口时怎么讲。走出总部办公室的门，走出总工会的门，几盏临时拉起来的照明灯，悬挂在光秃秃的树枝干上，被寒风吹得摇摇晃晃的，使得门口那两头大石狮的脸部表情，在光线的晃动下，老在变换：一会显得很愤怒；一会又显得很悲哀；一会儿，又好象呲牙咧嘴地在狞笑。恭鹏志早已收住了口；并不是因为当着四周围这么多感情用事的群众，担心他对头头们的劝导话，会溜进其他人的耳朵，激起众怒。他在收住口的开初，是被一种强烈的责任心所推动，肚子里在急速地打着腹稿，心想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他必须抓住，面对上万名革工联的骨干分子，发出他的大声呼吁：停住这种徒劳无益的冲动吧！这会把你们引入自我毁灭之路！但是而后的沉默，却完全是因为眼前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这一情景，使他的内心几乎完全被现场的气氛和情绪所征服，所感染，所同化。他看到了莫师傅！莫师傅头戴一顶端庄的黑呢帽，黑呢帽的下沿是灰白的双鬓，灰白的双鬓中间是饱经沧桑的额头，饱经沧桑的额头下是灰白的浓眉。他的脸颊平缓舒展，加上那宽厚的嘴唇，使他的脸神总是显得很慈和。这样慈和的一张脸，既然会拒绝给人理发，拒客于门外，会使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和无法置信。就象他现在这副样子，双腿缠着满满实实的白纱布，一边坐在轮椅上，一边用带着浓重苏北盐城人口音的话作演讲，一样使人不可思议和置信。一个一向说话呐呐的人，一个为准备“五一节劳模表彰大会”上的简短发言急得满头大汗的人，也会对着上万名情绪激动的听众，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然而，这分明是他；他分明在讲。虽然结结巴巴的，全场的人却听得很专注。他们都知道他是名声卓著的全国劳动模范，是代表革工联革命性、先进性的一个标志，一面迎风飘扬的光荣大旗。可如今，这一标志却遭受到了极粗野、极蛮横无理的污辱。光辉灿烂的大旗，被牛鬼蛇神的兽蹄尽情蹂躏践踏！就在恭鹏志所见到的那个批斗示众情景之后，他被押回市服务公司“主力军”的队部。那天夜里，重脸面、性倔强的莫师傅，趁人不防，奋身跃出了被关押的二楼房间。他并没未能够如愿以偿地达到以身殉节的结果，却只是摔伤了股骨，抱恨终身地被送进了医院。革工联总部的人听到这一悲讯，特地派人用轮椅把他接来，让他现身说法，激励出征人马的斗志和士气。在这种情景下，不需要滔滔雄辩，不需要口若悬河，那短短几句极沉闷的、令人觉得十分压抑的、甚至有些含混不清的话语，就足以在人们的心里，卷起万丈狂澜！

“……同志们，革工联的兄弟姐妹们，”石狮子的上空响着莫师傅沙哑的嗓门：“我很想跟着你们一起上路。但是，我知道这会拖累你们。因此，我只能赶来为你们送行。你们一定要替我给毛主席、党中央捎信：那些坏人，那些对党有刻骨仇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最不治一治，我们这个国家就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

莫师傅最后的声音，一句比一句低，喃喃的，又象是对旁人说，又象是对自己说。一边说，一边颤颤巍巍地举起一只袖管，去擦夺眶而出的眼泪。那站在前面的人，都看到了那只颤抖的袖管，都看到了那在灯光下混浊而又闪亮的眼泪，无不热泪盈眶，都禁不住伸手去擦自己也随之奔涌而出的眼泪。恭鹏志扭回头去，他不忍看着眼前的情景，更不敢触碰莫师傅的眼睛。他突然担心起自己是否已经被莫师傅看到。他极想把自己躲避起来。然而，眼睛是可以躲避的，耳朵却无法躲避。他听到了一片哽咽的声音。那是那些站在前面的女同志首先发出来的。这哭声随着呼啸的夜风，一吹就吹散开来了。后面的人，也一大片一大片地跟着呜咽起来。有人干脆号啕痛哭起来。而这号啕痛哭的声音中，不仅仅都是女人的嗓音，而且间杂有男人那种嘶哑的、厚重的、欲想极力压制却又根本压制不住的声响，不仅使人听了愈加悲怆，就是那沉沉夜幕，也浑身颤抖起来，使得灯光投射下的一切阴影，在刺人肌骨的寒风中跟着摇晃抖动。恭鹏志觉得自己的眼眶也湿了，他扭着头，背过灯光的照射，什么话都没有说，一个招呼都没有打，一扭身就离开了那两头石狮子，和石狮子中间所放置的两大张乒乓台所组成的显目地带。他把脸部背着照明灯光，是为了不想被熟人认出他狼狈撤退的脸孔。那乒乓台的上面，

此刻就停着莫师傅的轮椅。而这乒乓台，原是革工联头头打算用来作发动司令的。他恭鹏志曾经也想登上去插一脚，发表他的阻止令。然而此刻他却改变了初衷，沿着墙根朝他停放自行车的副食品商店门口，急速地默默撤退。他仍然抑制不住地想回头看。他记得：在那些在冰冷寒风中挂着滚热泪花的人群中，惟有那一对青石狮子，是无动于衷的。他羡慕它们；如果自己也能象石狮子那样，做到不被群众情绪所感染感化，他就一定能够坚定勇敢地登上乒乓台，不虚此行地完成俞市长交给的使命。

第十九章 对台戏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晚，奚大雄桌子上的电话铃急响。拿起话筒一听，是从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上海工总司要锡城市红总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协助他们把今晚将要流窜到锡城市的一批上海赤卫队员，拦截下来押回上海。奚大雄已经从其他渠道得到这一情况。而且知道有上万名革工联的骨干分子，打算同这批上海赤卫队员汇合，一起赴京告状。他本来就已经在调兵遣将作拦截安排，因此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并且进行了一通“革命造反派心连心”之类的感情交流，表示要同上海市工总司“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放下电话，为打破两支老保队伍的会合企图，他一边派建筑兵团和“石下草”兵团等去拦截革工联的队伍，一边亲率以公路野战兵团为首的大批人马，去锡沪路口阻截上海赤卫队的队伍……。事态发展证明：奚大雄对上海方面所作的积极配合，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这一政治价值在第二天一早，就见分晓。

这一天是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赫然登载了以上海市工总司、红革会为首的十一家革命造反派组织所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主要内容，是要求出走的上海工人返回生产岗位。《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加了气势磅礴的“编者按”。“编者按”说：“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具有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一天，《文汇报》在第三版上，又刊载了一篇同样由上海工总司、红革会打头的、跟上述文章精神相一致的《紧急通告》。

奚大雄并不知道那篇《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自毛主席的大手笔。但是他凭自己在几个月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政治敏感，立即就派出一辆宣传车赶到现场，对着被团团包围住的上海市赤卫队人员，反复地播放这三

篇文章。在这种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被包围的赤卫队人员纷纷缴械投降，同意听从党中央的声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而革工联的上告人员，除有一部分突破“主力军”的堵截单独北上外，大部分也被赶回到各自的单位里。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日报》上，史无前例地发出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热情洋溢地赞扬：“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天，锡城市红总就收到了上海工总司派专人送来的一封感谢信和一面大红锦旗。锦旗上八个金黄色的大字：“并肩战斗，共同胜利。”特别地醒目！

跟这些最新发展情况紧锣密鼓相配合，1月16日，《红旗杂志》第二期又发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社论。社论指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产，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铁道部门某些负责人也在这样干，妄图用中断铁路运输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就愈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制造条件。”

《红旗杂志》同期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

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S E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上述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无疑是判处了革工联和大中红卫兵的死刑，宣告了上海工总司、红革会等在锡城市的“两红”同伴无可置疑的正统革命地位。曾经显赫一时、左右锡城大局的革工联和大中兵，全面崩溃，一朝覆灭。其基层骨干，在接受批判游斗、挂牌示众的狂潮中，几乎无一幸免。凡

是支持他们的当权派，好多都成了资反路线的当然代表或货真价实的走资派，炮打火烧，油煎砸烂，成为六十年代“痞子运动”的攻击目标和牺牲品。市委常委中，除了陆波称病不起之外，其余的也都见风使舵，热情支持由武遥恭鹏志等出面，在“嘟嘟嘟”的柔和马达颤动声中，在太湖万顷碧波的轻轻摇晃下，和红总的头头们，连日围坐在有洁白台布覆盖的谈判桌前，紧张商讨锡城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旧市委的具体形式和方案。

然而，冲突仍然时有发生。而且发生的地点，不再在工厂，不再在学校，也不在机关或各类事业单位，却发生在驻军某部营地。1967年1月25日，江南航运公司“石下草”兵团据内线的通风报信，得知公司党委把收集整理的有关“石下草”兵团头头的“黑材料”，转移到了驻军某团团部；就因为公司党委副书记的丈夫，为该团团长。于是就纠集上千人马，包围该驻军团部，勒令交出黑材料。岂不知这一团之长，正为自己的革命伴侣被造反派剃了一个僧不僧、道不道的“阴阳头”怒火中烧，立即调动部队鸣枪驱逐；趁没有听过枪炮声轰鸣的造反派英雄抱头鼠窜之机，顺手还拘捕了几个嚣张分子。

这一天，正好是《解放军报》发表重要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日子。社论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集中力量，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满腔热情地、毫不含量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即使他们暂时是少数，也要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是不能不介入的。有些人假借、不介入’之名，行压制群众之实。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们所谓、不介入’，是假的。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当前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中间，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红联指和红总头头正在一起研究商量《解放军报》社论对锡城文革运动的涵义和影响；闻讯“石下草”兵团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急忙跟驻军军部联系；接头人物当然非史苏星黄军莫属。军政治部主任蔡国柱当日就欣然接见红总红联指的头面人物，一见面便满面春风地说道：“受上级指示，正要找你们联系。现在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主动出击，登门拜访，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然后听人介绍说，奚大雄原在驻军司令部过开小车，上过朝鲜战场，更是犹如故友重逢，倍感亲切。不仅设宴招待，身经百战、威震沙场的杜军长还亲自出席敬酒祝辞，祝愿军民携手合作，使发源于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吹遍锡城市，共同把锡城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让党

中央放心，毛主席放心。奚大雄见气氛融洽，其乐也陶陶，就趁热打铁，提出驻军某团扣押造反派之事和帮走资派藏匿黑材料的问题。杜军长说这种事还不好商量？驻军马上要组建支左办公室；这件事交给支左办公室来办好了。

兵贵神速。跟地方上相比，解放军办事从来就显得雷厉风行。第一天刚碰头；碰头时提到要组建支左办公室。第三天清晨，支左办公室的油亮招牌，就已经风风光光地挂到了市委大院的大门口。那新崭崭的白底黑字，漆光油亮，把一旁久经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的市委和市政府招牌，衬托得老气横秋，萎靡不振。支左办公室主任，就是与造反派已经有过酒肉之交的蔡国柱。蔡国柱走马上任没几天，就把红联指的几个主要头头以及首都三司驻锡代表郭贤请到办公室。这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三楼，有面积很宽敞的柚木地板，地板靠左一侧有一排长沙发椅；有很明亮的朝南窗户，可以鸟瞰市委大门口的情况动态。凭这两点，我们很容易就能回想起，这就是陆波原来使用的办公室。办公室大致维持原状；唯一的变化是：空调机给移走了，墙壁上多了两条醒目的毛主席语录。一条是“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一条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曲湘川、王小燕、史苏星、市一中“八·一八”的雷竞天，以及郭贤，一字排开坐在长沙发上。先是对红总没有代表到场觉得有些疑惑，后是对蔡主任开门见山提出的问题感到很惊讶。蔡主任问：“你们是锡城市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小将，跟毛主席最紧，路线斗争觉悟最高，对锡城市的文革情况，最有发言权。我们支左办公室建立短短几天来，接待了大量的革命群众来信来访，反映了红总的好多问题和情况。有些问题的性质还很严重。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看法。”

……………（为防盗版侵权，此处作大篇幅删节。）蔡国柱对革命小将提供的宝贵见解，表示十分感谢。临别前还告诉大家：“石下草”兵团被驻军所扣押的对象中，其中一个因破坏军婚受过劳动教养；一个是“四类分子”子女；还有一个是内定右派分子。因此其他的人都放了。就这三个人，暂时还不能放；已经转到了市公安局，等查清了全部劣迹再作处理。

至于“黑材料”的问题，现在有关材料已转到支左办，待清理复查后，属于黑材料的按黑材料处理；不属于黑材料的正常档案资料，会退给公司有关部门妥善保存，严禁随意冲击和销毁。还说支左办不是旧市委，放在解放军手里应该可以放心。最后问早就有过交往的史苏星，近来她父亲有没有来信？请捎笔代问一个好。希望她有空常去他家坐坐。

蔡国柱跟红联指代表的碰头会一结束，曲湘川就跟奚大雄打电话。奚大雄听完小曲的情况通报，苦笑着告诉他：“石下草”兵团早就得到消息；葛富林半个小时前刚来总部发脾气，大吼大叫地说：如果总部是银蚌蜡枪头，中看不中用，他就会带着队伍亲自去向市公安局要人！奚大雄还建议全市的造反派坐下来开个联席会议，好好研究商量一下最近出现的新情况。挂断电话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他总觉得好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奚大雄有理由感到不安。听诸申、李辉康、冯有强他们讲，最近公司里的铁杆老保很活跃很嚣张。丁荣兴、叶子栋、童年财他们逢人就讲：市支左办蔡主任是时红霞的丈夫；这下奚大雄和主力军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许多基层的“主力军”组织也都来总部反映：他们单位原革工联的人都涌到

市支左办去告状，回单位后神气活现得不得了！建新机械厂的铁杆老保们，更是在厂门口公然贴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矛头直指红总主力军。

葛富林的大发雷霆，亦是情有可原。那位被指称为“内定右派”的把关押者，不仅是“石下草”兵团勤务组成员，他的智囊军师，也是“705号游艇”秘密谈判会的内勤人员。他轰轰响地责问奚大雄：什么叫作“内定右派”？五七年向党提意见，是恶意的，就定右派；不是恶意的，就不是右派。够格的就宣布戴帽，不够格的不戴帽！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条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现在突然抛出一顶“内定”的帽子来，这“内定”算是那一档？是不是在有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那种对着奚大雄大叫大嚷的样子，就好象他的军师不是给人民解放军逮走的，而是他奚大雄作的关押决定。葛富林接着又为“破坏军婚分子”叫屈。他说这名“石下草”兵团的骨干分子同对方从小就青梅竹马，暗中相好，就因为出身成分差异，对方父母不同意，硬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军官。后来两人就私下通了几封信，被军官丈夫拿住，就作控告，被定了“破坏军婚”的罪名送劳动教养。这事来龙去脉公司里好多人人都知道，你说这屈不屈！然后又说：还有那个“四类分子”子女，原是同他一起回城的合同工。一向是个老老实实、处处受人欺负、事事委屈求全的青年。出生无法选择，革命的道路却在自己的脚下。这青年是受了他的亲口鼓励，才参加“石下草”的；被大石头成年累月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草，刚设法从石缝下探出头来透口气，享受一下其他公民都能享受的革命造反权利，就镣铐加身，投入大牢，这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不是仗着枪杆子的威力，又大摇大摆地卷土重来了吗？！总之，按葛富林的口吻，这三个被抓的患难兄弟，其中有两名均是他手下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之成员，虽然同西施和王昭君没法比，但就总体而言，政治面目并不很丑恶。即使有一点瑕疵，也是白璧微瑕，无伤大雅；紧跟毛主席革命造反功不可没！革命大方向一贯正确！现在惨遭不幸，身陷囹圄，如果总部袖手不管，会使下面人人寒心，个个失望。

奚大雄觉得葛富林说的这些情况，跟凌漪、诸申、李辉康、冯有强的情况，包括葛富林本人在内，都大同小异。如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分析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乍一听都是黑乎乎的，活脱活现一副牛鬼蛇神的可憎嘴脸。但是仔细一推敲，就能发现在每个人的情况中，几乎都有令人同情的地方，都有情有可原的方面。而带有这一类情况的对象，在红总的造反派队伍中，可以说是大量地存在。连同他们的子女家属，亲朋好友，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阶层。而真正那些罪恶昭彰、本质恶劣的坏人，在任何地点、任何地方，都只可能是少数。正因为这一庞大阶层的人平时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老是受到单位领导压制和社会歧视，不平则鸣，他们才会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向过去受到的错误压迫进行反抗报复，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享受应有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尊重。从这样一种大背景出发，市支左办所作的决定，就并不是仅仅针对“石下草”兵团的几个人，而是对红总所代表的这一整个社会阶层挥过来的迎头一棒！如果解放军是冲着红总中的一小撮坏人来的，他奚大雄举双手欢迎。因为自从当了红总头头后，他所以不顾某些人的背后嘀咕，把自己公司的保卫科长老傅调入总部，目的就是要清理组织，整顿队伍。但是如果是以此为借口，要把上述一大批人重新打下去，那红总就会成为一个空壳，锡城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前

功尽弃。从去年七八月份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反路线，围绕着如何看待这批所谓的“老造反”，到底是文革的对象还是文革的动力，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较量；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现在要重新加以否定和清洗，那不是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吗？

奚大雄按照上述思路所作的发言，在2月2日有上百名代表出席的全市造反派联席会议上，得到了热烈的喝采掌声和强烈共鸣。最后会议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强调要保卫六个多月来的文化大革命成果。锡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加入锡城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人民解放军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决心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努力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清除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争取夺权斗争的全面胜利。革命造反派将在进行上述思想整顿的同时，也将自觉认真地进行自身组织整顿，纯洁革命队伍。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允许保守派趁机进行反攻倒算，卷土重来。

整个声明，无疑是用转弯抹角的语调，向驻军提出了他们的担忧和警告。同时对驻军提出的造反派组织不纯的关切，作出回应。然而从文章中也能看出来：造反派希望和驻军继续谈恋爱、度蜜月的期望，还是很殷切的。因为有这种期望，态度激进的王小燕、葛富林等，提出把“释放被关押者、造反派同支左办共同审查黑材料，共同筹建夺权领导班子”这三大要求公开写进联合声明，没有被会议采纳；而是决定派代表与蔡国柱关起门来当面交涉。

2月4日，奚大雄和育文庆、曲湘川、王小燕、史苏星、雷竞天、朱兆平等一起去见蔡国柱。其中曾经为朱坤兴向唐延言说项求情的朱兆平，在文革大形势、俞迂武遥廖胜平和育文庆等方面的影响下，也起而造反，带头成立了锡城市机关革命造反纵队，成为一支来自市委内部的造反派劲旅。

蔡主任正在研读《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见到众代表登门拜访，第一句话就问：“郭贤为什么没有来？”曲湘川回说：郭贤回北京向首都三司总部作汇报和请示去了。蔡主任连连点头道：这样好；勤请示，多汇报，可以避免出差错。

接着拍拍手里的报纸问：2月3日发表的这篇《红旗杂志》社论，各位都学过了吗？

各位不管学过不没学过，都随大流地回说：“学过了。”

“好。还是造反派动作快，学习抓得紧！”蔡主任加以慷慨的赞扬。然后接着问：“你们觉得哪几条是重点呢？”

又是王小燕带头开炮：“各人所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理解的重点也就会有差别。蔡主任是怎么看的呢？给我们作作辅导怎么样？”

蔡主任对这位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的女大学生，已经领教过，就见怪不怪地笑了笑，谦虚地说：“辅导谈不上，共同学习，增强相互沟通，倒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吧，我把自己刚刚用红笔勾起来的地方念一念，看看是否算重点，大家一起作讨论。”说到这里，见大家有殷切期待的意思，就用很标准很柔和的普通话念起有关章节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总是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在他们权力被革命群众夺掉的时候，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夺权，妄图反攻倒算，把他们失去的权力夺回去。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正在重新组织他们的反动队伍，聚集地富反坏右分子，搜罗社会渣滓，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妄图瓦解分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妄图篡夺革命造反团体的领导权，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唆使尚掌握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单位、一个生产大队领导权的同伙，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妄图扰乱国家的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夺权的政治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否则，就会走错道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他们现在已经在群众面前亮相，在群众面前公开表明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共同战斗。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要相信他们。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拥护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在夺权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运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要、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指挥原来的业务班子（必要时加以调整）执行任务，并组织革命群众对业务班子实行监督。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还要担负起统一指挥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

“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苏维埃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家伙，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毛主席指出：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

“有的地方，反革命组织暴露得很充分了。当地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的公安机关，对反革命组织实行了镇压，这是做得完全对的。哈尔滨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市公安接管委员会，对当地所谓、荣复军‘这个反动组织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们在包围了所谓、荣复军‘以后，首先发动政治攻势，使广大受蒙蔽的人觉悟过来，反革命肇事的现场，变成了控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受蒙蔽的人们交出了头头。所谓、荣复军‘很快就瓦解了。……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保持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混进来捣乱。要在统一指挥下，配合专政机关，担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在座的代表们，没有想到蔡主任会一口气地读出一大堆重点来；更没有想到：这些重点以谈论夺权斗争的形式和意义开始，却以强调必须镇压反革命作为终结。对社论已经作过研究的人，在寻找自己感觉理解上同蔡主任在重点理解上的差异；没有读过的或只是草草看过一遍而印象甚浅的，就开始琢磨蔡主任选择这几段章节的用意。

曲湘川想到来碰头的三个重点，要求放人和共同审查黑材料的两点，都同蔡国柱所强调的“镇压反革命”重点不和谐，惟有夺权的主题与他所列出的重点相吻合，就决定从吻合处先接上口，很热切地说：“山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已经联合起来夺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青岛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了走资派的权。贵州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通过实现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也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种种大权。这些成功的夺权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实现了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我们锡城市的革命造反派也已经联合起来，因此今天来的主题之一，就是想同解放军商量一下夺权的问题。”

“好，”蔡国柱似乎每逢开口时总习惯用一个“好”字作引头：“全市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一起夺权，跟几个人同旧市委当权派躲在游艇上私下商量可不一样。我们坚决支持，坚决支持！还有什么主题呢？一起摆出来，我们可以来个一揽子方案，统包统销。”

奚大雄和育文庆一听蔡国柱提到“游艇”的事，脸色就显得有点不自然。跟旧市委秘密谈判造反派夺权问题和具体方案，红联指的曲湘川、王小燕、雷竞天，机关革总的朱兆平，还有市教师文化革命联合会、市文艺界“反到底”兵团，郊区农民革命造反军等市级群众组织，都预先打过招呼。按照郭贤和马进的意见，先有红总出面谈，把市委的整个意图搞清了，把造反派

方面的意图也先初步摆一摆，但是不作最后拍板。其它几个主要组织先不出面，是为了留有回旋的余地；以便逐步出场，步步进逼，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现在经蔡国柱这么一说，就带有跟旧市委暗中勾搭、私下相授的味道在里面，想当场反驳；又觉得在座人多数知情，为这句话争论起来破坏气氛，会影响另外两个问题的协商解决，就忍住。

“全市十几家主要革命造反派组织发的联合声明，想必蔡主任已经看过了。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造反派群众的问题，和怎么处理黑材料的问题，为了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促进军民团结，我们没有在联合声明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了今天上门协商的方式，希望蔡主任能够理解我们造反派拥护解放军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决心。”王小燕接着放炮。

“好，还是王小燕快人快语。我一看你们发的联合声明，就知道下面还有具体问题要提出来。是要放人吗？我一猜就准。放，只要红总能按联合声明上所说的那样，主动整顿组织，纯洁队伍，言行一致，我可以马上通知公安局放人。”

奚大雄没有想到蔡主任会这么爽快，有些疑惑，就追问道：“蔡主任的意思是：等我们整顿完组织再放呢，还是马上就放？”

蔡国柱把手一挥：“可以整顿好组织后再放，也可以马上就放。但为了证明你们整顿组织的决心。言行一致，这三个人放出去之后，必须开除出红总组织，接受群众监督，不得再参加文革运动。”

在座的人都傻了眼。还是机关干部朱兆平第一个反应过来：“请问：公安局对这三个人作定性了吗？定性的依据是什么？”

蔡主任发现：这个首次见面的市计经委政工科长，一出口就显得很老辣，似乎没有在市委白当几年科长，扬了扬眉梢：“不需要作新的定性。他们的问题，档案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这就涉及我们要提的第二个要求了，”王小燕迫不及待地插入话题：“对于江南公司旧党委所整的个人材料，我们的联席会议一致认为，造反派必须派代表一起参加审查！比如说，刚才那三个主力军队员，档案上写明他们被剥夺参加任何政治运动的权利了吗？”

奚大雄为王小燕的思路敏捷和谈锋犀利暗暗叫好。

“这个吗，”蔡主任顿了一顿：“当然不能光看一字一句有没有罗，要总起来看。不过，既然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尊重造反派的意见，可以派两个代表参与审查。但必须都是组织同志。”

“联席会议已经定了，红总派一个，红联指派一个。红总的老傅本来就是市货运公司的保卫科长，中共党员。红联指虽然派不出党员来，但王小燕是烈士子女，团干部，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应该是完全够格的。”曲湘川不失时机地插上来。

蔡国柱眯缝起眼睛看了看王小燕，又看了看一直没有开口的史苏星，说道：“团员也可以嘛。但是我觉得小王的代表面似乎狭小了一点，你们工学院两千多名大学生，在整个红联指中毕竟是少数。还是代表性更广一点好。我倾向在中学里面选一个，代表几万名中学革命小将。”

王小燕立即明白蔡国柱的意图，马上开口接上去：“我同意蔡主任的意见，就选原市一中团委副书记雷竞天，大家看好不好？”

在场者都表同意，包括史苏星。尽管她知道蔡国柱说那段话的原意，是想让她取而代之。可是王小燕的反应很迅速，不给他意愿的实现留下任何

机会。史苏星今天什么口都没有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已经敏感地感觉到：锡城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锡城市的革命造反派队伍，也许将面临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春江冷暖鱼先知。自从父亲调北京解放军总政工作后，母亲弟弟都去了北京。就她丢不开亲手创建的红旗团，一个人坚持不懈地留在锡城市搞文革。太湖边的别墅当然不可能仍然享用。她欣然地搬进了军部家属大院，同黄军做起邻居来。看到那些在革工联做基层头头的军部家属这几天都喜气洋洋的模样，她就知道一个巨大而威力无比的阴影，正在逐步向红总逼近。大家这几天所作的忙碌和努力，或许能多少延迟这阴影逼近的步子，却很难摆脱或打破那阴影所代表的凶险厄运！她被这种预感所困扰，就同黄军作商量。黄军却大大咧咧地说：“不要疑神疑鬼！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是毛主席发的号召！杜军长会连这点都搞不清吗？”她对黄军具有这样一个直线式的脑袋感到羡慕。因为他无须受疑惑、困扰和忧虑不安的折磨。而她就不行。

也许女孩子命定就应该更多愁善感。她直到今天，都把杨老师摘给她的那朵白纸花，放在自己的枕头边。每次睡觉前都要看它一眼；一看到它，眼前就会浮起袁世清那张清秀腼腆的脸。那张脸在活着的时候，常会借梦境来打搅她。想不到在这位同学的生命结束之后，这张脸反而变得更鲜明，更执拗地经常前来拜访她。如果他知道当初想整一整他的真实动机，是出于一种更隐秘、更深沉的感情，他会谅解她吗？不，不会的。她心里对自己直摇头。他只会觉得自己更残忍自私，更工于心计，更不择手段。每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史苏星就觉得痛悔不已！但是，她从来就没有在给父亲的信中提起这件事。因为她觉得这不仅是自己的羞辱，如果父亲知道了，也会觉得是他的羞耻。

自从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她一直在等父亲的信；希望北京解放军三总部的政治气氛和动态，可以给她把握下一阶段文革运动的发展趋向，提供一条宝贵的线索。可是父亲却迟迟不来信，使她送出一封信之后，不得不又追寄了一封；并决定，在收到父亲的回信之前，尽量保持低姿态。她对蔡主任老是问她父亲有没有给她写信是敏感的。对邀请她上他家作客，更持警觉态度。可是她已经打定主意，在没有得到北京的最新动态之前，她不应接受蔡主任的邀请。对同伴没有提名让她参加材料审查，她觉得一点都无所谓。她此刻所在意的，是红总跟市委进行秘密谈判的情况，她预先竟一点不知情，只是事后才在红联指的总部会议上了解到；会后才由郭贤正式征求她的意见；使她产生一种红旗团被排除出核心决策圈子的感觉。这种由于被冷撇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郭贤一下就意识到了，就拼命地往他自己身上拉责任，说这件事是由他负责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只是几次都没有跟她联系上，才耽搁下来。这么重大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把红旗团撇在一边的。锡城市的夺权斗争没有红旗团的参加，是不可想象的。以郭贤的为人，以及他讲这番话时的神情，史苏星不能不暗中承认自己有些反应过度。可是今天经蔡主任这么重新一提，不由地又使她产生了疑惑。听说“石下草”总部被扣人员之一，就是秘密谈判的知情者。公安局是否在审讯中发现了新的情况，她不敢断定。但是听蔡主任的口气，驻军对这一谈判本身，以及锡城造反派通过这一谈判同市委商定的“联合办公、造反派监管”方案，显然是抱否定态度的。因此，联席会议决定同解放军讨论夺权问题这一条，看来暂时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回应。当然这些都是具体问题。从大处着眼，史苏星时下最关心的，是在向

资反路线发动总攻击的新一年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取最后全胜的历史关头，红旗团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史苏星，将会在锡城的文革舞台上发挥什么样的历史作用？这是她所在意的。沉浸在这样一些念头里，她甚至对会见最后是怎么收场结束的，都没有注意。

奚大雄和其他谈判代表，当然不会特别去揣测注意史苏星此刻的心思。新年以来，他们也发现她在公开场合变得越来越沉默，揣摩是长大了一岁，象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大概会在每一个新年的开始之际，对自己提出一些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的目标要求。而少开口，也许是好多年轻人想逼使自己变得更成熟、显得更深沉的一条捷径；如此而已。他们此刻更关心的，是造反派参加联合审查后，红总被抓的人何时能候释放？最终将以什么方式放出来？几天来，锡城市已经被“造反派坐大牢”的消息，搞得风风雨雨。几家主要造反派的基层组织人员，都感到了原保守派组织人员兴高采烈、跃跃欲试的情形，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都把眼睛朝着上面看；看刚发的《联合声明》有什么用？发了声明以后又有什么新动作？奚大雄第一次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从不失眠，从“石下草”总部的人被抓起，他却开始变得常常睡不好觉了。

三天以后，老傅给奚大雄打电话，告知“石下草”兵团三个被捕对象的情况，比葛富林所说的复杂严重得多；建议红总或者接受蔡主任的释放条件，或者就暂时不要再管这件事情。奚大雄就打电话同葛富林商量。葛富林不服，直接找雷竞天了解内情。雷竞天又跟奚大雄打电话，告知他从材料审查中得到的印象，与“石下草”兵团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不明白老傅怎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奚大雄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势，召开勤务组会议商讨对策。以葛富林为首的多数派义愤填膺，主张给同走资派和老保穿连档裤的军队当权派一点颜色看看。以育文庆为首的少数派，则认为同解放军不能硬来，采用“革命造反”的老一套只会适得其反。小育有了以前几次轻举妄动的教训，如今俨然以稳健派自居。双方各执一词，都有难以忽视的理由作依据。

奚大雄一筹莫展，委疑不决，就只好再次向红联指的秀才们求助。对方约他去红联指总部面谈。所好总部就设在市中心附近的文物博物馆内，同时挂着“苏南工学院院长征兵团城中办事处”的牌子。奚大雄带着育文庆五六分钟内就赶到。这文物博物馆虽然被革命者所征用，表面上革命气息显得炽烈，细细用鼻子一嗅，中国文人墨客的传统请调就扑鼻而来。一走进那紫红色的楠木大厅，抬头是雕檐画梁，触目是红木的茶几桌椅和苍翠的松石盆景，还有一块临摹范仲庵手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硕大横匾，似乎被革命小将认为符合其所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怀，经“破四旧”之狂飙，竟然劫后余生，堂而皇之地高挂中堂。在范老先生的手迹两旁，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小将，用又活泼又老辣的行书写下的一副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使人觉得气势磅礴，意象万千。两位工人造反派巨头一进入这样一种氛围环境，顿觉才疏学浅，文革一心要扫荡的尊师重道之心，立时死灰复燃。

红联指参加商讨的不仅有曲湘川、王小燕，以及中途介入的史苏星，坚当革命小将智囊而不愿出头露面叱咤风云的马老师，也参与了讨论。

…………第二天，监狱外的示威队伍没有撤离，大街上近十万主力军队伍浩浩荡荡，高擎主席画像，高举革命红旗，高唱战斗歌曲，高呼拥军口

号，穿过锡城市的主要大街，穿过市中心，穿过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观摩人群，直奔设立在市委大院的支左办公室。

蔡国柱倒背双手，站在三楼办公室的窗口，注视着市委大门前一队队行进而过的造反派队伍，一言不发，脸色严峻，那功架模样，会使人回想起四个多月前陆波在同一个地点所采取的同一姿势。然而两者的情况，毕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市委的大门口，昂首挺胸，严阵以待，站立着两名以前所没有的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他们目光炯炯，威然挺立，眼前使人眼花缭乱的旗帜袖章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是不会扰乱他们的心境的。其次是造反派的队伍，并没有围困市委大门、堵塞交通的图谋，而是秩序井然，鱼贯而过，使蔡国柱无须承受老陆波所承受的那种心理负担和压力。然而他的心情，仍然是翻腾起伏，在波峰浪谷中盘旋打转。作为一个军人，他照理是不应该这样沉不住气的。眼下所发生的一切，这市委门口的游行，那监狱旁边的示威，都是早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向杜军长作过请示和汇报。军长的回答很简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拿出你们的道道来！”他知道，军长不是代表自己在说话。他心中已经有了主张，但是不是端给军长，却需要决断和勇气。如果造成不利后果，他个人无疑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驻军中的好多中上层军官，早就憋着一肚子闷气，一三四团扣押造反派，不过是一个爆点。蔡国柱虽然自己的妻子也受磨难，作为不是行伍出身的军中秀才，他不会象军中同僚那样简单地意气用事。支左办公室接待站前哭哭啼啼的诉苦申冤，虽然使他不无同情，却很难左右他的思想立场。军长了解这一点，才把支左重担交给他。他意识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急风暴雨般的大动荡时期。人民解放军作为国家和平时期的守护者，对维护国家政局和经济的稳定，负有神圣的使命和责任！而要成功地履行这种使命和责任，光靠军队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从踏上地方第一天起，部队就面临着依靠谁和打击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似乎很好解决；甚至可以说，在毛主席发出支左命令时就已经解决掉：“关键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支持革命左派还是支持保守派。”《解放军报》的社论对此讲得很明确。按照“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文章，这里所指的革命左派，很显然指的是红联指红总这一类造反派组织。然而，可惜亦可喜的是：他蔡国柱不是本本主义者。中国革命如果全照着字面上的东西办，可能直到今天还在漫漫黑夜中摸索爬行。接见造反派的代表是必要的，宴请红总红联指的头头也是必要的。但是向军中同僚保证：造反派中的坏人一定会被清除，穷凶极恶的阶级报复者必然会受到惩处，他们的家属会在单位里重新受到尊敬和尊重，这些不仅同样必要，甚至更为重要！这里面，不久涉及到他个人能不能继续受到军长的信用和同僚们的看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连军长本人的权威声望，都交托在他的手里了！试想：他能按照那些本本条条和造反派的吵吵嚷嚷，随随意意地把人放了吗？他如果这样做，那不是对那位团长，以及团长所代表的一大批中上级军官，盖面抡了一个大耳光吗？如果说，人民解放军是稳定国家的基石，倘若连基石都稳不住，都变得心中怨气冲天，那整个国家就会完蛋！因此造反派的那种要求，恐怕连军长都不敢轻易答应，他一个军政治部主任，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于是左思右想，他就向造反派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借此既不操之过急地同造反派的关系搞得抽张拔弩，也给军中同僚一个咽气的台阶和面子。可是，谁想到对方不领份。

不仅不领份，还既然要以所谓的“革命两手”，来对付解放军的“两手”，

一面搞拥军，一面到监狱前去闹事，公然向军队示威施压！这些造反派，以为在战火硝烟中跌打滚爬过来的人民军队，会象旧市委一样，被其乱哄哄地一闹腾，就“哗啦啦”地垮掉吗？该到下决断的时候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终于决定把经过深思熟虑的“道道”拿出来，并不仅仅是因为造反派不知好歹，欺人太甚；也是根据最近几次跟军长的接触，他发现军长的态度对造反派也变得越来越反感和不耐烦。军长的老伴并不在地方上干；因此他以前对造反派的态度，充其量不过是中间立场，不好不坏。他在那次同造反派一起进餐时所作的祝辞，也是真诚的。蔡国柱并不知道北京发生了几位将帅“大闹怀仁堂”的事，但是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却是下来了；也听说军区司令员刚刚下来看过军长。他从中很聪明机灵地猜测到：促使军长态度改变的力量，必定来自军队高层。在军队不比在地方，不仅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天职；上下级之间在出生入死中结下的血肉情义，更不可小看低估。蔡国柱既然已经把军长的立场态度及其来龙去脉摸清吃准了，就没有理由再犹豫。

锡城市惊醒了！锡城市的大地在摇晃震动！锡城市的市民一觉醒来，从窗口朝星期日的街面上一张望，只看到一辆一辆的草绿色军用大卡车，每辆车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首尾相接，不见尽头，在锡城市的大街上隆隆滚动。但是他们光凭眼前的景象，并不知道这隆隆滚动的车队，把十几公里长的围城马路，几乎团团绕了一圈！他们举目眺望，只见目之所及，军绿色的卡车，在缓缓地朝前滚动，白晃晃的刺刀，在寒风中闪闪发亮。战士们脸孔都极严峻，严峻的脸孔配上车厢板上“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横幅标语，配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尖，配上宣传车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告锡城市人民书》，使那些昨天还兴高采烈上街举行拥军大游行的造反派们，个个目显惊惧之色，脸露惶恐之状！

“……最近一段时间来，一小撮混进造反派组织的坏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监狱，呼喊反动口号，公开为被关押的犯人鸣冤叫屈，鼓劲打气！公然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示威挑衅！我们要严正警告这一小撮坏蛋，赶快悬崖勒马，缴械投降！

否则，你们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厉打击！

……全市的革命人民，请你们紧紧地同人民的子弟兵站在一起，擦亮革命的眼睛，识破那些批着革命造反派外衣、干着反革命勾当的阶级敌人，跟他们进行大无畏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锡部队，永远做你们坚强的革命后盾！

……”宣传车的广播喇叭里，还不时响起了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声音。这两大内容相混和的严厉声音，在锡城市的上空，伴着仍然充满萧杀之气的二月晨风，一遍一遍地震响回荡。它向全市人民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不要被昨天红总等所策划组织的“拥军游行”所迷惑欺骗，不要被十万人上街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不要以为人民解放军会对监狱前闹事的造反派勇士们袖手旁观，妥协退让！人民解放军驻锡部队奉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将对任何敢于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的人，给予致命性的打击！

解放军的武装军车示威大游行，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时光，仍在持续进行。几百辆军用卡车，就这么沿着围城马路反复地转圈。除了那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增添了某种喧哗的情调，军车大游行的总格调，是威严的，肃穆的，平稳而有秩序。只有在经过“石下草”总部驻扎的市航运大

楼前的时候，才出现了异常的情况。那灰白大楼顶上的广播喇叭里，对着行进中的解放军宣传车喇叭和军车游行队伍，毫不示弱地发出一个针锋相对的女高音：“……敬爱的人民解放军驻锡部队广大指战员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应该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能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如果任何人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威望，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违反毛主席的教导，不支持革命左派，而支持保守派和走资派，我们就绝对不能盲从，绝对不能实行奴隶主义！”

……锡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们，经历过半年多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搏斗的严峻考验，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那大楼下面一侧，是同样有着灰白颜色的工运桥。围城路从桥上通过，就算进入了闹市区。路两边的人行道上，站满了围观的人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是“石下草”兵团的成员或追随者。也许是受了楼顶上喇叭声的激励鼓动，也许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许他们中有好多人因为是合同工、临时工而特别具有斗争精神，他们并没有显出惊恐惧怕之色，而是对着卡车上的子弟兵指指戳戳，大喊大叫。有的还朝车子上掷传单。也有几个年轻的姑娘，默默地举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人民子弟兵必须为人民”的标语牌，满腔悲愤地注视着车辆一到这一地段车速就明显加快的军车。

而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座百货大楼前，又是另一番情景：每一辆经过这一地段的军车，速度都放得很慢。大楼前一大堆热情洋溢的人群，守着几个罩着黑色棉套的大保暖桶，把一碗碗的红糖姜汤高举到头顶，递给那些被车上的冷风吹得脸孔红通通的战士，因为军车仍在开动，脚下就不停地追着车子小跑。那些被前面所碰上的敌视态度搞的疑惑纳闷的士兵们，喝进甜醇醇、暖洋洋的姜汤，心里终于释然。刚才受那些反宣传喇叭声音的诱惑，曾按毛主席的教导在心中问了几个“为什么”，此刻似乎有了答案。为什么那些人尽用敌视的目光看待人民子弟兵，就因为他们是受了阶级敌人蒙蔽；而此刻碰上的人群，才是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武装起来的亲人。亲人相见分外亲，扳得僵挺挺的脸孔，就露出了欢快的笑容。一笑就使原先那种庄严肃穆的形象一扫而空，使路边心存敬畏之意的观众们蓦然发现：这些威严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好多原不过是一些未脱娃娃气的毛头小伙子。

百货大楼的马路对面，就是市文物博物馆，红联指的总部。王小燕，曲湘川，史苏星，黄军，以及闻讯赶来的奚大雄，育文庆等一伙人，以及红联指的一大群工作人员，都愣愣地站在总部的门口，注视着大街上一辆辆慢慢移动的军车，也注视着大街对面喜气洋洋的姜汤供应者，个个脸色铁板，人人显得沉默。但我们不知道这种沉默，是代表镇定自若？代表沉闷气忿？还是代表迷茫困惑？突然之间，却听得王小燕一声猛喊：“扯旗！抬毛主席的像！”立时有人响应，把比二辆卡车车厢面积还要大好多的“锡城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的大旗，“哗啦啦”地插到了人行道与机动道之间的地带；大旗下面，还竖起了一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巨幅画像。还有一名业余书法家按王小燕的指令，针对一辆辆军车车厢板上“镇压反革命”的标语和宣传喇叭的叫喊，挥动巨毫，写下一条一张纸一个字的大幅标

语：“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人，自有后来人！”

二十四个红卫兵小将，一人擎一张纸，对着游行军车一字长蛇排开，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标语阵。北风吹乱他们的头发，掀动他们草绿色的军棉大衣，扫刮着他们神色坚毅的脸庞。他们和车上的子弟兵年龄相仿，穿戴相似，都以为是毛主席的忠实战士；双方目光定定相对瞪视，彼此间的心灵距离，却好象隔着崇山峻岭，深洋大海。对那些子弟兵来说，他们大都来自穷乡僻壤的内地农村，部队里几年接近现代生活水准的经历，也许是他们中间不少人一生生活的顶峰。而这些手擎标语的同龄人，他们大都却是新中国的大学生。在那些农村战士出身成长的地方，或许要几千几万个同龄人中，才能侥幸摊上一个象他们这样的幸运儿！这些战士并不懂得革命造反是怎么回事，但是从这些貌似文质彬彬大学生的眼中射出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从那跟军车上“镇压反革命”的标语针锋相对的大幅标语，从几乎要横插到马路中央而使军车不得不向另一边避让的旗帜画像，就知道是碰上了跟航运大楼前同一拨观点的对立派，遇见了同属于首长要以武力加以警告的对象。他们很纳闷：这些天之骄子为何不珍惜他们的幸运和灿烂如锦的人生前途？他们一毕业，就必定会得到五亿农民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户口和国家干部身份，却为何要面对钢枪，妄论“砍头不要紧”之类的狂言，把头颅当游戏玩？如果为了什么“主义”真把脑袋砍掉了，甭说这城市户口和国家干部身份都成了虚空，也甭说浪费了国家和人民所出的大笔经费教育，更对不起茹辛含苦将他们拉扯成人的亲人父母呀！唉，新中国的一代大学生，怎么多读了书反变得如此糊涂？不知好歹！他们看看毛主席画像中所接见那些红卫兵，个个欣喜若狂地挥动着红宝书；再看看眼前擎着大标语的这些红卫兵，却擎着标语对人民子弟兵个个怒目相向！而马路另一边的那些脸色眼神，却又是那样温暖如春，可亲可爱。面对此情此景，就不再象先前所开过去的那些战友，喝了姜汤就觉得心中恍然大悟似的，而是目迷心乱，心中觉得很困惑。那甜热的姜汤，似乎不再能发挥先前那种能使战士们明辨是非的神功，对到底怎么区分敌人和亲人，心中变得一团混乱！联想刚才在航运大楼前听到的那条反复播放的毛主席语录，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之类，更是如坠迷雾之中！

王小燕注意到了车上士兵们的迷茫脸神，觉得她所布下的革命阵势，已经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心中不免有些暗暗得意，沾沾自喜。可是很快就有人非议，觉得那样的标语不仅显得唐突，而且有些自动对号入座的味道。只要解放军不直指红联指红总是镇压对象，就没有必要摆出跟解放军公然作对的姿态。王小燕不知道是谁率先提出异议，怀疑史苏星刚才在几个人耳旁唧唧咕咕的样子，是导致其他红联指头头最终要求撤掉标语的主要原因。然后有人从门口跑出来报告，说是有重要电话，曲湘川随即进门，她亦紧随其后；满心以为是盼望已久的郭贤从北京打来的。然而不是，电话是雷竞天从支左办公室打来的，转告蔡主任的一个重要通知，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最后通牒。但是这个通牒，并不是发给红联指的；而是请红联指转告红总。对红联指的革命小将，蔡主任是满腔热情盛意邀请。

“如果红总拒绝支左办的责令，你们红旗团参加不参加行动？”听到电话内容的奚大雄脸色铁青，两眼盯着黄军。

“我们听总部的。”黄军回答得很干脆。

“你这话是否也代表小史的意见？”王小燕追问。

黄军语塞，转首找史苏星，却发觉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总部。

第二十章 铁拳

驻锡部队举行的武装大游行，已经告一段落，而红总必须对蔡国柱提出的“最后通牒”，在下午三时前作出答复。奚大雄急忙赶回红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工学院院长征兵团的曲湘川和王小燕，红旗团的黄军，都列席了会议。勤务组十几个人员中，就葛富林没有到场。不是他因故缺席，而是有意没有通知他参加；因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就跟他直接有关，不得不临时实行“回避”政策。他如果在场，每个人就无法畅所欲言地发表看法，因此回避是必要的，尽管红总并没有正式的会议回避制度。而且在不让其本人知情的前提下，就剥夺其开会的权利，严格地讲，也不可以算是一种公正的回避制度。驻锡部队对造反派采取的“革命两手”，所作出的反应极其激烈而强硬。这种激烈强硬的程度，超出了任何一位与会者的猜测和估计。由几百辆军车组成的武装大游行，已经使人很吃惊；谁想到游行尚未结束，蔡国柱就通过雷竞天告诉红联指，并要红联指转告红总：在以葛富林为首的一小撮坏头头的把持操纵下，“石下草”兵团的所作所为，已经滑到了反革命的边缘。红总必须在下午三点以前，撤销葛富林在“石下草”兵团的领导职位，改组“石下草”的领导班子，否则驻锡部队将采取必要行动，把江南航运公司重新置于无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并声称：这对红总本身，也是一个考验。并要红总对照“石下草”兵团的情况，向支左办报出一个全面整顿组织的计划和名单出来。通牒没有提葛富林在红总的职务，但这是不言而喻的。与会者所要讨论决定的事情，既复杂，又不复杂。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接受还是拒绝？投降还是对抗？生存还是毁灭？前两点都极简单；第三点所包含的涵义，却并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很清楚。

接受与投降，是否就意味着红总能够生存？如果葛富林和“石下草”兵团不过是第一个接受开刀者和牺牲品，那么谁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如果红总的人，下至基层组织的头头，上至总部勤务组的成员，凭一些牵强附会的罪名，可以任人宰割，任意改组，即使红总因此经受住了所谓的“考验”，红总还是原来意义上的红总吗？如果它的各级头头，都换上了驻军所喜欢的那些原革工联的所谓“党团骨干”，如果它的生存，是以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大换班”作条件，这跟毁灭又有什么区别呢？红总的与会者中，除了奚大雄和育文庆，心事沉沉默默地暂时不开口，其他人都很激愤，都觉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都觉得如果造反派真要表现自己是硬骨头，就应该泰山压顶不弯腰！

红联指的三位学生领袖作为会议列席者，虽然没有表决权，但是他们的立场观点，可以直接影响表决结果。但是他们却好象已经在路上商量好似的，都执意不开口，似乎存心要把革命小将风风火火的本性收一收，做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旁听者。直到有人走进会议室，通知红联指总部找曲

湘川接电话，三个人一起接完电话走向会议室，才把革命小将的本色重新抖露起来。王小燕和曲湘川转告大家：郭贤刚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北京高层的一些军头，以军人出身的农林部长谭震林为典型代表，掀起了一股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攻击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的“二月逆流”！据说，谭震林对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拍台子，把手指都拍断了；气焰嚣张得很！因此锡城市所出现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二月复辟逆流在本地的一种反应。我们所面对的，是一条新的带枪的刘邓路线。他们要使江水倒流，地球翻转，革命人民的容忍退让，是不能使镇压者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他们既然已经磨刀霍霍，造反派在这场斗争中，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面对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张牙舞爪，我们红联指当场就已经叫出了这样的革命口号。革命可以被浸入血泊中，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极少发生的！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已经奋起反击。我们一刻也不能停留，必须立即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两个小将此刻轮流发言，滔滔不绝，慷慨激昂。曲湘川讲的时候，王小燕在一张纸上“唰唰”地写；王小燕讲的时候，曲湘川也在那张纸上接着“唰唰”地写。黄军从来就不是一个雄辩家和宣传鼓动家，与会者们大都了解这一点，因此对他没有发表类似的一通演讲，并不意外。他只是很简短地说：革命面临危机，革命成果可能会得而复失。造反派必须加强内部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坚决打退“二月逆流”的猖狂反扑！

黄军的这段话，与前两个小将的发言加在一起，代表了锡城市两个最有名望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明确立场，自然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发完言，接过曲湘川递给他的一张纸看了一下，点头说了声“很好”，接着扬头对大家说：刚才曲湘川和王小燕拟了十几条战斗口号，我读一下，看看大家是否还有修改补充意见：“紧急动员起来，迎头痛击二月复辟逆流的猖狂进攻！”

……“提着脑袋干革命！”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人，自有后来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与会者听了都说好，就奚大雄沉思了一下，建议增加一条“警惕保守派死灰复燃，决不允许资反路线反攻倒算！”大家认为他不愧为红总的第一把手，道出了千千万万主力军战士心里的担忧。奚大雄见没有反对意见，就要求与会者马上回去发动，务求在天黑之前，把这些战斗口号贴满锡城市的大街小巷！

“老奚，我们是否再跟蔡国柱碰头协商一下？看能否取得某种相互理解。”散会后，在会上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的育文庆，忧心忡忡地向奚大雄建议道。

“我也是这么想。你们觉得怎么样？”奚大雄转首追求三位学生领袖的意见，他在会下并不如在会上显得那么豪壮。

“可以联系一下，谈判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曲湘川也不豪壮。

奚大雄拨通了市支左办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蔡主任不在办公室里。如果有急事要找他，可以跟红联指总部联系一下，他十几分钟前乘车离开去那里了。奚大雄刚搁下电话筒，电话铃就又急促地响起来。这电话，恰好是蔡国柱从红联指总部打来的。首先问奚大雄红总是否接受支左办的意见。

奚大雄受了刚刚结束的会议的气氛影响，口气硬梆梆地反问道：凭什

么定葛富林为坏头头？就因为他有一个贪污犯的老爹？难道他革命造反，是想为其老爹翻案吗？他爹从小出卖了他，抛弃了他，后来又利用他作挣钱的工具。在政治上，他同他爹可以说完全是两码事！

他的养母和他脸上留下的疤痕，才能作为衡量评判他政治本质的依据！

可是不，蔡主任在电话里回答说：正因为葛富林觉得党对他不公正，所以他才对党有仇恨。而这种仇恨，在“石下草”兵团所搞的一系列打、砸、抢活动中，在冲击部队驻地、到监狱前示威、对解放军武装游行诋毁诽谤等方面的出色表演中，甚至在“石下草”兵团本身的名字上，都已经作出了雄辩的说明。解放军不搞“血统论”，我们是看成份，但是不唯成份。葛富林如果没有上述种种丑恶表演，我们当然不会把他当作打击对象。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食其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蔡国柱没有料到奚大雄的口气会这么冲，好象几百辆军车的武装大示威，并没有对他起到作用似的，就用很严厉的口气警告说：“离限定的三点种，只有半个小时了。我代表驻锡部队，要求红总立即接受支左办的决定。”

奚大雄说：“很遗憾，我们红总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我们刚才开会集体讨论过支左办的要求，红联指的三位同志也参加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一要求代表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逆流，我们无法接受。锡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胜利成果！我个人无权改变集体的决定。”

“解放军给红总以机会，给“石下草”兵团以机会。如果你们既不领会、也不接受我们对造反派的一片苦心，就只能咎由自取！请你把电话转给小曲小王他们。”蔡国柱显然认为同奚大雄已经无话可说。

曲湘川接过电话筒。

“……驻锡部队支持革命小将、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立场没有变！”蔡国柱在电话里向小将重申：“我为何亲自上红联指总部找你们？就是为了表明解放军跟革命左派心连心！我们也希望红总和“石下草”兵团能够自己把坏人端出来，使革命造反派的旗帜变得更红更干净。可是他们拒绝这样做，我们就只能采取断然行动，并希望革命小将一起参加这一革命行动。”

“你们打算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曲湘川急问。

蔡主任在电话里停了一会，好象是在跟身边的人说话，然后才回道：“按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解放军已经出动部队包围航运大楼。到三点钟，如果红总不改变决定，我们将逮捕葛富林及有关人员，解散“石下草”兵团。我们敬请长征兵团立即派人来现场，一起参加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的革命行动！”

“我想，中央军委并没有指示你们砸“石下草”兵团，抓葛富林。长征兵团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同你们采取的行动，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尽管如此，我同王小燕会立即赶到现场去，再见。”曲湘川搁断了电话。王小燕很会心地看了曲湘川一眼，转首问奚大雄、育文庆和黄军：“你们去不去？”

三个被问者都有些疑惑。他们在会议上对形势发展的严重性，已经有了充分地估计，真到面临实际关头，心中还是有些慌乱。对曲湘川一口答应奔赴现场，也觉得有点金刚丈二摸不着头脑，然而他们还是点了头。奚大雄却对育文庆说：“你就不要去了，留在家里跟各方面联系一下，看看能否组织到一些队伍，立即赶到“石下草”总部去声援。人越多越好。”

接着是奚大雄给葛富林打电话，也给诸申打电话。王小燕、曲湘川给

马进打电话。黄军也给自己学校里打电话。

奚大雄同三位革命小将赶到离航运大楼有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就给解放军设立的警戒线挡住。警戒线前还拦着挤成人墙般的围观群众。他们就向岗哨自我介绍身份，说明要找蔡主任。岗哨就向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汇报。那军官同他们一照面，就立即认出彼此来。他是军部的包裕民包参谋；杜军长宴请时是陪坐，现在在支左办工作。双方就招呼问候。五分钟以后，他们就在大楼前见到了蔡国柱。蔡国柱并不同奚大雄说话，却劈头就问三位小将：“你们的队伍呢？”王小燕说“马上就到”；黄军说小史正召集红旗团在开会研究讨论，估计很快就会带人赶来。

蔡国柱心里有些烦躁，但是不得不稍作等待。他知道：在锡城市市民的心目中，工学院院长兵团和延安中学红旗团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地位，是无容置疑的。解放军需要这两面大旗，在自己的刺刀尖上方舞动飘扬，以粉碎“别有用心的造谣诬蔑”，证明驻锡部队响应毛主席支持革命左派的不争立场。航运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此刻叫嚣得愈加起劲。叫嚣的主题，就是驻锡部队违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他不清楚这些叫嚣，对那些匍伏在用沙袋筑成的简易工事后的战士们，会产生多大的思想和心理影响。这些沙袋工事沿着人行道一字铺开，并一直伸展包抄到大楼的侧后，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工运桥下的大运河里，武装汽艇在“哒哒哒”地巡梭着，八字叉开枪腿的机关枪，蓝幽幽的枪口随着河中的水波，一起一伏，遥遥对准大楼显得黑咕隆咚的窗口。战士们知道对方并没有武器可以构成对抗性的火力威胁，那些如临大敌的沙袋工事，更带有虚张声势和恫吓的性质。黑洞洞的枪口架在工事上，一个个地瞄准大楼的窗口，窗口后面的人，只要一想到那些扣着扳机的指头一动弹，会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一定会不寒而栗。然而，这些举枪瞄准的士兵，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之间，也不乏有文化、喜欢翻书看报的城市兵。听了那些淆乱人心的反宣传，他们或许会变得心神不定，疑疑惑惑；并把这些情绪传染给别人。他们需要有人臂戴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作陪伴，一起蹲在身边作精神上的鼓励安慰。而这些，在蔡国柱头脑中还仅不过是次要的考虑。不管怎么说，蔡国柱并不需要这些士兵真的冲锋陷阵，士气因素并不据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键还是警戒线之后的那些人民群众，他们中好多人，会根据按照长征兵团和红旗团的政治态度，来确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并按小将们评论，对人民子弟兵的行为，来形成和发表他们的评论；这才是最关键的。蔡国柱打量小将们的脸神，明显是一副一时思想还转不过弯的样子。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想小将们一看这场面，该不至于给脸面不受，有俊杰不当吧？这时候，蔡国柱看到有一大群人上了航运大楼的楼顶。看那刚刚竖起的“石下草”兵团的大旗，“哗啦啦”地展示出很齐整的平面；还有一顶帽子，猝不及防地从哪个“石下草”勇士的头上跑走，“滴溜溜”地转动翻滚着飘下楼顶，就知道那六层高楼顶上的风，一定刮得很劲狂。那些人好象在摆弄什么布卷。高音喇叭里的女高音，据说已经叫嚷了大半天时间，却一点不显得有精疲力竭的迹象，反而叫声越加清脆响亮；使得楼下解放军宣传车里传出的男高音，相形见绌。蔡国柱知道这不能怪军车里的男高音长敌人威风，灭人民志气；双方喇叭的功率相差甚远，尽管我们坚信“人的因素第一。”装备因素在某些场合下，好象比“第一”还强。

蔡国柱正这么想，忽然只听得楼下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片喝采似的

的呐喊；那声音不算惊天动地，却也在那一瞬间盖过了双方的宣传喇叭。接着又是一片喝采声。又是一片……。蔡国柱同站立在他身边的红卫兵小将和奚大雄一起循声望去，发觉原来是楼顶上的人每抛下一个布卷，原来就是一条大幅标语；每展示出一条大标语，楼下就有一片起哄声。

那大标语上端从楼顶牵着，下端似用铁条包裹着，作为抵御横风吹掀的坠重，直直地泻下来，一共有六条，标语用词见所未见，除了最后一条，语气之激烈强硬，使人触目惊心：“击退二月逆流，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

“提着脑袋干革命，誓与锡老谭血战到底！”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人民子弟兵，必须为人民！革命造反派，热爱子弟兵！”

这些标语内容，原是王小燕、曲湘川在会议上所拟定的一部分；奚大雄在向葛富林打电话传达会议情况时，一并作了传达，此刻就以这种别具一格的风格，在大庭广众前抛头露面了。葛富林在电话里很激动。当听到总部全力支持他，并不惜为此同驻锡部队摊牌时，话筒里传来了他的哽咽声。

“……我葛富林是铁了心。我不后悔当初跟了红总，跟了你老奚。就是他们把我抓起来，关进大牢，我葛富林生为造反派的人，死为造反派的鬼！”奚大雄叫他坚持住，他会组织人马声援他。现在看到这解放军拉开的阵势，就吃不准需要有多少造反派队伍赶赴现场，采取什么方式，才能挽救葛富林。

蔡国柱见到围观者中有好多人既然跟楼顶上的人遥相呼应地起哄，就愈加烦躁起来。看看手表，三点钟已经过了十分。望望那刚挂出来的标语，什么“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啦，“誓与锡老谭血战到底”啦，一看就好像很有政治来头和煽动力；甚至觉得有点象革命小将的思维式样，看着王小燕和曲湘川的脸神，也越来越觉得长征兵团即使来队伍，亦不象是来助阵而更象是来唱对台戏的，就觉得不能再守株待兔，而应该速战速决。正在犹豫间，但见大街南北两头都有旌旗翻卷。有军官跑来报告：南边来的是长征兵团，北边来的是公路野战兵团，打得标语口号，跟大楼上挂的是一个口径。蔡国柱脸色陡变，命令部队两头堵住，决不允许其在航运大楼前汇合。然后转头对曲湘川、王小燕和奚大雄冷冷地问：“你们以为：解放军可以象刘邓路线一样打倒吗？”然后撇下他们，管自走到他的“嘎斯”军用吉普车前，向等待已久的下属，毅然决然地下达进攻命令。

于是，有一队队的军人，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以小跑步的速度，冲入大楼。解放军的宣传喇叭里，开始声色俱厉地警告大楼中的人不得抵抗解放军的行动，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石下草”兵团的广播里，女高音用悲壮的声调呼喊：“披着军装的刘邓路线，带枪的刘邓路线，终于撕下了他们的伪装，对革命造反派举起了屠刀！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侏子受，最终将逃不脱历史的审批！……”“哒哒哒……”，随着一阵声音清脆而准确机枪扫射，大楼顶上的喇叭被打哑了。然而，这最大功率的喇叭一停，远处长征兵团的宣传喇叭声音却遥遥飘传过来：“……紧急动员起来，迎头痛击二月复辟逆流的猖狂进攻！”

“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

“……誓与锡老谭血战到底！”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人，自有后来人！”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这些发自警戒线之外的喇叭声音，因为距离遥远，传到大楼底下解放军战士的耳朵里，是飘飘忽忽的，听不很真切。站在蔡国柱身边的警卫战士，听得很真切的，是刚刚从大楼里奔出来的指挥员向蔡主任所作的报告：“报告首长，战士们上不去！楼梯口被他们用铁床椅桌等堵上了！”

蔡主任望了望身边的参谋人员。“让公安局派消防车，用云梯从窗口上。”参谋人员建议。

五分钟不到，就有几辆消防车开到大楼底下。“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从宣传车的喇叭里响起。因为有了楼顶上喇叭的竞争，显得分外激越嘹亮。

在这听众所熟悉的歌声中，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市民，眼前浮起了解放大军昔日进城时老百姓隔道欢呼、箜壶以迎王师的热烈场面……。在这人们所熟悉的歌声中，五六架云梯竖起来了；云梯上，不可战胜的解放军战士，间杂着消防队员，一起向上勇猛攀登。他们身姿矫健，动作敏捷，越级而上，很快地向三楼四楼的窗口逼近。只见那些背荫的窗口，人影憧憧，慌乱地晃动。这时候，攀登战士们耳旁的旋律显得更加激越昂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要把反动派消灭干净！让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战马奔腾军号响，革命歌声多么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走向祖国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走向祖国的战场，……”就在第二个“战场”这一音节后，这激昂的进行曲却嘎然而止，一个同样激昂的女高音，取而代之：“锡城市的革命群众们，同志们，解放军指战员们，今天我们苏南工学院院长长征兵团收到驻锡部队的邀请，要我们参加一个镇压反革命的联合行动。我们来了！可是，我们的队伍，却被拦截在警戒线之外！因为他们所要镇压的，并不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仇视的真正的反动保守组织，而是站在文化大革命前列的革命造反派，是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石下草”战友！我们工学院院长长征兵团，对驻锡部队少数人蒙蔽广大官兵所采取的这种倒行逆施，提出强烈的抗议和严正的警告！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

你们紧跟北京谭老板‘二月复辟逆流’的罪行，迟早将受到人民的清算！驻锡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们，刚刚发表不久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社论说得很明确：一个革命战士，当某个指挥员叛变投敌的时候，是决不能服从他的指挥，相反的，要把枪口对准他。所以请你们调转枪口，对准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也在号召全市革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迎头痛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听到这广播声音，那些被拦赶到大楼对面人行道旁边几个小街口和弄堂口的群众，心里很混淆，他们以为这是大楼顶上刚刚给打哑了的那个女高音，突然在解放军的高音喇叭里借尸还魂；但这怎么可能呢？他们不能相信这种推理和猜测。然而，两个女高音不仅一鼻孔出气，连嗓门音调都一样！这类奇迹，恐怕也只能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才会发生。然后，他们看到远处的解放军宣传车里，起了一阵很大的骚乱，好象有推搡扭拉的现象出现。然后，那女高音也嘎然而止了。

“哇 - - - 啊！”人们一片惊呼。这惊呼，并不跟女高音的突然停止有关。

人们看到了大楼窗口前另一个惊心动魄的镜头：也许是解放军进行曲和女高音广播之间的突然转换，使正在奋力攀登的战士们，情绪和注意力受到了突然的干扰影响，一个三楼的窗口，突然间冒出几个彪形大汉，用木条铁棍顶着消防云梯，猛然一声吆喝，那云梯就摇摇晃晃，变向窗口倾斜的斜线为垂直线；然后又由垂直线变成向大街方向倾倒的斜线。云梯上的七八个解放军战士和消防队员，随着云梯的向后倾倒，一个接一个地从倾倒的梯子上摔落下来。那最顶端的两位，身子重重地跟坚硬的路面一碰击，立即昏厥过去。

“哒哒哒，哒哒，”响起一阵清脆的半自动步枪点射。围观的人们又是一片惊呼！只见两具魁伟的身体，象麻袋一样从窗口翻落下来，同样沉重地拍击着坚硬的人行道。殷红的鲜血，从他们头上和身上中枪的部位慢慢冒出来，淌到地面上，象在寒风中缓缓蠕动爬行着的血红色蚯蚓，咀嚼着冰冷的尘灰，沿着人行道的方块水泥砖缝艰难地爬动。那短促的射击枪声，是匍匐在简易工事前的战士，为战友报仇的呼喊；也是一种为时太晚的火力掩护。也许，这些突然发生的惨象，跟喇叭声音的转换并没有关系。因为对正在攀登而上的士兵来说，即使没有喇叭声音的分心干扰，即使他们在全神贯注中发现窗口有人推梯子，除非他们有开枪射击的许可，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云梯掀离窗口。担任火力掩护的战士，尽管也可能被自己一方宣传车上要求他们掉转枪口的呼吁，一时间闹得手足无措，莫名其妙。可是，即使他们没有被广播喇叭所分心，他们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看得有人掀梯子就开枪的指令。他们后来补发的射击，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事实上，大楼底下的所有指挥员，没有任何人发布过开枪的命令。包括蔡国柱在内，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有人会推梯子！

工运桥堍的北边，好象是连串的鞭炮受了大楼这边枪声的引爆似的，一时间枪声大作。

但那全是朝天放的空枪。公路野战兵团的主力军们，大部分由运输一场、二场、三场的搬运工人所组成，个个身强力壮。其中有一部分是草鞋浜的家庭户主或成员，在1975年的罢工风潮中就是骨干分子；凭着其原来就有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其造反斗争精神显得特别旺盛。他们在金阿二、李辉康、冯有强的带领下，眼看着远处高楼上云梯矗立，“石下草”兵团的战友危在旦夕，左冲右突，赴援心切，无奈增援的去路被解放军密集封锁，就奋不顾身地朝警戒线，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冲击。解放军战士们虽然荷枪实弹，但是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全没有上午在大卡车上示威游行时的纠纠雄气，而是处在狂怒人群的冲撞挤压之下，有军帽被扔跑的，有领章被撕掉的，也有脸皮被抓破的。人民的子弟兵第一次经受这种“盛况空前”的人群冲击，不仅外表变得狼狈不堪，内心也是狼狈不堪。行动前上级告诉他们要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还觉得首长饶舌；阶级敌人总是“一小撮”嘛，百分之九十五之外的一伙，这种常识，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而且这也是毛主席的光辉教导，早已烂熟于心的字眼，还需要喋喋不休地重复吗？可是此刻，这千余名打着“锡城市红总公路野战兵团”旗号的人群，把子弟兵当作阶级敌人一样发狂地冲击厮打；他们在那个单位的全体职工人数中，占了多大的比例？是百分之五以下吗？也能算是“一小撮”吗？……现场的指挥员以己度人，察觉到战士们内心的混乱状况，比队伍的外表混乱状况还要严重，就不失时机地告诉提醒战士们，这大批群众，是受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蒙蔽利用，大家争取“火线立功”、入党入团的大好时机到了！公路

野战兵团并没有自己的宣传车；因此也就无法运用毛主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条，来针锋相对地驳斥广大群众“被蒙蔽利用”的反人民观点，就只好化愤慨为力量，更加疯狂地向步步退让的人民子弟兵轮番冲击。就在这时，大楼那边传来了枪声，提醒和鼓励了负责坚守这边阵地的指挥员，就断然拔出手枪，对空“砰砰砰”地开火。其他指战员在束手无策之中，如获至宝地受到启示，都扣动板机向天空中竞相射击。这势如急风暴雨般的稠密枪声，果然使从未经过战火场面的造反派，象潮水一般仓惶万分地急泻而退。好多冲在前面而又色厉内荏的老兄，跑出百步之外，还一个劲地搔头摸首，搞不清自己的头颅，是否还在自己的肩膀上？

蔡国柱作为这场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攥得咯咯发响的拳头，几乎要迸出火星来，心里又震惊，又恼火，又沉痛。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精心策划的行动，竟会在他的眼皮底下酿成伤亡流血！因此听到工运桥堍那边又枪声大作时，几乎气急败坏。急忙派人前去查询。而当包参谋向他请示：对闯上宣传车的四名红联指红总头目怎么处置时，他很烦躁地挥了挥手，只说了极简短的两个字：“驱逐！”他此刻对锡城市革命小将的两面旗帜，真是失望至致！

史苏星明明曾向他表示过：红旗团在关键时刻一定会站在解放军的一边，却迄无踪影。长征兵团到是召之即来，却是跟解放军来唱对台戏的！这一情况加上流血伤亡，同他向杜军长呈交的总体方案，构成了直接的矛盾和偏离。更使他十分恼火的是：当战士们冒着危险在向“石下草”的阵地发动进攻的时候，自己的宣传阵地，却被偷袭了！他知道：如果军长此刻在现场见到这情形，以他的脾气，暴怒之中，弄不好是会掏出枪来毙掉守卫宣传车的警卫的。但是他蔡国柱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他理解：警卫战士肯定是只看到这几个臂戴红袖章的人，前几分钟还同他站在一起说话，那举止模样，分明象是首长的客人。他们怎么会料到：这些客人，原来竟是图谋不轨的歹徒！而具体的详情，蔡国柱一时间还来不及了解清楚。

情况实际发生的过程是：王小燕等四个人趁蔡国柱忙于发号施令指挥总攻时，泰然自若地走到了车前。守卫的战士，只听到面前长有一头秀发的女红卫兵小将对旁边的男红卫兵说道：“蔡主任说这车上的扩音设备是最新型的，功率特大。如果我们看中的话，可以支援我们一台。”

男红卫兵回道：“咱们不等他陪了，自己上去看吧；他正忙着呢。”

然后那女红卫兵对两名守卫的战士嫣然一笑。成天关在兵营里的年轻战士，实在极少有机会接触年轻姑娘的笑容，而且是那样气质高雅的一种微笑，就差没有“啪”地一个立正敬礼以示欢迎；朝着车厢后伸出的一个上车短梯子，极有礼貌地扬了一下手。在轮到王小燕踏梯的时候，靠近梯子的那位战士，还忍禁不住地伸手扶了她一把。上了车后，那广播员和另一个工作人员，不仅注意到不久前这些不速之客曾经和首长在一起交谈过，而且他们的登车显然已经过警卫的同意，就一点没有戒备之意，见王小燕走近广播设备，广播员还想自告奋勇地上前作性能介绍。却听王小燕对他笑容可掬地说道：“蔡主任让我们广播一个讲话，敦促大楼里的人马上投降。”广播员毫不迟疑地把《解放军进行曲》停了下来，转动一下有关旋钮，还作了一个请的手势。于是，原苏南工学院学生会的女高音广播员，威名赫赫的“小喇叭”，就用解放军的广播设备，胡说八道地发出了那一通反对解放军的声讨檄文。解放军的男高音广播员听了开首几句，脸色随即发白；急忙想上前关机，去

路却已经被奚大雄高大的身子阻隔。另一位工作人员见势不妙，也想采取行动，却被两位男革命小将挡住。那车下的警卫战士，既不习惯、也不善于从广播内容上去分辨意外事变的发生，更没有注意到车上所发生的异动。只见得不远处有个首长朝他们死命地挥手，一时还回不过神来。直到首长带着一队人马朝车前扑过来，才如梦初醒，急忙翻身登车，奋勇发挥镇压异变的先锋作用。

被推下云梯而急救入医院的战士，虽然生死未卜，面临让非死即残的残酷命运；两名实现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言的“石下草”勇士，流淌在人行道上的鲜血，已经成为凝结的紫黑色浆块。然而，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由于他们所作的悲惨示范，而后大楼里，最也没人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来推掀云梯，其它几张云梯上的战士，也就很顺利很安全地翻进了窗口。几分钟以后，在没有任何新的流血伤亡事故发生的情况下，就看到有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英雄人民子弟兵，象天兵天将般地出现在大楼顶上。原先那些在楼顶叫嚷呐喊的造反派的好汉们，都把双手高高举过了头顶，一副缴械投降的狼狈相，跟电影里看惯的国民党俘虏兵毫无两样。尽管他们并没有械可缴，两手垂在腰际下的话，也不会对解放军同志构成任何威胁，然而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却责令他们模仿国民党，他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把“誓与锡老谭血战到底”的豪言壮语，扔到九霄云外。

然后，“呜呜”响地开来警车。但是这警车却并不装人，而只是鸣笛开道，制造恐怖气氛。后面跟着的几辆大卡车上，才是解放军按预先所定名单逮捕的人犯。顶头一辆大卡车上，只见葛富林倒背着双手，被押在车厢的顶端。冰凉的手铐，毫不留情地勒进他手腕部位的皮肉里，使他双臂要想挣扎，却根本无法动弹。唯一能够表现他“生为造反派人杰、死为造反派鬼雄”气概的活动余地，就是拼命地想把头颈挺起来；而押解他的解放军战士和公安战士，窥破他的心机，觉得昂首挺胸是革命烈士奔赴刑场时的专利，决不能给坏人窃取，就狠命地把他的头往下揪。这种按地球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所作的拉锯战，自然是对抗拒地球强大引力的一方十分不利。其直接结果，就是使葛富林脸部和头颈一侧的疤痕，憋的通红鲜亮，引得观众中对造反派一向就鄙视不堪的评论家们，扬眉吐气地高喊：“看啊！看那副嘴脸，多凶恶！活脱就是一副牛鬼蛇神的模样！”人群中有人同情造反派的，或是混迹其中刚刚把主力军袖章掖到裤兜中去的主力军战士，闻言心中气得直打战，却认识到在警车一片“呜呜”的鸣叫声中，对着一片片寒光闪闪树立着的刺刀尖，断定此刻不是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最佳时机。翘首眺望南北两头，勉强能看到使悲伤心情得到稍许缓解的造反派旗帜仍在舞动翻卷。公路野战兵团和长征兵团的人马还在；但是结束了围楼任务的部队此刻挥师南下北上，配合刚刚开到的解放军增援部队，把他们也围堵了起来。奚大雄盼望的育文庆组织的救兵，迟迟不见踪影；心如刀绞地看着押解葛富林的军车，从野战兵团被围困的队伍前缓缓经过。他同葛富林刚刚四目遥遥相对，葛富林的头颅就被旁边的一个公安战士朝下一个猛按。

奚大雄蓦然间记起了自己以前相似的体验遭遇，现在却又重新回来落到了他的造反战友身上，不由悲愤交集，扯开喉咙振臂高呼：“向‘石下草’兵团的革命战友学习！向‘石下草’兵团的革命战友致敬！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可是，跟随他一同呼喊的声音，在警车的鸣叫声和解放军宣传车喇叭的压制下，此刻是显得多么软弱无力！所谓的野战兵团，

毕竟是徒有其名，象他那样听过枪弹呼啸、上过实际战场的人，乃是凤毛麟角。

因此刚才一阵对天鸣枪，已经把队伍吓散了一大半。随着又是一个合围，在合围尚未完成之际，又逃散了一部分，此刻野战兵团只乘下近两百名骨干分子，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离工运桥堍不远处的丁字路口一侧。

奚大雄被驱逐出警戒圈之后，王小燕、曲湘川本来要他一同加入长征兵团的队伍。这支两千余人的大学生队伍，也许由于宣传车的喧闹助威，也许是仗着人多势众在不断地呼喊口号，因此他们对北边的枪声，好多人根本就不曾听到，或者听到了也不当回事。其它几个红联指的下属组织，闻讯后也不断有队伍赶来助威，使队伍象滚雪球般地逐步扩大，形成了有六七千人的浩大阵容。因此解放军对南边的红卫兵造反派队伍，一是囿于兵力有限，而是对革命小将在政策对待上也有区别，只是采取了以堵为主的做法，不让他们同北边的公路野战兵团会合。王小燕和曲湘川都觉得奚大雄目前处境危险，劝他和红联指呆在一起较为安全。

黄军则不以为然，认为驻锡部队并未宣布整个红总为反动组织，因此也不至于对老奚马上采取什么行动。奚大雄觉得目前自己的队伍，一定受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和冲击，他必须返回到他们中间去做稳定军心的工作。因此他坚决地拒绝了王小燕、曲湘川的挽留，跟急着赶回学校的黄军同行了一小段路，就握手告别，折入公路野战兵团的队伍。那李辉康和冯有强，耳闻目睹解放军朝天一齐猛烈开火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看着自己的队伍在枪声下分崩离析地作鸟兽散，老奚交给的解围任务不仅没有完成，留下来的骨干队伍又被解放军四面围困。他们一看到老奚，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面对架在沙袋草包上的机关枪枪口，黑洞洞地瞄着自己的伙伴，他们不由自主地寻思：难道，解决掉“石下草”兵团之后，下一个对象，就是公路野战兵团吗？他们周围的同伴，刚才还凶猛无比，此刻却个个显得神情凄惶，面露惊疑恐惧之色。当看到奚大雄指着自己臂上的袖章，同警戒线上的解放军大声争辩着，终于在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的许可下，右腿一跷一跷地，自投罗网地向他们走来，好多本来席地而坐的人，本来望着逐步灰暗下来的天色在作听天由命的等待，此刻都“嚯啦啦”地站起来，同他起劲地打着招呼；那种热烈欢快的样子，就好象是在大年初一外出拜亲访友时，在路上或酒桌前不意撞见了一般。

“诸申呢？”奚大雄一看不见诸申，以为出了意外，心头一沉，一开口就问诸申何在。

知道他是留在公司里布置标语口号方面的行动，才松了口气。然后他找刚才把他放进包围圈的那名军官，申明要找蔡主任。蔡主任没露面，却见到了包参谋。他责问包参谋：解放军把公路野战兵团的队伍包围起来意欲何为？难道他们也成了反动组织吗？包参谋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有关方面正在向上作请示，在上级没有作出明确指示以前，他无可奉告。“什么时候才会下指示？天在黑下来，气温在一度一度地降下来。这些工人同志家里的妻儿老少，正等着他们回家团聚吃晚饭，作为人民子弟兵，难道连人民的这点基本要求都不懂吗？”包参谋了解奚大雄的背景情况，耸了耸肩，意思好象是说：部队里那一套你还不不懂吗？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懂得人民的基本要求有什么用？然后他低头想了想，说道：“这样吧，你可以派人回公司，通知送些棉大衣和棉被来，还让食堂准备一日三餐的伙食，每天送到现场来。”

奚大雄一听，明白对方是在暗示他：问题不会即时解决，要作好耐心等待的准备。同时按包参谋的口吻，猜想这可能也是他体谅到被围人群的处境而作的个人决定，就改变了原先的生硬态度，很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说：“谢谢你对造反派的关照。我马上就派人去办。”

奚大雄安排好派人回公司的事，又就北京来的消息和红总紧急会议的情况，以及航运大楼前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向战友们作了简要的传达介绍，指明天空暂时出现了乌云、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的道理。看到大家的情绪基本上趋向稳定，奚大雄觉得急需赶回红总，了解一下为何育文庆组织不起支援队伍的原因；同时也需要跟红联指及其它主要造反组织联系商量下一步的联合行动。然而，他在警戒线前被挡住了。他再次要求见包参谋。一个军衣上有四个口袋的军人冷然拒绝：“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最高首长的命令。”从六十年代初起，解放军就取消了军衔制和肩章、大盖帽。文革前夕，更把领章上的条杠星星都去掉了。辨别军官还是士兵，主要就凭是仅有胸前两个口袋，还是腰带以下还有两个大口袋。奚大雄愤怒地责问那个军官：“我是锡城市十几万人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你们有什么权利，剥夺我的行动自由。”那军官斜眼朝他睨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就管自走开了。进来容易出去难！奚大雄终于发现：长征兵团战友的顾虑和警告是有道理的。没有办法，只有等诸申领着送大衣饭餐的人来了，设法让他们跟红总总部和其它方面取得联系。

天完全黑下来了。解放军拓宽了警戒隔离带，使围观群众与被围人群最近处也有百米之遥。不要说那些闻讯赶来的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同被围亲人的呼叫对话已变得不可能，在夜幕和距离的阻隔下，现在连双方照面都办不成了。风，倒是息了；不知是因为自觉疲倦，还是对饥寒交加的被围人群起了怜悯之心？细碎而又稀疏的雪花，却懒洋洋地飘洒起来，不时给造反派战士的脸上，毫不吝啬地送上一个又一个凉冰冰的亲吻。这亲吻，使已成家业的人，愈加思念起老婆孩子和家中暖洋洋的气氛；未成家业的小伙子，回想和渴念起恋人的亲吻来：那滚烫的嘴唇，又湿热又柔软又拗挺又灵巧的舌尖，那才是真正的亲吻！相比之下，他们对雪花的自作多情和缠绵，就起了憎厌之心。解放军的宣传车，此刻也不见了。它也需要休息？加油？车上的成员此刻是否正热气腾腾地吃饭喝汤，热气腾腾地洗脸洗脚？还是纯粹对一天所施行的政治轰炸，也感到疲惫？或者，就觉得这孤零零不成气候的近两百名散兵游勇，已经不值得他们的宣传攻击和无私陪伴？稀疏的雪花，飘了几下就跑走了，仿佛很懊悔自己的自轻自贱似的，决计收拾起自己的脉脉温情，不再跟不识抬举者有任何来往。在寒气逼人的黑暗中，造反派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失落感。他们本来是可以拿起文革以来惯用的法宝，每逢困难或心情沮丧的时刻，就轰轰烈烈地唱上一通毛主席的语录歌曲，使悲观沮丧一扫而空。可是经过半天精神亢奋的苦斗，一浪又一浪的轮番冲锋，所消耗掉的卡路里没有能得到相应的补充，此刻又要集中残存的卡路里抵御寒冷，就本着“节约闹革命”的原则，不再愿意用唱歌来浪费所剩无几的热量。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享受精神食粮，有时会因为物质食粮方面的匮乏，而受到严酷的制约。

就在这样一种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喇叭“嘀嘀”地来了两辆大卡车，缓缓滑进解放军网开一面的警戒圈之内。充饥解渴的米饭热汤，有了！挡风御寒的棉衣棉被，有了！同事战友的亲切问候致意，有了！使他

们喜出望外的是，诸申他们还带来了五个经过加工的柴油桶，半车厢废木料，一大桶废机油。熊熊的篝火升腾起来了，金红色的火焰，映亮了重新有了生气活力的一张张脸孔。那些看过《列宁在1918年》又富有想象力的年轻造反派战士，看着那围在人群四周的篝火，就觉得自己好象是回到了列宁时代，走进了被篝火团团围绕下的那个什么大学的布尔什维克大本营，革命的热狂和豪情，又死灰复燃，象柴油桶里的废油碎木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而这些六十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们，此刻在篝火前还看到了使他们更为欢腾雀跃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一面挥动的大旗。大旗上飘扬着一排“公路野战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大字！他们本来不会对这个刚组建不久的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水准，抱有多大的兴趣。但是后来却听说：宣传队里有原市歌舞团的舞蹈尖子，正在排练《红色娘子军》中高难度的片断，就显得兴趣盎然。解放军拓宽了的警戒圈，恰好为宣传队的演出，腾出了足够的地盘。篝火是背景，街灯是照明，半个大街路面就是舞台，他们听到了悠扬声起的乐曲歌声，看到了舞姿翩迁的凌漪。作为一名领舞者，凌漪没有象另外六名女宣传队员那样身穿军装，腰束皮带，而是只穿着深红色的紧身毛衣，使她侧身转向篝火的时候，火的亮光，在她的胸脯腰肢和臀部的连接处，勾勒出优美的曲线。她不停旋转摆动的腰肢，显得柔软而富有弹性。那黑色长筒裤所包裹的欣长双腿，在歌声旋律的陪伴下，仍然显得灵活而轻快。“……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情，一家情……”这歌声，这舞姿，不仅使造反派的观众沉迷，也深深地打动了那些警戒线上的士兵。造反派宣传队的舞蹈水准，那个领舞队员的美貌和十分投入的演出表情，都使他们感到有些意外；要不是那伴奏音乐的单薄，没有舞台的“舞台”，光线昏暗的路灯照明和篝火映衬，他们会觉得是在看哪个剧团的正式慰问演出。他们甚至有点忘怀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观看这种不同寻常的演出，忘记了被他们围着的这一堆人中，有人在几个小时前曾抛掷他们的军帽，撕掉他们的领章，恶狠狠地对他们诅骂……。可是他们也清楚：如果上级发出象处理“石下草”兵团那样的号令，这些人将立即成为自己进攻的目标！“……红旗放光彩，军民鱼水亲！……”歌声旋律变得更加昂扬，造反派的队伍里，好多人都在跟着伴唱。战士中的有些城市兵，几乎忍禁不住地也想加入和唱。可是他们没有忘乎所以。他们明了，如果就在此时此刻，上级一道进攻命令下来，他们会同样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把上面规定要惩处的对象，一个一个地扭获。如果这个领舞者也在逮捕名单上，他们也会照抓不误。这种自我意识，使他们的观赏变得有些走味。那歌声旋律，好象带有了某种嘲讽的意味。毛主席说过，阶级敌人有露出牙齿的毒蛇，也有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眼前翩迁起舞的一群，也许就是化成美女的毒蛇吧……奚大雄此刻，却是另外一种心情。他同凌漪，可以算是久别重逢；自从那次在医院分手之后，他收到过她的一封信，也同她通过两次电话，却从未再碰过面。那次电话就同那封信一样，也是不同寻常的。

在奚大雄的心里，凌漪在市交通局那段“腐蚀引诱”革命干部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谜。

现在他有了搞清这个谜的条件和机会。他秘密约见了建新机械厂的“主力军”头头，要他们搞清夏思云当市交通局长时的“腐化问题”。建新机械厂的造反派，本来的仇视之心主要集中在关厂长的身上，因为他在厂里当政时间长，掌实权，各种得罪人的事，也必然大都同他联在一起。而对来厂时

间不长的党委书记，不仅不怎么在意，而且因为他深入群众，平易近人，颇得人心，因此曾设想要把他作为革命“结合对象”。在唐延安大字报所提出的重用朱坤兴所涉及的干部路线问题上，也是关厂长首当其冲，夏思云只是被认为是秉厂长之意作迎合。这种估计，大致也符合实情。而既然是唐司令的接班人，对夏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有特殊兴趣，造反派们也就按奚大雄面授的机宜，闻风而动地设立了一个专案组，对夏思云展开政策攻心，逼令其交待历史上所犯的“生活问题”。试想夏思云是何等重形象、要面子之人！开始时就必然是死命抗拒，坚称这件事组织上早有结论，主要责任不在自身。造反派摸准他的性格特征和心理，威胁如果不主动交待，就要发动舆论攻势，让他的问题在全厂职工面前曝光。如果如实交待，则保证不予扩散。夏思云老成持重，不肯轻易就范。造反派就另辟蹊径，暗度陈仓，对夏书记的夫人采取突然袭击方式。袭击过程中，向她出示了她为凌漪所作的见证签字材料。“老实交待吧，我们什么都掌握。抗拒到底只会加重罪名！”有白纸黑字为证，造反派的威胁显得沉重而紧迫。夏夫人听说凌漪参加了造反派，以为是她作了告发，就全线崩溃，如实招供内情。造反派拿到了口供，立即向总部报功。奚大雄得知内幕，名义上是为维护革命道德风尚，必须开展必要的消毒批判，内心却是嫉火中烧，为凌漪代人受过遭受不公待遇深感不平忿怒，因此要讨回公道，同时希望扩散开来的影响，能在客观上为凌漪起到某种正名的作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收到了凌漪的电话。凌漪告诉他，她对“老大姐”突然向她哭求十分震惊。老局长目前在建新机械厂处境艰难，希望奚大雄运用他的影响力阻止该厂造反派的胡斗乱批。奚大雄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回说道：“我跟该厂的造反派不熟，只能试试。老大姐丈夫受一些冲击，同你前一段时间所受到的磨难相比，也算不了什么。”“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不喜欢那些芝麻旧帐在大字报上到处传扬！”凌漪的口气显得有些恼火：“早知道会有这种后果，当初真不该搞那份见证材料！”凌漪虽然气势汹汹，却显然并未怀疑到是他在背后作了手脚。奚大雄没有想到凌漪会对这种“正名”如此生气，不由心中发虚，深怕弄巧成拙，连忙答应将尽力按她的意思去办。挂断电话后，随即给建新机械厂打电话，却没有找到有关负责人。就留言，等回音。回音终于来了，却使他大吃一惊！把自己名节声誉看得极重大的夏思云，也许是不堪忍受大字报中所横加的那些添油加醋的恶言秽语，或许是对凌漪在关键时刻的“背信弃义”深感悲痛失望，就在奚大雄去电话前的几分钟，关起房门在厂党委办公室里悬梁自尽了！留下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但这决不是腐化堕落；我妻子可以为此作证！”奚大雄立即给凌漪打电话，告诉她最新的发展情况，但是并没有提那遗书的内容。凌漪听了，在电话里愣了半晌，喃喃地说道：“这么好的领导，说死就死了，真可惜。”就挂了电话。奚大雄放下了话筒，心里觉得很难受。这并不是他和凌漪一样，为党损失了一笔宝贵财富而深感痛惜；也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对夏思云的自杀，负有某种责任。他是为凌漪在那死者心目中所遭受的不白之冤，鸣苦叫屈！这么好的女人，却老是代人受过！他对此心里颇难受。

此刻，他跟这个对其心存愧疚的好女人，终于又重新见面了，他好象甚至都没有料到：她会再次忽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在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时刻和场合，她不来，才是不同寻常和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李辉康也在被围人群之中；她不能在危难之际，

不来见她的男朋友。当他俩四目相遇，彼此就淡淡地点头致意，当着李辉康的面，好象都有点犹豫似的，但还是相互握了握对方的手；然后很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交谈的是什么，奚大雄竟然一下就忘记了。唯一深刻印在记忆中的，是她帮助李辉康拉平了脑后翻卷的大衣领子，用亲昵的口气怪嗔道：“你这人总是马马虎虎的；连穿件衣服都不象样子。”他分辨不清自己那一刻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经过这么长时间，终于再次见到常常会在梦中遇见的人，好象是对他一天惊心动魄经历的一种酬劳；但是他又觉得这种酬劳是苦涩多于喜悦。她那因舞蹈动作而显得分外婀娜多姿的身肢，曾经同他挨靠得那么近，此刻却是隔得那么远。自从收到她那封信之后，他终于明白：他俩本来是可能相互走得更近的；党员的称号和自觉性如果能卓有成效地阻挡这种走近，这世上所有违法乱纪的人众中，就不会有一个共产党员了。他对那天看电影后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至今耿耿于怀。他即使想忘怀，那条一拐一拐的瘸腿，也会执拗地提醒他。可是他从来没有自我检视，如果没有那一次红卫兵的过火行动，他同凌漪之间，真会严守界线永不越雷池一步吗？他能确保自己不加入违法乱纪党员的行列吗？而后，曲湘川以革命的名义，在他与凌漪之间蛮横地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这道藩篱之所以难以逾越，是因为凌漪自己，也自觉加入了制作者的队伍。而凌漪的这种转变，是同她对奚大雄在文革中的期待紧密联系的。如果没有文革，或者锡城市的文革运动没有赋予奚大雄以重任，以凌漪的多情善感和对奚大雄的倾慕之心，她所采取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压制，是不可想象的。奚大雄并没有认识到：正是文革所赋予的那种几乎不可抗御的政治使命，挽回了一个潜在的乱搞男女关系的蜕化变质分子，造就了一个形象高大不负众望的群众领袖。文革带给他的第二个恩德是：它使他摆脱了家庭问题方面的烦恼，给他一种全新的精神寄托和追求。对于这一点，他也并不是有很明确的自我意识。然而，有一点他知道的很清楚：锡城的文革正面临紧要关头，因此与凌漪重逢所激起的胡思乱想，必须从头脑中驱逐出境。他不再留恋地注视凌漪的身影，而是把公路野战兵团的几个头头拉到一起，商讨局势发展前景和对策。首先，他赞扬诸申想得很周到，在被围人员最需要精神激励的时候，带来了新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作出了很成功的演出。可是诸申却摇头否定对他的赞扬：“这可不是我的功劳；我连想都没想到。是凌漪主动提出来的，还借了一辆自行车，把那些队员一个一个地从家里叫出来。”奚大雄听诸申这么说，心里很感慨。一是觉得自己老是估计不到凌漪身上那种潜在的素质和美德。二是再次觉得：象诸申这样的人实在难得！有些人只要一有评功摆好的机会，就拼命地削尖脑袋往里钻。甚至不惜手段，贪天功为己有。无论是过去在机关里，还是在如今造反派的队伍中，都是司空见惯。而他不，人家推给他的功劳，他觉得不属于自己的，随即奉回；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不含糊！他想，在下一次的红总领导会议上，一定要把这个事例专门提一下，以扶持正气。然后，他们集中分析军队的动向。有一条他们在讨论中一致断定：蔡国柱所以不露面，是因为他正在向上级详细汇报一天的“镇反”战果，等候下一步的行动指令。

他们错了！天黑前蔡国柱只是很简要地给杜军长打了个电话，告诉军长最早也得在明天上午才能向他汇报详情。他正在市总工会主持召开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其中几名最关键的与会者，是他在天气傍黑的时分，乘着吉普车，亲自上门去一个一个地请到场的。在这上门亲自邀请的过程中，虽然

不能同刘备的“三顾茅庐”相提并论，却也算是苦口婆心，软硬兼施，才总算比较稳固地把两张王牌攥到了手中。而他认为：无论是明天去见军长，还是驻军确定下一步行动，这两张王牌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他本来以为应该是四张，中途却跑掉了两张，只得到斩获一半的战绩，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想到他所精心设计的方案，仍然可以在不作大调整的情况下粉墨登场，心中还是觉得无限地宽慰。当然战局千变万化，小调整还是免不了的。比如解决了“石下草”兵团，随后把奚大雄手下的公路野战兵团包围起来，就是临时作出的决定。野战兵团本来并不在镇压行动的目标范围之内；但是它自己跳出来了，对驻军行动所作的公然对抗示范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加惩处，他的下一步方案就无法顺利执行。然后是在路上从步话机里听到：奚大雄自动加入了被包围的人群，并要找他办交涉。他就让包参谋出面应付，并灵机一动地突然决定：既然自投罗网地进去了，就不要再让他跑出来。然后转首对坐在身边的育文庆说道：“我这是为你创造了最好的工作条件。红总群龙无首，你就可以尽可能地多争取到一些支持者。”

育文庆沉默以对。他的内心，折腾翻滚得厉害。一边要执行党性原则，另一边却不得不因此而背叛战友情谊；他被这种残酷选择折磨得痛苦不堪。“……两条人命，两条人命啊！”蔡主任一进门就对他反复叫唤的几个字，仍在他的耳边轰鸣。“如果红总采取配合的态度，如果奚大雄他们到了现场，能站在解放军的立场上在喇叭中说上两句，那些人就不会采取那种自取灭亡的对抗行动，伤亡流血也就完全可以避免！”蔡主任的这番话是有说服力的。而其它的那些说法，都使育文庆觉得有点牵强附会，无论在亲人面前，还是在造反派战友的面前，都不足以给他同红总的原班领导人马的分道扬镳，提供理直气壮的理由。只有这一条：人血不是水做的，生命不是面团捏的；最实实在在的一条硬道理，就是造反派既不能也无法跟枪杆子对抗。支持首都三司的中央文革，就能跟枪杆子对抗吗？如果能，为什么连报纸上都在讲：是不是拥护人民解放军，是衡量真左派和假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吗？当然，随着吉普车在弹石路面上的跳动，还不时有其它一些刺耳的反驳话冒出来：“……育文庆，你不要用生命不生命的话来作辩解！事实上，早在驻锡部队决计采取行动之前，你就在老傅的穿针引线下跟蔡国柱作了私下会晤。你的叛变，你的卖身求荣，是处心积虑的！因为你觉得你在红总内部老被人瞧不起；好多人都认为你当第二把手全凭有一块预备党员的牌子，而不是凭水平！所以你就对蔡国柱的引诱一拍即合……”这些指责唾骂，他知道一定会从他过去好多伙伴的嘴里吐出来。而此刻从他自己的心里先进发出来，也许是因为它们是从体内一面发射过来的声波冲击，他那习惯于对外接收的耳膜，对其好象抱着不理不睬的态度。而蔡主任从耳朵外边传进来的“两条人命！两条人命啊！”的叫喊，才把他的耳膜敲得“咚咚”作响，还在他的头脑里形成经久不息的回响。

而同样的叫唤，当蔡国柱嚷给史苏星听的时候，史苏星只是歉意地回道：“你这时间要求也实在太紧了！我一下子要召集齐全体勤务组成员开会都不容易，要召集队伍按时赶到现场难度就更大。好不容易凑了几百人，黄军打电话来说，“石下草”兵团已经解决掉了。我们也就暂时不动了。”她这样对蔡主任作辩解，心里面却嘀咕：“红总和长征兵团都不采你，单凭红旗团的旗帜在楼下一挥，“石下草”兵团就会俯首听命吗？”因此她一点都不觉得，那两条人命同红旗团的按兵不动有关系。事实上，读了父亲最近的北

京来信后，经过心里矛盾斗争了一阵子以后，她已经决定站到驻军一边。但是当她接到支左办的通知，要她带领红旗团参加具体的镇压行动，却担心连黄军都不一定一下转得过弯，更不要说勤务组里那几个新增选的非革军子弟！因此当黄军第一次在红总跟她打电话时，她就含糊其词地怂恿他随奚大雄他们一起去现场，而不是要他立即赶回学校参加会议，以减少会议上的反对意见。

即便如此，会上还是争论得热火朝天。因为红联指总部的人一接到郭贤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在跟曲湘川、王小燕通了电话之后，就马上给各校下属组织打了电话。有了总部的吹风，不仅那几个工农子女反对“叛变”，连革军子弟中，也有人在两种立场之间游移不定。史苏星当然不会把她统一同伴意见的艰难程度，如实向蔡国柱作诉苦；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在自我否定她史苏星在红旗团内的无可置疑的领导权威。因而我们可以说，史苏星这张牌，蔡国柱其实是一开始就操在手里了；问题是史苏星能否把红旗团全部执掌在手，那又另当别论。按实际情形看，如果她当时不略施小计，滞延黄军回校参加反对派的大合唱，还真有阴沟里翻船的可能！而一旦已经形成集体决议，造成既成事实，黄军凭他那浑身奔流的纯正军人血统，就不大可能要执意推倒从来；这一点算是给她拿准了。黄军在半路上碰到红旗团的队伍，看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标语牌，就立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满脸不高兴地嚷了一句：“早结束了，还去凑什么热闹？”

蔡国柱不记前嫌，邀请黄军一起参加晚上的会议，却被他以头痛推辞掉了。蔡主任不勉强，把具体的开会时间和地点写在一张纸上，递给他：“你先休息一下。如果晚上觉得头疼好一点，希望你还是赶来参加。”然后就把史苏星载进车里，驱车开出校门去红总找育文庆。他心想：有了红旗团的革命小将作陪衬，他俘虏后一张牌的把握就十拿九稳了；何况，他已经通过姓傅的预先做了工作。可是吉普车一出门，史苏星就叫嚷“停车”。她对蔡国柱说，学校里还有重要的事情险些忘了安排。她不能跟他走了。晚上八时准在市总工会小会议厅碰头。蔡国柱相信没有史苏星的陪伴，他照样能说服育文庆。果然马到成功，他的“两条人命”之说，似乎对育文庆特别有效用。随后，他当然不会再去找长征兵团。这张最重要的牌是泡汤了，他不再对曲湘川、王小燕抱幻想，而把最后一个目标瞄准市一中“八·一八”兵团。可是对他的“两条人命”之说，市一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同样颇不以为然。蔡主任本以为：雷竞天既然已经在支左办的屋顶下呆了这么多天，相互间又作过多次思想和感情交流，加上“前途无量”之类的种种暗示，他带着自己的人马转向解放军，应该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他也是最早被告知驻军行动的造反派人士之一。可是时隔半天，雷竞天却猝不及防地对他说：经过集体讨论，“八·一八”认为驻锡部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他们同红总、长征兵团的造反派战友心连心，决不当叛徒！“强扭的瓜不甜”，蔡国柱宽大为怀地笑了笑：“好吧，应该允许有个观察考虑的过程。解放军坚信毛主席的话：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说完就退出“八·一八”总部，看看手表，离开会时间还有四五十分钟，就对开车司机说：“去医院看望一下摔下来的战士吧。”一边心里想：但愿他们中间不要出烈士，进一步增添死亡人数。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不幸产生了烈士，对减轻那名战士擅自开枪的罪名，会有很大帮助；据说那是一位全军闻名的神枪手，应该加以珍惜爱护。同时对动员舆论，推进下一步行动计划，也有正面的意义。“坏

事可以引出好事来”；他想起了毛主席的这句名言来。

第二十一章 苦甜相间（节选）

铁镣哐铛，一阵又一阵，这声音是从隔壁牢房里传过来的。葛富林性烈，就象被猎人所捆绑住的一头雄师，不能再腾挪扑跃，却仍然转辗挣扎。这种挣扎，就是老是把脚镣弄得咔啦啦前奔，直到碰上顶头的一扇大铁门，撞了壁，再回过来，钻进人的耳朵中，显得分外清晰而刺耳。奚大雄牢房门上的小铁方框，却很少向外界传出这种使人心烦意乱的声响来。也许这要归功于奚大雄的性子稳重，因此就不象他的患难伙伴那样，老是困兽犹斗地把脚镣弄得咔啦啦张纸。就没办法，移动步子，也把铁镣“咔啦啦”地弄出一阵声响来，捡起那张纸，在阴暗的光线之下，端视了又端视，仿佛觉得事在意料之中，又似乎觉得仍在意料之外，心里觉得有些痛楚。他的思绪，是混淆不清的。在这种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他觉得自己的反应能力，思维能力，分析和观察能力，好象都在急剧地退化。唯一没有减退的，是记忆的能力；不仅不减退，似乎反而有所增强。因为在这近两个月内，他几乎天天都在回想回忆，把刻凿在大脑半球皮质上的记忆沟痕，加深了一遍又一遍。然而，这些沟痕，大都是由一个个问号所组成的，极少有清晰明确的答案。自从上海吹响了“一月革命风暴”的进军号之后，锡城市政治形势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使造反派的人晕头转向。对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直到现在，奚大雄仍然不能领悟，无法理解。他并不知道，当他一边在赏心悦目地观赏凌漪的芭蕾舞姿、一边在心里胡思乱想他同凌漪的关系时，红总的命运，他个人的命运，就已经在离解放军包围圈约有半个多小时自行车路程的一个会议上，基本决定了。

这个会议，是由刚刚从医院探望受伤战士的蔡国柱主持的。蔡主任是一个理智而冷静的军人，不会轻易动感情。可是，当他走进总工会的小会议厅时，他的心里却仍然是余波荡漾。在医院急诊室门前所经历的那番动人情景，使他那颗不易激动的心，还是增加了搏动跳跃的速率。面对那长长的志愿输血者队伍，他没有去点算确切的人数，却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人民，这就是真正的人民！”当听说被歹徒推下云梯的受伤战士因严重内出血急需补血，而医院所储存的血浆不敷所需时，这些真正的人民，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从这些人中间，看到了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大姐。她的肤色是白晰的，有一副知识妇女的模样；但是她那枯燥而没有光泽的灰白头发却显得很蓬乱。在那一头乱发的后侧，缀着一朵布质的小白花。那个医院里的人，似乎对她很熟悉，知道她是一个身患慢性肾炎的老病号，反复地劝她：“你的体质本身就很虚弱，有这么多人排队等献血，你那一份额就让体质强壮的人代了。”可是，她很蛮横地占居着窗口，执拗地说：“你不让我献，其他人也休想献！反正我已经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了，你们不能让我白白浪费掉这么多时间！”正在僵持之际，医院里的同志看到支左办的首长来了，就要他出面做说服工作。蔡国柱上前握住了这位老大姐的手，竭力抑制住自己内心的

激动，用尽量和缓的口气说：“大姐，你的心，解放军领了！我代表驻锡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看着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天比一天兴盛，而决不会被一小撮坏人所糟蹋！”“不，你不了解我的心！”老大姐流着眼泪反驳。她的心情，显然比蔡国柱更为激动。那双干枯的双手，执着蔡国柱的手不肯放松，微微颤抖着，嘴唇也跟着颤抖。蔡国柱知道她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向自己倾诉，可是却因为心情太激动，一下子难以说出口，就回说：“大姐，你慢慢地讲好了，我在听着呢。大家都在听着。”“我那老伴，也是在象……象这受伤战士的年龄，就参加……参加革命的呀！”她哆嗦了半天，却终于憋出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然后就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了。这时候，整个等献血的队伍再也不成队形，而是围聚成一团，把蔡国柱和那位老泪纵横的大姐团团围在中间。大家都可以猜测到：她一定有一个十分悲痛的故事，却被太多的眼泪噎住了，无法吐露。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她旁边站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臂上戴着黑纱。人们一看他的脸神，他臂戴的黑纱，就揣测他同他身边的大姐，有着某种亲近的关系；或者甚至就是同一悲剧中的一个角色。看着老大姐悲愤难言的样子，他在一边也是呐呐嚅嚅的模样，人们就猜测他也一定不善言辞表达。然而，他的情绪显然没有象那位大姐那样波动得厉害，所以大伙还是有理由请他作一些勇于实践敢于锻炼的努力，就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他。

这个臂戴黑纱的人，就是我们早就熟悉的朱坤兴……（此处有删略）。朱坤兴汤足饭饱，兴犹未尽，想到了对他恩重如山、为他招是惹非而如今已命归黄泉的夏书记，就匆匆赶去向他老伴报喜。夏书记老伴不愧为文化干部，立即想到了受伤战士一定会大面积的出血，医院一定会需要献血者。于是就先给支左办打电话查问详情，然后就带动朱坤兴一起赶到医院，加入已经有好多疾足先登者组成的献血队伍。朱坤兴被大家、特别是被蔡国柱期待的目光所打动，终于挺身而出，代老大姐讲述了夏书记惨遭迫害悬梁自尽的大致过程。当他讲到厂里好多职工听到夏书记的死讯后，都自动佩戴黑纱；食堂里职工念叨夏书记是经常去食堂劳动的厂领导，整整三天不供应荤菜以示哀悼，全厂几千名职工，包括造反派在内，没有肉吃也不吵不闹时，……听到这些感人至深的情况，周围好多听众的眼眶都潮湿了。蔡国柱的眼眶没有潮湿。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军人就没有眼泪。他也许是把眼泪吞进了肚里，也许是因为觉得欣慰。而欣慰，是可以抑制泪腺的分泌的。看到这么多人都向他公然显示宝贵的眼泪，他没有理由不感到欣慰：白天对“石下草”兵团所采取的行动，顺应了民心；解放军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此刻，蔡国柱坐在会议桌的首端，左边是育文庆和傅古宝，右边是史苏星和黄军。在会议桌的另一头顶端，坐着朱坤兴。虽然建新机械厂已经有了贾建勋做代表，蔡国柱总觉得带有“削职为民”性质的贾部长，不能说是典型的产业工人代表。而且他知道贾的级别以前比自己还要高，因此在了解到朱坤兴的有关情况后，就临时决定把他拉进会议，即使不派什么大用场，起码也可以压一压贾建勋的傲气。会场上其他的十几名参加者，大都是原革工联和大中兵的骨干分子。他们所代表的各行各业的千千万万基本群众党团员骨干，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一贯的依靠力量和对象。他们是国家的脊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打击他们，就是打击国家。削弱他们，就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可恨的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先是对他们百般利用，后来却又是背信弃义地加以无耻出卖。如今，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情况搞得

乱七八糟，有两大原因：一是地方各级党组织瘫痪了，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二是共产党真正的依靠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普遍的压制打击，溃不成军。现在唯一有能力收拾乱局的力量，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主席号令解放军支左，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为解放军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和政治稳定作用，提供了机会。而稳定政局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地方上被冲散打乱的基本群众队伍，重新集结组织起来？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集结组织起来？这就是前几天军长找他谈话时，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按军长的透露：这也是军区首长，乃至北京军方高层领导基本一致的看法。否则，就不会有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产生和下发。

杜军长是标准的军人，对政治并不在行。因此这些意思，是蔡国柱按着那些东拉西扯、互不连贯的话语，自以为是地作的概括提炼要点。

（此处有大段删略）在工运桥堍熬了一夜的奚大雄极其战友，听到远处有了汽车喇叭声和自行车车铃声，眼前白晃晃的，也感觉到有了刺亮的光，就把趴伏在大衣领子里的头竖起来，把似醒非醒的眼睛睁开来，意识到夜已过，天已亮。昨天那些灰沉沉的阴云，竟然被下半夜起的西北风呼呼响地吹跑了。云一散，昨夜的雪花，也就不可能再返回来舔他们的脸。

东面楼房的上空，红惨惨的，象征着将有太阳会从那个方向探出头来。然而这红光虽然来自太阳，却一点暖意都使人感受不到。在这红光的映照下，没有云层遮挡的晨风一刮到脸上，脸皮上就象挨上了锋利的刀口，生生地发疼；浑身禁不住打一个冷战，就本能地想把裸露的头脸重新缩回到棉大衣的领子里去。可是没有，几乎所有苏醒者，反都把脖颈伸长了。他们看到马路对面的建筑物前，有红卫兵小将在刷大标语。把眼屎黏糊的眼睛揉擦一下，朝着小将手臂上的红袖章仔细一端详，有人就又快又喜，情不自禁地挥起手来。还是延安中学红旗团的小将们有能耐，既然能一清早就闯过警戒线，在解放军的眼皮底下，发动了新一天的宣传攻势：“迎头痛击二月反革命逆流！”多么熟悉的口号，虽然眼睛耳朵昨天才接触到“二月逆流”这个新名字，蓦然醒来就相逢，却有说不出的亲切感。可是有些怪，刷标语的小将们分明看到了革命造反主力军的招手，却不回招，一边继续贴标语，一边不时地同身边几个转悠的解放军作闲聊，对昔日患难之交一副视而不见、不理不睬的傲然神情。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的抵触之处，开始感到困惑。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劲。

红旗团同驻锡部队心连心！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坚决镇压反革命！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真正的左派站出来！冒派货色滚开去！

……“公路野战”战士如梦初醒，那一张张原本显得喜出望外的脸，一下子在刀割一样的寒风中僵住了！几分钟之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昔日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小将们，背着身子离开了，对这边冻了一夜的工人造反派大哥们，没有一个人同情地转过头来瞟一眼。

公司里有人来送早饭。奚大雄好象觉得胃里结满了冰块，一点都不饿。凡是看懂了那几条大标语的政治涵义的人，胃部都产生了类似的感觉，就怪

怨这天早上公司食堂送来的馒头稀饭，味道不对劲，好难咽得下口。

东面楼房上方显现的红光，渐渐地消退了，白白的淡水太阳扳着一副冷脸孔，不紧不慢地爬上了半天空。远处响起了令人揪心的警车声音，“呜呜呜”地被西北风吹过来；响过了一阵子，又是一阵子。警戒圈四周的气氛，也突然大变样。警戒的士兵不再象电线杆似地呆呆挺立在四周，而是很忙碌地堆草包，筑工事，架机枪……一如昨天在围困“石下草”总部时所作的那套程序。考虑到今天被围的对象不仅两手空空，而且是呆在露天，什么依托都没有，解放军那副如临大敌的作派，就特别带有某种戏剧性的效果；或者也许可以说，整个场面本身就是一齣精心导演的戏剧，那种震慑性的作用，使奚大雄手下那些已经在马路旁“野战”了将近一天一夜的主力军战士，心中不免惊恐起来。送中饭的时候，不仅诸申、凌漪都来了，长征兵团的邢冠智老师，也混杂在送饭行列中前来和奚大雄取得联系。他们带来了糟糕得无法再糟糕的坏消息！直到这时候，奚大雄才知道警戒圈外面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删略）……据红旗团从有关渠道得到的最新消息，实际情况是这样：在中央文革小组所编印的《快报》上，最近发了一篇该报记者写的《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支持了谁？》的文章。这个小站在搞“四清”时，陈伯达蹲过点，并总结出其党政组织已被阶级敌人腐蚀篡夺，需要组织夺权的经验。那篇文章主要揭露北京政法公社某些人，在该地支持四清下台干部和各类牛鬼蛇神，以革命造反为名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的情况。陈伯达批示：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

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因此驻锡部队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对同类复辟现象的有力反击。把反复辟的说成是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这就是红旗团为何决定退出红联指，组建“九·一九”革命联合会的原因。史苏星希望这些组织也采取类似的行动，脱离红联指，加入“九·一九”。史苏星的这些劝导，虽然并不足以使大部分红联指基层组织转变立场，却有效地促使这些组织的头头三思而后行，面对情况复杂、真假难辨的情况，采取了按兵不动的政策。

如果说，蔡国柱催生出来的“九·一九”把红总装进了棺材，史苏星、育文庆等几个老造反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奚大雄王小燕已经北上首都同郭贤联系，争取能向中央紧急汇报锡城市的情况。这就好象是给已经钉进棺材里的人，来注射强心针似的。

奚大雄从诸申和邢冠智那里听完情况介绍，正寻思要诸申回去立即同红总的其他勤务组成员取得联系，把总部的控制权重新掌握住，却见到有个红卫兵小将走过简易工事，走过机关枪，正朝这边走过来。奚大雄认出了那张脸，这是黄军手下的一个铁兄弟。每次去红旗团见黄军，几乎都能见到他同黄军在一起。

奚师傅，要我立等回音。”说完还环视左右，显出一种带有机密性的样子。

奚大雄急急读完黄军的亲笔信，才知道他自己所面临的真实处境。黄军在信中向他密告：驻锡部队已经把红总内定为反动组织，很快就会公开宣布取缔。他作为反对驻军的红总主要头头，已经列入逮捕名单。他黄军为此和杜军长碰上了一次头，私下协商的结果是：杜军长最终表示，如果他奚大

雄能代表公路野战兵团，或者代表他个人立场，宣布与红总脱离关系，支持解放军近日的镇压行动，则不仅可以从逮捕名单上去掉，还可以进新成立的九·一九

.....（详情略）"大家表决一下吧，"奚大雄提议："同意接受黄军信中要求的，请举手。"大家的眼睛看着奚大雄的脸神，也看着他的手。奚大雄的手没有动，眼睛却注视着邢冠智。他对长征兵团在关键时刻派他深入重围传言报讯，内心很受感动。他其实一上来就决定不采纳黄军的建议；杜军长对奚大雄的好感，黄军的哥儿义气，敌不过奚大雄对郭贤的相信敬服，对长征兵团在患难中支持红总的感激，对已经身陷囹圄的造反战友的同病相怜，以及他自以为是的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此处有删略）在蔡国柱把红总下属七、八个民愤特大的"反革命"组织一一解决掉之后，就掉转头来，集中精力最后解决奚大雄。当夜色苍茫、冷扳了一天脸孔的冬日终于拂袖而去的时候，当锡城市家家户户的有线广播，打破沉默开始播送晚间新闻的时候，人们听到了驻锡部队支左办公室的一个重要通告：锡城市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劣迹斑斑，罪行累累，是本市牛鬼蛇神借文革之机打着革命造反旗号，同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人民较量的反革命大本营！必须坚决予以取缔！广大主力军战士是受蒙蔽的，应该在收听到这一通告后，立即同红总的一小撮坏头头划清界线，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在解放以后这十七年中，没有那一条通告，那么深刻、那么广泛地触动了锡城市市民的心.....（此处有大段删略）.....这一小小的失望，并没有减低奚大雄的欣愉之情。到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心中对玉芳其实还是很眷恋的。否则，这一刻他就不会怎么欢欣；睡在那冰冷的铁板床上，也不会老是做与她相关的梦。在梦中，他搂着玉芳那肉滚滚的身段，每次正想把伸手去抚摸她的脸蛋或胸脯的时候，她总会朝他动人地一笑，然后或者推说门没有关好，或者借口说给他去拿喜欢吃的酒酿圆子，有时甚至会莫名其妙地说要先准备一下什么包裹，一下挣脱了他的搂抱，就再也不见她钻回到被窝里来。于是他就会连棉袄都不披地从床上爬起身来，屋里屋外地到处搜索她，呼喊她的名字，直到浑身冻得直抖索，醒过来才发觉自己睡在被褥单薄的铁板床上，早春的寒气从牢房铁门的缝隙中逼进来，直钻他的骨缝。而玉芳送来的新棉袄分明已经裹在身上，他才想通梦中玉芳准备的是什么包裹。这新棉袄，是玉芳想到监狱里一定会有人间的温暖，特地为御寒而为他新做的。古时候的穷书生进京考状元，奚大雄的大儿子第一次上学，就会穿上亲人赶制的新棉袄，其中包含着多少希望、期待和关切！他也穿上了新棉袄，身子是暖和了不少，心里想到这一层意思时，却感到很别扭，觉得自己既不是赶考，又不是新入学，根本是不配穿这新棉袄的。他开始后悔，悔不该在玉芳向他"竹筒倒豆子"地坦白交待之后，对她就一下变得很厌味，很冷淡。只是当着老人和孩子的面，勉强保持一种客客气气的夫妻模样；而在感情实质上已经把她拒之千里之外，而把另一个女人作了顶替。他原本想着今后出狱后，一定要作补救。可是，他又自作自受地把补救的机会砸了！当他走近探视室的时候，他的呼息变得急促了。不管怎么样，他今天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心中所有的后悔，都一一讲给玉芳听，并请求她的原谅.....。可是，当他走进门，从探视室被铁条相隔的另一头，看到另一张熟悉的脸庞时，他惊呆了！

我想，你是探望错了人吧。

凌漪，心里很冲动，嘴上却冷冷地掷出一句俏皮话。他没有想到：自己既然会讲俏皮话，而且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按马老师的说法，也算是“环境造就人吗”？

没有，狱了。”

他现在怎么样？知道你来看我吗？

我俩只允许有半个小时，先不谈这些好吗？

他们怎么会让你进来的呢？常地惊疑。

还是靠了你以前的门路。

好歹也算是市里的一个头面人物了。可是他说帮不了我的忙，给了我黄军的电话，说他也许能帮我。找到黄军那里，没有碰上头，却见到了更有名气的史苏星。她说黄军外出前已经跟她谈过我的来意，随即给写了一封短信，也不知信上说了些什么；封上口后要我拿着它去找公安局的一个头。我找到了那个头，递上了信，就进来了。这不？熟人好办事，还是老套套。”

奚大雄觉得如果是黄军帮的忙，还可以理解；史苏星既然也会授之以援手，却使他颇感意外。作为一个很有一点贵族气的将门之女，史苏星对当初选奚大雄作唐延言的接班人，就不很热心。她所风闻到的奚大雄在男女关系上的暧昧色彩，大大降低了这位瘸腿司令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她在锡城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几名主要学生领袖中，所以坚决地转向蔡国柱，也许跟她总觉得工人造反派中鸡营狗盗的味道太浓不无关系。如今，直接跟奚大雄有鸡营狗盗之嫌的女人却撞到她的手上去了，是什么因素，竟然会促使她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奚大雄百思不解。其实，这同样地是出于深藏在她身上的那种贵族气。当她在黄军口里听到傅古宝所作的她当初回绝去红总当内勤的情况介绍，了解到凌漪在奚大雄春风得意之机毅然离他而去，而在他落难之际又决心走回他的身边时，不由对凌漪一下变得肃然起敬起来，以前认为她不过是一只到处沾腥惹骚的破鞋的概念，一扫而空。待到她首次亲眼见到凌漪时，她身上所蕴含的那种庄重、娴静和坚毅的气质，连同那非凡的美貌，更是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就毫不犹豫地交给凌漪的那封信上，把她说成是同自己有深交的一个朋友，务请市公安局有关头头给予关照。公安局头头不知虚实，光知道史苏星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不仅在新成立的军管会主任蔡国柱面前炙手可热，在杜军长眼里也红得发紫，就立即把权力作人情，不仅成全凌漪，而且大笔一挥，恩准她今后每个星期可以探监一次。这些情况，不仅奚大雄无法知道底蕴，连凌漪自己也搞不清。因此她的解释，只解去了奚大雄一半的疑惑。但有这一半，也已经足够了。这一意想不到的探监，实在是使他喜出望外，黯淡了近两个月的眼睛，第一次发出了褶褶的光采。在凌漪面前，他在牢房过道上想好的那些计划向玉芳作的道歉话，早就扔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除了身后在翻看一张报纸的狱警，他一无担心，两眼就肆无忌惮地把她从头顶扫视到脚尖，又从脚尖扫到头顶，发现她仍然是那样地楚楚动人。特别是她的眼神，一点都不回避他的注视；那种渴念，那种炽烈，那种情意缠绵，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就这样，两个人默默对视了一两分钟，还是奚大雄再次打破了沉默：“你还好吗？我还以为你也被抓了。”

没有。

主任划掉了。”

是因为你去医院探视过他老婆？他倒挺念情，什么帐都不算了？口吻。

没有算。

清醒，没有受红总黑头头的引诱陷进黑窝里去。二·二八公社的那些人，对我也还客气，仍把我留在修理厂厂部当内勤。"凌漪意识到奚大雄对刚提到的"二·二八公社"回不过神来，就解释说这是公司里原来革工联的那些人，在解放军砸掉公路野战兵团后新成立起来的一个组织；因为受到军代表的支持，公司里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它。而2月28日，正是主力军陷入灭顶之灾、奚大雄啣当入狱的日子。

你也加入了么？

正在考虑之中。可李辉康已经加入了，还进入核心组；他要保住他的那张驾驶执照，而对方需要有一两个老造反作点缀。"凌漪主动谈到了她男朋友的情况。

你们好吗？

我俩吵架了，

为什么？是因为你要前来看我吗？

算是猜对了一半吧。主因是玉芳前来找我了，我把玉芳的话全都告诉了他。

奚大雄很惊讶："玉芳找你干什么？讲了什么话？"

凌漪瞅了一眼做在探视室一角管自看报的狱警，压低了声调说："她告诉了同你离婚的消息，还说是你主动提出来的。她很伤心，知道你会把什么都告诉我，知道你仍然不谅解她，知道你……"凌漪突然不说下去了。

知道什么？

凌漪的脸微微红了，眼睛慌乱地逃开他目光的注视，但还是用极低的语调接口说："知道你心中另外有了人。我劝她不要相信那些胡加在你身上的罪名；如果我真同你有那种关系的话，现在还会那么安顿太平吗？玉芳却说：她相信我俩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可是你的心已经变了，再也变不回来了。因为她不止一次，听到你夜里在梦中……叫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凌漪最后的一句话说得吞吞吐吐，声音极其低微，奚大雄几乎是从我她那口形的变换上，辨别清这句话的意思来的。这回，轮到脸红了。那个年轻狱警突然抬起头瞥了他一眼，或许是惊奇囚犯也会脸红；或许是假装心不在焉地看报，实质上一字不拉地把他俩的交谈内容都听进去了，因为谈话进入了涉及个人感情最敏感的部分，他觉得有必要检视一下自己看管对象的神态反应。

她还说什么？

她……，法勉强的。希望我今后能接替她的探监任务，经常来看你。她相信你是个好人的，不会永远遭冤屈的。"

你把这些话都告诉辉康了？

是的，原原本本。

奚大雄感到有一股热浪在心头翻滚。他觉得有今天这样一个探监，能见到凌漪，这几个月来所经受的一切，都极其值得，都得到了极大的酬劳！……（以下略）

第二十二章 火线亮相（节选）

老武，我要你给我爹买的降血压片办了没有？一边问刚从上海参观学习回来的丈夫。

哦，纸边都已经发毛的《人民日报》。

你哦什么呀？请问降血压片买了没有？了几分不满。

武遥这下才听清了妻子的问话主题，也听出了她的不满，连忙直起身子，放下手中勾划要点的红笔，挠了挠头，对着妻子很歉意地说："糟糕！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有你这样健忘的女婿，真是福分。

她又走回进来，把一卷报纸往武遥身前的书桌上一放："他倒老惦着你。看这些报纸，今天中午特地送来的；专门为你作的收集，上面都有你的大名。"

我这真是……反正当天就能跑来回。"

怎么劳动大驾，还不如我自己去。

这时候，小杨翼却跑到武遥的身边，展开她的一张最新习作，嚷道："爸爸，爸爸，你看我画得象不象？"

武遥低头一看，乐了，招呼杨玲也过来欣赏女儿的杰作。杨玲凑上前来一打量，只见纸上画了一个线条简单的半身人像，虽然从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看，看不出哪一点象武遥的地方；那一只手托着太阳穴、一只手撑着下巴的姿势，却把武遥思虑问题时的模样，勾勒得维妙维肖。在纸的下方，还用歪歪扭扭的笔划写着："爸爸心方。杨翼作于1967年4月25日。"杨玲不由喜欢得把女儿一把抱起来，很高兴地亲了她一口，连声说道："象，杨翼画得真象！"

小眼睛还真有一点观察力！

告诉爸爸，怎么叫'心方'？

就是……就是，玩。"

武遥和杨玲都笑起来。"喔，你是说爸爸心烦！来，我来教你怎么写这个'烦'字。"武遥自告奋勇。

杨玲推开他的手："去你的吧，看看那些报纸上都说了你一些什么，不要把老爷子的关心给浪费了。我们杨翼才不希罕你教呢！"

对，我要妈妈教！

杨玲抱怨归抱怨，却总是能体谅到丈夫的精力和心思分配重点。武遥深情地朝妻子望了一眼，把身子转回到了书桌上，饶有兴味地阅读起丈人为他收集的《九·一九战报》和《红锡城报》来了。这两份目前在锡城市算得上是最有权威性的报纸，前一份是九·一九革联会的宣传喉舌，后一份是《锡城日报》的"九·一九"战士在夺权后新改的名，现在当然完全处在市军管会的掌管控制之下。自从军管会蔡副主任找武遥谈话，要他参与对全市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的指导工作后，他就注意到自己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这两家报纸上了。

然而，他没有想到老丈人会有心把它们收集到一起，这么前后连起来一读，才使他发现：前几天蔡国柱才向他正式挑明的意思，其实早就通过那些报纸文章作过多次暗示；只是他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或者说，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得这么快。

他们怎么会想到启用你呢？到了那种提示，可是却觉得有些想不通：“不是前一阵子，还死命追查你同红总勾结在一起刮经济主义妖风的事吗？”

唉，全靠老俞站起来主动承担了责任。包括所谓的‘705游轮黑会’，联合办公，和平让权，等等之类，他都一股脑儿地帮我兜下来了！”武遥感慨地说道，然后仿佛沉浸到了回忆之中。

患难见真情，老俞真是个好入！

老俞当结合对象才更合适。他更有经验和威望，情况又熟，基础又强。全市上上下下各重要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哪一个人不跟他熟？哪一个不服他的领导指挥？而你呢，毕竟才来了一年时间都不到；要论人头关系，除了你跟那些造反派打过一些交道外，恐怕只有文教宣传系统一些领导干部知道你的名字。你所熟悉的红总被取缔了，王小燕那帮子人又一天到晚在作检讨。那段时间查你同红总和长征兵团的关系查得这么凶，现在又要用你；要是我换在蔡国柱的位子上，对你才放不下心呢。”或许，武遥沉思了一下：“他们就是看中我在造反派群众中有些影响的缘故吧。军管会目前最关心的，是如何稳定大局，稳定人心。蔡副主任对我说了一大通理由，其中一条，就是由我站出来表态支持军管会，对那些心里仍有疙瘩的人，有助于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

蔡国柱所谈明的结合武遥的诸多理由，和武遥向杨玲所作的解释，应该说都站得住脚。

可是他俩都没有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这一考虑，在蔡国柱向杜军长推荐最终人选的过程中，无疑起着很大的作用。对这种考虑，武遥也不见得心中就一点都不明白；作为一名恪守党性原则的市委领导，他只是不愿意说给妻子听而已。

（此处有大段删略）前几天市中心的百货大楼上，从六楼顶到一楼底层，又重新出现了一连串矛头对准解放军的对联式巨幅标语。它们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雪压青松松更青，抽刀断水水更急！

否定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就是打击文化大革命！

重振革命造反派显赫军威，同二月复辟逆流殊死决战！

在那高楼的顶端，更有一条每个字有半个电影银幕大的横幅标语，触目惊心地呼喊叫嚣：“还我战友！还我红总！还我文革胜利成果！”

……………（有删略）市中心发生的这些情况，立即就通过市公革会更衣人员的记载汇报，传到了蔡国柱的耳朵里。蔡国柱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刚刚研读过，政治风向显然变得有些不利起来。可是他没有手忙脚乱，而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当机立断地作决定：必须让武遥赶在五月份到来之前“火线亮相”！只要雷厉风行地按中央的要求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把拟议多时的锡城市革命委员会马上成立起来，只要上面一认可新生的红色政权，那就生米煮成熟饭，造成了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谁再要闹，就不仅是把矛头指向了红色新政权，而且也是把矛头指向了批准成立这一红色政权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这紧要关头，蔡国柱不能不庆贺自己慧眼独具，选了武遥这样一个几乎无可挑剔的“三结合”领导干部。确实，在所有的市级领导干部中，武遥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的革命左派，跟毛主席革

命路线最紧，同资反路线分手最快，与革命造反派理解沟通最早。市军管会已经把武遥文革以来的有关表现，报到南京军区和中央去了，上面的反应挺不错，称赞驻锡部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选到了一个好干部。如今，中央文革那几个秀才一摇笔杆子，就立即使锡城市风声鹤唳，呈现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但是，真如红旗团革命小将贴的大幅标语那样：撼泰山易，撼解放军难！市军管会不是旧市委。蔡国柱是文人但更是军人！他既有文人的细腻周密，又有军人的铁腕作风，深谙兵贵神速的道理。他决不会象那位陆波书记那样，外面还没有全乱起来，自己内部就先乱作一团，结果被一群乌合之众的造反派闹得人仰马翻。他向杜军长作请示，经过批准同意后，就专门派小轿车去火车站，把刚从上海参观学习整风经验的武遥直接接到市军管会，促膝恳谈，要他作好第二天一早就"火线亮相"的准备。

所谓的"火线亮相"，似乎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发明创造。其内容无疑是最革命、最激进的；其形式，却好象是模仿了西方最反动、最落后的"就职演说"那一套。被确定为三结合场、观点，和被结合后的施政打算。可见最陈旧的资产阶级西方民主，同最新颖的无产阶级东方民主，其间也有可以相互沟通和借鉴的地方。蔡国柱打算：在武遥"火线亮相"的基础上，就选"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正式宣布成立锡城市革命委员会。按已经向上呈报的名单，市革会主任是杜军长，第一副主任当然非他莫属，作为"三结合"中驻军的代表；另外三名副主任依次排名为：武遥，代表革命干部；育文庆和史苏星，为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

（此处有大段删略）杨玲此时此刻，已经完全明了丈夫是在为什么而苦恼。他一方面受人看重信用，一方面又认为：看重信用他的人违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这种事如果挨在官场上好多其他人的身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成为任何思想负担。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管东西南北风，紧跟着看重信用你的人跑就是了；天塌下来由领头的人顶着，跟随者总是不难得到宽恕谅解的。而只有武遥这种人，才会因此变成一个大烦恼！那种神不守舍、丢魂落魄的样子，他是觉得跟着军管会的立场作表态，是践踏了他所信奉的党性原则，还是糟蹋了他所看重的道德良心？杨玲重新捧起报纸，拜读起刚才只是草草扫了一眼的《人民日报》社论："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看待几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开宗明义地说。

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播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的队伍，把革命小将引向歧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攻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 - 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反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杨玲读完全部文章，心里也变得动荡不定起来。看来，丈夫是把社论中所提到的革命小将，同王小燕那批人划上等号了。而把支左解放军，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走吗？显然，这很难。但问题的关键是：杨玲除了对把红旗团捧得那么高颇不以为然外，解放军哪一方面做错了呢？自从取缔了那些乌七八糟的"造反派组织"后，锡城市的革命生产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小将们，都被赶回课堂里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检点文革开始以来的种种不法过火行动。连不可一世、已经被捧成大左派的史苏星、黄军等，也不得不在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整风运动中，就以前对董校长的野蛮行径和大搞反动血统论的狂热，作了一通自我批评。除了对那些被取缔的一小撮反动组织的坏头头之外，到处抓人打人和批斗游街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象父亲那样一类德高望重、却受到造反派迫害凌辱的知识分子，支左军代表一进驻就把他们当作保护对象。原来全市多如牛毛的各种各样的"革命造反组织"，合并的合并，解散的解散，取缔的取缔，以只剩下的"九·一九"革命联合会作龙头，按原先的区局分类，实行了十三个系统的统一归口大联合。而这个在市军管会直接控制下的"九·一九"，虽然同被取缔的红总一样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除了里面几个核心组的头头换了脸之外，除了他们经常刷一些"打倒刘、邓、陶，批臭黑市委！"之类的大标语外，其组成人员、政治态度和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同以前有市委控制的总工会和共青团，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杨玲虽然因为对红旗团仍然心存疙瘩的缘故，没有参加九·一九工联和大中兵人员，相差无几：锡城市又回到了文革尚未正式铺开前的样子！各个单位的军代表，就象以前的单位领导一样，当然都紧紧依靠各个单位的党团骨干和基层干部。要想翻天的牛鬼蛇神受到严厉打击。那些跟党离心离德的落后群众，过去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还时有调皮捣蛋的情况，现在把一些带头的害群之马抓的抓，关的关，管的管，一个个都变得规规矩矩，夹紧尾巴做人……。

如果说，这些就是《人民日报》社论所指责的资本主义复辟，于党、于国、于民，这种"复辟"又有什么不好呢？杨玲心里这么想，两眼却似乎是下意识地朝书房门口望了一眼。随即想起：书房外面没有旁人，只有女儿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继续她的绘画。她就将丈夫恭维给她的那顶"看重'两报一刊'精神"的高帽子，扔在一边不管，却把自己内心的上述想法，原原本本地向丈夫作宣布。武遥似乎早就料到她会发表这种同中央唱反调的言论，对她对不对其胃口的《人民日报》精神抱质疑态度显得一点不惊讶，而只是用很沉静的口气回道："我承认，这种'复辟'行动，对稳定大局、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都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东西，在那么短短几个月中，就使一个原来平平静静的城市，一下乱起来呢？是哪些矛盾因素，会使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一下就有一半市民，站到了所谓的反动组织红总的一边去了呢？这些矛盾，长期以来被掩盖了，不为我们党的好多领导干部所注意和重视。数十万人呼啦一下出来造反，本来是可以使人清醒，促使我们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现在好，把造反的人统统用武力手段硬压下去，使本来应该检查自己执行错误路线根源的人，反而自以为有功！毛主席发动文革反修防修的目标，通过群众的冲击加强党和人民联系的良苦用心，不是全都落空了吗？如果不从根本上作改变，这种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的稳定，只能稳定一时，不能稳定长久。"

杨玲无语。这回，是轮到武遥双眼长长地盯视着她，逼着她开口。可是，她还是不作声。因为虽然从感情上，她还接受不了丈夫的看法，但是在理性上，她却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

好多同志抱着对党的朴素阶级感情，总是把那些造反的人看作只是一小撮坏蛋在捣乱。你知道吗？五八年那个带头罢工闹事的金阿二，这次也同红总的头头一起抓进去了。时红霞跟我说过，那是要老账新帐一起算！你想吧，明明是运输联社领导没有全部执行省市的决定，使一部分工人心中仍然有气，要借着文化大革命出气，支左部队却不辨真相，完全用镇压措施来对付；如果你还在报社，再要你就此事写一篇报道，你会怎么写呢？”

杨玲这时候，一边在头脑里搜索回忆着当年那个照片曾上过报纸的山东汉子的形象，一边想起了草鞋浜那些原运联社学生家长目前的居住条件，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半晌，她改用不很自信的口气继续抗辩道：“在共产主义没有到来之前，这个世界上总会存在好多不公正。按前一阵子那样地到处革命造反，这社会不公就会一朝消除掉吗？依我看，恐怕只会越造反，越糟糕。你越支持，就越添乱。”

武遥听了妻子这段话，说话的自信程度也降低了：“这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了。但是既然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造反的决定，我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就只能站在党性立场上来说话。”

丈夫既然把他所笃信的党性原则搬出来作依据，杨玲就觉得实在不便再作辨驳，只好很压抑地低声问道：“那明天的‘火线亮相’，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你说呢？我就是要听你的意思呀。

杨玲低头想了一想，决然地说：“如果你确实不支持军管会的做法，也不要勉强自己作违心的表态。顶多，就不做那个结合对象；明天一早就给蔡国柱打个电话，把这‘亮相’的事推掉。”

你这是第一次变得天真了！我能推得掉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珍惜这次机会，直话直说，支持王小燕他们，要求驻军按照中央精神给红总平反。”

杨玲惊诧得几乎合不拢嘴。顿了好长时间，才不以为然地发问道：“你想放一颗轰动天下的政治卫星吗？”

（此处有大段情节删略）第二天下午，天色象死灰般的悲苦。蔡国柱被杜军长叫回军部，在军长劈头盖脑一顿前所未有的严厉训斥下，他那副面如死灰的神色，就如一个酩酊大醉的人，刚刚从翻肠倒胃的整夜呕吐中喘过气来。其实，他昨夜不过就喝了自己酒量的二分之一不到。大事在身，他是从不贪杯的！问题并不在自己喝了那一点酒，而在于自己没有把武遥也拉到酒杯前，一诉衷情，使武遥满腹真言，能在酒后都吐出来。这样，即使他不能坚定他的革命信念，至少也能摸到他的反叛念头，预作防备，避免那种使全场哗然、使蔡国柱刹那间几乎觉得天昏地暗的情景发生！他脸面扫地地从杜军长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觉得每一张在长长走廊里碰到的脸，似乎都在幸灾乐祸地嘲笑他。他一个都不理睬，管自闷头走出门，管自闷板着脸，重重坐进“嘎斯六九”型的吉普车里。他仿佛觉得自己的牙齿在恨得咯咯

第二十三章 血与火（节选）

恭鹏志接到朱兆平的电话，脸色如铅。这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他却总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自己的努力不至于前功尽弃，希望朱兆平并不会被武遥的“火线亮相”所迷惑，而有一个更冷静、更深思熟虑的头脑。这种期待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怎么能期待市计经委的一个科长，会比一个市委副书记有更成熟的政治表演呢？……（有删略）恭鹏志对武遥，对朱兆平，都颇失望。他认为：去掉所有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和理由，在背后兴妖作怪的，归根到底是一个权力问题。围绕一个“权”字，他俩似乎都把政治当成了一种赌博。很显然，如果接受既定的政治格局，这就意味着他俩在锡城市的政治舞台上，只能在支左解放军的主导下，居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他们好象对此于心不甘，把赌注押在了反对解放军支左方针的一边。如果他们赢了，蔡国柱将不得不引咎下马，武遥就可能取而代之；朱兆平也能摆脱在同部队支持的联络站所搞的大联合中处于的不利地位，获得更大的权力，在市内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如果输了呢？闹不好恐怕会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恭鹏志知道：《人民日报》社论和林杰文章的背后，有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背后，当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可是在驻锡部队的背后，是南京军区；在南京军区的背后，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据时红霞的消息来源，毛主席在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期望在一场政治大决战中得到军队支持的红司令曾亲口询问许世友：“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司令毫不犹豫地表态说：跟着毛席重上井冈山！

目中，该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驻锡部队所作的一切，都是受到军区首肯支持的。只要许司令员不倒，武遥、朱兆平和工学院那几个秀才，随便怎么折腾，欲把锡城市的天下重新翻个面，谈何容易！

（此处有大段情节删略）当初斗批革工联头头和基层当权派的某些过火行动，已经使心地软弱的凌漪感到极大不安。而一进入六月下旬，整个锡城市似乎成了一个武斗的大战场。

这个战场犬牙交错，工事街垒林立。形成了以“革匪”为一方，和“九匪”为另一方的两大武装割据阵营。所谓的“革匪”，是“九·一九”赐自己对手“革联指”的尊称。“革联指”是由已经平反的红总和红联指、机关革纵等一批市一级造反派组织，为实行大武斗形势要求而成立的锡城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总部就设在苏南工学院的“工”字形七层教学大楼里。而所谓的“九匪”，则是“革匪”按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传统，在简化锡城市九·一九军事分界线；全市五六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及其桥头两侧地段，成为时常爆发激烈武装冲突的主战场。白热化的武斗空气，白热化的相互仇视情绪，使凌漪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惊恐不安。那一个接一个血淋淋的武斗事件和一串串的死伤人数，不时传进耳朵。“九·一九”方面那些由转复员军人为主所组成的专业武斗队伍，不仅组织严密，进退有方，而且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十分骁勇悍战，几次突袭，使素被他们视为乌合之众的红总队伍，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凌漪无法忍受那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焦虑，也无法熬挺入夜以后那种无边无际的恐惧和孤独。她寝食不安，总觉得好象有不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忍

无可忍之下，她终于借着最新发生的一个重要情况，违背奚大雄的禁令，赶到“革联指”的大本营去看望分别多日的新婚丈夫；或者说得更为确切一点，去见她的情夫。因为她在奚大雄出狱后与他所作的那种匆忙而热烈的结合，在严格意义上讲，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他俩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俩躲在凌漪专门私租的一个小房间里，先斩后奏、激情如潮地欢娱了数日之后，再去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时，竟被告知盖结婚证的公章已失落。而即使这一关键性的公章没有失落，整个部门的工作也早已停顿瘫痪。给牢笼生活锻炼得政治灵敏度极高的红总司令，立即就怀疑到这是在万般无奈中不得释放他的市军管当局，有意制造的一种用心险恶的人为障碍，以此把他树立为一个与女人非法姘居的“光辉典型”。奚大雄针锋相对，以大局为重，急流勇退，毅然决然离开凌漪刚刚建筑起来的那个温柔小窝，在革联指办公室里，隔了一道屏风摆了一张床铺，作为洁身自好的栖身之所。可是，这种亡羊补牢的措施，却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凌漪觉得：已经到了不能不把问题说清楚的时刻。

……（此处有删略）工学院的门口，硝烟弥漫，一场恶战刚刚结束。一辆模样古里古怪的土造装甲车，散发着带有焦臭气味的青烟，象一头奄奄一息的怪兽，歪斜着笨拙的庞大身躯，瘫陷在学院大门口的一道沟壕前。这辆装甲车是建新机械厂的杰作，由一辆大功率的进口柴油卡车改装，全身披挂着青黑色的钢板。驾驶室的前窗，钢甲车身的左右两侧，均留有用于观察情况和透气的小窗洞。那些小窗洞竖隔着细密的铁条，那样子既是监狱门上的望风口，又象是煤炉底的铁栅片。铁条间所留的空隙，恰好能阻挡住长矛大刀的攻击。当那场恶战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开足马力朝前猛冲的装甲车驾驶员，受小铁窗有限视野的阉限，并没有注意到“革匪”事前得到密报后夜里在大门口挖下的一道壕沟；壕沟上面，还用芦席片和泥土作了伪装。那壕沟虽然并不深，对付那土制装甲车却显得足足有裕。因为在设计中考虑要保护橡胶轮胎不受长矛的攻击，那车子的装甲板离地面只有两三寸的距离，那车轮一冲进壕沟，装甲板就搁住了地面，再也动弹不得。车内二十多名“九匪”勇士，包括应设计人员要求，临时被拉入车内实地勘察装甲车性能的建新厂设备科长朱坤兴，一声呐喊跳出车外，挥动手中的长矛大刀，妄图借一阵乱刺猛砍，突破重围与车后被“革匪”拦截住的后续部队会合。无奈后续部队已被早有准备的“革匪”重兵击溃，面对蜂拥而上的更多的长矛大刀，只好仓惶退入装甲车内死守，固待援兵。这边早有丧心病狂的“革匪”，抱着要为前几场武斗中丧命的同伙报仇雪恨的念头，把几床旧棉被和一堆破大衣塞进车底下，浇上满桶汽油，然后通过半导体小喇叭对着装甲车内大声嚎叫：“缴械投降吧！沾满人民血债的九·一九匪徒们！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再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如不投降，自取灭亡！……”面对这种鬼哭狼嚎般的叫嚣和在空气中发散开来的呛鼻的汽油味道，从铁甲车小铁窗里传出来的回应，却是一遍又一遍豪壮的毛主席语录歌声：“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是死得其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惨无人道的“革匪”被这种“打着人民旗号反人民”的伎俩所激怒，就忍无可忍地一头钻到车底下，终于丧心病狂地搯动了罪恶的打火机。只听得“啪哒”一声，由打火机一小点火苗所引发的烈火，开始在车底下熊熊燃烧起来。朱坤兴闻到了烟火的味道，率先停住歌唱，问领头的突

击队长："怎么办？他们真的下毒手了！"大家停住了歌唱，似乎一下都感到脚底下的车厢底板，在升腾的火焰下发出"吱吱"响的痛苦叫唤呻吟。当然，这其实不过是最初所出现的一种幻觉。无情而又欺软怕硬的火舌，首先贪婪地吞噬浸透汽油的棉制品，而对硬梆梆的底盘车身，则以烘烤预热为主。在这样一种耐模耐心的烘烤预热下，铁甲车内四壁的钢板，开始变得越来越热烫。车厢地板的下半部分，显然终于被火舌烧着了，带着焦火气味的烟雾，从各种可能的缝隙中一个劲地往上蹿冒，使车厢里的空气，渐渐变得好象一团浓稠而厚重的液体；这液体的颜色虽然是灰蒙蒙的，却使人想起被逐步加温烤红的钢锭，慢慢地化成流质般的物体。它在空气中毫无阻挡地到处流淌，让人们感受它那毫不掩饰的逼人滚烫！

朱坤兴裸露的皮肤部位开始冒油，仿佛要冒烟的嗓子口，也开始连连咳嗽。视线模糊的眼睛里，被刺目的烟雾呛出了辛辣的泪水。他擦了擦眼睛，竭力要想看清车内同伴此刻的脸神。

他觉得有些惊奇：车上所有的人，却除了咳嗽传喘气之外，似乎都抱着听之任之的超然态度，一个个都很沉着镇静似地死不开口。难道他们都不明白：车上所有人的生命，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他们是吓呆吓麻木了，心中全然失去了主张？还是仍然沉浸在扮演英雄豪杰的壮烈情感中，并未真正意识到死神的脚步，正向自己步步逼近？而事实上，浓烈的烟雾，被烟雾呛出的泪水，蒸笼般的酷热炙烤出来的豆大汗珠，已经使得朱坤兴难以确切辨认车内同伴的脸神。他只能看清一点：此刻大家的脸孔，分明都转向了身体精壮的突击队队长。这位曾参加过炮轰金门岛的解放军前炮兵大尉，神色严峻而庄重地走到车窗前，望了望已经蹿上窗口的无情火舌，缓缓转过身来，用极冷峻的声调说道："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请举起右手来，让我们一起向党作一次最后的庄严宣誓！"车内所有的人，都仿佛对他这句话期待已久似的，一个个庄严万分地举起了他们的右拳。承蒙已经撒手人间的夏书记的生前关照，朱坤兴好歹也算是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因此也就迟迟疑疑地跟着举起了拳头。一阵浓烟被风卷进窗口，使靠近窗口站立的队长，猛烈地咳起嗽来。然而，这并不能动摇他带领大家宣誓的决心。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边喘一边领着大家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声音："我们向党和毛主席庄严宣誓："....."誓死捍卫你的革命路线！"

.....！

决不当叛徒！

决不当叛徒！

.....！

朱坤兴感觉到：在那虽然夹杂着咳嗽声音却仍然不失齐整宏亮的宣誓声中，却也有个别的声调显得有些颤抖。仔细分辨，却发现这一颤抖，原来发自他自身剧烈颤抖的内心。他并不是这支身经数战、见惯了流血死亡的专业武斗队伍的编内人员；更没有在出发前，作好视死如归的精神准备。当他感到死神已经用窒热的魔爪扼住他的喉头时，他开始惊恐万状，泪眼模糊中所望到的，不再是车厢内那些同伴影影绰绰的革命身驱，而是妻子那楚楚动人的充满期待关切之神的瓜子脸，和离家时新新跟他挥手告别时的稚气小拳头.....是烈火的焚烧，使血管与神经猛烈地收缩和抽搐吗？他开始感到心的阵阵痉挛和痛楚！外面催促投降的呼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刻跟随着疯狂扑打窗口的白炽火舌钻进车厢内时，听起来却显得模模糊糊的，好似来自

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他看到身边有烧着了的腿脚，一条，又一条……，也有烧着了的胳膊，起火的肩膀……。人们终于开始横七竖八地倒下，痛苦地呻吟，在火焰已经蹿成一片的地板，浑身抽搐，打滚，痉挛。那象长有十分尖利牙齿的火舌，也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身子。被烧灼的肌肤，产生了一阵一阵利刃刮肉般的钻心疼痛！他拼命地扑打周身的火舌，拼命地扑打，越扑打，那火势却烧得越猖狂，越欢快……！突然间，他听到了一声尖利的呼喊，眼前蓦然间显出一大片白色的光亮。神智混沌中，他感到车后的铁门被谁突然撞开了，那发出喊叫的人，象一团火球般地“噗”一声滚下了车厢。然后有第二个，也摇摇晃晃地向那一片光亮扑去；接着有第三个火柱，也向门口扑去，但是晚了，只听的有人恨恨地一声低沉叫骂：“想当叛徒！”随着就响起了一声更加凄厉的叫喊！这第三个火柱尚未扑出车门，就沉重地仆倒在烈火中；一杆被烈焰烤得滚烫的长矛，刺进了他的后胸！朱坤兴似乎听到了矛尖上喷出的鲜血，滴落在长矛杆上，发出“嗤嗤”的声响。他或者是因为仍然记着自己是“九·一九”勤务组的头头，不能身先士卒当逃兵；或者是完全被眼前的惨烈境况所惊呆，以至失去了移动身子的力气；或者是求生的本能已经无法使他清楚地判断：哪一种行动更能够满足它的生存要求。尽管他离铁门距离极近，只要拼命一跃，也许就能死里逃生地滚出火笼一般的车厢，他却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那扇铁门，被一个在火焰中吃力扭动着的身子，重新砰然关上！他想分辨清：那位在垂死挣扎中一心要保全战友革命忠贞的英雄是谁，可是一股火焰却猛然蹿上了他的眉毛，“轰”地点燃了他的头发，他的额头好象一下迸裂。被熊熊火光映照的瞳孔中，在一瞬间飞快闪过的，却是一只小小的、白嫩的、朝他挥动着的拳头，“新新……”他低低地呼叫一声，脑子里就“嗡”地一声失去了知觉……当凌漪来到工学院大门口的时候，硝烟尚未散尽，人们正在把那一一具具烧得焦黑的尸首，从铁甲车里搬出来，装进从殡葬场叫来的一辆卡车里。炎热的空气中，飘散游荡着一股难闻的焦臭味，仿佛有许许多多看不见、摸不着的臭黄鱼，烤焦在许许多多无形的锅底里。不知是因为凌漪在毒日头下走了很长一段路，还是她的感官神经，既受不了那可怖的尸首形状的惊吓，也抵不住空气中焦臭气味的刺激，只觉得胸口突然一阵子恶心，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一大堆围观的主力军中，有公路野战兵团的成员一眼认出了她，急忙上来作问候，热心地带她去见奚大雄。

奚大雄刚同革联指的一群头头，刚从可以鸟瞰武斗现场实况的七楼楼顶，走向会议室继续讨论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和步骤。突然被人叫出会议室，一眼看到不期而至的凌漪，脸色煞白，一块沾有呕吐秽物的手绢捂在嘴上，散发着一股很冲鼻的食物腐酸味道，很吃惊。也顾不得自己的革命名声和光辉形象，急忙把她领进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倒上一杯凉茶，又转身打来一盆水。然后他返身关门，绞上一块热毛巾，递给凌漪，用双手扶住她的肩头，极关切地问：“你呕吐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大毒日头的天，赶到这里来！”

凌漪点了点头，带着凄惨的神情，很努力地笑了笑，然后用低低的语调，哀怨地反问道：“打搅干扰了你的革命，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了一场大武斗。你进来时，一定已经看到那辆烧毁的铁甲车了。那么多死人，你们女人看着一定受不了！”说完，从凌漪手里接过毛巾，在温水里搓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很亲昵地端视着她，说道：“我看你的衬衣背后都湿透了。来，解开钮扣，让我替你擦一下。”

凌漪见到朝思暮想的男人，一下变得这么温柔，怨艾之气就全消了，很顺从地随着他走到屏风后，任他一粒一粒地解开她胸前的钮扣，转过身，很惬意地感受着温热的毛巾，在她身背上来回缓缓揉搓。她那敏感的鼻子，此刻能嗅到奚大雄身上那股熟悉的男人气味。她微闭上眼，仿佛要用关闭视觉的做法，进一步加强嗅觉的灵敏程度。却感到那揉搓停住了，那股男人气息，随着脚步声飘远了，接着耳朵里传来了"哗啦哗啦"的水声音。待要睁开眼，那股男人气息随着脚步声又重新飘回到身边。于是继续保持双眼闭合状态，静静感受着那粗壮的手指头，在笨拙地解开她衬衣前端的最后两粒钮扣，体味着那热毛巾，在她的脖颈下端和身背上所作的来回移动。然后，听任那手指头移到她的背后，一下变得很灵巧地，又解开了被汗水湿透的奶罩的钮扣。那热乎乎、暖湿湿的毛巾，就在她那有些饱胀的乳房上面，很轻柔地揉擦起来.....（此处有删略）

凌漪，很抱歉，他们还在等我的发言。

沉话语。她的双肩，开始抽搐抖动起来。泪水终于从她那美丽的大眼眶中，不可抑制地奔涌而出，顺着手指缝流到了枕席上。她觉得胸口和喉头堵得发慌，突然从床上跃起来，冲到墙角边的一只痰盂罐前，再次呕吐起来。可是因为前一次已经把胃里的东西吐光了，这下吐出来的，只是一口又一口的胃液酸水。奚大雄愣视着凌漪光裸的雪白背影，终于明白过来。一手抓起她的衬衣，一手抓起毛巾，走到凌漪背后连声急问："你是有身孕了，是吧？什么时候有的？怎么不早告诉我？应该早通知我！唉，唉，我这个做父亲的，真是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

凌漪闻言转过了身，两眼深情地望着奚大雄："我不耽误你了，开会去吧。只要你知道的，我今天来看你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只是，"凌漪好象突然觉得有些冷，把奚大雄刚帮她披上身子的衬衣裹得紧了一点，哀哀地说："你能回来陪我几天吗？最近一段时间，我太孤独，太惦念你了！"

一定，一定！

凌漪黯然的眼神变亮了，脸上重新泛起了动人的光采。

.....（此处有删略）衣柜上的座钟，很快地就响起了敲十点的钟声。在凌漪此刻的耳朵里，这钟声也许是最讨厌的一种声响。可是她很快就发觉：她错了！就在那摩托车的轰鸣在转弯路口消失不久，当另外一种轰鸣声把她也带出转弯路口的时候，她却庆幸起那钟声的准确和及时了！就相差那十几分钟，凌漪就被一帮如天而降、似狼似虎的汉子，塞进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这些人都臂戴红总主力军的袖章，那辆卡车，竟好象就是凌漪白天在路上所遇见的那辆公司里的车。然而，当凌漪被一推上车厢，看到车厢一角蹲着四、五个双臂倒背、嘴里塞着毛巾的人，立即明白这车子和车子的原主人，是这支"深入敌后"前来抓捕奚大雄的"九·一九"别动队的第一批俘虏。没有多久，凌漪嘴腮的肌肉就变得极度紧张疲劳；那是因为她的口中，也被塞上了一大团毛巾。她的双臂，很快也变得酸胀麻木；这是因为麻绳的捆绑。她此刻并不完全明白自己落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凶险处境，心中一边寻思是谁作的密报，能使"九·一九"掌握大雄今晚离开革联指总部回家的行踪；一边暗暗地为奚大雄庆幸：幸好他似乎受老天保佑，受钟声的提醒早离开了一步。她在被推上车厢的一刹那，看到驾驶室里有一个人在钉视着她。因为是背着路灯的光亮，凌漪分辨不清他的脸，却总觉得有一副很熟悉的模样。那些动作机敏、态度凶狠的别动队员，一上车就沿着车厢栏板团团站成一圈，

而把凌漪很粗暴地按坐在车厢地板上，使卡车飞速抛甩到后边去的路旁行人或夏夜纳凉者们，根本无法看见她和她的"主力军"俘虏同胞。在车子开出家门不远处那个转弯路口时，她也无法瞥见纳凉的街坊邻居和值班店员会显露出一副什么样的神情模样。她疑心：引来这批别动队的密报者，也许就在这些人的中间。那车子一转上大马路，就不顾弹石路面的凹凸不平，奔腾跳跃着，风驰电掣般地朝着城南"九·一九"的占领区呼呼飞奔。这些人是怎么进入造反派的防线的？又怎么从造反派的防线关隘中冲出去？凌漪深感疑惑不解，好象是在读一本跟自己无关的惊险小说似的，先是一味地猜度，然后，凭那逐步减慢的车速，她断定车子是开近了革联指防线的关卡。这时候，她感觉到有人在触碰自己绑在背后的双臂，但是被眼前突然出现的景象所震慑，她却全身都一下僵住，惊愕地瞪起了神色恐怖的眼睛，根本无法对伙伴的暗示作出反应。她看到在那些"九·一九"突击队员的手中，忽然一个个都变戏法似的，显出了倒提着的冲锋枪，她被惊呆了！

车前方传来了"停车！""停车！"的吆喝声。已经减缓车速的车子终于停住了，好象有人在盘问，有人在作回答解释。也许是盘问者觉得解释者的回答完美无缺，凌漪听到了搬移活动路障的"咔嚓"的声响。可是，就在车子将要重新启动而尚未启动之机，她身边的那几名"主力军"俘虏却忽然站立起来，猛然推开车边猝不及防的冒牌主力军，不顾一切地冲向车子后端，不知在何时经相互帮忙解脱了绳索捆绑的手，一把扯掉了嘴里的毛巾，一边跳车一边大声嚷叫起来："抓九匪！抓九匪！……"随着这声嘶力竭的叫喊，四周围立即响起一片混乱的叫喊声、脚步声和物体撞击声。然而，在这一片声响中，最使人心惊肉跳的，却是那划破夜空的、清脆的"哒哒哒"的冲锋枪扫射声，和凄厉的中枪者的惨叫声。就在这突然响起的一片枪声中，卡车猛然起动加速，发狂地向防线另一边的桥头冲去。凌漪恐怖绝望地紧紧闭上了双眼，浑身上下颤抖不息，就好象一只被人急剧摇晃的筛子！她的眼前，虽然只堵着一溜圈腰腿，却好象分明看到了一具具饮弹倒地的尸首。尽管光凭着那一声声中枪者撕心裂肺的惨叫，她无法辨别那些被冲锋枪击中的身驱，光是关卡上值勤的革联指人员？还是也有刚才一刻还同自己背靠背挨坐在一起的那些跳车者？但是她看到有的射击枪口，分明是直对着他们的跳车方向开的火，就几乎能肯定里面也有中弹者。她想，如果自己刚才领会接收了对她手臂上所作的触碰暗示，让跳车的伙伴也暗中帮着松开绳索，也跟着一起跳车，此刻自己可能也已经成了一名枪下之鬼！这时候在她的脑海中，除了那些纷纷倒下、挥之不去的躯体身影，也显现出了一具具烧焦的尸首……。凌漪想到在这种大革命的狂潮中，人的生命一下子竟会变得那么脆弱，好象是一支支弱不禁风的烛火，稍会一吹，就"噗噗"地接连熄灭……眼泪就夺眶而出。

完全依靠着外加的力量，凌漪被架下了卡车。接着，踉踉跄跄的，她觉得自己似乎被推进了门，推进了一个长长的过道。再接着，是被人架着不停地登楼梯阶。这大楼里显得那么寂静，或者是因为夜已经太深，或者是因为戒备太森严，凌漪觉得自己的塑料凉鞋和押解者的脚步在楼梯阶上所踩出的声响，就象在山谷里一样，发出了空旷的回响。她觉得自己好象是被推进了一个房门，然后蓦然间，眼前一片刺眼的白亮，有人把蒙在她眼睛上的黑布拿掉了。凌漪的瞳孔变化一时间适应不了新的光亮，迷茫了十几秒钟，才终于看清房间里的情景。除了身后的押解人员，她看到面前横放着一张很简

单的桌子；从桌子后，看到一站一坐两个人。站着的，就是她在被推上车时，就觉得似曾相识的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个阴影，现在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她的面前。他不是别人，就是她和奚大雄以前的好朋友，如今却成了奚大雄仇敌的李辉康！

贾团长，这位就是我们逮到的那位瘸腿司令的夫人凌漪。

桌子上的一叠材料。这时扬起他那锐利的目光，在那材料纸和她的脸庞上，飞速地来回扫了一眼，却一言不发地突然站起来，又反复朝她打量了两眼，对李辉康摆头一示意，就径自朝门外走去；李辉康急忙跟他一起走出门外。凌漪感到了巨大的惊恐！她只是在那个贾团长把头一摆的一瞬间，才终于回想起：这熟悉的短粗身材和紫铜色脸膛，就是当年在那个舞会上对她非礼的贾师长！当时他就是用了这样一个摆头的动作，领着他的随从恼羞成怒地退出舞场的。凌漪听不清门外窃窃的交谈声，但知道是那位贾团长在面授机宜。在这样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一下子碰上了两个冤家对头，凌漪身在闷热的房间内，心却好象一下沉入了冰窖里，浑身上下都不由地打起战来……天花板上转动的吊扇，由于质量差而不停地发出嚓嚓嚓嚷嚷地开了好长时间。市一中“八·一八”的雷竞天，对活活烧死二十多名“九·一九”装甲车人员的残暴做法，对革联指的武斗总指挥葛富林提出了质疑：“……在对方的攻势已经被瓦解、装甲车里的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的情况下，我们难道除了火烧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要知道，他们毕竟也是受了蒙蔽的阶级弟兄啊！”市机关革纵的朱兆平，也要求葛富林对此作出检讨交待。葛富林左颊上的疤痕涨得通红，坚持复述着同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下令浇油烧！”“但是你没有阻止，你默许了！”雷竞天叫道。

我没有那个能力来阻止！你有这个本事，这个指挥你来当。我干不了，我辞职好了！”葛富林几乎是怒吼起来。

曲湘川对两位鸽派人物的指责之声，颇不以为然，就插上来说道：“我作过调查，浇油点火者有一个亲兄弟，在上一次武斗中，受伤之后在救护车旁被独立团的人乱枪捅死了！临时集中到一起来应付这场突袭的“四虎队”，成分本来就复杂。前一时期都吃过独立团的亏，死了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老葛跟这伙人并无深交，他硬要拦，也拦不住！我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到了这种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还是少一点布亚娃乔式的温情和空论，多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下一步的打算。”担任武斗副总指挥的金阿二随即响应：“我也觉得这是说风凉话！在当时情况下，不仅谁拦谁就可能挨刀子，而且今后也甭想再指挥得动人！”

已经失控了，还谈什么指挥不指挥！

这时候，首次参加这种联席会议而一直没有开口的武遥，打断两种意见的争论说道：先不争已经发生过的事了。现在最严重的情况是，想必大家已听说了，独立团已经装备了现代武器。昨夜潜入我方想绑架奚大雄同志，结果把他的妻子抓走了，出关卡时还开枪打死打伤了咱们十几个人。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我们内部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意见，就是以牙还牙，以枪对枪，以炮挡炮。小曲和老葛今天一早，就想通过三八三部队任旭东的关系去搞枪支弹药。老奚则通过他以前老战友的关系，昨夜接待了镇江总后二五二部队的造反派代表，谈妥只要派人去‘抢’，随时可以提供一批火力较强的现代化武器。这两件事，前者是我那位在工学院时的老搭档给了我电话才知道的，我要老任先挡住。后者是今天一早老奚跟我通的气。而在我收到的所有情况

通报中，没有任何字句提起过要去部队‘抢枪’的事。你们既然聘我当顾问，而且可以有最后否决权，我恭敬不如从命，这一次就想使用一下这个权力。

但是光以权压人，不作充分讨论，这是文革前的老套套，在我们造反派组织里仍然照搬是不行的。我想借这个机会，在大家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统一意见后，共同执行。如果大家都自行其是，我们就一定会失败的。

武遥仗义执言呼吁为红总平反的“火线亮相”，使奚大雄对这位原市委副书记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之情。可是此时此刻，他却很激动地站起来反驳说：“他们已经武装到牙齿，难道我们就该用自己的大刀长矛，去抵挡他们的冲锋枪机关枪吗？他们可以同驻锡部队搞明抢暗送，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办理呢？”

任政委从开始反对长征兵团到转而支持我们，马老师和曲湘川化了很大的力气。他现在愿意给我们雪中送炭，是说明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威力和深入人心。如果我们不立即自我武装起来，我们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王小燕也表明了其对近来获得她极大尊敬的武叔叔的不同立场。

据我们得到的内部情报，就在这几天，九·一九要凭他们的装备优势向我们发起总攻。或者是在枪口下等死，或者也拿起枪杆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葛富林着急的声调里，几乎带上了哭腔。

我们有选择。

什么选择？

朱兆平朝武遥望了望，发现武遥按会前约定的信号，在向他颌首示意，就毅然决然地说出一个令人震撼的字来：“撤！”

众人哗然：“撤？撤到哪里去？临阵当逃兵！学蒋介石把东三省扔给日本鬼子的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待众人气愤愤地叫嚷完，雷竞天却不慌不忙地说：“我也赞成撤，去上海，投奔革命造反派的大本营。政治问题，只能靠政治手段来解决；而不能靠越来越难以节制、越来越变得野蛮的肉搏杀戮！到了上海，我们可以依靠工总司的朋友，直接向张春桥同志反映情况，求得中央文革的有力支持。如果我们把几万人马浩浩荡荡地撤离到上海，一是体现了我们锡城市造反派以大局为重，主动避免大武斗的进一步血腥升级；第二也会迫使中央对我市的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

曲湘川深不以为然：“谁说打仗就不是政治手段？战争是最高形式的政治！试问：几万人逃到上海去求神拜佛，或者是在本市殊死血战，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两条路子，到底哪一条更能引起北京的注意和重视？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实力的对比。政治只重实力而不认仁义！如果我们撤离了锡城市，只会给中央以革联指站不住脚的印象，从而削弱自身的政治份量。”

王小燕立即表示赞成：“对，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付一点代价，胜利不会从天而降！”

丢了自己的阵地，失去了同锡城市人民的紧密联系，撤退只会使造反派陷入不利的境地。”

刚刚中途加入会议的郭贤也插口道：“工总司未必能顾得上你们；锡城市的运动发展到今天，除了以前的上海红革会发挥过一点作用外，还有哪一家帮过你们的忙？”他无意中，在把首都三司的贡献同上海造反派组织的表现作对比。

我们倒是帮上海工总司拦过上京告状的赤卫队！

海工总司头头吴沪江的询问，在促成武遥要求为红总平反的表态中，也是因素之一。

武遥见整个会场的气氛明显不利于撤退派，就写了一张纸条，传给了主持会议的奚大雄。奚大雄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能够出狱重见天日，归功于武遥“火线亮相”中所作的影响巨大的政治表态；所以尽管他站在主战派的立场上，也明知武遥的休会建议是缓兵之计，还是顺从地宣布：“我看先咱们休会二十分钟，冷静地想一想，再继续讨论。”

大家一起立，武遥立即就把奚大雄、郭贤、曲湘川和王小燕这几名主战的核心中的核心分子，请到隔壁奚大雄的办公室里。然而他的第一句话，却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在我们六个人中，有谁是本地人？”问完之后顿了一顿，接着说道：“我猜：就小一半吧，老奚和郭贤。我，小燕和小曲都不是。你们知道吗，任旭东在电话里告诉我：九·一九连迫击炮和可以平射的高射炮，都拿到了手；他们的炮口，也许已经对准了革联指的各个制高点 and 据守点，我们的这幢大楼，市内的好多商业和工厂的重要建筑物，都在他们的射程范围之内。”

他说，从内心讲他很矛盾：一方面他不愿看到你们手无寸铁地吃眼前亏；另一方面，答应了你们提供武器的要求，双方真刀实枪地干起来，实在是太可惜这座城市了！老任也不是锡城人，可是他在锡城住久了，感情却比我们这三个外地人强得多！无论怎么讲，我都觉得没有这个理由，把这座风景秀丽的千年故城浸入枪炮战火之中。小雷和朱兆平是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老锡城，特别是朱兆平所代表的机关革纵成员，他们大都为锡城市的建设花费过无数心血，我想作为他们同乡的老奚和郭贤，一定比我们这些外乡人，更容易理解他们内心的这种感情。”

武遥这一席话，一下就堵住了苏南工学院两个外乡人的嘴。郭贤一听说对方有炮，一下就担心起自己紧挨革联指一个重要据点的家，和家中的父老姐妹；想到炮弹不长眼睛，如果呼呼都改变了态度，也就作起自我批评来：“我是急糊涂了。一听我老婆刚被独立团抓走，自己却要拍拍屁股扬长而走，心里不好受！”

真要动枪动炮地干起来，这仇就结深了，你老婆掌握在他们手里会更危险。

郭贤，倒过来帮着武遥做工作了。

那我们该什么时候撤呢？问。

马上在会上作讨论吧。我个人意见是越快越好，最好是今晚。等人家攻过来时，要撤也来不及了！”武遥回答说。

第二十四章 转折点（节选）

……………读着这些气势澎湃、激情洋溢声讨“军内一小撮”的战斗檄文，光用欢欣鼓舞、笑逐颜开的词语来形容奚大雄、曲湘川、王小燕等革联指造

反派头头的心情，是不精确、不恰当的。就在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也就是在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提出了“文攻武卫”的战斗口号。曾经被武遥等一批革联指内部右倾分子所认为的“极端路线”，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当初不敢“文攻武卫”仓惶逃离锡城市的决策可以暂时不追究，但是“杀回锡城市、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准备工作，却已经热火朝天地准备了好几天。其中包括：由上海工总司协助，去镇江二五二部队拉来了几卡车军火弹药，虽然不足以武装所有的造反派战士，但是把从革联指中所有逃亡在外的几百名转复员军人全部武装起来，却已经足足有余。更重要的，是制定了一个“杀回锡城市老家”的“拂晓行动”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上海工总司将出动三百余辆卡车，并在每辆车子上配上几名“造反派”队员，插上上海工总司的旗号，把革联指的造反派战友，浩浩荡荡地护送回锡城市。整个计划的核心部分是：锡城市的“军内一小撮”和“九·一九”的坏头头们，敢冒天下之不韪，在毛主席亲自肯定和支持赞扬的上海工总司头上动土吗？谅其没有这个胆！这个计划一得手，革联指就可以如猛虎归山，蛟龙入海，凭着《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的强劲东风，仗着已经到手的“文攻武卫”装备，在家乡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导地位！那些“九·一九”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还能在风景如画的太湖之滨，臭烘烘地散发几天令人掩鼻的臭气呢？！因此，当设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革联指总部的电话铃声急剧响起，当奚大雄在电话中听到并没有忘恩负义的吴沪江告诉他：工总司的最高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这个计划时，人们完全可以用“欣喜若狂”这个字眼，来描绘电话机旁边的一派欢腾情景！

是的，家乡的水，是金水；家乡的土，是金土。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日难！在所有看重乡土观念的中国人中，奚大雄相信：没有谁能比得上锡城市的人更看重和眷恋自己的家乡！

如果看到了太湖边上那“包孕吴越”的雄浑豪壮，西郊公园里的天鹅湖，简直只能算是一洼大雨之后的积水坑。如果品尝过“迎宾楼”美味的银丝面，那几乎每天早晨都不得不吞咽的上海阳春面汤，几乎就象是喝的洗碗水。而革联指这些逃亡在外的造反派战士，又大都是那些知识浅陋、说起话来“弄堂里拔木头——直来直去”惯了的粗人。他们也许并不懂得客随主便的道理，却经常由着性子耍脾气。他们不懂得或不善于美言，不知道赞美是一种礼貌，它可以使主人领会到客人所存的感恩戴德之心。从西郊公园的天鹅湖，到食堂里和校园外食铺里供应的阳春面，如果客人是善解人意的君子绅士，本来均是讨主人欢心的绝妙话题，可是这支队伍，主要组成成分多为公路野战兵团那些拉板车出身的人士，“石下草”兵团的水手船夫和港务兵团扛包的搬运工，原建筑兵团那些出言放肆粗俗、走高层脚手架如平地、认定育文庆是卖身求荣的泥瓦匠，还有那些三教九流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他们心里本来就有气。在家乡的阵地守得好好的，还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却连向妻儿家小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一声令下就突然背井离乡来到别人的屋檐下。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可是造反派的脾气，却是宁死不低头的！于是三天两头，就有争吵械斗发生。掀翻饭铺桌子的，砸碎食堂窗户玻璃的，把饭碗砸到人家脸孔头顶上去的……诸如此类的冲突摩擦，更是数不胜数，几乎成了锡城市造反派发泄寄人篱下怨怒的一种生活习惯。那些混入革命队伍的不肖之徒，趁机在驻地附近从事的偷鸡摸狗、调戏妇女之类的不轨行为。处理这类冲突斗殴事件和伤风败俗行为，一段时间几乎成了革联指总部的头

等公务。而最糟糕的是，对外寻衅发泄在受到严格控制后，自己人拔刀相向的"窝里斗"，就取而代之地成了一种新风尚。先是早有武术界门户之见的"四虎队"之间，你死我活般地相互火拼，然后是工人造反派的主力部队和"四虎队"之间不断打斗，接着是"主力军"同红联指的革命小将之间动起了拳头，最后是主力军、红联指内部，这一伙同那一伙人也相互干起来。总而言之，按毛主席老人家的话，大家吃了饭要发热，"杀回老家去"的目标又遥遥无期；多余的精力无从发泄，精神上成天整日处在一种紧张压抑的状态，总得寻找出气孔。把奚大雄等一帮子"总部老爷"（注：革联指战士对他们头头的尊称）折腾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用葛富林的话来形容："成天忙得屁颠颠的，连撒尿也得在裤裆里留一半！"

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葛富林手下"石下草"兵团的"四大金刚"等一伙人，在一家校园门口的小餐馆里多喝了几杯酒，其中就有一位可算是葛富林铁兄弟的"金刚"，在一名单衣薄衫的年轻女店员的身上，又捏屁股又抓奶子的撒起野来。恰好同室坐着红联指下属组织的张本度等一伙人。这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自以为仍然高擎着纯洁的革命大旗，看着石下草踢败坏锡城市革命造反派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那位冲过驻锡部队机关、蹲过大牢、又在大武斗中见惯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场面的工人造反大哥，哪里把红联指的几个小弟弟放在眼里，横暴地用左手把其貌不扬的张本度当胸一把揪住，怒目圆睁，凶狠地喝道：就是让你们那个王丫头、曲湘川来，也管不了爷的事！你小子是活的不耐烦，竟敢老虎头上来拍苍蝇！来得好，老伯的拳头正发痒，就让你尝尝老伯的拳头！"说完，挥动右手的拳头，对着张本度的脸面就砸上去。那张本度也不抵挡那拳头，在胸口被揪住的一刻起，右手指早已扣进那只揪住他衣领的手掌内侧，左手紧按在自己右手手背上；见对方出手就打，猛喝一声，右腿往后撤退一大步，随之拧胯转腰，朝右下方一个猛转身，只听的"扑通"一声，那位金刚"老伯"立即摔成一个嘴啃泥！金刚"老伯"的同伴一看自己人吃了亏，一齐涌上，拳脚并起，胳膊飞舞。张本度一边的小将们，原是一班习拳练武的师兄师弟，当然不示弱，也一拥而上，顿时拳打脚踢，碗盏横飞，吓得那年轻女店员象一只烧着了尾翅羽毛的小母鸡，狂奔着蹿出店们外，文不对题地连声喊"救命"！幸好这时刻街上有好多闲逛的革联指战士，闻声急闯入，奋不顾身地把双方拦抱住，不允许"亲者痛、仇者快"的场面继续演下去。然后就是革命小将一方，义愤填膺地赶到革联指总部告状。奚大雄接待了张本度一行告状者，立即要葛富林彻查。葛富林第二天交来了小餐馆里征集到的证词，认定"石下草"的兄弟们决无非礼之举，红联指的人是无端寻衅和诬告。奚大雄就把证词摆给红联指的小将看。小将们气得"哇哇"直叫，对奚大雄嚷道："我们同那伙流氓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干吗去诬告他们？"奚大雄纠正道："你们没有证据，就称人家是流氓，不利于造反派队伍内部的团结嘛！"小将们一听奚大雄公然卫护自己的部下，就索性拉下脸来对着奚大雄破口大骂："瘟司令！假造反，真投机！地痞流氓的总头子……"奚大雄被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骂得狼狈不堪，回想他们一上来就显现的那副正义词严、大义凛然的架势，心中自忖小将们不象是血口喷人，情知是葛富林做了手脚，只好苦笑着皮肉纹路全扭歪的脸，答应再复查。张本度他们说不必复查，一转身，数分钟之内，就把哭哭啼啼的那位年轻女店员推到了奚大雄的面前。奚大雄不知是因为从眼前这个女店员的遭遇，联想起了他日夜思念的凌漪的类似经历，还是纯粹被红卫兵小将

当场揪住了辫子的缘故，气得脸发青，嘴唇发抖，随即再找葛富林。

谁知葛富林这次不仅不否认，反而理直气壮地反击道：“我也重新查了，就这么回事：兄弟们心里闷，喝醉了酒，便有了几个毛手毛脚的动作。怪谁呢？怪我这个做头头的没有耳根！听着别人的意思转，把兄弟们抛家离妻地带到外边来活受罪！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好了！撤职，记过，送班房，都可以！不死不活地窝在这个鬼地方，我早就不想干了！我那位弟兄是‘石下草’的功臣，为革命造反坐过牢，跟红总跟得铁了心，我不能为了自己保个光鲜名声，就对患难弟兄六亲不认！”奚大雄知道：葛富林这些话，听上去是自责自艾，其实口口声声都在吊自己的颈皮！只好长长地叹口气：“罢，罢。我代你向红联指的小将上门赔礼道歉去。今后不准部属再酗酒，再有违令犯事，一律送上海市公安局！”葛富林耸耸肩，回去对着那几个肇事者臭骂一顿。骂完，自己率先犯禁饮了一个酩酊大醉；上的就是那同一个小餐馆。

第二天，红联指就接到下属组织反映有一帮子人开了小差，一查，就是那个跟史苏星同校、使黄军和“石下草”勇士们都尝到厉害的张本度及其一伙！据说他们最后是告到了曲湘川那里。曲湘川对他们说：“依你们看该怎么办？人家的总头头都向我们赔礼道歉了，还要怎么着？红联指为此同红总分手吗？让那个抓摸了一下女人身子的浑蛋重新坐牢去吗？是谁专门抓住红总造反派的枝叶末节大做文章的呢？是“九·一九”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你们这样闹个没完没了，跟谁站到一起去了？”显然，那一帮子小将受不了这番话，就不辞而别了。武遥从王小燕那里听说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摇着脑袋连连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是人们并没有听明白，他这里所说的严重问题之“严重”，到底是严重在哪个方面？

现在好，终于有一个可以阻止人们借酒浇愁和胡作非为的、马上就能付诸行动的共同奋斗目标了！于是就立即拟口号，开大会，编队列，作操练。全军上下，士气大振，面貌一新。武遥在动员大会上发出了鼓动人心的号召：“……古人说：士别三日，另当刮目相待。

我们就要打回老家去，见我们的父老乡亲，在他们的箪壶相迎之前，我们应该显示一种什么样的新风姿、什么样的新印象呢？我们革联指的队伍，不仅要显示出威严雄壮、斗志昂扬的气概，而且要象当年解放大军入城时一样，显现出王者之师的气度和风采，让锡城市的人民从心里感觉到：我们堂堂革联指，决不是九·一九所宣传诬蔑的乌合之众，而是代表了革命，代表了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在起，立即用军训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纪律整顿，作风整顿，做到紧密团结，令行禁止，不辜负锡城市人民对我们的挂念、盼望和期待！”武遥的讲话，在全场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人类似乎有一种本性，当他们自觉正在走向沉沦堕落，或被人视为沉沦堕落的一群时，他们在肆意放纵自己的时候，内心并没有泯灭某一天也想走向崇高的希望，暗暗渴求能够洗刷别人的蔑视，获得被自视高贵者们所独享的尊严。武遥的这些话，正是打中了这些粗人、俗人、贱人们深深潜伏在内心的这种渴念和需求。他们以前，也许从来就没有清晰地自我意识到有这样一种渴求需要。而实际上，在去年刚起来造反的时候，这种需要也许已经充当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犯上作乱”的行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满足得到社会注意和尊重的渴求；对那些一向不注意、不尊重、甚至常常蔑视压迫他们的人，他们不能不放过由毛主席所赐给的、史无前例的、可以用一种报复性的攻击大出风头

的好机会。在陆波、蔡国柱之类军政要员的眼里，这种心态无疑释放了一种恶，一种对社会破坏性的冲击摧残力！而象武遥这样的党政要员，却以为这种心态代表了一种善，如果善加引导，可以走向崇高，走向辉煌灿烂！至少，武遥的这种信念，在1967年8月份这一段非常时期，得到了一试身手的机会。自从这个动员大会后，每天天刚蒙蒙亮，这上海西郊大学区的居民，就能从校园的操场围墙内，听到嘹亮的出操口令声，“咚咚咚”的整齐跑步声，斗志昂扬的战歌声。到了白天和傍晚，还有琅琅的读书声从围墙后面翻过来。其实除了念一些《毛主席语录》外，围墙里的人读的并不是什么书，而是按武遥的意见，由红联指和机关革纵的秀才们编写的一些政治学习材料。居民们也极少再看到一拨一拨走出校门闲逛游荡的、惹事生非的、缺少教养的“锡城乡下人”（注：许多上海人习惯把邻市的居民称作“乡下人”）。拾金不昧、搭乘公共车时搀人让座之类的“雷锋精神”，也流星般地时有闪现。如果这些“乡下人”真有事要出动，却都整整齐齐地排成了八人一行的队列，“嚓嚓嚓”地，向街坊行人炫耀他们整齐划一的步伐。特别是在队列转弯的时候，不经过专门队列训练的人，看着那八人一列的横队，纹丝不乱地扫动着一个个笔直的扇面，齐崭崭地改变行走方向，都傻了眼；惹得路边的那些“上海小青头”们（注：“锡城乡下人”对校园外那些游荡小青年们的尊称），也半羨半嫉地直嘀咕：“戳奶，阁些乡下人一夜之间都变脱了！”这些“小青头”，当然不知道这些成群列队的“乡下人”，在驻沪空军军训代表的全力帮助下，正象当年延安山沟里的“土八路”一样，厉兵秣马，日日操练，随时准备“杀回锡城市”，建立红色革命新政权哩！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眼看就要到了召开誓师大会、正式挥师西征的日辰，工总司总部一个电话打过来，却象晴天一声霹雳，把奚大雄的黑脸膛打得乌焦焦，把近来成日价欢蹦跳跃的王小燕打得病焉焉，把意气风发的曲湘川打得搭拉着脑袋，就象经了霜打的丝瓜藤。在最困难时刻都能谈笑风生的武遥，也哑了口；成天皱着眉头，把自己关进了无穷无尽的苦想殚思中。吴沪江在电话中的声音充满了歉意，指出由于某些原因，上海地区的造反派不便插手兄弟地区的文革运动，工总司无法再向锡城市的造反派战友提供交通工具，更不可能按原定计划出动人马护送革联指“杀回老家”去。“真的很抱歉！”吴沪江直打招呼，却并不把上海工总司突然退出“拂晓行动”计划的真实原因说出来，这就更使革联指的众头头们心里憋闷得慌。其实，当吴沪江被张春桥找去劈头盖脑一顿训的时候，他除了被戴上一顶“违反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帽子之外，也不明了刚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委、对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负有特殊照应责任的上海“一号首长”，为何对邻近地区造反派的难兄难弟如此薄情寡义？为了维护春桥同志在兄弟地区革命造反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当然不能把枪毙“拂晓行动”计划的决策人物的大名直告奚大雄。他相信，春桥同志一定另有计划安排，可以把江苏地区被颠倒的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春桥同志是通天的，有通天本事的人应该是无所不能的！上海地区的文革所以能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上海的造反派所以能有今天，无时不刻地都在证明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这个真理其实是靠不住的。张春桥尽管有通天之路，却远非是无所不能的。恰恰相反，他也每日每时地在揣摩伟大领袖的想法与意图。而在他的感觉中，这个七旬巨人的脑子实在是太活跃了，活跃得使人常常觉得摸不着、猜不透、跟不上。而在这三个“不”字上，除了老毛本人，任何人都

可能栽大跟斗！如果按老毛身后的某些情况看，有人甚至争辩说，连他本人也在这三个“不”字上面栽了跟斗。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告说：“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毛主席一向酷爱游长江。1966年的7月，正是文革方兴未艾之际，他也曾横渡过长江，并且话中有话地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这句话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些不安本分的“弄潮儿”纷纷起来兴风作浪、革命造反的精神激励。这一次，毛泽东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陪同，奔赴当时两大派群众组织用大刀长矛打得一团火热的武汉三镇。一向足智多谋、以善于停调解纠著称于世的周恩来总理，担心毛主席的安全，于7月14日晨率先飞抵武汉，为晚上将要抵达武汉的毛主席作了精心安排。无产阶级革命家兼大诗人的毛泽东，原来抱着“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勃勃兴致，一住进景致优雅的武汉东湖宾馆，才发觉这长江是游不成了。武汉由中央文革支持的“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和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磨刀霍霍，抽弓弩张之势，竟不由得不使人想起当年张学良、杨虎城搞西安事变经磨砺而几至炉火纯青的停调劝架本领，加上他在全国人民和武汉对立军民中的崇高威望，想来既然由他的预作安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危应该根本不成问题。可是不，7月20日下午两点十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贴身口袋里揣着他亲密战友林彪的一封密信，飞临其住所，急告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要搞兵变！密信上还有林彪求江青作的亲笔签名。毛泽东想到武汉的东湖宾馆，竟然可能成为西安的华清池，一字不识的老粗陈再道，既然要模仿能够讲上几句洋文的少帅张学良，淡然一笑，觉得几同儿戏，并不放到心上去。然而此刻武汉的大街上，上千辆卡车隆隆滚动，支持陈再道亦为陈再道所支持的百万雄师的触动，比起那封密信，似乎却要强烈得多。

多少年来，毛泽东在党内一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并把它作为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文革开始以来，更是把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人民日报》在7月21日发表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社论中，一开头就强调：“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接着在7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的社论。社论向全国人民宣布：毛泽东同志有个志愿，就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社论还对毛主席打算怎样继续当群众的小学生的愿望作了具体阐发：“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是只听赞成自己的意见，也要群众听反对自己的意见。一般说来，对于赞成自己的意见，总是容易入耳的。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就不大听得进去。其实，听听反对的意见，对于全面地判断情况，往往是必要的。……我们要认识，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标准。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一事无成。”而此时此刻，几十万名具有“老师”身份的群众，在大街上公开反对他所支持的中央文革，诚心诚意充当“小学生”的毛泽东，站在东湖宾馆玻璃窗的后面，心中也许是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动！

多少年以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评定毛泽东的晚年作为时，几乎都把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作为他的一大施政特色。这种评判也对也不对。说它

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现实的斗争是如此严峻，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向何处去，毛泽东必须暂时撇开学究式的苦思冥想，先对紧迫的现实问题作出回答：是人民错了吗？还是自己需要修改调整？如果他真正信奉自己向全党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如果他心口如一地实践他公开声明过的在群众面前“继续当一个小学生”的愿望，那要修正的，就必然应该是他自己，而不应该是几百万人民子弟兵，以及跟子弟兵站在一起的亿万人民群众。国内外好多评论家们，都喜欢把毛泽东比作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君王。

说来也可怜，在文革的一些重大转折关头，其实他都当了民众的尾巴；用他自己的话来作注解，则是当了群众的小学生。例如1966年11月份，上海数万名不守本分的工人，在国棉十七厂保卫科人员王洪文等的带领下，发起成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委一查有关工交企业如何开展文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发现明明白白规定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就明确采取“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政策”；随之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中断铁路运输二十小时的“安亭事件”。中央文革的张春桥等以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为理由，宣布承认上海市工总司为革命群众组织，并声称他们卧轨拦车是上海市委逼出来的革命行动。事情吵到毛泽东的面前，老毛一听是群众自发地起来造反，同上海市委作对，就好象又恢复起了1926年在湖南农运期间大叫“痞子运动”好得很的劲头，就全然不顾有关中央文件精神，在11月16日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之后，作了一个典型性的甘当群众尾巴的裁决：“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再如，创上海市“一月革命风暴”之先的上海市十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所发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以及由上海市三十二个造反派群众组织签发的《紧急通告》，张春桥、王洪文开初都很不以为然，可是老毛读到了这两个文件，似乎觉得又可以创造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范，又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赞扬，又是为《人民日报》写《编者按》，又是领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贺电；在群众面前，真可以算得上活脱活现一个恭敬虔诚的小学生。

只是，按照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解释，群众是分层次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组织和带头作用，才具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喜欢发明创造、另搞一套的毛泽东，却不分青红皂白，只要群众中有那么一拨子人聚集成一股足够的势头和能量，不管那是一群乌合之众、社会渣滓，还是一些对刘邓路线嘴上批得响、心中爱得深的党团员骨干，他都会拜为自己的先生，从中认真学习积极吸取政治营养，作为自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如今，面对武汉三镇犹如炸药桶就要爆炸般的政治局势，毛泽东沉吟良久，说出了一句政治涵义不同寻常的话。这句话，不仅决定了中国前途命运，也直接影响到本书众多主人公的前途命运。其长远后果，不仅他自己都没有能够完全看清楚，世界上那么多中国问题专家，至今似乎都未能对此作出充分的评估。

毛泽东感慨良深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他当然比谁都清楚：这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不能团结起

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可是他明知故问，以掩饰他在亿万军民强大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让和认输的念头。简而言之，这原因就是：这亿万军民并不认为他们站错了什么队，也根本不买中央文革要他们重新站队的帐！即使是作为全军最高统帅的他亲自开了口，自恃有百万群众性“雄师”支持的将军也不听！作为一个坚信“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和检验政策的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这种个人力量难以扭转的势态，除了顺应占中国人口一半之众的民心和重权在握的军心之外，除了把他那朝令夕改、翻云覆雨的施政特色作一个大发挥之外，他还能作出什么其它选择呢？因此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就把继续按着他老想法上蹿下跳、不遗余力的王力、关锋，一言九鼎地定为妄图“毁我长城”的“小爬虫”，丢卒保车地从中央文革小组中抛出来。这是他的高明伟大之处，还是他受了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恐吓而举止失措呢？抑或，两者都不是，他只是不愿看到有更多重兵在握的将军，象陈再道司令员一样发犟撒野。周恩来的劝慰调解本领呢，又只对国民党的宋美玲、宋子文和张学良之辈有效用，对自己党内的将军们，却似乎兜不转。在千军万马中素来沉得住气、稳得住劲的林彪同志呢，又老是手忙脚乱地派亲信大员送有人要谋反的急件密信。把他的生命安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李进（注：江青别名）同志呢，到了关键时刻又一点都没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气度，见一封密信签一个名。照此办理，还要不要搞革命？只怕是连吃饭睡觉都搞不成了，枉论革命！因此，就必须借对“小爬虫”的痛斥，抚天下众将军之心。不然的话，南京军区揪许世友“许再道”，济南军区揪杨得志“杨再道”，福州军区揪韩先楚“韩再道”……，军无宁心，国无宁日，尽让刘少奇、邓小平在一旁看笑话，还要不要收场，是不是该收场了呢？怎么才能收场？长江水无法游，武昌鱼没得吃，伟大舵手不能不心乱如麻，说出同1966年年底完全不同的话语来。而在那一次，他当着庆贺他生日的中央文革各位要员说：让我们为1967年的全面内战而干杯！惊得在座者个个目瞪口呆。

毛泽东极少作违心之事，而这一次在武汉，他最终却还是接受了各方劝告，恋恋不舍地连夜辞别了怒涛翻卷的长江，赶到东海之滨闻污浊黄浦江水的熏臭去了。驾驶着在惊涛骇浪中一着不慎就可能倾覆的航船，伟大舵手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还是心涛起伏，比掀动扑打那航船的惊涛骇浪翻腾得还要厉害？那段时期紧随舵手左右的张春桥，一定独具慧眼，有他自己独特的观察体会。他用手指轻轻一点，就把革联指和上海工总司某些头头苦心合谋的“拂晓行动”计划，有如气球水泡一般戳得粉身碎骨，是否就是对这一观察体会的实际运用呢？

第二十五章 北京之声（节选）

……奚大雄并不了解前面发生武斗的具体情况，只听的奔逃回来的队伍人员描绘血淋淋的情景场面，明白自己的队伍是遭到了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突然袭击，完全处在一种被动挨打的境况之下，心中叹息回锡前的计

划会议上，所有的与会者都只谈如何利用返城游行之机大造舆论的锦囊妙计，却无一人谈到预防对方突然袭击的措施办法。他扳着脸对蔡国柱说：“我很失望，我们是抱着大联合的动机、凭着军管会绝对可以安全返锡的保证，和平返回家乡的。如果贵军确实想按毛主席“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指示精神，真心实意地促进革命大联合的话，一是要立即安排救护伤员，二是必须追究九·一九这一新的暴行，对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严肃处理！”说完，他朝曲湘川望了一眼，一下推开车门，钻出蔡国柱的吉普车以示抗议。曲湘川犹豫了一下，对蔡国柱说道：“希望你能理解老奚的心情。”说完也随之拉开车门下车。蔡国柱朝司机挥了挥手：“走，我们前面去看看。”小车就“呜”得朝大批人流仍在朝这边溃退的方向开走了。

奚大雄同革联指几个头头临时聚在一起一合计，觉得返回去硬拼肯定要吃亏。只好临时改变原定穿过市中心的游行计划，除派出一部分人去前面抢救伤员外，其余的溃退人员同后续队伍并在一起，走环城马路去原定的驻地。他的心情很纷乱。然而这种纷乱的心境，却并不完全是这一场突发的武斗所造成的。事实上，从走出火车站月台的第一刻，他的心就乱了！他日思夜想的凌漪，没有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尽管有公司里的同事告诉他，凌漪已经获释。可是，在迎接他的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中，他就是看不到那张嘴唇一动就会显现两个酒窝的鹅蛋脸来。他的心抽紧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的心室！

与奚大雄相比，武遥似乎要幸运得多。

脚尖刚一踏到锡城市的地皮，就有人前来通知：市军管会的蔡副主任在车站贵宾室欢迎和接见革联指总部的全体头头。武遥立即就踌躇；革联指的顾问，算不算是革联指的头头呢？当然算！以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来说，他几乎可以算是革联指的总头头，头头们的头头。因此，当朱兆平和王小燕看出他在犹豫时，都坚持认为：他应该去贵宾室参加接见。“既然蔡国柱欢迎我们回来搞大联合，大联合后面就是三结合。你以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三结合对象，现在是我们革联指推荐认定的三结合对象，不管他喜不喜欢看到你，你都必须在他面前亮相。这也是对军管会是否真心实意要搞大联合、三结合的一个测试。”武遥尊重大家的意见，随众人一起进了仍然保留着红地毯的贵宾室。想到这是自从他四月底“火线亮相”之后与蔡国柱的首次碰头，就不停揣测可能会出现的尴尬场面，设想应付的办法。果然，蔡国柱对武遥抱视而不见的态度。他同每个人握手，寒暄，满面春风地表示热情欢迎之盛意，眼睛就是不朝他身上瞟；更不要说握手与交谈。王小燕和朱兆平瞥见这情形，就把奚大雄拉到身边一咬耳朵，三人随即一起上前把蔡国柱围住，由奚大雄带头说道：“蔡主任，我们很感谢军管会在帮助革联指返回家乡和促进革命大联合方面所作的工作！感谢你专门来车站迎接我们。同时，我们也很感谢武遥同志对我们红总所作的支持和肯定。没有他的这种支持肯定，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里跟蔡主任握手了。现在，他是我们革联指的顾问，也是十几万革联指战士信得过三结合候选对象。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希望看到革命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相互握一握手。”说完不由分说地把武遥推到蔡国柱的跟前。

“是啊，蔡主任讲了那么多要求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的话，我们期待着看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场面。”王小燕随即帮腔。

朱兆平也开口说：“我们还要感谢解放军，武遥同志是你们首先挑中

的。”一边说，一边用将蔡国柱军式的眼神，带着微笑看着蔡国柱。

蔡国柱有意不理武遥，既是为了给他难堪，更是为了表明：军管会并不认可他仍然具有三结合资格。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这几个造反派头头竟会当场逼宫，略一思索，不慌不忙地拉住武遥的手摇了一摇，说道：“为了不使各位失望，这个手看来是非握不可的了。何况是老相识，冤家不打不聚头，是不是？想不到你们造反派，还挺看重形式主义；关键还是要看实质噢。蒋介石把毛主席请到重庆去握手，转身就发动内战，幸亏共产党对这类握手早就有经验，有准备。我希望今天同武副书记的握手，也不要成为同一种类型喔！”

武遥微微一笑，回敬道：“我感谢奚大雄同志为咱俩提供这种机会。可是我并不十分同意他的观点。大家今天能在这里相互握手，靠得是毛主席。没有他革命路线的指引，我武遥个人，既不能肯定谁，也无法否定谁。不要说我手中无权，就是大权在握，那种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肯定或否定，也一定是长不了的；迟早会被历史所推翻。蔡主任，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蔡国柱收敛住笑容正色回道：“我们让历史来作结论吧。”然后对奚大雄说道：“我跟育文庆、史苏星讲好了，你们一回锡，双方就各出两名代表在我那里碰一下头，议一议怎么搞大联合的事。”

革联指的头头们并没有想到蔡国柱会有这种“只争朝夕”的干劲，就回说要商量一下。

在贵宾室外面的小花园里，凑集了曲湘川、雷竞天等其他几名核心成员，最后由武遥拍板，决定派奚大雄和曲湘川作为代表，与“九·一九”开展自赴京谈判结束以来的第一轮磋商。

由于革联指的回城队伍遭到了“九·一九”的突然袭击，奚大雄中途愤然离开蔡国柱的吉普车。曲湘川心中认为：打归打，谈归谈，谈判桌也是一种战场。但是为了对外保持一致，也就只好随之离开蔡国柱。

武遥在上海期间，包括返锡前夕寄的一封，曾先后给杨玲写过好几封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因此在出车站时，虽然也难免有东张西望之状，心中却并不抱大的希望。而后随着大队人马住进革联指的老本营苏南工学院，心里沉甸甸的，为了革联指人员一回锡就遭到迎头一闷棍的沉重打击，晚饭都觉得吃不下。突然间，却喜从天降，现任机关革纵头头之一的许洪元，吃过晚饭后去学院门口溜鞦时，恰好碰见了老首长的妻子杨玲，就把她俩带进了武遥的办公室兼卧室。

武遥喜出望外。自从“火线亮相”前夜与杨玲母女分手后，他俩仅见过一次面，还是在岳父家里。那一次武遥一是探望老人的身体，二是送托人从上海捎回的降血压药丸，三是想劝杨玲回家。然而在第三点上，他失败了。夫妻俩在“火线亮相”问题上的老矛盾未能完全和解，新的矛盾，却又在这次见面中产生了。他几乎不能相信，杨玲给他看的那份东西会是真的。更使他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是：不管那份材料是真是假，杨玲对材料中的观点和情绪，却抱有不加掩饰的共鸣。

这份杨玲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油印材料，名字叫《我这个外交部》；据说是外交部长陈毅在一个批判大会上所作的发言。这个在“皖南事变”之后同刘少奇一起主持新四军工作的“十大元帅”说：“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

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位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轮到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的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磨菇，明天来跟你磨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过一次，一九四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路线、方向错误，以后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毫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分，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话，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如果外交人员都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同志语录牌，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过，很伟大嘛！若有20%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乾纲独断。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个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是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也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

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帐。‘打倒大军阀朱德’？！人家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我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这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都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得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光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群，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好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去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了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部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住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是说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是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了就下不了台，哼哼！

“武遥看完这份材料，沉默了半晌，终于对杨玲说：“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出自陈毅同志之口。你过去在报社，我过去搞意识形态，都把思

想改造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按这篇讲话看，好象在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头脑中，这思想改造是专门对付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如果要他们也照办，就不干！这是一个真正马列主义者的态度吗？”武遥停了一会，见杨玲不吭声，又接着说：“文革以来，中央发了那么多报刊文章和文件，核心是怎么对待群众。这么大的一个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过火行为是难免的。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成立那一天起，直到文革运动开始前，就从来没有做过过火的事吗？为什么犯在老百姓的身上，就变得那么大逆不道了呢？”

杨玲还是不作答，却听到躺在内间床上的老岳丈气喘喘地说：“你总护着那些造反派。

他们也许有……造反的理由，可是凭他们的素质和水平，让他们来掌权，这个国家只会……只会变得更糟！不懂科学，不尊重学问知识，就凭大搞阶级斗争，大搞个人迷信，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吗？就凭陈毅敢反个人迷信这一条，我就觉得他……是好样的，有骨气！”说完，就传出来了一连串的咳嗽声。杨玲急忙跑进房，给父亲捶背、倒水、喝药水，然后回出来，对他苦笑笑，说道：“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还没有开始争论，老头子就已经加入进来了。他一激动，会整夜睡不着觉。”

武遥深情地握住妻子的手，注视着她明亮的双眸，用近乎恳求的口气说：“那就让我们一起回去争吧，争个水落石出，再重新合成一条心，好不好？”

杨玲用另一只手在他的手背上抚摸了几下，然后挣脱了被他握着的那只手，柔声说道：“让我能把你过去留给我那些形象，继续存留住；让我再看上一段时间，可以仔细想一想。

等咱俩能够重新统一的时机成熟时，我们再交锋吧。自从你亮相后，我爸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他现在比你更需要我。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可以让杨翼回去陪你几天。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很忙，女儿呆在你身边对双方都不利。等你的大忙季节过了，我会带着她常回家看你。”

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就开始了大武斗。为了安全与其它方面的考虑，武遥不得不住进了苏南工学院。而杨玲父亲的居所，却处在“九·一九”管辖区内。然后是撤离。武遥就再无机会同妻子女儿相会。

……杨玲再一次发现：虽然同武遥已经做了将近十年夫妻，在他身上，却还是有一些她所预想不到的东西，跳出来使她感到新奇和惊讶。也许，正是那些充满官场习气的共产党干部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品性特点，使她当初迷醉，如今却要不断为此付出代价。她曾听陈驰华老师说过一句西方名言：天底下没有不付钱的午餐。这句话所包含的多重哲理，似乎此刻她才全部明晓——你总要为你所求得的东西付出相应的代价。她曾经为自己的丈夫充满自豪。她已经为这种自豪付出了诸多代价，而且似乎是老付不完分期付款。等他作过了这最后一次政治表态，是否就算全部付清了呢？她内心抱着一种本能的怀疑。然而，她又有什么选择呢？她知道：老武一旦打定主意，就是绑上一百条老牛也拖不回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分发挥他主动提议的文章修改建议权。

在而后的一个星期里，杨玲认认真真地行使她的修改建议权，从反对派的角度，横挑鼻子竖挑眼，一本正经地帮助丈夫把文章尽量搞得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无懈可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其中有两三天，杨玲去父亲那里把杨翼带到苏南工学院，以慰父女双方渴念之心。

顺便也是向老父亲通个风，就武遥将要发表的时局看法，自作主张地借着武遥名义征求岳丈的意见，以示吸取上次“火线亮相”时的教训，对长辈礼貌周全地表达尊重之意。整个制作过程，也许是双方抱定了求同存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决心，夫妻俩极少争论。四、五万字的洋洋大作，常常是武遥写上一大个段落，杨玲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一通意见，武遥洗耳恭听，然后修改。然后再交杨玲“复审”。如果杨玲发觉自己的意见被采纳，自然欢天喜地。如果言不尽意，就代为斟酌字句。如果依然如故，或换汤不换药，杨玲知道丈夫不愿接受违心之论，也不勉强；从重建夫妻蜜月的目的出发，抱听之任之的态度。

以这种奇特方式炮制出来的文章，果然不同凡响。人们初一看，倒好象这并不是革联指的头号高参，为维护革联指的利益向对立派发的一颗炮弹；而是貌似公允，各打五十大板。

全文先是引经据典地点明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和意义，强调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针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蜕化变质的现状，不仅是要解决中国人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是要为世界上一切被剥削压迫人民和民族指明前进的方向。接着回顾锡城市文革历史，追溯产生两大派组织的思想、政治和社会根源，剖析人们的错误观念，旧的习惯势力，以及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怎样使锡城市的文革运动，逐步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所指明的正确轨道。武遥在文章中，首先检讨和批判了自己在担任旧市委领导时所执行的资反路线，强调这一资反路线的关键，是不能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不满和造反。

党的绝大多数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认识不到我们社会中确实存在着需要加以纠正剔除的阴暗面，反而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唆使挑动下，把响应毛主席号召勇于起来揭露这些阴暗面的革命群众，视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就采取了利用一部分基层党团员和群众骨干对党朴素阶级感情，组建“保”字号组织压制围剿革命群众的做法，从而使本来就紧张党群关系，进一步走向对立恶化。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初步胜利的“一月革命风暴”之际，锡城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本来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认真听取群众的不满和意见，与鄙视仇视人民群众的资反路线划清界线，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之上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令人遗憾的是，驻锡部队重复了旧市委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错误路线，从右的方面加入了锡城市的文革运动；并在取缔红总的基础上，组建了全市统一的群众性文革组织“九·一九”，为锡城市后来分裂为两大派群众组织奠定了基础。驻军领导在陪同两派代表进京谈判时，对于支左工作中所犯的这一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已经向一方造反派作了反省检查，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许。锡城市的文革运动下一步向何处去，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在革联指一方面，是否因为解放军承认了所犯的过错，就觉得自己是一贯正确的当然左派，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实行大联合？二，在“九·一九”方面，虽然现在也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却是否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思想深处坚持“造反无好人、好人不造反”的想法，等着跟造反派搞“秋后算帐”？

从第一方面作分析回顾，红总等造反派在“一月革命”时期所表现的“唯我独革”的倾向，同保守派群众“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思想，其实是同一种小资产阶级狭隘观念的不同表现形态。这一时期造反派对

革工联、大中兵广大成员所采取的激烈报复态度，以及其队伍本身所存在的思想组织不纯，极端自由化、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风行一时，个人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在一部分造反派头头身上有特出的表演等，都大大损害了造反派的形象，加深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党团员群众对造反派的敌视心理。这种敌视心理，直接影响了支左解放军对造反派的看法。而在红总平反之后，红总红联指方面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却仍然“唯我独革”，不承认参加了“九·一九”的原革工联、大中兵人员，也有革命造反的权利，而把他们一概视为复辟倒退的黑势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工学院“从头越”兵团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长征兵团的革命功勋和左派地位时，缺乏宽阔革命胸襟的长征兵团，却一口拒绝了对方面所提出的以长征兵团为主实行大联合的建议，采取了逼令“从头越”自行解散的错误态度。在狂热的极左思潮和偏执的保守观念的主导下，双方不能在同一个革命大目标下相互兼容和解，而把由于某些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分歧，视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直到导致两派走向血腥大武斗。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革联指在当前推进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是否已经表现出自己政治上应有的成熟，其主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真正承认“九·一九”是代表了应该加以团结依靠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之中的另一半，是否能摈弃“主力军、红联指就是压不倒”之类的斗争性口号，真诚地、满腔热情地推动促进革命大联合。那种因为发生了一些新的冲突，就怀疑革命大联合的方向，动摇实行革命大联合决心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

在“九·一九”方面，对按照在北京达成回锡协议安排的革联指仍然兵刃相见，大动干戈，说明把革联指仍然视为革命仇敌的思想观念，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显然受到了某些方面的鼓励纵容。事件发生以后，幕后策划着和凶手不仅没有受到认真查处，反而大造舆论，倒打一耙地诬告革联指游行队伍冲击“九·一九”据点，毒化了锡城市革命大联合的空气，破坏了赴京谈判时所创造出来的良好气氛。如果说，革联指应该对锡城市的不利政治局势负更多历史责任的话，“九·一九”则必须对锡城市的政治现状，对大联合筹备会议的中断，负有主要责任。希望“九·一九”的核心领导在这一是向前进还是朝后退的紧要历史关头，表现出言行一致、不计前嫌、真正以革命大联合全局为重的品质。生性善良的锡城市人民，已经尝足了家庭分裂、亲人反目的苦楚，受够了两派大武斗的血火之灾和磨难，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都必须对推选自己到领袖位置上的群众，负起革命的、历史性的和道义上的责任，不再以对付敌人的立场态度，继续沿用过去那种不择手段的做法，竭力诬蔑、攻击和削弱对方组织。

接着，武遥借谈论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个人体会的形式，笔锋一转，把矛头对准了市军管会的领导。他指出：毛主席在向全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指示后，特地向驻锡部队发出了“常胜之军、要立新功”的指示和希望，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这就是明确告诫驻锡部队不要躺在过去的历史功劳簿上吃老本，不要在大联合的过程中，重犯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锡城市的革命造反派，一方面对驻锡部队所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以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慷慨地给予原谅。另一方面，他们也抱着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态度，希望市军管会的某些领导，真正能够吸取教训，从心底里承认和尊重革联指一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确实做到“一碗水端平”。人民解放军驻锡部队在锡城市人民心目中享

有崇高的威望，掌握了本市主要的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锡城市文革运动进行得是好还是坏，革命大联合进展得顺利还是艰难，都跟市军管会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密不可分。全市一切真诚希望看到锡城市革命大联合成功的人们，真挚地希望驻军领导能够摒弃个人好恶，严查“九·二八”武斗事件的策划组织者和凶手，使近百名受伤者及其家属能够从市军管会领导的实际行动中，真切感受体会到：常胜之军确实在积极响应毛主席“要立新功”的号召，向破坏革命大联合的行径作坚决斗争。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武遥再次引经据典，强调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必须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明辨大是大非基础之上的大联合，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和稀泥”式的大联合；更不是颠倒黑白、要想借联合之机，让一派组织吃掉另一派组织的“吞并式”的大联合。

这就是武遥精心泡制的打算赠送给锡城市人民的“告别礼”。一谈到文化大革命，人们就会想到毛泽东在他要求联合的著名指示中所提到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其实，在老毛发表这一最新指示的时候，在中国各地，还存在着人数众多的第三派。这派人可以被称作中间派，骑墙派，或观潮派（注：两耳不闻文革事，一心只顾自家事的“逍遥派”不在其列）。单纯从字面上去理解，他们似乎是在两派龙争虎斗之际，或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或似墙上芦苇草，风吹两边倒。实质上，这类人内心都有自己一定的政治见解和倾向性。例如杨玲及其父亲，因受过政治冲击而对两派组织都敬而远之的董校长之流，对两派争斗和军人主政始终抱冷眼旁观态度的俞市长等一大批原地方领导干部，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组织，不在正式场合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但是在其各自特定的范围中，在向两大派听众发表他们“各打五十大板”的观点方面，却很少犹豫。这些人因为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严肃搏斗曲解为宗派、权力之争，在私下场合今天批评这一派，明天指责那一派，两头得罪人，两头不讨俏，一向并不被两大派和市军管会所重视。后来经过大武斗，因厌恶或恐惧武斗血腥气而从两派组织中游离出来的人数越来越多；加上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一发表，这派人原先所持的中立观点，倒好象同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不谋而合，显示出具有先见之明的亮丽色彩，其政治影响力和思想追随者，急剧增长。武遥对时局的看法在《长征战报》上一发表，首先赢得了这部分人的思想共鸣。其中竟有人以“促联派”的署名，在市中心贴出了支持武遥观点的大字报，遥相呼应地责问市军管会在“九·二八”流血事件上的暧昧立场。

史苏星、季家驹、刘海南等“九·一九”头头把武遥的文章一分析，觉得他那种貌似公允“各打五十大板”的言论，比一面倒地革联指造舆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杀伤力。他对红总红联指以前“唯我独革”、不许别人革命造反所作的批评指责，实际上是一种不露痕迹的褒贬手段——即通过呼吁他们正确对待前保守组织成员的方式，造成革联指具有正统革命左派地位的印象，而把“九·一九”贬低为应该加以团结宽容的对象。而对“九·一九”所作的指责，虽然比革联指近日来所作的连篇累牍的攻击缓和得多，却用第三者的口气，旁征博引，有根有据的分析推导，不仅把“九·二八”事件的罪责，不容置喙地加到了“九·一九”的头上，而且将此上升到是促进还是破坏革命大联合的高度，责令“九·一九”改辙易张。文章对市军管会的批评，更是咄咄逼人。一方面把解放军支左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问题，

全归咎于军管会的领导错误；另一方面拉大旗，作虎皮，借毛主席“要立新功”的最新指示，企图迫使军管会就“九·二八”事件惩处“九·一九”，扭转革联指在大联合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经过这么一分析，大家觉得下一步必须把武遥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武遥在文章中所使用的那些躲躲闪闪的语言，说穿了，不过是在古伎重演，目的是再次煽动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不满。在中央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支持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新形势下，这个旧市委的老当权派以退为进，贼心不改，既然要同革命人民继续较量，革命人民也就只能奉陪到底了！

……………武遥和杨玲骑自行车，一路朝反帝医院飞奔。经过几个主要街口时，发现又有一拨子、一拨子的人，在夜色中忙忙碌碌地张贴新的大标语。杨玲此刻可顾不上看标语，脑子里老是父亲的各种脸容，象过电影似地在眼前闪现。她不明白父亲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脑溢血！而且凭她的医疗常识，知道这意味着父亲即使大难不死，也十有八九会变成痴呆，形同行尸走肉。想到自己从此就要永远失去一个慈祥老人的关切挚爱，离开他那不时照耀自己生活道路的智慧光芒，眼泪不由夺眶而出。当她赶到医院门口，从一辆到达不久的救护车中，看到心脏已经停住搏动的父亲时，她就失声痛哭起来。泪眼模糊中，透过挡住她去路的急诊室门玻璃窗，可以看到医护人员在为死者作最后的检查和纪录。她用手绢拭着眼泪转过身来，突然发觉情况异样。定神一想，才发觉身边只有父亲的邻居，却并没有丈夫的身影。她这时不仅心中异常悲苦，而且突然变得十分慌乱。急忙返身冲出医院大门，朝着来路上踮足张望。擦肩而过的行人用好奇的目光，瞥视她满脸泪痕而又焦急万分的模样。终于，在被梧桐树重重黑影遮掩下的人行道上，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走动身影。他推着自行车，走出了树荫，仿佛梦游似的，不慌不忙地蹒跚着脚下的步子，显现在黄惨惨的路灯灯光之下。

“老武！”杨玲哭叫着扑上去，扶住丈夫的肩头，泣不成声地哽咽道：“我爹他……他去了！”武遥好象被杨玲在沉思冥想中突然惊醒，蓦然抬头，用使人心惊的冷漠表情望着泪涌如泉的妻子，喃喃地低声问道：“这么会呢？”然后管自摇了摇头，仿佛要从头脑里抖掉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东西，又重复低声嘟哝了一句：“怎么会呢？”

杨玲发现父亲家热心的邻居也站在她身边，不由朝他含泪发问道：“我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中风的？”

……………她双腿发软，天晕地转，一下子昏厥过去了……

第二十六章 不归路（节选）

在革联指从沪返锡第一天，开完那个拖得很晚的总部会议，奚大雄深更半夜敲响了凌漪住所的门。白天没有在火车站欢迎人群中露面的凌漪，这时却顾不得开灯，就扑进了他的怀里。两个人在黑暗中相互紧紧拥抱着，那种可以融化冰川雪山的炽烈，因为上一次分离所带有的生死别离的色彩，超出了一般人久别重逢时的程度。奚大雄听到了凌漪“嚶嚶”的啜泣声。奚大

雄以为这是乐极生悲的表示，一个劲地柔声劝慰：“别哭，别哭，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以后我俩再也不分离。我每天回家住，一定，一定……”然而凌漪的泪水，竟象瀑布般地奔泻而下，喉头的哽咽声音，悲伤得好像她并不是抱着一个安然生还的丈夫，而是抱着他的骨灰盒似的。她抓住奚大雄的一只手，颤抖地把它按到自己的脸庞上。奚大雄的手指，立即变得湿漉漉。他并不完全懂得凌漪这一动作的含意，只是顺势用那泪水打湿的指头，在凌漪的脸颊上轻轻地抚摸移动，另一只手，则在她的全身上下，不住地搂摸安慰。可是怪，他越搂摸，越安慰，凌漪却越是哭得欢！奚大雄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先是问她收到他的信没有，接着倾诉自己下火车后没见到亲人迎候的失望、凄凉和不安。凌漪突然挣脱了他的胳膊，冲到墙脚跟前“啪”地开亮了电灯，朝他发出了令人心碎的哀号：“你看看，看看我的脸！你喜欢看吗？你喜欢看，我就在家里让你瞧个够。”奚大雄震惊了！他方才好象觉得：自己湿漉漉的手指头触摸到的脸，有些异样的感觉，现在一下看清了：她的脸颊上，竟然布满同葛富林脸上相类似的疤痕，皱褶中有平滑，平滑中起皱褶，而且两面都是，在电灯光下，泛着能使人生出鸡皮疙瘩的滑亮之光。凌漪带着这张丑陋无比的脸，扑回他的怀里，泣不成声地哀哭道：“你原谅我吧，我是……实在没有那个勇气，到大庭广众面前出丑去啊……”接着，奚大雄听到了凌漪使人心痛欲裂的长篇哭诉。

（此处作者作大段删略）奚大雄听了这一段使人几乎无法相信的悲惨哭诉，几乎觉得自己也要忍禁不住地号啕大哭起来！他对凌漪为维护他的声誉而不惜被毁容的崇高牺牲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而只是一个劲地在她那伤痕斑斑的脸颊上狂吻不息。

一边狂吻，一边不停地说：“你不要太伤心，不要太伤心。在我眼里，你比以前更美，更动人！更可爱！世上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比得上你！我告诉你，为我俩办结婚证的事，时红霞的丈夫已经写了纸条。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办……”奚大雄发送着这些肺腑声音的时候，两手已经把凌漪腾空抱起，象一件稀世珍宝一般地，把她小心翼翼地安放到床上。然后用毛巾对着她不停流淌的眼泪，擦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他改变劳而无功的做法，开始用嘴唇去舔她那两个泪水涌流不息的泉眼；一双手，开始有条不紊地缓缓解开凌漪的衣服钮扣和裤腰带，然后伸进那些最易转移她悲伤情绪的部位，极其温柔地抚摸摩挲起来。在他这种刻意排解悲痛的爱抚温存之下，凌漪的眼泪终于渐渐制止，喉咙里抽咽的频率，从一秒钟左右一次，逐渐延长至几分钟一次。苍白的疤痕上，也在黄亮的电灯光下显出了红晕。当奚大雄终于把自己的身子象大山倾倒般地压上她的身躯时，她的喉头，不由低低地发出了另外一种呻吟……然而，当第一个高潮消退之后，晶莹的泪花，却又亮晶晶地，从凌漪的眼角边上滚出来。于是，奚大雄又知道了李辉康偷拍照片的事。奚大雄此刻心中升腾起的怒火，把眼珠和脸膛都烧红了。“你保存着那照片了吗？”奚大雄怒冲冲地发问。“我把它交给他那位姓贾的上司了。”凌漪首次看到奚大雄那种被怒火烧红的双眼和脸神，不由害怕起来，回答的声音变得胆怯生生的，不仅声调有些发颤，连身子也跟着颤抖起来。奚大雄立即从暴怒中苏醒过来。他知道妻子是被他的表情吓坏了，并且因为身子被另一个男人糟蹋，而起了一种不应有的羞惭负疚感。于是他立即赶走怒气，再次把凌漪象受惊的小羊紧搂在怀抱里……。

期盼已久的结婚证，非常顺利地领到了手。蔡国柱极严肃、极愤慨地

听完了奚大雄陪着凌漪所作的血泪告状，凌漪在一年多前去医院探望他妻子所留下的好印象，在他脑子里仍然记忆犹新。他随即给“九·一九”独立团团团长贾建勋打电话。这时候，奚大雄的心中开始变得不踏实起来了。在来军管会的路上，他才听妻子透露：那位李辉康的上司、独立团的贾团长，原来就是当年借跳舞对凌漪作过非礼举动的贾师长！有其奴便有其主，况且有那么一笔历史旧帐，姓贾的会确认凌漪当初所作的控告和交给他的罪证吗？然而出乎意外，蔡国柱很亲切地把话筒递给凌漪：“你来接吧，老贾要让你亲耳听他作保证。”凌漪犹犹豫豫地接过话筒，竟听到这位曾对她命运发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先是在电话里用检讨性的口气对她说：“真对不住……我轻信了李辉康，还真以为是那个红总司令硬拆散了你同他的关系。本以为把你交给他全权处理，可以使你们破镜重圆，也能揭露你现在那位丈夫的流氓本性。后来才知道他对你使用了那些下流残暴的报复手段。现在有蔡副主任的指令，我会立即把他送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的！”姓贾的在电话里说到这里时，口气突然变得有些不顺畅起来，声音也变低了：“……真对不起，我看了有关你的全部材料，知道你后来受了好多委屈……。希望你……能原谅我那次喝多了酒。”然后他挂断了电话。奚大雄陪凌漪走出军管会时，很奇怪她同昔日宿怨何以电话越打，脸神变得越柔和。凌漪就把贾建勋电话中说的话，一五一十作复述。奚大雄将信将疑地看着她。就在第二天，公司里就传开了李辉康被抓进监狱的消息。

（此处作者作大段删略）但是也有例外；王小燕就是其中一位。召开市革会成立大会的前一天，她联络了奚大雄等四五名原革联指的市革会常委和委员，要找代表中央来锡祝贺的张春桥反映情况，却在桃红柳绿的太湖宾馆门口被挡驾。第二天欢庆市革会成立，庆祝大会尚未正式开始，红联指的几个下属组织，又同锋头正劲、气势如虹的“九·一九”的队伍，不识时务地发生了摩擦冲突。结果旗帜被撕毁，人员被打伤。王小燕在主席台上遥遥领望见自己手下队伍的一副惨象，勃然大怒，对拼命拦阻劝告的曲湘川、朱兆平等投之以轻蔑的一瞥，带领近万名红联指的小将，愤然退出聚集了十几万庆祝之众的体育场，挥动着被撕成碎片的战旗，呼喊激愤的口号，乱哄哄地凑成一支杂乱的队伍，象漫山遍野乱了方寸的羊群，“吁吁”乱叫着，朝着联结太湖宾馆的那条大街上，絮乱无章地奔涌而去。这些曾经受到毛主席宠爱、为冲垮刘邓路线立下汗毛功劳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不能相信毛主席手下的大红人、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主心骨，会对邻近地区保守势力的猖狂反攻倒算熟视无睹，对受尽打击迫害的锡城市造反派甩手不管。他们一路行进，一看到路边的围观者中有熟人或同情者，就立刻大呼小喊：“走啊，找张春桥去！拦他的车去！……”皇天不负苦心人，红联指小将们的队伍，果然在运河桥堍的拐弯处，拦到了数辆正向体育场庆祝大会齐齐进发的小车队伍。车子在铺满整条马路的蜂拥队伍前，不得不刹车停止。即刻有眼尖眸聪的小将发出惊喜交加的呼喊：“张春桥！张春桥在第二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里！”这时候，第一辆车子里钻出一名秘书模样的人物，对名扬全国的首长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公然拦截，显得又惊又恼，连声对着领头的王小燕叱问道：“你们是那一派组织的？想干什么？”王小燕一边不慌不忙地递上自己的证件，一边沉着冷静地回道：“我叫王小燕，苏南工学院学生，锡城市革联指的核心组成员，现任市革会常委。昨天我同数名市革会造反派代表去宾馆找春桥同志，反映汇报市军管会主要领导勾结我市保守复辟势力，对革

命造反派全面反攻倒算的严重情况，受到阻挠。今天一早在庆祝大会现场，我们造反派的队伍再次遭到攻击，你可以看到我们头上这些被撕烂的旗帜，和我身边这些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战友。我们请你转告春桥同志，希望他走到群众里面来，听取人民的呼声，重新考虑成立锡城市革命委员会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

那秘书模样的人看着证件上的像片，对照了一下王小燕的长相外表，没有吭声，转身走向第二辆车。人们看到车窗的玻璃在下移，一直在正襟危坐中静观车外动态的张春桥，脸色阴沉，身子略朝前倾，一只扶着黑色眼镜框架的白晰手掌，安放到摇下玻璃的车窗沿上。

然后似乎是在洗耳恭听。然后好象是在发指示。然后只见那车窗玻璃又齐齐上升，恢复原状。

那些头脑反应敏捷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一看车窗启而复闭，车门紧闭如桶，立即知道请愿失败！一向把群众路线叫得震天价响的春桥同志，此刻根本没有心思来倾听他们的呼声，立刻由失望而变为愤怒，愤怒转为狂野，在狂野中吹响了一片声音尖利的唢呐口哨。在这样一种愤怒而又混乱的嘈杂声中，王小燕几乎没能完全听清记住秘书的回话。数天之后，当她和奚大雄、葛富林、金阿二、雷竞天等秘密会集在一起时，对那位秘书所作的转达，她所复述的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春桥同志要我向你转告毛主席的一句最新指示：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张春桥对拦车革命小将们所作的这种回应，使锡城市的造反派，简直可以说是伤心得寸肠欲断。在新的形势下，“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这样的至理名言，似乎不再适用。原以为以革命左派著称的春桥同志只是误听谗言，在武遥问题上当头一棒，把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的锡城市革联指造反派打得七葇八素，晕头转向。在王小燕及其战友亲眼目睹了这位左派人士对他们不屑一顾的冷傲态度，聆听了那种阴森森的威胁性话语，他们开始怀疑：是这位在庆祝大会上代表中央向市革会成立致以热烈祝贺的主席宠臣，向主席进了谗言；以致使人觉得革命越革北京越远，造反派的处境越惨，毛主席的笑容却越显得慈祥。他们只怨自己运道不佳，从文革开始以来所搭上的那些关系，从支持“北上控告团”的周荣鑫到大声疾呼“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林杰，从被张春桥镇压的复旦红革会到被“工宣队”专政的“清华井冈山”，一个个都好景不长，转眼间自身难保，不仅失去求助的指望，反而受其牵累！他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毛主席对“与工人阶级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虽然深恶痛疾，对妄图趁机兴风作浪、搞乱共产党天下的社会不满分子，并不会因为他们在打倒刘邓路线上立了汗马功劳，就不跟他们算帐，就“造反更觉‘造反派’亲”！“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他老人家的话是说得如此明白，如果对之加以深刻领会，再结合在所谓的“二月逆流”期间，毛泽东对各地支左部队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所抱的那种默许态度，以及而后他亲自批令开展的“清队”运动和全国性“清查五·一六”运动，他实在是左右开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用林副统帅的大彻大悟之言来描述，是“今天拉这一派打那一派，明天拉那一派打这一派”，把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一台巨型的“绞肉机”。文革造反派（注：不包括那些一开始就同造反派对抗、后来借“造反派”帽子加入为毛泽东所认可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中的保守派）在这些灾难性的连番打击中，经磨历劫，死伤累累。不要说在那些民风好勇斗狠的偏远蛮荒之地，就是在

被认为是文明开化程度最高、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名的江南富贵温柔之乡，也饱尝“秋后算帐”的种种惨烈滋味。例如上使受刑者骨折筋断的“老虎凳”：把人的双腿捆在长条凳子上，然后在膝盖以下的小腿与板凳之间塞砖头；在十指连心的手指尖上钉竹签子；在身体上滋滋冒烟作响地烙烧红的铁条；还有滚钉板，灌辣椒水……等等之类；这些据说当年在国民党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所盛行的酷刑，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光辉思想照耀之下，却在中国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推广应用。还有浇滚开水，跪碎玻璃，逼喝尿粪等，则也许是文革初期受毛主席鼓励、得到地方官员支持的红卫兵小将们的创举，此刻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造反派所受的打击迫害之深广惨烈，不仅被老毛痛斥为实行“白色恐怖”的刘邓路线，远远无法望其项背，与至今使许多人耿耿于怀的反右斗争相比，更是无法同日而语。迄今为止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切文革苦难，与这千百万“犯上作乱”分子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坑洼积水面对江河大海。当然造反派在其短暂的得势之期，也有心狠手辣的表现。想当年，他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地用挂牌游街、跪长凳或跪地请罪及皮鞭抽打之类，兴高采烈地对付与他们作对的保守派人士和“欠他们帐”的当权派人士；如今，他们所遭受种种手段酷烈的“秋后算帐”，虽然与他们昔日的胡作非为在性质和程度上不成比例，却也是一种报应！

而当王小燕在张春桥面前撞了一鼻子灰的时候，锡城市的造反派尚未认清人民大救星对走资派和造反派左右开弓的轮番打击策略，更未充分领受体验到这种打击的酷烈与厉害。但是凭着他们的政治直觉，却已有了大祸将临的预感。大部分或在惶恐不安中坐以待毙，或摇尾乞怜地投靠当权者，但是以王小燕奚大雄为首的一小撮死硬分子，却想作死猫咽气前的最后一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使我们免遭被全面清算的结局，全靠我们自己！锡城市的造反派，从张春桥阻止上海工总司帮助我们杀回老家起，其实就成了他同军队作交易的牺牲品，我们不能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王小燕慷慨激昂、毫无忌惮地说出内心的想法。大家一致同意，觉得既然面临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严峻形势，还不如铤而走险，拼个鱼死网破。……………（此处作者作大段删略）

第二十七章 尾声

1968年10月13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发问：现在都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他的自我回答是：文化大革命大概需要三年，因为造反派夺权的全面胜利，到1969年夏天就差不多了。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而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建各级党组织，运用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力量，稳定文革造成的既成格局，是他在心中思考筹划的下一个步骤。

远在长江以南的锡城市老百姓，在10月13日这天早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意图，当然一无所知。那些步行的、乘车的、骑自行车

的市民们，在加入苏南工学院大门外那条街道上的上班洪流时，却发现有一辆并不“呜呜”鸣叫警报的红色消防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进工学院的大门。工学院一大清早失火了吗？哪里是浓烟？哪里窜火苗？为何不拉警报？何以只有一辆消防车孤军上阵？人们好疑惑。可是，他们受工学院的围墙和黑色的铁栅门阻挡，无法象一般火灾发生时那样，为满足他们所具有的强烈好奇心和看火灾的爱好，深入现场搞观摩或调查研究。其实，即使不受铁门高墙阻隔，不惜付出上班迟到代价，他们也无法窥见欣赏到消防车在浓烟烈火中奋勇救灾的壮烈场面。因为在消防车拐进的那个弯道口的不远处，挡着王小燕和曲湘川曾经有过一段非凡经历的小洋楼。而在那条通向小洋楼的道路两头，都已经被市“文攻武卫”战士，加以严密地封锁。土制的钢盔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红缨枪的飘穗在晨风中严肃地飘动。就是无围墙铁门阻隔之难和上班迟到之忧的工学院师生员工，也被挡住去路，无法知道消防车开进小洋楼旁那条被水塔当头拦住的死路作何贵干？他们遥遥聚集在小洋楼前那条林荫道东西尽头的两个丁字路口，听消息灵通者讲解消防车到来之前，先有救护车来往的曲折情节……（为防剽窃版权，此处作大段情节删略）。

1968年的9月7日，是一个应该大喜大庆的日子。代表中共中央权威声音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著名社论，社论欢呼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极其壮丽的一幕”，并且指出：“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论还传达了毛主席把在《十六条》中提出的斗、批、改任务进一步具体化的最新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可是，从武遥被张春桥点名之后就似乎噤若寒蝉的马进，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刚被院革会内部列入下一轮“五·一六”学习班的审查名单，却迫不及待地自动跳出来，突然以个人名义，异想天开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对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自称“经过一番认真的回顾思考”，“形成了一点个人看法”，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他的“个人看法”，大致可以归结如下：鉴于西方民主为垄断资本所操纵控制的反动实质，吸取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从“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主人”的严重教训，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所发动的文革运动，是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伟大尝试，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新曙光。

按他马进个人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体会，感到参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经验，对国家官僚机器和阶层形成有效的群众性监督体系，加强党群关系，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也许是文革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和设想。《人民日报》在67年11月19日发表的《干部要到群众里面去》的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的最新指示精神，强调“干部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可是，据他所掌握到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状况却十分令人失望。他随之列举了大量事实，对锡城市及其邻近地区普遍存在的“结党营私”、“以人划线”、胡作非为、以权谋私等情况，描绘了一幅极其阴暗的社会图景；

并且强调指出：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这些地方所盛行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家长制式个人独裁统治，基本上代替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全背离了巴黎公社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动辄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大批干部群众，扣上“反党乱军”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手段之酷烈，程度之深广，后果之严重，令人发指！如果毛主席党中央对此不采取断然措施，有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文革的伟大意义和胜利成果，产生根本的动摇和怀疑。

假如马进光是用上面这些危言耸听的话，“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玩弄一下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游戏，也许他还不至于落到脑袋开花的悲惨结局。问题是他对造成上述“令人失望局面”的原因，还作出了一些自作聪明的理论分析。其要点为：1）他竟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对发动文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文革前夕中国各阶层各社会集团（特别是对军队系统）的政治立场态度，缺少系统化、定量化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文革运动每一个重大步骤的出马，常常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应急性和偶然性；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某种程度上的前后矛盾性，对导致人们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白热化的派别斗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下令部队介入地方，一忽儿“揪军内一小撮”，一忽儿又否定“揪军内一小撮”。而上面所提到的“结党营私”、“以人划线”、封建家长制式的个人独裁统治等后遗症，几乎都同这些由此派生出来的派别斗争，密不可分。与此相联系，高层领导中的个人沉浮，往往代替了政治原则和路线斗争的是非标准，进一步助长了“跟人不跟线”的倾向，最终导致了好多人对崇高政治信念和革命理想抱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找靠山、随势倒、关系高于一切的恶劣风气，不仅毁掉了一批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而且了毒化我们民族的社会心理，其长远的消极影响，将会在今后几代人的身上逐步表现出来。

2）人们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业大国，在人民普遍缺乏基本民主训练的情况下，采用“大轰大鸣”的大民主方式，能否达到文革纯洁干部队伍、加强民主监督的目标？马进谦虚地表示：他不想以自己所了解掌握的局部情况，以偏概全地作出没有把握的总体性结论；但是希望党中央能通过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对此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他认为：毛主席匠心独具地提出了“斗私批修”的指示，希望以此提高人民掌握运用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总体素质和水平。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派别、权力和关系决定一切，“斗私批修”的具体实施和效果，就大都流于形式。

马进在信尾十分恳切地表示：受个人认识条件的制约局限性，他的一窥之见很可能失之偏颇。但他真诚地希望毛主席能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宏伟气魄，亦发动全党全国人民对刚刚尘埃落定的这场大运动，按照老人家早在1957年就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一场心平静气的大讨论。而且衷心地希望：今后中国不管搞什么大运动，事先都要按毛主席一向强调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民族传统智慧，和文革中一再强调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思想，开展广泛充分的讨论交流，以增加共识，减少避免失误、混乱和人民内部的对立冲突。

最后，马进虽然在他的信中发了好多惊世骇人之言，却仍然难免按当时流行的俗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马进自认为是在行使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因此他把自己的信，按正

常的渠道，投进了邮局的信箱。可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在给信件打邮戳时，一看到“党中央毛主席敬收”的抬头，立即就上交有关部门拆检审查。审查的结果，初步认定全信通篇毒汁四溅，所谓“以人划线”、“封建家长制的个人独裁统治”之类的话语，实质上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影射攻击。那些对所谓“跟人不跟线”、找靠山、随势倒、关系高于一切”现象的抨击，实际上是发泄对张春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不满怨恨。信中所诬蔑攻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则是为受到无产阶级专政严厉惩处的“五·一六”反动分子鸣冤叫屈。而他所津津乐道的中国人民“文化程度低”、“缺乏基本民主训练”之类，恰恰反映了这位“为民请命”的英雄，骨子里却对人民群众十分地蔑视和仇视，以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他那些“文革缺乏充分准备”，“运动带有较大随意性、应急性、偶然性、前后矛盾性，导致人们普遍思想混乱和白热化派别斗争”的谬论，更是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所作的最放肆、最赤裸裸的否定和攻击！也是为走资派和阶级敌人破坏文革推卸罪责。马进有关“斗私批修”流于形式的恶毒诬蔑，则是他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罪证！而最后的那两句祝福话，不过是阶级敌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惯用伎俩。马进虽然在一般市民中知名度远远不及武遥，在市内有关当局的眼里，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这封信为“忧国忧民”、实为诋毁诽谤毛主席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信件，立即被送到了实权在握的市革会第一副主任蔡国柱的办公桌上。蔡国柱虽然对信中有关部队介入地方的非议特别愤愤不平，就总体而言，却大喜过望。立即指示市公、检、法把自投罗网的马进逮捕，从重、从严、从速判罪定案。

具体办案定案人员心领神会，以雷厉风行速度，判处马进为“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猖狂诬蔑反对文革和人民解放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一措辞严厉的判决，一送到当时同样由军人主政的省高等人民法院，立即核准。

1968年10月12日的锡城市，警报响，摩托欢，大街满，人头攒。行刑前游街示众的浩荡车队，由“隆隆”震响的摩托车和“呜呜”鸣叫着警报的警车开道，耀武扬威地行进在通望苏南工学院的大道上。在离工学院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就是闻名锡城市的枪毙场。在第一辆草绿色的军车上，载着三名五花大绑的枪决犯。车厢两侧，一面是一个自作聪明地用报纸铅印字剪贴拼凑“打倒毛泽东！打倒林彪！刘少奇万岁！”反动标语的现反分子，一面是一个强奸杀人犯。两颗头皮剃得溜青的光头，两张面如死灰的脸，两双在金黄色的秋阳温煦照拂下紧闭如缝的眼睛，显示出这两名死刑犯，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今天的下场！

那种面临末日、绝望无救的悲苦恐惧，使每个大街两旁具有恻隐之心的观望者，在“阶级敌人伤心难受之时、人民大众高兴开心之日”的时刻，外表个个现得兴高采烈，内心却阵阵地发紧发颤。想到活生生的人命，只要经一个扳机轻轻地一扣，就立即化为乌有，物伤其类的本能性伤感，使得这部分生性软弱、敌我不分的人类同胞，觉得老大于心不忍。在这鱼龙混杂的观摩人群中，当然也一定混有尚未暴露的罪犯，正在心惊肉跳地看着自己的同伙接受人民的严厉惩罚。这两类人，或是应该加以改造，或者应该加以打击。总之，都是革命的清除对象和目标。而我当时站在人群中却想：如果这大街两旁少了这两类分子的存在和围观助兴，只留下清一色纯粹看热闹的眼睛和麻木不仁的头脑，这兴师动众的游街，也就变得毫无目的和意义了。而

使作者当时最感触到的，当然不是这两个配角型的死犯，而是车厢前端正中站着的马进。他的头皮也泛着光溜的青黑色；他仟瘦的脖颈上，也高高斜插着名字上打着红叉的令箭形判决牌。但是我不知道：在构思酝酿和书写寄出那份信件的时候，他是否预见到了今天的下场？以他的政治智商，我想他不可能不意识到明摆的风险。可是面对秋阳金黄色的光，面对工学院门口那些观望者熟悉的脸孔和眼神，他那被剥夺了戴眼镜权利的双眼，却没有象与他同赴黄泉路的伙伴一样，闭成两道由绝望、恐惧和悲苦所构筑的黑色纹路。他的表情，显得安详而宁静。如果不是有一条车下围观者所不易察觉的细麻绳，死死地勒住他的脖颈喉门，他那不停挣扎扭动的头颅，分明显示出他要想同他所熟悉的学院同事和学生，说上几句最后的告别话。或者，他那扭动的头颈，也许只是在人群中寻找他的妻子、女儿和丈母娘。他深信在这人生给予的最后一个告别机会中，她们是一定会抑制住心头的无限悲痛，强打精神前来为他送行的。也或许，他不过是想透过人群的头颅，看一眼永远使他心头感到亲切留恋的工学院的校门、校牌和校舍。

他那仍然年轻却显得皱纹过多的额头，此刻在想什么？他是否象好多临刑前的垂死者一样，会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每重要的一页，惟恐不及地作一种急速的翻转回顾？他是否想到了自己“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所遇上的那场幸免于难、现在看来当时受难却能使他今天免于死命的反右运动？他是否会记起他下乡作四清动员报告时的那个土地庙，和那个忍辱负重的石街村民偷偷送上的一捧鸡蛋？他是否回忆起自己对那些刮“经济风”的“二等公民”们，借着马克思的经典说法所作的那个既充满人道主义同情又充满政治谬误的理论辩解？他对“一月革命”中的翻身者所表现的狭隘复仇心理，曾经是何等地失望和反感；而当这些造反派受到枪杆子镇压之时，却又竭尽全力地为之辩解辩护，不惜因此而种下最终置自己于死命的冤仇！作为一名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思考型代表，他对祖国的挚爱和对民族命运前途所作的思考与关心，也许比挤拥在这校门口的任何一名年少或年长的知识分子同类，都要深广，都要执着，都要痴迷。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不可能对符合这生活法则的结局，一点都没有预料。事实上，早在他看到自己的师长同学在反右运动中纷纷落难遭罪的时候，在他于土地庙里见到回乡监督劳动的高远时，他就认定：历史的前进，总是需要无数的铺路石作代价的！仅有的区别，就在于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作这铺路石。此时此刻，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属于自觉一类的吧？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显得如此平静，如此安详？

然而我想，他也未必能完全预知：为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独特的见解，为了使最高领导能够听到下面的真实情况和相应的思考分析，他竟要付出如此昂贵的人生代价！这代价，就是有一颗滚烫的子弹，将要在高速旋转之中，无情地敲碎他那坚硬的头骨，把他太过丰富、太过敏感的思维神经，象一把笤帚插进贴大字报的浆糊桶里，不由分说地乱搅一通，把它们捣成一团血肉模糊的浆糊。从此，他再也不能开口，再也无法为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献上他的哲理思考、独到见解和敢于说真话的无畏勇气。当他刚被收审的时候，他虽然曾从最坏处着想；但是这最坏的着想打算，仅不过是作好长期坐牢的准备。象他这样一类的中国知识分子，再聪明，也有痴呆的地方。他只想到自己对党对人民确实是一片好心。他相信：这封信虽然不一定能抵达毛主席的手中，但是他身边那些拆信看信的人们，一定不难从他那些也许是不无偏

颇的词句中，发现一片好心。而他却忽视了：他的自由通信权力，经过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冲击，并不享受法律字面上的保护。而缺少法律保护的信件，根本就抵达不了它本欲抵达的、可以确保他生命安然无恙的地方。而事实上，如果这封信真能上达天庭的话，如果毛泽东真能读到它的话，尽管英明领袖也许会老大不高兴，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推断判定：他绝少可能会因此而治马进的死罪。以我们对老毛处事为人习惯的了解，相反，他也许甚至会给他以某种程度的赞赏。而在老毛的权力达到这空前绝后的顶峰时期，他手下那批“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吏，却可以高扬他的大旗，随心所欲地杀掉那些他觉得命不该杀的甚至应该得到赏识的不幸者。这种情形存在的本身，无论对老毛，还是对所有对老毛真诚崇拜和无限热爱的中国人，都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和悲哀！也许就凭这一点，已经足以证实马进的“偏颇之见”不无道理。马进如果想到这层意思，应该可以自豪地开颜一笑。

根据我当时的亲眼目睹，他在游街车队开近工学院大门口的时候，苍白的脸上，确实是突然挂起了笑意。然而在这显现的一丝微笑中，与其说是显露了一种自豪之情，还不如说更象是泄露出一种懊恼与后悔。那样一种机械僵直的笑容纹路，在明眼人看来，毕竟不够潇洒，不够自然，而是明显带着强颜欢笑的成分。他明知笑不好，却也不能不笑。因为他终于凭着模模糊糊的视线，在人众中瞥见了他的妻子和岳母。遗憾的是，他却没能看到他那已经初懂人事的女儿。他既显得失望，又显得高兴；心中情不自禁地夸奖妻子想得周全：无论如何，为了女儿健康的心理发育成长，为了不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一个永远滴血的创伤，这种缺席殊为必要！他看到自己两位亲人的身边，站着许多他以前的前长征兵团的学生，他的心中，是否应该能为此感到一丝欣慰？在这生离死别之际，由于没有眼镜的帮助，他无从分辨他亲人脸上的表情。由于没有镜子的关系，他也看不到自己脸上的表情。然而，至少他能明辨自己此刻的心情。也许就是在这一瞬间，他才突然理解领悟到：什么是生死离别的真正滋味！这种滋味揪打着他的心灵，一定是使他起了一种心如刀绞的感觉。而他的那种笑容，如果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催化出来的，就不可能不僵直，不可能不带有强颜欢笑的成分。

试想：如果是我们自己死到临头，我们能做到百分之一百地笑容可掬，视死如归吗？事实上，当时好多根本没有身命之虞的旁观者，都做不到保持一种开朗自然、安之若泰的心情。

当游街示众的车队一离开工院校门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岳母，首先就双双晕倒在她们身边学生们的臂弯里。而那些经历过文革风浪锤打的大学毕业生，或者亲眼看到过马老师那封信的抄印件，或者听说过信的具体内容。虽然他们凭着自己前所未有的成熟和独立思考头脑，并不觉得马老师信上的话，句句都是至理名言。有些说法如果细加推敲，似乎还有自相矛盾之处。可是，他们却根本无法接受这是一封“恶毒攻击”的反革命信件。他们一向为自己在文革中所表现的敢于怀疑权威、敢于独立思考而自豪。在他们的眼中，马老师不过是把这种他们所引以为自豪的怀疑思考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有了文革后期的诸多痛苦体验和失望，他们的怀疑思考能力，正开始渐渐向更高的层次提升。他们已经常常在向自己提出类似马老师提出的疑问。当然，以正統的观念看，马老师对毛主席本人也提出质疑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如果对各级党委领导不能质疑的正统观念可以破除，为什么就不能对党的最高领导同样质疑？事实上，他们知道最高领导作过好

多提倡听反调、提倡独立思考的诚恳表示。马老师不过是在身体力行这些最高指示而已，何罪之有？他们在内心，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都无法把他们所崇敬的哲学老师，与死有余辜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上等号！他们把眼泪强咽进肚里，认定这是掌握市革会大权的“丘八”们，对怀恨在心的工学院造反派，所作的一种最无法无天、最肆无忌惮的公报私仇！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直接承受这种残忍报复的后果，虽然他们自己的性命安然无恙，他们的外表和心情，却比失去生命前一刻的马老师，还要别扭和伤痛。那天中饭和晚饭后的学院食堂里，到处是触目可见的剩饭残汤和咬过几口的馒头，就是一个明证。而这个清晨所突然发生的事件，更是昭明彰著，显示了一股暗中奔涌的悲痛和愤怒！

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终于被消防车人员不费吹灰之力地粉碎了。工学院的化学实验室，立即成了追查这一反革命事件的重点。可是，专案组人员很快就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个实验室从来就不进高浓度的硫酸液。如果王小燕此刻身在校园，她是可以排上头等嫌疑对象的。可惜，从68年初春时分起，她就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有传言说，她在参加一个全国性“炮打张春桥”秘密聚会遭到搜捕时，她父亲以前的另一个老战友帮助她逃离了险境。

如今，她已漂洋过海，在菲律宾参加了新人民军的游击队，一如既往地贯彻实践自己的理念和信仰。也有人说，她已经被菲共游击队枪毙；因为菲共暗中接受中共的“革命援助”，对后期掌管这一行的张春桥言听计从。总之，王小燕是无法给革命人民提供活生生的靶子了。

院革会领导面对破案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不利因素，并不消沉气馁，而是把不利当有利，将挫折当动力，借着这一充分证明“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的典型事例，乘机在工学院内部，进一步掀起了大张旗鼓整肃阶级敌人的高潮。

与王小燕合伙流窜徐州从事颠覆锡城市革命委员会罪恶活动的奚大雄，在《人民日报》有关“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社论发表后，就以卧轨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间。对于他的死，有各种不同的解说版本。有的说，他并不是自尽，而是在与徐州市的造反派发生内哄时，被人打死后为逃避责任，拖到铁轨上伪造自杀假象。有的说，送他上西天的人，实际上是锡城市革会派出的特工人员。这种说法，特别受那类侦探小说爱好者的青睐。也有人说：奚大雄确实是自杀。党中央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他陷于极度的悲观、绝望和痛苦之中。从革命的理智和党性原则出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不能违背党中央的意思，硬坚持锡城市以及同锡城市政治形势直接相关的江苏地区，却是“一片白”的现实。从感情上及其流离失所的自我政治处境出发，他又怎么也接受不了这“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残酷结论。他把头颅交付给铁轨，仿佛希望撞碎他脑壳的飞转车轮，能够带他去见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解答他的困惑，清除他的苦恼。然而，按照最终回锡自首投案的金阿二的交待：导致奚大雄自杀的主要原因，却是非政治性的。在他臂膀被车轮轧得血肉模糊的一只手里，仍然握着他妻子留给他的那份绝命书。那张皱巴巴的纸头，原先似乎前后浸印过夫妻两人的斑斑泪痕，此刻却溅着丈夫星星点点的肉浆，上面写着：“大雄，当你看到这种纸头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

不要以为我是用自己的死，来发泄对你的怨恨和谴责。不是的，我永远感激你带给我的那份关怀、尊重、疼爱 and 欢乐。是我自己不好，我不应该

忘乎所以，对生活抱有太多的期待和希望。当这些希望终于被现实击得粉碎时，我就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女人似乎永远是弱者，而我则更是弱者中的弱者。玉芳是对的：我既没有充分的资格，又没有合适的的能力，帮你照顾好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因此，我不得不与你永远告别。请转告我对玉芳的真诚祝愿。凌漪1968年5月4日凌晨留”金阿二知道：凌漪在奚大雄登上火车去徐州那个凌晨所留的这封绝命书，是在她吞食安眠药自杀身亡后的一个多星期后，才经过辗转周折传递到奚大雄的手里。从此他发觉奚大雄就经常变得精神恍惚，(反)革命斗志一落千丈。因此按金阿二亲眼目睹奚大雄自杀现场的情景作推测：他自寻短见并不是受了马克思的召唤。作为一个工人造反派，奚大雄不会具有那些知识分子造反派才具有的奇奇怪怪的念头。显然，他只是向老婆学习看齐，不甘落后地去追赶他老婆的脚步了。金阿二所提供的情况也许更为接近实际；但是，他显然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市货运公司，奚大雄一心要想打倒的崔志中成了公司革委会的“三结合”领导干部，而原党委书记邱铭却成了“走资派”。这样一种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显然是奚大雄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和接受的！

同王小燕曾经有过深厚革命情谊的曲湘川，自从在《长征战报》上发表了那篇揭发批判武遥的大作之后，两个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关系，就出现了裂痕。但是这种裂痕在开始阶段，并不具有使两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的性质。尽管由于父亲的关系，王小燕对自己的武遥叔叔有情独钟，有着特殊的敬爱和尊重，在毛主席所倚重的张春桥公开判处武遥政治死刑的大前提下，曲湘川在兵团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同王小燕所作的个别意见交换，所持的立场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有一段时间，王小燕甚至确实认为自己是个人感情代替了革命原则，并为自己不能大义凛然地站起来，象曲湘川、朱兆平等一样，向旧省、市委用来破坏捣乱锡城市文革运动的大黑手武遥猛烈开火而羞惭不安。她同一向视为兄长的曲湘川之间的彻底破裂，是从在市革会门口的一次奇怪遭遇开始的。

那天在市革会小礼堂听完蔡国柱的报告后，王小燕刚走出离原市委现市革会大院不到一百米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北京牌军用吉普车从身后追上来，“嘎”地一声在她身边刹住车，一个相貌威武英俊的年轻军人，摇下车窗叫住她，彬彬有礼的请她带个纸条给曲湘川。王小燕很诧异：一是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位不佩红领章的年轻军人，而人家却认识她。二是她认得这辆北京吉普车乃是杜军长的专用车，虽然其性能并比不上蔡国柱所坐的苏制“嘎斯69”，却因为这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所乘的车型，坐上它，就获得了某种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因此整个驻锡部队就此一辆。面前这个年轻军人既然可以动用杜军长的座车来追赶她，说明他的来头不小。第三是她步出市革会大院时，见到曲湘川正同育文庆黄军等在院中的花圃前闲聊；而这辆小车显然就是从大院里开出来的。

“曲湘川就在大院里，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他呢？”王小燕惊异地发问。

对方却微笑着回答说：“你拆开看一下就明白了；谁叫你是他的亲密革命战友呢？你有责任帮助他。”说完对司机一挥手，那北京吉普就一下蹿得无影无踪了。

王小燕听对方的回答得很奇怪，就按他的要求打开纸条看；一看就大吃一惊！那样一个彬彬有礼的托讯者，却留给人几乎不能相信的潦草字体和流氓型的威胁口气：“姓曲的：如果你还敢围着姚美珠转，别怪我对你不客

气！昔子杰。”

傍晚在工学院食堂里，王小燕碰见曲湘川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把纸条交给了他，然后歪着头颈静观其变。曲湘川打开叠成“X”形的纸条一看，似乎大惊失色，却竭力稳住神情和语调，对她故作惊奇地问：“你从哪里搞来这莫名其妙的纸条？昔子杰，谁是昔子杰？”

王小燕冷冷地回答道：“我想，你该去问那个使唐延言发疯的姚美珠吧？至少，你认识她。这个纸条，可是我从杜军长的北京牌吉普车上收到的，来头可不小。怎么回事？革命革出了头，有闲空同公子哥儿比试起追女人的本事来了？别忘了，你可是有了妻室的堂堂市革会副主任啊！”

曲湘川赌咒发誓地否认。王小燕不作定论，含笑而别。然后是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却使曲湘川在王小燕面前不攻自破，无地自容……（为防盗版侵权，此处作大段情节删略）

到了1969年春，曲湘川终因斩不断同姚美珠藕断丝连的关系，被前来探亲的结发妻子撞破；再加上昔子杰背后趁机兴风作浪，颇得蔡国柱欢心的他被连贬三级，一头栽到市郊当了一个公社革委会的主任。上任第一周，他就接待了一名意想不到的来客。这位惶恐不安的来访者，不是别人，却是三年前他在下乡四清时认识的高虹时。故人重逢，接待的态度自然是分外地热情。可是言归正传后，会见的气氛，就变得十分地沉闷起来。曲湘川在官场上混了这一段时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变化之一就是学会抽香烟。此时此刻，高虹时反映的情况这么棘手，对着熟人又不好意思说一通推诿敷衍的话，就一个劲地猛抽香烟，直把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弄得烟雾腾腾，竟使得高虹时一下忽发联想：在她丈夫葬身火海的铁甲车内，刚开始时，一定也是这般烟雾缭绕、呛人眼鼻的吧？由于起了这种使人感伤的联想，于是鼻子就发酸，伤怀死者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滴下来。曲湘川对朱坤兴惨死在自己学院门口的大武斗中的消息，自然是感到非常地遗憾和痛心！可是，他怀疑高虹时此刻洒的眼泪，也同被戴洪发在清队中乱棒打死的高远有关。原属自己一派的锡山县农民造反军司令高金福因猖狂反党乱军，现在正关押受审。妄图“右派翻天”的高远充当他的狗头军师，被重新上台的戴洪发抓住把柄“秋后算帐”，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曲湘川已经同反党乱军分子划清了界线，又刚刚在男女问题上栽了跟斗，而且现在他也不再似当年下乡搞四清时那样血气方刚，头脑简单，当然不便支持高虹时与戴洪发继续对抗。无计可施地闷头思索了半天，突然灵机一动，就埋头给黄军写了一封短信，严严实实地封了口，然后把信交给高虹时，语气坚定而沉着地安慰她：“你就去找这个黄军。他过去是九·一九的头头，现在是市革会委员兼群众工作部负责人。你丈夫既是九·一九的核心组成员，又是九·一九的烈士，他对你的困难处境，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高虹时千恩万谢地告别了曲湘川，就到市革会群工组找黄军。已经同史苏星暗中敲定了革命伴侣关系的黄军，见了烈士的遗孀，读了曲湘川道明历史原委的信件，果然态度热情。

“我跟你丈夫挺熟，以前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他很爽快地对高虹时说：“其实你直接来找我，我也一定会全力帮你。那个姓戴的既然现在还想整治你，简直混帐透顶！其实，根本就不应该让这种人重新上台！我现在就帮你联系，尽快帮你把户口转到市郊来，他就鞭长莫及，只能对你干瞪眼了！”

“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个户口问题。当初我跟朱坤兴结婚后，管转户口的

部门瘫痪了，没来得及办。”高虹时一边诉说，一边觉得这位年轻领导办事地道，不仅懂得抓住关键问题，而且古道热肠，细致周到。交谈中不仅问寒问暖，还主动给她留了电话，并且不兴欺哄，而是实事求是地把工作难度告诉她：因为涉及到好几个部门和同邻县的地区关系，需要耐心和时间。但有他黄军在，至少对方是不敢如他们扬言的那样，派人来把她绑回原籍去的！高虹时心中得到无限地宽慰，一想到在清队中死于戴洪发手下人乱棒之下的高远叔，和仍然生活在戴洪发淫威之下的母亲，感激和感伤的眼泪，再次刷刷流淌到了她那张美丽动人的瓜子脸上。黄军在以前“九·一九”召开的“烈士追悼大会”上，已经见过高虹时的出众风采，脑海里留下过极其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当时她那副楚楚动人的哀伤状，使许多与会的“九·一九”战友，内心都为朱坤兴烈士艳福既深且短的命运，大为感慨和遗憾！此刻高虹时那乌黑的杏桃眼和白嫩的脸腮，重新挂起晶莹剔透的泪珠，就象露打梨花，雨洗玉兰，把个血气方刚、热肠如火的黄军，两眼痴痴呆呆地瞪直了，半晌才突然回过神。内心不无羞惭地走出门去，不厌其烦地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新毛巾，硬塞给烈士遗孀擦眼泪。

从那天起，黄军就经常通知高虹时去见他，通报进展情况，了解锡山县西塘公社西塘下生产大队革委会的最新动向。高虹时碰到这样一个年轻的热心人，就象又碰上了当年那些下乡四清的大学生，原先走进市革会大院时所存的心理隔膜和距离，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每一次的会见和问长问短，不但使她惶恐不安的心恢复了镇定，而且竟好象还给了她单调沉闷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寄托和希望。可是，就在据说她的户口问题接近解决的尾声阶段，她按约定去见黄军的时候，却突然听到一个晴天霹雳，几乎把她炸懵。黄军万分遗憾地告诉她，刚接到市公安局的电话，告知她的户口不仅不能转进市郊婆家，而且要服从原籍生产大队革委会的领导，尽快返回老家“抓革命，促生产”。

“为什么？”高虹时问话的声音，几乎带上了哭的调子。

“我也不清楚。说是根据内部掌握的政策。”黄军耸了耸肩。

“他们没向你说明清那是什么内部政策吗？你可是代表市革会去找他们的呀！”高虹时在突然的打击面前，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出她自己都感到惊奇的思辨头脑。

黄军被问住了。怎么跟她说呢？内中的实情，他实在觉得难以说得出口。事实上，作为蔡国柱老实听话的亲信而调到市公安局当革委会主任的育文庆，一开始也确实是用“内部政策”来搪塞他的。他当时就反击：“哎，我说育老兄，不看咱们当年一起革命造反的情分，就看我现在是代表市革会群工组为人民办事的分上，你也给把这个内部政策给兄弟亮一亮吧！”

育文庆被他将军将住。顿了半晌，才推心置腹向他露底牌：“跟你实话实说吧，这可是史苏星的主意。”

“史苏星？”黄军颇惊讶：“她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帮着那个土皇帝欺负人呢？”

“我怎么知道？有闲将我的军，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她？你俩之间，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商量吗？”育文庆语带双关地敲他。作为原“九·一九”高层一个小圈子里的人，育文庆对他同史苏星的关系，自然了如指掌。

聪明的黄军立即回过神来。他记得上星期在约见高虹时的当口上，向来不上群工部打搅他工作的史苏星，却突然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而当时

因为天气热，看到烈士遗孀在烈日奔波下之后，汗水不仅黏湿了她的乌黑鬓发，也黏湿了她半透明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衣，黄军为显示党对来访群众的体贴关怀，给她打了一盆温热的洗脸擦汗水。如今担任市革会副主任要职的史大忙人，这天撞进门来后，却游哉悠哉地坐到高虹时的身边，同昔日战友的未亡人，从年龄、个人问题前景打算，到家庭、孩子的情况等，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了十多分钟。第二天两人幽会，史苏星就夸奖黄军在工作态度上有巨大的长进，那种对来访人员所表现出来的体贴备至的精神，使她深受触动和感动。黄军以装聋作哑的态度，欣然接受上级领导的表扬称赞，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把未婚妻同高虹时作细细比较。是的，高虹时虽然已没有她所具有的那种青春活力和热火朝天的革命干劲，却有那种少妇型的娴静、圆熟和温柔的风韵。在黄军的眼里，史苏星那个俄罗斯型的脸容和身材，虽然是富有吸引力的，却无法同烈士遗孀那张巧夺天工的瓜子脸相匹敌。而更重要的是，他在高虹时的面前，可以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而她所射出的那种感恩戴德的美丽眼神，使他觉得乃是人间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享受和乐趣。而当他同史苏星在一起的时候，位置就完全被颠倒。史苏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他流露居高临下的态度，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也不作自我批评。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是：他可不是高虹时，因此并不习惯对居高临下者感恩戴德。

史苏星作为一个极聪明、极敏感、极有办法和能力的女子，当然不会对黄军的内心世界置若罔闻，毫无体察。凭着这种体察，她稍会动一下小手腕，就把黄军借职权便利见异思迁、想入非非的错误倾向，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这样一种责任、爱情与权力相交织的复杂微妙游戏，黄军是无法向高虹时坦诚相告的。面对着烈士遗孀眼泪汪汪的焦灼脸容，他沉吟半晌，最终心生妙计，力主高虹时直接去找蔡国柱。“你们在追悼会上见过面，还一起在烈士遗像面前合过影，当初你丈夫还是他亲自选中的核心组成员。对，找他去，他的话谁也不敢不听！”

高虹时受了黄军的启发鼓励，觉得阳光灿烂，柳暗花明。仗着有黄军派出的一名工作人员作陪同，毫不犹豫地直上那圆弧形的楼梯，去原市委办公大楼的第三层找蔡国柱。可惜，出席过党“九大”的蔡国柱现在权倾一时，万务缠身，并不是随时可以见人的市革会头号人物。而原任市革会主任的杜军长，已经带着威名赫赫的“常胜之军”，去了乌苏里江畔的反修第一线执行其本职工作。在外间屋子里，现任市革会办公室主任的包裕民，抱歉地告白：“蔡主任工作繁忙，有事可跟我说。”高虹时颇感失望之际，仍然坚持要面见蔡主任本人。

也许是高虹时求神心切，心诚则灵；也许，是靠丈夫在天之灵的护佑，蔡国柱不迟不晚，偏偏在这时候正好从里间办公室踱出来，一眼看到高虹时，立即就认出她来。热情地打招呼，关切地作问候，不嫌忙累地把她邀请到办公室内间作细谈。高虹时怀着感恩不尽的心情，严格遵循黄军的吩咐，略去戴洪发图谋报复的复杂政治背景不提，只把她在转户口问题上面临的阻难，就事论事地向新生红色政权的代表人物作倾诉。“什么内部政策？借了内部两个字，就可以什么交待也不给，一句话就置人于死地？真是岂有此理！这种根深蒂固的旧衙门作风，看来还并不是换上几个新生力量，就能解决问题。”蔡副主任带着愤慨，随即给育文庆打电话。自不必说，阻难立即迎刃而解。更使高虹时受宠若惊的是，这个不忘死难烈士革命贡献的市革会首长，

竟一定要包主任派一辆小车，风风光光地把她送回朱坤兴烈士的故居。

在这篇小说里所有出身有问题的主要角色中，高虹时也许是一名唯一的幸运者。在蔡国柱的亲自干预下，她的转户口问题不仅得到了顺利解决落实；而且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党的“九大精神”不断深入人心之际，“九大”代表的夫人时红霞亲自下公社找曲湘川，说明她年老体衰，在文革中被奚大雄那伙人打伤的身子又多病多灾，三天两头歇病假，还是操劳不了那个家。为了让老蔡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确保他每天都能精力充沛、无所牵挂地投入革命，有关方面已经决定，要曲湘川通知文革烈士遗孀高虹时上她家去当帮佣；并列入市革会勤杂人员名单发工资。

高虹时在蔡国柱的家，一呆就是五年。直到在1974春，蔡国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劫难逃地成为与林彪黑线有牵连的清洗对象，高虹时的名字，才从市革会勤杂人员的工资名单上去掉了。在这五年中，虽然人生难免会有舒心一时或别扭一时的事情发生，就总体而言，高虹时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其中值得一提的舒心事，是她的母亲在蔡国柱无远不屈的政治影响力下，终于摘掉了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地主婆”帽子。而使高虹时至今还心感愧疚别扭的是：在蔡国柱夫人的亲自陪同下，她去医院做了一次颜面无光的人工流产手术。当然，那是在她的身形尚未使公公婆婆和外人看出异样的时候。在那种年月里，小百姓家的寡妇如果莫名其妙地大了肚子，乃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保持高度革命警惕的人民医院，也不会随随便便接纳你。如果正好搭上一个什么运动，很可能还会演变成一种阶级斗争的迹象，弄不好连人命案子都会闹出来！因此，市革会主任夫人的陪同，是殊关紧要的。她那张平板的严肃脸盘，虽然被过早来临的“妇女更年期”搞的象结了蜘蛛网似的皱纹密布，却是一张到处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其实，高虹时大可不必为此心存别扭愧疚；她出这种纰漏，是情有可原的。在穷凶极恶的小权势面前都无法抵挡的事，在和蔼可亲的大权势面前，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

在1974年春夏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靠近市中心的城中公园里，又如火如荼地竖起了一排排的大字报专栏。大字报的内容，主要分成三类：一是揭发蔡国柱卖身投靠林彪，在锡城市为其大兴土木建造特殊的“地下行宫”。二是结合批判孔老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克己复礼”路线，愤怒声讨蔡国柱借揪五·一六”之名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这类血泪控诉大字报的作者，清一色的都是原革联指的成员；他们甚至企图借着这一机会，为那些至今仍然身陷牢笼的“反复辟委员会”成员翻案。第三类大字报，政治和理论水平最为引人注目。它们借古喻今，文采飞扬地提醒人们：目前军政合一，各大军区如果拥兵自重，会造成了中国政治格局“尾大不掉”严峻局面！作者呼吁人们认清军阀割据、“骄兵悍将向长安”的现实危险，从弘扬法家“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理解和推进“批林批孔”斗争。这类大字报危言耸听，文字火力富有凝重的历史感，作者多是史苏星领导下的宣传口子中原“九·一九”的那班文人秀才。历史向前推进了六、七时间，他们喜剧性地同以前以“反军乱军”为能事的革联指老人马，遥相呼应地结成了“反军倒蔡”的统一战线。令人费解的是：把这两帮子昔日冤家对头联结在一起的一个奇怪政治主旋律，却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所合伙反对的、全国性的“军人专政”局面，难道不正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一大胜利成果吗？与此相联

系，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大成果是：令人憎厌痛恨的“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肆无忌惮地席卷全国；文革本意上要加以监督制约的权力，反而变得更加为所欲为！七亿人民跟着老毛头破血流地折腾了大半天，却折腾出这样一种结果来，心中的怨恨和失望伤心，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如果平心而论，文革的后果和产物并不一概都是消极的。由于在哪怕是最偏远的穷乡僻壤都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毛泽东个人所深恶痛绝的、在前“城市老爷卫生部”英明领导下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医生只为全国百分之十人士服务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改善；对于这一点，好多即使把文革看作是一场东方式德国纳粹运动的西方人士，都不得不加以承认或赞扬。而锡城市的大部分市民，除了象本作者那样在农村有一大帮“泥腿子”亲戚的人，对这种改善的好处益处既无法感同身受，就难免对它的深刻含意抱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反映在锡城人对待有关要警惕“藩镇割据”的呼吁上。兴许是吸取了文革后的事实教训，觉得“尾大”还是“头大”似乎都与己无关，谁当老大对小百姓来说都差不多；因此他们仅对第二类有关“五·一六”问题的大字报，表示出较多的关心。因为这跟他们的亲友、同事或自身，或多或少有一些直接间接的关联。除此之外，他们牢骚更盛、埋怨更多的，却是当权者们肆无忌惮“走后门”的十二级歪风。他们一向相信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如今却几乎觉得这是一种存心欺骗糊弄！可是一向非常看重保持中国革命纯洁性的毛泽东，此刻却令人费解地为老百姓痛恨的“走后门”辩护说：“后门里进来的有坏人，前门里进来的也有坏人。”这样一种诡辩说法，违背了文革要监督制约权力的初衷，回避了“走后门”不合共产党“不拿权力作交易”原则的实质，却在现象问题上兜圈子。因此江青按他丈夫“七、八年再来一次”理论搞的“放火烧荒”，只是把蔡国柱这样的人拉下了马，却并没有能够轰轰烈烈地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烧成“第二次文革”的燎原大火。

对蔡国柱来说，就如他当初的冒升和春风得意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一样，他的下台，也并不孤独。陪着他一起革职下台的政治失意者，那时候在全国范围有一大批，几乎都是各地支左军代表出身的实权人物。这批人的前途和命运，包括地方上所有与林彪毫无牵连但仍然无一例外被请回军营的各级军方代表，其实早在1970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决定了。在那个被毛泽东称之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庐山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军方人士，开始时都一致热烈拥护国防部长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尽管多数响应者如今都认为他们不过是受了蒙蔽，如果人们尊重历史事实的提示，就不能不怀疑在这些人的中间，是否有人心里其实很明白：如果国防部林部长真能如愿以偿地当上林主席，那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充任军代表的司令、军长、师长、团长等，名正言顺、一劳永逸地兼上一顶省长（书记）、市长（书记）、局长（书记）的帽子，也必然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自然延伸。也许这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按毛泽东所作的反应来看，似乎至少他是朝这个“小人的方向”去揣度和预防的。一个最为基本却常常为史学家们所忽略的历史事实是：从林彪倒台起，军队在各级地方政权中的影响力，就每况愈下，急剧消退。到了“批林批孔”的后期，似乎是响应政治嗅觉特灵的史苏星摩下一班文人秀才所造的“削藩”舆论，毛泽东和邓小平合谋作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重大决策。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全国所有在地方任职的军方要员，都不得不把促使他们把那套军人作风刮遍全国的执政大权，恋恋不舍地重新交还给了以前的地方干部。

在锡城市，接任蔡国柱市革会主任位子的，是德高望重的老市长俞迁。原市委书记老陆波已经病故。返家休养的武遥，神志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与他朝夕相伴的杨玲，经常带着女儿杨翼上教堂作礼拜。精明强干的原市委办公室主任恭鹏志，则取代武遥在锡城市当了介乎于第二到第三号人物位置的市委副书记。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雷竞天，被蔡国柱在“五·一六”学习班里关了好几年，后来赶到苏北农村去“练红心”。七八年返城后考上大学，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如今在中国一家开放度颇高的社会科学刊物当编辑。在这个世俗主义风靡世界、几乎人人都相信惟有个人主义能把人类带向灿烂明天的时代，他似乎是一名仍然执着于当年为国为民为理想初衷的幸存者。我出国前他有一次曾经对我说过：“我虽然曾为自己的做人信念付出过惨重代价，但却永远是一名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我相信他；因为前年他妻子终于离他而去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谢绝了一家大公司总经理职位的聘请。不久前，作者在通信中同他讨论文革话题时，他对我说：“就其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残酷的斗争手段而言，纳粹运动和文革确有不少相似之处；然而就实质性的民族动机、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取向来看，两者却风、马、牛不相及。西方学者老是哀叹中华民族缺乏自我反省精神和自我批判的勇气；也许，他们应该在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上，先为中国人作一个善于自我反省的榜样。文革的根本教训，也许是蔑视、仇恨和对抗不能解决问题，靠伟人的宏图大略更靠不住；中国人应该从每个小学生起，就注重培养相互尊重、理解、关怀、宽容、妥协和合作的国民精神。”

雷编辑尽管空有一堆高洁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独到的见地，却似乎也逃不了有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在其内心弄神作鬼；于是在前半段话中，竟然用反唇相讥的态度来傲慢无理地对待恨铁不成钢的西方国际友人。抱着这样一种历史的重负和一味护短的鄙陋心态，怎么能够轻装上阵、精神抖擞地走向下一个世纪去呢？哎，丑陋的中国人！我又遗憾，又为之害羞。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到底是人民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如今，从走俏世界的美国亨廷顿之精英统治理论，到中国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和莫言的《丰乳凸臀》，似乎还是林彪赢了。当中国百姓以为自己真被当成了一帮群氓阿斗或“石下草”却又忿忿不平的时候，类似文革的悲剧，会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再次重演呢？而在整个人类地球村上，贵族和贱民之间已争斗了几个世纪的大悲剧，什么时候才能终止？要知道，布什总统同萨达姆总统玩起武斗来的时候，使用的可不是“九匪”和“革匪”手中的长矛和古巴刀啊！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稿于多伦多

